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近世名人大出殡



序

一

北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古都，自古以来，这里聚集着众多的知名人物，尤其是清末民初，这个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众多的风云人物应运而生。由于历史较近，所以这些人物又为人们所熟知，有的是民族精英，他们的毕生作为，对于历史的发展与民族经济、文化的繁荣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有的则是在历史上功过比例不等的复杂人物。还有的则纯为民族败类。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一，统治阶级所持的功过标准各异，因而使得他们都有一个令人瞩目的身后“哀荣”——隆丧厚葬。

本来，丧葬礼俗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是传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史的一个侧面。而每个不同历史时期名人，不同形式的典型葬例，则好像是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反射出这种传承文化极为丰富多采而又纷纭复杂的内容，从而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典制，以及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人们的礼仪、风俗、习尚、心态（追求和向往）。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通过多年的民俗调查，并多方搜集历史文献资料，整理、总结了自清末以来，直至本世纪5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地区的名人葬例和与北京地区有关的名人葬例。

本书从被发送人的社会地位选择了上至前清帝、后、妃、王公、民国总统、总理、军阀、名僧、戏曲名伶，下至民间艺人、烟花妓女等例。从葬例性质上，既有国葬、公葬，又有民葬。从殡仪形式上，既有民族传统形式，又有辛亥革命后“改良维新”的形式。从历史时期上，包括了清末；民国后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国民军北伐统一中国之后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日寇侵华，华北沦陷时期；并附本世纪50年代初期一例。这样，基本上反映出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不同阶层，各种不同形式的丧葬礼俗。

历史人物的毕生经历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生有地，死有处”，生地死处未必一致，身后哀荣亦各有异同。有的历史人物的原籍及其最后“归宿”都非北京，但他的毕生活动，却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创业、扬名就在北京；有的本是北京人死于异地他乡；还有的纯系异国人士，却身后之葬礼杂以北京礼俗。凡此种种，各择其较为典型者，列入一二，当可反映出外地礼俗与北京礼俗的异同，以资对照类比。

二

清末民初这个历史时期，欧风东渐，新潮泛起，一切旧的意识形态都在逐渐更新，作为传承文化的丧葬礼俗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始自清代康、乾，定型于道、咸的传统模式，直至本世纪50年代初，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还占上风。这在许多名人的丧葬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清末民初的名人葬礼，表现了如下的四个特点：

（一）、新旧形式的兼容并蓄

新旧交替必然要有个渐进的过程，虽然旧的意识形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由于丧葬礼俗，较之其它礼俗（如岁时节年礼俗、婚嫁礼俗、寿庆礼俗等等）具有更为顽强的传承性。这主要是丧葬的“礼”与“俗”比较统

一，群众基础很深，难于一时从根本上彻底改变。有的名人多是所谓“三朝元老”、“两代元勋”，平生身跨两个以上的不同历史时期。历史和他们自身的经历都无法绝然割断。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政权的更迭，其它方面的旧意识形态则是任其自然存亡。同时，民国肇建，礼制未修，在无典章可循的情况下，必然要沿袭其旧。故清末，尤其是民初，以至民国以来的名人葬礼，除孙中山和极少数人是全新的以外，几乎都是新旧形式兼容并蓄的，在某种程度上，新的形式仅仅作为传统形式的附加部分，成为一种点缀。此种情况以南方各省、市为最，北方次之。例如：上海十里洋场的名人大丧，讲究以印度巡捕骑马开道，并用以多种军乐、西乐、间杂于传统仪仗、响器之间，既要擎举作清官“荣归故里”时的万民旗、万民伞，又要高悬民国时期所荣获的锦旗、锦标。既要以黄亭抬着清帝所赐的“御赏”；又要以彩亭抬着民国时期所得的文虎章、嘉禾章等勋章大绶和盖有“荣典之玺”的功勋状。

（二）、民葬（家葬）与公葬，或公葬与国葬在性质上含混不清。

一般平民百姓死后，绝大多数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举行葬礼，极少数因赤贫无力发丧埋葬的，才由他人助葬，形成一种贫葬穷办性质的“公葬”。而名人无论其身后是否萧条，均可出现地方性的，行业性的公葬，成为死者的一种荣典。其实际上，都是民葬与公葬的混合体。有的小名人若单凭其生前业迹，并不够公葬条件，但因身后萧条，棺椁无着，必有其本行业中的某个单位或个人出头，为其集资助葬（通过公葬又加深了其知名度）。后者，既有民葬的性质，又有贫丧富葬——公葬的性质。还有的名人有功于国家或地方，但又不够国葬条件的，有时，国家或地方以某种不同的名义给予公葬。

民国时期有“国葬”的提法，但由于军阀混战，政局不统一，不稳定，所以《国葬法》的确立、颁布、执行与废止都比较混乱。国家的“伟人政客”身后哀荣务尽其奢，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和规格，唯以民葬模式为基础，附以某些新的形式（如陆、海两军仪仗队等）而已。

（三）、体现了信仰上的“三教圆融”和“万道归一”。

名人，尤其是政界人物，生前为了政治上、交际上的需要，很可能介入多种不同的宗教，所以，在他们死后的丧礼上，必然会出现儒、释、道各占一席，来个“三教圆融”。按儒家的典制成服、成主；办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的综合法会，这是司空见惯的做法。有的亡人及其孝属并非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丧礼排场上、观瞻上的需要。当然，有的确是由于身份复杂，一身多信，而导致身后葬礼上的“万道归一”。例如：旧时住在上海租界的英籍犹太人哈同，本来是犹太教徒，住在“公共租界”里，身为洋行老板，受到西方天主教的影响，在家庭里又受其妻子和大管家佛、道两教的影响。所以，他死后的葬礼中，世界上主要的几大宗教不能不各占一席，成为古今中外罕见的奇观。

（四）、受满清统治者的影响，在婚丧礼俗上，满汉两大民族逐渐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汉人满化，满人汉化，或采取满汉合璧的形式。

清代，汉官婚丧礼仪掺杂满礼；民国以后，满人婚丧礼仪又掺杂汉礼，如满人出殡学汉人的摔盆儿，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况，集中地体现在某些名人葬礼上，因为其礼仪排场越大，越要满、汉合璧。什么满汉全席、满汉执事，一骨脑儿地往一起堆砌。例如：袁世凯是汉官，但在他死后的丧礼上，许多方面都是按清室皇家的满旗礼仪进行的。出殡时的仪仗既有汉执事

的五堂幡、伞；又有满执事中的门熏、曲律、黄鹰、细犬、骆驼、刽子手等象征游牧民族出猎的仪仗。是典型的满汉合璧形式。

三

清代国家有典章礼制，而且等级森严，强调“遵礼依制”治丧。王公贵族有爵、衔之分；臣僚有品级之分；满、蒙、汉三军二十四旗（外加内务府三旗）各依定制，不得逾越。民国初建，北洋政府不修典制，对于前清的典制又任其兴废存亡，诚然做到了“朝廷无干涉民俗说”。除前清王公、遗老自觉遵守旧制外，对于汉人则听其自便，不论官民，只要有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名人，尤其是“伟人政客”既不受礼制上的限制，又不受经济上的制约，所以就都竭尽全力，各显其荣。从形式到内容都不甚规范。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企图改革旧式的婚丧礼仪，由于习惯势力强大，结果都不成功。

国民军北伐，北洋政府覆灭后，国民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下同）于民国20年（1931年）5月15日通令废除跪拜礼，要求依新颁法令“痛革此种恶习”而代之以鞠躬礼。

民国23年（1934年）9月，北平市社会局力图“纠正礼俗”。9月23日《北平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自民国成立以来，对于专制时代之礼节，虽有改革之命令，但各地居民相习成风，迁延敷衍，阳奉阴违，致各种仪式新旧参杂，而以北平市为尤甚，凡婚丧庆吊，仍多袭用前清旧制。仪式方面，往往金瓜、钺斧、朝天镫，伞扇旌旗，招遥过市，甚有绵延数里之长，而执斯物者，多为乞丐，蓬头垢面，红帽绿衣，实有碍观瞻，阻滞交通。在当事者，以此种铺张，认为荣耀。至于礼节方面，多数居民仍喜沿用叩头、作揖、请安等形式。酬酢既费周折，且表示一种奴隶根性。现闻社会局将组织讨论礼俗委员会，对于婚丧仪式及各种礼节，拟条分缕析，详加讨论，明白规定，布告市民，一体遵照……”

但无下文。

民国25年（1936年）1月，北平市公安局通令，取缔旧式婚丧仪仗，令区、队认真执行。《北平晨报》于1月22日报导说：

“平市公安局以旧式婚丧仪式屡经取缔，乃近来仍有沿用者，该局昨特抄取缔婚丧仪仗执事各单，通令各区、队认真执行取缔，不得稍忽。兹录其应取缔婚丧仪仗执事各单如次：

“坐都马、后护旗、日正伞、如意轿、小拿盘、彰库刀、拉都桶、弓箭撒带、诰封黄亭、曲黄伞、提炉御杖、龙幡、黄牌、龙扇、曲律、衣包马、门伞、扇棍、耳箭、刽子手、军牢夜役、龙头皮架、鸟绵枪、黄鹰、细犬、对马骆驼、官衔红牌、官幡、回避牌、红锣衣、红缨凉帽、对襟补褂、红缨秋帽、红锣帽、肃静牌、曲黄伞。”

所有这些“通令”，全国上下，一律执行不通，人们根本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俗云：法不责众，当局碍难强制。尤其那些使用“前朝仪仗”的，不是清室遗老，就是民国新贵，地方上对这两类“上层人士”拍捧唯恐不及，又何以限制？另一方面，当时红白口上的各类租赁行业、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为数甚多，如彻底取缔，势必造成失业，政府又无力安置，所以，每次颁布一项“取缔”、“限制”的通令后，又都以照顾“民间生计”为下台阶的

藉口，从这一历史时期整个名人葬例来看，当局的改革通令徒具空文。

至于日伪时期五次“强化治安”提出所谓“革新生活”，以及新民会中央指挥部部长缪斌手订《新生活实践运动要纲》第二项“丧祭仪式应为求简单肃穆，取消无谓之仪仗。”更是纸上谈兵，由该时期的巨奸葬例来看，诚然是自打嘴巴。

抗战胜利后，面临彻底倾覆、瓦解的国民政府内政部，于民国37年（1948年）9月16日，公布了所谓《婚丧仪仗办法》（条例），该条例第四条规定“婚丧不得沿用含有封建色彩或迷信性质之仪仗，违者由地方主管机关分别予以销毁或没收之处分。”不过，作为时局来讲这已是多此一举了！历史宣告：不劳阁下的大驾了！

四

婚丧礼俗，包括历史上名人的葬礼，乃是社会史的一部分，我们同样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它，从广义上讲，重视人的身后大事，让有业绩的死者充分享受哀荣，历来被汉、满两大民族的人们视为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大事。官、民、贫、富，各有各的办法。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正面意义。从其主旨上看，都在体现自己民族、国家、家族，以至个人集团的尊荣，尤其是旨在体现人类自身的尊严（以区别对于其它动物死后的处理）；激励、教育后人继承先人余绪而创业自强。总之，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以礼治国”的产物。

但是，我们也应从另一方面看到当年的一些军阀、政客、汉奸，并无正面的业绩可谈，他们将毕生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修坟墓，大办丧事，竭力炫耀自家的“天恩祖德”，功名富贵。而且互相攀比，不遗余力。不但虚耗了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而且造成社会上的不良空气。这是应予批判的。

因为本书主要是旨在体现近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礼俗，不是仲裁历史人物。关于有些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根据他毕生的政治作为，历史功过，应不应享受某种哀荣，对后人有无积极的教育意义，我看，笔者在此不必大发议论，这个“权利”还是留给广大读者吧！

完颜佐贤。《康乾遗俗轶事饰物考》。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8出版。第39—44页。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出版。第84页。

《公安局取缔旧式婚丧仪仗，令区队认真执行》。《北平晨报》，1936—1—22第6版。该报导所列仪仗杂乱无章，不但婚丧不分，且仪仗与执事夫的衣帽混杂一处。第十项“曲黄伞”与最后一项“曲黄伞”相重。笔者未予改动。望读者注意。

《内政部公布婚丧仪仗办法》。北京《华北日报》，1948—10—6第6版。

近世名人大出殡

同光两朝不挂名女皇的“金葬” ——慈禧太后葬事概略

世人相传，人死葬法有五：即金葬、木葬、水葬、火葬、土葬。此乃将人间的葬事牵强附会地赋予“五行”的意义。帝王、后妃死后为金葬；满、汉臣民死后殓以质料不同的木棺，是为木葬（然后以土掩埋，实际上是木土复合葬）；水葬多出现在江河湖海之滨的少数民族；佛教徒圆寂后皆荼毗火化，表示“五蕴皆空”，是为火葬；回民死后挖“喇哈儿”为土炕形，使遗体直接接触于土，是为土葬（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概括中国各民族所采用的各样葬式，因此是不完整的）。

盖金葬是对帝王葬事的尊称，言其至尊、至贵、至高。仅以垄断清政权达48年之久的慈禧太后来说，她死后是典型的“金葬”。其葬礼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耗费人力物力之巨是骇人听闻的。从她六脉初绝（民间称“倒头”）到葬入东陵地宫，丧礼近一年，共花掉120万两白银。

古制天子之椁四首。清代帝王的棺椁比起古代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的金棺做好后，先用一百匹高丽布缠裹衬垫，再漆饰四十九道。每道油漆都必须按既定工艺规程如法操作，工序各有不同名目：第一道谓之“钻生漆”；第二道谓之“通漆灰”；第三、五、七、九、十一道谓之“漆满糊布”；第四、六、八、十、十二道谓之“压布漆灰”；从第三道到第四十道轮番使用漆满糊布和压布漆灰两种工艺。第四十一道谓之“中漆灰”；第四十二道谓之“细漆灰”；第四十三道谓之“浆漆灰”；第四十四道谓之“糙漆”；第四十五道谓之“垫光漆”；第四十六道谓之“退光漆”；第四十七道谓之“笼罩漆”；第四十八道谓之“金胶漆”；最后一道谓之“满扫金”。

漆饰完毕还有一系列的加工。她的棺材体积庞大，盛殓遗体绰绰有余，于是填装了大量的殉葬品。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1908年11月16日），慈禧遗体验入梓宫，同时放进去大量的殉葬品。其中有：正珠朝珠五盘；东珠朝珠四盘；红碧瑶朝珠四盘；绿玉朝珠二盘；珊瑚寿字朝珠二盘；珊瑚双喜朝珠二盘；红碧瑶手串三盘；绿玉莲子手串一盘；珊瑚手串一盘；正珠念珠六盘；红碧瑶念珠二盘；绿玉念珠一盘；珊瑚圆寿字念珠二盘；绿玉兜纪念一挂；正珠挂钮一副；金镶正珠镯子一副；金镶各色真石正珠镯子一副；金镶珠石镯子五副；珊瑚雕螭虎朝珠一盘；珊瑚朝珠二盘；龙眼菩提朝珠一盘；大正珠手串一盘；正珠手串二盘；东珠手串二盘；金镶正珠龙头软镯一副；金镶各色真石白钻石葫芦镯子一副；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镯一副；东珠软镯一副；白玉镶各色真石福寿镯一副；绿玉圆镯三副；绿玉烟壶三件；茶晶烟壶一件；白玉皮烟壶一件；玛瑙烟壶一件；洋金镶白钻石小表一件；洋金镶珠日带别针小表一件；洋金镶白钻石宝砧桃式别子一件，紫宝石桃式别子一件；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珮一件；绿玉透雕活环珮一件；珊瑚鱼珮一件；大蚌珠别子一件；白玉鱼一件；蚌珠别子二件；汉玉珞 一件；汉玉仙人一件；汉玉玩器二件；汉玉玩器一挂；金镶钻石带别子一件；白玉蘑菇一件；白玉羚羊小别子一件；白玉猫一件；黄玉杵一件；雕汉玉针一件；汉玉羚羊一件；雕绿玉圈纹扳指一件；雕汉玉镶金里扳指一件；汉玉扳指两件；红碧瑶暖手 一件；玛瑙暖手四件；汉玉东升 一件；汉玉箭隔 一件；汉玉蚕纹璧一件；汉玉英雄鸡心块 一件；汉玉昭文袋 一件；绿玉猴把杵簪三支；红碧瑶猴把杵簪一

支；正珠抱头莲二支；金平安小耳挖二支；蓝宝石抱头莲二支；红碧瑶抱头莲一支；紫宝百抱头莲一支；子母绿抱头莲四支；茄珠抱头莲二支；大小正珠抱头莲四支；绿玉抱头莲一支；蚌珠抱头莲一支；绿玉镶红碧瑶抱头莲一支；珊瑚绿玉蝠一件；金镶红白钻石蜻蜓一件；金镶白钻石蜂一件；红碧瑶绿玉穿珠菊花一对；金点翠佛手簪一支；绿玉佛手簪一支；金镶绿玉佛手簪二支；金镶珠佛手簪一支；金点翠镶绿玉小珍石米珠佛手簪一支；雕绿玉兰花瓣佛手簪二支；雕绿玉杵佛手簪一支；绿玉宽溜子 二件；绿玉溜子二件；绿玉马镫溜子四件；绿玉小马镫溜子一对；珊瑚宽溜子二件；珊瑚溜子一件；红碧瑶宽溜子一件；红碧瑶万寿无疆溜子一件；红碧瑶马镫溜子大小三件；绿玉镶红碧瑶福寿溜子三件；金镶红白钻石溜子一件；金镶红碧瑶小正珠溜子一件；金镶大小正珠溜子六件；金镶蓝宝石溜子三件；金镶子母绿溜子一件；正珠戒箍（11）一副；正珠戒箍一副；大正珠帽花（12）一件；金镶红白钻石桃式帽花一件；金镶红碧瑶绿玉白钻石帽花一件；大蚌珠桃式帽花一件；大正珠帽花一件；红碧瑶桃式帽花四件；金镶红碧瑶子母绿帽花一件；金镶红碧瑶珠边帽花一件；金镶钻石帽条（13）一件；横绳帽条（上钉正珠二百零四颗）茄珠褂钮一副。慈禧的遗体简直被深深地埋在珠宝、金银、翡翠、玛瑙之中，确实是名符其实的“金葬”。据说，当时有个宫女看了之后，觉得太过份了，背后曾议论说：“这么多的殉葬物，将来必要招致后患，到那时老佛爷（指慈禧）恐怕连条裤衩也剩不下。”20年之后这话果然应验了。民国17年。竟然被以孙殿英为首的军阀、兵痞们劫掠一空。

慈禧入殓后，金棺即停于寝宫。由和平门内大六部口陈记六合棚铺搭了一殿两卷的起脊大棚，作为每天王公大臣轮流上祭之用。按清宫惯例，要用番（喇嘛）、道（道士）、禅（和尚）、尼（尼姑）四棚经作荐亡法事，每天一棚，逢“七”四棚轮念或念对台经。这样，办成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的综合道场，以壮大丧礼的势派。所以，棚内部搭上高大的经台。祭棚外，搭着高耸的钟、鼓二楼，两边遥相对称，每日早晚上祭奠酒时，好来个“晨钟暮鼓”。棚外正中还要搭上三座高大的席箔牌楼，上顶安着席制的五脊六兽，有如旧时东四、西四十字路的四面牌楼。巍峨壮观。

牌楼下，对称排列着以青松碧柏的枝叶编成的狮、虎、象、麒麟、狻猊、骆驼、仙鹤、野鹿……还有数不清的宫廷特有的仪仗和黄云缎挂彩色飘带的“万民旗”、“万民伞”。俱都插于特制的金红罩漆的执事架上。

祭棚内，各王公大臣送来的满筵——饽饽桌子、各种祭席尽管随祭随撤，仍是堆积如山。

一切祭品务尽其奢。作为殉葬物的变种——纸活等冥器更是无计其数。在她奉安入陵之前，于不同的丧礼环节，焚烧了大量的纸糊的神楼宝库、亭台殿阁、凤辇舆轿、御前侍卫、歌妓侍女、京剧戏出、满汉全席、“三牲”祭筵、螺甸镶嵌大理石心的硬木桌椅、多宝格、罗汉床、金钱桌、金钱柜……以及仿其生前喜爱的文玩、古董、钟表、文房四宝、生活器皿等等。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此外，凡是她生前穿用过的衣服鞋帽，除了分别赐予皇亲王大臣作为遗念外，大部分随同上述纸活一起焚化。

据说，慈禧死后的60天，过“奈河”时已经烧过一次船桥。可是次年有的大臣却上奏说，老佛爷升遐后60天，正逢腊月封冻之时，恐不能行船，无法得渡（实际上他们想借机贪污）。但按丧礼旧俗，一切丧祭均不得重复，否则即有“重丧”（百日之内再死人）之虞。所以，只好托言于佛教的孟兰

盆会“中元普渡”的说法。于是即在宣统元年七月十五日（即1909年8月30日）再烧一次法船。按其立意，当然是专门超渡慈禧的御用法船，但这也象征着清室替慈禧发心普渡冥界众孤魂的法船，这样，就给慈禧作了身后功德。

慈禧的这条法船，船身長18丈多，寬2丈多。基本上是木结构的框架，糊以綾罗绸緞和彩布。据有关记载：“船上樓、殿、亭、榭、陈设悉备，侍从篙工数十人，高与人等，皆衣真衣。此外，殿陛阴森，神佛巍坐，旁立鬼判，状极狰狞。中竖10丈高桅，悬一黄緞巨帆，上书‘普渡中元’。无数红莲，围绕船外。”届晚，燃烛其中，蔚为奇观。文武百官列队，至东华门北沙滩地方送焚法船。当时，许多男妇老幼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人们“感叹之声，不绝于耳。”

慈禧奉安入陵的势派恐怕是清末最大的了。一般臣民死后“发引”用的引路大幡不过高1.5丈，或1.8丈，最多以32人抬异而行。而慈禧用的引路大幡却高3.2丈，由64人抬起来就有4丈多高。所以，殓列所经过的地段，许多民房、厂房、电线杆都奉旨拆除。临时还有所谓“金锹”、“玉镐”在殓列前边开道，可以随时拆除障碍，“如有阻拦，处以杖刑，打死勿论。”

丹旌（大幡）之后，是五光十色的“万民旗”、“万民伞”的旗群伞海，遮天蔽日，以象征着她的“德政”。接着便是上千人的“法驾卤簿”宫廷仪仗队，以及风辇舆轿，连同僧、道、番、尼，王公大臣恭送的行列，浩浩荡荡蜿蜒十几华里之长。

关于慈禧奉安用杠的说法还不太一致。有说是用了128人的皇杠，因为她已经被尊为“太皇太后”，故与帝葬用杠相同。还有人说，根据清制帝后有别的制度，应为96人杠。但无论如何，用杠用罩是“落地满黄”（即黄漆杠、黄罩片、黄绳、黄垫、杠夫的荷叶帽上插黄锥翎）是肯定无疑的。

杠后是十路纵队的武装兵弁，他们佩刀肩枪，跟随护卫。最后面是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后妃嫔媵的车队，大约不会少于2000辆。

从北京到东陵，步行送葬需要5天。慈禧奉安时，由北京到马兰峪共分4站。每站都各搭停灵用的大路祭棚一处。所以，每天必须按计划赶到站口，以便将梓宫停入棚内过夜，送殓人马一并驻扎安歇。待次日起程。据承办慈禧奉安路祭棚的六合棚铺后人陈家骥先生说，这种棚是有一定规格的，其南北进身不得少于14米，宽下不得少于10米。这样，它的高矮大小的尺码才与皇杠（连同大罩）相适应，使杠罩出入自如无碍。大棚两旁还搭上一丈通连的棚，以供备司员暂住。棚外以木隔扇作为临时围墙，晚间门上加锁，垂下帘幕，下面掩上土口袋，暂禁出入，棚外正中，搭着三座大席牌楼，与宫内停灵时的祭棚的装点完全一样。

大祭棚后面为中军帐棚。内设虎座，为王公大臣们办公的地方。另备床帐，兼作大臣们的休息之所。

此外，另设“人”字形帐棚，作为王府六部值班人员住地，界以绳索，不准值班人员越界以确保灵柩驻地的秩序。

慈禧被葬入了普陀峪定东陵。其陵墓建筑豪华惊人，是个糜费的典型。但由于受清代帝、后有别典制的限制，所以她的地宫不能像乾隆皇帝地宫那样富丽堂皇，陵寝也不能像帝陵那样广大，因而她极力把隆恩殿等地上建筑搞到豪华惊人的地步。

在慈禧的地宫里，除了放置她的金册、金宝、玉册、玉宝外，还有镶满

珍珠、宝石的“三凤顶（即朝冠，乃皇后专用）等数百件极为珍贵的殉葬品，适成一座珍宝馆。但经过民间 17 年，军阀的大洗劫，如今只剩下一具残破的棺材，其它殉葬珍宝已荡然无存了。

五蕴，佛教名词。“蕴”，梵文意译为积聚、类别。《俱舍论》卷一：“诸有为法和台聚义是蕴义。”是对一切有为法作的分类，共计有五：（1）“色蕴”：“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劣若胜，若远若近，如是一切略为一聚，说名色蕴。”（2）“受蕴”：即把“诸所有受”“略为一聚；（3）“想蕴”；（4）“行蕴”；（5）“识蕴”；即把想、行、识“略为一聚”。此五蕴作为对一切有为法的概括，狭义为现实人的代称，广义指物质世界（色蕴）和精神世界（余四蕴）的总和，是佛教全部教义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

清档案：《孝钦显皇后升遐记事档》，第九本。

珞，即纓珞，用珠玉穿成戴在颈上的装饰品。

扳指，戴在右手上的装饰品，比戒指宽，供拉箭用。

暖手，在手掌中用手指拨转以暖手的两个圆球。

汉玉东升，汉代所砣玉兔。

箭隔，放箭的筒状物。

玦，供佩带的玉器，环形，有缺口。

汉玉昭文袋：汉代所砣佩剑用的玉物（袋系带之误）。

镏子，金戒指的一种。

（11）戒箍，吃斋时戴在脖子上或挂在身上的装饰品。

（12）帽花，帽子正中用珍珠缀成的花。

（13）帽条，帽子上的带子。

主要参考资料

俞进化。《清东陵与西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9。第 90—92。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帝后入陵式 ——光绪帝、隆裕后的“奉安大典”

按满清旧制，皇帝即位数年，便营“寿域”，但惟独光绪帝由于受慈禧太后挟制，其在位34年中从来无人提及为他勘定“万年吉地”修陵的事。及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崩，才急不暇择地在河北易县城西偏北约四十余里的太平峪（属西陵范围）赶修“崇陵”。因此，光绪帝的梓宫只能于当年十二月从北京奉移到易州梁各庄行宫内停灵“暂安”。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崇陵的基础工程尚未及半。直至民国2年（1913年），光绪帝的正宫隆裕后死后（亦暂安行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才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特派赵秉钧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协商后，拨款赶修。

光绪帝与他的正宫隆裕后是同时葬入崇陵的。其“奉安大典”是“一殓双棺”的形式。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末一次封建帝、后的“奉安入陵的仪式了。当时，因为两梓宫奉移的路线是队河北易州梁各庄出发至崇陵，所经之处，均是人烟稀少的旷野荒郊（系新修成的土马路），所以，这个奉安大典规模再大，礼仪再隆重，也是鲜为人知的。

民国2年（1913年）12月13日，光绪帝梓宫葬入崇陵时，用的是128抬的“独龙杠”，以表示“真龙天子”归位。这种杠是用一根前镶龙头，后嵌龙尾的大杠，龙头、龙尾均为金箔罩漆，杠上涂以黄漆。以这根主杠为轴心，两旁相你地各拴小杆、抬杆，每边各用60名杠夫肩舁而行。轴心大杠下，悬着黄云缎加绣金龙的大棺罩，罩顶上，饰以金葫芦火焰形的顶子，罩的四角上各系一条黄绸带，披于前后两侧，以杠夫四名，每人各牵拽一头，缓缓行进，谓之“拉幌”，杠罩两侧，各有杠夫12名，每夫各举拨旗（红漆竹竿，上挑横2尺、竖3尺，长方形，黄地白圆光，上书“皇室奉安”字样的小旗，遇有树枝或其它障碍物，可用其支起，以使皇杠顺利通过）。杠的四角各有一名手持“响尺”（约2尺长和1尺长的老红木的木尺各一根，用1.2丈长的“尺绳”相连，用短尺敲长尺）以指挥、协调杠夫们抬灵操作和行进的步伐。同时，每角还有一名手拿藤鞭的“执鞭压差”，监督杠头、杠夫的每一动作。抬杠的杠夫都是清宫銮舆卫所属的包衣旗人差役。按定制，要求他们前三天即要斋戒、沐浴、剃头、刮脸、全身衣帽普新。俱都头戴青荷叶帽，上插朝天锥式的黄雉翎，身穿紫色团花麻驾衣、土黄色套裤、足穿白布袜、青布靴、上盖黄色靴护，手上还要戴上黄手套。以示极度庄重、严肃。

这种皇杠不能现拴现用，而是要经过多次演练，直至全体杠夫的技术操作完全娴熟无误，经监杠大臣验收合格为止。

演杠时，在皇杠上放梓宫的地方铺上木板，摆上一桌两椅，桌子沏上茶水，由两位监杠大臣各坐一边，貌似品茗。实际上是在考核杠头、杠夫操作技术动作、步伐，是否合乎要求。主要的方法是由杠头以打响尺为号令，指挥全体杠夫慢步、快步，左右转弯、换肩、爬坡、上下台阶等难度较大的动作，继而排练换杠、换罩等技巧。在全部动作上必须保持杠的绝对平稳，以免“惊驾”。监杠大臣直视杠桌上的茶具，如果杠夫动作起来，杯里的茶水不荡漾，不外溢，茶具不倾斜错位就算达到标准了。这是皇家用杠所特有的礼仪排场，王公以下臣民的葬礼是不准演杠的。

奉安——金棺起杠前，也有辞灵仪式，主要是供“辞灵果子”，王公大

臣们依次奠酒，行三拜九叩的大礼。金鼓重乐和笙、管、笛、箫等轻乐参灵后，即由番（喇嘛）、坤道（道姑）、尼（尼姑）、乾道（男道士）、禅（和尚）依次诵经转咒。礼成后，即由监杠大臣传令，这时太宁镇绿营马队大喊“得令”！扬鞭开道而去，当做前导。与此同时，梓宫出殿，先被请上64人皇杠“小请儿”。在杠前焚帛化纸、奠酒行礼之后，才缓缓地启行。待将梓宫抬至在行宫大道上，即换升128人的“独龙杠”。这时，扬起来的金银纸钱铺天盖地而来。清宫銮舆卫准备的全堂满洲执事，排出约有数里之遥。其行进排列的顺序概况是：

一、走在最前边的是一座3丈多高的“丹旒”，即民间所称的“大幡”。原立于大内乾清宫左门之外，表示招魂之意。奉安时，由杠夫32人抬界而行。其形状为一红漆四方木架，中间装置一根红漆旗杆，杆顶为一金箔罩漆“火焰”形的葫芦顶，顶下悬挂着一面绣有金龙的黄帛直幅，垂至杆底，四周以红色“火焰”为饰，上系铜铃，走起来叮当作响。

二、熊虎常旗八对：

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

三、金箔罩漆的木质“金执事”：

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镡、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一对。

“八宝枪”一堂：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

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

四、门纛（即“坐纛”，系古代军中的大旗），杆高丈许，上有半尺来高的“火焰”式的金顶，悬有黄帛垂幅，上绣金龙，边沿有红色“火焰”为饰。两端缀以黄绸带，用两名执事夫牵引，谓之“拉幌”。

五、曲律，亦作“驱路”（满语译音），与前边引路的大幡相似，只是无铃成对，亦即小型纛旗。共八根。均为黄色直幅绣上金龙，边缘以红色“火焰”为饰。

六、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牵黄绸带“拉幌”以行。

七、如意亮轿一乘。即四人抬的一把“宝座”。背似如意头，上有黄绫靠垫，并铺以豹皮一张（因无帷故称亮轿）。

八、日照影伞一把。此是给如意亮轿遮阳的。其伞的直径约三市尺，伞围子仅一尺二长，成为一把扁伞，黄寸蟒缎料。伞小，不拉幌。

九、大掌扇一对，走在日照影伞的两旁，表示为大行皇帝打扇。

十、金鼓重乐一班。拉号、官鼓、唢呐、海笛、笙、九音锣、跟锣。但设乐而不作。

十一、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以黄绸带拉幌。

十二、笙、管、笛、箫、九音锣等轻音乐一班。类似民间的“清音锣鼓”。但设乐不作。

十二、御影亭一座，16人抬。其亭宫殿顶盖，敞门但罩以黄纱帘。内供光绪御影一幅。下边为须弥座。均以鹅黄彩绸为饰。影亭前有提炉（内燃檀香）八对。

十四、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以黄绸拉幌。

十五、大黄魂轿一乘，内供清德宗神牌。八人抬舁以行。

十六、番（喇嘛）：

由一对2丈多长的大铜号（藏传佛教谓此为“刚冻”、“元筒”）前引。每支大号由一人以黄绒绳提着，后边由一喇嘛吹奏，二号轮流作响，一起一落，一高一低。两低两高，再加一低，此五声为一组，且走且吹。后面紧跟的是大柄鼓两对，每鼓由一人肩扛而行，后边由一喇嘛用弯钩形的鼓槌敲打。再后面为大钹一对，唢呐、海笛各一对，吹出佛曲的主旋律（鼓、钹作拍节、板点）。法味充盈，庄严透顶。此外还有罕见的手摇“人皮鼓”、海螺号、金口角等各项蒙、藏轻重法器。

喇嘛们俱身披大黄袍，斜搭着紫红色的“哈达”，头戴去掉帽结的黄秋帽，足登青缎靴。后跟两位执法喇嘛，头戴大鸡冠帽（似半个蒲团）。最后是主法放正的“得木奇”（二喇嘛），头戴桃形的黄帽，手执铜铃。由“格司贵”（达喇嘛）身穿黄袍，但又罩上比袍子略短的白布孝褂，斜披着紫红“哈达”，头上亦戴桃形顶子的秋帽，手托铜盘，盘内放着用酥油合莜面（喇嘛称“巴拉面”）捏成的灯、塔，灯内有酥油，燃点起来，以引“灵”前行。这大抵是嗣皇溥仪的替僧，代为尽孝（民间一般应是亡人的长子捧这份“灯、塔”）。

十七、坤道（即道姑，道教称女道士为“坤道”）。走在最前边的，左边的持铃（不是以单手执铃柄，而是以双手捏住铃身，不作响），右边的敲“喻子”（比引磬大的铜钟，俗称“金钟”），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头戴混元巾，露着冠簪，身穿蓝道袍，加披彩色缎绣法衣，每对为一色，上绣青云白鹤、灵芝，及八仙法物、百寿图等图案。走在最后的高功为紫色八卦、太极图图案的法衣，手捧如意一柄。

十八、尼（尼姑，汉传佛教谓之“比丘尼”），走在最前头的两尼，右边的打引磬，左边的敲木鱼，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身穿灰袍，加披红缎金线绣成“福田”纹的袈裟。走在最后放止的尼姑手执手炉，炉上插草香一炷。

十九、乾道（男道士）法器与法衣与坤道相同，故从略。

二十、禅（和尚，汉传佛教谓之“比丘”）其法器排列为：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身穿海青大袍，加披红缎金线绣成“福田”纹的袈裟。头戴青毛线织成的“如来帽”。走在最后面的放正大和尚身披黄袍、红袈裟，手执手炉，炉上插草香一炷。

二十一、身穿印花白小褂的男童40名，分为左右两组，每组20名，均身挎木盘，内放檀香炉一樽，燃点檀香，名为“呼小呐”（臣民殡仪上用的“呼小呐”亦作“小嚷”，不托香炉，而托亡者生前的文房四宝或文玩古董）。小呐边走边喊，左边的一组喊“啊”；右边的一组喊“喂”，以助丧家举哀。每组小呐均有一执鞭头目，进行指挥，一扬鞭为放下盘子；二扬鞭是跨齐站好；三扬鞭是“举哀”前进。

二十二、执紼恭送奉安的各王大臣们，一律身穿青布袍、头戴去掉顶戴花翎的秋帽，足登青布靴。因为光绪帝宾天已超过三周年，故不着缟素。

二十三、128人抬的“独龙杠”，内罩光绪帝梓宫。

二十四、后扈（亦作“后拥”）64名，俱为行猎装束，身穿灰布袍，沿着红边的黄坎肩，头戴去缨的秋帽，上缀豹皮叉尾，足登青布靴。骑着高头骏马，手执长矛，跨着腰刀，以表示护卫梓宫。

二十五、隆裕太后的影亭比光绪的略小，为八人抬，亦为宫殿楼顶，敞门加挂黄纱帘，下为须弥座。以素黄彩绸扎成。内供隆裕景皇后御影。

二十六、凤辇，即双马驾辕轿式的车，黄云缎轿围，上绣彩凤，下绣海水江牙。内供隆裕景皇后的神牌。

二十七、96人的皇杠，抬着景皇后的梓宫，上面扣了一卷黄云缎的官罩。

二十八、恭办奉安大典的官员车辆 和备差员工人等。

一路之上戒备森严，除有一部禁卫军外，还有民国政府派来的许多宪兵，沿路巡逻、放哨，进行警戒。很多观礼的乡民都不得靠近，所以秩序井然。皇杠经过半壁店，进入西陵地区“风水墙”的东口字门，直达崇陵的牌楼门。光绪帝的梓宫当即换成了64人杠；隆裕后的梓宫则换成了48人杠，一直抬到地宫外口。原来这里已设置好运灵车，自地宫外口至地宫石床上，特仿轻便铁路式样，铺就木质阴槽轨道（用铁道枕木鏊出纵长的槽），在轨道槽上铺以绵毯，上面置一硬胶皮轮的平车，车上铺以棕毯，即将梓宫放置其上，并施以保险设备，左右有护卫人员，前后有杠夫牵引着黄绒绳，打响尺的杠头一前一后，前敲后应，徐徐将灵车升堂入殿，移上了石床。后由钦天监指挥杠夫将梓宫，按着“山向”，奉安于石床中央的“金井”上面。随后，同样也将隆裕后的梓宫奉安于光绪帝梓宫左傍齐头略低一些的位置上。帝、后并了葬，奉安即告礼成。

随后，即布置殉葬物的事宜。殉葬物品除石桌、供器、万年灯（以两口大缸装满了植物油，覆以盖，上面正中置一灯台，系以灯捻，直通缸内，临时点着）、册宝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帝、后生前用过的衣、被和心爱的文玩、金银器皿，以及佛经香料，金玉等贵重“镇压品”。布置妥当后，恭送人员先后退出地宫，前去朝房更换吉服（即顶戴花翎齐备的朝帽、朝衣）。

在这时候，发现年迈古稀的梁鼎芬身软如泥，坐在地上不动，人们见状，都很惊慌。在他身旁的两个亲随说：“梁大人曾说过等皇上奉安时他要殉葬的话。”主事人员这才令梁的亲随将他背出地宫。于是这位愚忠的梁鼎芬才殉葬未遂。

随后，有专人关闭石门，就是用铁钩子从门缝将石球由浅沟钩入深坑中，顶上石门。从此，除非设法破坏，这石门就不能打开了。四道石门都关闭后，就由事先派定的瓦工们抢砌哑吧院的琉璃影壁，以便堵绝地宫门的外口。王公大臣等在朝房稍事小憩，即齐集隆恩殿虞祭，主要是献祭席、读祭文，由鸿胪哈番（满语，官员）赞礼，依次行三跪九叩大礼。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帝是慈禧太后耍弄的一个傀儡，其地位无足轻重。再加之民国成立后，帝、后奉安大典礼仪，虽说仍如旧制，但已大大从简，仅略具梗概而已矣。尽管如此，据说，还耗费了国家的45万两白银。

据清档案，宣统元年二月顺天府致内务府咨文记载，光绪帝梓宫奉移河北易州梁各庄行宫暂安时，杠后有1340辆车送殡。至于葬入崇陵时的奉安大典，躬亲送殡的车辆细数待考。

俞进化。《清东陵与西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9。第75页。

主要参考资料

杜如松。《民初修建清室崇陵和光绪“奉安”实况》。见（In）：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9。第137—148页。

紫禁城内空前绝后的“盛举” ——中国末代皇太后隆裕的大丧

清光绪皇帝的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静芬系三等承恩公桂祥之女（即慈禧太后的侄女）。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初十日。光绪十五年（1889年）被慈禧太后指定为光绪帝之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病逝，慈禧懿旨，立醇亲王载沣3岁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命载沣摄政，并于临终前降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宣统即位后，尊光绪帝皇后为皇太后，称“兼祧母后”，上徽号“隆裕皇太后”。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乘机施展阴谋，迫使摄政王交出权柄，要挟清帝退位。后由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御前会议，虽然与会王公大臣意见不一，但最终由隆裕太后做主，接受《优待清室条件》，签发了《退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来北京在社会各界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曾称赞隆裕太后赞成共和，交出皇权，可以称之为“女中尧舜”。

据说，隆裕太后体质素弱，身有隐疾。虽然慨然下诏逊位，但实际上仍是“让国仍存亡国恨”，以为愧对创业的列祖列宗。心中一直郁郁不乐。尝谓“孤儿寡妇，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等语。年来，积成肝郁，尝患呕逆。延至民国2年（1913年）正月，胸腹更隆然高起，日渐肿胀，经御医佟质夫、张午樵二人诊治，稍微渐轻。正月初十日，适逢她的“万寿节”（生日），循例于御殿受贺，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专使梁士诒，用着外国使臣觐见的礼节祝贺，不免悲从中来，且宗室王公大臣多半回避，不肯入贺，殿上不过寥寥数人，昔年权柄在握时的盛景全非。因此，愁病交加。再加上“万寿节”内，天气晴暖，殿中所用素炉热气过高，感受炭气，致使病情加剧。从此，卧床不起，延至正月十七日（阳历2月22日）凌晨薨逝。仅享年46岁。

清后即逝，一切治丧事宜，首由清宫太保徐世昌、内务府大臣世续倾心计议，继由御前大臣那彦图、魁斌、溥伦、世续、陆润庠、陈宝琛、伊克坦、景丰、绍英等人，遵照清朝典制与列后成案办理。上谥号“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庙号为“景皇后”。逊清宣统帝降哀“朕以冲龄，钦奉皇祖妣孝钦显皇后懿旨，承继皇考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皇考德宗景皇帝之祧……兼祧皇妣大行皇太后……自去岁冬令以来，渐致违和。屡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安痊。

不意服药罔效，遽于正月十七日丑时，仙驭升遐……谨遵遗制，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月，稍申哀悃。”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接到清宫内务府大臣世续的报闻后，立即派荫昌、段芝贵、孙宝琦、江朝宗、言敦源、荣勋等数人，前往宫内帮助料理治丧事务，并命国务院发出通告二则：

“据清室内务府总管报称，二月二十二日丑时，隆裕皇太后仙驭升遐等语，当经派员查检，医官曹元森、张仲元等所开脉方，俱称虚阳上升，症势丛杂，气壅痰塞，至二十二日丑时，痰壅薨逝。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方冀宽闲退处，优礼

长膺，岂图调摄无灵，宫车宴驾？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国民，同深痛悼。除遵照优待条件，另行订议礼节外，特此通告！”

又：

“兹逢大清隆裕皇太后之丧，遵照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待遇，议定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特此通告！”

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袁世凯臂带黑纱举哀致祭，并特备赙仪三万元。

民国各地军政要员，也纷纷向清室发来唁电。副总统黎元洪唁电称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山西都督阎锡山唁电称：“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视天下不私一姓，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国民哀悼会的发起者吴景濂发表公启说：“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余谓美利坚之独立，受战祸者或七八年；法兰西之革命，演惨剧者将数十载，虽伸民气，实苦生灵。前清隆裕皇太后，默审潮流，深鉴大势，见机独早，宸断无疑。诏书一下，化干戈为坛坫，合五族为一家，大道为公，纷争立解。盖宁可以敝屣天下，断不忍涂炭生民，所谓能以私让国。”并倡言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开全国国民哀悼大会。

与此同时，袁世凯召开了国号院特别会议查照《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之规定：“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根据这一精神，隆裕太后祔葬崇陵，更兼赞助共和，有助于民国，故所有丧礼，务须从优，费用亦归民国政府负担。这一提案马上得到了参议院的通过。

袁世凯复令各部、院长官亲往致祭，特派赵秉均等政府军政大员与逊清御前大臣共同在太和殿侍班守灵，步军统领衙门亦设值班官员轮流护灵。还专派了民国的仪仗队、军乐队及守卫人员前往参加丧礼。

隆裕皇太后的遗体于当日申初（下午三时）被殓入了满洲式的“大葫芦材”，谓之“升入梓宫”。按清制，帝、后的梓宫大体上相同，都是内棺外椁。内棺套入外椁，故体积很大，其高度约有一米七、八，平头齐尾，两侧板直，棺盖向上倾坡，前端有一个与棺盖薄厚相等的大葫芦，而且与棺盖是一块整板。按制，还应涂上米色的油漆“七七”四十九道。皇后的梓宫外边须绘以彩凤（皇帝的梓宫绘以金龙）。不过，初敛后不可能毕其“工”于一役，而是日后奉移暂安时才完成的。

隆裕太后入梓宫后，由掌礼司首领太监用鹅黄吉祥轿将梓宫从长春宫抬出吉祥门，由景运门进锡庆门、皇极门、宁寿门、至皇极殿停灵。这乃是清宫里最为尊贵的地方了。隆裕的灵柩扣上了一卷銮舆卫送来的黄云缎底，绣着九只彩凤帷子的堂罩。前面横放了披着黄寸蟒床单的灵床。床上竖立着隆裕太后全身宫装的巨幅画像。两旁挂着云头素幔，外罩三拱门四立框的素彩灵龛。灵桌上，香花灯烛，广陈供养。殿前摆满了旧王公大臣们送来的果桌、饽饽桌、祭筵。

从皇极殿通往宁寿宫的丹陛两旁，有宫廷卤簿仪仗。宁寿门、皇极门前均扎了高大的素彩牌楼。正对皇极门的九龙壁前，立起了3丈多高的大幡（丹旛），表示招魂。左边设了64人的太平杠一份，表示护灵。还有领魂轿、金凤辇、曲律（满语，竖条小旗），门纛等。

民国政府则将祭堂设于太和殿内，殿内布置得极为庄严肃穆，正面扎了一座三门四框式的素彩灵龕，顶端正中挂着一方题有“女中尧舜”的大匾。在灵龕的须弥座上，每一栏杆立柱上，都套着一个素色的空心花圈。灵龕内高悬隆裕太后的大幅宫装御影。供案上广设香花果饌，素烛高燃。供案之前立一大镜框，内有《退位诏书》，宣布实行共和国体的诏旨。殿内外，布满了奠礼祭品，其中有王公大臣送来的满筵饽饽桌子，其供品有摆至六七尺高者。殿内蟠龙金柱、红柱及殿壁四周皆挂满了挽幛、挽联。副总统黎元洪的挽联是：

“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
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

太和殿内还扎了三门四框式的经台，内供西方3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由13众大德高僧昼夜轮流唪经礼忏。根据皇清定制，大内佛事，一律“禅念”（不敲打法器）。

太和门前扎了三门式的大素彩牌楼，上书“哀悼”二字。午门城楼内外，均悬挂了一丈开外的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国旗（皆半旗式），并以绳索拉起了万国旗。门楼墙壁上挂满了各界送来的冲天大幅挽联。天安门前的城楼下，扎了七门八柱的特大素彩牌楼，正中嵌以“国民哀悼会”字样。穿着清朝玄色袍褂与民国西式大礼服的官员并肩出入，一时紫禁城内外，冠盖如云。据说，前往吊唁、祭奠的各界人士达数万人。

2月14日，在太和门前广场隆重召开了全国国民哀悼会。由参议院参议长吴景濂主祭，恭读祭文，盛赞隆裕太后有逊位之德，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同“共和之美”。哀悼大会还决定将要设立皇太后的铜像，以表彰她的功勋。

据当牢各大报纸刊载，隆裕太后薨逝后，舆论界颇为惋惜。《中国日报》云：“己丑年嫁光绪帝为嫡后，秉性柔懦，失西后欢；尤与光绪感情不洽，抑郁深宫二十余年。既无可誉，亦无可讥。惟清廷退位，后力居多，将来共和史中亦不失有价值之人物也。”《亚细亚日报》云：“隆裕太后去岁，不为亲贵浮言所动，力主共和，实为有造民国。今一日崩御，我五族国民，当同情哀悼。”

驻京各国公使对隆裕太后的薨逝亦均表惋惜，除亲去太和殿致祭外，于哀悼会期间，各使馆均下半旗致哀。

由于光绪帝的“崇陵”还没有修完，所以，隆裕太后的梓宫也只能“恭奉暂安”。4月3日，奉移时由民国政府的仪仗队、军乐队前引，传统的满族执事：门纛、曲律（满语译音，即小纛旗）、影亭、亮轿、曲柄黄伞、鹰、狗、骆驼、刽子手、帐篷等随后。用的是96人的“落地满黄”的“皇杠”（即黄杠、黄罩、黄杠绳、杠夫戴的青荷叶帽插着黄雉翎，举黄色白光的拨旗，上书“恭奉暂安”字样），一直抬至前门火车站（西站）用慈禧太后曾经使用的专列，运至河北易州梁各庄行宫内暂安，等候崇陵竣工后，与光绪帝一起入陵。

隆裕太后的丧礼结束后，于民国2年3月出版了一个线装石印的特刊《国民哀悼纪事录》。书前是一幅隆裕太后的御影，附有她宣布清帝逊位的谕旨。接着是太和殿内外哀悼大会的摄影12幅。还有各界拍来的唁电、挽联、致祭礼节、祭文、哀悼歌词、皇室答词、外宾名单、工作人员名单等等。当可为此次紫禁城内空前绝后大丧礼的佐证。

主要参考资料：

李升培等。《国民哀悼会纪事录》。国民哀悼会石印本，1913《清太后逝世再记》。上海《申报》1913—3—1。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8。第 121—124 页。

最后两个皇贵妃的葬礼 ——敬懿、荣惠两太妃“奉安”纪略

两太妃暂“丘”地下

瑜妃赫舍里氏、璿妃西林觉罗氏，均系清穆宗同治帝的妃子。民国2年（1913年）3月12日，逊清皇室对她俩加崇位号，瑜妃被尊封为敬懿皇贵妃，璿妃被尊封为荣惠皇贵妃。民国13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修订《优待清室条件》，废除了宣统尊号，勒令皇族迁出紫禁城。溥仪遂迁至什刹前海醇亲王府暂住；敬懿、荣惠两太妃先迁至大佛寺街路西的大公主府，继而又迁至东城麒麟碑胡同居住。这两位太妃未被撵出皇宫之前，就已准备好了死后的殓具。那是一对相当精美的金丝楠木、满洲式的大“荷包材”，也叫“大葫芦材”。棺的两帮上部成为坡形，下边垂直到底，整个棺身成为一大六棱形。其盖隆起，两边斜坡。紧前端上是一个与棺盖薄厚相等的木质大葫芦头，向前探伸。宫外臣民所用的大荷包材，棺盖上的大葫芦头是用“合页”与棺盖相连的，可以折叠。而宫里给两位太妃做的大荷包材上的葫芦头则是一块整板制成的。没想两位太妃死后并没有用上，而是遗留在故宫里，给后代人当文物了。她俩被撵出皇宫以后，又找棺厂照原样重做的。

敬懿太妃和荣惠太妃确是两位有心的老太太，当鹿锤麟将溥仪、婉容等撵出皇宫后，她俩还在宫里逗留了16天，在此期间，她俩将部分象征皇家荣典礼仪之物，巧妙地收藏起来。其中，包括光绪帝穿过的龙袍和她们自己被晋封为皇贵妃时所得的部分仪仗、伞盖、舆轿等“软片”等。结果，当她俩死后，在丧礼上都派上了用场。

民国21年（1932年）2月5日（即阴历辛未年除夕）瑜妃（敬懿皇贵妃）薨逝于东城麒麟碑胡同平寓。本来，溥仪承继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帝）兼祧穆宗毅皇帝（即同治帝），应当躬亲顶灵，但他身去长春，做了伪满的傀儡，不克参与，乃由清室贵胄载涛、载洵、载沣等负责操办丧仪。决定在府停灵受吊19日后，暂厝柏林寺。

3月22日（阴历正月十七日）、依制举行大祭礼。由雍和宫的喇嘛，白云观的道士，柏林寺的和尚，翠峰寺的尼姑四打送圣。前清贵胄遗老和在野名人均前往致祭。所收挽联、饽饽桌、祭筵、纸扎冥器等奠礼极多。

23日（阴历正月十八日），举行奉移礼。整个殡仪原则上要求按清代宫内旧制皇贵妃的丧礼办理，因为当时能应皇杠的灯市口永利杠房已倒闭，所以发引抬灵只能由北新桥义茂杠房承办。

敬懿太妃的大殓用了32人抬的大幡（即宫廷礼单上所谓的“丹旒”），还有一对黄底绣金龙的门纛、八根黄底绣金龙的“曲律”（满语译音）、黄鹰、细狗、骆驼、刽子手、影亭、座伞、如意亮轿等全堂满族执事，而且加上了她在被封为贵妃时所得的仪仗：黄云缎扎成的大黄亭子两座，本应是一座用来供奉贵妃金册；另一座用来供奉贵妃金宝（印）。据说，只是两座空亭子（金册、金宝可能没让带出宫来），仅仅是个象征性的仪仗。但仍然煞有介事的用了身穿红驾衣的执事夫16人抬异而行。亭前还各张一柄大黄伞盖，一人擎举，二人牵黄绸“拉幌”。以长尾山雉翎子装饰起来的仪仗车、轿（即所谓“翟车”、“翟轿”）各一乘；明黄8人仪轿一乘；明黄缎底绣

7 凤图案围子的曲柄大伞一柄；明黄黑、红缎宝相花伞各 1 对；红、黑缎瑞草伞各 1 对；黑、红云缎金凤旗四面；金黄缎凤旗 2 面；红、黑云缎素旗各 2 面；金黄缎素扇 1 对；红、黑云缎素扇各 1 对；红黑缎雉尾扇各 1 对；金节 1 对；五口伏立瓜、卧瓜各 2 对。以上这些仪仗再加上番（喇嘛）、道（道士）、禅（和尚）、尼（尼姑）、官鼓大乐、松活、纸活等等，足排出二、三里地之遥。

按制照例用了 80 人的皇杠，即“落地满黄”的大杠、大官罩（黄漆杠、黄缎包裹的杠绳、黄杠垫、黄拨旗，上书“恭奉暂安”字样，杠夫头戴青荷叶帽，上插明黄色雉翎，身穿红绫驾衣，黄布套裤，足登青靴加黄靴护，手戴黄手套），大罩罩片是黄寸蟒的，顶盖上的四周是石青妆缎的檐子。这是皇贵妃用罩与帝、后的区别之处。据说，这些设备都是原在清宫銮舆卫当差的人暗中保存下来的（1942 年 7 月伪满帝宫谭玉龄的葬礼大概也是用的这份设备，后来，不知这些东西落在何人之手了）。

升杠时，焚化了一所纸扎仿宫廷建筑的黄瓦四合房，不过尺码不大，仅一人来高而已。据说，头天送圣时所烧的楼库，也是一殿一卷的黄顶子，加大尺码的冥活。其纸扎之多，无法胜计，就光尺头桌子（陈设桌）一项，就有几十张之多。其中，牌桌、烟床为不可少之物。

这是出现于北京市面上的最后一次皇贵妃的大殡。如果不看看，以后也就永远别想看了，所以，四九城凡是闻讯者，无不携老扶幼，呼群唤侣地来“观礼”，大有万人空巷之势。一时车马塞途，甚至第二路电车被堵塞于东四牌楼以南及北新桥迤西。所有路旁小贩一律收摊，停止营业。平市公安局保安队、宪兵、及卫戍步队均出面维持秩序。

发引路线几乎是绕行东北城一周。灵柩从麒麟碑胡同出南口，经铁狮子胡同出西口，经交道口南大街、马市大街、猪市大街、往北经东四牌楼北大街，至北新桥则折向东行，经东直门内大街，进北小街至炮局，折向西行，至 11 时始抵柏林寺。

瑜妃薨逝后，只剩璿妃孑然一身，平日长斋拜佛，无所事事。亦因病于次年（1933 年）5 月 18 日（阴历四月二十四日）下午 7 时与世长辞。享年 78 年。由贝勒载涛等亲视含殓。她的丧事大体上与瑜妃相似，只是没有停厝于柏林寺，而是在麒麟碑胡同 5 号府中砌一砖窖，将其灵柩“丘”于其中，上面用水泥磨严，一如平地。等待与瑜妃一起入陵。

二妃归葬东陵双山峪惠陵

民国 24 年（1935 年）初，清贝勒载涛、溥沂等考虑瑜、璫二妃的灵柩，长期“丘”于城内，终非长久之计，总以入陵为安。故在瑜妃薨逝一周年之际，亲去柏林寺致祭，延请该寺僧众诵经超度，并向报界发表谈话，向各界“告窆”：二妃将于本年 3 月归葬于东陵双山峪惠陵。奉移前一日（3 月 13 日），载涛等在柏林寺给瑜、璫二妃设位，请该寺僧众诵经一日。平市朝野名流，吴佩孚、江瀚、鲍毓麟、余晋和、游伯麓，以及逊清遗老遗少等分别赠送了花圈、祭席、满筵（饽饽桌）等奠礼。家奠仪式，一如清制，由清贝勒载涛主祭，溥沂陪祭，奠酒、焚帛皆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二妃灵柩皆分别厝于地下，“丘”于柏林寺内的瑜妃与“丘”于府第的璫妃，情况大体相同，都是砌于砖窖之中，上磨水泥。家祭前，乃由夫役将棺启上，等候发引。

3 月 14 日（阴历二月初十日）寅时（即夜间 3 点），二妃金棺分别由两处起灵，赴东四牌楼聚齐。用长途汽车 20 辆，灵车上架以明黄缎罩，分载二棺，并用了杠夫 64 名。其它护灵送殡诸人乘坐的车辆均扎以素彩。一切从简，并无仪仗等物。

车队出朝阳门，径赴东陵。事前，载涛呈请平市公安局派员保护，即由局中派督察员冷兆琪，率同保安二队队警 20 名，护送至通县。再由战区保安队派员保护前往东陵。灵车于当日晚间到达双山峪。次晨（3 月 15 日）安葬。

据办理丧事的负责人谈，此次“奉安”共用去 14000 余元。

民国 17 年（1928 年）国民军北伐，二妃曾匿居于北平六国饭店数月之久。

溥仪是民国 13 年（1924 年）11 月 5 日出宫的，敬懿、荣惠两太妃是 11 月 21 日出宫的。

民国 23 年（1934 年）2 月，溥仪在长春将要做“满洲国皇帝”时，即从北京拿来了荣惠太妃保存了 22 年的光绪帝的龙袍，准备穿它去“登极”，但日本关东军不批准，只许穿这件龙袍去祭天，登极时还要换上“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见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 年 3 月版，第 336～337 页。

软片，指旗、伞仪仗上的绣片和舆、轿上的绣片围子。据说，这是太妃们挟在个人衣物中带到公主府的。

这些都是被册封为贵妃的部分仪仗。其中有些贵重物品，如金炉、金瓶、金香盒等，还有一些大件，如金盆、金髻马杌、交椅等，都没有让带出来。否则，也应用黄亭舁抬，列入仪仗行列。

惠妃陵在东陵双山峪惠陵（同治帝陵墓）以西半里，建于光绪二年（1876 年），是同治帝的妃陵。葬有慧妃富察氏、瑜妃赫舍里氏、珣妃阿鲁特氏。

主要参考资料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8。第 126—127 页。

《废清瑜妃出殡，观者万人》。《北平晨报》，1932—2—24。第 6 版。

《璫妃逝世》。《北平晨报》，1933—5—20。第 6 版

《瑜璫二妃，四月移葬东陵》。《北平晨报》1935—2—1。第 6 版

《瑜璿二妃今晨移葬东陵》。《北平晨报》，1935—3—14日。第6版

塔王人亡家破的惨变 ——记塔王家中的两桩大丧事

突遭无妄之灾次子子媳双亡

阿拉善扎萨克和硕亲王塔楚布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奉旨入京“值班”，后因国体变更，政局亦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不能返任，便在北京寄居落户，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三座桥府夹道一号建筑宏楼广厦，享受着安富尊荣的生活。阿拉罕每年通过西伯利亚银行汇寄现银18万两，作为供养塔王之资。20年来从未间断，因此，塔王在京可算是富户之一。

民国20年（1931年），塔王已届62岁。一共生了3个儿子，长子名达里扎雅，年27岁，娶了载涛之女为妻。次子达都旺喜克，年25岁，人甚精明强干，掌理家务井井有条。娶了前清齐侯之女达齐氏为妻，婚后夫妻二人从爱情上，物质享受上，无不美满。达都旺喜克平生酷好旅游，终年携其如花似玉的爱妻，游历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享尽了人间的幸福。

讵料乐极生悲，忽遭惨祸。3月20日（旧历二月十二日）达都旺喜克驾驶其平生最喜爱的一辆小摩托加汽车，行驶在南池子地方，与一骑自行车的张某相撞，人仰车翻，各受重伤。经交通主管部门调查，认为此一交通事故双方都有责任，复经调解，言明各自调养，和平了结。

达都旺喜克在家请中医诊治，医生认为系胸腔内部受伤，故令达都旺喜克夫妻暂时分居，断绝房事，以利静养。因此，达都旺喜克移居在后花园的花厅楼上，其妻达齐氏乃住于内宅卧房。经医生精心治疗，一百天后，达都旺喜克伤势渐轻，接近痊愈。达齐氏认为其夫静养期已过，遂屡劝其夫回房居住。但塔王家族人等均表示反对，为此还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来塔王考虑到夫妻之间情爱甚笃，强令长期分居亦非人情，遂于伤愈108天后，即令其夫妻同居。但是，达都旺喜克的内伤并未十分痊愈，与妻同居后，马上旧病复发，竟至无救。至同居的第二天（即6月9日）清晨，达都旺喜克满腔鲜血顿从口鼻喷射而出，据说当时血染墙壁，飞溅满室，达都旺喜克立即仰卧身死，其状绝惨。他的爱妻达齐氏见其夫遗体双目不闭，口不合，显系抱恨而去，不免愧悔交加，乃于怆痛之下，乘家人忙乱之际，暗中吞服了大量鸦片烟膏，中毒过深，待家人发现，为时已晚，抢救无效，乃与其夫双双归天去了。

塔王以为次子突罹横祸，死因至惨；儿媳达齐氏殉夫而死，节烈可嘉，悲痛之下，乃令厚葬二人。管事的马上找到东黄城根合兴杠房老东家，原清宫木库管事的陈大爷，倾心计议治丧事宜。首先选了两口老金丝楠木的大荷包材（即满族人用的大葫芦材），每口为法币5000元（共计10000元），当天即用两付32杠，以“双转空”的形式，抬往丧居。根据阴阳先生勘定，于酉时大殓，至于衣饰殓物亦极珍贵。殓后，两柩并排停于后花园内，马上由雍和宫的喇嘛在园内临时搭就的帐房（蒙古包）内诵经，给亡者安魂。

丧礼一律按清制及北京地方俗例办理，丧期为11天（自9日“倒头”之日起，至19日发引止）。因非家族内最高长辈，所以在府停灵受吊的日子不能过多，但自接三之日起，每天都有番、道、禅轮流唸经超荐。塔王出于“儿女情长”，不惜破费重金，在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广合斋于记冥衣铺、护国寺前街永合斋冥衣铺订制的纸活冥物无计其数。接三那天，糊的翻毛骏马

驾辕的大鞍车两辆，其中一辆，车沿上跨有“跟妈儿”，是给儿媳达齐氏乘坐的，车厢的两旁有青纱“旁帐”，缀以飞檐，车窗俱为冷布所饰，车帘、车篷都用的是貌似真绫真缎的“吐沫葛”糊成的。还有满绘彩凤捧着金圆寿字的红轿一乘、绿帏官轿各一乘，均为8人抬；翻毛金鞍宝马一对；马僮一对。杠箱8抬。大约是塔王怕触物伤情，故决定将小两口生前所用的家具、衣物，只要是可燃物，一律随纸活火化。昔年，上层府第落了丧事，确有将死者生前衣物当作附加焚化物的，但多是象征性的，只焚烧一小部分而已，其它大部分都给亲族人留作“念想儿”。塔王府这次给小两口治丧，焚化家具夫称、衣物都是实际性的。就光接三那天晚上，在焚化纸扎车轿的同时，竟然将他夫妻二人生前穿戴的衣服鞋帽，抬去几十箱，一齐倾入火堆，延烧两三个小时之多。据其家人称：“二人的衣服没有一件是穿过两次的，甚至有的衣服，根本没有上过身，既有满、蒙民族式的，又有汉人的时装、西装，包括皮、棉、夹、单、纱，一应俱全。”可见其平日豪华奢侈的程度。

接三之后，几乎每天都有番、道、禅、尼轮流作荐亡法事，3日为一棚，每棚功德圆满时，都要送圣。这样，13日、15日“首七”、18日伴宿，都要送圣、焚库。每次送圣，都是用加大尺码的三堂楼库；12抬杠箱；几十张尺头桌子，上面摆的文玩陈设、日用器皿，无所不有。最后伴宿送库时，还糊了一所浓缩得具体而微的“王府”大阴宅，宅内大垂花门，穿廊游廊、过厅、厢房、楼台殿阁、后花园子、山子石、月牙河、小桥、凉亭，应有尽有，院内还糊了戏楼，台上糊了一出京剧。同时将其夫妻二人生前的室内家具照糊了一份。每次送圣都招来万人争看冥物。地安门、什刹海、西黄城根一带挤得水泄不通。塔王不忍观看，独坐府中痛哭，几次昏绝，经人抢救才苏醒过来。

19日巳时发引，用了合兴杠房的两付大杠，每杠俱为48人抬，杠上都加了红寸蟒的大罩，由一对响尺指挥。达都旺喜克的灵柩在前，达齐氏的灵柩在后，形成了少夫少妻的双灵大殡。京城没有特定的蒙执事，故用的是一全堂“旗执事”：大幡、坐熏、曲律（满语译音）、黄鹰、细犬、骆驼、帐房（蒙古包）、驂马、单钩、刽子手、“肃静”“回避”虎头牌、金执事（古代兵器模型）20对；座伞、如意亮轿2乘；日照影伞2柄；官鼓大乐；番、道、禅经班；官样轿2乘；童子督胜盘24名。前清各王公贵胄，遗老遗少，平市“军政要人”几乎都送了匾额、挽联，间杂于各仪仗之中。整个殡列排出2里之遥。是日，东北城一带，赶来看热闹的人山人海，红男绿女，扶老携幼，拥挤不堪。由于路祭、茶桌过多，大殡自上午9时许由三座桥府夹道出发，沿途行进缓慢，直至下午2时才到达西四牌楼迤北报子胡同隆长寺。

据说，这桩丧事塔王破费甚巨，除去焚烧的衣服、家具、陈设等不计外，共花去法币40000余元。

塔王忧郁而死

自从达都旺喜克夫妇遭罹无妄之灾，双双而死后，塔王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忧郁成疾，医治不效，竟于9月5日去世（按迷信的说法，凡家有丧事后，百日之内再死人算作“重丧”，为家宅最大的凶变。塔王的二儿及二儿媳于6月9日故去，至9月5日仅89天，不足百日，是典型的重丧。诚然，这是塔王家败人亡之信号）。其家人乃倾囊倒底地大办丧事。

依王府旧制在家停灵受吊“三七”二十一天，比他二儿和二儿媳的丧礼要大得多。塔王“倒头”后，塔王府门前马上就立起了“幡架子”，中间挂着缎绣软片，绣着一条大龙，外边装饰着下垂的大彩球，成为一大“嘟噜幡”，高3丈余。表示为死者招魂；也是向外界报丧。府内垂花门前的左边，放了一付红漆黄绳的“太平杠”，是大亮盘（无罩）的形式，32名杠夫衣帽齐整地昼夜在此值班待命，以防水火之险。杠前还亮出了“如意亮轿”，形似太师椅，但后背上安一如意头，披一虎皮，座上铺以杏黄缎垫，无轿帏、顶盖。此外，还有8根“曲律”（满语译音，即旧时满军中参佐之旗帜），插在红漆葫芦座的执事架上。影壁前设了“倒头鼓”；对儿门鼓、八面官鼓，都按清代定制挂了青寸蟒的鼓帘子。还有所谓“梆”（即古代云板）、“鐃”二报，以备为来吊唁的客人传报之用。据说，这些设备都是东黄城根合兴杠房承办的。

塔王府内不但搭了一殿一卷的起脊大棚，还在后花园和前院、跨院的空地上搭起了黄色镶有大黑云头的穹庐式的蒙古包，大抵是招待蒙族亲友的（因为这符合蒙族人的生活习惯，使被接待者感到亲切，从而认为是受到礼遇）。大门前还搭了人字形的帐房两座，是给官面上前来维持秩序的官人驻守的，在清代，这本是地面官厅上的事，但塔王府则是主动准备的。总之，是一派清制丧仪的排场，也是满、蒙合璧的形式。

从接三之日起，就是番、道、禅经轮流作法，每3天送焚一次楼库，首七之日是结合僧、道送疏，一天送三道楼库。因为塔王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出了府门往南不远就是三座桥，斜对着千杆胡同就有一个小大院，只要送圣就在这里焚化冥物。伴宿那天，不是分而送之，而是在下午6时，于钟楼后广场集中焚化九堂加大尺码的楼库；36抬杠箱：几十张放着不同文玩、器皿的尺头桌子；纸糊的祭筵、烟床、牌桌、戏出……还有王爷生前的皮、棉、夹、单、纱各种穿戴物，不计其数，均在僧、道急敲重打中付之一炬，其排场之奢可见一斑。

10月5日（即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发引。下午10时，灵柩由三座桥府夹道宅中出堂，先以32人“小请儿”抬至三座桥千杆胡同西口斜对面的小大院，换升64人大杠，升杠时，在杠前由长子达里扎雅三奠酒之后，举火焚化了一所纸扎的大四合房。因塔王系清朝和硕亲王，故沿旧制用了“落地满黄”的杠罩，凡杠、罩、绳、垫均为杏黄色（按清制，满王爵用鹅黄；蒙王爵用杏黄）。罩片乃是委托杠房现裁现绣的，鲜明异常。所有杠夫一律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一冲天锥式的杏黄色雉翎，绿驾衣，土黄套裤，青布靴加黄靴护，手戴黄手套。杠罩的四角，有8名跟夫各扛杏黄拨旗一面，上面的白光上写着“王府奉移”字样。

为了壮大殡仪的排场，用了满、汉两门的仪仗，不下数百件。满（旗）执事（由前至后）有大幡30人抬；门纛一对；曲律（满语译音）8根；黄鹰、细犬、骆驼、鸟枪、线枪、剋马、衣包马、鞍鞴马、帐房（蒙古包）；八宝枪8对（轮枪、螺枪、伞枪、盖枪、花枪、罐枪、鱼枪、长枪）；刀4对（即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门伞一对；金执事8对（即金卧瓜、金督、金掌、金拳、金天镫、金钺斧、金立瓜、金兵符）；腰刀；箭筒；红轿子；小番丹（蒙语译音）；黄亭子；在轿、亭前后尚有3柄龙凤座伞；黄牌；黄旗；龙凤伞、御炉、小轿（如意亮轿）；童子督胜盘32名。并兼用了汉执事5堂，每堂为幡、伞12件，分为红、蓝、白、黑、紫五色，共60件；

鸣锣、飞鳌旗、飞鲤旗、飞熊旗、飞豹旗、军牢、夜役、龙头、皮槊、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清道旗、格漏、绿扇、粉棍、“肃静”牌、“回避”牌等 17 对。仪仗中间间杂着松狮、松亭、松人、松轿、纸扎金山银山、绸缎尺头，日用器皿、文房四宝、古玩陈设、汽车、马车、仆童灵人，四季花盆……无不应有尽有。

塔王府为了“风光风光”，殡列几乎绕城一周。灵柩出堂后，经西黄城根、地安门大街、鼓楼东大街、交道口、北新桥、东四、东单、东长安街、西长安街、西单、西四，停灵于报子胡同观音庵庙内。

沿途观者如云，交通为之断绝，各处军警随行照料，以维持秩序。平市各界要人以及前清遗老遗少前往送殡者络绎于途，素车白马，蜿蜒如一长蛇阵。沿途茶桌不下数百；蒙古王公复在西四甘石桥地方支搭大型路祭棚一座，灵到该处时由那彦图领衔主祭，由僧、道、番诵经品咒，逗留约一小时。灵柩到达暂厝的目的地时已经日落西山了。

塔王的大殡要比同一个蒙王那彦图的殡不知大多少倍。

塔王殡后，塔王府也就日未山头了。

塔王的丧事，京市各报报导不详。只留下了当年杠业同人的口头传说，故其中细节只供参考。

主要参考资料

《塔王家中惨变》。《北平晨报》，1931—6—21。第 6 版。

《塔王大出丧》。《北平晨报》，1931—10—6。第 6 版。

荣归乎？一棺附身归葬螺江 ——记一代鸿儒陈宝琛身后事

身跨两个不同时代的陈太傅

民国 24 年（1935 年）3 月 7 日，《北平晨报》广告栏刊登一则颇为引人注目的“口报”：

“家主陈太傅于旧历三月五日，即夏历二月初一日卯时寿终北平本寓。三月七日即夏历二月初三日接三。恐报未周，谨此稟闻

灵境井儿胡同七号陈宅门房谨稟”

这位陈太傅不是别人，乃是身跨两个不同时代的名儒，大名鼎鼎的“帝师”陈宝琛。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陈在福建有才子之名，他是同治朝的进士，二十岁点翰林，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出名，与张之洞等有清流党之称。他后来不像张之洞那样会随风转舵，光绪十七年被借口南洋事务没有办好，降了五级，从此回家赋闲。一连二十年没出来。直到辛亥前夕才被起用，原放山西巡抚，未到任，就被留下做我的师傅，从此

没离开我，一直到我去东北为止。”

民国 15 年（1926 年），陈宝琛首次到京活动，企图使溥仪“复号还宫”，但没有成功，当溥仪要去东北当日寇的傀儡之前，陈氏坚决反对，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溥仪不听，85 岁高龄的陈宝琛又赶住大连劝阻溥仪出任伪“蒙疆共和国总统”，主张复辟就要复大清帝国之辟。但溥仪非要跟着郑孝胥踏入“虎穴”，陈氏见谏之无效，乃退居北平，以诗文自娱。

陈氏酷好改诗，即所谓“诗钟”，并约集闽人旅平能诗的老者结成诗社，号曰“补闲”，每月能得佳作一二集。又组织所谓“灯社”，集各处文士唱合明志，长年乐此不倦。陈氏善于“诗钟”，思路敏捷，神乎其神，且寓讽刺于典雅句中。例如：民国 21 年（1932 年）一次吟集，眼字为“中”、“日”第一唱，陈乃吟“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其奈外犹强”，一语道破日本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故此佳句久已为人们所传诵。

又如在答复关外某诗中，有“试扞此局称心无？”之句，质问去东北投敌的汉奸们，如今伪满的政局，是否能令你们如愿以偿？由此足见陈氏之立场。

民国 24 年（1935 年）旧历正月初七日，陈氏在铁门“翁山寄寓”

诗友家唱和吟咏，从午间至深夜，毫无倦意，座间比他年纪轻的尚有不支者，大家见陈氏矍烁，都以为他将逾过 90 大关。未料，灯节以后，偶染小恙，竟至不起。病初发，他与家人都未介意，以为过两天即可痊愈。夜未成寝，居然抱恙审阅邵某人所著《马江船政》稿本，以一昼夜功夫阅完两厚册。劳累过度，发起高烧来。他的长子懋复当即请来克礼医生进行诊视，医生认为无关紧要，稍予医药。又两日高烧不退，克礼认为系患肺炎，主张送往医院治疗。老友林贻书也劝他“闭器静养”，遂入德国医院就诊。自此沉疴不起，日渐垂危，最后只能以注射强心剂来维持生命。为免做“外丧鬼”起见，家人乃主张出院，于是乘汽车返回井儿胡同本寓。延至 4 日下午 7 时，回光

返照，精神渐佳，正值朱益藩来寓探病，遂为处一方面去。夜 12 时服中药后，手足渐冷，目光已散，气息渐微，天将破晓即与世长辞了。

《北平晨报》于次日在社会新闻版刊登了陈氏遗像，发表了题为“一代鸿儒陈宝琛晚节独全，尤为世重，昨日大殓，明日接三”的报导。同时以“按语”的形式，发表了陈氏简历：

“陈公宝琛，字伯潜，号庵，沧趣老人，晚号自称橘叟、翁。福建闽县人，世居螺江。在前清一门府第之盛，为全省冠。公年十九，即掇魁科，当壬午、癸未间，公以阁部立朝，疏草一出，传抄几罄万纸。时有护车殴打太监之狱，那拉氏震怒，谕令严谴，公上疏力争，直声遂震天下。光绪甲申，高庐败盟，马江受敌，公以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奉敕视师江南，为南洋大臣。时后党忌公，适丁太夫人忧，公遂里居奉亲，不问国事，时年不过三十有三岁也。螺江为山水清淑之区，公筑楼江滨，名曰‘沧趣’，日惟吟咏，用以陶冶性情。顾公又未尝屏乡里之事弗治。科举既废，福建师范学堂成立，公为监督，一时闽中子弟隽秀者，咸出公之门下。又建闽厦铁道，游历南洋诸岛，励勉侨民，俾之出资助藏路事。虽奔走烟瘴，不鸣其劬。那拉氏既逝，公因有山西巡抚之命，未到官，廷旨改授毓庆宫师傅（即与陆润庠、伊克坦同为宣统师傅）。时年六十一，自甲申迄己酉，公息影乡园，近三十载。时公之不得赴任，为不奔走奕劻之门。然辛亥革命，晋抚陆锺琪遭难，公竟因而获免焉。国步既改，民国优待清室，废帝仍居宫中，公为国师，又历十稔。民十三，溥仪出宫。匿居沽上，公以师傅，常往来平津间。“九·一八”事变后，日挟傀儡出关，曾与遗老密商，公独持不可。伪国成立，公未获一职，世咸以此多公。然公一生出处，未尝不慎，宜其晚节独全也。平日谦恭下士，丰仪清俊。最长于诗，体近临川，清靖沈远，挹之无穷。自选四卷，仅有写本，矜慎不肯付梓。公今既歿，闻其门生故旧，将谋与奏议骈诸散文，合刻全集，以传不朽。公卒年八十有八。子五人：懋复（几士）、懋侗（愿士）、懋艮、懋需、懋随。女九人，二人已前卒，孙八人。”

为“崇恩报德”受吊四十九天

陈氏之丧，迅速传播于全国各地，连日，其故旧同僚、门生发来唁电不下千数百封。凡居京城者，闻耗前往吊唁者不绝于途，灵境道上，素车白马，蔚为壮观。其中，长辈如陈三立、朱益藩、林开暮等；旧王孙如载洵、载涛、溥儒……其门下士百数十人，集陈氏灵床前同声一哭，谓此“国老”不可复得矣！

根据阴阳生的勘定，于 6 日酉时大殓，一切礼仪悉遵旧制。寿衣为清装袍褂、去掉花翎的清制官帽，粉底朝靴。按闽人风俗，身盖棉大衾（棉被挖出领窝，露出头部）。复加黄绫红字的陀罗经被一面。因需要日后扶柩回籍安葬，故用了楠木行材。殓后，停于东院大厅，此为陈氏生前谦集吟唱之所，厅前有小山子石一座，四外为花圃。现则高搭起脊大棚，四壁挂满了联幛。

7 日接三。堂前披麻带孝者多为陈氏的门下士，旅平闽人几乎全都亲去吊孝，其中有为科举时代主试选取的“甲乙榜”；有为福建师范学堂的学生，年龄最小的也得在四五十岁以上。而其门生中“齿德俱尊”的，当推陈三立、朱益藩二老，陈、朱二老一直执弟子礼甚恭，对陈氏之死尤感怆痛。连日来，

朱氏均亲临陈府主持丧事。

下午6时送三，官鼓大乐前导，喇嘛、老道纷击法器走在中间，和尚“素打七星”殿后而行。送三者数百人，尽皆知名人士，皆提灯举香，其中年逾古稀的朱益藩躬亲徒步送三，足见师道之尊。全队出井儿胡同西行，经灵境，绕道甘石桥，进堂子胡同至太仆寺街西口，焚化纸扎转轮大轿车一辆；顶马、跟骡各一匹；绿帏官轿一乘及金银宝库一堂。以懋复为首的孝子孝孙数十人跪道哭送，成一长蛇阵。所有围观者均异口同声地说：“陈太傅真是福寿双全！”然而其门下生均为陈氏来至“期颐大寿”而感到遗憾。

据说，陈氏临终前留有遗嘱：“丧仪从俭，勿得铺张。”但其后人和门生几经商议，为“崇恩报德”仍要在寓停灵受吊“七七”四十九天。于领帖、发引之前——4月15日向各界正式发出了讣闻：

恕报不周

不孝懋复等罪孽深重，弗自殒灭，祸延显考太傅 庵府君痛于乙亥年二月初一，即阳历三月五日卯时疾终，正寝。距生于道光戊申年九月二十三日寅时，享寿八十有八。不孝懋复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择日扶柩回籍安葬。哀此讣

闻

谨择于三月十八日即阳历四月二十日领帖，翌晨发引，暂殡于法源寺

需

侗

孤哀子陈懋复泣泪稽顙

良

随

暂厝法源寺

陈氏于4月21日发引。相对来讲，仪仗甚简。据说，这是根据其家属、门生经多次研究而决定的，主要是鉴于国民军北伐后的形势，国民政府内务部屡颁禁令：凡属封建时代的婚丧仪仗都在取缔之列（不过是纸上谈兵——笔者），如果要用全堂执事，对于抬舁清帝“御赏”的黄亭、曲柄、黄伞，以及官衔牌、功名牌之类的仪仗应如何取舍，当殊费斟酌。所以，假托陈氏生前留有“丧仪从俭”的遗嘱，凡属仪仗不问新旧，一律免掉。尽管如此，还是保留了汉人发引用的铭旌，走在殡列的最前面，大约还是写上了清封太傅的荣衔（登在报上的口报、讣闻都写上了太傅荣衔）。其次是悬有陈氏大幅遗像的影亭一座、绿帏青纱帘的领魂轿一乘，俱为8人抬。除官鼓大乐加小乐儿外，还有两班军乐队，这大约是某单位送的。送殡的经班有喇嘛、道士、和尚各13人。因为挽联太多，所以也没有挑出来用于殡列（俟日后刊刻专集）。其最大的特点是穿白袍送殡的故旧门生特多，为历来殡仪所罕见，陈氏的最老门生朱益藩已年逾古稀，陈三立已届84岁高龄，为尽“弟子礼”也都徒步执紼相送。逊清王公、贝勒以及章嘉呼图克图（活佛）等亦多在途中致祭，并到法源寺行礼。

陈氏灵柩先以32杠抬出灵境，在西四缸瓦市换升64人大杠。执紼者多由半亩园饭庄门前加入。沿途观者如堵，内二区、内四区、外二区等警署均

出动巡官、警士维持秩序。殡列经由西单北大街、西长安街、六部口、北新华街、和平门、南新华街、骡马市大街、广安门内教子胡同，始抵法源寺。灵柩被停厝于该寺念佛台后边大殿西庑。

沿途搭设路祭棚的计有7处：一在西单北大街大木仓胡同东口外，为前清王公、贝勒等所设；二在六部口中央电影院对过，为前清翰林院同人所设；三在和平门内北新华街半壁街口外，为陈氏戚属所设；四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门前，为陈氏的门生们所设；五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门前，为福建旅京同乡所设；六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为福州会馆同人所设；七在广安门大街，为春明女中所设。所有路祭棚均为平棚起尖子，成为小型起脊楼的形式，棚前高扎素彩牌坊，设大鼓锣架，以官吹官打迎灵（遗像）入棚就位，由主祭单位上香献爵，僧吹道打，诵经品咒。庄严隆重，哀荣极矣！至于沿途商号、住户所设的用于慰劳送殡宾客及孝属的茶桌、茶会不下三四百处。由于路祭过多，所以从上午9时出堂，直至下午2时始抵法源寺。安厝后，孝属及执紼来宾一一叩祭，由法源寺梵月法师亲率两序大众在灵前高诵《阿弥陀经》，最后，以焚帛撤供宣告礼成。至下午3时始散。

归葬故里

陈氏灵柩停厝法源寺后，其子懋复等即回籍筹办茆葬事宜，于当年11月一切就绪，乃由闽北上，迎柩归葬故里。此次一切礼仪更为从简。11月2日，在法源寺设奠，延请该寺僧众唸诵《妙法莲华经》一日，设放瑜伽焰口一堂，为陈氏作了昼夜功德。是日，在京的前清遗老遗少，名流人士到寺致祭者极多。3日下午1时，陈氏灵柩被抬进一辆载重汽车，车上扣了一卷由京彩局扎成的“几了”（简易官罩），是个一殿一卷宫殿顶盖式的长方灵龕。为便于抬运装卸，只用16名杠夫跟了下去。下午1时，由鼓乐参灵后，灵輓（輓，音“而”特指灵车）由寺启行，全寺僧众搭衣送至山门而返。灵輓经由教子胡同、骡马市大街、菜市口、西柳树井、西珠市口、前门大街，于3时半抵达北京东站。

站外，于日前搭就了巍峨壮观的路祭棚一座，棚前设鼓乐，其门生故旧数百人早已到站恭候。灵輓到时，即在棚内设位，先由其老门生陈三立、朱益藩致祭，上香、献爵，各迎送来宾俱随行跪拜礼。在庄严的哀乐声中，灵輓转而南行进站，由数百人执紼前导。包车停在货站站台。据说，此即当年西太后奉安时所用的灵车，复经再次修整装饰，越发华贵，灵车外边加披了素彩，车厢里设了灵座，一如在家停灵之灵堂。4时1刻，灵柩被舁入车厢，停放就位后，陈、朱二老及迎送执紼者又在灵前行礼始散。灵车于4日拂晓开往天津。居津遗老遗少及名流人士亦群集站前致祭。下午即由孝属扶柩登上“新铭”号轮船，5日南下，11月中旬安抵福州螺江原籍，总算“魂魄一体”地“荣归故里”了。

诗钟，旧时文人游戏之作，其题往往绝不相类，或分咏一事一物，或嵌字。均无不可。近人作《诗钟考》云“清初，闽人已有此制，名曰‘改诗’。说者谓改律句、绝句之诗而为两句也。今此体不经见。”又云“昔人作此社规甚严，拈题时，缀钱于缕，系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其声铿然，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即刻烛击钵之遗意。”

民间风俗，谓兽类皮革、禽类羽毛不得殓入棺内，以防亡人来世托主

为畜禽。

主要参考资料：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3。第 67 页。

《一代鸿儒陈宝琛》。《北平晨报》，1935—3—6。第 6 版。

《陈宝琛之丧接三算空前，送者数百，尽为知名人士，且有古稀老门生》。《北平晨报》，1935—3—8。第 6 版。

《陈宅讣闻》。《北平晨报》，1935—4—15。广告栏。

《陈宝琛殡仪》。《北平晨报》，1935—4—22。第 6 版。

《陈定琛灵柩昨运闽安葬》。《北平晨报》，1935—11—4。第 6 版。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皇杠” ——伪满“祥贵人”谭玉龄“暂安”纪略

民国 26 年（1937 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彻底破裂了，于是辗转通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又娶了一个妻子——谭玉龄。婚后，溥仪将她册封为“祥贵人”。

祥贵人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为北京的一名中学生。进宫后，很是忠于溥仪，因此也颇为得宠。但是，她与溥仪只有 5 年的缘分，就不明不白地病死了，至今这一历史事件仍然是个谜。

至于谭贵人死后的发送，前几年有的电影片上倒有所反映：大出丧时，旌旗伞盖遮天蔽日；僧道番尼吹吹打打；雪白的纸钱铺天盖地……后面是一付几十人抬着的大杠，扣着一卷大官罩。从伪满“帝宫”的大楼前缓缓通过。这时，极度神经错乱的婉容不由自主地戴起假皇冠，从楼窗对着“皇杠”大喊：“好哇，接我做皇帝来了，我做了女皇啦……”但，这毕竟是文艺作品。

别看谭玉龄的死因是个谜，但她的丧礼可不是个谜。谭玉龄的丧礼究竟什么样？笔者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从一位当年从事杠业的老者口中，听了一个梗概。

却说早年，北京地安门外西黄城根路南，有个信成杠房（兼桅厂），专应旗、汉两门大丧事的杠罩、仪仗。老经理狄琴荪是北京婚丧用品同业公会董事会的首任董事长。他的交际很广，社会上许多头面人物与他都有往来，所以，他在北京城里也小有声望。民国 31 年（1942 年）7 月里的一天，上午 8 点，涛七老爷（载涛）从宽街山老胡同府上打来了电话，请老掌柜的到府上去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原来是满洲国帝宫的祥贵人谭玉龄死了。要求按满族皇室的典制治丧。但是，早年专门伺候清宫銮舆卫的水利杠房，早已倒闭，现存的杠业又无一家可以胜任。所以这一“重任”也就落在信成杠房的肩上了。

狄掌柜的应了这样一桩“国际上”的大买卖，诚惶诚恐，又惊又喜。由于柜上资金不足，垫付不起这笔钱，只好通过地安门外大街平易银号经理徐子才，在本柜的帐户上“透支”了一笔巨款，才将这桩“大事”应酬下来，当然，信成杠房为此也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据原信成杠房少掌柜的说，谭玉龄死后，在“新京”（长春）帝宫的西花园植秀轩停灵受吊“五七”三十五天，依制决定以 80 人的“皇杠”发丧。根据治丧大臣的意见，提前半个月就在帝宫门前演杠。因为这份大杠所用的杠夫是北京与长春两地共同招来的。长春市的杠夫都是“小生虎子”，从来没有应过这样的“大活”，还得由北京去的 60 人来做教练。而皇杠的操作技术要求的又严，所以难度较大，需要经过反复演习，才不致临时“乱套”。

原来，80 人的大杠是在 64 人杠的基础上，将杠的中间前后各加一根竖杠，谓之“挑心”，挑心上横着做上“卧牛儿”两根。每根卧牛儿各做上抬杆两根。这样，共 4 根抬杆，用 8 夫，前后共 16 夫，加上四角原 64 夫，共计 80 夫。大杠拴好后，每角配北京杠夫 15 人，长春杠夫 5 人。杠上先不扣大罩，只铺上木板、地毯，再放上茶几、兀凳和茶具。由信成杠房管事的会同监杠大臣一起坐在上边，注视杯中的茶水，（要求走起来不外溢）。由杠头以打响尺为信号，反复演练各种动作。由治丧大臣亲自“检阅”。日本关东军的骑兵也来“观礼”。宫门前，持枪荷弹的军警林立，实行戒严，禁止

车辆通行。至于市民只能在远处居高临下地看看热闹。

因为谭玉龄既非皇后，又不是皇妃，仅仅是个贵人。这样，从名份上、地位上，她的丧礼规模不会太大，比起当年帝、后大丧自然要略逊一筹。但总的说来“在溥仪的统一吩咐下，宫内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来灵前作了祭拜。祭奠仪式从头到尾都搞得挺隆重，惊动了整个‘新京’”。谭玉龄灵柩奉移长春的般若寺时，用了80人的“皇杠”：黄漆杠、黄包绳、黄衬垫、杠上扣了一卷“黄寸蟒”的大官罩，四角以黄绸带“拉幌”。而且连杠夫举的“拨旗”都是黄底白光的，上书“恭奉暂安”（一般民间用杠的拨旗上均写杠房的字号），共16面，走在大杠的两侧，每侧各8面。杠夫一律头戴青荷叶帽，上面插了冲天锥式的黄雉翎，身穿紫色团花的袈衣，足登青布靴，加了黄靴护。手戴黄手套。杠前、杠后各跟打“响尺”的杠头两名、执鞭压差两名。俱头戴清制白凉帽（去缨），身穿白孝衣。杠夫、杠头等身材高矮一致，步伐齐整。

杠前有伪满各部大臣、文武官员执绋。由溥仪指定爱新觉罗·毓岳和溥仪二人披戴重孝顶丧驾灵。

孝属两侧各有16名头戴清制官帽，身穿白孝衣的小男孩，身跨红漆托盘，内放谭玉龄生前喜爱的文玩、用具。表示是她的侍者。左边的发出“啊——”的长音；右边发出“喂——”长音，边走边喊，以示“助哀”。行里管这种仪仗叫做“童子督胜盘”。

从杠前往前排的仪仗大致有：

披着黄锦缎的对儿白马驾辕，拉着一辆红轱辘的黄缎绣着彩凤的轿子。这在皇后宾天“奉安”时，称为“凤辇”。但谭玉龄只是个贵人，故仍称“领魂轿”，但又区别于民间发丧时用的绿帷小轿。轿前轿后均有一柄大黄云缎的座伞，一人（红驾衣、青荷叶帽）举伞，二人以黄绸带牵拽，谓之“拉幌”。

以黄、白两色绸布扎成的影亭一座，古典宫殿顶、下有须弥座，中间穿以抬杆，8人（穿孝）肩抬而行。亭内供谭贵人大照片一幅。影亭前又有大黄云缎座伞一柄。16名少年（穿孝）提铜香炉，边走边燃檀香。

以鹅黄、杏黄绸布为主，以红绸布为辅的大黄亭一座，象征谭玉龄被封为“祥贵人”的“旨谕亭”。用抬夫16名，均头戴清制官帽，身穿红驾衣。黄亭前有一柄伞帷子很短的“曲柄黄伞”，亦由身穿红驾衣的执事夫擎举而行。

黄亭前是响器和经班：

番（喇嘛）、道（道士）、尼（尼姑）、禅（和尚）若干班。

西式铜鼓、洋号的音乐队若干班。

官鼓大乐（加小乐）一班。

黄鹰、细狗、骆驼各两对，俱用身穿锦袍头戴官帽的执事夫以黄绒绳牵引。以应满族先民的牧猎遗风。

刽子手8名，身穿号衣，头戴红帽，手提屠刀、锁链。亦系外出打猎之随从相。

曲律（满语译音）8根。红杆、金火焰顶，下垂长条黄底绣金龙的长幅，沿着红火焰边。由头戴青荷叶帽，身穿绿驾衣的执事夫擎举而行。

门纛（军中大旗）一对。杆高丈许，主火焰顶，下垂黄底绣金龙的大长幅，沿着火焰边，一人擎举，二人以黄绸带“拉幌”。

以上这些仅仅是“恭奉暂安”的大致排场，估计还有其它附加执事，松

活、纸活等冥器，均因不知具体详情而未列入。但这也足以反映了当年皇杠的整个格局。

据说，这些皇杠、仪仗设备——黄罩片、黄伞帷子都是当年在清宫銮仪卫当差的人暗中保存下来的，未成想在伪满帝宫的丧礼上派上了用场。

谭玉龄的葬礼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皇杠。自此以后，什么“暂安”、“奉安”典礼均成为历史陈迹。至于皇杠的杠也成了历史文物，但又被那些根本不懂历史文物的人，劈成劈柴扔进历史的熔炉里烧成了灰烬。

爱新觉罗·毓岳、贾英华。《末代皇帝立嗣纪实——宣统皇帝有否龙种传世》。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8。第39—45页。

新形势下旧王爷的家葬 ——清末摄政王载沣的葬礼

1952年的上元节刚过，京西通往福田公墓的土道上，出现了一个近年来已经绝迹的“大殡”——由32名身穿绿驾衣，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鹅黄雉翎的杠夫，抬着一付黄绳拴的红杠，上面扣了一卷黄彩扎成的官罩，就像一座一殿一卷的古典宫殿——躺龕式的简易官罩。杠后还跟着32名身穿蓝驾衣，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鹅黄雉翎的杠夫。这分明是两班大换班的形式。杠后还有几辆汽车，里面坐满了身穿旗孝的男男女女。殡仪并不规范，但可以说是个皇杠的变种。沿途的老乡民们都好奇地互相探问：“这是谁家的大殡哪？”有些上了岁数的便猜测说：“大概是前清有爵位的人死啦。不然怎么能用黄罩呢？”乡民们议论纷纷，但谁也猜不透死者是谁，即便是懂得清代典制的“老古董”也无法判断。他们万想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末摄政王载沣的殡。

载沣，爱新觉罗氏，满族。光绪皇帝之弟，宣统皇帝之父，荣禄之女婿。清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十二日（阴历正月初五）生于北京西城太平湖醇王府内。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爵为醇贤亲王。二十七年，曾亲赴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八旗兵所杀表示谢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死前，立其3岁儿子溥仪为帝位继承人，封他为摄政王。他主张集权于满洲皇族，计划杀死掌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结果未成。后罢免袁的一切职务，亲自统帅禁卫军，代理海、陆军大元帅。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资政院。三年春，组成“皇族内阁”，又实行铁路国有化，大借外债，增加捐税。同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自请退位。翌年清亡。从民国17年（1928年）以来，先后在天津美、日租界隐居，直至民国28年（1939年）7月，天津发生水灾，才回到北京什刹前海醇亲王府居住。1949年，将王府售与高工学校，11月迁至北京东四北魏家胡同46号居住。次年又将此住宅售与政务院，7月迁至东城交道口利溥营11号闲居。

载沣的一生，身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在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1952年1月23日（阴历辛卯年腊月二十七日）病故。享年68岁。当时，他的长子溥仪，次子溥杰均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三子溥淇早殇。故由四子溥任料理丧事。

溥任的七叔载涛（涛贝勒）是位礼仪通，尤其对清制皇家、王府的典制更为精通；对于北京市面“红白口”上的各行各业都有一面之交，伪满帝宫谭玉龄的葬礼就是他一手承办的。所以，溥任不能不请他出面，全权料理治丧事务。但是，这次治丧却有几个难点。首先是正逢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从旧从新，颇费斟酌。原来他的侧福晋邓佳氏民国31年（1942年）6月死时，都是按照清制，用扣了红寸蟒加了黄走水官罩的64人大杠抬出去的，难道对王爷本身的发送还能低于这个规格吗？但从新的形势上看，不要说清典旧制，就是民间的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婚丧礼俗，都在迅速土崩瓦解，对于历史上既已形成的王府礼俗，确难保全。其次则是经济上的问题，虽然家族中还有残余的“硬货”，但是，手头上的现钱却不多，不是一两天就能筹措出来的。于是找到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原信成杠房的老掌柜的狄琴荪、少掌柜的狄恒业父子二人，共同倾心计议。狄家都建议治丧的总方针，总宜“务实”，不宜“浮费”，即有钱也要花在棺椁、墓穴等实处。而不要花在

叶帽插黄雉翎，跟夫执黄色“拨旗”上书“王府奉安”字样。但这次只以一辆大载重汽车，扣上一卷由彩子局扎制的黄罩，杠业谓此为“几了”。但后边一辆载重汽车却拉着64名（两班）杠夫。原来是用汽车拉到京西八里庄，上了土路，就改为32杠了，灵柩过重，一班杠夫顶不下来，所以用了两班，这才应了王杠大换班的典。

载泮葬于福田公墓。福田，乃取“沧海福田”之意。是前清九门提督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创办的。据说，设备、条件、地理环境，都称得起是上乘。事前已为载泮砌好了水泥的墓穴，而且留出了下葬用的马道。

临近中午，载泮的灵柩换成16人的“软杠”下了墓穴的马道。打尺的杠头在墓穴上边站着指挥，狄恒业见了，便马上用脚轻轻踢了他一下低声说：“事前我怎么嘱咐你的？”打响尺的如梦方醒，噗通一声就跪下了——原来王爷下葬时，打响尺的杠头也得跪着指挥。这是清代典制，乃260多年传统下来的“祖宗家法”。载涛见了觉得很满意，连说：“不错，不错，到现在还真有懂得咱满礼的呢！”

葬后，载涛把狄恒业和两个打尺的头目叫到公墓礼堂，说：“我还真没想到，今天所有的礼仪过节儿，你们搞得严丝合缝。这可真是后继有人啦！我的主意，叫帐房给你们每人开40万块钱（旧币，合新币40元）的赏钱。目的是让你们永远别忘了咱满人的大礼……”

“丘”，浮葬。旧时，客居北京的人家死了人，因故暂时不能扶柩回籍安葬的，即在同乡义地或庙宇空地上，临时砌一砖窖，将灵柩放入，上面覆以木架砖瓦为盖，谓之“丘”起来。这种临时浮葬的坟墓，俗谓之“丘子”。

伟大的人物全新的葬礼 ——孙中山先生葬事始末

民国 13 年（1924 年）年底，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段祺瑞的邀请，决定北上，他满怀希望的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骄傲，在人民的拥护下，去解决国事问题。11 月 13 日，孙中山先生离开了广东，途经上海，绕道日本，然后到了天津。因长期奔走革命，积劳成疾，还没有来得及进京和军阀会议就肝病发作，卧床不起了。

12 月 31 日，孙中山先生扶病入京。旋经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不幸，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经中西医多方救治无效，于民国 14 年（1925 年）3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逝世。终年 59 岁。

当晚，中国国民党在京人员，于铁狮子胡同行辕内，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决定立即组织治丧办事处，并通电中国国民党党员，左臂缠黑纱 7 日，停止宴会及娱乐 7 日，以志哀悼。

段祺瑞饬令内务部，拟议对孙中山先生作饰终典礼。内务部准备实施国葬。与此同时，段祺瑞派卫兴武为代表，到铁狮子胡同吊唁。旋派柏文蔚、王来为临时执政府治丧代表。同日，颁令曰：

“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划。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遽夺元功！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

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3 月 14 日，在京非常国会议员在参议院开会，彭养光动议讨论孙中山先生国葬案。当经决议，按照国葬条例第一条第一项“有大功劳于国家”之规定，应予国葬。北京临时执政府内务部亦遵段祺瑞令，拟定了国葬办法。3 月 19 日，经段祺瑞核准。但中国国民党人拒绝了段祺瑞政府的这项安排，决定以国民礼制安葬孙总理，以示平等。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人民深切哀悼。全国各地立即展开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全国各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均下半旗致哀。民众自动举哀，结队宣传。许多人到街上张贴致哀的文字。其后，北京 30 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规模之盛大，礼仪之隆重，影响之深远，都是民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暂厝香山碧云寺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治丧处决定，为长期保留其遗体，首先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防腐手术。入殓时，遗体穿西式衬衣，外罩民国大礼服，足登皮鞋，头戴大礼帽。殓具用的是美式楠木玻璃盖的棺材。以供吊唁者瞻仰。半月之后，苏联政府送来了一具镶着花牙子的玻璃盖钢棺。经协和医院的专家们检验，认为质料脆薄，外皮为金属质，易于传热，不适于遗体的永久保存，而且尺码过于狭小，与孙中山遗体不相适应。因此，治丧处与其家属联合商定，仍使用原来殓具，苏联政府所赠之棺，暂放东城铁狮子胡同行辕治丧处的灵掌内（现存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内），供人参观。

3 月 10 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被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前

殿。从 24 日起，举行公祭。在公园大门、社稷坛石门和拜殿（即今中山堂）门口均搭了素雅的三彩牌楼，适当地配有彩绸彩球。灵堂上也扎了灵龛，灵龛的圈门上叨出了抱厦，探出五佛冠式的挑，挑上悬着长短彩绸、绣球，非常庄严肃穆。灵龛内停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柩盖上覆以青天白日旗；柩前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遗像。上端悬匾“有志竟成”，两旁挂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灵龛两旁摆着青松碧柏、鲜花。灵堂内设有陪灵的苦席，仍按中国传统习惯，男左女右（按灵位座向）排列，灵位东侧（上首）为：戴恩赛（先生女婿）、宋子文（先生内弟）、孙哲生公子、孔祥熙（先生襟丈）；灵位西侧（下首）为：孔夫人（孙夫人之妹）、孙哲生夫人、小孩三人，为先生之文孙。同时，在此轮流守灵的还有政府文武官员。

灵堂内外摆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花篮，墙壁和殿柱上挂满了挽幛挽联。其中有许多冲天大幅引人注目。

许世英送的挽联是：

“四十年建革命之勋，立志艰贞，身可毁，家可破，国不可亡，三民五权，大名永著；

“八千里徇合肥之请，征人况瘁，声相应，气相求，而未相觐，九仞一簣，遗憾难忘。”

章炳麟送的挽联是：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是我家故物，恐灵修浩荡，武关无旧人盟秦。”

据报载，前往中央公园社稷坛拜殿吊唁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仅 1 周时间，公祭处共收花圈 7000 余个，挽联 5900 余幅，横条幅 500 余件，唁电、唁函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共计 746823 人。机关团体 1254 个。

经治丧处黄开文、许世英、李烈钧、戴天仇等互相协商之结果，定于 4 月 2 日上午 11 时举殡，暂安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俟修好陵墓后，再正式奉安。

2 日，全城各机关、团体、学校、铺户、住户均挂半旗致哀。上午 8 时起，北京西长安街至中央公园门口、天安门一带，由治丧处分段分片地插上了白旗，作为各机关、团体、学校送殡人员集合的标志。政府派出的陆、海军护灵仪仗队、北平警察保安队，先后按次序排列整齐。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花圈队则在公园南门“公理战胜”牌坊（今为“保卫和平”牌坊）集合，人各手持花圈一个，等候起灵。

以段祺瑞，大礼官黄开文、王颐苏、朱绍阳、各部总长、次长、善后会议秘书长许世英、各机关代表、顾问朱庆澜、京兆尹薛笃弼、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参谋长李兴中、执政府军事处处长刘以仁、警察总监朱深、内务部特派礼官郭昭、罗秀峰、梁吉昌、周成英、及各团体代表，均于 9 时许先后到齐。9 时 35 分，参灵仪式开始，首先由军乐团奏哀乐，随后，段祺瑞及各阁员，依次在灵堂前行三鞠躬礼，敬献花圈，各界代表及孙中山的家属亦相继行礼。

11 时发引。内务部鸣礼炮 33 响致哀。由于右任、居正、李仙根、马超俊等 8 人，用青布带挽棺，双手抬出，马湘手执宋庆龄夫人赠送的红色花圈随后，罗驭雄等手执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前导。卢师谛、吴稚晖、喻毓西、杨杏佛、李烈钧等均随执紼，李业璋、李荣等手捧遗像随行。国民军第一师手枪队队长率兵士一连，保护灵队。

行至“公理战胜”牌坊前稍停，由治丧处请来的美国白鹤公司给拍摄了电影记录片。

11时5分，至公园门口。各界送殡的来宾在原地脱帽行礼，治丧处原拟以马车运载灵柩，因有人说马车不适用，所以临时改用协和医院汽车，车为黑色，呈长方形，四角与顶端扎着青布彩球。由李仙根、马超俊等将灵柩舁入车内，将宋庆龄夫人的花圈置于柩前。马湘与李荣二人坐于车内照料一切。由戴恩赛、孙科等将棺移正，再由孔祥熙将车门关掩。这时宋庆龄夫人面罩青纱，身穿青色夹旗袍，足登高跟鞋，由两位女眷搀行。孙中山的大幅遗像则被放在一辆扎了素彩的马车上，四周绕以段祺瑞与黎元洪所赠送的花圈。马俊超、李仙根、黄惠龙、赵超、邓彦华、吴稚晖等身佩蓝色徽章，担任保护灵车的任务。

殡列行进时，宋庆龄夫人在灵车后边乘坐第一辆双马驾辕的黑车，车顶上扎着黑彩球。其它送殡官员的女眷所乘的四轮马车车顶上，一律扎白彩球。

殡列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等街道时，市民们均不约而同地肃立在便道上，主动脱帽，行注目礼。有的机关、团体、学校、商号铺户自发地摆了路祭桌，焚香秉烛；还有的摆设了茶桌，招待送殡人员饮水。

各国代表及各校师生、军警送至西直门门脸后，即分成两行，站于道旁，目送灵车驶过，然后告退。北大的花圈队仍继续前进，经观音庵，至老爷庙始分两行，待灵车驶过，学生们即将花圈投扔车上之后告退。

灵车抵达海定时，有培元小学、西郊小学、西郊女学等校师生列队行礼致祭。车经玉泉山，山口扎有素彩牌楼一座，上面嵌以“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字样；不远又有小牌楼一座，标以“哀音”二字。下午4时25分，灵柩到达了香山碧云寺，山门外有香山慈幼院男、女学生千余人，他们均身穿青制服，手执素花束，列队迎灵。另有清华童子军一大队，每人俱穿上黄军服，胸章、肩章、队色，佩戴齐整，颈上系蓝、白两色的领巾，头戴大沿帽，手执军棍，阵容整肃。当灵车开过时，全体童子军在一声口令下，均以左手举军棍，右手三指合拢（代表智、仁、勇的精神）放在军棍前行礼。顿时，鼓乐大作。此外，中法大学、绅商市民团体纷纷用松柏枝、鲜花、纸花临时搭了大牌楼。寺前的一座牌楼横额是“天下为公”四字，左联为“人群进化”，右联为“世界大同”。至二重门有牌楼一座，横额为“中法大学敬奠孙中山先生”，上联是“赤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下联为“大名乘宇宙，英灵长耀两香山”。至第五重门，挂有释净老和尚的大幅挽轴，题曰“今世如来”。

碧云寺依山而建，其院落凡四五进，每一进均须越石阶若干级，故灵柩安放时，系搭木桥推拽而上。灵柩停在寺的至高点——金刚宝座塔内。内有二尺三寸高的石龕，龕外布置得与原灵堂无异。横额为“有志竟成”，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悬有未署上下款的长联一幅，其文曰：“功高华盛顿，识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瘦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下午5时30分，举行公祭仪式。首先由军乐团奏哀乐，读祭文，众人三鞠躬，唱追悼歌，奏乐礼成。最后封灵，随即设立护灵处，置士兵1排，以资守卫。

归葬南京紫金山

根据孙中山先生生前遗愿，治丧处和家属共同商定，将他安葬在南京紫

金山的主峰之下，明孝陵以东的陵址上，因为这是他自己选定的地方。陵墓于民国 15 年（1926 年）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破土奠基，至民国 17 年（1928 年）年底竣工。历时 2 年 9 个月，耗资 150 万银元。陵墓占地面积 2000 余亩，自大门口至顶上墓室高距 70 米；平距 700 米，共分大小 10 个平台，计 339 级台阶，均以苏州花岗岩砌成。大门为“博爱坊”，其前为广场，南端挺立着孙中山铜像，陵门刻有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字，再前为碑亭。最高平台建飨堂，中门有长额“天地正气”，亦孙中山之笔迹，堂外有华表，矗立于两侧；堂内是一座用汉白玉雕成的孙中山坐像。飨堂之后为墓室，作钟形，直径约 17 米，高 10 米，无窗，其外壁系用采自香港的花岗岩砌成，“钟”底留一圆坑，此即安放孙中山先生灵柩及卧像之处。陵墓四周广植青松碧柏，树种多是各地敬献而来，其中有广东省敬献的罗汉松、五彩松、新会葵、血桂等许多名贵树种。

陵墓竣工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 181 次会议决定，指派吴铁城为中央党部代表，会同林森、郑洪年为迎柩专员，负责将孙中山灵柩由北平迎往南京安葬。时间确定为民国 18 年（1929 年）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 4 周年纪念日举行。未料，南京连降雨雪，致使通往中山陵的道路修整工程，不能如期完工。因此，展期至 6 月 1 日。

灵车试驶

为承运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到南京紫金山安葬，民国 17 年（1928 年）11 月 15 日，铁道部决定，调平奉路第 100 号花车、平汉路清太后和清帝所用花车各一辆，从中选一辆改做花车。后经北宁铁路联合办事处紧张筹措、选定，修整完竣，于次年 5 月 18 日试驶。

灵车是当年“头等式”的，但结构完全不同，车厢为木质，包以钢皮，满涂蓝漆。两面各有窗户六扇，每两扇窗户之间，各镶有白角圆徽花，正中为国徽，两面均镶着由梅花组成的银色“国花”圈，三窗之间的正中，有较大的花圈一个，亦由梅花组成。车的两头，各有格门六扇，窗棱涂了茶色与白色的油漆，内衬蓝色的时花。沿车两头各有铜质细花栏杆，两边各有细花铜门，门下各有铜面突花踏板各一块，两路正中也各有细花铜门一扇，门外各有平面铜板，可以根据需要俯仰，俯下时，恰在车与站台之间。车厢顶上满绷蓝缎，四周钉上铜条，钉为活钉，可以拆卸。车顶下，沿窗户之上，围以蓝缎车帏，下边缀以白丝线的绸穗，再用白丝绳来做成水波形。靠窗户顶的长波纹束上，靠两窗之间的波纹放下，上嵌白缎花一朵，花蕊以蓝缎缀成。车内分三间，棚顶糊蓝缎，每间棚顶各做上凹形。地板满铺特制的蓝地白花绒毯一条。三间并无隔断装置，只有白物华葛帐子两架，用白丝绳束作八字形。棺罩即放于两帐之间正中。其罩乃是以蓝缎子所制，前后左右皆用白丝线绣成白日国徽。每间顶棚正中，各安大白电灯一盏，周围用白玻璃嵌成国徽形。另有两个蓝矮长凳，乃垫铜棺所用。此车装设费共为 4 万余元。衔接这辆灵车的蓝钢车厢共 6 节，计：饭车 1 节、电灯车 1 节、头等车（迎柩专员客车）3 节、3 等车（杠夫、杂役车）1 节。是新由唐山车厂修整后，于 17 日开至京郊长辛店的。

灵车专列先开到北京东站，停于五股道上，因车辆有不妥之处，故又将钢车调开，由北宁铁路联合办事处处长吴颂华指挥修理后，又开至月台四股道。铁道部部长孙科 9 时 20 分偕夫人陈淑英女士到站，行至灵车内视察。迎柩专员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亦于 9 时半抵东站，随员有陈深德、冯锐波等

及卫士 18 名，当即与孙科等一同登车，一来为了试车验收，计算每小时的行驶速度，二来为了前往迎接迎榇的孙夫人宋庆龄一行。

10 时 30 分灵车由北京站开出；10 时 56 分抵丰台；12 时 20 分抵廊坊；下午 1 时抵杨村；1 时 45 分抵天津老站；2 时抵东站。灵车经过各站均未停留。由指定的专人毛裕昌记录到达各站的时刻，以便计算灵车驶往南京的到达时刻。

试驶的灵车到达天津后，即为验收完毕。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宪兵司令袁庆曾等预先调第三十六师步兵两营，宪兵一营，警备司令部警备队、手枪队若干名，在北月台上戒备。台内有职工会、市党部、妇女协会、工人联合会及各界代表。傅作义、天津市市长崔廷献、三十六师师长李生达、特三区主任王固盘、宪兵司令袁庆曾、公安局局长曾延毅等在站内迎候。专车进站时，军乐大奏。车停后，傅作义等即登车与孙科及三位迎榇专员会见。随后，孙科等即到头等候车室，迎候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津埠各报记者纷纷拍照灵车。直至晚 10 时灵车才驶回北京。

遗体改殓

根据奉安委员会的决定，为了长期保存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从北京香山碧云寺奉移南京中山陵以前，需要进行改殓。此包括殓具、殓衣两个方面。

改殓铜棺。派员至英国，以 27000 元购置铜棺一具，棺作古铜色，长六尺二寸，高二尺六寸，前宽二尺六寸，后宽二尺四寸。棺盖上有国徽，前、尾两端的底侧，系以铁质的横拴，为移动时杠抬之用。棺盖之侧，缀以大旋，可以启闭。棺下为金黄色缀幔。

铜棺由迎榇专员吴铁城、林森、郑洪年偕随员孙环及卫士等，乘津浦路特别快车携棺北上。于民国 17 年（1928 年）12 月 23 日抵达北平西直门车站。北平护灵主任马湘亲率日升杠房杠夫 24 名，将铜棺运至香山碧云寺。杠夫均白衣白帽，帽上嵌以青天白日徽。随行卫士 10 名，俱灰军装，左臂臂箍上标有“迎榇专员卫士”字样，胸前佩戴奉安办事处徽章。铜棺运到后，暂放到寺内罗汉堂内。

奉移南下的前四天——5 月 22 日正式奉殓。事先，由迎榇办事处派秘书池博赴西山碧云寺主持布置各项准备工作。由碧云寺大门至各院落台阶入口处，均扎成蓝色，白底的素彩牌楼。在碧云寺大殿布置祭堂，堂顶用国旗铺成，东、西、北三面，均挂上白幔帐，南端用蓝绫做成幢幔。上端悬匾“天下为公”，左联“浩气长存”；右联“有志竟成”。其内端为“行易知难”。堂内满悬电灯，北端正面对有遗容亭，中悬中山先生遗像，其下端映以电灯。亭前有方振武赠送的银盾。祭堂的左右两厢，为家属休息室；室内布置极为整洁。东配殿为音乐室；西配殿为接待室，室内有高桂滋、西郊总商会、北平中等学校以上各校赠送的银盾、木铎、造像等纪念品。

奉殓的前一天，——5 月 21 日下午 4 时，即由孙科、郑洪年、吴铁城等偕同协和医院美国医学博士史蒂芬，医生郭荣勋、赵德安、吉延卿等至碧云寺，先行礼仪，然后再将中山先生原殓的楠木玻璃盖棺请出，揭去上盖，用器械将中山先生腹内原放的药物取出，使之成为“真空”，其外部涂以格司林药水。除头部之外，通身再缠以白绒布，为移入新铜棺做好准备。据史蒂芬医师对记者表示，“总理遗容与生前无异，肉也软如常人，骤视之，如安睡状。”并说施此手术后，遗体可保存千年不坏。

5 月 22 日，中山先生遗体正式奉殓，移入新铜棺。上午 7 时，郑洪年等

指挥卫士们将中山先生应易的衣物，陈放于祭堂的长案上，计有：蓝缎白里长夹袍1件；青缎夹马褂1件；白绫衬衣1件；白线织袜1双；白手套1双；青礼帽1顶；青缎圆头云履1双；花缎锦被1幅；白绫夹被一床。此外还有：枕头2个；丝棉制成的大小束卷225个；铜盘两个，内置开关铜棺的锁钥；白绫制成的花球一束。陈放完毕后，由各摄影师一一摄影留念。

8时20分，郑洪年等亲至碧云寺最高巔石龕内，向遗榭行三鞠躬礼，军乐团奏哀乐。旋由卫士将玻璃棺从石龕内请出，郑洪年等亲自抬至祭堂，放于铜棺之左，并在棺上盖覆以国旗，复行礼仪。孙科于9时5分到寺，命人将蓝帏放下，此时室内电灯齐明。孙科乃令马湘将中山先生棺盖启开，徐徐将其遗体抬至木案上，孙科对之大哭不止。由医师史蒂芬等为中山先生更衣。9时40分，换罢内衣；10时20分，换罢二层衣，10时40分，始换罢外衣。至此，衣殓礼成。中山先生脱却民国大礼服，改换民族式服装，是由美国医师史蒂芬建议而实行的。日后，史蒂芬发表谈话称：凡人死后，因血液尽枯，必缩小一倍，中山先生若穿中山装，在棺内不壮观，故仿回教葬礼，内裹以白绫，外罩长袍马褂，非常好看。并非提倡马褂，并非沿用清制。

奉殓之日，行营派专员陶敦礼至碧云寺招待孙夫人宋庆龄。孙科及夫人陈淑英女士，戴恩赛夫妇孙满等，均于10时过后前后到寺。10时15分，孙夫人宋庆龄始至，为了避免记者们摄影，由宋子良给她打着一把旱伞，以掩其面。孙夫人身穿青布旗袍，未戴帽子，头发向后作髻，顶部头发略薄；脚穿青线袜，高跟皮鞋，行走迅速，满面悲容。由宋子安扶持，由孙科迎至休息室。夫人未发一语，热泪夺眶而出，举室为之黯然。

随后，便举行一家族会议，先是有人主张在大殓之前，要举行一个向遗体告辞的仪式，祝文已拟就，大意为×年×月×日，家族人等恭请先生入殓等语。后考虑诸事已安排甚当，不便再事繁文缛节，并决定入殓时务要节哀免痛。遂散会。

上午11时，家属齐入祭堂。仍放下蓝布幔，孙夫人看见了先生遗体，大哭不止，声达户外，宋子安劝她保重，夫人不忍，仍号陶不已，经郑洪年劝止。孙科与室内诸人，亦各掩泣。未几，入殓时间已到，乃由孙科等舁先生遗体至铜棺内，其不平之处，垫以丝棉卷束，使之安稳。最后再给遗体盖上白绫被，其上再加棉被，但将面部露出，以便到南京时让民众瞻仰。大殓告成，家属、迎榭专员和蒋介石的代表何其巩、先后行三鞠躬礼。

殓后，中山先生的家属提议，将先生原来穿着的民国大礼服、大礼帽等衣物，仍装入原用的楠木玻璃盖的旧棺内，封存于宝塔的石龕中，成为“总理衣冠冢”，以为永久纪念。当时参加大殓的诸人均表赞成，遂于当日下午3时，在石龕内举行了衣冠冢的成立典礼。

5月25日，孔祥熙也建议保留碧云寺灵堂及原用棺槨，以资纪念。得到国民党中常会批准。

起灵之前

根据奉安委员会决定，孙中山先生的灵榭将于5月26日从北平西山碧云寺起灵，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起灵的一周以前，北平市即进入了迎榭、送榭筹备工作的紧张阶段。各界也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

5月19日，在迎榭专员办事处的主持下，开始在市内各主要街道、城门、牌坊等处悬灯志哀。灯上一面为党、国旗，一面书“恭迎国父灵榭”等字样。灯分两批挂齐，19日先挂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和平门、南长街牌楼、

天安门、正阳门、南池子牌楼、崇文门、外东华门、各两盏；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各一盏。22日用大梯悬挂，羊市大街牌楼4盏，西四牌楼8盏，外西华门2盏，金鳌玉桥牌楼16盏，北海牌楼4盏，总统府牌楼6盏，西长安街6盏，司法部街牌楼2盏，东华门、东长安门、中华门、东交民巷牌楼各2盏……入夜，灯盏齐明。

21日下午，迎榱宣传列车抵平，车内有中山纪念堂，布置非常庄严肃穆，各界民众均可自由参观。即晚及22日，在中央公园举行游艺会，映演革命影片，并有新剧及音乐演出，藉以进行宣传。次日，北平召开了欢迎宣传列车大会，到会4000余人，由学联代表任主席，行礼仪。下午又举行了游艺会。

23日，北平各界决定，将曾经停放过孙中山先生灵榱的中央公园社稷坛前殿改称“中山堂”。由商震主持揭幕式，悬上了蓝底金字的“中山堂”匾额。

24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了隆重的送榱大会，中搭主席台，由商震担任主席。东西两侧高搭素彩牌楼，东牌楼上书“天下为公”；西牌楼上书“世界大同”。当日，各团体及学生代表1800多人，前往西山碧云寺祭灵，并在原停放中山先生灵榱的塔前建立纪念碑，由林森主持了奠基典礼。

同日，国民政府规定了奉安时间及招待各国使节办法。外交部派陈世光等3人去上海，陪同各国使节进京。

起灵的前一日，中山先生的家族举行辞灵家奠。孙夫人宋庆龄、孙科率领夫人陈淑英及两公子、二女公子；次亲属戴恩赛夫妇、陈铁珊夫妇、陈秋光夫妇、海容襟等，于晚间11时，先后到达碧云寺。礼仪简单隆重：（一）、孝子同家族肃立灵前；（二）、奏哀乐；（三）、行三鞠躬礼；（四）、献花；（五）、奏哀乐；（六）、礼成。辞灵后，家族全体成员即守待移灵。

迎榱办事处为移榱妥善安稳起见，特嘱日升杠房经理孟傅绶（孟羲之）组织杠夫，从2月初即在万寿山黄影壁间举行移棕演习，已经进行4次。5月25日下午5时10分（起灵前8小时），特由中山先生灵堂至碧云寺山门外，再演习一次，验收人员认为“该杠夫等抬法纯熟，步伐平稳，一切行动，颇为敬谨”。

与此同时，迎榱专员林森，亲至碧云寺，召集日升杠房经理孟傅绶等，商议奉移灵榱的详细办法。决定按既定计划，准予26日凌晨1时出堂：6时30分到万寿山；上午10时到西直门；下午4时到前门东车站。规定杠夫步伐，每步前进五寸。灵前压杠的马队由杠夫两名牵马行走，不得急行。杠夫人数及换班办法，亦经议定（由迎榱办事处议妥）：（一）、由灵堂至碧云寺外，用杠夫24名；（二）、由寺外至万寿山用中杠32人抬，加小罩一卷，所有杠夫分6队换班；（三）、由万寿山到东车站，用大杠64人，换大罩，所有杠夫分3班换抬。指挥杠夫由日升杠房经理孟傅绶担任。规定杠夫上身穿蓝衣，前后嵌有青天白日徽，下着蓝裤，足登黑油靴，头戴“介石式”帽，帽章嵌有青天白日徽。全身“普新”。

迎榱办事处事前商定了迎榱官员的职务，碧云寺内事务由郑洪年指挥；由碧云寺至东车站沿途殡列由吴铁城指挥；林森则专在东车站照料灵车一切事宜；其碧云寺内秩序则由三十八师师长李眼膺担任。

由碧云寺至西直门的迎榱大道上，设清道夫300名，铺垫黄土，随时洒布清水，并用公安局所派的汽碾，往来碾平。道旁每隔五六丈的树干上，即贴有某旅、某团字样，预备警卫军队集合认记的标志。距碧云寺不远，另有

大旗一面，上书“卫队”字样。公安局所派警察共计7队，驻守道旁。由西直门至西四牌楼，亦由清道夫洒扫，因原系马路，较郊外土道省工。在西四牌楼南，立有横行大木牌一具，上书“参与送柩者请往北”。计沿途警卫车队为卫戍总部所派的教导团两团，以及三十二师的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两团等部。碧云寺前移柩所用的便罩，有士兵20名、官长1名保卫；万寿山前的大罩大杠，设士兵50~60名，官长3名保卫。并由公安局派消防队一大队，携带消防器械，在大道两旁，分段警备。平市卫生局为防万一，特派卫生第一区事务所所长方颐积，所员郑河先等率人在碧云寺外组织救护队。燕大女生40余名，亦组成救护队。

起灵前，碧云寺大门前高扎素彩牌楼一座，系用白布蓝花组成，顶上有巨大的青天白日徽，横额为“天下为公”四字。二门素彩牌坊，较大门牌坊略小，组织结构相同，横额为“大同”、“三民”等字样。再进即为东旁门，亦扎有素牌坊，入门即祭堂，堂前亦扎素彩牌坊一座，旗杆上下半旗，外额“浩气长存”；内额“演明主义”。门洞挂纱制“奉迎”灯笼两架。祭堂距牌坊4丈，极为庄严。先生遗像悬于正中素扎亭内。遗柩即安置于亭前，铜棺罩上覆以国徽，顶上悬电灯4盏，白绸束球4个，下缀蓝穗。棺尾供桌上，有景泰蓝大香炉1尊，花瓶1对，炉内香烟缭绕。四壁皆以白布遮掩，沿壁设有青松碧柏、月季花数盆。堂门挂着蓝缎棉幔。再进至先生灵柩原停处右墙嵌立纪念碑1座。寺内各处及迎柩大道上高搭棚架，上悬煤气灯。又制马灯200盏；纱灯400盏；4尺长竹竿400根。作为挑灯之用。届时将千灯万火，照如白昼。同时，碧云寺至西直门迎柩大道上，每50步即悬水月电灯一盏。沿途树幌、电杆均悬皂花，为移柩做好准备。

北宁铁路局于起灵前还公布了，奉移南下的灵车先后开行、到站的时刻。总理灵车专列将有湖广号铁甲车，作为先行的开道车，另有护灵铁甲车、随员车、来宾车等等。计划：

第一列：铁甲开道车，于16：15开车；19：15抵津，停车25分，19：40由津开出，于28日9：30抵浦口。

第二列：总理灵车，于17：20开车；20：00抵津，停车30分，20：30由津开出，于28日10：15抵浦口。

第三列：随员车，于17：45开车；20：45抵津，停车30分，21：15由津开出，于28日11：00抵浦口。

第四列：来宾车，于18：30开车；21：30抵津，停车30分，22：00开车；28日11：45抵浦口。

起灵前夕，迎柩专员办事处作出了关于三专员去留的决定：以郑洪年、池博留住西山，办理一切结束事宜；吴铁城则随灵柩去南京；林森年纪过高，不克执紼送殡，仅至东车站恭送。并发出了“特派迎柩专员办事处启事”，宣布5月28日办事处工作结束，此机构即日撤销。

奉移南下

5月26日，北平30万人衔哀恭送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柩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殡仪盛大、隆重，备极庄严，敬肃之至。

是日凌晨0时40分，在碧云寺举行奉移典礼。总理家族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以及政府官员何成浚、商震，迎柩专员林森、吴铁成、郑洪年等，齐集灵堂，行礼如仪：

（一）、全体肃立

(二)、军乐团奏哀乐，全体向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柩行最敬礼，一、再、三鞠躬

(三)、孝属、迎柩大员向灵前献花

(四)、军乐团奏哀乐

(五)、护灵处干事池博持国旗（长约6尺）一面，请奉移专员覆棺。由何成浚、林森、商震、吴铁城等，每人持国旗一角盖于铜棺上。

继由日升杠房经理孟傅缓率杠夫16名，至灵堂将铜棺置于杠上，用蓝色杠绳拴紧。1时正，起杠出堂，由河北省省政府乐队奏乐前导。总理家属及各专员均在灵后，宋庆龄悲痛不已。为力求灵柩的绝对平稳，杠夫们发挥了京杠房的特技。经过每进院落的数十级石阶时，都是采取前后杠夫轮流“摘肩”，以手捧棺的操作方法抬下来的。为给灵柩照明引路，护灵处预备了大纱灯30余个；手提油灯100余个；小纱灯200余个。由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派来的学生提灯前行，列队约半里许。灵柩移至碧云寺山门外的平台时，已凌晨1时50分，当即换用中杠，并将特制的银色棺罩，盖于铜棺上。中杠计用杠夫6班，每班32人，执灯4人，执旗4人，合计40人。执灯者为前后各2人，照耀各处；执旗者亦前后2人，中途如遇有空中障碍物，即行拨除。中杠换毕，由孟傅缓指挥杠夫，每行8步，换班一次，轮流替换，行至万寿山时，约换了420余次。是时，天已大亮，正好凌晨6时，复由孟傅缓指挥换升大杠。杠夫分为3班，每班64人大杠前后扶杠者、执旗者各4人，共为80人，共计240人。据说，杠夫的待遇是，每人发给棉帽一顶；夹衣一件；单裤一条。其不去南京的只发给工资10元，执灯、执旗者只得3元工资。其随往南京紫金山之杠夫仅选52名（并已照了相片，办有证件），每人发给工资50余元。

为保证送柩大典的顺利进行，特由军警联合维持秩序。郊外警备责任，由商震派士兵两团担负。碧云寺至西直门，由西郊分署派警察250名，协同负责。自西山至万寿山前，每约4丈，设岗1人，因道路狭窄，军警多鹤立于山头之上。万寿山至西直门这段路还加派了第三十二师步兵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两团，与三十八师的骑兵连一连，分布于灵柩前后，担任护灵任务。

郊外送柩行列：

凌晨1时，碧云寺山门外，送柩行列即已组成。灵柩换中杠后，马上向万寿山方向进发。其行列顺序大体为：

(一)、公安局特派的开道马队警察8名。

(二)、政治学院特派的由杨永领导的骑兵30名随后。

(三)、军乐队一部，奏哀乐前导。

(四)、第三十二师步兵八十八团。

(五)、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特派该校学生750名送柩。由碧云寺至万寿山，派小学第一、第二，及女小学生共350人执灯相送。由万寿山至西直门，更换为该校中学生。男生一律穿白衣裤；女生则穿月白色长袍，极为整齐。

(六)、影亭一座，内供总理孙中山先生大幅遗像；外悬孙夫人宋庆龄所献的鲜花圈。用16人抬舁而行，4人轮流替换。

(七)、提炉34人，分两行行进。每人手提白铜炉一个，内焚檀香。

(八)、32名杠夫以一付白漆蓝绳拴系的“中杠”抬舁着总理灵柩，并

加盖特制的银色棺罩。由日升杠房经理孟傅经指挥。

(九)、后护——三十八师骑兵连。

(十)、协和医院救护车。

(十一)、总理家族车。

(十二)、政府特派迎柩专员车。

灵柩由香山至海淀：

灵柩在碧云寺山门外换杠毕，仪仗队及各送柩团体即开始前进。哀乐大奏，同时鸣放礼炮 101 响，并燃火炬 8 柄，一时光耀照天。各政府要员均走在孙夫人宋庆龄之后，随同灵柩徐徐行进。沿途军警均举枪致敬。2 时 10 分至下冈，20 分至北辛村，孙夫人及何成浚、商震、林森、吴铁城等要员均于是时改乘汽车，先行进城，在西直门迎候。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亦鞠躬告退。灵柩至玉泉山，时整 5 点，东方微明。至蜈蚣桥时，时针业已指向 5 时 40 分。即令杠夫脚步加快，至万寿山换大杠时，适为上午 6 点整。换杠后，由于人数增加，重量减轻，故速度略增，约经过一小时即抵海淀。是时，郑洪年在西山的公事已完，乘 240 号汽车进城，与送柩殡列相遇，乃下车面嘱杠夫：“因现在时间紧迫，你们要减少换班次数，加快速度，赶快入城。”言罢，复乘汽车入城，往西四牌楼布置沿路事项。送柩行列当即遵嘱，于 9 时到达西直门十字街口。至此，公安局骑兵连陆续回防。三十二师八十八团步兵则分布于西直门至十字口，成一平圆形。因城内送柩行列尚未布置就绪，不便马上进城，于是宣布就地休整。由林森乘 325 号汽车进城视察一遍。9 时 50 分，城内警备完毕，布置就绪，遂由林森命令前进。

奉安大典任人参观：

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柩南下，为北平圭城各界人士所关注，但有传届时禁人观礼的说法。但迎柩办事处并无此项决定，市公安局为向市民作出解释，于 25 日发布布告如下：

“为布告事。本月二十六日为总理灵柩奉移，业由奉安迎柩专员办事处规定办法，分行遵照办理。按照办法规定，灵柩经过之路线交通，于上午九时起，酌量暂停通行。又，除送殡者，其余概由警察指挥。在两旁行人路上行走，不得混入马路。又，两旁小贩，劝令暂时停止，免碍交通，酌加限制。并无一律禁街，及商店闭门停业之取缔。乃阅本日各报纸，有登载一律禁街，断绝交通，商店停止营业各节，殊与原案及事实均不相符。除飭区传知外，合亟布告。”

灵柩进西直门以后：

西直门门脸东面，搭有席棚一座，内设桌椅，门外贴着“总理家属休息所”字样的黄纸条。而送柩人员及新闻记者们因无他处休息，所以就都齐集棚内外。棚外停有汽车和四轮马车多辆，大部为总理家属及迎柩筹备人员所备。其余为中外新闻记者的汽车。此外还有摄影汽车数辆，以便随时拍摄新闻记录影片。9 时 45 分，有乘马士兵数名，向棚内外喊话：请总理家属乘马车进城；非总理家属，请随灵步行。于是总理家属均按护灵处事先的布置登上了马车。第一号马车为孙夫人宋庆龄所乘；第二号马车为孙科所乘；第三号马车为孙科夫人所乘；第四号马车为孙科的公子所乘；第五为戴恩赛夫妇；第六为宋子安、宋子良；第七为陈秋光夫妇；第八为陈铁珊夫妇。第九号、第十号两车暂时虚席。

灵柩开始进城，首先由骑兵营队官长一员，率领骑兵数名，手执开道旗，

在最前头开道。后边依次为：香山慈幼院教职员、学生数十名；16人肩抬素彩扎成的总理遗像亭；16名杠夫各提香炉一尊，内焚檀香。次为长三丈余的黑绋两行，每行有十余人执行，末端系在杠首；最后方为灵柩。经过西直门门洞时，正好钟鸣十下。进城后，经过西直门大街时，即有张学良所派来的飞机三架，在天空盘旋，逐渐降低，以示护灵。此时，摄影汽车及拍照者纷纷向灵柩逐段摄影。两旁观礼者，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均欲先睹为快，已不像在郊外时那样清静了。11时，至新街口，预先已有马队60名及步兵1排，候于道左，准备送柩。至此，所有送柩队伍均按指定的次序一一加入，竟然排出五六里地之遥。当时，灵柩尚在新街口，而先头行列已过西四牌楼了。

城内沿途的警戒：

自灵柩入城后，沿途秩序，由赵超率队乘三轮汽车往来于殡列两侧，担任纠察任务。另由三十八师第二百二十六团第三营及第六、七、十、十一各连，警戒于西直门至太平仓一段；第二百二十八团第一营及一、二、七、九、十各连警戒于太平仓至西单牌楼一段。均持枪肃立，并不直接干涉人民，其两旁便道上观众如有挤入大道者，则由警察随时婉言劝阻，所以沿途男女老幼，鹄立道旁观看者，并未与军警发生冲突。西四以北观众越入大道者甚少，而西四以南观众渐多，故间有往来于大道者，亦可见人民对于瞻仰灵柩的热烈。

城内送殡的行列：

总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有其最大的特点。主要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全新的，无宗教性礼仪；不用民族乐，用西乐；不用民族传统形式的仪仗，除影亭，提炉外，无任何旧的痕迹。其次，殡仪是规范化的，是在奉安委员会、特派迎柩专员办事处统一指挥，统一组织下进行的，各界送殡的人数是事先安排指定的。规定所有参加送殡各部队及党政军警各机关、各法团、各界代表，均须按照行列次序，每8人列为一排。家族之女眷，如有乘汽车送殡者，列在殿后骑兵后随行。参加送殡之护兵马弁，须在殿后骑兵后步行。并特别强调，送殡者必须整齐严肃，以表哀敬之意，无论任何人在集合中或行进中，一概不得呼口号及散发传单，尤其不得持自制的各种旗帜。

自新街口以南，送殡者分为12行列，由前至后，其次序为：

第一行列 1. 骑兵带队官长1名，乘黑马执开道旗在最前头开道。

2. 骑兵3名，乘黑马背枪护旗。

3. 骑兵2名，乘黑马背枪分执党、国旗（国旗在左，党旗在右）。

4. 骑兵3名，乘黑马背枪护旗。

5. 军乐队（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军乐队）。

6. 骑兵1队（执长矛）。

第二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10步）

1. 军乐队（天津特别市公安局军乐队）。

2. 总指挥：商震，乘马在前；士兵1名乘马执旗在后，旗为蓝地红边白字。

3. 步兵（每师一连，枪口朝下）。

第三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10步），1. 军乐队（北平社会局第二习艺工厂军乐队）。2. 指挥张荫梧，乘马在前；士兵1名乘马执指挥旗在后。3. 步兵1排。

4. 工界代表。

第四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

1. 军乐队（北平社会局第二习艺分厂军乐队）。

2. 海军官长。

3. 海军兵士（枪口朝下）。

第五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

1. 军乐队（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军乐队）。

2. 指挥赵以宽乘马在前，警士 1 名乘马执指挥旗在后。3. 警察保安队 1 排（枪口朝下）。

4. 商界及各法团代表。

第六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

1. 军乐队（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内一区军乐队）。

2. 指挥原定何其巩，后改为冯鹏翥，乘马在前，警士 1 名执指挥旗在后。

3. 警察保安队一排。

4. 学界及农界代表。

第七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

1. 军乐队（北平宪兵司令部军乐队）。

2. 指挥楚溪春乘马在前；宪兵 1 名乘马执指挥旗在后。3. 宪兵 1 队（枪口朝下）。

第八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

1. 军乐队（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外五区军乐队）。

2. 蒙藏代表、河北省党部代表、北平特别市党部代表、河北省政府及各厅代表、北平特别市政府及各局代表、各军事机关代表、中央各直辖机关代表。

第九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1. 军乐队（天津警备司令部军乐队）。

2. 步兵 1 连（枪口朝下）。

3. 团旗（各团团旗集合排列）。

4. 步兵 1 连（枪口朝下）。

第十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

1. 军乐队（河北省政府军乐队）。

2. 步兵一连（枪口朝下）。

3. 提炉（16 人提炉，内焚檀香）。

4. 遗像亭（16 人抬，内供总理孙中山先生大幅遗像）。

第十一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

1. 各国政府代表、各国公使及外宾。

2. 执绋者。

总理孙中山先生家族、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河北省党部执监委员、北平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各总指挥、平津卫戍总司令、各司令、各师师长、各旅旅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秘书长、各厅厅长、北平特别市市长及秘书长、各局局长、各师部以上参谋长。

3. 灵柩（64 人大杠，盖棺罩一卷。宪兵 40 名荷枪在灵柩左右拱卫）。

第十二行列（要求距离前行列 10 步）骑兵 1 连殿后（执长矛）。

殯列最后为总理家属及军政要员女眷乘坐的汽车、马车。

执绋人员约有百余名，左方计有：张继、郑洪年、孙满、容海襟、李品

仙、楚溪春等。右方计有：马坤、梁寒操、陈君璞、张清源、吕咸、李书华、刘镇华、刘人瑞、华文选、吕复等。其后参加者甚多，至天安门时，执绋者已达 200 余人，到北京东站时，商震、张荫梧等也下马加入了执绋行列。

由新街口到西单牌楼：

灵柩行至新街口，已经 11 时。送殡人员的各行列均敬候于街心，各观礼的民众则立于两旁的便道上。秩序井然。当各行列与灵前军乐队相接时，奏哀乐前行。惟第七行列以下，未及与后列相接即前进，致使大队中断。

阳历五月底的北平，烈日如蒸，街中泼水尽干，灰尘复起。卫生局的洒水车即在大队中断的三处，徐徐前进，以洒水压尘，直至队伍衔接后，洒水汽车始由队西绕去。

护国寺街口外路西有民间火壶茶会摆桌献茶，以备送殡人员饮用。茶桌上焚香秉烛，正中设佛龕一座，内供总理遗像，颇称异于一时。西四牌楼又有两档子民间茶会，东西隔道而列。慈慧殿和尚仿我国旧有飞惯，特在西四南路东便道，摆设茶桌，供送殡孝属饮水。警察厅消防 2 队则头戴铜盔，全身制服，架水龙而立，以防临时火警。

灵柩颇缓，而送殡的前头行列（多是马队）走的较快，致使距离越拉越大。所以，前队行至西四牌楼时，不得不暂停前进，各指挥及士兵均下马休息。约 20 分钟后，始继续行进。灵柩过西四牌楼已 11 时半。由于前导队步伐仍然较快，仅 30 分钟即逾过西单牌楼，结果又与后边灵柩执绋的队伍脱节而再次休整。

西四牌楼东西两街街口均为观众所塞。观礼者虽然拥挤，但秩序并未紊乱。总理遗像亭经过时，乃由迎柩专员办事处派的纠仪队高呼“脱帽”，民众皆应声脱帽俯首，表示哀敬之意。

北平各界总理奉安大会在西四南、北大街各搭素彩牌楼一座，上悬“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救世界之主义”的横标。中华北平佛教平民教育联合会总理奉安纪念大会在甘石桥搭素彩牌楼一座，上书“法治集大成，五权三民创制者；庶政公天下，古今中外第一人”。

长安街、天安门、正阳门前：

送殡行列由西单牌楼向东转入西长安街时，三十八师二百二十四团士兵即站队环立于南、西两方，以防止观众向前拥挤。当时，附近各铺户门窗均为观众所占据，甚至陈列橱窗里的货物亦被清除无遗，免得有碍视线。屋顶、树上及电线杆子上均盘踞着无数观众。东西街内，10 余丈外，尚有观众登在洋车上、汽车顶上，引颈遥望。人声喧嚣，此起彼伏。是时，烈日当空，人们挥汗如雨，亦在所不顾。灵柩过西单时，约为下午 2 时 20 分左右。

行至西长安街新华门以东，秩序渐好。观众均躲在路南的花墙子后边，从墙孔中窥望，街头并无一人。但南长街南口，观众则均挤于桥头观礼。中央公园门前素日车马水龙，此日却寂无一人。据说，事前军警即进行了清理。天安门前亦不准任何人逗留。东三座门以外，均由警察把守，行人、车辆均不能进。灵柩至三座门一带，休整约 15 分钟后，继续前进。灵过天安门后，后面观众即蜂拥而上，随之行列南行，至中华门前被军警所阻，遂排于东西两侧驻足而观。中华门内皇城西墙上坐有百余观众。邮务局职员则登上三层楼屋顶西望，与银行公会楼顶的观众遥遥相对。远处十余丈高的大树上，还有人攀高以观。中华门内东西两豁口戒备极严，警士列成两排，不准观众通行。中华门外、前门以内的两旁观众皆被阻于一、二两路电车轨道之外。美

国士兵亦立于兵营楼上窗内向西瞭望。前门一带戒备异常严密，军警密布，环南、西两面均为警察岗哨。凡不进站送柩的大队陆续前往天桥解散时，前门大街一带的群众，时而遥望东车站前的灵柩，时而观看街心之大队，一时诚有应接不暇之势。

东车站内外之布置：

北京东站前面，搭有九间宽的大素彩牌坊一座，中间上额嵌“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牌坊旁边新立一木牌，上书：“注意：凡领有平津卫戍司令部所发月台证者，请在车站外恭候。总理灵柩上灵车后，方可入月台。”下书“特派迎柩专员办事处制”。牌坊之内，有高大席棚，棚内上面书：“继续总理精神，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大同。”至1时30分，乃将运灵小车（用它将灵柩装入正式灵车）安置在棚内中央。该车系木质，长一丈，宽五尺四寸，四面绘青天白日徽，外罩蓝绸，白绸里，上绣白日，光芒四射，下绣万字纹。左右四铜轮，外镶橡皮，以防震动，前后四铜环，前环缀以青绸，藉便提挽。同时，从车前至第二月台的地面上，满铺草席。以利灵柩上车。

车站内外戒备森严，车站方面之警察，由外右一区署长耿济和率领。此外有第三十八师第二百二十五团第一营步兵，由营长赵学立率领。并有第三营宪兵若干名进行配合。自上午7时起，即分布于站内外站岗，计：车站牌坊处站立军警约30名，每间隔5步即站立1名。车站两门口各站20名。站内第二月台整队约200名。其余则散布于各冲要地方。并有官长往来指挥。凡未持有卫戍司令部所发证件者，一概不准入站，故秩序丝毫不乱。此外并有消防第三队，由机关士白续贵带领，在车站外守备。以防临时火警。

灵柩到达北京东站前后：

下午2时15分，送殡的前列即到前门，因车站不能容下多人，故大部未能入站。迎柩办事处在正阳门外两边，立木牌两面，上书“各位送殡者，请向天桥方面解散”。彼时由商震、张荫梧及三十八师师长李眼鹰等，亲自乘马指挥各列送殡者一一南行。

总理灵柩抵达车站后，即由杠夫总指挥日升杠房经理孟傅绶亲自到移灵用的四轮车前视察一遍，然后令杠夫将灵柩徐徐放于车上。时正下午2时55分。安放妥当后，即由吴铁城、张荫梧、商震、李服膺、冯鹏翥、林森等执缚牵车在前，后由其它执缚者相推，直赴灵车（正式火车车厢）。车与站台的接近地点，安置了小铁轨，以免铜棺入灵车时摇动。3时20分，铜棺安放就位，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即偕孙科至车内视察。林森等并向铜棺行三鞠躬礼，礼毕，即在车内照料一切，并派马湘为灵车看守主任，担任守护灵车的全责。

各项列车按次开行：

关于送柩列车始发的时间、地点和次序，业经迎柩办事处与北宁铁路局议妥（对原计划略作调整），决定各项列车每隔45分钟开出一列，其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列：前导车，12时由前门始发；第二列：铁甲车，12时45分由东便门始发；

第三列：护灵车，15时由前门始发；

第四列：铁甲车，15时45分由前门始发；

第五列：灵车，17时由前门始发；

第六列：铁甲车，17时45分由前门始发；

第七列：随员、来宾车，18时30分由前门始发。

灵车先停在四股道上，灵柩安置妥贴后，至 15 时 35 分，转到第三股道上，以便与特派迎柩办事员办公处专车接轨。该列车共 15 辆（节）：车头为平奉机车第 214 号，前面交叉党、国旗，中间有太阳光茫牌一面，后挂第 22 号冷藏车；2508 号行李车、厨房铁闷车、津浦路蓝钢卧车，为孙夫人偕孙科等乘坐。其厨房铁闷车三等第 585 号系杠夫所坐；三等第 24 号系拱卫士兵所坐。次为头等客厅车第 208 号；再次为头等饭车；再次即为灵车，灵车之后为泰山号包车，是迎柩专员的办公厅。其后是头等餐车第 2057 号、头等客厅车第 207 号，为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等三人所坐。其后还有头等卧车第 558 号及 562 号两辆（节），为送殡各要人张继等所坐。

迎柩专员办公车及头等客厅车厢内，均设有大、小沙发、茶几（几上有茶具、花瓶）、写字台、戳灯；窗上挂着白纱窗帘，车壁悬有挂表，地板上铺着蓝地白花的地毯。布置非常整洁。

根据需要，各节车厢由铁路上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是根据严格训练之后审查批准的。按照“迎柩专车员役着装办法”一律为白制服，白鞋袜，帽上原来的金边改为黑边。以示哀敬。

下午 5 时整，站上的铃声大作，列车即徐徐出发，这时军乐齐鸣，各军士均举枪致敬，全体送殡人员脱帽鞠躬致送。车站内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

灵车上护灵的军队：

灵车前后各有卫士 2 名，系与孙科同来者。此外，中山号铁甲车队 1 队；护灵拱卫队 1 队。北平警备司令部派第三十八师第二百二十三团第二营，由营长李俊功率领，送至德州，然后由陈调元派队接续护送。宪兵司令部派第三营营长褚宏浚率宪兵 60 名送至浦口。

卫戍司令部军乐第二队亦随灵车南下至浦口。

随灵车南下的人员：

随灵车南下的人员，除总理家属外，尚有政府要人张继、林森、吴铁城、郑洪年等。总理的故交日本客人梅屋、山田、菊池三人亦随柩南下，共坐于 520 号卧车中。

送柩尾声：

灵车南下后，站内军警、军乐队及各界送殡人士陆续撤出。群集站前的群众为观看撤出队伍不肯散去，历半小时之久。至于天桥一带送殡的队伍解散后，有的被本机关汽车、马车接走，有的则自费乘高价人力车而去，但都不能顺前门大街北行，所以皆往东西的街道和胡同中疏散。路人对他们均投以羡慕的眼光。

其它各处观礼的群众良久不能尽散，直至下午 6 时多，前门、天安门及长安街两旁尚有三三两两的女士，参观大典归来……

南下路上

晚 8 时，灵车抵达天津，停车 30 分。各界群众在车站公祭。天津各界送大银镜一面，上书“人类救星”；警备司令傅作义也送大银镜一面，上书“人类福音”；政训处送花瓶一个，上刻“主义之花”4 字，瓶内插满鲜花。8 时半，灵车继续南行。

5 月 27 日，上午 8 时 40 分，灵车到达济南，停车 30 分。各界在车站公祭，并举行了纪念碑奠基礼。9 点 10 分继续南行。

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宋子文、唐生智等人，由南京下关码头乘威胜舰去浦口。下午乘火车北上临淮关迎柩。将与灵柩同车到达浦口。

安抵浦口

在孙科、宋庆龄、吴铁城、林森等人的护送下，总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自北京东站出发，经过天津、济南、蚌埠，历经 42 小时的行程，终于在 28 日上午 11 时 45 分安抵位于长江西北岸的浦口车站（仅与南京一江之隔）。浦口车站早已搭就珠彩牌楼。灵车经过处，均围以翠竹，并在站外设立了休息室。

是日一早，浦口车站及位于长江对岸下关的中山码头，直到中央党部的中山路一带，即由首都公安局警察及卫戍司令部的士兵严密戒备。谭延闿、胡汉民、戴传贤、王宠惠、蔡元培、易培基、陈果夫、王伯群、刘文岛、方觉珠、陈仪、葛敬恩、王伯龄、叶楚傖、邵元冲、孔祥熙、焦易堂、恩克巴图、刘芦隐、周启刚、赵戴文、丁超五、高桂滋、周亚卫、黄昌谷、宋子文等党政要人，以及各机关、各团体代表等 600 余人，均于上午 8 时以前，即到浦口车站，恭候灵柩的到来。

上午 8 时 25 分，前导压道车（共挂车皮 12 节）首先进站。车上的护灵兵为方振武部第一百三十五旅二十六团一营，由旅长王占林率领。

9 时 5 分，中山二号护灵铁甲车进站。国府代表蒋锄欧随车而到。

11 时 45 分，灵车在凄楚的哀乐声中驶入车站。长江对岸的狮子山炮台当即鸣放礼炮 101 响。这时，到临淮关迎柩的蒋介石身穿丧服——白长袍，黑马褂，与宋庆龄、宋美龄、孙科等一同下了灵车，向站上迎柩的官员挥手致意。

灵柩旋即奉移于月台的祭坛前，迎柩人员同行三鞠躬礼，默祷三分钟，礼毕，即移灵于事先准备好的威胜舰上。据说，舱内的灵龕是北京扎彩局工人的杰作，龕上叨出抱厦，上有毗卢帽式的顶子，垂下素彩球。左右家属陪灵的地方，也扎出左右圈门子和素彩子隔扇。完全按照陆地停灵设位一样。军舰驶往下关时，由舰上的海军军乐队高奏哀乐。停泊在长江的外国舰艇，皆鸣礼炮 21 响；狮子山炮台亦再次鸣礼炮 101 响。同表哀敬。这时，蒋介石、孙科、宋子文及其他要员均肃立于灵柩左右的苦席上默哀。宋庆龄满面泪痕，悲愁已极，面向灵柩，屹立不动，四周声色，均充耳不闻。

12 时 10 分，安抵下关。各机关及民众团体代表云集中山码头迎迓，由司仪翁烟隐赞礼“全体肃立！”“向总理英灵行最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移灵！”即由杠夫将灵柩用小杠抬下军舰。军乐大作。岸上迎候者有宋老夫人、孔祥熙夫人及各机关代表、中央军校学生列队约三里之遥。岸上早已备妥灵輶（汽车），其结构造型甚精，车厢分为两层，上层置鲜花，中腰围以镂花的铜条，外以绿绸扎彩，正面饰以青天白日徽章。12 时 40 分灵輶开动，向中山路中央党部礼堂进发。其迎柩队伍的序列为：

- 一、党、国旗前引。由持青白旗长枪的骑兵团一队开道。
- 二、军乐队 1 班；步兵 1 列（枪口朝下）。
- 三、海军军乐队 1 班；海军陆战队 1 列（枪口朝下）。
- 四、警察队乐队 1 班；警士 1 列（枪口朝下）。
- 五、军乐队一班；农、工、商、学、妇女团体代表。
- 六、军乐队 1 班；华侨代表；各编遣区；各师、旅；各舰队；航空队代表；各省特别市政府代表；各省特别市党部代表；并南京各机关中央党部职员；中央军校学生。
- 七、遗像亭，由杠夫 16 人抬异而行。

八、军乐队 1 班；国民政府委员（包括蒋介石、胡汉民、戴传贤等）；各特任官；中央直监委员；总理亲友及遗族执绋牵引灵輶而行。并有护灵步兵一营，在灵輶前后左右护卫而行。

九、骑兵步队殿后。

十、送殡车队：1. 孙夫人宋庆龄，及宋子良、宋子安；2. 孙科的夫人；3. 孙科的男女公子；4. 宋美龄、孔祥熙的夫人；5. 谭延闿；6. 于右任；7. 林森；8. 其他亲属女眷。

沿途观众甚多，因警戒严密，距送殡行列较远。灵柩经过时，一律脱帽致敬。由于从码头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路途较近，人多无法容纳，所以各部院、党部机关及中央军校学生等只得分列路旁，敬待灵柩过去，即分别散去。

20 时 10 分。灵柩到达党部马路前稍待，让家属、中委、府委、来宾、迎柩专员先进入党部内院，分列两旁肃立。敬候灵柩安放就位后，举行告安祭礼。

停灵中央党部礼堂

中央党部门前左右搭就两座素彩牌楼，二门阳台高扎松柏牌楼，上悬总理遗像，素花球悬满门楣。灵堂中挂总理遗像，两旁对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像前安灵停柩，前设香案，上设古香炉，左右摆银瓶二。香案前设主祭席，两旁设纠仪员、宣赞员、陈设员。四周挂素帐轴，布置得庄严肃穆。祭门凡三，左进右出，各门均有军警维持秩序。中央党部附近设候祭室五处：原第二会议室为第一候祭室；职员饭厅为第二候祭室；中央通讯社为第三候祭室；交际科为第四候祭室；第十区党部为第五候祭室。

灵柩安放就位后，由护灵团负责守卫。蒋介石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献花圈，中央及国府各委员行三鞠躬礼，然后退出。

从当天下午，党政要员开始按班守灵，每 3 人 1 班，每班 4 小时。从 5 月 28 日下午 4 时开始至 6 月 1 日上午 8 时，共安排了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等 66 人守灵，共分为 22 班。次序如下：

5 月 28 日 16—20 时：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

20—24 时：刘芦隐、林翔、陈肇英。

5 月 29 日 0—4 时：李文范、戴季陶、程天放。

4—8 时：陈耀垣、刘纪文、张群。

8—12 时：林焕庭、古应芬、林云陔。

12—16 时：孔祥熙、王正廷、王伯群。

16—20 时：邵力子、何香凝、杨杏佛。

20—24 时：张道藩、余井塘、邓青阳。

5 月 30 日 0—4 时：陈果夫、宋子文、叶楚伦。

4—8 时：朱家骅、陈立夫、张静江。

8—12 时：朱培德、黄贯、谷正伦。

12—16 时：方觉慧、刘文岛、唐生智。

16—20 时：林森、张继、吴铁城。

20—24 时：何应钦、王伯龄、缪斌。

5 月 31 日—4 时：吴稚晖、蒋梦麟、褚民谊。

4—8 时：蔡元培、王宠惠、魏道明。

8—12 时：邵元冲、桂崇基、陈绍宽。

12—16时：杨树庄、周启刚、丁超五。

16—20时：恩克巴图、克兴额、郑洪年。

20—24时：于右任、丁惟芬、曾养甫。

6月1日0—4时：赵戴文、焦易堂、易培基。

4—8时：陈嘉佑、贺耀祖、李石曾。

《公祭总理文》

5月29日，首都南京各界开始公祭总理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是日公布《公祭总理文》。全文如下：

“惟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考试院院长戴傅贤、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暨各委员车同文官处、参军处全体职员等，谨荐馨香，报告于总理之灵曰：于戏！揽金陵之形势兮，实开创之始基。仰钟山之岩崎兮，奉神灵而永绥。惟总理兮，先觉先知。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首倡国民革命兮，万方众人之欢嬉。创行三民五权兮，范千古而不遗。故夫颠覆满洲政府兮，举天下而公之。苟一夫之不获兮，犹已溺而已饥。荡

滌军阀割据之秽兮，抗帝国主义者之陵夷。四十岁如一日兮，盍尝因成败以自疑。轶尧舜而薄汤武兮，固将跻斯世于雍熙。中华民国其自由平等兮，亦大同之可期。地坏兮天崩，山枯兮海泣。天惨惨兮昼冥冥，风冷冷兮云幂幂。悲当年兮鼎湖，攀龙髯兮英疑。

惧神州兮陆沉，尤吾民兮所戚。惟党人能继述兮，逾丰岭而北征。

寄在天之灵爽兮，振大军之辙声。三年战绩兮，壹朔南以告成。武威再接再厉兮，已鲁难以宏汉京。其有或侵或叛之人兮，亦必大张而用甲兵。此奋斗之精神兮，维持世界之和平。弓剑尤新兮，山河益壮。列强系盟兮，四方会葬。探遗容兮如生，迎灵柩兮凄怆。上山陵兮穷崇。岂明祖兮敢况。吾党忠实主义兮，即大道之未丧。既虎踞兮龙蟠，冀马归而牛放。吉日兮良辰，灵主来兮洋洋。萃万国兮冠裳，执玉璧兮荐馨香。功烈炳然兮久长，与日月兮齐光。千秋祀兮，作轩辕苗裔无疆。尚飨！”

公祭三天

5月29日，为公祭总理的第一天。公祭次序如下：

上午7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职员，由胡汉民主祭；国民政府全体职员，由蒋介石主祭。8时，编遣委员会、第一编遣区、各省市党部代表。9时，各省市府代表、首都市党部。10时，行政院及建设、蒙藏、赈灾、财政、禁烟委员会、立法院。11时，司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院官吏惩戒委员会、考试院。12时，监察院、审计部、内政部、首都公安局。

下午1时，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及所属机构。2时，交通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及所属机构。3时，铁道部、卫生部及所属机构。4时，海军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5时，首都卫戍司令部、南京市政府及所属各局、各编遣区及各师旅、各司令部、各舰队、各航空队代表。

5月30日，为公祭总理第二天，由奉安委员会典礼指挥赵戴文、席楚霖，在祭堂布置一切。参加公祭者次序如下：

上午，海外华侨代表、西藏、蒙古代表、全国农民代表、工人代表、商民代表、学生代表、中央军校全体师生、陆军教导队。

下午，首都女校代表、全国妇女团体、中央党务学校全体师生、国术馆、青年会代表、新闻记者、陈果夫及家属、张静江及家属、童子军代表、铁路

代表、中央党部工友、于右任及家属。5时以后还有其他团体。

5月31日为公祭总理的第三天。上午参加公祭的有外国新闻记者、外侨、外籍在华工作人员。下午为总理葬事筹备处人员，由林森主祭。京沪各大学代表、奉安委员会全体委员，由蒋介石主祭。奉安委员会职员，由赵戴文主祭。还有陈少白、唐绍仪、日本人士头山满、犬养毅等。

德、美、英、法、日本、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巴西、古巴、丹麦、挪威、土耳其、波兰、捷克、比利时等18国专使及随员63人，亦参加公祭，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献花圈，并用华语宣读祭文。

最后，由总理的家属致祭，由宋庆龄主祭。至此，公祭即告全部结束。

下午4时40分，举行封棺典礼。由宋庆龄、孙科、蒋介石、胡汉民、孔祥熙和医生等先将灵柩上的玻璃棺盖移开，换上铜棺盖，拧紧螺丝，并亲手拂拭铜棺，盖上国民党党旗、民国国旗。然后，各复原位，行三鞠躬礼。

奉安大典

连日来，首都南京到处充满了极度庄严的气氛。由市内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到紫金山麓的中山陵——灵柩经过的道路两旁，皆用各界所赠送的花圈、花篮及青天白日旗进行了装点。各街道冲要之地均扎了巍峨的素彩牌楼。十字街口大转盘处，扎起了挽联塔和花山。

奉安委员会为招待外宾，还在中山陵附近高搭彩棚。设立招待站。分为外交部彩棚招待站，由周龙光、张我华、樊光等任招待员；明孝陵招待站，由张维城、徐鼎等任招待员；总理陵园阶下堂前招待站，由徐谟、杨光性等任招待员；总理灵柩招待站，由徐东沈、稽锐等任招待员；为表庄重，招待员一律穿燕尾大礼服。

6月1日凌晨1时，奉安大典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典礼指挥赵戴文、布置主任刘纪文、警卫主任谷正伦，先后到中央党部准备一切。2时起，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奉安委员、各特任官员、总理家属、故旧、各国专使、日本友人，均陆续莅临。晨4时，举行移灵典礼，由胡汉民主祭，行礼如仪：

- 一、主祭就位（胡汉民）
- 二、与祭就位（孙科）
- 三、全体肃立
- 四、奏哀乐
- 五、行三鞠躬礼，一、再、三鞠躬
- 六、默哀三分钟
- 七、恭读谕文（胡汉民）
- 八、奏哀乐
- 九、行三鞠躬礼

礼毕，分左右肃立。杠夫以小杠舁灵柩上辆，由胡汉民扶棺，由孔祥熙指挥安放就位。4时5分，在礼炮、哀乐声中，肃然从中央党部门前发引。

送柩次序分为8行列：

第一行列

- 一、开道骑兵，前导兵3名，乘黑马执旗，总指挥朱培德率戈矛队。
- 二、军乐队1班。
- 三、马队1列。

第二行列

一、淞沪军乐队 1 班。

二、骑兵长官。

三、陆军教导队。

第三行列

一、军乐队 1 班。

二、农民代表。

三、工人代表。

四、海军陆战队。

五、海军官佐。

六、海军宪兵。

七、各界花圈队。

第四行列

一、军乐队 1 班。

二、警察队。

三、妇女团体。

四、全国铁路代表。

五、商民代表。

六、学生军。

七、学生团体。

八、学生队。

第五行列

一、军乐队 1 班。

二、海外华侨代表。

三、蒙藏代表。

四、各编遣区、各师队伍。

五、军官学校教职员。

六、军政部代表团。

七、京内外各机关职员。

八、党部代表。

第六行列

一、辽宁军乐队 1 班。

二、护灵团。

第七行列一、军乐队 1 班。

二、外宾。

第八行列

一、军乐队 1 班。

二、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

三、总理家属（在黑纱棚内）。

四、遗像亭（有随从之府卫队）。

五、灵輓（前有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特任官、总理亲故、迎柩专员、葬事委员会委员、各国专使亲手执紼）。

六、殿后骑兵。

由中央党部礼堂至陵墓约 30 里，路途过长。因此，各外宾中途即登汽车由太平门至总理陵墓。眷属至迎柩大道，亦改乘马车随行。

自凌晨4时灵柩出发，每隔5分钟，即由狮子山、紫金山两处炮台互放礼炮101响致哀。自中山门至陵墓，警戒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警，布置极为周密。中山山陵、中山苗地均划出警备区域，直至明陵四方城为止。四方城内有屋数楹，为国府委员休息所。明陵内设奉安会临时办公处，各国专使招待处，外宾招待处等。

送殡大队于9时10分至墓门，孙夫人宋庆龄、孙科夫人陈淑英、何香凝、孙满夫人以及总理之孙男、孙女等人均下马车，步行至石阶之下。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列于后排；总理家属，亲故列于前排。灵辆驶至石阶前停住，由宣赞员高唱“升杠”，即由杠夫20人将铜棺（灵柩）寻下灵辆。换上64人大杠（有四面拨旗）并架上蓝布花罩，杠前系青纱，以为缚绳，由执缚人员牵扶缓步登上石阶。执缚者，左为孙科、家属及中委、各特任官，最后为蒋梦麟。右为戴恩赛、各国专使、总理故旧，最后为庞青城。杠前两旗前导，上书“肃敬”、“致敬”。由军乐开道。孔祥熙手执奉安总干事旗帜指挥。蒋介石身着白长衫、黑马褂照料一切。文职外宾由左侧石阶而上；武职外宾由右侧石阶而上。

10时15分，灵柩抵祭堂就位后，举行了奉安典礼。蒋介石主祭，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等五院院长陪祭，蒋介石宣读祭文；胡汉民献花圈。礼毕，由孔祥熙率杠夫20名，恭移灵柩进墓，随行者除总理家属外，蒋介石代表中央，犬养毅代表总理故旧，荷兰特使欧登科代表18国专使进墓。10时50分，灵柩安位完毕，进墓人员退出。再由日使芳泽率全体专使及海外高级军官；由胡汉民率全体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特任官；由头山满率其他外宾，依次入墓瞻仰。复集合行三鞠躬礼。最后，由宋庆龄、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将灵墓二门关闭，奉安大典遂告完成。

主要参考资料

王光远。《孙中山奉安纪实》。《北京档案史料》，1991，第3期，第37—42页。

《孙中山灵柩奉移送殡行列图》。《北京档案史料》，1991，第3期。第42—45页。

张同新。《孙中山第三次到北京》。《北京档案史料》1996，第1期。第61—67页。

《孙文今日出殡西山》。《晨报》，1925—4—3。

《孙文灵柩移置》。《晨报》，1925—4—3。

《总理灵车昨日试驶》。《世界日报》，1929—5—19。第3版。

《总理遗体昨奉移铜馆》。《世界日报》，1929—5—23。第3版。

《总理灵柩今日奉移南下》。《世界日报》，1929—5—26。第2版。

《三十万人送总理灵柩》。《世界日报》，1929—5—27。第2版。

《总理灵柩昨午到京》。《世界日报》，1929—5—29。第3版。《总理灵柩到京详情》。《世界日报》，1925—5—30。第3版。《总理灵柩今晨奉安》。《世界日报》，1925—6—1。第2版。《总理奉安典礼完成》。《世界日报》，1925—6—3。第3版。

无国葬之名有国葬之实 ——抗日名将宋哲元暂厝富乐山

抗日名将宋哲元于民国 29 年(1940 年)4 月 5 日午刻病卒于四川成都东北的绵阳。当时，天水行营主任程潜首先向国民政府建议国葬，海内各界人士亦多附议。但当局以抗战期内，一切国葬缓议，已有定案回答不准。于是，宋氏同僚，故旧以及当地士绅公同集议，择地暂厝。当地有善堪輿人吴克庄者，以为富乐山为“风水吉地”，并亲自勘测墓穴。专员钟体道，县长郭镛及当地士绅都认为宋氏忠勇爱国，功勋显著。民国初年，曾在绵阳驻防，并与夫人常淑清结婚，越 25 年病故于此，如今忠骨埋于富乐山，诚是为山川增色，所以情愿集资相助，遂按价购置下来，用以暂厝宋氏遗体。形成了一个朴实无华，但又是相当隆重的公葬。

宋哲元，字明轩，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生，山东省乐陵县赵洪都村人。

宋氏自幼秉承家学，习四书、五经。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在乡设馆教书。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宋氏投笔从戎，考入北京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并补名额于北洋陆军六镇二十三标第二营。

宣统二年(1910 年)，宋氏毕业，分发第六镇见习，旋随陆建章赴广东，充任中军处委员。次年，陆建章回京任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宋为稽查员，与冯玉祥初识。

民国元年(1912 年)，陆建章奉令编练左路备补军，宋氏任第一营前哨哨长，驻防北苑。次年，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第一师，宋氏在冯玉祥的第二团任第二营前哨哨官。自此，宋氏在冯玉祥麾下服役达 20 年之久，随冯转战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历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民国 13 年(1924 年)，冯玉祥兵变倒吴佩孚，组织国民军。宋哲元为第一军第十一师师长。翌年，出兵热河，任热河都统。

民国 15 年(1926 年)8 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宋氏的党籍也从此开始。

民国 16 年(1927 年)，冯部入陕，宋氏任北路军总指挥，绥靖宁陕边区。6 月，就任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 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国民军北伐，宋氏率部参战。

民国 18 年(1929 年)，蒋、冯战起，宋兵退潼关。次年，中原大战又起，冯、阎败绩，宋氏率西北军残部渡河入晋，通电听候处理，誓言下再参加内战。西北军残部遂改编为东北军第三军，宋哲元为军长，归张学良调遣，旋改称陆军第二十九军，直隶国民党中央。自始，宋氏与冯玉祥脱离。

二十九军初驻晋南，民国 20 年(1931 年)8 月，移驻冀南。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宋氏即率部下将领，于次日通电全国，请缨杀敌，有“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之壮语。12 月，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后改称北平政务委员会。

民国 21 年(1932 年)，宋氏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率部入察。次年，日军占领山海关，紧逼长城各口，平、津震动，华北危急。宋氏受任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率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抱“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取得喜峰口抗战的辉煌战长城抗战以《塘沽协

定》的签订而告终，时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责成宋哲元调停，及至冯解散队伍，宋仍回任察省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民国24年（1935年）1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同年6月，“张北事件”发生，行政院院长江精卫向日方要求，免除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宋乃回天津养病。7月，国民党政府向宋颁授青天白日勋章。8月，出任平津卫戍司令（从11月4日至8日兼任北平市市长4天，后由秦德纯接任）。时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愈演愈烈。11月，宋氏受任为冀察绥靖主任。12月，国民党政府同意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氏被指定为委员长并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立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负重交涉，委曲折冲，虽对日军做出种种让步，但终于保全了华北的领土，挫败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

民国26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宋氏初主和谈，及知中计，乃奋起抗战。未久，南苑之役，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殉国。至7月28日，奉令离平赴保定督师，旋移防马厂。是年冬，又移防平汉线，驻节新乡，不数月间驰驱于冀鲁豫千余里，大小百余战。经常累倒不起，其病根即伏于此。

民国27年（1938年）春，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战区益广，军务益繁。4月间在战区积劳致疾，复患中风，遂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请假赴南岳养病。是年秋，移居广西朔阳县调治。民国28年（1939年）春，移居四川灌县。29年（1940年）3月，移居绵阳，病势加剧，竟于4月5日午刻逝世。卒年56岁。弥留时仍以“抗战到底”为念，勉励旧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努力奋斗，收复失土。

宋氏老母——沈太夫人尚在堂，年已76岁。宋氏颇以未尽孝养为憾。

宋氏身后虽然未获国葬之名，却有国葬所应获得的哀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特赠赉仪1万元，并派处长竺涛来绵治丧，复电令军事参议官秦绍文料理丧葬善后事宜。当即组成宋委员明轩治丧处。决定于4月16日公祭；17日暂厝于富乐山。

宋氏灵堂上，素彩高悬，正面挂着他的戎装巨像，英武凛然。前设备界送来的祭席素筵。两旁有军人轮流守灵。堂内灵柩两侧为其夫人常淑清、随侍子华玉，以及长女景昭、次女景宪（特从香港闻病赶来）等陪灵的苫席。灵堂上端高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送的挽幛，上题“良图永著”；右首是国府主席林森的挽幛“孝友忠贞”；左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挽幛“天地正气”。灵棚内还有“党国要人”送来的素色挽幛62幅。幛光上的题词，高度赞扬了宋氏的功勋业绩。例如：冯玉祥题“乾坤正气”；阎锡山题“功在党国”；何应钦题“国失干城”；朱庆澜题“正气长存”；鹿钟麟题“袍泽同悲”；冯治安题“壮志未偿”；刘汝明题“至大至刚”……

灵堂和灵棚四壁分别悬挂着“党国要人”和宋氏生前友好人士的挽联：

蒋介石的挽联是：

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慑骄虏；

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痛元良。

冯玉祥的挽联是：

卅载故交相期报国；
一生革命未尝后人。
李烈钧的挽联是：
喜峰口鏖兵摧敌凶威凭白刃；
居仁堂祝寿怡亲戏彩著斑衣。
程潜的挽联是：
何处招魂精气周流天上下；
万方多难阵云重叠海东西。
孙科的挽联是：
燕蓟恃长城杀敌余威纾国难；
风云黯大地收京化日慰英魂。
孔祥熙的挽联是：
桀戟壮幽燕丹心可鉴卢沟水；
鼓鼙思将帅热泪难成蒿里吟。
何应钦的挽联是：
身兼刚毅沉潜德；
功在沙场樽俎闻。
孔德成的挽联是：
火箭犯卢沟永为大将伤心地；
客星陨涪水正是中原歼虏时。
周恩来的挽联是：
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卢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
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4月16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由军乐团奏哀乐，全体肃立，向英灵默哀。冯玉祥、陈继淹、秦德纯、吕秀文以及孝属男华玉、女景昭等均恭读了祭文。

次日，即由治丧处备白马素车，将灵柩舁上，由宋氏生前属僚百余人亲手执紼送殡。由军警骑马执旗开道，军乐团前引，四川省立绵阳中学数百名身穿土黄色制服，系着蓝、白领巾的童子军，高举灵堂、灵棚内的部分挽联、挽幛、锦旗、锦标、花圈、花篮；捧着宋氏民国24年（1935年）7月国民政府向宋氏颁授的青天白日勋章等向富乐山进发。殿后有护军百余人，送殡汽车百余辆，车顶俱挂有蓝白两色的彩球。沿途所有观礼的民众均不约而同地脱帽致敬。便路上的路祭桌、茶桌鳞次栉比。下葬后，抬来祭筵一桌。军乐团高奏哀乐，全体恭送人员，肃立致哀。首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遣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恭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特遣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敬荐馨香致祭于宋故上将明轩之灵曰：呜呼，朝露晞天，大星戢耀，国丧长城，中外同悼。

惟君志节，实遵等伦，策名宣力，懋达勋勤。
都护北庭，锁钥之寄，御侮折冲，鞠躬尽瘁。
岛夷犯顺，气益激昂，躬率虎旅，是别是攘。

转战朔南，我劳靡监，力殫驰驱，沴罹寒暑。

雁门象郡，方奏凯歌，挥戈返日，冀起沉痾。

天不愁遗，巫阳遽召，甲马行空，遗章入告。

呜呼哀哉！金瓯未复，赍志九原，一哀三峡。

大树风寒，骇浪惊涛，摧我柱石，鼙鼓之思。

怆深今昔。敬陈刍束表芜忱，灵旗半汉恍兮来歆。尚飨！”次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等恭读祭文。最后，在悲壮的军乐声中掩穴成丘。

当日，国民政府发表命令：

“国民政府令：陆军二级上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宋哲元久绾军符，精娴韬略。往岁长城之役，率师御侮，声绩炳然。嗣膺冀察疆圉重任，时际艰虞，竭诚揶拄。此次抗战军兴，在前方指挥将士，屡奏肤功。近以积劳致疾，政府正殷履念，遽闻溘逝，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卹，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勋勤，而慰英灵。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旋于五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再次发表命令：

“国民政府令：宋哲元上将原叙第二级，兹追赠为上将第一级。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嗣后，在暂厝宋氏遗体的富乐山修建了“宋上将军明轩林园”。在宋氏墓前立了石碑，由冯玉祥以隶书题“宋上将明轩之墓”七字；墓前立墓道坊一座；复建八德亭一座，以赞扬宋氏生前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还立有神道碑一座，由丁惟芬撰文，于右任书丹。详记宋氏生平事迹。

宋氏出殡之日，因四川省立绵阳中学童子军前往服务执事，治丧处以700元相赠，义不得却。故以此款于校北筑亭纪念，命曰“明轩亭”，亭内有碑，碑文由黎光明撰，钟体道书。

主要参考资料

《宋故上将哀荣录》。1941年编印。首都图书馆藏本。

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
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大葬式
——记袁世凯的葬礼

黎元洪为“崇德报功”下令厚葬

袁世凯的葬礼是民国北洋政府《国葬法》颁布之前的特殊葬例，乃古今中外、皇、庶、国葬与民葬混合型的隆丧厚葬。袁氏临终对徐士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所发布的遗嘱中之第三项，谓“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内务部中，原主张帝制复辟分子，尚思尽其“臣妾职分”，主张按照“国丧”之例，一如清制，并参照中外典章，予以厚葬。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就职后，对袁氏治丧一事发表命令：

“民国肇建，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夙夕勤劳，天不假年，遭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

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旋即由政府特派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敬谨承办”大丧典礼。曹等三人乃帝制复辟派中首要人物，又恰好充任大丧典礼的承办员，自然恭拟典章，倍极优隆，在怀仁堂左边设立了“恭办丧礼处”。先定丧礼条目13项：

（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27日；出殡日下半旗1日；灵柩驻在所亦下半旗，至出殡日为止。

（二）、文武官吏停止宴会27日。

（三）、民间辍乐7日，及国民追悼日，各辍乐1日。

（四）、文官左臂缠黑纱27日。

（五）、武官及士兵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27日。

（六）、官署公文封面、纸面用黑边，宽约五分，亦27日。

（七）、官署公文书，盖用黑色印花27日。

（八）、官报封面亦用黑边27日。

（九）、自殓奠之后1日起，至释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京外大员有来京者，即以到日随本日轮祭机关前往行礼。

（十）、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与驻外使馆，自接电之日起，择公共处所，由长官率同僚属，设案望祭凡7日。

（十一）、出殡之日，鸣炮108响；官署、民间均辍乐1日；京师学校均于是日辍课。

（十二）、新华公署置黑边素纸签名簿二本，一备外交团签名用；一备中外官绅签名用。

（十三）、军队分班至新华门举枪致敬。

决定大丧典礼奠祭事项8条：

（一）、每日谒奠礼节均着大礼服，不佩勋章，左臂缠黑纱，脱帽三鞠躬。

（二）、祭品用蔬果酒饌，按日于上午10时前陈设。

（三）、在京文武各机关及附属各机关，每日派4员，由该长官率领，于上午9时30分，齐集公府景福门外，10时敬诣灵筵前分班行礼。

（四）、单内未列各机关，有愿加入者，可随时赴府知照，亦于每日分

班行礼。

(五)、外省来京大员，暨京外员绅谒奠者，可随时赴府签名，于每日分班行礼。

(六)、外宾及蒙、藏、回王公等谒奠者，即由外交部、蒙藏院不拘时日，先期赴府知照，届时仍由外交部、蒙藏院派员接待，导至灵筵前行礼。

(七)、清室派员吊祭时，应由特派接待员接待。

(八)、除各机关每日谒奠外，其各机关中如另有公祭者，先期一日赴府知照，另班上祭。

民国期间的“大丧”、“国葬”，均以朝野既已形成且为公众所承认的形式出现。袁氏的丧礼是在家国不分、家国难分的形势下进行的。凡属总体性、全局性的以及属于“大丧”所特有的典礼安排，固然由“恭办丧礼处”决定。而有关传统丧礼的具体事务则由袁氏长子袁克定及袁氏的五姨太太杨氏主持。对于这两个人听出的“点子”，丧礼处必然无条件地采纳。根据袁克定和杨氏素日在北京地面上的交往，决定：

丧仪仪仗、杠、罩、鼓乐、家伙座由灯市口王记水利杠房承办（他家曾承办过清慈禧、光绪的奉安大典）；

灵棚、祭棚、经棚、客棚由大六部口陈记六合棚铺承办（他家曾承办清慈禧、光绪“万寿”大典；慈禧、光绪奉安大典，宣统大婚等）；

灵龕、经座、牌坊等彩活由前门外东珠市口罗记贵寿彩子局联合同业承办；

冥器、松活、纸活由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奇巧斋冥衣铺，丰台花厂联合同业承办。

其丧葬经费经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批示，由北洋政府拨款 50 万元（银元）。据说，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 9 万元，其后往河南彰德县走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 10 多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须用 50 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袁氏生前旧属僚，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 8 人联名发启募捐，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国务卿、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不等，绝大多数是 1 万元，最少的是 2000 元，总计共收到捐款 25 万余元，这才结束了袁氏的丧事和丧礼。

按帝王典制入殓

袁氏虽然宣布撤销帝制，复位为大总统，但死后仍要依帝制而殓——棺槨要用阴沉木；殓服要用龙袍。盖为圆其 83 天皇帝梦也。活着不能称帝，死后也要称帝。

阴沉木极其珍贵，为世间不可多得之木材。民间相传“正月阴沉二月蒿”，盖不知所指。其实真正阴沉木是指久埋地下的坚硬木头。原来，古代地震树倒，木埋土中，千百年后即成石炭，凡未变成石炭者即为阴沉木。以云南省产量为多。用其制器做棺最为坚固，颇为人所珍视。

按旧制，只有封建帝王才能用阴沉木做的棺槨。其实，在近代史上，封建帝、后一般也只不过用口金丝楠（楠木有金丝楠、水楠之分，以金丝楠为上品）棺材而已。

袁氏生前，有人送他两块上好的阴沉板片，木质极轻，且香味浓郁，为

稀世珍宝。民国5年（1916年）6月，袁氏病笃，乃临时找斜木行的匠人攒材，做成一口“四独板”（即四块整板）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从木料质量上看，可能比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棺椁还要贵重。

但袁氏生前躯体就较肥胖，由于得的是膀胱结石症，尿毒在周身蔓延，以至死后遗体浮肿，刚刚做好的阴沉木棺材竟然装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好将这口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买回一口普通的阴沉木棺材。这样，以32杠往中南海转了两回空（指从材厂往丧居抬空材），这在当年风俗习惯上，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因为只死一个人，却买两口棺材，本身就主“重丧”。故有些文人便利用这一情节，附会出很多“故事”来。

至于其殓服（寿衣）究竟怎么用，其儿女姬妾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既然死的大总统任上，就应以总统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的戎装）入殓。有的则认为既然是作过“洪宪”，好歹也算一代帝王，就应以帝制时期规定的甲种礼服入殓。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由袁氏的于夫人请示徐世昌而后决定的。

结果，给袁氏头上戴了“平天冠”。这是祭天时用的冠冕，上面有象征日、月、星、辰一类的装饰品，前后缀以玉串，谓之“旒”。脚上穿的是朱履，但身上穿的却不是与之配套的祭天礼服。由于遗体浮肿，与之配套的袍子及家中所有的衣服袍褂，均穿不进去。故有人建议，衣库中还存有“洪宪”龙袍一领，非常肥大，可为殓衣。徐世昌、段祺瑞等自无非议。

据说，被当做殓服（寿衣）的龙袍，当初是帝制大典筹备处在杭州定制的，全身紫红色，上面绣着九条平金线的大龙。龙眼上各镶嵌大珍珠一颗，龙头各部位还镶有小珍珠，龙鳞上缀有珊瑚断片。这领龙袍袁氏生前并未敢加身，就是1916年元旦受贺时也只是穿的民国大总统礼服。

袁氏“倒头”（初终）乃阴历五月初六日（阳历6月6日）。端午刚过，正逢炎夏，停尸于居仁堂。尽管镇以天然冰，覆以香菜，但遗体仍然发散着臭味，而且嘴里还流了血。为了等候由河南彰德、项城匍匐奔丧的亲属，直至五月初八日才正式入殓，以符合“全宅孝属亲视含殓”的旧制。

“转空”（即往丧居抬空材）时所用的杠式与清宫帝、后大丧完全相同。黄杠，黄包绳、黄垫，杠夫32名，紫红驾衣、土黄套裤、青缎靴子，加黄靴护，头戴青毡荷叶帽，插了鹅黄色冲天锥式的雉翎。而且戴了黄手套。对尺指挥，其威仪不亚于民国2年（1913年）隆裕太后大丧时的排场。

入殓后，大约没有按当时北京民间风俗习惯，烧“倒头车”、“倒头轿”之类的纸活。但是却将袁氏称帝时给他九个姨太太定做的“妃”、“嫔”凤袍以及10套“皇子服”统统在紫光阁前付之丙丁。这是孝属有意还之于他，大概是让他在阴间重登大宝时另派用场吧！

在怀仁堂中央“正寝”，死后仍有“九五”之像

灵堂内外

袁氏遗体大殓后，其灵柩即以24人的“软杠”，抬至怀仁堂，停于堂内正中央预先搭就的木台上，扣以清帝御用的“堂罩”一卷，该罩黄云缎底子，绣五彩龙纹，下有一尺二寸的“海水江牙”。罩前横放灵床一张，完全是“黄寸蟒”的铺垫。床上树立着袁氏巨幅遗像。“床”前以四张八仙桌拼成了供案，自后至前，设有景泰蓝宝塔式的“长明灯”（俗成“闷灯”）一盏；特

制金银灵花“七珍”、“八宝”各一堂，共 15 瓶（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奇巧斋冥衣铺定制而来）；两旁加饰绢制莲花、荷叶、苍蒲棒，慈菇叶组成的彩色灵花一对，俱插于景泰蓝花筒之内；高足供碗三堂，每堂五碗（鲜果、干果各一堂；糕点一堂），最前边的正中央设鼎式景泰蓝香炉一樽，蜡扦一对，上插杏黄大蜡。供案前挂着黄缎底子，绣九龙戏水图案（如同北海九龙壁上的花纹）。

灵前由贵寿彩子局给搭了三门式的素彩，金龙抱柱的大灵龕。堂罩两侧，俱以“龟背锦”图案的素彩打出隔扇墙，是为孝属跪灵的苫席。左右苫席外侧均拦起了松鹤、野鹿图案的短屏，内为文武官员轮流陪灵的立席。

怀仁堂内外，挂满了各界赠送的花圈、挽联、祭幛、匾额。门前扎了一座三门式以冬青草为底的鲜花牌楼。新华门外，搭了三座高大的素彩牌楼，一座紧倚新华门门楼，为两层重楼、五门式的巨型牌坊；另两座牌坊，有如旧时西四、东四牌楼的格局，矗立在新华门前的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成为过街牌坊。

新华门内外均站有轮流值班的士兵。门外 24 名禁卫队，一色崭新草绿军装，左臂缠着黑纱，斜挎“盒子炮”，手持捷克新枪，雁翅般排开，分立两侧，笔管条直。值星官身穿呢子军装，足登高靛皮靴，斜挎加了黑边黑穗的大红值星带，更显分外严肃。每有高官要人的汽车驶入，两岗必高喊“立正，敬礼！”一时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冠盖如云。

倒头鼓乐仪仗

袁氏于“倒头”之日，即在怀仁堂须弥座上左侧（按男左女右之成例）立起了铭旌架子，停灵之日起，即挂了“芯子”，是按满人贵族挂大幡的风俗进行的。

袁氏用的铭旌，高三丈二尺，是为最大尺码者。古典长亭式，下边做成须弥座式的高台，四面扎着栏杆，每杆顶端按有狮子头型的柱头。栏杆内，摆着香炉、蜡扦等供器。这座大铭旌可以从三面看，中央有红绸金字，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世凯之铭旌”字样，这就是彩子行所说的“芯子”。芯子上端有绿色荷叶宝盖，两侧垂挂着彩球和各种形式的彩活。

怀仁堂前景福门，设了红漆金纹门鼓一对，加挂带孝的二龙戏珠的缎绣鼓帘；与之配套的锣架一对，梆、鐃各一，金漆号筒两对，官鼓四面。其它吹奏乐则设于“丹陛”两旁：唢呐两对，海笛两对，笙两对；九音锣一对。此为官吹官打 24 个响器加小乐儿，只为吊唁的宾客传报，不作堂祭之用。灵堂前，左为总统府华乐队，以笙、管、笛、箫等民族乐器奏哀乐；有为总统府军乐团以大、小铜鼓、管号等西乐奏哀乐。乐队乐团的成员均身穿青呢子制服，系白布孝带。

怀仁堂殿座左侧，陈放着一份大亮盘形式的“太平杠”，乃龙头黄漆的小杠，黄绳、黄垫，架在红漆金墩上。据说，此为隆裕太后刚刚用过的御用“小请儿”。永利杠房派来了 32 名杠夫（经警厅审查批准）俱着紫红色，印有大“十二点”围绕车轮图案的新驾衣，土黄套裤、青布靴，头戴浅碟式黑毡帽，插着黄雉翎，每天轮班在杠前分四排垂手肃立，表示为守灵待命。

怀仁堂外，向前伸展的甬路两旁，亮有五整堂汉执事的幡伞。按北京旧例，每半堂汉执事只亮四件，即幡、伞各两把。因此，每一堂汉执事，应亮幡、伞各 4 把，五堂即亮出各 20 把。计有红缎绣花幡、伞各 4 把；蓝缎绣花幡、伞各 4 把；白缎绣花幡、伞各 5 把；青缎绣花幡、伞各 4 把；紫缎绣花

幡、伞各4把，俱插于红漆木制的执事架上。另有袁氏生前仕途中所得的万国旗、万名伞各数十柄，通天巨幅彩缎金线锦旗、锦标数十件。

设座招待

居仁堂、春藕斋、万善殿、万字廊前后，均有大六部口棚铺分别搭了起脊大棚或平棚，用来设官座招待各界来吊的宾客。居仁堂里的“洪宪宝座”上，特立了袁氏灵牌，宝座前的御案上，挂了黄绫围子供以装在硬木锦盒里的“中华帝国之玺”、“皇帝之宝”金印两颗。堂前陈设着袁氏称帝时从清室“銮舆卫”取来的一些皇帝仪仗。但这里警卫森严，没有承启官的接引，是不能随便出入的。凡政界亲信人物（帝制复辟分子）多到此处凭吊，痛哭不止，在某种程度上是替袁氏痛哭帝业未成身先死的遗恨。水明轩也搭了起脊大棚，袁士生前，每逢阴历八月二十日办寿诞时，都以这里为寿堂，如今却成了祭堂，是招待各部总长及各省督、抚、道等大员的。万字廊以北还专为他们设立了奠礼小帐房。万善殿前的大棚是招待番、道、僧、尼、居士等宗教人士用斋的地方。春藕斋则是接待清室代表和外宾的。这几个院落内外，同样也摆满了祭品，有清室代表及民国北洋政府各部总长，各省督、抚、道等大员送来的祭席、饽饽桌子、巨幅祭幛、挽联、花圈。

清室致送厚礼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逊清皇室给袁家送来的丰厚祭礼。

袁世凯一生为清廷立过汗马功劳，维护以慈禧为守的守旧派，貌似忠臣；辛亥之役表面上先是为国家弭乱，后是为清廷争取优待，实际上乘机逼官篡政，取而代之。对于清室显属功罪交杂。但袁氏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对于清室确给予特别优待和备加保护。清室对此当然不能忘怀。同时，为了拢络旧臣遗老，也不能不摆出笃念旧臣，大仁大义的姿态来。所以，当袁氏病逝后，清室特地派员送去丰厚的祭礼，以示哀悼。

祭礼分为两批。

第一批：

花圈一个；

十三节饽饽桌一张；

祭席一桌（十五把大碗）：川活鱼一尾、仙鹤鱼肚、火腿三笋、葫芦鱼翅、七星鱼脯、灯笼鸽蛋、如意燕菜、一品福肉、金丝香菇、金丝鸡块、梅花肘块、海参什锦丝、太极图发菜、寿字鸭子、湾子豆腐、花卷、佛手卷、苹果包、鸭蛋包（四碟）、汤饭小菜、俱点飞金香菜；

陈设桌八张，桌上陈设品计有：古铜方炉、古铜圆炉、麒麟表、象表、绿玉插瓶、绿玉拱壁、金钟、玉罄、铜玉洋钟、豆青细瓷瓶（一对）、绿玉寿山福海、绿玉寿星、木像加金苏钟、豆青八封瓶（一对）、古铜犀牛望月、古铜牧牛童儿。

第二批：

花圈一个；

十三节饽饽桌一张；

大理石花池四个：

天竹腊梅花池；

真像秋海棠花池；

真像各色芍药花池（两个）。

纸花八盆。

这些祭品，连同购置青纱箍等杂费，据逊清皇室内务府的档案记载，共花去 463.3 元。当时，逊清皇室是靠民国政府拨出的经费度日，竟不惜支出这样大笔款子为袁世凯送祭礼，可见其用意了。

纸活松活

搭在怀仁堂附近最高最大的席棚是冥器（纸活）大罩棚。因为治丧受吊期间为阴历五月，气候炎热，多雷阵雨，而各种仪仗、纸活怕淋，所以，搭成加高加厚（数层席箔）的防雨棚。一旦遇雨可作临时遮挡。

丧礼处依照袁氏家属的要求，务尽其奢，向市内各大冥衣铺定制了各种豪华型的纸活冥器。主要有：

（一）、仿古宫殿式的纸制“阴宅”一套。门前糊“棂星门”式牌坊（有如雍和宫、白云观山门外的牌坊）一座；殿堂为黄、蓝琉璃瓦的顶子，三进院落，每殿各有名堂，其中包括袁氏本人受奠的享殿五间；最后还有上下俱为五间的楼阁一座。

（二）、一殿一卷式，古典宫殿顶黄地青瓦蓝墙，加大尺码的楼库三堂，每堂为神楼一座，宝库两座，俱为横宽四尺八寸，并附杠箱四只，是为一份“送圣全活”。每三天，度亡道场经忏圆满送圣时，必焚楼库一堂。故罩棚内总保持三堂大库做贮备。

（三）、“小黑老虎”式的进口汽车，两旁有脚踏板，上边还站有斜挎“盒子炮”的卫兵。车后背着车轮备份。挂蓝牌白字“袁宅自用”。车内驾驶楼糊一年轻司机手握方向盘，做驾驶状。后面座席设袁氏灵位，上书名号“原命”（指出生年、月、日、时）、“大限”（指死亡年、月、日、时），盖为领魂之意。汽车两侧各糊一辆草绿色的带跨斗的保卫车，上边糊一戎装卫士。

（四）、大鞍车、轿车。俱以蓝绢为篷，每侧四面冷布纱窗，窗外扎着遮阳的黑纱帘。车前张挂大幅黑纱凉棚，连同辕马一齐罩上。车箱下活交转轮，所谓“落地拉”者是也。辕马、顶马、跟马各一匹，均为黑地白斑的“菊花青”马，翻毛细活，马蹄下按有小木轮轱，可以牵行。顶马上骑一清装官人执鞭开道。

此外还有四轮马车、轮船、尺头桌子、金山银山、古玩陈设、文房四宝、四季花盆、金童玉女等等，应有尽有。

袁氏丧礼处还向丰台的几家大花厂子定制了松狮、松亭、松鹤、松鹿、松人（以上五对为一堂）若干堂。外加松麒麟、松虎、松象、松象犴、松骆驼、松驼车、松炉鼎、松匾等巨码松活。每对松兽约高一丈上下，仅松狮脖颈下的铜铃，其周围直径就有一市尺左右。分别摆在各个祭棚内外，出殡时当做附加执事。

道场经忏

清代以及民国期间，京城中的大丧事都用佛、道两教的道场，不问亡人是信佛，还是信道，为壮大势派，一律用番（喇嘛）、道（道士）、禅（和尚），个别还有加上尼僧和居士的，轮流礼忏、燃灯、施食，以便给亡人免罪。一般人家办丧事，无论僧道，每棚经最多为 13 人，等而下之的为 11 人、9 人不等。袁氏每棚经却用了 15 人，由三位正座法师领忏，12 位为“随众”。而且经幡、法器、法物、法衣也都特别讲究。

怀仁堂内高悬黄缎绣花番经经幡四筒；蓝缎绣花道经经幡四筒；红缎绣花禅经经幡 12 筒（每棚经应为四筒幡）。各个经坛上均挂着与经幡同样颜色、

质地的云头幡门、幡条，上书自家庙宇的名号。

番经（喇嘛经）由雍和宫请来，坛上设鼎炉，红色龙抱柱的藏式样蜡，赉巴瓶上插着孔雀翎、酥油灯 48 盏。大柄鼓一对、大“刚冻”（藏语译音，即长约丈余的大铜号）一对，大铙一对、唢呐一对。吹奏起来，声震屋宇。番僧身穿黄缎暗纹大袍（品咒“回向”时，加披朱红哈达），头戴黄底红绿彩绘宽边大礼帽。正座“达司贵”喇嘛，则是头戴黄色桃形秋帽。

道士由白云观请来。坛上供“三清”（上清元始天尊、玉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巨幅画像。经案上左设大磬、引磬、铛、铃，右设木鱼、唢子（金钟）铃、铛、铃、大法鼓、忏钟。蓝缎绣青云、白鹤图案的桌围子。青缎绣的“经符子”（盖经书的绣片）。坛前桌上设敕令架，上插令旗、令牌、宝剑、天篷尺（量天尺）、象牙朝筒、“三镶”如意、甘露碗、米碟、柳枝、大砚等法物。按一般情况，道士唸经均在蓝道袍外披红色加黑边的法衣，只有“送疏”（向赦罪天尊上表，由斋主将黄表捧至大门外焚化）、“回向”（在灵前品咒）时才换成彩缎绣花的“对儿衣”。但袁家办的道场却是每一节忏，换一次法衣。因此，每天至少要换三次。每次所披的法衣颜色与绣的图案均不尽相同。法衣分为黄、橙黄、红、蓝、豆青、绿、黑、白各色，上面分别绣着青云、白鹤、八仙法物。轮、螺、伞、盖、花、罐、鱼、长或折枝花卉，仙草灵芝等，边沿俱加“万字”不到头，或不同形式的“寿”字图案。除中间三位“高功”是八卦仙衣外，其余 12 位道士穿的法衣颜色、质地、图案分为 6 种，每两位一种，称为“对儿衣”。精美绝伦。

禅经从广济寺、拈花寺和戒台寺请来。各为 15 众，成为三棚（台）。三经坛俱供“三世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巨幅画像。经案上左设铛、铃、引磬、大磬；右设木鱼、引磬、铛、铃、法鼓、忏钟。红缎绣花的桌围子，红缎绣的“经符子”。和尚俱在海青大袍外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

在停灵的 21 天里，五棚僧、道每天有一棚念经。三天为一棚，经忏“圆满”后，必要送圣、焚库（兼焚各种纸活冥器）。晚间放焰口施食，以示向“十方法界无祀孤魂”赈济，为袁氏做身后功德。首七和发引头天“伴宿坐夜”的日子，则五棚全到，轮流唸经、礼忏。道场圆满后，也要送圣、焚库，这是停灵受吊期间的一次总祭奠。晚上僧道俱放三位正座（和尚谓此为“三大士”；道士谓此为“三清”）的传灯焰口，即在焰口之前加上燃灯法事，这是对神、佛的一种供养，也是为袁氏做的“身后功德”。每逢做这样的法事，都是金钟法鼓，经声佛号通宵达旦。

空前绝后的大殓

告期

袁氏于 6 月 6 日“倒头”，6 月 8 日棺殓后，停柩于怀仁堂受吊 21 天。按民间风俗习惯，在家停灵治丧受吊的日数，原则上取其单数，凡办大丧事的，以“七”为期，如“首七”（不称“一七”）、三七、五七、最高可至“七七”49 天，都是从亡人倒头之日起算。而袁氏之治丧则是从入木停灵之日起算，至 28 日发引，扶柩回籍。这样，实际上在家（家、国难分）停灵 23 天。这里之所以说“停灵二十一天”，是为了符合封建时代皇家的典制，这种作法和提法相矛盾的丧事，在民间没有先例。

据说，发引日期是以袁克定为首的袁氏家属假托袁氏遗嘱的名义下决定的。发引前，恭办丧礼处即预先发出了通告，向各界“告期”。对于执紼送殡人员额数，恭送起止地点等进行了全面布置。文曰：

“为通告事，本月二十八日举行前大总统殡礼，所有执紼及在指定地点恭送人员，业经分别规定办法，合亟通告，俾便周知。

计开

(甲)、赴彰德人员：

(一)、大总统特派承祭官一员(蒋作宾)；

(二)、文武各机关长官及上级军官佐；

(三)、文武各机关派员；

(四)、其他送殡人员。

(乙)、送至中华门内人员：

(一)、外交团；

(二)、清皇室代表。

(丙)、送至车站人员：

(一)、国务总理(段祺瑞)、国务员暨其他文武各机关长官；

(二)、文武各机关各派简任以下人员四员。

(丁)、在中华门内恭送人员：

文武各机关人员，及绅、商、学各界(不拘人数，在中华门内指定地点恭送)。”

演杠

为了符合封建时代的皇家典制，发引前一周还进行了“演杠”。由恭办丧礼处派员与水利杠房执事人员联合监杠。

事先，将80人的“皇杠”上铺以木板，板上设茶桌一张，上置茶具，沏好小叶茶一壶，茶桌两旁各设太师椅一把。由丧礼处监杠官员，坐于茶桌上首；杠房执事人员(即演杠总指挥)坐于茶桌下首，二人相互将茶水斟满。由80名头戴插着黄雉翎荷叶帽，身穿紫红驾衣的杠夫在两名执尺(指打响尺的)头目的指挥下，舁杠而行。练习慢步、疾行、转弯、换肩……所有动作，都必须使杠绝对平稳，不得有丝毫倾斜、颠晃，由坐在杠板上面的监杠人员，直视磁盏内的茶水，如无波动、四溢等情始为合格。据说演杠的目的在出殡抬灵时能使杠罩绝对平稳，避免惊扰亡灵。但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礼仪性的排场。演杠结束后，由丧礼处向杠夫颁赏，并在演杠验收单上签字。

亮杠，亮罩

袁氏发引(出殡)前三天即于新华门内外，以及西长安街两侧亮杠、亮罩、亮执事(仪仗)。永利杠房遵照丧礼处的指示，将黄色“ ”字杠架在二尺多高狮子头须弥座，贴箔罩漆的木质“金墩”上。杠上扣着挂有黄缎金龙云水图案的罩片，上端安了金色柳叶尖式的“火焰”顶。黄杠、黄绳、黄垫。四角立有执事架，各插四面拨旗，皆红杆黄旗白光。皇杠旁还亮出了32人抬的“小皇请儿”，这是准备发引出堂用的。另有纛旗12面，立于新华门内的影壁前。新华门前还有红、蓝、青、白、紫五色幡伞各60柄，自八字影壁前向东西两侧排列，每边各立30柄。一时府右街往东，马路两旁施旗招展。但警戒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持枪荷弹，如临大敌。市民可以从此路过，但不得驻足围观。尽管如此，西长安街上仍是车马如云。“好事者”纷纷绕道，故意经过此处，以饱眼福。

净水泼街，黄土垫道

当年，帝、后奉安，走大杠，都讲究“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袁氏发引当然不能破这个例。故于头天晚间，即由市内指派某工程队将黄土分堆卸于殡列即将通过的马路两旁。次日拂晓，始由身穿号坎儿，臂缠黑纱的道路工程队工人用铁锹将黄土扬散于大道中心。当然，只是撒成一条甬路，仅是象征性的“铺街”。尽管如此，黄土竟用了数百车之多。前边垫道，后边即有工人抬来大木桶，盛以净水，用插把的大水勺子，象征性地泼洒，凡经过泼洒净水的地方，即不准行人再去践踏，谓之“净街”。这项工作自有军、警密切配合，结合着戒严进行。所以，从新华门前往东，经西长安街，到前门外西车站，沿途军警密布，由警察总监吴炳湘负责全面指挥，严格禁止车辆行人通过。凡是赶来看热闹的市民，只能站在便道上观看。

参灵、出堂

6月28日，是袁氏灵柩奉移，袁子扶柩回籍的日子。中南海内冠盖如云，静候袁氏起灵。新华门外，长安街上是一片幡、伞、旗帜的海洋。

辰刻，恭办丧礼处，向永利杠房执事人员传令“即刻出堂”，在16名杠夫给袁柩“圈活绳”的同时，五堂汉执事的头目人，头戴一尺多高的红锣帽，身穿肥大的红锣衣，手执三角火焰边的催压旗、催压锣，快步跑出新华门，连喊“唔……得令喽……弟兄们叫齐啦！”后边的青铜大锣“咣”“咣”地筛了起来。震天动地的喊声，锣声给所有停在长安街上的仪仗传来了行动信号。两班160名杠夫，每班各分四排在杠、罩前对面而立。

怀仁堂前，官鼓大乐叮咚作响，其声哀婉催人泪下，所有官员按文东武西，分排脱帽而立。袁氏孝眷人等分男左女右跪于灵前，长子袁克定手持“六尘幡”形式的魂帛，跪于所有男孝眷的最前边。

参灵仪式就像表演节目一样，凡参加送殡的响器都依照约定俗成的顺序在灵前吹奏一遍。继官鼓大乐之后，由象征汉礼的清音锣鼓吹奏《哭皇天》一曲。之后，即转入“国葬”所特有的仪式：由总统府华乐队高奏《洪宪国歌》，袁氏的儿女、夫人、姨太太、丫环，以及各地来的亲友俱向袁柩三拜九叩；继任大总统黎元洪特派承祭官蒋作宾、各部高级官吏、各省督、抚、道等大员、清皇室代表等俱行三鞠躬礼。礼成，杠房执尺头目便朗声喊道“请驾！请驾”，即由16名杠夫将袁柩抬出了怀仁堂，在台座下，上了32人的“小请儿”（小杠）。灵柩上扣了一卷黄缎底子，彩色云水龙纹的官罩，大金火焰形的顶子，以四条黄绸拴住，拉在官罩的四角上，由四名杠夫牵绸向后边拉拽，谓之“拉幌”。杠的四角各有穿孝的响尺头目一名，用打响尺的方式指挥所有杠夫的动作。另有四名杠夫手持丈许红漆竹竿，上面挂着黄色白光的拨旗，走在杠、罩的两侧，路上空间遇有电线、树枝等障碍物，即由这四人拨除，使杠、罩顺利通过。另有四人背了高约二、三尺高的“交木”（红漆金饰的木凳）各一，如遇灵柩在途中停留，即将此“交木”放好，把灵柩垫起来。这样，小杠也有40多人。

杠前，袁的大儿子袁克定披麻带孝，以左手执一白蜡杆子，顶端糊着金钩龙凤“衔”一白绸制做的“六尘幡”，中间主幡的荷叶宝盖下写着“已故中华民国大总统，显考 讳世凯之灵引灵魂幡，原命前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午时；大限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周围六小幡上分别写着代表佛家“六境”之意的赞偈：“愿眼观华藏界；愿耳听舍那声；愿鼻闻界定香，舌尝甘露味；愿身披福田衣，愿意为无为舍。”由两位穿孝的侍从搀

扶而行。自三子以下的男孝属每人均左手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孝杖（俗称“哭棒”），也由两名侍从搀扶，走在长子袁克定的后面。

袁氏的夫人于氏也穿了生麻布的孝衣，用麻布包头，带有白棉球五个；姨太太包头上只有三个白棉球。儿媳妇、女儿等包头上也有三个绵球，中间一个是红色的，两边仍是白色的。还有一群丫环、女佣人都都身穿白布孝服。夫人于氏手捧“宝瓶”，当灵柩上了“小请儿”时，杠夫头目喊道：“请太太们上轿啦您哪！”于氏便率领女眷登上轿子，出中南海西门，经府右街，到新华门前，抬在大杠之后。

32人的“小请儿”启行，前有高大的铭旗开路，后有松活、纸活幡、伞等相随，由官鼓大乐、清音班及总统府乐团吹奏引导、番、道、禅随后。出了怀仁堂正门来薰门南行，经居仁堂大门宝华门，沿中海西、南岸东行，经仁曜门，再向西经丰泽园前，最后沿南海西岸、南岸，出新华门。

当袁枢被抬到新华门门楼时，外边的16名杠夫即将“”字杠上早已横上两根“龙门耙”的大罩请下来，顶在袁枢的小罩前头，由原来出堂杠夫将灵柩移至“龙门耙”上，然后，将灵柩与官罩一齐抬到大杠前边，但不落在杠上，而是由另一组杠夫将大杠抬起来，去找灵柩和官罩，谓之“底盘找活”。这是一切隆丧厚葬使用大杠时所特有的仪式。

这时，随小杠而出堂的响器均被执事提调往前带，以便插入殡仪行列，各就本位。京城撒纸钱的名手“一撮毛”带领四名高徒，大显身手，在杠前纵身一跃，五把纸钱即腾空而起，顿时，新华门前金银纸钱漫天飞舞（11）。

在总统府西乐团的哀乐声中，一群头戴高筒大礼帽，身穿黑色燕尾大礼服的高级官员，拥簇着一位老者，身穿天蓝色陆、海军大元帅礼服，袖头袖口用金线绣满嘉禾，佩着宝星垂金大元帅肩章，胸前挂着耀眼生辉的各式勋章，左臂缠着黑纱，手捧白纓元帅帽——他就是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他的身旁还有一位总统府特派赴彰德的承祭官蒋作宾。来到大杠前，向袁枢一鞠躬，以袁克定为首的男孝眷均跪地一叩还礼。汽车马上开了过来，黎元洪只向蒋作宾打了个手势，转身登车，在两辆绿色跨斗保卫车护送下，匆匆疾驶而去。

至此，大殡开始向前门外西车站进发。

殡仪行列

恭办丧礼处为符合“大丧”、“国丧”、“国葬”的格局，在国典未修，“国葬法”未颁的情况下，精心安排了国家丧典的程式，实际上已成为后来“国葬法”殡仪的雏形。按国葬规格应有国旗先导，大约丧礼处认为，象征“共和”的五色旗与袁氏生前仕途的极点——“洪宪”帝制不相容，故舍而不用（经查有这方面的资料可证）。象征发送国家元首的国葬仪仗仅有：

一、向导旗十面。由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领武装警察、保安队开道。

二、陆、海两军仪仗队。陆军一个团；海军一个连。士兵一色崭新军装，左臂缠黑纱，倒背最新捷克式大枪、俯首而行。长官手持指挥刀督队，刀、枪柄上都缠了黑纱。

国葬特有的仪仗之后，是传统仪仗：

一、各界送的花圈、挽联各数十对，由执事夫擎举而行。这种仪仗实是民国以后新兴的奠祭礼物。出殡成为满、汉正统执事之外的附加执事。一般不能夹在传统成堂的执事之内。

二、匾额亭若干座。皆为彩子局的艺术杰作，竹竿为架，外面绷上蓝、

白两色的布帛，做成古典宫殿式的顶子，上有五脊六兽的装饰。亭身为敞门凉亭式，下为须弥座。全亭以白布为底，蓝布镶边，中间以蓝布条拉上菱形小格，在每一交叉点上，别上一朵彩色纸花。匾额放在亭内，两头上下款露于亭外。由四名头戴“纬令”（亦称“卫帽”，是一种白蘑菇形，上缀红缨的凉帽壳。丧事则去掉红缨），身穿孝衣的执事夫肩舁而行。

三、松活 48 件。此为右安门外草桥一带各大花厂子的联合杰作。松狮、松亭、松鹤、松鹿（松鹤、松鹿放在一起谓之“鹤鹿同春”）、松人（有和合二仙、福、禄、寿三星、八仙庆寿等）。以上五种除松人外，皆成双对，是为一堂。另有特制的松麒麟、松虎、松象、松象犴、松骆驼、松车、松炉鼎、松匾等巨码松活。有如帝王陵前神路两旁的石雕石相生。大的四人一抬，小的两人一抬。

四、纸活冥器。

1. 四季花盆三套，共计 12 盆。盆内插一簇花、叶并茂的纸花，分春、夏、秋、冬四季，表示为“时花”。四季花盆亦为“灵花”的一种。

第一套为兰芝、荷花、菊花、梅花。俱以马粪纸为胎，白电光纸敷面，糊成筒式白瓷花盆，上绘山水人物，兼有真、草、隶、篆不同字体的题款与印章。花盆下面支以木质四柱红漆的架子。

第二套为芍药、牡丹、茉莉、桂花。以硬纸敷以木纹纸，糊成木盆，打上“铁”箍，亦架于红漆木质盆架之上。

第三套为迎春、百子石榴、碧桃、腊梅。以硬纸敷以彩纸糊成“紫砂”盆，上面刻有阴文涂绿的人物山水，诗词题款。架于棕漆木质盆架（表示是硬木架）之上。

2. 尺头桌子六组，每组两对，共计 12 对。桌上为红栏杆的绿色托座。以桌面陈设物品为别。

第一组：桌面上放置用“吐沫葛”充代真绸缎的尺头衣料两对，一对为“卷”状；另一对为“匹”状，谓之“绸缎尺头”。乃尺头桌子名称之由来也。

第二组：桌面上放置用金、银纸糊成的小山子石儿的盆景，谓之“金山银山”。一金一银为一对。共两对。

第三组：桌面上放置纸糊的笔、笔筒、笔架、墨锭（带匣），彩笺（带匣）、端砚、墨盒、墨水壶（池）、印盒、印章、古书、画卷等，谓之“文房四宝”。共两对。

第四组：桌面上放置带锦匣的珠宝翠钻、古铜、陶瓦、瓷器、景泰蓝、雕漆等文玩，谓之“古玩陈设”。

第五组：桌面上放置各种生活日用品。包括盥漱、洗浴、梳理用具、茶具、果盘、食盒。共两对。

第六组：桌面上放置四季穿戴的衣服鞋帽。共两对。

共 24 张桌子，每张用两名执事扶以红漆杆抬之行进。

五、铭旌。即怀仁堂停灵期间所立的高三丈二尺的长亭式铭旌。内挂红绸金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世凯之铭旌”的“芯子”。以 32 名身穿绿驾衣，头戴青荷叶帽的执事夫舁行。此为汉人发引所特有的大件执事，照例走在传统执事的最前边，表示为亡人招魂引路。

六、香幡——筒幡 24 把。上端为周围直径二尺的六角竹架，每角吊一面牌子幡，成为一六棱形的筒幡，状如佛殿上的经幡，此为冥衣铺的高档冥活。

以白缎为底，上面用特制的彩色线香，镶出各种花卉图案，分为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四种，每种各六把。用糊有金钩龙凤，刷了红漆的白蜡杆子挑起来，每同样四把为一横排，共六排。

七、大香亭一座。亦为冥衣铺高档冥品。此亭先以竹竿做骨架，上面绷以彩绸彩缎（皆用“吐沫葛”代之）。古典宫殿顶盖，上有五脊六兽，凸起的瓦椽，出檐的椽子，亭身为敞门凉亭式，下为白缎绷成的须弥座，亭上所有的油漆彩画以及下座的云龙石刻，俱以镶上特制彩色线香的办法来表现，与上面的香幡是同类的冥活。

香幡——筒幡、香亭，配套使用，乃为招魂引路之仪仗。香亭为8人抬。

八、催压旗、催压锣各一对（以下为第一堂汉执事）。

九、红地绣花幡、伞各12把。

十、清道旗（四方形、蓝底红边、红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四方形、白地、红边、彩色图案）各两对。

十一、“回避”、“肃静”牌、虎头金牌12对（牌为浑金）。上端有虎头图案，故杠房直呼为“虎头牌”。

十二、蛤蜊（有写作“格漏”者）棍2对。系二尺多长的木棍，漆黑白相间两色。

十三、粉棍两对。系半个竹筒，金箔罩漆，上端做一木质云头帽子，上有“万字不到头”、“车轱辘钱”、“四季花”三种图案。

十四、催压旗、催压锣各1对（以下为第二堂汉执事）。

十五、蓝地绣花幡伞各12把。

十六、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两对。刀的本身为木质，金箔罩漆，红漆柄，约二米多高。

十七、催压旗、催压锣各1对（以下为第三堂汉执事）。

十八、白地绣花幡、伞各12把。

十九、“八宝枪”（即“暗八宝”）共16对。即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两对。

二十、催压旗、催压锣各1对。（以下为第四堂汉执事）。

二十一、青地绣花幡、伞各12把。

二十二、金执事16对。即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镡、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两对（第四堂汉执事至此终）。

二十三、大车1辆，内放皇帝应用的各式器皿。“坐独马”12对，执事夫穿肯绒红边衣，头戴大绒帽，手持长枪，身背弓箭，骑在马上。这些都是清朝皇帝外出的排场。

二十四、门纛16对。门纛即古代军中的大旗，杆高丈许，上有半尺高火焰式的金顶，是典型的满（旗）执事，其纛旗的颜色是按自己所属旗别决定的，但袁氏身为汉人，为仿效满清皇室的典制，但自家又无旗别，所以，每旗——黄、蓝、红、白旗各用两把。

二十五、曲律（满语译音）。即小型纛旗，旧时，八旗当中参佐时用之，与上面的门纛是配套的旗执事，上面绣的图案均为日、月、星、辰、龙等。每旗用三把，共24把。

二十六、黄鹰、细狗、骆驼、刽子手、蒙古包等共12对。禽兽身上均披挂了红绸彩球。黄鹰两对，架在执事夫臂上；狗、骆驼各两对，由执事夫以

黄丝绳牵引。蒙古包，也叫“帐房”，人字形，上面一条脊，底下往两边分着，每座由四人舁行，亦为两对。以上执事人均穿缙丝套驾衣、黄套裤、青布靴。另外刽子手 4 对（8 人）身穿号衣，头戴红帽，手提屠刀、锁链，作出打猎随从相。这些都是清朝皇帝的仪仗，带有游牧民族色彩。

二十七、黄云缎座伞 3 柄（以黄绸带拉幌）。

二十八、各色扎彩的配亭 4 对。走在上述仪仗的两旁，最前边的一对，内供袁氏勋章大绶（如民国大总统所佩带的勋章，外缘锐角三重，皆八出，中圆绘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红色大绶）。第二对内供袁氏生前使用的笔墨纸砚等文具，谓之“四宝亭”。第三对内供袁氏生前所珍爱的文玩古董。第四对，供袁氏生前穿戴的衣服鞋帽，谓之“更衣亭”。每亭 4 人抬。

二十九、催压旗、催压锣各 1 对（以下为第五堂汉执事）

三十、紫地绣花幡、伞各 12 把。

三十一、官鼓大乐 24 名。官吹官打加“小乐儿”，拉号 1 对；官鼓 4 面，锁呐两对，海笛两对，笙两对，九音锣两对，跟锣一对。鼓手头戴“纬令”凉帽，绿驾衣，白搭帛绣圆“寿”字，青布靴。

三十二、清音锣鼓 13 名（此为汉人专用的响器）。

横笛两对、笙两对、小手锣一面，二人抬堂鼓一面，一人敲（抬夫不计在内），九音锣一对，指挥皮鼓一面。鼓手俱头戴“纬令”凉帽、白孝衣、青布靴。

三十三、番、道、禅送殡。

1. 雍和宫番经一班 15 人，头戴大沿黄帽，披黄袍，斜披红哈达，足登青缎靴。第一、二对执黄缎刺绣经幡；其依次为“刚冻”铜管大号一对，由穿孝的二人以黄绳在前边提着喇叭脖，由后边的两位喇嘛手握喇叭铜管的吹嘴且走且吹。大柄鼓一对，由两名穿孝的扛着，由两位喇嘛用弯钩的鼓槌边走边敲。大钹一对，与鼓同时打出节奏。后边的主持喇嘛（达司贵）头戴桃形黄秋帽，手内持铃。

2. 白云观道经一班，15 人，俱头戴圆形混元巾，露着冠簪，蓝袍加披黄红、蓝、绿，白地绣有云鹤、灵芝、八仙法物的“对儿衣”。第一、二对执蓝色引幡（片幡）。其他依次为：左铃、右喻（大铜钟）、对儿铛子、对儿镲锅、对儿法鼓。后面三位“高功”捧着“三镶”如意。

3. 广济寺、拈花寺、戒台寺禅经各一班，每班 15 众。俱光头青袍加披红缎金线绣福田纹的袈裟。每班第一、二两对，高举红缎绣花经幡，其他依次为：对儿引磬、对儿铛子、对儿镲锅、对儿法鼓。走在最后面领忏放正的 3 位大和尚，身穿黄袍，加披红袈裟，手捧燃香的手炉。

三十四、总统府军乐团。80 人俱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奏哀乐。指挥官身穿白制服，头戴将军帽，手握挂有小红旗（加黑纱）的电镀指挥棒，站在一辆指挥车上，被二人推着走。

三十五、大黄彩亭 1 座。全亭俱以黄布为底，绷以红边，中拉红布条成为菱形小格，每一交叉点上，别一朵彩花。亭内供带硬木匣，黄锦缎套的“洪宪”金印两颗（“中华帝国之玺”、“皇帝之宝”），“洪宪”皇帝金牌一道。抬夫俱为紫红驾衣，8 人抬舁以行。

三十六、各式彩亭 12 座。分红、黄、绿各色，有方座方身，圆顶；也有方座圆身、圆顶；还有方顶或长方顶的。每座均为 8 人抬，走在大黄亭子两

侧。抬夫身穿绿驾衣，头戴宽边黄帽。

三十七、总统府华乐队 80 名。吹奏民族乐器：笙、管、笛、箫、海笛、唢呐、加铜钟、九音锣等（平时，这支乐队多用在招待外宾的国宴上。据说，袁氏在天坛祭天时也用的是这支乐队），队员穿青呢制服，系白孝带。

三十八、大黄云缎座伞 1 柄。以黄绸带拉幌，执事夫着紫红驾衣。

三十九、领魂轿 1 乘。绿呢轿帏，镶以黄边，顶上黄网套，黄走水，青穗子，青纱帘，内供袁氏魂牌。用 8 名头戴“纬令”凉帽，身穿孝服的轿夫肩舁而行。另有提炉、提灯各 4 对，焚香秉烛，随行魂轿两侧。还有袁氏生前的卫队百余人戎装护送。

四十、大黄云缎座伞 1 柄。以黄绸拉幌，执事夫着紫红驾衣。

四十一、大影亭 1 座。亭身亭座均蓝底白边，中间以白布条拉成菱形小格，在每一交叉点上别上一朵彩花。亭内挂着袁氏放大照片一幅。杠夫 8 人均头戴“纬令”凉帽，身穿孝服，肩抬而行。

四十二、大黄云缎座伞 1 柄。以黄绸带拉幌，执事夫着紫红驾衣。

四十三、袁氏生前坐骑 1 匹。由生前侍卫牵引（当于袁氏下葬后，将马背覆以黄缎“封鞍”，表示此马曾为御骑，立有神功，除献神外，任何人不得再用，只能养老）。

四十四、“洪宪”皇帝宝座。8 人抬，金漆加绘五彩花纹，四角盘龙，椅脚雕金漆小狮，是袁氏称帝时，大典筹备处用 40 万银元定做的，以备袁氏在登基时坐用。帝制败亡后，该宝座一直在居仁堂放置，此次出殡抬出来当仪仗，也算派上了用场。

四十五、如意亮轿 1 乘。上铺虎皮一张，4 人抬行。

四十六、曲柄“影伞”1 柄。以上宝座、亮轿与此影伞的执事夫均头戴金边大黄帽，身穿缙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

四十七、大雪柳 48 杆。竹皮裹了剪穗的白纸，插于 1 米高的竹筒内，竹条下垂，谓之雪柳。由 48 名少年头戴假发髻、身穿印花白布衣，手执相送。

四十八、执紼宾客。外交使团、清皇室代表、国务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袁氏生前侍卫武官，按丧礼处规定均穿各自制服，无制服的，穿燕尾大礼服，戴黑领结，黑手套。有勋章大绶的，均佩勋章，带大绶，左臂暨刀剑柄，均缠黑纱。

四十九、白布帷幄 3 架。每架各宽数丈，即支一上下挡严的白布帐子雇人（穿孝）擎举以行，孝属走在里边，外人看不见。夏天则雇人（穿孝）举一白布凉棚，以遮烈日。袁氏之殡虽在夏天，为孝属安全起见，仍以白布上下挡严。袁克定以下的男孝属百余人在内步行。袁克定等各有两个侍从服持，并有侍从为他打扇。

五十、童子督胜盘（即“小拿”，亦作“小嚷”）48 名。帷幄外每侧各 24 名，各由穿孝的执鞭头目，进行指挥（一扬鞭为放下盘子；二扬鞭是跨齐站好；三扬鞭是举哀前进）。小拿均用未成年的男童，身穿孝衣，头戴假发髻，脚登青布靴，表示是侍童，两手皆捧一个长二尺，宽一尺五的红漆木盘，上面放置袁氏生前喜爱的古玩玉器。24 名托原件（为殉葬物）；另 24 名托仿制的纸活（皆北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奇巧斋冥衣铺承制）。小拿们边走边喊，左排喊“啊”，右排喊“喂”，以助丧主举哀，谓之“助哭”。

五十一、为殡仪扬撒“买路钱”的五人。以著名“一撮毛”为首，带领五名高徒，身背大串纸钱，就像旧京卖的“糖饽饽——大柿饼”一样。两旁

各有轿车一辆，内载大量金银纸钱。“一撮毛”师徒边走边扬，从新华门一直扬到前门外西车站。凡殡列经过处，地下铺满了金银纸钱。

五十二、80人的皇杠，抬着袁枢，大扛拴成“口”字形。黄杠、黄绳、黄垫，上扣大黄云缎的官罩一卷，罩片上绣有彩色云水龙纹。上端安柳叶尖式大金火焰顶子，罩架四角探出“兽头龙口”、“口”下挂着编织的花穗，顶头为一绿色荷叶帽，下边拴着8个小金葫芦。大罩每角还串以黄绸，每角由一名杠夫向后牵拉，四角成为一顺边的形式。杠夫有两班，每班实际上应为112名。除杠夫80名外，还有随杠跟夫32名，计有“执鞭压差”4名；打尺杠头4名；徒手的8名（这8名轮流挑瓦壶供饮水，背白土子往地上“划拨子”即换班记号）。头班杠夫为紫红色缙丝銮驾衣；二班杠夫为绿色缙丝銮驾衣，两班杠夫俱头戴青荷叶式毡帽，上插黄雉翎，土黄套裤，青布靴。

五十三、“后拥”（也叫“后扈”）48名。每排6人，共8排，分别手执后扈刀、后扈枪、后扈（扇）、后扈星、后扈拳、后扈铲、后扈锤等。

五十四、送殡女眷的轿子。

1.无顶的白布轿，四人抬，由袁氏夫人、于氏、女儿、儿媳等乘坐。于夫人后边跟随两人抬的小轿四乘，坐着她的丫环、老妈子。

2.蓝、白相间的布轿，由袁氏的姨太太们乘坐。每轿后各随两人抬着小轿两乘，里边坐的也是丫环、老妈子。

3.蓝、黑相间的布轿、坐着远亲及袁氏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种轿子共一、二百乘。

五十五、“恭办丧礼处”执公车。

1.前大总统灵柩奉移大典指挥车、巡回车若干辆。

2.丧礼处总理、副理车。

3.丧礼处庶务车。

4.丧礼处礼宾车。

5.丧礼处财务车。

6.袁宅帐房车。

7.北京市警察厅弹压车。

8.消防车。

9.救护车。

此外，还有四轮马车，坐着政府高级官吏的眷属。

根据“恭办丧礼处”的规定，大殡的路线是：从怀仁堂南出新华门，往东，至天安门，向南，经由中华门，出正阳门（前门）到京汉铁路车站（即西车站，后称前门车站），共计才有二里多路，但上述全部仪仗、人马至少也要排出三里地以上，所以，根本就走不开，排不下。许多仪仗在启行之前，都重叠排列在府右街以东，新华门以西，俟袁枢快要“升杠”时，再往前带，插入指定的行列。

怀仁堂内，杠夫刚刚给袁枢“圈活绳”，停在新华门外陆、海两军仪仗队就从传统的仪仗中间阔步穿过，直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头。所有一组同类的仪仗一律平行行进（例如：汉执事中的幡、伞共五色，每色12把，按民间传统习惯，为两把一对地前进，袁氏之殡则改成6把一平行地前进，余者类同），好在长安街上已实行戒严，车马不准通行，尽管这样，后边的大杠还在新华门门口，殡列最前头的队伍已到达了前门外西车站。

仪仗到达西车站后，即按指定地点进行排列。保安队导旗、两军仪仗队、

总统府军乐团、华乐队、番、道、禅，以及随车开赴河南彰德的香亭、影亭、魂轿、部分松活、纸活进入月台内外，余者均于站外排列。五堂汉执事均于前门楼子下边的观音庙、关帝庙前驻足，满（旗）执事在箭楼北侧驻足，凡不随车运往彰德的松活、纸活（约占全部冥活的三分之二），一律在箭楼与城楼中间的空旷地带分堆而放，等候西车站路祭礼成后，点火焚化。

车站路祭

西车站站外，早已由大六部口陈记六合棚铺及前门外东珠市口罗记贵寿彩局搭就蓝、白两色素彩五门牌坊一座，起脊式一殿两卷的大型路祭棚一座，棚口有金漆龙纹的门鼓一对，挂孝的黄缎彩绣二龙戏珠图案的鼓帘子，金漆镗架一对，金漆圆筒拉号一对。梆钹，各列左右，并设细乐，官吹官打共 24 个响器。棚口还插着金执事三组：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各一对；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各一对。共 24 件。各色幡、伞、扇、牌 12 件。棚内预先搭就祭台一座，上扎毗卢帽式三门素彩灵龕一座，前设祭筵一桌，供案上设有景泰蓝五供一堂，花筒内插着素色绢制灵花一对，蜡扦上插一对大白蜡烛，上书蓝字“西方接引，花开见佛”。

袁枢被抬入路祭棚，放在灵龕当中的红漆“交木”（指停柩用的木凳）上。路祭棚是以国务院名义设立的，故由前往执紼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主祭。首先由官鼓大乐击鼓鸣号，主祭人等就位，总统府华乐队奏哀乐，主祭人三奠酒、恭读祭文后，由继任大总统黎元洪特派之承祭官蒋作宾献花圈，陪祭的文武官吏（文东武西）脱帽三鞠躬。最后，由袁氏长子袁克定匍匐三叩，还礼答谢，总统府军乐团高奏哀乐，全体举哀而退。礼成后，官鼓大乐 24 响器前引，丧礼处部分官员至箭楼后边，祭送部分纸活。袁枢则由 24 夫以软杠抬进站台，安放于专用的灵车里。

袁氏的灵车，本是民国 2 年（1913 年）逊位后的清隆裕太后奉安时特制的，经京汉铁路局事先改装修饰一新，车厢内满涂了白漆，车厢外完全以蓝、白两色的布结成素彩，其中有“花车”一节，作为灵堂。袁枢扣以在中南海怀仁堂停灵时用的黄底龙纹的“堂罩”，罩前挂着特制的云头素幔，并摆了祭席一桌，最前边的是五供，外加“长明灯”一盏。四围挂满了花圈、挽联。长子袁克定打的魂帛和袁氏夫人于氏所抱的“宝瓶”（焰食罐子）都放在了灵座之前，灵枢堂罩的两侧和前后座位则成了袁氏孝眷的苦席。

站台铃声骤响，灵车启动，汽笛长鸣。保安队全体警官警士，两军仪仗队官兵均举枪向灵车致敬；全体铁路警，前往“弹压”秩序的军警一律就地肃立，行注目礼。全体送殡官脱帽三鞠躬。总统府军乐团再次奏起了哀乐，金银两色的纸钱漫天而飞，军队鸣礼炮 108 响；北京市各大寺院、宫观闻炮亦鸣钟 108 响……

袁家既已扶柩回籍，在北京的丧礼即告结束了。

袁子扶柩回籍 归葬彰德

袁世凯死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停灵受吊 23 天（说是 21 天，是为了应制）。这在旧时代是没有达到最高峰的。据说，袁家原本打算搁“七七”49 天。但由于当时的政局混乱，相传段祺瑞要带兵杀死袁氏全家，黎元洪主持下的北洋政府，对袁家“扶柩回籍”归葬河南一事进行了催促。但袁家的余哀未尽。袁氏的哀荣也未了。所以，回到原籍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家里，继续停灵受吊，还要大办特办，一方面是为等待墓圻的初步落成，另一方面来个“明七七”，

即前后共停灵 77 天(实际上从 6 月 6 日至 8 月 23 日应为 79 天。因为袁家是按在中南海停灵 21 天计算的。按旧俗,只要单数即可),以应袁氏生前驾坐龙楼,至高至贵至尊的荣典。

袁氏的灵柩到达河南彰德时,站前早已搭好了一座五门十柱的素彩牌楼,与当年北京前门外的五牌楼相仿,不过加了毗卢帽式的顶子,每门一顶,每顶扎出七个“山尖”,每一“山尖”垂挂一串蓝、白相间的大彩球。另有起脊式的路祭棚一座,上面挂了“彰德各界公祭故袁大总统”的横匾。棚口设了红地金纹的大鼓、锣架,上面挂了加上孝布的二龙戏珠图案的鼓帘子,金漆长号、金漆官鼓、梆、鐃等官吹官打的乐器,两侧八字排开的红漆执事架上插着彩缎绣花的幡、伞,以及金瓜、钺斧之类的金执事(即木质金箔罩漆的古代兵器模型)。棚内的高台上搭了素彩灵龕,龕旁立有绿色的大扇两把,供案上设了香炉、蜡扦、花筒,案前小几上设了奠酒池、执壶和杯盏。路祭棚外还搭了两座客棚,内设官座 16 个,招待从北京乘车送殡来的文武官员和当地迎灵致祭的官吏。

袁柩被 16 名杠夫以软杠从火车上抬下来时,彰德地方文武官员均身着素服,左臂缠着黑纱,前往迎灵。身穿一色绿驾衣的鼓手在路祭棚前击鼓、鸣号。所有从北京运去的仪仗、松活、纸活都抬了下来,顺着大牌楼顺序往前延伸。只有一座高约二、三丈的红缎金字的铭旌是在彰德当地重新扎制的。

还乡开吊

袁柩被抬进棚内,马上摆上祭席,由彰德县官恭读迎灵祭文,再由文武官吏依次上香、奠酒,由袁克定等孝眷叩首答谢。礼成后,即由鼓乐前引,举行升杠仪式,仍然用的是从北京运去的 80 人“万字杠”。杠前,焚化了彰德县文武官员送来的纸扎官轿一乘,金鞍宝马一乘,表示让袁氏的灵魂乘轿“衣锦还乡”。所有杠前一切仪仗,仍照旧排列,喇嘛、道士、和尚,排列其中,女眷乘坐的白轿尾随杠后。走起来,在田野大道上蜿蜒三里之遥。一路上,金银纸钱漫天飞舞。直奔袁家的宅院。当地乡民们为了开开眼界,不约而同地从十几里以外扶老携幼地赶来看热闹。

袁家在洹上村的宅院有五重高大的瓦房,每重建有正房五间,左右耳房各两间,两旁厢房三间、五间不等。都是前廊后厦。院落与院落之间有中间的“过厅”可通。袁柩被停在最后一层院的正厅中间,仍然是头顶风门(卸掉风门隔扇等门楣以下的全部装修),成为“正寝”的格局。本来,按风俗习惯,凡死于外乡的,运回家里治丧时,只能停在灵棚内的上首,不再“登堂入室”。但是,袁氏生前曾为“九五之尊”,好歹也是一代帝王,超越一切,故家规、成例,在他的面前当然不能成立。

灵堂院内搭了一座五丈多高的起脊大棚,古典宫殿顶子,上有五脊六兽。灵棚向前延伸,将前院一起罩了起来,成为“一殿一卷”的形式,棚顶的四周出檐,其外观有如北京北海公园团城上承光殿的建筑形式。棚内上下安装了两层蓝框、蓝色五蝠(福)捧寿图案的玻璃窗。内部棚壁四围完全用蓝、白两色的绸、布扎成各式彩活,做工精细。其工料全是北京大六部口六合棚铺和前门外东珠市口贵寿彩局承包下来的。

灵棚内,除了灵堂那面以外,其它三面都在房顶上搭了“两层托子”,上面摆满了从北京运去的各种纸活冥器,有古玩陈设、文房四宝、成桌的筵席、成台的戏出……下层挂着番、道、禅三棚经的各色绣花经幡 12 件。灵前照例搭了一座大型月台,台的四柱围以立体云水蟠龙的彩色装饰,上加天花

板，有如古典殿堂上顶的彩绘装饰，十分华贵。底座是木质预制件拼成的须弥座，是仿汉白玉石雕的形式。月台上，灵前竖立着一幅袁氏遗像，供案上有从清宫带出来的万历青花古瓷的五供一堂。焚香秉烛昼夜不息。每天上下午均结合禅经的“戒食”、“交供”仪式，在灵前供饭，摆祭席一桌。席前设奠酒用的酒池、执壶和杯盏。月台上的正前方，设白布拜垫一个，上面复盖着红毡一块，是给前来吊唁的人参拜行礼准备的（白垫上加了红毡表示对来吊者的礼貌，因为来吊唁者家里并没有落丧事。但来吊者为了表示谦逊，照例要主动撩开红毡，跪在白垫上行礼）。月台下的雨路两旁，设有官座 16 座（每座一桌六椅），挂着白缎绣花的桌围、椅套，以招待宾客听经、观礼。

第三层院子是作荐亡道场用的经棚，这棚比灵棚略低。棚顶也起了尖子，有五脊六兽的装饰，四面出檐。棚口（即第二层院的“过厅”）前，放着一对大松狮子，一对大松鹤，还有一堂松“八仙人”分作两边排列。棚内三面都在房上搭了“经托子”，此为僧道作法的地方，正面是喇嘛，左首为道士，右首为和尚。各 15 人。经台的前脸都用红、黄、白三色的绸布扎出了拱门，再配上经绸局的大云头缎绣幡门、幡条，已是超越了庙宇殿堂的设备。

僧、道诵经作法，仍按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停灵时的安排，或番、或道、或禅，每天一棚，每天念的经典不重样。逢“七”三棚轮流诵经。每天都要送五道疏（即呈送神、佛的荐亡文疏），每次送疏都要换一堂法衣或袈裟。由袁克定等孝属捧疏，僧或道纷击法器送至大门外焚化，然后在灵前转咒“回向”（将诵经、礼忏的功德归于被超度的亡灵）。

在其它两院里搭了平顶的酒席棚，为了对来宾表示尊敬和礼貌，棚壁四面均扎了花红彩子。酒席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席为四水果、四冷盘、四热炒、四大菜，是招待来宾的；中席为四冷荤、四热炒、三大荤，是总管、帐房吃的；下席是四热炒、两大菜，是茶房、扎彩匠、棚匠等工人吃的。此外，还有素筵，是给僧、道预备的。袁家每餐上、中、下席经常要开 100 多桌。

在此期间，豫省军巡大员，特别是为袁氏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均躬亲至彰郡，亲为奠醊，以表报恩。简任以上各员，前后至袁家随礼的有：参谋长时鼎岑、警察厅长王景福、高等检察厅长陈官挑、周祚章、财政厅长顾归愚、巡安使田文烈、河防局吕耀卿、开封道叶济、德武将军赵倜、政务厅长陶琪（以吊唁前后为序）等高级文武官员数百人。

袁宅伴宿之日（即发引的前一天），前来吊祭的有从北京赶来的前清遗老遗少、北洋政府军阀、政客以及豫省大小文武官员共千余人。各院棚内外挂满了各方赠送的绸缎素幛、花圈、挽联、匾额。灵前摆满了祭筵、饽饽桌子，各种纸活冥器。为向随礼者表示谢忱，袁家预备了汉席、教席、素席三种，每餐开 200 余席。这天喇嘛、道士、和尚三班轮流诵经。到了下午 6 时，举行盛大的送圣——送库仪式。官鼓大乐、清音“九福班”前引，僧道纷击法器随后，由袁克定等孝属“捧圣”（即用铜茶盘托着给神、佛呈上的荐亡文疏），在来宾 1000 余人的簇拥下，步出大门，在附近广场上，将三堂楼库（每堂为一楼二库）六对杠箱，几十张尺头桌子、金山银山、文房四宝、日用器皿、古玩陈设、阴宅四合房，以及袁氏生前所穿用过的部分衣服鞋帽等分堆焚化。届晚，番、道、禅三班各登法座，放了对台的传灯焰口。经声佛号，钟鼓笙簧，通宵达旦。

点主

按照汉族人的风俗习惯，殡前要由勘舆家择吉举行“点主”仪式。点主也叫“成主”、“题主”。这是从周代传承下来的风俗，古人认为，家鬼依木不依墓，所谓“形归于土，而后依神于木主”。所以，封建时代，仕宦之家死了人，在治丧期间，就要通过“点主”的仪式，建立一个木制的牌位，以便让死者的神魂依附于上，留给后代奉祀。袁家乃仕宦之家，当然对这一仪程恪守不渝。

担任点主的人称为“点主官”、“鸿题官”。一般都是清代科甲出身的人，最好是当过翰林、主考、学政等官的人，因为他们的朱笔经常为士子点名，使士子能“飞黄腾达”，经过他们点主，死者可以早日“超生”或上登莲台极品。袁家请的点主官是曾任袁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因为他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过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又曾与袁世凯换过“金兰帖”（成为把兄弟）。符合“点主赐福”的条件。

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点主即“事生”、“事存”的仪式，“主”代表亡者神魂，点主是将亡者神魂召回，等于亡者再来，是吉利事，谓之“吉礼”。所以，事前袁家就将灵棚内素彩全部撤掉，换上了以黄、红两色为主的花红彩子，灵堂的供案上也换上了红烛、红供花、红桌围子，甚至灵前的拜垫、孝子的苫席都由白色的换成蓝色的。

一切象征丧祭的挽幛、挽联也都用整疋的红布象征性地遮挡了起来。

点主的头天，请来一位在清代曾任文职的遗老写“主”。老先生身穿蓝长袍，青纱马褂端襟正坐在公案桌后，受孝子袁克定三拜九叩的大礼，然后由袁克定捧上袁世凯的木主。这是一座非常精美的木雕艺术品，其用料是老金丝楠木。下边有个须弥座，座上立着一个带有雕孔的木罩，雕孔上下左右雕满了云水蟠龙的图案，罩里才是牌位。由执事将它打开后，分为内函、外函两部分。写主官先写内函，正中写上“中华已故大总统袁公讳世凯字慰亭之神主”，两边写上它的生卒年月日时。下边再写上以袁克定为首的奉祀人的名字。后再写外函，上书“中华已故显考大总统袁府君讳世凯号容庵之神主”，写时均将“主”字少写一点，成为“王”字，留待点主官以朱笔加点。写罢，先由茶房用五色线将青绸一方、红绸一方捆在主匣上，再由袁克定捧回灵堂。最后，向写主官拜谢，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次日，袁家都脱去孝衣，换上了“吉服”，以袁克定为首的男眷均头戴青缎帽头，身穿蓝长袍，青马褂，足穿青便鞋、白袜。女眷均穿素旗袍，但不参加典礼，依礼回避。来宾亦不再戴孝，白孝带、白花、青纱箍等一律去掉。

典礼开始，袁家派出鼓乐和仪仗队前往迎接点主官徐世昌，其排场是：

一、开道锣一对，执事夫扛一躺卧式旗杆，金漆龙头，挂着红地黑边、黑字的方形大旗，上书“开道”二字。旗杆前端则挂青铜大锣一面。

走在最前头。

二、金执事 16 件：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一对。

三、素红云缎大伞一对。

四、绿扇一对。

五、“肃静”、“回避”虎头牌各一对。

六、官衔红牌 12 对，上面写着徐世昌点主官的生平职衔。如“翰林编修”、“兵部侍郎”、“民政尚书”、“关东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

按通例，一般丧家接点主官的仪仗，用的是自己家的官衔牌。因袁世凯曾为“洪宪”皇帝和民国大总统，情况特殊，故用点主官的官衔牌去迎接。这是一种变例。

七、清音锣鼓一班：双管、双笙、双笛、双云锣、堂鼓（两人抬，一人敲）、小锣、皮鼓（指挥）。

八、如意亮轿一乘，即大型太师椅一把，后背上有个如意头的装饰。因无篷盖、轿帷，故谓之“亮轿”，上披一张虎皮。8人抬舁而行。表示对点主官是最优隆的礼请。

九、日照影伞一把，系短围子的扁伞，将如意亮轿遮盖。

轿夫及执事夫均身穿红驾衣，头戴红缨帽。点主官徐世昌坐着四轮马车随着鼓乐、仪仗而来，但没有坐在如意亮轿上，表示谦恭。随着迎请行列而来的还有襄题官（两名）、大赞、前引官和袁宅亲友，都穿了蓝纱袍褂。

袁克定跪于门前，以三拜九叩的大礼迎接，奏乐鸣炮。由前引官同至客厅小憩、更衣。点主官、襄题官、大赞都换上了前清的官衣，戴了大红缨的凉帽。点主官头上是一品顶戴花翎。这时，灵堂院的月台下，设了一长方形的公案桌，桌前扎了红缎绣花的桌围子。桌后摆了三把太师椅，上面都披了虎皮。到了吉时，就请点主官在中间“升公座”；两位襄题官在左右“陪坐”。公案桌上安放了墨砚、朱砂砚各一方；“紫气东来”墨、白芨各一锭；“一品文章”小楷笔三枝。桌旁还放着一个鸡笼，内有一只白羽毛的公鸡。一切都是按古制如法准备的。

点主开始，鼓乐三吹三打，鸣放礼炮。首先由袁克定分别向点主官、左右襄题官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然后，捧主出堂，跪着递给左襄题官，由他接过来，将上面覆盖的青纱、红纱揭去，分出内外两函，并象征性地拂去尘土，递到点主官面前，复将一枝新笔饱蘸朱砂，以诵诗的形式进行“祝赞”后，转给点主官“彩笔鸿题”。这时，点主官接过笔来，面向东方吸取“生气”三口，嘘在笔上，先在木主内外两函“之神主”的“王”字上各加一朱点。继由右襄题官染墨笔，如前仪。由点主官再往内外两函神主的“主”字上加一墨点，谓之“墨笔增辉”。最后，由茶房将白公鸡从笼内捉出来，用“金针”刺破鸡冠，谓之“刺禽”，由点主官以新笔蘸鸡血“润笔”，在两函神主的“主”字上，再加一点，谓之“盖主”。如此三次才算把“主”点好。

点主完毕，右襄题官起立，合主、入榑、合榑，把红绸放在上面，黑纱放在下面，蒙于主盒，以五色彩线扎紧，谓之“入靛”。继由袁克定捧回灵堂，供于灵桌上，谓之“安主”。克定反身出堂复位，拜谢点主官、襄题官，兼谢大赞诸宾，仍三拜九叩。

至于那点主用过的三支笔，便由点主官向背后一扔，谓之“向后笔（必）发”。寓意家族今后必然发旺。人们以为这三支笔是无上功德笔，所以当场有人用手接住，如获至宝，说是考试时，用它作文答卷，大有神助。

最后，点主官、襄题官等起立，拿出事先写在红纸上的赞词，当场宣读，内容是赞颂袁氏生前的业绩，谓之“荣主”、“赞主”。赞词都是四六排联的，最后还有几句韵文。读完后，就把这篇文章安放在木主的函内。至此，点主仪式礼成，奏乐。袁家上下互相道喜。这时，鼓手、轿夫、茶房、厨子等头目均向袁家请安道喜。袁家把事先用红纸封好的钱包分赏给他们，谓之“喜钱”。

随后，袁家马上撤去花红彩子，灵堂上撤去红烛、红供花、红桌围。一切恢复原状。袁家上下也都脱了“吉服”，穿上孝衣，继续治丧。徐世昌等这才以宾客的身分向袁灵祭奠。袁克定匍匐答礼。然后，袁家摆上“燕翅席”（以燕窝、鲨鱼翅子做成的高档席），四干果、四鲜果、六热炒、六点心、六饭菜、十二个大菜，均以江西细瓷高碟盛装，上绘“万寿无疆”的图案，诚是美食美器。点主官、襄题官每人一席，高距首位。由大赞和贵宾作陪。事后，袁家对他们均有厚赠。

下葬

8月23日（已是治丧的第79天）“巳时发引”。仍旧用了从北京运去的满、汉执事，80人的大杠将袁枢抬到坟地安葬。

袁氏的墓地在其住宅以北二里多地的太平庄上，占地约为二百多亩，与住宅余地相连。出殡安葬时，墓地工程尚未完竣，但已略具雏形。墓地四周已建起花墙子，并凿以濠沟，引来彰河之水，将墙围住。四外新种植的松、柏树已有一人来高。墙的大门，面对安阳桥。门内建有大石块铺成的甬路，宽约二三丈，两旁树木蓊郁，有石兽12对，对称而立。中间为享殿，这时才刚刚打好地基，甬路逐渐倾斜，通入坟墓，其墓分为两层：上层为室顶，用红色花岗岩砌成，高约三四丈；下层为石室，有大石门两扇，雕有龙纹。中间大殿三间，两旁各有朝房五间。大殿中间有石桌、石座，均用汉白玉制成，也雕有龙纹。石桌上陈设着五供及袁氏生前喜爱的各种玉器古玩，两旁设有“金灯”两座，高约四尺，灌满灯油，于下葬时开点。仿的完全是帝陵内“万年灯”的形式。下葬的前一天，坟墓内外部扎了高大的素彩牌坊，以迎接灵柩的到来。

袁枢被抬到坟地后，即改用24人抬的软杠，顺着隧道抬入石室大殿，但没有即刻安位，而是要等待勘舆家给择定的吉时。结果，直到天黑，才将袁枢放在正中石座之上。这时，袁克定以下的孝眷和送殡的亲友依次向袁枢行礼。然后，他们均退出石室，闭上石门，在坟地上作最后的祭礼。除了部分松活，如松狮、松鹤、松鹿等依次陈列甬路两旁外，其余纸扎冥器，包括纸扎阴宅四合房、四轮马车、汽车、官轿、灵人、花盆、尺头桌子、香幡、筒幡、香亭、松亭及治丧期间收进来的花圈、挽联、匾额、金银鏤簪等等统统点火焚化，趁着火势，将所有剩余的金银纸钱尽数扬上高空。洹上村被照红了半边天。

袁氏安葬后，仍然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继续招商施工，直到民国7年（1918年）6月才全部完工。

坟墓建成后，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绿琉璃瓦顶的石牌楼，接着便是左右对称的石柱、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等等。再走过一座碑亭，便是“飨堂院”，院内建了七开间大飨堂，命名为“景仁堂”，堂的两侧建有东西配房。飨堂内，供奉着袁氏的主位，还陈列了袁氏生前惯用的家俱什物、其中以硬木的书桌、书柜、办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脸台、小便柜等等，无一不备，甚至连托盘、醋酱碟，都一一陈列齐全了。飨堂后，再经过一道铁门，便是袁氏的坟墓了。纵观其建筑形式、格局，俨然是座皇陵，恰也圆了他生前83天的皇帝梦。

《袁氏自毙之前后》。上海《民国日报》，1916—6—11。报导说：“袁对徐、段、王所嘱之遗言，据为袁氏诊病之医部秘书箫方骏所述，略如下：（一）、所行诸政，余乃以国家为前提，决非为余一身之荣誉，一家之繁荣。

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后世亦当有定评。（二）、传知拱卫军诸将，虽余死后，对于后任之大总统，须如对余一样，宜守军人之本分，决不可有不谨慎之行动。关于北京治安之维持，责成段、王二人。（三）、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云云。”

对龙袍的制做地点说法不一。袁氏七子袁克齐说是从杭州订制的。（袁克文。《回忆父亲二、三事》。见（In）：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2。第84页。）但张伯驹则说：“洪宪时，备御极黄龙由前门大栅栏瑞蚨祥承制，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

一说袁氏死后，外面盛传袁氏因“帝制自为”，导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走投无路，自杀身死，故袁家有意晚殓，以令权威人士验证，而明真象。

清代，帝、后从“晏驾”之日起，立大幡于乾清门外，谓之“丹旛”。王府治丧则于亡人“倒头”之日起，立大幡于垂花门外，汉人则立“铭旌”。皆为招魂引路之旗帜。袁氏为汉人，故立铭旌于怀仁堂外左侧，一般汉官、汉民则须等到发引头天——伴宿之日始立铭旌。

清代，帝、后或亲王奉安大典之前，均有演杠之举，自亲王以下一律不准演杠。否则即为逾制，受到弹劾。袁氏虽撤销帝制，但仍复位为大总统，以国家元首自居，故死后，出殡之前仍要演杠。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第165页。

清初朱彝尊《日下旧闻》引露书：“京师期功以下服孝，帽顶心皆缀红绒一朵曰‘花花孝’莫知所自，流俗可笑。”足见这种风俗流传至少有几百年。

旧时，民间发丧出殡例由死者的大儿媳妇手捧“宝瓶”，俗称“抱罐儿”（罐内装的是辞灵时孝属及近亲给赚的祭食）。袁氏出殡时让他的正配夫人抱罐，是依照清代皇家的礼法。

因怀仁堂南面有春藕斋、静谷、丰泽园等建筑群，位于南海西北隅一带，成为中海、南海之间往来的阻碍。又因清代及民国年间，中海、南海之间筑有宫墙，挡住去路。故出怀仁堂直接向甬行是不可能的（因有建筑群和宫墙拦挡）所以必须向东绕行一下，再折向西行。所经的仁曜门位于瀛台正北面，是原勤政殿的后门（南门），又是中海与南海之间的一处大通道口，故经此门。

“一撮毛”，正名全福，满人。是清末民初扬纸钱的能手，无出其右者。手下有徒弟多人素日即在空旷高坡上练习扬撒技功，锻炼臂力。专应大殡扬纸钱的活。颇有挣项。但晚年潦倒，在西城大觉胡同当街庙当了庙祝。后不知所终。

（11）按旧京风俗习惯，凡出殡走灵，在起杠，换杠以及沿途经过祠、庙、河、井、桥梁、路口、城门、路祭棚、路祭桌、茶桌都要高高扬起纸钱，表示向拦路的孤魂饿鬼施舍了买路钱，以便让死者的灵魂顺利通过。新丧发引用白纸钱；超过三年以上的起灵、改葬，扬花红（彩色）纸钱；帝、后奉安，扬金、银纸钱。袁氏发引以皇帝奉安仪典进行，故也撒的是金、银纸钱。

主要参考资料

《袁氏自毙之前后》。上海《民国日报》，1916—6—11。

袁静芬。《我的父亲袁世凯》。见（In）：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2。第63—68页。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In）：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2。第84页。

李泰棻。《杨翠喜案及其它》见（In）：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2。第313页。

萧景泉。《丧葬琐记》。见（In）：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2。第316—336页。

中西合璧古今一体 破天荒的沪上奇观 ——盛宣怀出殡纪盛

旧时，人们重视死后的哀荣，不独是帝王建都的北京，而南方各大城市皆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上海洋场中名人出丧，无论仪仗、响器，均大搞“土洋结合”，有的竟然以印度巡捕为先导，借用新兵，吹奏军乐，与中国传统的民乐前后穿插而行。丧家不考虑两者是否协调，只图时髦，以为荣耀。近人朱文柄《海上竹枝词》有云：“丧仪究竟胜他邦，开路先锋印捕房。漫谓新兵供借用，挽歌军乐不同腔。”民国6年（1917年）11月18日，清末曾任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葬礼就是典型的一例。

盛宣怀的葬礼是继北京袁世凯“大丧”之后的又一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盛举”。从形式上看，属于“家葬”，实质上，是被其垄断的工矿、铁路等企业给其举行的公葬。此举同是发生在民国初建，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所以就形成了中西合璧，古今一体，“惊天动地”，空前绝后的大奇观。袁、盛一北一南，一京一沪，风俗各异。袁氏的葬礼是民初典型的北京风俗的反映，乃集北省丧礼之大成；盛氏的丧礼是民初典型的上海风俗的反映，乃集南省丧礼之大成。但两者又都是集古今中外，朝野臣民，满汉风俗、典制于一体。如若两者对照类比，当可对研究中国丧葬礼俗之异同与民初社会史有所补益。

民国6年（1917年）1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社会新闻版刊登的《盛宣怀出殡纪盛》一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资料，笔者以此为依据，再以其它零星材料进行补充，稍作整理，成为名人葬礼轶事中的一叶，献予读者。

人潮如涌观大殡 商店停业搭看台

由于报界的张扬和“消息灵通人士”的传播，盛宣怀即将大出丧的消息不胫而走。怀着好奇心的上海人纷纷奔走相告“此票难买，莫错良机”。不要说市内的居民们，呼群唤侣，抢占“要冲”，就是许多上海郊区，甚至外县的乡民父老们也都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向市区云集，等着瞧“大出葬”。

商人们和经济头脑灵活的人们见景则另有打算——如何乘此良机捞上一笔“外块”。因此，11月18日前夕，凡是殡列即将经过的马路，两旁店铺自动群起停业，雇来棚匠，临时用杉槁、木板搭设成阶梯式的观礼台（看台），以便临时卖票，收取观赏之资。均各利市三倍。尚有各弄口，亦有人在两边搭台设座，收取“看资”。凡搭设在路祭棚对面，或路口要冲之外的看台，均设“雅座”，招待茶点。每位收大洋八角；一般设座者收大洋六角；“站票”收大洋三角。两旁楼房的阳台和房内临窗处，亦有招待看客者。

大殡经过的马路，从上午10点开始，即已人山人海，例如：泥城桥大马路、四马路一带，几无容足之隙，新世界绣云天、青莲阁、升平楼、长乐等处早已起满坐满。至于马路上的观众更是人如潮涌。外滩各楼房、阳台、屋脊、只见人头攒动。人们只顾一饱眼福，却不顾“身家性命”，以至互相拥挤、倾轧，失帽落鞋，跌扑受伤，丢失小孩，冲散老人之事，不一而足。

绣云天于 12 时许，看客正盛之际，不料第二屋靠后面水门汀搁门，因压力过重，稍有走迹，遂由经理速令将后面暂时拦截起来，以免发生危险。

时届下午 1 点，英、美总巡麦高云即饬令老巡捕房，派出通班。中西各捕分赴各路弹压。总巡捕房除派印度马巡，驰往护送道外。并选通班中西各捕，沿途巡护，以确保安全，而防滋扰。

南北杂掺成“盛举”土洋结合现奇观

午后 1 点，由静安路 110 号发引。以 16 人夹杠将盛氏灵柩抬出丧居后，即在门前大马路换升大杠。其先头仪仗已于前一小时即开始行进。整个殡列队伍拉开距离后，约有五华里之遥，可谓壮观。其大致行进顺序如次：

一、西捕马巡一名，印度“马巡”四名，徐行开道。

二、纸扎开路神两对。各高两丈余，头如斗大，戴盔，做金刚怒目状，身披铠甲。足下安有木轮，用人推之以行。

三、洋号旗枪（此为军中旗、鼓、号引申而来的开路仪仗）。

四、马匹十余骑（以上均为引魂开路的仪仗）。

五、雕有虎头图案的浑金“肃静”、“回避”牌各一对。由扮作清代官府衙役的执事夫肩扛而行。

六、铭旌亭，系挂幡之长亭，其幡红绸金字，上书盛氏官衔、名号。幡的上端有绿荷叶式的宝盖，两旁挂着彩球等彩活。总高三丈二尺。由 32 名杠夫肩抬而行。此为汉官出殡招魂引路的旗帜。

七、马执事全副。

八、洋号一班。小步号 49 把，横排竖排均为 7 人。俱蓝、白制服、将军帽。

九、香亭一座。古典宫殿顶盖，敞门、下有须弥座。均以白缎为底，以彩色线香拚成团寿字、团万字、瓦垅、棂窗菱花格，以及座上的云水龙纹。是为极细的冥活。座上穿杠，8 夫抬舁而行。

十、銮驾全幅。包括銮舆、仪仗。

十一、马上清音一班。

十二、黄亭——御赏亭 10 座，分别由身穿红驾衣的执事夫（每亭 8 人抬）肩抬而行。内供前清御赐诰命、福字、佩玉、蟒袍、匾额、暑药、茶果等御赏。每亭前均张举黄云缎曲柄大伞一柄。

十三、买办西乐一班。共 96 人。俱穿大黑呢礼服、黑领带、全部轻重西乐乐器。指挥员站在二人推着转轮的“指挥台”上，以小旗作号令。

十四、遣客亭，8 人抬舁而行。

十五、红黄牌：红色金字的官衔牌，黄色红字的功名牌各数十对，上书盛氏生平历经清朝任职官衔，及清廷赐予的各项功名。

十六、前清卫队亲兵百余名，对儿马 8 匹。

十七、执事一班：花旗、花伞各若干件。

十八、招商局北机、南机工役百余人持香步送。

十九、各轮买办所送的素色奠幛数十幅。

二十、以冬青扎成的三丈二尺高的大花亭一座；冬青扎成的大狮子一对；牌、伞、亭台各一对；童男、童女一对；鹿、鹤轩桥一座。

二十一、纸扎金象辇、银象辇，兼七彩虹桥一座。

二十二、绣花旗、伞一堂。

二十三、銮驾全副。包括銮舆、仪仗。

二十四、花奠伞，清客串一班。

二十五、花汽车一辆。民国后在沪新兴起的新式领魂车，内供盛氏灵牌。

二十六、洋鼓、洋号全班，计 48 名。俱身穿白制服，头戴将军帽。乐器为大、小铜鼓、黑管、大小号等。

二十七、花花亭一座（8 人抬），花人物（八仙人、歌妓人、“二十四孝”等）、花狮、花象、花麒麟、花松鹤、野鹿等数十对。

二十八、彩绸布扎成的“祝文亭”一座。8 人抬舁以行。

二十九、汉阳铁厂送的“纪念石”一座，16 人抬之以行。

三十、銮驾全副。

三十一、德政牌数十对（士民称颂长官德政之石刻，谓之“德政碑”，此德政牌是士民称颂长官的牌匾性的仪仗，上写歌功颂德的赞词）。

三十二、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所赠送的各色锦旗、锦标“万名旗”、“万名伞”各数十事。

三十三、清音锣鼓一班，4 笙、4 管、4 笛、4 箫、4 云锣、2 小锣、1 堂鼓（2 人抬）、一皮鼓（指挥）。共计 25 人，俱穿孝衣，头戴清制官帽。

三十四、萍乡煤矿赠送的各色锦旗、锦标、“万名旗”、“万名伞”、银盾、银鼎、银炉各数十件。

三十五、音乐提香一班。引炉、盘炉各 12 对。

三十六、紫禁城骑马肖像亭一座，8 人抬舁而行（至广西路，外罩玻璃已碎。据称，行至南京路小草场前，被一穿蓝长袍、青马褂，年约三十余岁的青年人以石子抛掷击破。该人当即被弹压的军警捕去）。

三十七、全猪、全羊两亭，以为祭品。每亭 4 人抬之而行。抬夫穿孝。

三十八、谋得利音乐全班，由数十人组成。

三十九、彩饰花铁路机头车一辆。

四十、执事全班：

1、金执事三组：

第一组：金立爪、金钺斧、金天镡、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一对；

第二组：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

第三组：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

2、汉旗子 8 对：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各一对。

3、红地绣花幡伞、蓝地绣花幡伞、白地绣花幡伞、青地绣花幡伞、紫地绣花幡伞，各 6 把，共 30 把。

四十一、普益习艺所送的盛公头像一尊。8 人彩衣抬舁而行。

四十二、天津锣鼓一班。

四十三、“掬搁”4 座。用壮年 4 名，俱身穿铁马甲，头顶木板，上立幼童 2 人，扮成戏剧。

四十四、细乐一班：4 唢呐、4 海笛、4 笙、4 云锣、4 水镲、4 手鼓。

四十五、铁路大臣亲兵百余名列队相送。

四十六、彩马、花牌楼、珠车、轩轿多种。

- 四十七、细乐、军乐各一班。
- 四十八、彩汽车一辆。除驾驶楼外，车窗一律掩以青纱。
- 四十九、上海白云观道士 13 人，俱头戴混元巾，身穿蓝袍，外加五彩绣花擎衣，每色一对。纷击法器步送。
- 五十、各界所送的挽联、挽幛数百轴，且多为冲天大幅。
- 五十一、留云寺僧众 200 余位，搭衣执香相送。
- 五十二、玉佛寺僧众 100 位，搭衣纷击法器相送。
- 五十三、上海孤儿院学生百余人，俱身穿白制服、白鞋袜，列队相送。
- 五十四、细乐一班。
- 五十五、花马车一辆。对儿白马身披素彩锦驾辕。由身穿孝衣 2 夫坐于驾驶座上执鞭策马。
- 五十六、江宁公司等单位赠送的花亭 4 座，每座均为 8 人抬舁而行。
- 五十七、三星纱厂等单位赠送的奠幛数十幅。由穿孝的执事夫擎举前行。
- 五十八、军乐团一班。
- 五十九、花伞、花旗若干把，由身穿绿驾衣的执事夫擎举而行。
- 六十、各工厂所送的纪念伞等数十把。由各厂工役穿孝擎举而行。
- 六十一、灵花、什锦花、銮驾花、逍遥伞各数十对。由穿绿驾衣的执事夫擎举而行。
- 六十二、“八拍集”音乐全班。
- 六十三、花圈龙亭、花清道、花匾额、花奠幛、花龙船、花四兽、花人力车、花大轿、花鹤鹿等件各若干。均由穿绿驾衣的执事夫擎举或牵引、抬舁而行。
- 六十四、闸北惠儿院师生全体列队相送。
- 六十五、新素缎制服军乐一班。
- 六十六、龙华寺僧众 200 余人，搭衣持香相送。
- 六十七、纸扎彩亭四座，内供纸鼎、福寿字等类。每座 4 人抬。
- 六十八、广东锣鼓一班。
- 六十九、中国救济妇孺会数十人列队相送。
- 七十、军乐队 32 名。
- 六十一、留义男女孤儿院全体执香相送。
- 七十二、素对儿马 8 匹；素顶马一骑；卫队百人。
- 七十三、茅山道院道士约数十人，穿道服步行相送。
- 七十四、上海贫儿院乐队 24 名。
- 七十五、学生 58 人，肩背花圈随送。
- 七十六、8 人抬绿呢领魂轿一乘，内供盛氏主牌。
- 七十七、素衔牌及鸡亭一座。
- 七十八、身穿绣花红、白衫的彩童 16 名，或执九节灯，或执提炉，或捧香烛。
- 七十九、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及童子军约三四百人列队相送。
- 八十、环球中国学生会学生数十人步送。
- 八十一、送殡的诸亲族及生前友好等数百人执香步送。
- 八十二、功布，较寻常者为大（枢行时用以导路，用白布长 3 尺，悬于饰有金钩龙凤的白蜡杆子上，执以导枢，遇道路倾欹，视布低昂。使异者有所准备。功，谓制布之功细密，丧制所用皆粗布，惟此独色白工细，取其易

见故曰功布)。

八十三、军乐全班，由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所送。

八十四、淞沪警察厅骑士巡逻队十余人，及新闻捕房中西包保护送。

八十五、盛氏灵柩。灵柩上扣着一卷红缎绣花的大官罩，上缀合金顶。杠罩是由天津鼓楼北广春杠局雇来。杠夫计 64 名，俱为新驾衣、新靴帽。阵容齐整。

八十六、送殡的马车、暖轿肩舆百余，俱扎素彩，缓缓而行。

沿途各界所设的路祭棚、路祭桌、茶桌，无计其数，每到一处，必由主办单位或主办人祭奠一番，故行抵招商码头，夜幕即已降临了。

据说，若站于一处观礼，从头至尾须五个小时之久。盛家为了办好这一大典不惜破费了现大洋（银币）30 万元之巨，其奢靡可谓登峰造极矣！时人余槐青《海上竹枝词》反映了这一实况：

“丧仪绚烂满长街，古今中西一例排。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诗的原注谓：“前清邮政大臣盛杏芬（盛宣怀的字）出丧，远道来观丧仪之盛，为前所未有。”

据当年上海各大报刊所载，各马路看出丧者，争先恐后，互不相让，颇有因拥挤而受伤，甚至危及性命者。例如：四马路万家春门前，有位年龄二十余岁的怀孕妇女，被众人挤倒于地，顿然不醒人事，由其夫大声呼救，始见被数人抬起往东而去。蕙芳门口有一五六岁的小孩，竟被众人挤倒后踩死。新世界左近也轧坏浦东乡老二人，小孩一人，后经旁人呼救，始得出险。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有衣服华丽之中年妇女二人，被众人挤落于码头底下，后经旁人拖起，虽未殃及性命，但已满身污泥浊水，形极狼狈。至于呼妻觅子，寻哥唤弟，以及失落鞋帽、财物者，多至不可胜计。据说，市政当局于大殡过后，出动了警车、救护车多辆沿殡列所经过的马路巡行，以图善后。

附录

郁慕侠《上海鳞爪竹枝词续集·大出葬》

社会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一朝伸腿断气，撒手西归以后，必有“大出葬”的举行。排场越阔，越能哄动一时，竟会传播到几百里以外的外埠民众，不远而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看大出葬”、“看大出葬”。等到举殡那天，民众们如疯狂般地丢了正事不干，专程来看大出葬。几条经过的马路上，人山人海，前推后拥，挤得水泄不通，沿马路的几片旅馆、菜馆、茶馆的阳台上，都设好了优等座位，做一回临时的好生意。从前的盛杏荪和朱葆三，都举行过大出丧，民众现在想起来，还啧啧称羨。前年黄楚九故世后，一般瞧热闹的民众，又欣欣他说道：“我们又有大出丧可看了。”后来因为债务关系，黄楚九的大出葬，就此无形取消，民众方面，也大大地扫兴。大户人家有了钱，有了名，一朝死了人，场面就阔，非举行大出葬不足以显其阔绰，以示其盛风，糜费虽巨，满不在乎。他们有的是钱，挥霍挥霍，无损毫末，更可得到庸失俗子的激赏，也乐得大出而特出了。

主要参考资料

《盛宣怀出殡纪盛》。上海《民国日报》，1917-11-19。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第436-439页。

先厝天津卫 后安土宫山 ——黎元洪国葬记略

黎元洪自 1912 年至 1922 年的十年间，曾经荣任三届副总统，两届大总统。从表面上看来，他从清末的协统、都督到民国总统，似乎青云直上，但实际上始终未掌实权，一生蹉跎坎坷，几起几落，在北洋“群雄”角逐中，是个失败者。1923 年，不得不悻悻东渡日本，歇息倦体。半年后，又悄无声息地回到天津，隐居张园，不再过问政治，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茶余饭后，常伴禽鸟为乐，泼墨写画，以解苦闷之情。

黎氏晚年一直患有脑病，血压偏高。1928 年 5 月 28 日，看完赛马回到家中顿感心胸憋闷，脑病复发，长时间昏迷不醒，医治无效，于 6 月 3 日晚上 10 时半，因脑溢血，去世于天津英租界 10 号寓所。享年 65 岁。

次日天津《大公报》第二版对此即作了简短的报道，说黎元洪昨夜逝世。定 6 月 4 日下午 2 时大殓，一切丧仪，遵嘱从简。并刊登了一幅黎氏身穿燕尾大礼服，白衬衣，颈系黑色领花的半身遗像。

半个月后，其遗族亦于开吊前，在报刊上发出讣闻：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三日亥时，前任大总统显考宋卿公疾终津寓。正寝。享寿六十五岁。绍基侍奉在侧，亲视含殓，即日成服。谨择于七月十九日，奉移本埠特别一区容安别墅。卜葬有期再行奉告。恐讣未周，特别登报讣闻

六

谨讣七月十七受吊

八

基

孤子黎绍基泣血稽顙

业

芬

孤女黎绍泣血稽顙

芳

齐衰期服孙昌复泣稽首

黎氏死后，他的遗族以及旧日属僚，都主张“暂”按民国元首大总统的身份治丧，并为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请功，予以国葬。

黎氏被殓入一具上等金丝楠木四独板的重材，而且涂了黑色的褪光漆。殓服用的是民国大总统的衣冠——天蓝色的陆军大元帅礼服，袖头、袖口用金线绣满了“嘉禾”，佩着宝星垂金大元帅肩章，胸前挂着各式勋章。身旁放着白纓元帅帽。以便供人瞻仰。

殓后，在私邸停柩 47 日。

独出心裁的“平民式总统殡”

7 月 19 日，为黎氏灵柩奉移之期。其殡仪是经过其旧日属僚精心设计的，反映“推翻专制”，突出民国改无的特点。因此，不用旧式仪仗执事、杠、罩，来个独出心裁的“平民式总统殡”。此为当年津门一大“盛事”。

黎氏大殓的另一特点就是租界当局破例批准带有武装卫队的殓列通过。此为一“破灭荒”之“大事”。

午前8时，黎氏大殓由英租界私邸出发，全列共分为12组，统一由治丧办庶务处指挥。其路线是：从英租界19号路起，经过法租界31号路，日本租界芙蓉街，转福岛街、旭街，再经法、英两租界，至特一区容安别墅殡宫停灵暂厝。全部路程约七八华里。

殓列所经之处，商店铺户、民居住宅前均挤满了中外的观礼者，甚至临街楼房阳台、屋顶，均成了观众的看台。日租界旭街和法租界梨栈一带则自上午8时起，群众即逐渐聚齐，仁立于烈日薰蒸之中，欲一睹此“平民式”的总统殓仪。

租界当局为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临时加派了大批巡捕，于各要路口值勤站岗，指挥一切。

黎氏的丧仪，虽说是“遵嘱从简”，实际上并非如此。据不完全的统计，所有的执事、鼓乐、僧众、送殓执绋者约有1万余人。所有被雇来的执事夫虽没有穿传统的彩绣驾衣，但一律身穿新做的白布褂，头戴白布帽。表示“维新”。当时，报刊上赞美此举说“一洗社会之积习，殊足为社会之模范”。

殓列势派大矣！警备司令部特派了数百名士兵组成了全副武装的卫队。一律按规定倒背枪支（枪口朝上），表示哀敬。殓列各组均有大幅白绫旗一面，上书第几组的编号，中间有一蓝色的“黎”字。盖仿旧时军中马前开道的旗帜。其殓列的排列为：

第一组

国旗两面，高约三丈，迎风招展。旗杆顶上金矛煜耀，纓旄鲜明，殊为壮观。两旁各有护旗者二。皆崭新军装，正步前进。

由保安队48人组成的大型军乐团高奏哀乐。绣有“黎”字的大幅丧旗走在中间。所有队员均着新军装，胸前佩白花，左臂缠黑纱，乐器上也披了黑纱，表示戴孝。

次为警备司令部的马队两连，骑兵均全副武装，臂缠黑纱，缓步而行。

第二组

军乐团一班，高奏哀乐前引。

保安队组成的大型武装仪仗队。

第三组

慈善院音乐队一班。

保安队共两大队（全副武装）。

第四组

各方赠的祭文，均镶入镜框，置于素彩亭内，雇人（穿孝）抬舁而行。第一座为国民政府祭文。后面依次为：徐士昌、段祺瑞、王士珍、章太炎、高凌蔚、王正廷、龚心湛、周学熙、傅作义、陆荣廷、齐耀珊琳、田中玉、刘承恩、曹汝霖、唐克明、凌福彭、陈锦涛、汤漪、吴景濂、陈嘉谟、何佩瑢、项骧、杨寿枏、刘宗铎、聂宪藩、翟瀛、中兴煤矿公司、朱启铃、李徽五、李钦、言敦源、何东、释普仁、天津红字分会、蒋作宾等，旅津湖北同乡王泳生、旅沪同乡代表胡人俊、天津新闻界、唐滋镇、六河煤矿公司、天津佛教居士林等祭文，共抬44亭。

祭文亭后为各界所送的挽联，约200余幅。皆以竹竿挑起，走成双行。其中不乏过誉之佳作。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挽联曰：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寇岂能于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第五组

军乐团一班，奏哀乐。

各界所送的挽联 200 余幅，均挑之于高竿，配幅而行。

第六组

各界所送的挽联、花圈、花篮、冲天大幅的锦旗、锦标。

第七组

中国军乐队一班。

素扎大彩亭一座，内悬“策勋表”。

素扎大彩亭一座（仿旧更衣亭），内放总统大礼眼、海陆军大元帅服、白纓元帅帽等。

素扎大彩亭一座（仿旧四宝亭），内放总统生前所用的笔、墨、纸、砚、印章等文具。每座素彩亭皆为 8 人（穿孝）抬舁而行。

第八组

男童 24 名（穿孝）左手以木棒提铜香炉一尊，内焚檀香。男童 32 名（穿孝）身挎红漆木盘，盘内放铜香炉一尊、檀香丁、檀香粉各一盘。边走边焚檀香。

平、津两市的大德高僧数十名，手执法器，沿途逢路祭棚时，啐经品咒，超度亡魂。

第九组

清音锣鼓细乐队一班，以笙、管、笛、堂鼓、小锣、九音锣等民族乐器吹奏哀乐。

海、陆军军旗海、陆军大元帅旗（俱高丈余，一兵执旗，二兵护旗）。侍卫马队。

侍卫步队，皆为前总统府侍卫武官，手执长戟，戟上蒙以青纱，以表志哀。

黎氏遗像车，此系由北平运来特制的大礼车，车式如轿，车厢朱红色，敞帘，内供黎氏大幅海、陆军戎装遗像。该车由对儿马驾辕，前有顶马，后有跟骡各 4 匹，俱为白色。

第十组

民间西乐队 48 名奏哀乐。

学生千余人。多为黎氏生前捐款兴办的学校中之师生。

各界来宾数百人。

第十一组

男童 24 名（穿孝）各以木棒提铜香炉一尊，内焚檀香。

男童 18 名，各执黄缎彩绣的罗汉幡一柄。

平市雍和宫的喇嘛 64 人，俱黄袍、黄帽，手执长号，肩扛大鼓，另有海螺号、金口角、唢呐、海笛等轻重法器。吹奏西番乐。

平、津两地寺院的大德高僧 48 人（以应弥陀如来四十八愿之数）。俱身穿杏黄袍，加披红缎金线刺绣福田纹袈裟，以铛、钹、鼓素打“七星”。

第十二组

孝子黎绍基左手执引魂幡；黎绍业双手捧灵牌。皆麻衣草履，哭声尽哀。均为 2 人搀行。

黎氏旧日属僚千余人，俱腰扎白布孝带，头戴白孝帽，分成四行执绋缓缓而行。

黎氏遗柩不用传统的杠、罩、杠夫抬异，而载之以彩饰的汽车上。灵柩上覆以国旗，满堆鲜花。车的四周则用木枪交叉成栏杆形。显属独出心裁的杰作。

灵车之后，共有四轮马车 60 余辆，前 11 辆为黎氏家族之女眷，黎本危夫人乘第 4 辆车，哭之甚哀。其女公子绍芬、绍芳乘第 5 辆车，亦痛哭不止，两眼红肿，第 12 辆之后，通为送殡亲友的女眷所乘坐。最后为红十字会的救护车。

沿街设有路祭棚、路祭桌、茶桌多处。正午 12 点始抵特区容安别墅。孝子请灵入厝后，摆上祭筵，首由喇嘛、和尚分别在灵前诵经品咒；后由家族及旧日属僚依次行礼。至下午 2 时始告礼成。

落叶归根到旧乡——七年后的国葬大典

黎元洪的祖籍本为安徽，但从他祖父这辈开始，即定居于湖北的武昌汉阳，黎氏于清同治三年（1864 年）十月十九日出生在汉阳，辛亥之役，又发迹于武昌。因此，他死后仍要归葬于武昌旧乡。于是在民国 22 年（1933 年）4 月，由其两子绍基、绍业等从津门扶柩回鄂，并择定武昌卓刀泉土官山为茔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下同）认为黎氏“首举义旗，创造民国”，决定为他举行国葬。事先国民政府即饬令湖北省政府，组成典礼办事处，筹备一切。

民国 24 年（1935 年）11 月 24 日是黎氏举行国葬大典的日子。上午 8 时，各界参加送葬的来宾，齐集武昌汉阳门外，用事先准备好的素彩汽车将黎氏灵柩运至洪山。参加这一盛典的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李书城，行政院的代表贾士毅，考试院的代表程其保，司法院的代表史延程，内政部的代表孟广澎，审计部的代表任应钟，海军部的代表陈武民，交通部的代表高廷梓，蒙藏会的代表萧颺曾，中赈会的代表贺衡夫，湘政府主席何健的代表胡燮槐，沈鸿烈的代表沈肇年，胡宗铎的代表严敬，马鸿逵的代表童宾秋，以及英、日、法、美等各国驻汉领事，各团体、学校、伤兵、民众等共达 5 万余人，蔚为大观。

礼堂设于洪山宝通寺停灵处。堂内布置极为庄严，素彩灵龕的正面高悬黎氏大幅遗像，灵龕上端挂着林森的大匾，上题“民国元勋”四字。供案上焚香秉烛。四壁高悬挽联约有数千幅之多。

居正的挽联是：

“奠定河山，出为霖雨；
炳灵江汉，上应星辰。”

孔祥熙的挽联是：

“秉三民策略，崛起湖湘，运会启金瓯，牧野鹰扬光大业；
集五族衣冠，奉安丰沛，风云护华表，辽天鹤去有遗思。”

何应钦的挽联是：

“首义拥旌旄，墓路肇兴溯开国；
归葬安体魄，漆灯不灭识佳城。”

李宗仁的挽联是：

“党国重酬庸，汉水楚山，遥见元勋隆奠礼；
馨香贻祀典，报功崇德，怆怀先烈动哀思。”

何成浚的挽联是：

“生有来，逝有为，江汉一呼，顿还故国；
薨于津，葬于鄂，墓嗣千载，合配中山。”

陈继承的挽联是：

“仗剑扫胡尘，光我中华，光垂宇宙；
单刀临胜地，归公骸骨，气壮山河。”

上午 10 时，各界送葬人员齐集洪山举行公祭。军乐团高奏哀乐，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李书城主祭，宣读祭文云：

“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湖北省政府委员李书城，敬荐馨香，致祭于黎前大总统之灵曰：呜呼！两仪正气，海岳英云。郁数十年，闳杰挺生。洸洸江汉，南国之纪。湛惟我公，应运而起。雷雨艰屯，风云翁集。汉帜斯张，百城风霖。奉迎先觉，大业不居。荆襄坐镇，遐迩瞻仰。国位螭蟠，元黄再黜。执德不回，允膺天禄。惟公德重，险夷一致。拨乱反正，卒申大义。再执魁柄，宽裕温柔。视民如伤，仁泽滂流。

轩鼎升遐，于兹八祀。中外归仁，讴恩未已。范金铸像，坠泪遗碑。

庇民扶国，陟降在兹。业昭炎黄，勋重民族。垂德报功，典宜优渥。

楚云蓊郁，汉树青葱。佳城式奠，今肉何穹。尚飨！”

祭毕，鸣礼炮 23 响。随后，即移灵至卓刀泉土官山安葬。执紼人员分为 8 个行列，浩浩荡荡向墓地进发。不料，天公不作美，中途风雨交加，但秩序井然不乱。下午 3 时半，黎氏灵柩入圹，在哀乐声中，鸣礼炮 101 响。全体执紼人员行三鞠躬礼后，在哀乐声中依次告退，至此国葬典礼告成。

是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一天，以志哀悼。

黎氏畜孔雀二，其一已于去年黎病时死去，其二于前日清晨无端死去。遗族以为异事。

主要参考资料

《黎元洪病逝津寓》。天津《大公报》，1928-6-4。第二版。

《黎元洪出殡记》。天津《大公报》，1928-7-20。第二版。

《黎灵南下移往湖北》。天津《大公报》，1933-4-8。第二版。

《黎故总统国葬记》。《北平晨报》，1935-11-28。第五版。

身死先荣而后哀虎头蛇尾悄声埋 ——段祺瑞南丧北葬大事记

死于胃溃疡

民国 22 年（1933 年）段祺瑞应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下同）的邀请，从天津移居上海。民国 24 年（1935 年）被任命为国府委员，但没有就职。

段祺瑞 22 年前曾患胃溃疡症，民国 25 年（1936 年）秋，又患腹泻，经国医丁济万诊治，病渐痊愈。未料至 10 月初，段氏因“忧虑国事”病复加重，乃请英医白菜生诊治，旋入宏恩医院，照 X 光，发觉胃溃疡症复发，且已加重。仍由原主治医师白菜生继续诊治，除服药外，并加注射，情况尚好，每日仍能坐起阅报。后见“国事紧张”，段以忧虑而病情越发沉重。迨至 10 月 31 日又咳血、泻血，至晚间 9 时半，即不能言语，延至 2 日晚 8 时 40 分，在霞飞路寓邸逝世。其子宏业，侄宏纲等，均服侍在侧。李思浩、吴光新、梁鸿志、屈映光、曾毓隽、龚心湛等闻耗，均前往吊唁，并襄理丧务。

段氏遗妻一，妾二，子一均在沪。

次日（11 月 3 日），京、沪、平等各大城市报刊，均于要闻版发表了这一消息，并刊登了段氏的西装照，以及民国 22 年（1933 年）段氏南下抵沪时的摄影，其人已老态龙钟，诚是“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已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了《北平晨报》在报导这项消息时，附了南京中央社发出的段氏“略历”：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少业北平武备学堂，光绪间，赴德学陆军，年余归国，随袁世凯治军小站。袁抚鲁，段续统武卫军，袁任北洋大臣，段为参谋长。宣统元年，任第六镇统制官。辛亥革命，任第二军军统，率军至汉，旋电清宣统逊位。民元，任陆军总长，二年，代理国务总理，三年，再任陆长，四年秋，袁谋窃国，筹安会成立，称病辞职。袁死，黎元洪任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六年，主对德参战最力，为黎免职。复辟事起，在马厂誓师，讨逆。七年三月，再任国务总理。九年，直皖战败居津。

十三年，直奉战后，复起为临时执政，十五年下野，自此居津，不问时事。二十二年，由津南下，息影沪滨。二十余年前，段曾患胃溃疡症，时发时作，迄未断根，兹因旧病复发，以致不起，享年七十三岁。”

以僧装入殓

段氏死后 4 天才入殓（北京没有这样的风俗）。因段氏生前笃信佛教，其后人遵嘱，于 11 月 5 日上午，以僧衣、僧帽、僧鞋，作为给他送终的装裹（据说，还加披了红底金线绣着福田纹的袈裟，不知确否），总之，是一套佛子朝“大雷音寺”的装束。按当时，沪上的风俗，遗体放入棺内，算是“小殓”（初殓），必须等到封上棺盖，举行了殓礼，才算“大殓”。段氏的大殓仪式是在当日下午 2 时举行的，相当隆重。大殓前，段氏夫人，及长子宏业，次子宏范，女儿五人，长侄宏纲，还有如夫人及孙昌世、昌岱、昌华，孙女媚、珏、珍，侄宏程、宏纶、宏炳，曾孙希曾，刚于昨晨 7 时 40 分乘平

沪通车，由津赶到。全体家属亲视含殓。礼用佛教仪式，孝子、孝孙等匍匐灵前，叩首如仪，上祭菜，焚冥纸、往生钱等。然后，由上海龙华寺高僧围绕棺柩念经转咒，给段氏安魂，僧众齐举《西方赞》：“赞礼西方，极乐清凉，莲池九品华香，宝树成行，常闻天乐铿锵，阿弥陀佛大放慈光……”下接《往生咒》：“天灵地灵，普化万灵。通运三界，佛宝流通，上奉宇宙，下至幽冥……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再转《七佛灭罪真言》。念罢，乃由孝子等亲手插上“子盖”，然后再由杠房工人将大盖封上。

殓罢，于是一干吊唁人员齐入灵堂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蒋介石的代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的代表、中委褚民谊；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外交部部长张群；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代表孔公子令侃；中央秘书处处长谭光；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中委李烈钧、杨庶堪、薛笃弼、张知本；唐绍仪的代表其子唐榴；铁道部次长曾镛甫；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保安总团团团长吉章简；外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周珏；两路局局长黄伯樵；上海市府专员王长春；警备司令部秘书王之南；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的代表王绍贤；以及知名人士杜月笙、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俞佐庭、许修直、郭顺、褚辅成、叶恭绰、袁良、屈映光、冯耿光、白宝山、姚琮、周作民、何竟武、江庸、卢学溥、吴蕴斋、姬觉弥、罗迦陵；段氏生前旧友冀察政委会经济委员会主席李思浩、龚心湛、吴光新、章佩乙；并段宅亲友等，凡 200 余人。还有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的代表该国驻沪总领事若杉；日使馆海军武官；辅佐武官；及日侨名流船津中田等外宾多人。行礼时，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乐团，上海市公安局全班军乐团，还有传统的民族乐队（吹班）分别演奏哀乐。共约 45 分钟礼成。

段氏大殓之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一日，以志哀悼。

国民政府决议国葬段祺瑞

南京国民政府于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召开第 25 次常会。到会的有中委叶楚傖、冯玉祥、丁惟汾、周启刚、张厉生、方治、居正、张继等 20 余人。由冯玉祥担任主席，主持会议。讨论了蒋介石、冯玉祥、于佑任、居正、丁惟汾各委员所提出的关于段芝泉先生赞成共和，再造民国，遵尔逝世，宜报哀崇，拟请予以国葬案。当即表决通过，做出决议。

国民政府于当日发表关于国葬段祺瑞的命令。全文如下：

“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刀维正义，节概凛然。

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功硕望，薄海同钦。兹闻在沪溘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予以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此令！”

暂厝沪寓

国葬具体日期及实施方案尚未确定，段氏灵柩暂厝沪寓。

段宅大门高搭素彩牌楼一座，入内为来宾签到处、丧礼收受处。花园内

高搭天棚，内设官座，为来宾休息所，预备素席数十桌，进行招待。棚内所有治丧人员，上至管事、提调、知宾，下至仆役，均一律身穿大白孝袍，就是外交部长张群参加祭礼时，也在便服外边罩了白孝衣，因为张群在当年也是受业于段氏，因此不能不以学生的身份出现。

灵堂上悬挂着巨幅彩绣灵幔，富丽堂皇。上端悬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大匾：“元老徽猷”。中间竖立着黑色宽边雕花的大镜框，内放段氏晚年半身照片一幅，像前供着段氏遗嘱。灵堂四壁挂满了政府要员及在野名流的挽联。例如：

王揖唐挽云：

一代完人，盖自任天下之重如此；
万方多难，是知其不可而轻耄歛。

冯玉祥挽云：

自发乡人，空余涕泪；
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李烈钧挽云：

硕德久为天下望；
大雄终合佛家风。

张知本挽云：

喻凜防川，言犹在耳；
死于忧国，忠岂忘心。

薛笃弼挽云：

欧陆参战，俾国际地位之提高，眷怀前徽人已渺；
马厂誓师，使共和肇基焉底定，言念后死责方殷。尤列挽云：
论功祇马厂誓师，足见勋名隆万古；
怀旧则鸡坛 萦梦，顿令风雨洒千行。

龚心湛挽云：

了世间生死而来，形没性存，若悯群伦仍普渡；
系天下安危甚巨，人亡国瘁，悲深薄海况亲知。

陈调元挽云：

项城云殂，中山不朽，慨共和手创，实历百艰，地下若相逢，应叹先生老矣；

保阳开业，新镇谈兵，记方略亲承，早经三沐，斯人庸可作，更为国家痛之。

褚辅成挽云：

一身系天下安危，犹忆鲸海兴波，正洋国南迁，顿 敌纵弭隐患；
百里感国土日蹙，每念马厂振旅，又胡氛北炽，削平大难丧元勋。

此外，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驻沪总领事若杉要，海军武官佐藤修，及该国驻英大使吉田茂，贵族院议员坂田利八郎等亦均送了花圈。

各方唁电亦如雪片般地飞往段宅。

蒋介石自洛阳致电云“闻芝老夫子长逝，国伤耆贤，世丧坊表，闻耗痛悼，宁唯私恻，敬电致唁，节哀为盼。”并电其子段宏业云：“上海吴市长译转段骏良先生礼鉴：冬（二日）电敬悉，昨发唁电，谅达礼次，老夫子令德考终，薄海永悼，中正行役在外，不克亲临视殓，除托铁城兄代表致唁外，并已呈请政府优议追恤，以示崇报。我兄孝思笃至，遭此大故，务望节哀自

重，勉承公志为盼。”同时，特派军委会副官处长丁琮赴沪襄办丧事，并致赙仪两万元。

余汉谋四日唁电云：“阅报惊悉尊公不讳，悼愴至深，大星之殒，青史千秋，伏望将敬胜哀，饰终协礼，谨慰致孝，临电忉驰……”吴佩孚六日唁电云：“顷读报载，骇悉夫子于二日仙逝，追念师门恩义，感涕难忘，遥望海天，悲痛何已。伏念夫子丰功伟业，勋在国家，林下优游，名垂竹帛，在天有灵，当无遗憾。吾兄大孝性成，哀毁可想，古者君子居丧，惟贵中礼，尚望节哀顺变，以主大事，是为至禱，专唁大孝，即希保爱。”

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亦于三日致唁电，复派魏宗瀚赴沪，代表致祭。并致赙仪1万元。

此外，张学良、孔祥熙、冯玉祥、居正、程潜等均纷纷来电慰唁。

北平治丧处成立 订出迎榇方案

本来段氏死后，蒋介石拨款20万元，在黄山购置了墓地，准备以国葬的名义，将段氏安葬于此，但他的长子段宏业认为乃父创业发迹，一世功名，均在“京师”，所以决定扶柩北上，在平郊另卜风水宝地。故北平方面便决定成立“段前执政平市治丧处”，并举行会议讨论制定了迎榇、移灵、停灵等各项事宜。

故“段前执政北平治丧处筹备处常务干事会”，于11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首次会议，拟定关于迎榇、移灵一切办法及应用礼节后，于次日下午3时，仍在怀仁堂，召开筹备全体干事会成立会。到会的常务干事有魏宗瀚、陆锦、师景云、干事贾德耀、秦德纯、冷家骥、邹泉芬、魏子丹、陈继淹（钱宗超代）、石友三、吕钧、管翼贤、金达志、宋抱一、凌昌炎等40余人。由贾德耀主持会议。首由魏宗瀚报告筹备处成立经过，及前日常务干事拟定的迎榇、移灵办法，交大会研究。他说，治丧处的工作可分三个时期：灵柩到平，奉移至安灵处为第一时期；举行追悼为第二个时期；国葬为第三时期。初步方案现提交大会审议，现在主要讨论第一时期，迎榇应办事项。旋即展开讨论。最后决议：

（一）、治丧处组织，决定分设六组，并推定人选。文牒组主任王潜刚；会计组主任孙泽生；招待组主任高胜岳；警备组主任陈继淹；庶务组主任贾干卿；宣传组主任管翼贤。各组分工合作，各负其责。

（二）、通过常务干事会所拟迎榇、移灵办法提案。

（三）、关于追悼会办法及国葬礼节，交由常务干事会参照执政时代办理孙中山先生治丧事务情形，及国葬典礼，分别修订。

（四）、参加执紼人数，限定400人，分四班，依次参加。各界机关团体参加人数，由治丧处决定，参加人位由各界自行推定。

（五）、服制：甲种：段公亲友、学生，一律孝服，由治丧处代备孝服500套。乙种：普通礼服，蓝袍青马褂，左臂佩黑纱，军警刀靶上挂黑纱。

会议临时动议：

（一）、礼炮：拟定灵榇下火车鸣礼炮24发；出西直门再鸣24发；至卧佛寺 停厝地点时再鸣33发。国葬时另定之。

（二）、灵柩祇入宋委员长祭棚公祭，其它各棚，仅设段公遗像。

（三）、迎灵时，各法团及亲友，均在灵车对面月台上恭迎；各机关人

员，在靠近灵车月台恭迎。

(四)、公祭用素席，行三鞠躬礼。

(五)、加聘周养庵为本处干事。

该会议还通过了《段前执政北平治丧筹备处办事规程》以及《段前执政北平治丧筹备处拟定灵柩至平及移灵至卧佛寺停灵一切筹办事项（具体方案）》两份文件。兹录于后：

《段前执政北平治丧筹备处办事规程》：

(一)、凡关于治丧一切事宜，除中央政府特设国葬筹备处办理事项外，均由本治丧筹备处（下称本处）负责筹备。

(二)、本处筹备事宜，经全体干事决议后，呈请冀察政委会委员长核准执行。但处内普通事件，常务干事得负责处理之。

惟须随时分别报告委员长及各干事。

(三)、本处如遇重要事项，须全体干事会议时，由常务干事通知之。

(四)、本处各处主任，商承常务干事处理各该组一切事务。

(五)、对外公文，以本处名义行之。

(六)、如有未尽事宜，随时增添修正之。

[附则]治丧筹备处，用款在三百元以下者，各主任负责开支。三百元以上至一千元，常务干事负责开支。一千元以上至五千元，由全体干事会议决定开支。五千元以上随时呈请委员长，批准开支。《段前执政北平治丧筹备处拟定灵柩至平及移灵至卧佛寺停灵一切筹办事项（初步计划）》：

甲、东车站迎灵：

(一)、东车站附城墙搭祭棚一座。灵柩下车后，委员长、政委会、绥靖公署、冀察两省府、平津两市府，二十九军重要人员，在此公祭。

(二)、车站迎灵时，各机关、各团体暨亲友迎接，排列地位秩序，由警卫组预置标志示明，以期整肃。

(三)、东车站祭棚迤西，设临时招待处，所有迎灵各机关团体，及亲友等赴站迎灵者，先到该处签名，并领取臂纱与佩花，以便入站。

(四)、招待组预备人员，在东站票房外面，专任招待并指导各部分入站排列地段。

(五)、车站迎灵时之警卫，及迎灵出站次序，与来宾车辆停置地点，均由警卫组负责指挥。

(六)、灵车到平之日，全市下半旗一日，以志哀悼。

(七)、灵车到站，按照国葬典礼之规定，鸣炮迎灵，以表致敬。

(八)、灵车到站举行迎灵礼毕，所有来宾均由招待、警务两组，引导至预定送殡行列地点，以待起灵恭送。

(九)、灵柩下车，先用小杠请灵至站外祭棚，公祭后换大杠，起灵进发。

乙、东车站公祭后起灵：

(一)、灵前仪仗设备及排列如下：

1、仪仗骑兵一连；

2、军乐队一部（公安局）；

3、铭旌亭；

4、步兵一团（团旗团长指挥）；5、喇嘛经四十八众；

6、影亭；

- 7、仪仗保安队一连；
- 8、军乐队一部（绥靖公署）；
- 9、高僧四十八众；
- 10、神主轿；
- 11、送殡来宾；
- 12、执紼人；
- 13、孝子帏；
- 14、灵柩八十人杠；
- 15、孝眷轿二十一顶；
- 16、孝眷马车二十一辆。

（二）、经过路线如下：

由东车站进正阳门，经中华门、天安门前，西转经西单牌楼、西四牌楼、新街口，西转经西直门大街，出西直门，经高亮桥至广通寺 暂停。次晨由广通寺起灵，经海淀、青龙桥，直达卧佛寺安灵。

（三）、搭设素彩牌坊三座，地点如下：

- 1、前门东车站外；
- 2、西单牌楼附近；
- 3、新街口附近；

（四）、各机关团体搭设祭棚地点如下：

- 1、政委会：东车站；
- 2、绥靖公署：中华门外；
- 3、市政府：天安门；
- 4、专委会：西三座门；
- 5、二十九军：新华门；
- 6、法院：府右街南口；
- 7、新闻界：西长安街；
- 8、各慈善团体：西单堂子胡同西口；
- 9、北宁、平汉、平绥三路局：缸瓦市；
- 10、市商会：西四牌楼；
- 11、银行公会：护国寺街西口；
- 12、学界：航空暑街西口；
- 13、安徽旅平同乡会：新街口；
- 14、陆军各学校同学：虹桥（东北大学门前）；

（五）、西直门外广通寺前，搭设暂行停灵之祭棚一座。

（六）、因西直门外暂行停灵一夜，拟借广通寺作孝眷住宿之所。由东车站起灵至卧佛寺，家属所用之食物，均由本处代备。

（七）、次日午后三时，在卧佛寺安灵。

（八）、卧佛寺孝眷住所由筹备处设备。

丙、礼节：

- （一）、灵车进站，军乐起奏哀乐，同时全体肃立迎灵。仪仗队同。
- （二）、奠祭时一律用三鞠躬礼。
- （三）、仪仗骑兵背枪，枪口朝下；步兵背枪，枪口倾向前下。
- （四）、其余一切细目，另行规定。

北平治丧处发出关于灵前仪仗及公祭程序的公告

段氏灵柩于12月7日由沪起程北运。“段前执政北平治丧处”于6日即接到沪治丧处及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的代表赵蔚如的两份电报，谓段氏灵车准予9日下午6时抵津，将在西站停留一夜，次晨10时开入总站，接受天津各界的公祭。11日上午9时45分，开抵北平前门东站。平市治丧处当即电复沪处知照。并加聘天津各界名流20余人为招待干事。招待组为确定各方面招待各项事宜，再次召开全体干事会议。

旅平安徽同乡追悼段前执政筹备处，亦于6日由同乡追悼筹委会，在后孙公园该省会馆正式组织成立，推贾干卿为主任。内分文牒、总务、交际三组，各组负责人员均推定。订7日下午2时开会，商讨进行办法。用费已筹妥，并即加聘旅平各界皖省闻人为筹委。接洽事宜概由该省同乡会负责。

为使迎柩仪式更加隆重，北平治丧处就灵前仪仗及公祭程序，经多次复议，业已做出最后决定，并向各界发出公告。

段枢抵东车站公祭后起灵，关于灵前仪仗及排列顺序规定如下：

第一日：由东车站至广通寺（一）、仪仗骑兵一连（骑兵司令部）；

（二）、军乐队一部（平市公安局）；

（三）、铭旌亭（32抬）；

（四）、仪仗步兵一团，团旗团长指挥（第110旅）；

（五）、松活：松狮、松亭、松鹤、松鹿；

（六）、喇嘛经54众；

（七）、仪仗宪兵一中队（宪兵司令部）；

（八）、影亭8抬；

（九）、仪仗保安队一中队（公安局）；

（十）、军乐队一部（绥靖公署）；

（十一）、各寺院住持；

（十二）、高僧53众；

（十三）、四季花盆（纸活）；

（十四）、神主轿一乘8人抬；

（十五）、送殡来宾；

（十六）、执紼人；

（十七）、孝子帟；

（十八）、灵柩80人大杠；（十九）、孝眷轿9顶；

（二十）、孝眷马车31辆。

第二日：由广通寺至卧佛寺（一）、仪仗骑兵一排（公安局骑警队）；

（二）、军乐队一部（公安局）；

（三）、铭旌亭16抬；

（四）、仪仗宪兵一队（宪兵司令部）；

（五）、松活：松狮、松亭、松鹤、松鹿；

（六）、喇嘛21众；

（七）、影亭一座，8人抬；

（八）、军乐队一部（绥靖公署）；

（九）、四季花盆（纸活）；

（十）、仪仗步兵一队（公安局保安队）；

- (十一)、高僧 21 众；
- (十二)、神主轿一乘，8 人抬；
- (十三)、送殡来宾；
- (十四)、拂拂人；
- (十五)、孝子帏；
- (十六)、灵柩 32 人杠；
- (十七)、孝眷马车 31 辆。

殡列沿途的素彩牌楼于 12 月 7 日开始扎搭，由原订计划的 3 座，增至 12 座。地点如下：

- (一)、前门东车站（两座）；
- (二)、正阳门（一座）；
- (三)、天安门（一座）；
- (四)、中山公园（一座）；
- (五)、西单牌楼（一座）；
- (六)、新街口（一座）；
- (七)、广通寺（一座）；
- (八)、海淀（一座）；
- (九)、颐和园（一座）；
- (十)、香山公路至卧佛寺拐角处（一座）；
- (十一)、卧佛寺（一座）。

关于段氏灵柩由东车站起灵发殡后，公祭礼节规定如下：

- (一)、灵车进站，军乐起奏哀乐，同时全体肃立（迎灵仪仗队同）。
- (二)、祭奠时一律用三鞠躬礼。备素筵。
- (三)、东车站及卧佛寺公祭礼节如左：
 - 1、就位；2、上香；3、读祭文；4、三鞠躬；5、礼成。
- (四)、各祭棚致祭礼节如左：
 - 1、就位；2、上香；3、三鞠躬；4、礼成。
- (五)、各学校于灵柩到达其迎灵地点时，全体肃立，由校长献花圈。
- (六)、仪仗骑兵背枪，枪口朝下；步兵背枪，枪口倾向前下，握住枪床。
- (七)、仪仗官兵均左臂缠黑纱、丧章，胸前佩带白花，刀柄缠黑纱、丧章。
- (八)、军旗顶下挂黑纱、丧章，鼓乐亦均挂黑纱、丧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厘定迎柩仪节

“段前执政北平治丧处”、“旅平安徽同乡会追悼段前执政筹备处”12 月 7 日再次分别召开会议。北平治丧处招待组为确定对各方面参加迎灵送殡人士招待具体办法，特于怀仁堂东厅召开全体招待干事会议，到陈中孚等百余人。招待组主任高胜岳担任会议主席，对各方面招待事项，均有所商讨与决定。

冀察政务委员会亦根据北平治丧处的呈报，最后厘定了迎柩仪节，对于迎柩当日下半旗、公祭礼节、灵前仪仗，基本上维持原议，惟对迎柩鸣礼炮一节，有所更动，规定：灵车入站；灵柩出西直门；灵柩至卧佛寺停放就位，

各鸣礼炮一次，而每次均照陆军礼节鸣炮 21 响。

北平治丧处再次明确公布东迎灵办法规定（与原定办法基本一致，故省略）。并对殡列所经路线，沿途警卫配备作了全面布署：

甲、沿途警卫配备：

- （一）、城内外沿途警戒，宪、警共同担任，由军警督察处督饬。
- （二）、车站内警宪酌派。
- （三）、车站外警宪酌派。
- （四）、沿途祭棚警宪酌派。
- （五）、沿途主要街巷由该区队酌量加派照料，并指挥交通。
- （六）、广通寺暂停之警卫由宪警各派官兵 10 人，会同办理。
- （七）、海淀之彩牌坊之照料，由西郊区署派警。
- （八）、颐和园祭棚之照料，由西郊区署派警。
- （九）、卧佛寺之警卫，由宪兵司令部派上士班一班，会同西郊警察常川驻守，归林署长指挥。

（十）、中山公园商民公祭之照料，由警宪派人会同办理。

乙、沿途交通整理：

- （一）、于仪仗先头到达时，由警宪会同制止一切车马。
- （二）、各路电车应于灵柩经过后，再行开驶，由治丧处函知电车公司照办。

（三）、前门迎柩人员停车处（在西车站）之指挥，由警宪会同办理。

北平社会局规定中、小学校公祭办法关于平市中、小学校参加公祭办法，业经社会局规定如下：

（一）、参加公祭之各校学生，以 10 人至 12 人为限（小学限于高年级者，无高年级者，得于中年级选派），一律着制服，携带校旗。中等学校由训育主任，小学由校长率领，依照规定时间（按照附表办理）到达指定地点齐集公祭。

（二）、每校备置花圈一个，于公祭时呈献。

（三）、中等学校校长在航空署街西口祭棚处集合，参加公祭。

（四）、过远之小学，只须校长在指定地点参加公祭，并呈献花圈，学生勿庸参加。

（五）、公祭礼节：1、每校代表献花圈；2、全体行三鞠躬礼；3、礼成。

（六）、各校参加人数，须于本月 10 日以前开单，到科领取黑纱、素花，以资佩戴。

（七）、每组负责接洽一切事务人员，由表列第一位之小学校长担任。

（八）、参加公祭之学生，是日休息半日。

（九）、此项办法由社会局第三科以函通知各校遵照执行，如有变更，临时另行通知。

迎柩前夕

段氏灵车于 9 日晚到天津西站，10 日在天津总站受祭。将在 11 日晨 7 时 10 分离津，9 时 45 分到达北平前门东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特分派李思浩、王冷斋二氏，于晚 6 时搭车赴津代表迎灵。日前，宋哲元派赴沪迎柩、致祭的代表门致中，已于 9 日提前返平。北

平治丧处常委陆锦、魏海楼及庶务组主任贾干卿，特与干事王德彬等，自车站起，沿途至西山卧佛寺等处，勘探一切。晚始返处。魏氏则于勘看毕，即于晚6时赴津迎灵。

段氏灵车到津后除宋哲元、秦德纯分派李恩浩、王冷斋前往迎灵外，平治丧处招待组为与随灵的沪治丧处接洽，抵平后的具体安排，特派职员张文阁等赴津与之磋商，大致拟定如下：

随灵来宾平方招待办法：

(一)、随灵来宾与孝眷行李灵车到平时，均有招待专员办理运送。来宾行李运至丰泽园，孝眷及随侍男女仆人行李送至卧佛寺。

(二)、灵车到平停车后，随车北上来宾，全体在站台灵柩后齐集，俟灵柩下车后，上小杠出站时，请执紼至站外祭棚，然后退出祭棚。俟大杠进发时，平、津、保、察，各方亲友执紼，沪上亲友一律参加送殡行列，在最后端。

(三)、孝眷俟灵柩下车后，再下车集于灵后。

(四)、所有随从人车到时，一律不动，俟灵柩由站台进发后再下车。

(五)、灵车到达车站停住后，孝子先下车，向迎灵委员长暨来宾叩谢，并请枉驾先送。

(六)、装灵列车灵柩所在之位置，务须查明，预计达到车站时，灵车应在站台何位置，以便决定委员长暨其他重要人员之迎灵地点。

治丧处对迎柩及发殡各项事宜，均已次第办理就绪，关于各界参加迎灵送殡的代表臂纱标志及素花，经连日颁发，截止至九日晚，按预定统计，已发出十之七八。10日即将发放完竣。

关于平市普通商民致祭问题，平治丧处已决定办法两项：

(一)、灵柩到平之日，中山公园社稷坛设备灵堂供奉遗像，以便商民致祭。

(二)、是日开放中山公园一天。

关于消防事项大致定三项如下：

(一)、车站内外汽机一架，官兵若干名。

(二)、广通寺汽机一架，官兵若干名。

(三)、卧佛寺汽机一架，官兵若干名。

以上三项临时及常川驻守之分配，则由公安局照派办理。

担任迎灵送殡各执事人员，北平治丧处规定11日晨7时，全体在东车站报到，8时分班配备完竣，8时半各界迎柩代表即可按照预定次序凭证进站，排队迎候。

关于发殡参加执紼办法，及全体招待执紼人，规定如下：

(一)、第一段(由前门东车站起，至新华门二十九军祭棚止)：招待执紼：李玉麟、潘渠楹、贾德辉、陆锦、李钟岳、吴佩孚、蒋雁行、贾德懋、门致中、秦德纯、熊炳琦、鲍文樾、邵文凯等71人。

(二)、第二段(由新华门二十九军祭棚起，至西四牌楼市商会祭棚止)：招待执紼：胡恩光、蒋廷梓、何丰林、蔡成勋、陈乐山、陈正义、卢金山等59人。

(三)、第三段(由西四牌楼商会祭棚至新街口安徽同乡会祭棚止)招待执紼：赵学芳、方咸五、丁搏霄、杨文凯、乐振声等61人。

(四)、第四段(由新街口安徽同乡会祭棚起，至西直门外广通寺止)

招待执紼；杨化昭、程长发、穆文善、魏旭初、董幼丹等 57 人。

段椋抵平 移灵卧佛寺

殓分两日出：当晚暂宿广通寺；次晨再移卧佛寺。

段氏灵车于 11 日上午 7 时许由津北发出，9 点 45 分抵北平前门车站，各界前往迎灵者甚众。一时极为热烈严肃，幸事前有充分准备。由于戒备森严，秩序井然。灵椋抵站后，即移灵至西郊卧佛寺停灵。定期举行国葬。北平治丧处则定从 14 日起，在中山公园举行追悼会三日，由各界公祭。

因自前门车站运灵至西山卧佛寺，路途甚远，而且沿途又有各界公祭，在时间上势必有所耽隔，故头天晚间暂宿西直门外高亮桥广通寺，次日 6 时再起灵西运。两日殓途，每遇祭棚，因送灵者及围观者过众，交通均暂告中断。灵过后，始行恢复。

平市当局为表示哀悼起见，特令全市各界下半旗一日致哀。

车站布置

前门车站为段氏灵柩奉移卧佛寺的始发点。布置极为壮观。前门外大街迤东支搭素彩坊一座，车站之前搭了一座大席棚，为宋哲元委员长及冀察政委会，绥靖公署，冀察两省府，平津两市府，及二十九军重要人员休息室。两侧席棚为各界来宾休息室。

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率全体员工，在第二、第三月台前树立一牌坊，上书“恭迎故执政段公灵輶”。

各界迎灵部位，规定在三个月台之间，均有木牌标明。第一月台为段氏亲友及其它各机关、各团体位置；第二月台、第三月台为军政部各界位置。

警卫配备

城内外沿途警戒事宜，由宪、警共同担任，是时，东车站及沿途均由主管区署及北平宪兵司令部加派警、宪，密布于仪仗前头到达地点，临时制止一切车马通行。各路电车亦于灵椋通过后，方开始行驶。此外，消防设备亦极周密，东车站、广通寺、卧佛寺等处，均设置消防汽车一辆，并派兵守候。

热烈情况

上午 8 时，各界迎灵代表纷抵东站，计有宋哲元、秦德纯、吴佩孚、刘哲、门致中、邓哲熙、张维藩、石友三、张吉德、陈继淹、富保衡、邵文凯、钱桐、周作民、冷家骥、邱占江、鲍毓麟、李桐文、马占山的代表王铎、费起鹤等共约 3000 余人。治丧处警卫组主任陈继淹等亲自在场指挥，维持秩序。9 时 45 分灵椋专车进站，站内顿呈热烈景象。

灵车一列，共十余节，灵车居于正中，为蓝色，两端设有素彩牌坊，上书“段”字，两侧玻璃均嵌白花。灵车进站后，在金达志司仪下，举行迎椋礼，众齐脱帽，向段灵行三鞠躬礼。礼毕，即引导宋哲元委员长及秦德纯市长入灵车，首先致祭。祭毕下车，段氏公子等亦随之下车，先向宋、秦叩首致谢。礼毕，段氏各公子手捧段氏遗嘱下车，面对灵车下跪，静候移灵。此时，礼炮开始，每隔一分钟响一次，共 21 响。

移灵情形

事先治丧处备有杠、罩（系宣武门内大街同顺杠房承办），于灵车到站后，即由杠夫抬罩入站，将罩堵在灵车的东门，由车上的杠夫将灵柩徐徐移入罩内（杠业谓之“堵门活”）。然后再由另一班杠夫将杠抬起来去找灵柩

和棺罩。棺罩为红寸蟒，并镶满“佛”字。灵柩下车，礼炮亦止。孝子段宏业执一高大的引魂幡，这是在上海扎制的，幡大而精，比平市发引用的灵幡高三分之一。拄在地上，能高过孝子一头。孝子段宏范手捧乃父遗嘱。均由二人搀扶引灵出站（站前所有铁栏杆均临时卸掉）。执紼者蜿蜒长达三丈有余，至站前祭棚停止，受宋哲元及各军政机关人员公祭。

随灵同来者，除段氏眷属外，计有邓赞卿、曹提三、张啸林、龚光舟、吴皓、苑惘然、李伟侯、陈仲寒、李顾远、唐伯年、王竹村、程海青、顾水如、庄梦兰、刘君亮、梁众义、龚治初、陈崑山、吕戴之，及段婿奚东曙等、平方代表魏宗翰等亦随车返平。随来人员及护灵警卫官兵均分别下榻花园饭店、中央饭店、天福店等处。

车站祭奠

段氏灵柩由站台换小杠迎入祭棚后，即安置供桌、像片、香花、供果，由宋哲元率领政委会全体官员致祭，由吉世安担任司仪，王喜凡读祭文。其礼仪秩序为：

（一）、全体肃立；（二）、主祭人就位；（三）、与祭者就位；（四）、奏乐。（五）、读祭文：《宋委员长祭文》

“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宋哲元，谨以玄醴庶羞，致祭于前执政段公之灵曰：呜呼！昊天不吊，竟不憖遗一老。惟公生平四主枢政，三造共和，成逊让之美。奠民国之基，身系天下安危，苍生仰望者盖四十年。故国人于公之薨也，入表震惊，薄海同悼。况当此万方多难之日，更当有大厦梁栋之思，不禁同声悲恸者矣。

综公生平，勋业彪炳。光宣之交，首创军制，强国是效。立国防之基本，整尚武之精神，此公有大功于国者一也。辛亥之役，公悯念生灵，促成国体，清室逊位，遂定共和，此公有大功于国者二也。

盈廷劝进，更号改朔，公则正色立朝，不忍以私交陷元首于正义，谋国竭诚，爱友竭诚，于是民国将危而复安，法统将新而复续。此公有大功于国家者三也。徐州难作，公则誓师马厂，昭大义于天下，三日之间，克平其难，华夏重光，此公有大功于国家者四也。

欧战既起，公独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实行参战，公理战胜之后，我乃能出席巴黎之会，遂使青岛全区、胶济一路，收回主权，德奥俄三国取消租界，国际地位，由此增高，此公有大功于国家者五也。我国关税夙受条约不平等之约束，公于民国十三年邀及友帮，开诚共议，政制自主，由此肇端，此公有大功于国家者六也。

至于领事裁判之权，公尤痛心积虑宵旰忧勤，使非内乱挫折，岁月蹉跎，必可早见成功，岂尚待今日当局者忧劳筹划也哉！呜呼！

公有救国之大功，而不矜其织，不伐其德，诚既照于百世，节复抗于千秋，国事危坠，微公谁挽。我志澄清，微公谁师？望高山而仰止，荐馨而陈辞。肃英光于千载，永呵护于来兹。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六）、向故前临时执政段公行最敬礼，一、再、三鞠躬；（七）、全体孝子孝孙向主祭人三叩首；（八）、全体孝子孝孙向与祭者叩谢。（九）、奏乐礼成。然后，由喇嘛、和尚在灵前转咒。最后，撤供起杠。全体高声举哀。

升杠起灵

灵柩出棚，仍由杠夫将大罩堵在棚口，由棚内杠夫将灵柩徐徐抬入罩内，当灵柩与大罩走出十余米之后，再由另一班杠夫，将大杠抬起来去找灵柩和大罩。80名杠夫全身“普新”青荷叶帽、红雉翎、绿驾衣、红套裤（只有西城同顺杠房的杠夫穿大红套裤，其余杠房一律用土黄套裤）、青布靴。阵容格外整齐。这恐怕是北京市面上最后一个80人的大杠了。

起杠时，西乐、国乐、梵乐响彻云霄。焚化了祭棚中的灵花、冥纸。所有致祭、送殡代表按既定的班次相继加入执绋。在四位“执鞭压差”和“对儿响尺”的指挥下，循道进发。

仪仗一般。

仪仗最前由骑兵一连开道。次为北平市公安局军队团吹奏着哀乐；队后即为“铭旌亭”，高两丈一尺。亭内挂着红绸金字，写着亡人官衔的巨型牌位，上书“故前临时执政段公讳祺瑞之灵位。”是97岁老人马相伯所题。由32名杠夫肩抬而进，两侧跟随四面“拨旗”。亭后为仪仗步兵一团，由团旗、团长前导。次即松狮一对，松亭一对；松鹤、松鹿（即“鹤鹿同春”）各一对。后面依次为：花圈队数百人；喇嘛54人；仪仗宪兵队一中队；8人抬素彩扎制的影亭一座；仪仗保安队一中队；绥靖公署军乐队；平市各寺院高僧53人；四季花盆引导8人抬之神主轿（即魂轿）；送殡来宾；执绋人；孝子帷幔（即帷幄，支一白布帐子，四面帷幕下垂，由执事夫举而行进，孝属走在里边，外人看不见）。后为80人大杠，扣着红寸蟒嵌“佛”字的大罩，四角有黄绸“拉幌”，罩顶上安有金箔罩漆的“柳叶尖”形式的“火焰”顶。杠的四角各有一名穿孝的“执鞭压差”，杠的两侧各有四面红、蓝两色的“拨旗”。杠前有两名穿孝的杠头，以打“响尺”的形式指挥杠夫的步伐和动作。杠后有女孝眷乘坐的白轿18顶；挂蓝、白两色彩子的四轮马车36辆。全部仪仗庄严整肃，蜿蜒数里，殡列经过之处，临时断绝交通。马路两旁观众，极为拥挤，盛况空前。

沿途致祭

（一）、殡仪行列通过正阳门后，即为吴佩孚上将军所设的祭棚。祭棚内设祭座，座披虎皮外套，上罩万年伞，中列段氏遗像，前列香花供果。孝子入位后，即由吴氏入位主祭，由吉世安任司仪。

（二）、第二道祭棚在中华门内，为冀察绥靖公署全体官员致祭，由绥署参谋长富占魁主祭，吉世安任司仪，绥署秘书长郑贵暄读祭文。

（三）、殡列至天安门前为冀察两省府及各厅处致祭处所，由张吉墉、柯昌泗分别主祭。

（四）、中山公园前为平津两市府及各局所设的祭棚，由平市市长秦德纯主祭。

（五）、西三座门前为冀察五委会及农业合作会所设的祭棚，由刘治洲主祭。

（六）、新华门前为二十九军及冀北保安司令部所设的祭棚，由石友三主祭。

（七）、府右街南口为河北高等法院及北平地方法院所设的祭棚，由李棟主祭。

（八）、西单堂子胡同西口为新闻记者公会祭棚，由常委管翼贤主祭；李诚毅、马祉庠、杨仲华、王以之等陪祭。

其余沿途路祭棚极多，计有：各慈善团体；自治界同人；平汉、平绥、

北宁各铁路局；市商会；电车、电灯两公司；银行公会；蒙古各王公；各大中小学校；地方参议会筹备处；安徽旅平同乡会，陆军各校同学等单位所设的祭棚十余座（限于篇幅，兹不赘述）。因路祭耽隔时间过多，殓列全部出西直门时，已是下午3时45分，眼看就要落日了。

举行家祭

殓列于下午4时10分抵达西郊广通寺。该寺事前一切迎灵事项，均已布置就绪。大门前支搭素彩牌坊一座，文为“振我国威”。庙内并高扎席棚一座，四壁满悬挽联、挽幛，各项祭品，布置极为肃穆。灵柩抵庙后，遵照既定仪节再鸣礼炮21响。灵柩随炮声入庙，停于大殿，然后开始家祭，设素筵一桌，果供、糕点供各一堂，由长子段宏业上香、依家族尊卑长幼依次行三叩首礼。次由各界致祭，由前交通总长龚心湛主祭，先后献花、读祭文。后以焚帛、撤供宣告礼成。

广通寺退居长老长悟偕住持性然和尚赠送挽联一付，文曰：

“往事已成烟，当此月冷风悲，忍听亿兆哭元才；
人生原如梦，试看河残山破，公能放著即解脱。”

祭毕，治丧处招待组即在该寺招待各界执紼送殓的来宾用饭。根据段氏生前信仰，一律用的是新陆春饭庄的素筵，表示谨遵佛教戒杀的清规。由段氏孝眷分别叩首“谢席”。饭后，无职务者即前后返城。段氏家族则守灵于寺内，等候次日移灵。

安厝卧佛寺

12日清晨6时，即由广通寺起灵，往西山卧佛寺进发。其灵前仪仗行列，基本不动，惟将80人大杠改为48人大杠，以便于快速行进。昨日各界人士是否继续送殓，一律听便，如欲参加者可于西直门乘坐治丧处特备的大汽车前往广通寺。

西山卧佛寺暂安段柩的灵堂，早已布置就绪。灵堂内四壁遍挂挽联。凡是段氏生前同寅、旧门生、亲友，均人各一幅，其挽词含义则亦应有尽有。除宋哲元、秦德纯等挽联送往中山公园中山堂追悼会会场悬挂外，余者多在此悬挂。现举数例如下：

傅作义挽云：

“三造共和著青史；创立勋名在事慨推枰，一局安危谢太傅；
千秋论定伴碧云，饰终葬典箴言伤属纆，毕生忧瘁武卿候。”

张吉墉挽云：

“生有自来勋劳谐河山益寿；
歿无遗憾惠泽与天地同流。”

徐诵明挽云：

“身系于全局安危，岂图再造共和逮今日邦家巩固；
五族当集中团体，庶冀大兴民国慰我公霄汉英灵。”

胡毓坤挽云：

“再造邦家大名垂宇宙；
统御文武参战定华夷。”

冯治安挽云：

“下为河岳，上应日星，时势造英雄，三定共和成往迹；
功在苍生，名垂青史，国家摧柱石，万方涕泪哭之初。”

汤尔和挽云：

“起家亦自寒儒，再莫谈谁败谁成，过客而今归佛域；
盖棺也无定论，更休说为功为罪，大名终古在人间。”

万福麟挽云：

“申府笃生百世殊勋光史垂；
东山系望万方多难痛星沉。”

李鸣钟挽云：

“春秋明义战，周占辅共和，若论元宰功勋，历数贤豪堪首届；
正气照日生，留形归河岳，俾留国人矜式，况曾庵幔受心书。”

邵文凯挽云：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名世五百年，手造河山归大隐；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传薪十六字，愧承衣钵哭先生。”

段氏灵柩于下午1时许到达卧佛寺，安灵后，开始公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夫妇；平市市长秦德纯；门致中、王揖唐、曹汝霖等均往致祭。段氏生前老友马良（子贞）上祭时痛哭失声，悲哀万状。公祭毕，陆续前往致祭者极为踊跃。吴佩孚因事不克前往，乃特派代表张佐文赴寺致祭；此外并有贾德耀、莫德惠、何竞武、王琦、萧方骏、吕钧、熊少豪、陆宗舆、邓如琢、马介眉、费起鹤、徐明辰、贾干卿、邓哲熙、龚心湛等要人，纷纷前往与祭。香山慈幼院子下午3时许，特派全院师生代表500余人，赴寺致祭。

迎柩移灵事告一段落后，北平治丧处即积极筹备举行追悼会事宜。定于12月14、15、16天，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17日则为旅平安徽同乡举行追悼会日期，地点仍为中山堂内，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同时，平市各大名刹僧众、喇嘛于13日起，在卧佛寺段氏灵柩堂前临时阁上，每日集会诵经三遍，共为九天“永日功德”。

至于国葬墓地尚未选妥。国葬具体日期预定于民国26年（1937年）春夏之交。国葬治丧费用，据说将由中央拨款50万元。

公祭三天

根据平治丧处的安排，段柩安厝后，从12月14日起，平市各界分别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当年谓此为“追悼会”）三天。在此期间全市仍下半旗致哀。14日上午为冀察政委会及所属各机关致祭，由宋哲元主祭。11时为外宾致祭时间，下午1时，由北平市长秦德纯率各局长及高级职员致祭。15日上午为学界，下午为商界及新闻界。16日为民众及亲友同乡致祭。

公祭期间，公园门前搭有素彩牌坊一座，上书“公理战胜”字样。此是为表彰段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之功。社稷坛四门，亦搭有牌坊。中山堂门前扎有素彩，两旁搭了席棚，为来宾休息处所。由园门至中山堂，沿途军警林立，戒备甚严。与祭来宾凭证入门，在园门入口处签到，即可直入礼堂。

礼堂正中，悬段氏遗像，供以素席；周围供以鲜花圈、鲜花篮等物。上方悬有吴佩孚所赠的横额，文曰“还我山河”。四壁满布各界挽联，宋哲元挽额：“日星河岳”被悬于堂门素彩牌坊正中。其挽联曰：

“谋国公忠，鞠躬尽瘁，溯自典兵戡乱，参战誓师，正气壮河山，出处一身关大计；

经年感慨，观变沈机，惟有扼腕推心，赌棋诵佛，悲声动天地，沧桑满眼老奋才。”

上午8时许，宋哲元与秦德纯、贾德耀等莅场，当即开始公祭。由宋氏

主祭，秦氏陪祭，与祭者有门致中、陈中孚等 20 余人。由吉世安担任司仪。祭礼秩序如下：

- (一)、主祭人、陪祭人就位；
- (二)、奏哀乐（平市公安局乐队）；
- (三)、主祭人上香；
- (四)、陪祭人献花；
- (五)、献果、献肴、献饌、献羹；
- (六)、奏乐侑食；
- (七)、恭读祭文（王郁骥宣读）：

“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宋，谨以香花庶羞致祭于前执政段公芝老夫子之灵曰：呜呼！先生命世之英、重光华夏，拯我蒸民。开陈大计，应天顺人。整军经武，陶铸群伦。誓师马厂，凶逆荡平。参加欧战，国体愈尊。复我祖地，还我胶青。通商裕课，力尽齐盟。凡兹大节，施乾转坤。丰功伟烈，永垂汉青。胡天不吊，斗黯星沉。悲含八表，更动师门。馨香式荐，庶几来歆。伏维尚飨。”

(八)、向段前执政遗像行三鞠躬礼。

(九)、礼成。奏乐。

继而由冀察各机关要人陆续致祭，计有高胜岳、邓哲熙、孙维栋、巴立地等 200 余人。11 时，由外宾致祭，共到法使那其亚，日武官今井等百余人。下午 4 时，北平市长秦德纯、雷嗣尚、陈继淹、林世则、富葆衡、谢振平，及各局、处、股主任以上职员前往致祭，亦由吉世安司仪，秦氏领导主祭，王郁骥宣读祭文。至 4 时 40 分礼成。继由河北高等法院、北平地方法院等机关致祭，由邓哲熙主祭。

15 日上午 8 时，由学界致祭，学界知名人士前往者有徐诵明、方宗鳌、齐树芸、李抱齐等；其他如各大中小学校派遣来的代表约数百人。军需学校全体师生亦前往致祭。11 时许，吴佩孚及冯（国璋）、王（世珍）两氏之子均亲备素筵上祭。吴氏率高级旧属及随员 30 余人，亲往致祭，并恭读祭文，状至诚挚。此外，还有留东学会，也于 11 时半派遣张厚琬代表前往致祭。下午由商界及各团体致祭。1 时许，平市商会全体委员前往致祭，由主席邹泉荪主祭。相继致祭者，有全省商米会、万国道德总会、电车公司、电灯公司、平津邮电检查所，惠通公司，公益联合会、白“ ”字会、国医学院代表等多人。

老媪报恩

下午 3 时许，有一六旬老媪，手持银纸锭前往祭堂，自称他是京东西集人，于今夏由九江北返，因路费中断，留落于首都（南京）行乞，经过飞艇街段府前，遇段府女仆，亦系北平人，当动同乡之念，遂走告于段府六小姐、老太太、姨太太等，因此即被引见询问，共赏国币十元、作为北归之资，并谓如果不够，可再来领取。虽然路途遥远，困难颇多，然而无此十元钱，势难返乡。今知段府老太爷奉安此地，特搭车来平拜祭，以报宏恩。当由司仪引导至祭堂行礼，并将该老妇所送的银锭就于祭堂前焚化。适值治丧处常委师岚峰在场，当即询问一遍。念该老妇“居心诚笃可风”，为之赞叹不已。乃命收礼处出国币一元，赏作归途的车费。老妇再三不收，经在场的多人解释后，始接受称谢而去。

16 日为举行公祭的第三天，虽然昨午突降雨雪，气温下降，然而祭者仍

络绎不绝，此日为各界民众及段府亲友、同乡致祭之期，中山公园开放一日，不收门票。

17日为旅平安徽同乡举行追悼大会之期。12时以后，一般市民均可随时致祭，公园亦不收门票。

公祭事竣，冀主席冯治安，察主席刘汝明，津市长张自忠，以护灵人员不远千里北来，殊为劳苦，故于15日下午6时，假冀察政委会联合宴请龚心湛、曾毓隽等护灵人员，并邀秦德纯、陈继淹等作陪。

至此，段氏在平的丧事即告一段落。

悄葬京西万安公墓

据说，在卜寻坟茔，等待国葬期间，由宋哲元将军代为筹款两千多元，在香山卧佛寺附近，盖了几间房，又将段氏遗柩从卧佛寺迁入此处（这样，免去租赁庙殿停灵的费用）。未料，“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日伪当局当然不会承认前国民政府关于国葬段祺瑞的决定（如果承认，其家族亦未必接受）。如果段氏家族在经济上有力量置办茔地，自行发丧下葬，日伪当局尚可听之，或许象征性地给几个钱，轻描淡写地赞扬段氏几句空话。段氏家族亦绝不忍废弃乃父在历史上既得的身后荣誉，于是只好等待胜利后再议。不期“八·一五”后，国民党由于抗日耗尽元气，财政拮据，无力顾此，段氏家族更无力置地发丧，事情便搁置下来，直至28年后的1964年，才由章士钊（著名学者，1924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是段氏的老部下，老朋友）等人出面。将段祺瑞遗柩悄悄葬于京西万安公墓的水字区。章士钊先生还在段氏墓前的汉白玉石墓碑正面题写了铭文：“段公芝泉、母张佩衡之墓男宏业、宏范及诸孙敬立”。据说，1964年修筑此墓时，章先生原拟题写“故中华民国执政段公芝泉之墓”，但经反复思考，以为还是不提官衔为好，让它成为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墓。

“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句，为南唐中主李璟《南唐浣溪沙》词上半阙后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鸡坛”，《北户录》越人每相交，作坛盟誓，祭以白犬丹鸡，故曰“鸡坛”。

卧佛寺，坐落于碧云寺东北的寿安山南麓，创建于唐代，初名兜率寺。元至治元年（1321年）重建庙宇时，驱使民夫七千多人，仅铸铜佛一项，就耗铜三十万斤，改寺名为寿安山寺。元至顺二年（1331年），把刘元良等二万四千多家佃户划归寿安山寺为“永业户”。至明代，光后改名为昭孝寺、洪庆寺、永安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再次重修扩建，改名为十方普觉寺，因寺内一尊铜卧佛，所以俗称卧佛寺。民国25年（1936年）十二月，段祺瑞的灵柩曾在此停厝。

广通寺，在海淀区东升乡北下关小学校内。元代名法王寺。至元年间本刹住持贵吉祥所建。明代更名为广通寺。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内官监太监田用等重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雍正十二年（1734年）重为修葺。寺坐北朝南，有殿五进。庙内钟鼓楼、佛像、碑刻均毁于“文革”。

主要参考资料：

《段祺瑞昨在沪逝世》。《北平晨报》，1936-11-3。第3版。

- 《段遗体昨晚入棺，今午大殓》。《北平晨报》，1936-11-5。第3版。
- 《中常会昨决议国葬段祺瑞》。《北平晨报》，1936-11-6。第3版。
- 《段祺瑞大殓志详》。《北平晨报》，1936-11-7。第5版。
- 《段前执政平治丧处昨举行成立会》。《北平晨报》，1936-11-29。第6版。
- 《段前执政决明春国葬》。《北平晨报》，1936-12-1。第6版。
- 《段前执政灵柩今日由沪北运》。《北平晨报》，1936-12-7。第6版。
- 《段前执政北平治丧处昨开招待干事会议》。《北平晨报》，1936-12-8。第6版。
- 《段前执政灵车准明晨抵平》。《北平晨报》，1936-12-10。第6版。
- 《段前执政灵车今晨抵达车站》。《北平晨报》，1936-12-11。第6版。
- 《段柩昨抵平》。《北平晨报》，1936-12-12。第6版。
- 《段前执政灵柩昨安厝卧佛寺》。《北平晨报》，1936-12-13。第6版。
- 《追悼段前执政今晨起在中山堂举行》。《北平晨报》，1936-12-14。第6版。
- 《段前执政追悼会昨开始，宋秦分别莅临主祭》。《北平晨报》，1936-12-15。第6版。
- 《追悼段前执政第二日盛况》。《北平晨报》，1936-12-16。第6版。

官满花未谢 身后有哀荣
——张作霖军政府内阁总理潘复丧礼

死于肺积水 临终有遗书

潘复 于民国 16 年（1927 年）6 月，曾任张作霖军政府内阁总理。但他没有死在任上，最后成了政坛上的残花败柳，可是死后享受了相当的哀荣。这主要是他跟随张学良，响应国民军北伐，宣布东三省“易帜”，被张学良聘请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高等顾问。后在天津隐居，做了寓公。他死后，在国民政府看来，虽不能给予“国葬”优恤，但作为他长期居住的津、京地方政府的要员都要亲临致祭，表示对他晚年最后的政治作为，给予肯定。

潘复因患肺积水症，医治不效，于民国 25 年（1936 年）9 月 12 日，在平寓西城毛家湾私邸逝世。当日晚 6 时即行大殓。其家属分别以电报向张学良、阎锡山、陈调元、于学忠、王树常、万福麟等报丧。关于治丧一切事务均委托前宪兵司令王琦代为办理。潘氏旧友张廷谔、朱作舟等，亦闻耗来平，协同料理丧事。

潘氏生有八子：耀麟、耀森、耀同、耀楠、耀齐、耀襄、耀星、耀鳌。女四人。子女于潘氏临终时，均亲侍在侧。潘氏尚有老父健在，长期定居天津，当时尚未闻此噩耗。潘氏临终前，神智尚觉清醒。特命其第五子耀齐记录其口述的遗书，是给旧日老友张学良、宋哲元、吴佩孚、刘哲、王树翰、靳云鹏、黄郛、王克敏、戈定远、王树常、陈觉生等人的。文云：

“连日心绪不宁，恐非吉兆，倘致不起，至乞我兄等，惠予婉劝家君，以免伤感，庶可稍减弟罪。小儿辈年幼，诸望训海，多年旧邻亲爱提携，未了各事，祈代收拾，是为至禱。现值季玉、景韩、智号、捷三、佩巡、建勋、耀宗，他们几位均在此，亦可请来一听。”还有一份遗嘱是给其家属的。文云：

“余病经年，连日心绪不宁，恐非佳兆。设有不讳，汝等必须善事祖父大人，以免伤心，为要为要！门户之维，勿堕家声。余身居河北，如此大局，日萦于怀，无所贡献，良用惭愧。汝等宜本余志，在社会服务，勉为端人，对于父执时聆教诲，有命必遵，戚友旧属，尤应热诚团结，互相提携。勿负我嘱！命齐儿书。九月十日夜。”

“小三天”逾日搞初祭
大接三宋、秦亲致祭文

潘氏逝世后，唁电纷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津闻耗后，马上拍来唁电。文云：“（衔略）潘馨航先生逝世之耗，逖听之下，惊悼莫名，除派秦市长代表致祭外，特此电唁。宋哲元。十二日。”按潘氏旧属僚原议，潘枢在平私邸停灵受吊“七七”49 天，然后运灵回山东济宁原籍安葬。后考虑其尚有老父健在，根据丧制，其停灵受吊日数不能过多，乃改为“五七”（仍不能停满，只停 33 天）。旋即由护国寺街西口外一家棚铺派工匠，于毛家湾潘邸搭了一座起脊大棚。灵枢停于北厅正面，成为“正寝”的格局。按旧丧礼制，凡上有老亲在堂的，均不能停枢于北堂正中，只能停在东厅正面（即灵棚内的上首）。潘氏的老父亲大约是考虑其子生前曾任内阁总理等高

官要职，于家族上有“光前裕后”之大功，所以，破例逾制，给儿子以特殊待遇（这在后来所发的讣闻上，也有所表现）。棚内搭了三面的“经托子”（搭在房顶上的经台），从接三之日起，即有番、道、禅经轮流为潘氏作荐亡法事。

原定9月13日接三，（大约死的时间是11日亥末，这样属于“小三天”。因举动甚大，筹措不及，故又改为14日接三。

是日潘邸门前设鼓乐迎宾。高扎素彩牌楼一座。陈放的纸活有加大尺码的一楼二库四杠箱；“落地拉”转轮带里子的蓝篷轿车一辆；翻毛菊花青辕马一匹，顶马一匹，跟马一对；对儿翻毛白马驾辕的四轮马车一辆；8人抬绿帏官轿一乘。所有人夫衣服鞋帽、车篷、轿帏均为貌似真绸真缎真呢绒的“吐沫葛”所糊成。此是当年最高档的冥活。

是日，刘哲、陈中孚、戈定远、钮传善等，均往吊唁。名伶梅兰芳、尚小云等亦往致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因公滞津，不能前往，乃特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于下午3时前往吊唁。秦氏在灵前上香、献爵后，恭读了宋哲元的祭文。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秋，九月十有四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遣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致祭于前国务总理潘公馨航之灵曰：呜呼！人生如寄，死曰全归，振古于兹，亦安独违。惟公桓桓，勋业未竟。服政之年，忽焉毕命。朋旧咨嗟，走相告语。曰惟公贤，元神标举。弱冠弄翰，老宿群惊。芹香早擢，鸮荐旋膺。佐幕江南，治河鲁北。声施烂然，誉闻四国。频年况瘁，兼赞军谋。从容肆应，有容休休。刘晏理财，时称第一。困难见易，运神奥秘。扬历台省，久绾度支。晋总国务，用作盐梅。国用繁兴，四方多故。一尘不惊，六轡在御。盛年息影，于津之孺。杜门却扫，还读我书。如何不吊，遂殒元良。秋风夕起，我心孔伤。呜呼！人亡国殄，悼惜同深。矧忝旧交，曷禁哀吟。太翁在堂，诸孤在室。素幕沉沉，悲歌寥慄。招魂陈奠，荔丹萑黄。追念昔游，如何可忘？呜呼哀哉！尚飨。”继由冀察政委会委员刘哲等代表政委会致祭。其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愚弟刘哲、秦德纯、陈中孚、冷家骥、戈定远、钮传善。顾问何丰林、张济新。参议王琦、张鲁泉、吴家元、齐为、张剑秋。主任高胜岳、许剑樵、姜月波。科长刘振权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前国务总理馨航先生之灵，而为文以申哀曰：呜呼！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死生契阔，枵触人琴。公之设施，剔历中外。瑚璉国华，南金大贝。云何冲举，如李邕侯。又如子房，赤松其游。肃穆几筵，清高遗像。溯洄潮游，安仰安放。呜呼哀哉！尚飨。”

上祭时，分别由“堂祭清音锣鼓”、二十九军军乐团、冀察绥靖公署西乐队、平市公安局西乐队、亲朋友好所赠之民间西乐队，轮奏哀乐，并由番、道、禅三经班品咒助赞。

所有来宾坐席后，于下午6时许送三，至太平仓北口东便道广场，送焚象征送魂的纸扎车轿等冥物。送三行列颇为壮观。由内四区警署派遣的20余名警士在最前边开道。由传统的民间官鼓大乐，官吹官打，拉号成对，官鼓四对（八面），唢呐、海笛各双对；并加笙、管、九音锣（带“小乐”），跟锣指挥等24个响器前引。次为清音“九福班”以笙、笛、九音锣、小锣、皮鼓吹奏雅乐。纸扎轿车、四轮马车，官轿（轿内设潘氏纸灵牌一座）均由雇来的执事夫牵引前进。其前后左右，由执事夫高举大白气死风灯、六角手

罩子各 12 盏。并有腰挎“盒子枪”的警士若干名围绕于纸活左右，以示护灵。其后即为二十九军军乐团，高奏哀乐。次为雍和宫喇嘛 15 人，纷击蒙藏轻重法器。次为冀察绥靖公署西乐队。白云观道士 15 人，俱身着彩缎锦绣警衣，每对一色，纷击铃、嗡、铛、钹、鼓等法器。其后即为北平市公安局西乐队。次为送三的来宾约三百余人，均手执“引路香”一股，或手提白纸灯笼一个，表示为潘氏灵魂引路。再次为民间西乐队；本家孝属。最后为弘慈广济寺和尚 15 众。沿途观者蚁聚于便道上，不下数千人；尾随不舍者亦约数百人。据说，这种大接三在当时已是极为罕见的“盛举”了。

送三回棚，全宅孝属哭灵后，番、道、禅联合祈建的“往生逍遥道场”即开坛作法。有喇嘛的观灯焰口；老道的“三清”铁罐施食；和尚的“三大士”啐演《地藏十王宝灯》《瑜伽焰口施食》。法座左右侧还设了“监经席”。棚内的官座上的观礼者几无虚席。

上有尊亲竟正寝 老父出名发讣闻

潘氏接三后，经其家属和旧日属僚几经磋商，决定将其灵柩运回济宁老家安葬，但由于种种原因还要在天津浙江义园暂厝一个时期。

并以他老父亲的名义在报刊上向各界发出讣闻。其讣闻云：

恕报不周

藐躬不幸，蹇及冢男

前国务总理、财政总长、交通总长馨航悼于中华国民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即丙子年七月二十七日子时疾终，平寓正寝。距生于清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寅时。得年五十四岁。当命孙耀南等亲视含殓，遵礼成服。兹讣于国历十月十四日，即夏历八月二十九日，移厝于天津浙江义园，再行择期回籍安葬于先茔之次。叨在乡友年世学寅戚谊

敬此启

闻

国历十月二日夏八月十七日成主

国历十月十三日夏八月二十八日领帖

反服生潘廉拭泪拜 国历十月十四日夏八月二十九日移灵

朝野名流送库 大德高僧讲经

10 月 13 日为潘氏开吊之日，潘邸丧居胡同口及门前均扎了高大的素彩牌楼，设丧门鼓一对，锣架一对，官鼓大乐在门前设乐，为来吊者传报。并有内四区警署派的警士站岗。自晨至晚，西四北大街及新街口大街一带，赴潘邸吊唁的素车白马络绎不绝。

棚内灵堂上，潘氏灵柩扣上了一卷黄云缎的“佛”字堂罩。堂罩前悬挂着潘氏大幅遗像，像前还供着潘氏的“神主牌”。沿着灵堂的房檐，扎着一座三门式的素彩灵龕，上悬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送的大匾，上书“骑箕天上”。右边悬挂着徐世昌送的大匾，上书“济上清材”。左边悬挂着曹琨送的大匾，上书“仙岛归真”。灵龕前，沿着灵堂的台阶，搭了一座大月台，台上分别挂着吴佩孚、张学良、李厚基、天津轮船业公会及山东旅平同乡会等所挽之匾额。月台的两柱上挂着政委会委员刘哲所送的挽联。月台下两侧

陈列着纸活金山、银山、绸缎尺头，陈设桌上有文房四宝、古玩陶瓷、日用器皿、衣服鞋帽……棚内四壁挂满了挽联、挽幛、花圈。

是日，由雍和宫的喇嘛（经台搭在南面，正对灵堂），白云观的道士（经台搭在东面），弘慈广济寺的和尚（经台搭在西面），轮流诵经超度。还有旧日同僚送的尼姑经、居士经等。经声梵乐，终日不辍，与灵前清音雅乐、西乐等交织在一起。

灵堂前，月台东侧设堂祭清音锣鼓一班；政委会、绥靖公署西乐队各一班；月台西侧，有平市公安局西乐队一班；亲友送的民间西乐队两班。轮流在灵前奏哀乐。

灵堂前院，亮出了潘氏生前，在前山东实业公司、山东运河浚疏局、鲁丰纺织厂、前北洋政府全国水利局、前靳云鹏内阁财政部、运河局、盐务署、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交通部、张作霖军政府内阁总理府、关税自主委员会、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等所颁赠的万民旗、万民伞、冲天大幅的锦旗、锦标。其中就光天津各界所送的万民旗伞就有 30 多件。同时，还亮出了明晨发引时用的“五半堂”汉执事中的一部分：计有各种彩色绣花的幡伞 20 件，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等汉旗子 8 对。

冀察政委会委员刘哲于清晨即前往致祭，并应潘宅邀请，任棚内总知宾，张罗一切。平津朝野政客名流，均亲临致祭，计有秦德纯、萧振瀛、李思浩、陈觉生、章士钊、吴佩孚、江朝宗等 300 余人。团体方面有山东旅平同乡会、北平市商会、津市各法团代表 100 余人。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于下午 4 时亲临祭奠，对潘之家属殷殷致慰。

潘宅用了汉、回、素三面席招待了所有来吊者。并由孝属逐席叩谢，请予劳步送库。

下午 5 时许送库。官鼓大乐、清音“九福班”，五班西乐队，番、道、禅、尼、居士，送库来宾 200 多人，列队里许。焚化纸活计有加大尺码楼库 3 堂、杠箱 6 对、金山、银山、尺头陈设桌、祭席等数十件。西四牌楼一带观者如堵，交通完全中断。内四区警署特别加派警士前往维持秩序。

晚间 8 时，结合“辞灵”仪式，举行家奠。按当年风俗，尤其是山东人，一般都是采用儒家的讲《论语》问孝部分，或讲述《孝经》的某些章节。而潘氏的辞灵家奠却完全是佛教式的，但又不诵经、放焰口，而是请法师讲经。这可真是别开生面。据说，潘氏生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自民国 17 年（1928 年）6 月，随张作霖撤退出关，在沈阳皇姑屯遇险，大难不死。从此躬亲反省，发愿皈依“三宝”（佛、法、僧），拜弘慈广济寺现明长老为师。故在死后，该庙的僧众、居士均参加了祭礼。

家奠仪式相当隆重。由江朝宗担任纠仪。堂上供的全是素席素筵，孝子三奠茶，而不奠酒。僧众 48 位，整合弥陀“四十八愿度众生”之意，连同居士 100 余人，参礼者 300 余人。合诵《戒定真香》赞、《心经》后，由广济寺现明老和尚、卧佛寺宗月老和尚及大居士杨云史、田桂舫等 6 人分别讲述了《无常经》。最后，与祭僧俗、信众同咏《无常颂》：

“今后我当死，尽人莫不知，日日又不死，由此常心生。譬如夺标人，得失虽有二，总以得为准，决不以失计。此不正思维，正知正念蔽，时起久住心，执常谓不死，便觉现前身，继续多需备，求暂时诸乐，闭目前苦计，亡躯舍修行，力求苦守据，更求长生法，总不念及死。于诸解脱法，成佛等大事，无暇及观察，而复生畏惧，或游心圣道，趋重于世事，纷忧度时光，

万劳谢一死。复多修行人，念死又未死。渐渐常见生，怠弱不精进。忽然死王来，迅速不先闻，纵精神腾跃，大势力才能，文章巧技术，仙药咒术等，或避山海间，王臣兵威等。老少中年人，美容或醜辈，智愚贤不肖，皆不免于死。人寿说百年，百年者有几？纵许汝百年，百年有尽时，百年末后日，亦何异短命？况此百年中，刹那不停，如织师织布，赴刑场罪人，及少水鱼类，电流等更思；又此百年中，尽日扰纷纷，杂话饭食等，夜来复昏睡，奔赴苦思维，伤情拭眼泪，病苦困床席，避逃冤家类。老年多衰病，久忧长不死，清静好时光，百年中有几？智人善观察，应当勤戒定，死王何时来，不先与我信。”

仪式至为庄严，直至 10 时许方告礼成。全宅孝属及与祭僧俗信众，俱伏地向法师顶礼，信受而去。

三十年代北京城屈指可数的大殓

10 月 14 日，潘氏发引，移灵于天津浙江义园。殓仪完全是民族传统式的，冥活精细，仪仗齐全，是本世纪 30 年代北京城屈指可数的大殓。

9 时许，总提调王琦发令：杠头“叫齐儿”，带杠夫进棚至灵堂“圈活绳”；随后即带响器参灵。全宅孝属依尊卑长幼长跪于灵堂之前，首由官鼓大乐大锣一筛，揭开了殓仪的序幕。胡同口外“五半堂”幡、伞的“催压旗”、“月催压锣”，头戴高筒大红锣帽，身穿肥大的红锣衣，一边鸣锣，一边扯着嗓子高喊：“弟兄们！叫齐啦！喔……”所有的幡幢宝盖、旌旗伞扇，均各就各位，对对双双地排列整齐待发。

灵柩出毛家湾时，因胡同狭窄，故先用 32 杠（“小请儿”），扣了一卷小罩。至西单北大街始换 64 杠。其杠、罩本家要求“普新”，棺罩是用红云缎新绣的四季团花加金色佛字的图案，下边还加了一尺二的“海水江牙”，鲜艳夺目。从 11 日（发引前三天）即在此亮罩、亮杠。两名打“响尺”的杠头，均头载清制秋帽，身穿漂孝；杠夫穿新绿驾衣，土黄套裤、青靴子，而且要求事先洗澡、剃头。这都是老北京过去大王府、大宅门发丧的那套规矩。

上罩升杠时，焚化了一所纸糊的被浓缩得具体而微的京式大四合房。被请来扬纸钱的能手“一撮毛”（名全福）趁火势大显身手，他带着四个徒弟，轮流跃身往天空扬洒纸钱，一时，白蛛腾空数丈，像几把大伞似的向四外扩散，经久不落，成一奇观。以二十九军军乐团为首的五班西乐同奏哀乐，由一名手执小旗的站在“小推车”上指挥，面对大杠灵柩退步而行。本家孝子在杠前“请”了盆子后，所有孝属，及执紼的亲友来宾一同高声举哀。这时，打响尺的杠头引吭高喊“加钱儿”，向本家和亲友给酒钱的表示谢赏。一个领杠的“执鞭压差”过来喊道：“请本家姑奶奶、少奶奶们上轿啦您哪！”于是所有女眷均被搀至杠后的马车里去了。

大殓开始行进。

纸扎的“哼、哈二将”，身高丈二，头如笆斗，金盔银甲，神气十足。如同佛教寺院一进山门的泥塑无异。表示为潘氏灵魂前往“极乐国”的护卫之神。

纸扎的开路鬼、打道鬼，亦身高丈二，头如斗大，面目狰狞可畏。所有全身装束均为真正绫绸扎成。二鬼各持鞭棍，表示为亡魂开路，驱逐拦路的“外祟”。

纸扎的金银宝库一对，高九尺。仿汉白玉的须弥座上加杠，二人抬异而行。

纸扎的金山、银山盆景，绸缎尺头、文房四宝、古玩陶瓷、日用器皿、衣服鞋帽等等，分别放于 20 余张的尺头桌上。亦由执事夫抬异而行。

纸扎金童玉女一对，表示是神佛接引的使者。金童执黄绫幡；玉女手提香炉。其装束均为绫绢糊成。

次为用素彩扎成的匾额亭，4 人一抬。其顺序为：

- (一)、宋哲元挽，题曰“骑箕天上”；
- (二)、徐世昌挽匾，题曰“济上清材”；
- (三)、曹锟挽匾，题曰“仙岛归真”；
- (四)、吴佩孚挽匾，题曰“功在中枢”；
- (五)、张学良挽匾，题曰“绩著旂常”。

继为李厚基、天津轮船业公会、山东旅平同乡会等所挽匾额。

匾亭后为纸制四季花盆数十对，均系亲朋及旧日同僚所赠。由执事夫抬异而行。

纸扎仙女双对，其装束亦绫绢所制。由执事夫擎举而行。

继之为挽联行列，约数百对，均以青竹竿挑而行之。

二十九军军乐团数十名，俱白制服、将军帽，吹奏哀乐。

汉用“五半堂”幡、伞（民间传统仪仗）：

第一半堂：

红云缎绣四季团花幡、伞各 6 把。

汉旗子 8 对：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

“回避”、“肃静”虎头牌各 1 对。

格漏、粉棍、鸣锣各一对。

官衔牌，上面写有潘氏从前清举人开始，直至民国军政府内阁总理的全部官衔，以示荣耀。

第二半堂：

蓝云缎绣四季团花幡、伞各 6 把。

金箔罩漆的木质“金执事”；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 1 对。

第三半堂：

白云缎绣四季团花幡、伞各 6 把。

金箔罩漆的木质“金执事”八宝枪：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 1 对。

第四半堂：

青云缎绣四季团花幡、伞各 6 把。

“金执事”8 对：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镡、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 1 对。

第五半堂：

紫云缎绣四季团花幡、伞各 6 把。

官鼓大乐 1 班：拉号 2 对；官鼓 4 对，唢呐、海笛、笙、管各 1 对、九音锣 1 对，小铜鼓 1 面，跟锣（指挥）1 面。共 24 个响器。

大红云缎绣四季团花座伞 1 柄，高丈许，上有“火焰”形的金顶。1 人执撑，2 人以黄绸“拉幌”。

清音锣鼓 1 班，由 2 人抬堂鼓 1 面，1 人敲打，4 笛吹奏，1 面小锣，另 1 人以皮鼓指挥，共计 9 人。

潘氏生前在宦途中所得的万民旗、万民伞、冲天大幅的锦旗、锦标。

素彩扎成的加大尺码的影亭一座，8 人抬。亭内供潘氏遗容，高约四尺。

又大红缎座伞 1 柄，2 人以黄绸拉幌。

冀察绥靖公署西乐队 1 班，吹奏哀乐。

领魂轿（即神主轿）1 乘，绿帏，顶上青縑网罩。8 人抬，轿内供潘氏神主牌，轿外挂青纱帘。

又大红云缎绣花座伞 1 柄，2 人以黄绸拉幌。

纸扎香幡、筒幡、灵人（仆役）等冥活。

雍和宫喇嘛 1 班，“刚冻”铜号 1 对；大柄鼓 1 对；大钹一对。俱身穿黄袍，披红色哈达，头戴黄秋帽（放正的戴桃形帽）。

白云观道士 1 班，纷击铃、喻（金钟）、铛、铃、手鼓，高功手捧如意 1 柄。均身穿蓝袍，加披彩绣氅衣，每色 1 对，唯高功披紫色八卦太极图仙衣。

彩亭 2 座：一为“四宝亭”；一为“更衣亭”。俱 8 人抬。四宝亭内陈列潘氏生前用的笔、墨、纸、砚、印章、书籍；更衣亭内陈放潘氏宦途中所穿用的礼帽、便服、靴帽等物。

北平市公安局西乐队 1 班，吹奏哀乐。

童子雪柳数百对，随风摇摆，一望无际。

弘慈广济寺大德高僧 48 人，以应弥陀如来“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之意。

平、津各法团代表约二百余人，俱胸前佩戴白花，步行送殡。

民间西乐队 2 班。一为华北乐队 48 名；一为大北乐队 48 名。轮奏哀乐。

“一撮毛”率领 4 徒身负大串纸钱，不停往空中扬洒。

孝子孝孙走在白布支搭而成的帷幄里，外边人看不见。

帷幄后是宪兵队、公安队长官亲自率队护送。

后即为潘氏灵柩，由 64 名杠夫高抬，上罩一卷大红云缎绣花官罩，四角以黄绸拉幌。每角有一名身穿漂孝，手执藤鞭的“压差”（监管杠夫者），还有八面红、蓝两色的“拨旗”。杠前由对儿响尺指挥。

杠后为传统仪仗“后拥”25 名，每五人一排，走成五行。分别举着木质金箔罩漆的金星、金槌、金刀、金枪、金拳。但每排均以湖色绫绸系于一起。

最后为送殡之素车白马约 100 余辆。包括孝眷车、治丧处执公车，平市公安局弹压车等等。

全部仪仗经由西四、西单、西长安街、天安门、公安街。于下午时抵达前门东站。沿途路祭棚共有 6 处，西四、甘石桥、中南海新华门前、中山公园门前、前门内东侧、以及前门东车站，均有起脊式的大型路祭棚。至于路祭桌、茶桌不下数百处。

北宁铁路局特备灵车 1 辆，头、二、三等客车 4 辆。潘氏灵柩登车后，即于下午 4 时开赴天津。随灵车赴津之祭吊客人有王琦、何丰林、周志诚、吴季玉等 50 余人。至此，潘氏在平治丧事竣。

潘复（1883—1936）字馨航，山东济南人。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1883 年）生。清举人，捐纳府衔，分发江苏候补。后入江苏布政使，为陆钟琦幕僚。宣统三年（1911 年）七月，陆耀升山西巡抚，随之赴晋。武昌起

义，太原光复，遄回济宁，与靳云鹏合资创办鲁丰面粉公司。民国元年（1912年）任职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四月，任江苏都督府秘书。民国2年（1913年）1月，任山东实业司司长。民国3年（1914年）11月任山东运河浚疏局筹备主任。民国4年（1915年）秋，在济宁开办鲁丰纺织厂，自任经理。民国5年（1916年）5月，任北京政府全国水利局副局长。翌年任署理总裁。民国7年（1918年）冬，改任运河浚疏局副局长。民国3年（1919年）12月，任靳云鹏内阁财政部次长，仍兼浚疏局职。民国9年（1920年）5月，升运河局总裁。7月，署财政部总长。8月，靳云鹏二次组阁，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督办。民国10年（1921年）6月，以次长暂行代理财政部部务。12月辞职。移居天津。民国15年，任河道督办。7月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10月，署财政部总长。民国16年（1927年）1月，任交通部部长。6月，任张作霖军政府内阁总理兼交通部总长，民国17年（1928年）3月，任关税自主委员会主席，6月辞职。随张作霖离京返奉。同月4日，专车经皇姑屯时，被炸受伤。12月，东三省易帜，国民政府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被张聘为高等顾问。后至天津作寓公，民国25年（1936年）9月12日病逝于北平。

“小三天”，旧时人死，若于晚上10时左右去世，当天只有两小时，也算一天。这样，至接三初祭之日，实际上只有两天，即谓之“小三天”。凡属这种情况，一切丧祭事宜部须全力突击，谓之“爆儿”。如果丧礼事派大，措手不及，只好四天接三，潘复的丧礼就是这种情况。

“冢男”，即嫡长子。

“反服生”，反服，即尊长给死去的卑幼穿孝。例如：父给子出讣闻报丧，具名“反服生”。凡属这种情况，死者的嫡孙皆服“齐衰”期年之孝，余者均服“缌麻”之孝。比死者上无老亲的孝要轻。

主要参考资料

《潘复遗体昨大殓》。《北平晨报》，1936—9—15。第6版。

《潘复昨日接三》。《北平晨报》，1936—9—13。第6版。

《潘复今日开吊》。《北平晨报》，1936—10—13。第6版。

《潘复身后哀荣》。《北平晨报》，1936—10—14。第6版。

《潘复昨举殡盛况》。《北平晨报》，1936—10—15。第6版。

《潘复灵柩昨专车运津》。北京《华北日报》，1936—10—15。第6版。

不是国葬胜似国葬
空前绝后备极优隆的大发丧
——吴佩孚公葬纪实

吴氏之死

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便积极在华北物色、培植为他所需要的傀儡。他们以为曾居北洋直系首领的吴佩孚可以利用，企图让他“出山”领兵。一时坐落在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吴公馆门前车水马龙，说客盈门。这时，已经投降日寇的齐燮元、日本特务、间谍大迫通贞、土肥原和川本大佐等都相继粉墨登场，动员吴氏担起“兴兵”重任。但吴氏却提出了日军先撤出北平为“出山”的先决条件，使说客们都碰了钉子。

土肥原企图以强硬的手段，强迫吴氏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事前，土肥原设计了一个偷天换日的办法，以吴氏的名义拟好了《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的答记者问的稿子，要求吴氏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同时，还伪造了一封吴氏主张“中日议和”的通电，表示接受日方一切条件。擅自在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上公布，似乎吴氏已倒向日方，担起“兴亚”重任。但是，次日吴氏通过家属向美国合众社记者郑重声明，否认此事，指出此为日寇一手捏造。合众社当天就发了这条新闻，并抨击“日方故弄玄虚，企图逼吴就范”。结果，国际舆论大哗。

民国 28 年（1939 年）1 月 30 日，记者招待会在什锦花园吴公馆举行。出席的中外记者约 130 余人。土肥原派来的人已将中西文“谈话稿”发给记者人手一份，在吴氏的桌上也放了一份中文稿。但吴氏却胸有成竹地发表了自己对和平的看法，提出了包括“日本无条件撤兵”和“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作为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对于记者的提问，一律笑而不答，表示一切均以刚才的发言为准，那个印发的稿件是假的。

土肥原的这场傀儡戏没有耍好，日特机关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首先对中外记者进行威胁，一律不准发表吴氏个人的谈话，同时命令新闻电讯机关扣发全国记者发出的新闻报道。

次日，报上虽然全文刊登了土肥原伪造的讲稿，但美国合众社记者还是发出了吴氏谈话的真实记录，并将日方威胁报馆和扣留电讯稿的丑事公诸于报端，使日本人大丢其脸。

日本侵略者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突然改变了手法，改派川本大佐假装拜吴氏为师，自称“弟子”，而且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企图进行诱降。由于吴氏提出的条件过高——全权交给吴掌握；日军撤出山海关；组建由吴指挥的 30 万军队。因此，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事有凑巧，吴氏因为吃鱼，被鱼刺扎了牙床子，当晚牙龈就发起炎来。这可是日本特务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牙有炎症，不能拔牙，这本是一般医学知识，但日医伊东却连麻药都不打，就给吴氏拔掉一颗牙齿，结果使吴的半腮和喉咙都肿了起来，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中医认为应当“清火”，开了一副汤药，内有四两石膏，吴氏与他的家属可能认为药剂过猛，舍而不用。当时，有一德国牙医，主张让吴氏到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去动手术，但吴氏素有“不入租界”的心愿，所以也被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川本大佐和大汉奸齐燮元同着日本牙医登场了。他们不顾吴妻和所有亲属的强烈反对，强行给吴动手术。日医石田仍然是不打麻药针，就用手术刀往吴的口腔里戳。当时，吴氏的五姑爷张瑞丰看出破绽，厉声提出质问：“既然是开刀，为什么连麻药都不打？”吴妻也尖声提出抗议。石田十分尴尬，假惺惺地连声道歉，急忙打开皮包找麻药与针盒。一个女护士诡谲机警，推说装着麻药和注射器提包遗落在楼下会客室里。于是，川本亲自陪她下楼去取，这才给吴氏打了一针麻醉剂。然后石田撬开吴氏的牙齿。张瑞丰亲眼目睹，石田并不使刀锋向左，划开灌脓肿胀的牙槽，而是紧握刀柄，猛的向吴氏的喉咙刺去，只听一声瘁人的惨叫，吴氏两眼一弹，目眦尽裂，哇的喷出一股鲜血，直喷射在两名洋护士的脸上、身上。原来，吴氏的喉咙已被割断，顿时气绝身死。时间是民国 28 年（1939 年）12 月 4 日下午 3 时 54 分。

吴佩孚的死因已昭然若揭。

两府一宅各在报丧上大做文章

吴氏逝世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立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唁电，表彰吴氏“精忠许国，大义炳耀，治军严肃，操已俭约”。称他“是我国军人之模范，可谓中国旧军人最后一个典型”。因此，最高国防委员会做出了相应的决定，追赠吴氏为“一级上将”。

日伪当局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国内外舆论，首先在他所控制的报刊上，做了与事实不符的新闻报道。

民国 28 年（1939 年）12 月 5 日，《新民报》以“吴佩孚将军昨晚在寓逝世东方文化上一大损失”为题做了四项报导：

“一、[本报特讯] 吴佩孚将军于四五日前，因槽牙激痛，当经中日医生协力治疗，但延医已稍迟矣，继更由德国医生诊治，以期万全，惟化脓过甚，血液殆成腐败状态，由此病状推之，疑系败血症，当以最后方法施行手术，切颚取脓，至四日午后五时半，病势极为危笃。

“二、[又讯] 吴佩孚将军，以六秩晋六（虚岁）之翁，身体素健，步履如恒，讵于前四五日突罹牙疾，当延伊东日本大夫及中医郭眉臣，西医石，德医史替芬等医治，以期万全。惟牙肿迄未见痊可，竟于四日下午六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将军之生前友好齐燮元、江朝宗、蒋雁行、孙丹林、陈廷杰、陈中孚诸氏主持治丧处云。

“三、吴氏经历：吴佩孚将军，字子玉，年六十六岁，山东蓬莱人，北洋武备学堂肄业，历任陆军第三镇管带，第六协统领，陆军第三师步兵第六旅旅长，第三师师长，直鲁豫巡阅副使，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

“四、吴将军噩耗传来，靳云鹏在津之沉痛片谈[同盟社天津四日电] 吴佩孚将军逝世之噩耗传来，曩者吴氏在保定武备学堂肄业当时之恩师靳云鹏氏于英界邸宅黯然谈称：吴佩孚将军在士官学校，当时为余所教之高才生，毕业隶余部下，共事多年，其后已阔别十余年，今接其凶耗，恍然如梦。自在学当时，与蔡松坡、李烈钧、李维英、刘存厚等同为瞩目将来之人物，余当时曾与故犬养木堂先生等致力于大亚细亚主义即东方文化主义之实现，吴将军亦为热心东方文化之信徒。今突如逝去，乃东方文化上之一大损失，诚不胜哀悼者也。”

紧接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就吴氏逝世一事，在报上发表谈话，谓：

“孚威将军吴子玉先生，因牙疾并发败血症，竟以不起，惊悉之余，不脸怆悼。敝人与将军系多年旧友，自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即经聘为最高顾问。上年以来，将军倡导和平不遗余力，在此和平运动尚未完成之际，遽闻溘逝，深为国家惋惜，固不仅在友谊上致歉也。昨晚已推汤委员长代表政府，前往慰唁。饰终办法当由政府共同商讨办理。”

同时吴宅通过报刊发出口报：

“家主

孚威上将军吴公于国夏历十二月四日夏十月二十四日申刻病故。

五日六日兹于申刻大殓；申刻接三

谨此禀

闻

什锦花园十一号吴宅家人郑廷文谨禀”

复以其子吴道时名义发表了一份晦涩的所谓“吴氏遗嘱”。此亦为一纸不可多得的奇文。文曰：

“余父，孚威上将军，卧病八日，亲友来视，犹时以国事为念，兹就侍侧所亲闻者，谨布如次：约谓余委质国家四十余年，本军人天职，拥护国权，保全领土，历经险阻，斯志未渝。事变以来，中外人士共相期待属以振导和平，因痛感时势之艰危，责任之重大。积忧成疾，寝馈难安，不意年已桑榆，未堪忧患。偃卧数日，病势加剧。惟念中日人民，遭兹浩劫，再不急谋收拾渝胥之亡，实所殷惧。若能徼幸万一，沉痾复起，仍当与海内外志士仁人，共致祥和，奠安东亚。余平生抱负，俯仰天地，无愧无作，一息尚存，坚持此旨。吴道时谨述。”

治丧处宣告成立

吴氏逝世后，吴宅特请吴氏生前的挚友齐燮元（当时任伪治安总长）主持治丧事宜。齐氏情不可却，乃慨允暂时主持三天，俟接三以后，一切丧仪均责成治丧处统办。

齐氏与吴宅主事人几经协商，邀请了社会名流与吴氏生前友好 180 多人，于 5 日正式组成了治丧处。次日即公布于报端。一、定名为“吴上将军治丧处”。

二、设总理、协理若干人。

三、设下列各处：

甲、总务处；

乙、文书处；

丙、会计处；

丁、交际处；

戊、庶务处；

己、警防处；

庚、宣传处；

组织人员名单：

总协理：齐抚万、蒋雁行、蒋宾侯、刘六皆、刘文泉、潘锡九、邹泉荪、

翟茂亭、张燕卿、张月笙、董寿金、劳逊五、张辅卿、喻伯椿、陈中孚、汤尔和、符字澄、陈幼孳、陈岷亭、陆季山、寇弼臣、陆润生、汤住心、高泽畚、毕辅廷、崔耘青、许修直、孙翰丞、袁绍明、殷雨农、孙子涵、孙尧卿、王德如、胡凌尘、吴秋舫、洪敬民、邵仲则、金殊奋、余幼庚、杜鸿宾、冷家驥、宋维明、何茂如、何克之、李彪岑、李凤山、江宇澄、池宗墨、田桂舫、王揖唐、王子铭。

总务处：张瑞峰、刘泽普、赵子宾、赵心如、张方严、张燮堂、张锡九、孙逸尘、胡观生、王实平、王寿卿、王鹿苹、丁质初。

文书处：陈幼孳、苏应武、苏继生、萧子超、谢重开、刘雍、张春煦、疏绍澄、曹静波、殷鲁堂、汪崇屏、王性存。

会计处：张瑞峰、张邵溥（兼）、刘静澜、刘耀斌、杨筱章、李达泉、李育民、王子寿。

交际处：王景韩、张燮堂（兼）、苏世荣、丛大经、钱亚民、甄荃忱、邓继禹、刘家驥、刘宝亭、刘显庭、韩子才、察玉荣、万仞千、贾新五、裕振民、傅庆隆、张保生、傅佩青、张儒青、张伯伦、张则良、郭文卿、贾建勋、陈鼎元、许铁丰、陈至宾、张锡章、张彬卿、刘国瑞、黄金如、陈子衡、韦润一、梁任伯、徐殿甲、宁化南、高子丹、周冀景、吴文卓、侯清祥、佟志朴、李松轩、李纪瑞、胡捷三、宋筱牧、李鉴斋、何同生、米少堂、水梦庚、江宝苍、田仲韬、王达三、王悟真、王德如、胡广辅。

庶务处：张邵溥（兼）、苏继生、赵炳章、高合德、秦福亭、洪晋彭、宫鼎臣、吴毅斋、邱佐忱、李达泉、方鬘云、索明文、延奕悟。

警防处：任士杰、赵文堂、孔庆钧。

宣传处：汪崇屏、苏雨田、管翼贤、杨仲华、贾弗荪、郭健夫、陈乃赓、凌抚元、宜永光、吴菊痴、松清溪、宗威之、吴寿彭、李滋园、金达志、江梁、生率斋、白陈群、王泰来、王以之、祝勋、张剑秋、姚又文、松亚农、启具瞻、金应元。

道装、楠材作大殓

吴氏逝世后，吴邸顿时呈现出漫天愁云之惨淡景象，瞩目正堂内，原来悬有前大总统曹锟所题的匾额两方，一为吴氏六十晋三寿辰时所送，词为“养隆日秩”；一为吴夫人五十寿辰时所送，词为“北堂萱寿”。此两匾额均已用黄色纸条交叉封槓起来，仁立院中。所有书画均行撤去。唯有楼房门头吴氏亲笔所书的“三星在户”仰首可见。

根据阴阳先生的勘定，择于5日申刻（下午3点）大殓。什锦花园吴邸门前车马如云。遥见素彩花牌楼已矗立于门前，倒头鼓乐、倒头仪仗均已上齐。预示着一场特大丧事即将拉开序幕。

自吴氏倒头之日起，即有拈花寺高僧15人；广济寺高僧11人，分两班轮流诵经安魂，经声喃喃，乐声凄凄，使人黯然神伤。

大殓前，吴道时等宣布，按乃父的“生辰八字”，入殓时，忌虎、蛇、猪、猴四属相，请有属此四相者回避。

盛殓吴氏遗体的是一具老金丝楠木，四独板的棺材，棺板约尺厚，色紫油亮，系华北第一流的大棺。乃万益祥木厂的存货，原价11000元，但该厂因钦仰吴氏气节，故以7500元之价出售，以表敬意。

大殓开始，先将棺木停放堂内正中，以“交木”（支棺专用的高凳）支起，作“高殓”之形式，取离地三尺即成佛之意。再将两把宫扇，一罩红伞遮住正门。由孝子吴道时等家属4人将遗体异入棺内。遵照吴氏遗嘱，寿衣用道装——沿金边的蓝道袍为外罩；头戴青大沿道帽。望去似与生前消瘦许多，双目已闭，犹含笑容。入棺时，哀乐大作，声音极为悲惨。时日已黄昏，室内一灯荧然呈青黄色，灯光照进棺内，此道装之吴氏，已仰卧其中，上盖红色经被，有“西方道引”四字。至于殉殓之物因遵吴氏遗嘱，仅为其一生所得之勋章，及入道教会中所得之纪念章，以及包金制钱8枚而已。

遗体入棺后，由孝子吴道时为乃父“开光”，用凉水为吴净五官。净毕，请吴之生前至友来棺前一晤，首至棺前者为白发皤然，双目赤红的江朝宗，一望即痛哭他向。其后，陈中孚、齐燮元、汤尔和等相继与此长眠之老友作一瞬之永诀，返身时，均放声痛哭。此时，其家族之人亦随声而哭，一时哀声震天，凡临式之人，如其部下多年子弟兵及下属亲友等均随之下泪不止。吴夫人悲痛过甚，当即昏倒，其男女公子乃纷纷呼唤，声音绝惨。未几，子盖阁上，大盖浮掩，暂不上梢。然后，扣以一卷“堂罩”，上面遍绣寿字，极为精致。灵堂已具雏形。院内棚匠，赶办工事。灵棚为起脊宫殿式，颇为巍峨壮观。

吴家根据既往经验，凡仕宦、绅商富户，人死后，殓物过丰，必要留下后患——坟墓被掘，棺木被毁，殓物被盗。为让世人知道吴氏棺内并无值钱的金银珠宝，古玩文物。故于12月11日，正式在平市各大报刊发表了《六日大殓详情》。当与上面所叙互为补充。其全文如下：

“吴上将军于六日下午四时，由孝子吴道时，甥婿王实坪及属下张劭溥，洪晋彭等数人合作下，开始大殓，吴夫人及儿媳，孙侄，亲戚故旧，朝野名流，各方要人代表，至交属员等，均围观肃立敬视。

上将军外用道服，内衣便服七件，外罩绣花蓝道袍，八卦青袍罩，白袜云履，面貌如生，口微开含笑，衣冠整齐。后当由王实坪向大众报告云：‘现在上将军衣冠袍履被褥等项，均已穿戴整齐，非常舒适，请大家放心。至于殉葬的物品，在别人想，必以为有稀世珍宝，贵重之物，大家请看，这就是左手金，由街买来的不如枣大的金元宝，右手银不值两块钱的银元宝，其余只有这白玉扳指一个，是他老人家生平最爱之品，别的就是这新教会道院、万字会等慈善机关之铜牌十余方。’王氏一面说，一面将如小玩艺的两个小元宝及扳指、铜牌，一一提起，请大众同观，并指白玉扳指沉痛言曰‘君子如玉，他老人家的字是子玉，如今盖棺论定，仍带这洁白如冰的这块玉是如何的干净，如何的高尚，生平乐行的是纲常礼教，五伦八德，所忧虑的是国家人民，所盼望的是和平救国，和平救世。这几个铜牌子是他老人家所忧所乐，所盼望的成绩。看看哪一件是值钱的东西；想想哪一条不是为人类谋幸福的。这样光明磊落的人，他竟然舍了我们走啦！’说至此，王已泪盈双目，不能成声，大家不约而同的一齐大哭，号泣顿足。王乃一面极力劝止大家暂时忍泪，一面手持上将军所著《左氏春秋》一部，曰‘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爱读，近七八年来日夜用心所著的《春秋》。《春秋》的意义是甚么？大家当然都能了解，他老人家读《春秋》，著《春秋》，这部《春秋》当然陪他老人家同去，可算是贵重的东西，大家平常多为《春秋》而来，现在《春秋》也入殓啦！我代表大家扶着棺，看看他老人家的面，诀别四句话：一、清风亮节；二、乐遭爱民；三、精神不死；四、浩气常存！话是说完啦！他老人

家是我们永远不能再见一面的啦！’言至此，哭声齐作。室内外近千人，无一不涕泪涔涔。吴夫人当即昏倒，公子道时及少夫人并亲戚梁荆山、徐敬昌，侄孙晚辈，甥男外女等多人，勉强收泪，极力喊救。半时许，夫人方清醒。政府代表汤尔和、齐燮元及各军政要人，友邦川木大佐并吴旧属张佐民、张瑞峰、赵振鸿、赵恒轩及送三诸亲友、旧属等约二千余人，作最后一面。大殓告

终。”

（编著者按：六日为吴氏接三之期，《文告》说“送三诸亲友、旧属等约二千人”参加大殓，恐与事实不符。接三为人死之初祭，乃殓后之大典，有其固定之礼仪。旧京官庶，绝无送三之前一小时入殓之习俗，显系造作。但亦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保持资料的完整和原貌，除标点符号作了适当调整外，文字一律未动。）

近代罕见的大接三

6日为吴氏接三之辰。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认为，吴氏系国家元老，不幸逝世，殊为国家莫大损失。决定通令各省市一律下半旗致哀。并赠与其家属治丧费2万元。同时，派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代表政府亲去什锦花园吴邸致祭。

接二，即“迎三送路”，乃旧时丧礼之大典。是日，中外名流、各界人士、吴氏旧日属僚，均不约而同地冒着严寒，齐赴吴邸吊祭。什锦花园一带，汽车蜿蜒成一字长蛇阵，佳宾如云，长幼咸集，约数千之众。门前鼓乐声咽，竟日传报不暇。

凡是吴氏亲戚友好，多主动身穿孝服或腰扎孝带。故宅内踉踉跄跄，一片缟白，往来如梭，令人目眩。除自备孝衣、孝带的以外，吴宅赶制的孝服截止到晚间送三，已发出1000余套，孝带、白纸菊花发出无计其数。

前去吴邸致祭的“名流”计有董康、马良、余晋龢、鲍观澄、汤尔和、周肇祥、宋介、冷家骥、何丰林、殷汝耕等，下午为最盛之时，日本侵华军——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多田中将偕笠原参谋长亦亲临致祭。伪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因与吴氏生前有“金兰之交”，特着孝眼往来照拂，颇为忙碌。至于总招待则为王琦、梁柱二人；灵前招待为梁柱及米国贤。由于治丧处组织健全，设备周密，故前后左右，井然有序。

各界赠送的挽联、花圈，琳琅满目。灵棚内外触目皆是。灵堂的帷幕两侧挂着江朝宗的挽联：

“感世谛之纠纷，五教未兴，君竟骑箕归紫阁；
读春秋之余义，一言足式，我思化鹤吊青冥。”

月台前四柱上挂着两幅挽联，一幅是张燕卿的：

“不爱钱，不惜死，不依茆外人，持千秋论定公评首推健者；
能说士，能谈禅，能怡性书画，溯教载追陪和谊腹痛知交。”

另一幅是伪市长余晋龢的。文曰：

“万丈云霄，便运会无常，终有大名垂宇宙；
一身盘错，愿英灵不昧，长留浩气护河山。”

是日，吴宅办了规模盛大的度亡道场，所用僧道之多，为民国以来“伟人政客”丧事中所罕见。灵棚内高悬红、黄、蓝、紫、青各色经幡40幢。棚

内四面搭了三层经托子，每面三棚经，计雍和宫、隆福寺喇嘛两棚，白云观、东岳庙道士两棚；潭柘寺、戒台寺、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和尚五棚；翠峰庵尼姑一棚。共十棚经，总僧道达百余众。乐队亦有数班，除门前官鼓大乐、灵前清音细乐之外，还有伪市府、伪警察局西乐队。更有普化小学学生组织的古乐队，亦竟日参与演奏。

山东旅京同乡会于下午四时半在吴邸灵前进行公祭，由何丰林主祭，贾蕻荪司仪，并读祭文。文曰：

“山东旅京同乡会何丰林等谨以清酒庶羞之奠，告于孚威上将军玉帅之灵曰：蓬莱胜迹，毓秀钟灵，诞生人杰，骨气峥嵘。文章经济，海岱蜚声。心伤国事，投笔请缨。轻裘缓带，韬略纵横。

兼坼开府，丕振成名。荣擢上将，朝野倾诚。力行廉介，矢志忠贞。愤嫉未俗，邪说横兴。匡维吾道，笔诛舌争。等该著述，海内风行。有功圣域，如日之明。晚年好道，书画怕情。静参禅蕴，诠注麟经。春秋褒贬，秉若汤铭。何来厄运，如沸如羹。虫沙化幻，风鹤时惊。东山在望，如望雨零。胡天不吊，劫数相仍。摧我柱石，坏我长城。云霄惨淡，忽陨蒋星。况关梓谊，悼痛何胜，所堪共信，正气充盈。精神不死，虽死犹生。心香一瓣，以誌哀荣。呜呼尚飨！”

读罢，奏乐，举哀。

下午6时接三。首先由吴宅举行家祭，其子吴道时主持行礼。礼仪秩序为，奏乐，孝子孝女出庐，跪，上香，叩首，献爵，叩首，兴，入庐。祭毕，来宾齐向灵位三鞠躬，即行送三。顿时，鼓乐齐鸣，僧众点鼓，齐诵《登云咒》全体举哀，哭号震天。其送三行列大致为：

由治丧处邀请的伪北京市警察局特派的数十名警士开路。金筒大号、官鼓、唢呐、海笛等官吹官打二十四响器；身穿孝衣的执事夫高举白色半透明的大气死风灯数10盏，间以六角形手罩子灯16对，为之照明。纸扎的全副武装的卫兵8名，纸糊的绿帏官轿一乘，由纸轿夫8名肩抬，前后跟夫各一名。由执事夫与纸人为伍，肩抬而行。后为纸扎开路大翻毛菊花青顶马一匹，蓝篷暖厢三面玻璃窗的转轮大轿车一辆；跟马一匹；最后还有纸扎的马弁两名，均骑马扛枪，马弁胸前还贴着吴家给写的名签；一曰“存仁”；二曰“存勇”。表示护送吴氏灵车。在这些纸扎冥器的两旁，除了有伪警宪持枪护卫，还有由治丧处指定的数十人，各手执用白蜡杆子糊成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古代兵器，以便到焚化场看压烧活。冥活的后面是由伪北京警察局派来的西乐团，以铜鼓洋号吹奏哀乐。后面依次为：送三的朋情来宾数百人提灯执香步送，宛如一条火龙。雍和宫的喇嘛13人，拉着大铜号，扛着大鼓，合奏西番乐；白云观的道士13人，身穿绣花对儿衣，敲打着铛、铃、鼓；普化小学学生组成的古典乐队以笙、管、笛、箫、九音锣合奏哀乐；又隆福寺喇嘛13人；东岳庙的道士13人；潭柘寺的和尚13人；广济寺的和尚13人；戒台寺的和尚13人；伪市政府西乐团48名；身穿大白孝袍子的亲族、旧属僚等百余人；法源寺和尚13人；翠峰庵尼僧13人；堂祭清音一班；孝子吴道时执挑钱纸66张，其它孝属则分别捧着上述番、道、禅、尼呈送给神佛的疏表，走成单行。边走边高声举哀，每人都由两位至亲搀扶，并有警、宪在两侧护卫，不准任何闲杂人等靠近。走在最后的是拈花寺的和尚13人。因为吴氏生前皈依拈花寺全朗和尚，故拈花寺在度亡道场中是主体道场，以“主人”的身份殿后。其后还有警察局弹压车；消防大队的消防车；跟随来

宾送三的汽车、自用洋车等。

整个送三的行列延绵数里，香烟弥漫，灯笼火把，一望无际。东四一带，万人空巷，都到马路驻足而观，交通为之断绝，马路上的汽车难以行走，向南去的人力车，均由便道上行走。可见吴宅迎三送路之举其规模势派之大，景况之盛，谓为近世仅有，实非过誉。

送三行列出什锦花园东口向南，经东四北大街折向西行，至隆福寺神路街焚化车轿等冥器，在熊熊烈火中，纸扎的卫兵马弁、魂轿车马纷纷倒化，俱随吴氏去矣。

送三回来后，又有市商会在灵前公祭，由会长邹泉荪主祭，与祭者有商会常委杨绍业等多人。

从晚间9时起，番、道、禅分别上座，施放了对台的观灯焰口。听经观礼的亲友、旧属僚等约数百人。

次日，即12月7日，京津各大报刊均以“一代完人孚威上将军昨日接三盛况”为题，做了详细报道。

正式发出讣闻

吴宅根据北京的风俗习惯，于吴氏“首七”（即死后的第七天）之前正式发出讣闻（同时从10日起开始见请各大报刊），公布了全部丧礼日程。文曰：

“不孝道时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显考子玉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国历十二月四日，即夏历十月二十四日申时寿终北京本宅正寝。距生于前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三月初七日卯时。

享寿六十有六岁。不孝侍疾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兹谨择于国历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夏历己卯年十二月十六日，移灵安厝于北京拈花寺，择吉扶柩回籍安葬，叨在，恕讣不周学世族戚乡谊哀此讣

国历二十九年一月十六日成主

一月二十一日家祭

一月二十二日开吊

一月二十三日伴宿

一月二十四日发引

闻

奉

继慈命称孤哀子吴道时智中泣血稽颡

齐衰期服孙运乾坤泣泪稽首

坤

未亡人吴张佩兰泣血稽颡”

讣闻上开列的丧礼日程比实际情况要简略得多。吴氏在家停灵受吊，如以阳历计算，乃是跨年度的，也是跨年代的。民国28年（1939年）12月4日逝世；

12月5日申刻大殓；

12月6日接三；

12月10日首七送库；

12月17日二七公祭；

12月24日三七送库；

12月31日四七公祭；
民国29年（1940年）1月7日五七送库；
1月14日六七公祭；
1月16日申刻成主；
1月21日七七家祭；
1月22日开吊；
1月23日伴宿送库；
1月24日巳时发引（移灵拈花寺）。

吴氏初终，原本计划在家停灵十四天之后（即半个月）移灵于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后因有人提出在吴氏皈依佛教的拈花寺庙内建一“武圣祠”，暂厝于此，至于扶柩回籍，安葬祖茔事，待日后再议。经治丧处与其家属讨论协商后，决定采纳这一建议。为了等待建祠工程初竣，故拖延至52天，但在提法上遵照旧制，以“七七”49天论。

“首七”公祭

吴氏作古已届7日，盖“首七”历为丧礼中最重要的一环，什锦花园吴邸车马盈门，“朝野名流”纷往吊祭。

吴氏生前曾与江朝宗办了一个所谓“救世新教”。吴氏为“主教”；江氏副之。故于吴氏首七之日，该教总会暨正一堂同人偕赴吴邸举行公祭。当时执事人员计为：主祭江朝宗；襄祭蒋尊祹、田步蟾；陪祭沈大静、陈悟息、杨子江、王悟真；读祭文高合德；赞礼延奕悟、索明文；司香张理博、徐守勤；司爵赵学谦、赵学镇。

公祭悉遵古礼，大有祭孔的意味。祭礼开始，由赞礼延奕悟朗声高喊：“肃立排班！”襄赞索明文接喊：“执事各司其事！”从此拉开祭典的序幕。

“乐生就位！”由乐舞传习所高合德将一队身穿古装，手持各种民族乐器的“乐生”带至灵堂月台对面站立整齐。

“主祭就位！”江朝宗身穿蓝缎团花罩面的皮长袍，金貂绒的马褂。临时加了一件肥大的孝衣。由两人搀扶上了月台。

“陪祭各就位”蒋尊祹、田步蟾、沈大静、陈悟息、杨子江、王悟真等皆白孝加身，走上月台。江朝宗面向灵位站立正中，陪祭者立于两侧。

舞乐生起乐。司香张理博将大藏香一炷在灵桌的右烛台上点燃后，交予主祭人江朝宗，江接香向前跨进三步，双手一举，即由徐守勤接过来插入香炉江跪拜。如此反复三次——初献香、亚献香、三献香。然后，由司爵赵学谦执壶，赵学镇把盏，酌满酒爵后，递与江朝宗，江双手举过头顶，泼入奠酒池内，江再跪拜。如此反复三次——初献爵、亚献爵、三献爵。乐止，由高合德上前展读祭文，文曰：“维天运己卯年孟冬月翔壬子越二十九日辛巳，谨以香花酒果，致祭于我救世新教主吴公智玄之灵而言曰：呜呼！云黯九霄，将星遽陨，风凄四野，大雅云亡，哀哉痛哉！公自解尘缘脱离苦海，扫除世谛之纷纭，竟作仙游之高洁，是否出神而上谒仙佛耶，抑系乘云而覲见玄祖耶，是耶？非耶？使我心恍惚不知其所以然也！哀哉，痛哉！神思目企盼公来临。虽然了此入世之勋劳，尚希仍存度世之夙愿。主教之行，伟哉，壮哉！使我同仁羨之无已。当兹乱世时危，正赖宏兴新教，挽回浩劫，福庇群生，指导五教。信徒日弘其道，宣传五洲，士信日进其功弭灾，化劫消患

无形，三千大千世界共成极乐。仙耶！亿兆男女信徒，同游清净福地，功成复位，天乐相迎，赫赫声闻，欢腾海宇，大德深仁，岂以亚洲庆颂。已耶！今主教灵归紫府，名列仙班，上陈玄阙，垂念黔黎，求无极鸿恩，泽有生之兆庶。宏兴五教，化及万及，天赐良机，人力展布。新教行于中外，明经遍及亚欧，懿欤休哉！何亟骑箕竟去，盼时时化鹤归来。星垂月落，何处再觅音容？风疾云驰，不禁怀思老友。呜呼！遗容在望，而泪洒千行。讲学未忘，而声吞五内。哀哉，痛哉！悲何如也？灵前稽首，来格来馨。伏维尚飨！同门慧济江朝宗端肃拜奠。”

高合德读罢，复由副教统、主祭人江朝宗亲自展读一遍。读罢，奠爵（如前仪）全体皆跪，三叩首，遂告礼成。

祭礼中，乐舞传习传“乐生”演奏古乐数阙，清凄婉转，聆之诚有徒唤奈何天之感。而肃然无 的悲壮气氛，尤使公祭具十二分之庄严景象。

“首七”居士讽经

吴氏“首七”之日，各界除致送花圈、挽联、纸扎冥活、祭席之外，还有送经忏、焰口者，是日，番、禅、居士共六棚经，轮流诵经超度。

救世新教总会送本会正一堂居士 24 人，干灵台对面山石前设坛，布置极力堂皇严肃，实为平日所罕见。所有居士均头戴如来帽，身穿海青大袍，加披紫红色的缙衣，跪诵佛教名贵经典。据说，正一堂居士只给段祺瑞、曹锟二人作过这种度亡佛事，此次乃为第三次。

各方面所送的经忏还有：张瑞峰将军等送长椿寺 13 人禅经一坛；刘静澜送嘉兴寺 15 人禅经一坛，张锡九送弘慈广济寺 15 人禅经一坛带焰口，五姑奶奶、老姑奶奶送雍和宫 13 人番经一坛；全朗方丈送拈花寺 13 人禅经一坛带焰口；普善莲社杨显禅送 17 人居士经一坛。棚上已吊满五颜六色的经幡，棚壁挂满佛画。并不亚于“水陆法会”的隆重场面。

“首七”家奠、送库

下午 3 时许，举行首七家祭，由孝子吴道时主持，王实坪赞引。孝子依次出帟后就位，匍匐（再三），继上香（再三），又匍匐（再三），旋即献爵，最后又三匍匐，即告礼成。

下午四时送库。所焚之物除楼库、杠箱，还有吴宅为吴氏糊妥全套书房设备，计有书桌一张、转椅一把。桌上陈列品有金刚经一部，春秋一部，桌灯一架，仙人球两盆，无线电一具，茶壶、茶碗、茶盘全份，印石连盒全套，香炉一尊，墨海一个，墨水盂两个，笔筒、笔架各一，内插大小毛笔。糊工精细，惟妙惟肖。均在大佛寺西街一并焚化。

各界亲友参加送库的约有千余人，伪北京市警察局特派伪警在送库行列前后左右严加警戒。附近居民，呼群结伴，扶老携幼，空巷往观。

送库时，鼓乐喧天，民乐西乐、经声佛号，交织于一起。所有的纸活都雇人肩抬，走在最前面，官鼓大乐二十四响器前引。次为伪北京市警察局西乐队；雍和宫的喇嘛 13 人；拈花寺的和尚 13 人；嘉兴寺的和尚 15 人；长椿寺的和尚 13 人；弘慈广济寺和尚 15 人；堂祭清音“九福班”；便服来宾，均腰扎孝带，胸前佩戴白菊花一朵；乐舞传习所民族乐队一班，以笙、管、

笛、箫吹奏古乐；孝服来宾；男女孝属，分别捧着各经坛呈送神佛的度亡文疏。其后为女宾；救世新教总会正一堂居士 24 人；普善莲社居士 17 人殿后。送库行列的后边跟着有伪警察局弹压车；消防大队消防车；送库来宾们的自用汽车、自用人力车等数十辆。

送库回来后，吴宅办了通宵达旦的“往生逍遥道场”。弘慈广济寺 15 位高僧，由显宗作金刚上师，放诵南韵“瑜伽焰口”一堂，拈花寺 13 位高僧，由全朗作金刚上师，放诵北韵“舍施功德瑜伽焰口平等无遮甘露法食”一堂。两台对擂，盛况空前。听经观礼者约二三百人。

十二天大祭

首七已过，二七未至，12 月 15 日，吴氏又掀起祭奠高潮。大抵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大将、总参谋长板垣中将等派人来吊有关。治丧处对此日祭礼、经忏、招待均做了周密部署，大有迎接“太上皇”谕祭的意味。

据说，西尾大将、板垣中将由于公务繁忙不克分身，特派总参谋副长铃木少将代表，于 15 日下午 4 时半，赴什锦花园吴邸致祭，由伪治安部总长齐樊元陪祭，并进行招待。此外，日本政友会总裁久原房之助；众议院议员丰桥，市长大口喜六，亦专程到京赴吴邸吊祭。伪政府立法院院长温宗尧；第二路总司令崔培德等均于下午至吴邸致祭，均由齐氏陪祭。

为了配合此项“外宾”公祭，以示隆重起见，吴宅竟日讽经礼忏，鼗鼓齐鸣，经声喃喃声达邻近。共讽经、施食六堂。计：拈花寺常住送法师 13 位讽《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一堂；冈野等公送翊教寺法师 15 位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堂；智莲道长送莲花山下院坤道 9 位讽《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三官北斗经》一永日；崔润卿送拈花寺法师十五众施放“瑜伽焰口平等无遮甘露法食”一堂；本家自请弘慈广济寺法师 13 人施放“瑜伽焰口甘露斜食”一堂。因此，是晚仍为南北两韵对台焰口，通宵达旦。

下午 1 时，云南旅京同乡会至吴邸举行公祭，由吴煦主祭，行礼悉遵古制，并由吴煦亲读祭文。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云南旅京同乡公会同人吴煦等，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孚威上将军子玉，哭之灵曰：

呜呼！泰岳云黯，五丈星沉。繁星烂宵，卿月孤明。奕奕吴公，降灵齐鲁，绉灌能文，隋陆能武。当公未遇，艰险备尝。岂知天意，大任方将。既选莽莪，嗣拥貔虎。荡秽滌腥，震今铄古。操心虑患，既危且深。东西南北，百炼精金。败不自馁，胜不自矜。惟返诸己，不庇于人。操舟舵稳，负重肩牢。所谓栋梁，不折不挠。呜呼！一部天星，奎宿几个？四海滔滔，完人几个？叹天道之难知，终稀世而寡和。哀哉，尚飨！”

是日，吴夫人张氏还挂出了自撰的冲天大幅挽联。上款为“子玉夫子灵座”，下款为“未亡人张佩兰泣上”。挽词内容，哀感婉转，伉俪情深，跃跃于字里行间，每联凡九十八字，对仗颇工。

“托微茎垂四十年，维君矢志澄清，我亦誓同九死。计自衡湘振辔，张大义以驰骋中原，汤雪折枯奸回掃亦封丘建揭，草木知名，环宇震威棱，方期律吕风云，夷宴河海，讵意豺狼抗毒，屡囊萧墙，逢举世之狂攘，险阻艰难，伉俪相偕聊避地。

“转飞蓬达数万里，于是积忧危乱，责更毕萃一身，忆从巴蜀还辕，彰宏谟而甄陶庶汇，放词拒行圣贤为归，笔伐口诛，春秋秉正，重瀛尊矩范，群企晒骚荒秽，寢息干戈，顿教鹏鸟鸣哀，遂来桑户，导全家而踟蹰，凄歔怆恒，绸缪挥泪苦呼天。”

治丧处连日来已收到挽联数百幅。其中，不乏佳作，早年与吴氏同在武备学堂就学的李际春前后送来两幅挽联。

第一幅：

玉公学长上将军灵鉴

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

同投军，同就学，同拯国难，抚棺痛哭，岂独念私情。

同学弟 李际春 拜挽

第二幅：

是奇男子，是真将军，家国系安危，斯人胡可死？

为天下忧，为民众惜，行藏系劫数，天道竟难论！

（注云）半成之丧，举国同戚，况四十年间叨在契末，噩耗传来，能无心痛？前联情犹未尽，再志数语，以志将军之亡，为天下之同悲，非一二人之私痛也。时艰未艾，吾与谁谋？天其犹未厌乱欤！悲夫！

李际春 再挽

“二七”公祭

12月18日为吴氏“二七”之辰。是日又有8个单位和“名流”个人前往什锦花园吴邸致祭。吴氏灵前，月台上下，摆满了各种祭席和满筵——饽饽桌、果桌。均挂着蓝、青素缎绣了青云白鹤的桌围，加上两条白缎带，一书“孚威上将军尚飨”，一书祭奠单位或主祭人的名号。大多是用鼓乐抬进来的。尽管随时撤换，月台两侧仍是堆积如山。棚外墙壁上所贴的黄纸礼单几乎重叠起来。

下午3时，河南同乡会会长袁乃宽，率旅京河南士绅公祭。由袁乃宽主祭，上香、献爵，行礼如仪后，展读祭文。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夏历己卯岁冬十一月初七日戊子之夕，旅京河南同乡袁乃宽、陈铭鉴、陈全三、宋庚荫等，谨以香花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孚威上将军之灵曰：于乎！岳岳吴公，国家元气。内服外警，磊落严毅。微疾致陨，天愁人泣。名节独完，安危谁寄？文宗孔孟，武崇关岳。诠释春秋，骊珠在握。海国争购，无间南朔。大将兼儒，凤羽麟角。古今英雄，奚止千百。历劫不磷，独标奇格。充此精神，常留毅魄。护持禹字，勿俾裂墉。昔镇豫州，荡寇保民。盛德阁泽，肌浹髓沦。岱宗遽颓，崧震洛堙。酌酒致祝，敬迓明神，尚飨！张伯驹、陈铭鉴、李作民、魏振声、王实坪、陈尧初、袁蓉荪、宋庚荫、郭法西、潘印佛、高理亭、岳效鹏、袁梦潭、李滋元、张子湘、吴公纯、陈梦矩、高靖候、赵绍宣、阮会亭、魏少璞、刘伯、李庚先、阮农仙、卢祖铭。”

宣武门外私立汇文小学（第三）师生公祭。由该校学生歌咏队合咏自编的《哀歌》，以提琴、钢琴伴奏。别开生面。

歌前，先奏哀乐一曲，再由校长苏文德朗诵哀歌序言：

“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私立汇文第三校长苏文德率

领学生歌咏队，与杨宝忠先生、苏文德夫人提钢琴合诵于孚威将军吴玉帅灵前。歌曰：（至此，学生合咏）蓬莱境，东海滨，诞生大英雄，处忧患，如安居，志在拯愚蒙。众人民皆感戴，将来定成功。到现在，成往事，徒留身后名。嗟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去了救国晨星。溯往自，掌戎权，除暴在人间。虽尚武，亦习文，国难怎息肩？东西征，南北檄，心比铁石坚。只怨恨，身先死，地下竟长眠。嗟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去了救国圣贤！

近年来，隐居在北京城之隅，不贪财，不怕死，不住租界地。善绘画，兼真草，乐此无聊耳。待时期，挽国难，使民登衽席。嗟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去了救国隐逸。日月失光兮，又逢黑云幕幕，天地色变兮，伟人骤尔远逝。前途茫茫，是谁来挽救疮痍？我众无法，只有仰天长叹息。嗟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

去了救国神裔。”

文颇哀婉。却道出了真情！

此外，前去吊祭的还有：北京铁路局局长关衍麟；中华同义会北京同义会代表杜汉三；山西省省长苏体仁；北京医界同仁；沧县县长；名流劳之常等。

“二七”之日，治丧宣传处致函各大报社，征集吴氏生前的遗物，如诗文、墨迹、往来信件、照片等，以便汇编成刊，而传久远。原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孚威上将军本月四日病逝京寓，将星陨坠，大树凋零。噩耗传出。举国哀怀。盖将军人格崇高，勋业彪炳，感人之深，良有以也。窃念将军旷代奇才，中外共仰，其言论风采，以及文章著述，可资后人矜式者何限？势非广为搜集，不足以彰其精神之伟大，不汇刊遗著，不足传其言于久远。唯同仁等对于将军遗物珍藏有限，而散佚世间者甚多，倘能宣扬报端，征诸友好，凡有珍藏将军名贵照片，诗文、墨迹、寸笺尺牘、公私函件，生平遗物等，或赐还保存，以便陈列之需；或暂借观摩，以供编辑之用。

必能集腋成裘，事半功倍。又如：外国关于将军一切稿件，如蒙不吝珠玉，均所竭诚欢迎。素仰贵报对于将军人格勋业，钦佩正与人同，必将乐观其成，予以赞助。用敢不揣冒昧，乞将此函刊登报端，籍广流传，共襄斯举。他日遗著刊成，四海矜式，亦邦国之幸也。临颖不胜盼祷之至，耑此奉恳。顺顿撰安！吴上将军治丧处谨启。”

经坛与道场

吴氏晚年对自己毕生所作所为有所反思，为在精神上求得彻底解脱，因而循入空门，而且是“显密双修”。前后拜太虚国师（据说，太虚是蒋介石之师，曾被授予国师称号）、拈花寺退居方丈全朗为师，修习“显宗”；复拜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师，接受“灌顶”，修习“密宗”。自称“蓬莱居士”，成为在家学佛修行的“三宝弟子”。确实像他在《满江红》一词结尾所说的“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他在佛教界的名衔、荣衔极多，尽人皆知的有“五台山普化向善佛教会”会长、西直门外念佛会名誉会长等。

吴氏晚年好道，有儒、释、道三教圆融的思想。故与江朝宗等人又搞起了所谓“救世新教”。

因此，他死后曾连续作了“七七”49天的度亡法事，其规模之大，是令

人难以想象的，几乎北京著名的寺院、宫观的番、道、僧、尼、居士都云集于吴邸，为他诵经、礼忏、燃灯、施食，大作“身后功德”。这些经忏法事除吴家自请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寺院、宫观主动送上门去的，还有的是吴氏亲友、旧日老部下属僚及各界“名流”赠送的。仅从民国 29 年（1940 年）1 月 1 日起至 14 日两周不完全记载，即有 20 坛之多。计有：

1 月 1 日：

法源寺住持天文送禅经 13 人，讽诵《金刚经》一永日，晚间设瑜伽焰口一堂，成为“昼夜功德”的道场。

拈花寺常住送禅经 13 人，礼《目犍莲报恩法忏》，永日功德。

1 月 2 日：

拈花寺常住送禅经 13 人，礼《目犍莲报恩法忏》，永日功德。

弘慈广济寺常住送禅经 13 人，放瑜伽焰口一堂，晚分功德。

1 月 3 日：

法源寺送禅经 13 人，讽诵《妙法莲华经》一永日；晚间设放瑜伽焰口一堂。昼夜功德。

拈花寺常住送禅经 13 人，礼《目犍莲报恩法忏》，永日功德。

1 月 7 日：

雍和宫番经 13 人，唵《报恩经》一永日；晚间设放传灯（观灯）焰口一堂。昼夜功德。

宝智请弘慈广济寺禅经 13 人，讽诵《报恩经》一永日；晚间设放瑜伽焰口一堂。昼夜功德。

白云观道经 13 人，唵诵《太上道德经》一永日；夜设萨翁铁罐 度施食一堂。是为昼夜功德。

卢翰章送承寿寺音乐禅经 13 人，讽诵《佛说阿弥陀经》，永日功德。

翠峰庵送比丘尼（尼姑）经 13 人，讽诵《金刚经》永日功德。

1 月 10 日：

拈花寺禅经 13 人，礼“报恩忏”一永日。

长椿寺禅经 13 人，唵《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永日，夜间设瑜伽焰口一堂。昼夜功德。

1 月 12 日：

拈花寺禅经 13 人，礼“报恩忏”一永日。

杨云史送广济寺禅经 9 人，礼“净土忏”一永日；晚间设放瑜伽焰口一堂。昼夜功德。

1 月 14 日：

满洲同乡会送承寿寺音乐禅经 13 人，唵诵《金刚经》一永日；晚间设放瑜伽焰口一堂。昼夜功德。

弘慈广济寺禅经 13 人，讽诵《报恩经》一永日。

拈花寺常住送禅经 13 人，礼“报恩法忏”一永日。

白云观道经 13 人，讽诵《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一永日。

正道坛弟子送潭柘寺禅经 48 人，施放“七如来”（七位金刚上师放正）瑜伽焰口一堂。昼夜功德。表示弥陀如来四十八愿，悉皆周隆；圆满。

据传闻，在后来的佛事中，还请了 108 位高僧，放了一堂“七如来”焰口（也作“七大师”焰口）。灵前搭了三层大座，上座搭了七个幡门，有七位头戴毘卢帽、五佛冠的金刚上师主法，由拈花寺、广济寺、柏林寺、贤良

寺、潭柘寺、碧云寺、龙泉寺等七庙的方丈担任。“七大师”当中的正座是潭柘寺方丈茂林大和尚。中座是吹打法器的僧众；上座金刚上师“举赞”（引领唱念经赞）时，由下座僧众“接赞”。这种规模的瑜伽焰口施食是近代度亡佛事中所罕见的，其耗资之巨，虽不知确数，但拈花寺的何铺排（伺候经坛法座上僧众的杂务）所分得的“衬钱”（施主给和尚和铺排在经份之外的赏钱）就够买三所瓦房的。

“四七”公祭

12月31日，即民国28年（1939年）阳历除夕，是吴氏“四七”之辰。是日，天道龙华圣教会马仙龙、马圣祥等代表该会至吴邸致祭，用四人抬的彩亭一座，内悬“文型武范”缎匾一方，由清音细乐一班前导，抬进吴邸，由治丧处礼宾人员及官鼓大乐至路口迎接。进棚后，首先在灵前献祭席一桌，由马仙龙主祭上香、献爵后，再由马仙龙和马圣祥将缎匾从彩亭请出，呈献给孝子吴道时，当被治丧交际处礼宾人员指定悬挂于灵堂正面的上首。悬匾后，由孝子就地叩谢。紧接着，河北省救济总会亦派人送来大匾一方，上书“泽被苍生”。行礼如仪后，悬挂于灵堂正面左侧。

是日，灵前度亡法事二坛：正面经台上是万成当送的白云观道经13人，讽诵《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一永日。左首的经台上为翠峰庵住持赠送的尼经13人，讽诵《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一永日。吴宅自请的拈花寺高僧13人，礼“梁皇慈悲宝忏”一永日。据说，佛教的“梁皇忏”和道教的《皇经》是至高无上的“极品真经”，只有盛大的道场才有这种法事。

“五七”送库

民国29年（1940年）1月8日，为吴氏“五七”之辰，什锦花园吴邸除了大门口外，其左右墙界扎了过街的素花牌楼。南墙陈列着各式以松柏枝编扎的冥活：松麒麟、松双狮、松鹤鹿……并由永盛杠房晾出了幡、伞执事、“肃静”、“回避”、虎头牌、魂轿。牌楼的左右（相当于孔庙前“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位置），陈列出纸制双碑，高可丈许，由昂（驮碑的大石龟）驮之，花纹至细，碑面黑地白字，内容为吴氏生平事迹。与宫观、庙宇大殿前的石碑无异。裱工精巧，最为逼真，望之若不以手抚摸，决不知为纸制者。据说，这是北京各王公府第的大丧中，所没有用过的冥活。

吊客从四面云集而至，送冥活四季花盆者有之；送金山银山、绸缎尺头者有之；送花圈、挽联者有之。棚内祭席已无处可摆，只要上祭人行完礼后，马上撤去。来吊的人流中有：伪市长余晋猷率市署各局、处、科长以上职员；嵩祝寺佛教同愿会会长王揖唐、总长派理事王度公率全体会员；下午，伪政治部总长齐燮元率部官员……约数百人。

是日，继前数次举办了盛大的度亡道场。计有番、道、禅、尼等六棚经。雍和宫喇嘛13人，讽诵《报恩经》一永日；弘慈广济寺禅经13人，讽诵《报恩经》一永日；拈花寺禅经13人，讽诵《报恩经》一永日；承寿寺音乐禅经13人，讽诵《金刚经》一永日；白云观道经13人，讽诵《太上道德经》一永日；翠峰庵比丘尼经13人，讽诵《金刚经》一永日。

下午5时，各经坛功德圆满，举行了盛大的送圣——送库仪式。除官鼓

大乐、堂祭清音和上述番、道、禅、尼六棚经外，还有伪警察局的西乐队。参加送库的来宾高达千余人，仅穿孝衣者即有五六百人之多。沿途观者如堵，其盛况不言而喻。送库的路线是按治丧处既定计划进行的，出什锦花园东口，至东四牌楼西行，至隆福寺前神路街焚化冥器。

所焚冥器除加大尺码楼库（三丈多高的楼；两丈多高的库）之外，并有纸扎大小沙发全套；八仙桌一张，上摆古玩陈设；书桌一张上摆文房四宝；四季花盆，骑马扛枪的卫兵等等，还有本家少姑奶奶、老姑奶奶给糊的一把大伞。晚间有雍和官喇嘛的传灯（观灯）焰口一堂；广济寺、拈花寺对台的瑜伽焰口施食；还有白云观道士的“一元无上萨祖铁罐炼度施食”一堂。

“六七”公祭

1月13日为吴氏“六七”之辰，除继续由白云观道士，广济寺、潭拓寺、拈花寺、承寿寺高僧讽经礼忏外，又添了新的“精彩节目”。

北京市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会长谢天民及各在理公所（基层组织）理事、主任，以及东直门羊管胡同德爱堂沈星垣、沈梦飞、沈竹轩等人组织的民间香会“万寿无疆”（清慈禧对该会的封号，是清皇家御览过的香会），五虎少林棍，及金顶妙峰山各档香会的督管（香会首脑）、会员等，为颂扬吴氏生前功绩，公议集金制成了万民旗、万民伞等数十件。特于是日“六七”之际，以各档香会的“文场”恭送至吴邸。下午1时，各档香会成员都在德胜门内大街德胜桥会员范月川家里集合。照例由“神耳”——二人肩抬的大广镗用大鞭子抽打，以示开道，后边由数十人擎举旗、伞前行，十几档子文场随后，每档子文场均是大铙、大钹、镲锅、堂鼓，敲得山响，震耳欲聋。还有旱秧歌腰鼓队打着大秧歌“亮、咚、强”的点子。两旁随员肩挑插满会旗的“笼子”

（“笼”读作“拢”，是民间香会所特制的圆箩，内放香蜡、钱粮、道具、乐器等），笼上的小铃哗哗作响。送伞献旗的队伍从德胜桥出发，经由果子市、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交道口、北新桥、东四北大街、进什锦花园东口至吴邸。治丧交际处派员暨官鼓大乐、清音班吹吹打打至道口迎接。行人驻足围观者不下千余人，盛极一时。及至香会进院后，所有旗、伞，均被插在了事先准备好的执事架上，列在甬路两旁，成为一道“屏障”。随即由理善总会会长谢天民主祭，向治丧处呈递礼单，举行了献伞献旗仪式。五坛僧、道均轮流至灵前转咒诵经，为之“祝赞”。

吴氏“六七”前夕，即1月12日，内三区东直门内羊管胡同公益会，特联合附近街巷公益会共17会，制作祭匾一方，文曰：“英名宇宙”，雇四人肩抬素彩亭一座，内悬祭匾。延请羊管胡同德爱堂沈星垣、庆子余等，领导“万寿无疆”太平五虎棍文场及幌旗多堂，沿途演奏，观者如堵。于上午10点半出发，经东直门大街、北新桥、东四北大街，送至吴邸。并举行了公祭仪式，由羊管胡同公益会会长捧读祭文。

以上这些万民旗、伞及匾额，日后都成为吴氏发引时仪仗的一部分，为吴氏身后哀荣增色不小。

民国 29 年（1940 年）1 月 16 日，即阴历己卯年腊月初八日，为吴佩孚死后成主之日。东城什锦花园吴邸门前的过街牌坊乃由素彩换成花红彩。灵棚内外的全部挽联、挽幛都以整匹的红布象征性地遮挡起来。灵前红烛闪烁，灵龕上的昆卢帽顶子也扎了一排红黄两色的彩球，甚至连桌围子、椅套都换成了红的。这是成主大典所特有的场面。人们一向将成主视为白事里的红事。当然，吴宅也不例外。

吴宅以重礼恭请傅增湘（四川江安人，字沅叔，清宣统溥仪之师。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为鸿题官；恭请潘龄臬（河北白洋淀人，清代翰林。民国后，曾任甘肃省长）、张海若（湖北人，碑文拓片收藏家）为鸿陪；高淞笙为鸿书；陈幼孳、劳逊五、孙汉尘、高淞笙为襄题；崔耘青、张馥卿、孙子涵、萧子超为鸿赞（司仪）。凡是吴氏生前故旧友好，以及治丧时期出力之同仁均参加了襄礼。礼仪极为隆重，很有一番古国遗风，为三四十年代所未曾有者。

谨择于下午 3 点（申正）为成主吉时，二时，先由吴宅派代表梁仁伯赴鸿题官傅增湘宅恭请起驾。陪同傅氏返抵吴宅时，孝子吴道时预于大门内跪接，当即以红毡进行遮挡。随后，被前引官引入客厅休息。3 时，孝子吴道时换上了素乙种礼服（蓝长袍、青马褂），由各员陪同至后宅客厅，向傅氏及鸿陪二官依次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表示叩恳赐福。然后，引导傅氏及鸿陪、襄题、鸿赞各官赴灵台前，以鼓乐先导，继以乐队、后为清音班。红罗伞下，年高德劭之傅元老偕鸿陪等官缓步行进。是时，观礼者达数百人，均肃立于铺地之红毡两旁，静观此庄严肃穆之大典。

行礼开始，执事官各司其事。鸿陪张海若因故未到，临时由符定一代理。孝子出帟，至灵前三叩首；执事者将神主双手授予孝子。神主为两层，古典宫殿式，雕刻玲珑剔透，极为精美。孝子诣案前，跪请神主升公案后即俯伏于拜垫。左襄题官接主去“魂帛”（黑红绸），启榑出主、分主、卧主。神主外函之文为“显考子玉府君之神主”。先点外函，次点内函，均由傅氏执笔向东受生气，然后凝神想象吴氏神形予以加点，其朱点特用血，由孝子以针刺破中指，用笔蘸指血点之。点罢，傅氏起立致成主祝词曰：

“维公诞降，海岱英灵。功成名遂，回驳青冥。忠魂毅魄，炳耀日星。贞风劲节，华著典型。气无不之，神则有凭。方明为主，宗祜是升。灵其未格，庙亲永宁。吉蠲用享，明德为馨。肃雍显相，纯嘏斯承。重麻锡祜，长启云礽。”

文乃为傅增湘自作自书。读毕，即将此祝文放入主盒。最后，由孝子双手接主，诣香案前，安主就位。复入帟，易孝服。鸿题官、襄题官诣月台灵案之前行荣主礼三鞠躬。至此，番、道、禅、尼经乐齐作，谓之“祝赞”。一幕庄严绝顶的成主大典，遂于一片肃穆气氛中告成。

古风儒礼行家奠

1 月 21 日为吴氏“七七”之辰，于晚 7 时举行家祭。首由孝子吴道时率孝孙吴运乾、吴运坤祭奠；次为吴夫人张佩兰祭奠。并聘礼宾张馥卿、崔云卿、许铁峰、李润江、孙送尘、谭约安、刘泽普、张燮堂等 8 人襄祭。番、道、禅三棚经参加祝赞。一切仪式悉遵古礼，庄严异常，诚是汉家古风儒礼的再现。

根据吴宅拟定的“家祭礼节单”共分为五个环节。

序幕：

擂鼓三通（由鸣赞人向棚外高喊“发爵！”由官鼓大乐中的鼓手敲官鼓。鸣赞人喊“严鼓”，鼓止。如此反复三遍）。

鸣金九响（由鸣赞人向棚外高喊“鸣金！”由官鼓大乐中的鼓手敲大广铎，二人对敲）。

执事者各司其事。

孝子、孝眷出帟，各就位。

一、行迎神礼（即迎请亡灵就位，实际上是祭礼的准备工作）。

奏乐（由原堂祭清音班以笙、笛、小铎、堂鼓合奏细乐）。

孝子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起立）。

孝子诣（至）盥洗所，濯手，净巾。

孝子诣（至）匙箸案前拭视匙箸。

孝子诣（至）酒罇所，司酒者启幕酌酒。

孝子诣灵案前，跪（跪于灵桌前的高垫上），孝属皆跪。

燃烛（由礼宾人员将两烛从蜡扦上拔下交孝子，礼宾人擦火，由孝子交捻而燃之，复交礼宾人插还蜡扦之上）。

焚香（由礼宾人将香递与孝子，由孝子执香在右首蜡扦上燃点，双手往上一举，由礼宾人接过来插入香炉内）。

献爵（将酒盏双手摆于供案）。

献祭文（将祭文双手高举，放于供案）。

与祭者皆跪，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奏乐（官鼓大乐带小乐吹奏十分钟后，由清细乐继奏）。

二、行初献礼孝属皆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

孝子诣灵案前，跪，皆跪。献帛，献爵，献匙箸，献茗（茶），献穀（穀音 xiáo，古祭礼，切卤为穀，乃升于俎，谓之“穀烝”，见于《左传》），献炙肉，献羹。乐止。

孝子读祭文：

孝子吴道时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不孝男道时率孙运乾、运坤，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显考吴公子玉府君之灵而泣以文。曰：呜呼！曩读《韩诗外传》臬鱼之言曰，‘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待。’以吾父之健在，岂知其言之可悲而可殆。时乔荫之忽失，如天地混茫之无日。羹和纵辔于西阿，感万物之回薄，时已逾乎七七。忆屠维作噩之始壮，圆舒循晷而未及于望皇览揆，而不孝以生泣皇皇兮音亢，于是王母欢容，叹为家祥所钟。幸纘戎乎祖考，命绍承乎吾父之大宗。置怀溺水之年，恨子身含飴，不得复绕于王母之膝前。彼蒋常之咏榭花，时随父保阳，而赁居臬伯通之数椽。侍节洛中，四方来同。萤窗雪案，经史交攻，羲之方得枕秘。吾母李夫人旋即违养捐弃，归母灵于故里蓬莱，赅阮孝绪之五经诵记戴凭说经席重德用为铁门先锋，虽先后同其岁纪，徒袭迹于榆关之表，岳汉之冲。若大陆宣公以鸿词列名翰班，悉达多因人道，而独住雪山，皆年方十八九。而不幸乃频往来于京郑，更阻足以蜀关。呜呼哀哉！自韶年以达弱冠，会中原之多难。伟吾父之鹰扬，屡削其祸乱。雷寓宙而压河岳，龛靖及于天下之半。伤侍奉之虚时，惭衾影于昧旦。尔乃节钺北归，获覲庭闱，亲承易象，发蕴抉微。

箴春秋之膏肓，总群经而绝韦，探五教之渊海，道先天而弗违，遂慎修以守天，符，委命以国道，腴，课孙训子，亦释亦儒，锚尘轩冕，一束生刍。征延年于美意，复神游于藐姑。既体轻而骨健，凝冰雪之饥肤。方期颐之未足道，何计乎痾恙之有无？况阴殒不阳，怵满地之搀枪。更川枯而山竭，威延颈企踵于吾父之和先。呜呼哀哉！彼昊天之浩浩，叹劳人之草草，宏丧乱而无嘉，胡不慈此一遗老？呜呼哀哉！少缺晨夕之养，壮恻陟祜之诗。以微疴而遽致危笃，窃腐齿于庸医。呜呼哀哉，天只人只，于今已矣！攀恸呼号，父终不起。丰洁染盛，肴嘉酒旨，父若不闻，亦复不视。冀丹旌之归魂，庶来格兮。鉴此。呜呼哀哉！尚飨！”

吴妻张氏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之二十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未亡人吴张佩兰，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子玉夫子之灵而泣以文曰，呜呼！君竟自是终古耶！胡天不吊，歼我良人之速也，慨自清季庚戌之岁，执巾栉侍君长春时，君受前大总统曹公之知，任第三镇管带。威姑周太夫人，就养军次，君以军事倥偬，盛夏成礼。冬即出戍吉之东北边境，英风所被，曠已宁穆。次年武汉军兴，应调入关，师次井陘白不镇，旋有娘子关之捷，适周太夫人有疾弗豫，乃立请解新职，一意将母。何期啜菽之欢未尽，棘薪之恻旋生。周太夫人遽于是年十二月弃养寓邸。呜呼！天不我与，忽遭凶，既伤君失恃，亦深痛吾姑妇之缘，何其浅也。民国元年，兵变京师，曹公谓君才堪济变，追缘前绩，起君任第三镇炮队第三标统带，并令良乡结营，藉资镇压。四月归葬周太夫人于蓬菜。秋改镇称师，统带易名团长，奉职如故。冬移防南苑。二年曹公任援鄂总司令。君兼任副长官。三年曹公再奉援川之命，君仍兼副长官。四年升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冬随师入川，与滇军相持于泸县，旋即败之。次年春克纳溪，再克綦江。是秋，班师保定，君之勋名，遂震烁于世。六年奉讨逆之命，湘南荆襄，于时相继独立，晋军第三师师长，冬遂戡定荆襄。岳长亦于次年相次救平，又奠衡州，梏祁阳，持丰阳，既息兵于衡。九年夏自卫率师北还，京畿以警闻。君振一师之众，纵横扫荡，更入捷涿鹿之野，于是曹公晋直鲁豫巡阅使，以君副之。威亮火烈，更腾名中外。明年夏，君师援鄂，晋两湖巡阅使，先后进兵蒲圻岳州，所向皆靡。又却川军队夷陵。十一年辽沈不共，入侵畿辅，君又焉。十二年曹公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君继任直鲁豫巡阅使。于是日拱京师，外领四岳，国家所托付于君者，亦日以增进。而辽沈内窥，戒心弗戢。逾年秋，又大举入关，君控雄师四十万，董统鹰扬，海陆并进，行且翦灭，会輿纛启萧墙，元首身遭劫持，星流慧扫，投鼠忌器，不获已浮海至汉，转驻信阳观变。次年春次黄州，入岳州，称讨贼联军总司令于汉口。十五年春，寇英杰、靳云鹗皆于郑州集师，候令检阅。又先后于石家庄、北京，与阎锡山、张作霖会决大计，于时察绥并复，势浸以振。未几武汉告急，即躬赴前线，檄刘玉春坚守武昌，卒因士气衰沉，无可挽救。冬乃移节郑州。十六年春至鞏，夏至南阳，秋应四川袍泽之请，至夔州之白帝城。十七年春至大竹县城。夏至达县檀木场。十八年冬，至河市坝。十九年，至下八庙，皆达县所隶治。二十年发自达县，经广安、南充等县而达成都，又由成都至松潘而及甘肃之武都、天水，再至兰州宁夏，已闭塞成冬。二十一年春，行抵北京，遂卜宅什锦花园。忆此三十余年间，历程数万里，转战十数省，佩兰皆侍君左右，形影未离。柴戟所临，军民交庆，所谓欢若父母，馨若椒兰，则悉为耳所接，为目所受。然万物回薄，振荡相

转，纠缠艰难，躬亲忧患，则绝非寻常人所能堪。呜呼！君之所以动心思性，可云极矣！功勋既融，绝影朝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抉爻象之精微，发春秋之蕴奥，整国家之纲维，修道德了藩篱。时复宿酒数壶，贮诗盈囊，挥毫落纸，焚香独坐，兴会所及。写竹画梅，浩然之气，横溢楮墨之间。见者皆称君心神超旷，颐性养寿，年近七十，犹体貌丰腴，如四五十许人。“冈陵之庆，必左券操之”。君感国事，亦时为愤悱之言，谓当重周花甲，再造乾坤。卢沟桥事变，一星之火，几于国土皆焦。中外朝野，引跂和平，皆惟君是望。岂意以一龋齿之微，竟成不治之症。君之龋齿，本为宿痼，每因风热所袭，岁辄触发，一二次皆进药数剂，痛遂立已。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左齿忽痛，初不介意，旋见浮肿，痛不可耐。乃延日医伊东诊察，谓龋已生脓，恐其蔓延。君乃嘱将痛齿拔去，嗣感外邪，寒热交作。因请中医，进以汤药。二十七八两日，始寒终热，汗如雨注，次晨稍见平复，以为必自是全可矣。殊自此病势反复，中西医因亦主张各异，来视君疾者，复议论纷庞，各有所执。正器然病榻之侧，君即与佩兰永诀矣。呜呼痛哉！以君积年之修养，初无异状；以君年年必发之宿疾，亦非绝症。以君与国家人民之关系，尤非可以弃去之时，而今竟有是意外！天乎人乎？此中外所同悲，实家庭之巨变。佩兰肝胆寸裂，屡恸皆绝，哭玉不能成声，求死不得其所，君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哀哉！尚飨！”

读罢，俯伏，兴，皆兴，复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垂帘（放下灵前两旁孝帏）。

孝子、孝眷入纬。

奏乐侑食（喇嘛以铜号、大鼓、大钹、唢呐吹奏西番乐，10分钟左右，仍换清音细乐）。

三、行亚献礼启帘，孝子、孝眷出纬，就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孝子诣灵案前，跪，皆跪。

献爵（酒），献茗（茶），献灸鱼，献灸膾（膾 fán 古代祭祀时用的熟肉），献羹。

俯仗，兴，皆兴，复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垂帘，孝子、孝眷入帏。

奏乐侑食（和尚以笙、管、笛、九音锣、钹、饶、钹、手鼓吹奏禅乐，约10分钟，仍换清音细乐）。

四、行终献礼启帘，孝子、孝眷出纬，就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孝子诣灵案前，跪，皆跪。

献爵（酒），献茗（茶），献灸肝，献饼饵，献羹，献饌。

俯伏，兴，皆兴，复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

垂帘，孝子、孝眷入纬。

奏乐侑食（道士乐约十分钟左右，仍换清音细乐）。

五、行告成礼启帘、孝子、孝眷出纬。就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

司祭文者捧祭文；司帛者捧帛，送燎所梦化，孝子、孝眷转身望燎。复位礼成。

孝子、孝眷入帏，举哀。

礼成奏乐（官鼓大乐、清音班、番、道、禅各奏各乐。十分钟后，由官鼓大乐以一捧大锣宣告止乐）。

以上这种丧祭礼仪在本世纪 40 年代初，已极少见。吴氏家祭，虽不能说是“孤例”，但亦属于龙鳞凤毛。

此外，日本天理教华北传道厅厅长请井庆五郎，崇文天理教会会长佐藤军纪，特于吴氏“七七”之辰，召集该教教徒 300 多人，还有通县传道所会众 100 余人，共计 400 余，携带大批祭品，赴吴邸祭奠，仪式为天理教礼节。

大开吊

吴氏“七七”家祭之后，一反北京风俗习惯，还要在家大办三天丧事。一说按接三之日起经，至发引前一天，整为“七七”49 天，恰为道场圆满。另一说是根据山东蓬莱（吴氏原籍）的地方风俗，在家停灵受吊“七七”49 天，不包括开吊、伴宿、发引这三天。后者显属无稽。实际上就是等待拈花寺东院现盖武圣祠的工程。吴宅与治丧处故将正式开吊与伴宿分开，表面上看来，开吊是对外，伴宿是家族内的事，其实，两天都接待吊客，收受奠礼（领帖）。

1 月 22 日正式开吊。吴宅门前车马如云，军警机关为维持交通，特规定临时行车路线，凡至吴宅宾客车辆，一概由什锦花园东口进入，由西口出。凡西来车辆至什锦花园胡同者，一律绕道马大人胡同东口，转入什锦花园东口进入。其热闹情形，当可想见。

日寇侵华的头子不得不出面应酬。敌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多田骏中将军率参谋长平田正判，于下午 3 点 30 分到吴邸致祭。由门协光雄任翻译。由伪市长余晋龢、伪宪兵司令邵文凯及蒋雁行、劳之常、王臻善等进行招待。另有敌寇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特派齐籐准尉，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派森冈次长均往上祭。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派代表宝熙及松本二人；中央银行河田总裁派王少铁代表，均于下午往祭。

其中，伪满代表宝熙居然以“外国使臣”的身份至灵台致祭，还抛出了一份所谓祭文：

“维康德七年一月，癸卯朔越二十有二日甲子，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谨以清醴庶馐，致祭于中华民国孚威上将军故吴公子玉如弟之灵曰：去月四日，星陨燕京。其光煜煜，中外震惊。华邦土庶，如失长城。东山再起，壶浆相迎。玉楼赴召，天地晦冥。好德终命，死哀生荣。厥星为何，大树之英。海岱钟灵，申甫笃生。允文允武，崛起编氓。幼而岐嶷，长笃忠贞。娴习弓马，腹有甲兵。年逾弱冠，游洋登麓。国家多难，投笔清纓。武备测绘，历奋鹏程。爰治军旅，武卫入行。曹公雅鉴，三镇成营。迹遍奉吉，寒暑五更。湘鄂转战，树厥典型。两定畿辅，巡阅蜚声。思弭内讧，力倡和平。功震环宇，声问砰訇。屡经事变，磊落光明。转道入川，爰戴同情。绕行松潘，都下息争。著述自娱，于人无争。追踪关岳，宇宙垂名。天祸中国，大厦将倾。兆民属望，只手天擎。迺因齿疾，医药失灵。天不遗，孰拯苍生？忆昔连轡，管鲍倾诚。志同道合，为国为民，生离死别，使我伤心。遣员展吊，泪洒胸膺。如丧令原，其痛弥深。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伪宪兵司令邵文凯亦于上祭时抛出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宪兵司令邵文凯，敬

备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孚威上将军玉公之灵位前曰：呜呼！茫茫禹迹，莽莽神州，沧桑屡变，赤水横流。世衰道微，国替民愁。五百年兴，名世其

俦。天生我公，良有来由。擎天之柱，转地之轴。东渐于海，西至沙陬。南通湘粤，北尽燕幽。八方风雨，齐会中州。无思不服，众望归攸。管萧流亚，尚父权谋。允文允武，嘉谋嘉猷。公之出也，后乐先忧。公之处也，不伎不求。铁肩道义，立之不朽。建中天地，作万世模。晴天霹雳，鹏驾西遊。军神其匹，武圣其侔。高山仰止，与国同麻。蒸尝裕禘，俎豆千秋。呜呼尚飨！”

欧美祭客也纷至沓来。外交界计有法国大使馆代办巴赛松伯爵，汉文参赞韩德威，使馆医官贝熙叶大夫；德国大使馆代办那特博士，秘书吴步萨；美国大使馆参赞司迈斯，参赞秘书司蒂芬，秘书林瓦特；比国大使馆代办方敦伯参赞；巴西公使罗葛大人；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白汉，领事白贝；葡萄牙公使馆代办贾格；德国留华驻京德侨会会长罗德礼等。外国新闻记者计有：法国政闻报主笔孟烈士特，美国联合报主笔怀德，纽约时报社主笔罗布孙，国际通信主笔葛德益等。比利时、葡萄牙、巴西均送了鲜花圈，美国送幛五端，英国送幛两端，法国送幛两端，德国送幛一端。

中国机关团体参加公祭的有：龙泉孤儿院教职员院生，仁义社张星辰、张清炤、出田政夫、背川雅雄等，万国道德总会，天津特别市慈善团体联合委员会，东亚和平建国促成会代表黄介民，察南六县民众公举代表邱佐忱、史子超等。参加致祭的中国社会名流还有董康（康百川代）、蒋雁行、靳云鹏（许钟璐代）、王维城、田子久、劳之常、胡毓坤、张百龄等。

开吊之日，吴宅竟日讽经达 8 棚之多。计有：张太太、洪太太送雍和宫喇嘛 13 人，讽《毘卢经》一永日，施甘露法食一堂；拈花寺常住送法师 13 人，礼“大悲忏”一永日；白云观安世霖监院送道士 13 人，讽诵《太上道德经》一永日，本宅请放焰口一堂；鲍毓麟局长送长椿寺法师 13 人，讽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永日；道神大和尚送华嘉寺法师 13 人，讽《金刚经》一永日，施瑜伽焰口一堂；潭柘寺常住送法师 13 人，讽《妙法莲华经》一永日；张太太、洪太太送嘉兴寺法师 13 人，讽《金刚经》一永日；施瑜伽焰口一堂；永泰寺、延寿寺主持送本寺法师 21 人，施“五方焰口”一堂。

伴宿送库

1 月 23 日，已是吴氏逝世的第 51 天了。吴宅继昨日“领帖开吊”之后，举行启灵前的总祭奠——伴宿送库。于是，京市各界继续掀起公祭吴氏的高潮。各方面来宾吊唁者由朝至暮，从四面八方云集而至，车马喧逐，途为之塞。据当年报载，计有社会名流高凌蔚、陈中孚、陈廷杰、刘永、符定一、张佐民、张瑞峰、赵振鸿、张禹三、张清炤、李松轩（代表鲍毓麟）等，各机关团体代表有敌伪皇协军代表李佩玉，良乡、房山两县绅民，天津市黄字会，天津慈善团体联合委员会，天津新药业公会代表，内六区公益会会长王锦章等，日本西本愿寺北支布教总监部冈条金札、藤原信铠、青山常次、

仓乘蔚、太田义醇、木户贤了、光岗良雄等，济南市自治区坊联合会会长魏寿山，江苏省省长陈则民代表，维新政府立法委员并人民会宣传部长张桐代表，河南省省长陈静斋代表，冀南道道尹王季章，鲁高等法院院长张超骥等。

吴邸灵棚内的挽联、挽幛多已重叠而挂，只露送礼人的下款。新增加的挽联只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是展开挂在正面的。其联曰：

“乱世念英雄，忆戎马半生，赍志未图烟阁像；

中流砥柱，正风尘入表，伤心空对岷山碑。”

灵棚内外满列明日发引时用的纸扎冥活，主要有：用“吐沫葛”糊成的香幡、香伞，排列成行，哼哈二将，开路神，打道鬼矗立棚口。还有加大尺码的神楼一座，高三丈二尺，金银宝库两座，各高二丈八尺。各种不同陈设的尺头桌子及各式盆花，无计其数。形成了五彩斑斓的花海。

前后各院的墙壁、棚壁上的礼单、唁电、唁函早已贴满，后来只好别于布幅，再张挂于绳索，有的已重叠起来。这也是近代任何丧事所未有过的盛况。

是日，经忏法事达 11 班之多。前后两院的棚内尽管在房上搭了“经托子”，仍不敷应用，棚内的“平地座”仍是“见缝插针”。棚壁下端是挽联、挽幛，而上端则挂满了佛画。棚顶分别挂了喇嘛（番）经黄缎绣花的“筒儿幡”4 幢；道士（道）经蓝缎绣花的“筒儿幡”12 幢；和尚（禅）经红缎绣花的“筒儿幡”16 幢；尼姑（尼）经紫缎绣花的“筒儿幡”4 幢；居士（优婆塞）经青缎绣花的“筒儿幡”8 幢。共计 44 幢。插在平地红漆木制执事架上的 24 诸天筒幡 48 幢。每坛悬挂 3 幡门，6 幡条，共 33 幡门，66 幡条。33 幅大型佛像和神像。喇嘛经座上为“竖三世佛”，即过去佛——燃灯上古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道士经座上为“三清像”，即上清元始天尊；玉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和尚经座上为“横三世佛”，即本师释迦牟尼佛；消灾延寿药师佛；西方接引阿弥陀佛。尼姑经座上为，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太祖佛。每班经坛的神佛圣像前都焚香秉烛，广陈供养，但荤素各异。喇嘛供红焖肘、扣肉、米粉肉、大墩肉、四喜丸子等荤菜；道士供的是鲜果；和尚与尼姑供的是素糕点、素饌……整个经棚望之俨然，酷像一座大梵宫。经坛上很多幡门、幡条、筒幡都是新绣的，尤其是僧人的袈裟，道士的擎衣都是崭新的。例如：白云观的主持安世霖素与吴氏相契，此次，安世霖主动送道经七永日，并为此新绣古篆字百寿图七色（经师六色，高功一色），擎衣三堂，其图案是现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里找来的，为此次法事增色不小。承寿寺的音乐经也是新绣的三堂袈裟，均为“七衣”（比丘具足戒的袈裟）的底子，有红、黄、青、紫各色，上绣花卉，有钩子莲花、牡丹、芍药、菊花、梅花、百鸟……惟放正的大和尚披“千佛衣”，两旁的披“罗汉衣”。僧、道都是每送一道疏（包括回向）换一次法衣或袈裟，就如同演传统戏时演员穿的戏装一样。11 棚经要送 44 道疏，所以，每逢送疏不独孝子、孝孙要亲自捧圣，就是近亲也得尽孝，否则，本家就忙不过来。门前的大鼓锣架为送疏的僧、道击鼓鸣号“接赞”、“送赞”忙个不停。

经棚、灵棚内几乎未设“官座”，所有来宾登月台行礼后，用茶用饭都要到附近的一个职业学校去。由治丧处刘泽普统一掌握管理。每餐汉、回、素、番菜（西餐）不下 200 桌。大教席面大体都是燕翅席（上宾席）、鸭翅席（普通来宾席）、海参席（工役、警宪席）三种。治丧处派出的监厨、监席就有 50 多位；知宾近百位。

下午 4 时送库。4 时起，东四一带居民即纷纷赶至东四北大街、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一带，挤在便道上等候观看送库的队伍，其中，不乏远道而来者，虽寒风刺骨，其盛况亦不稍减。

送库行列与众不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色黑警服的伪保安队（枪口一律朝下）开道。马路两旁，亦站满了伪警宪（左臂一律缠着黑纱），不许围观

者走下便道，马路上的车马一律暂停行驶。

送库行列绵亘里许，其排列顺序大体为：

官鼓大乐领先，金漆圆筒长号两对；官鼓四面；唢呐、海笛、笙各两对；九音锣一对；小铜鼓（即小疙瘩锣）一面；跟锣一面（指挥）此为官吹官打带“小乐儿”二十四响器。鼓手俱身穿绣白光蓝圆寿字绿驾衣，腰扎绣蓝万字白褶帛；头戴清制官帽（去缨）；足穿青布靴。双行前进。

雍和宫喇嘛（番）13人。大铜“刚冻”一对；柄鼓一对；大钹一对。番僧均黄袍、黄帽、青缎靴。

白云观道士（道）13人。喻子（大铜钟）、铃各一；铛子、钹子、手鼓各一对。道士均头戴混元巾；身穿蓝袍，外罩擎衣，每色一对，红、蓝、绿、黄，俱为缎地绣不同形式的篆体寿字。安世霖为高功，披紫缎八卦太极图的仙衣，手捧三镶如意一柄。

潭柘寺和尚（禅）13人。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钹子、手鼓各一对。和尚均身穿海青大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袈裟，头戴青色大风帽。茂林大和尚为领忏放正者，身着黄袍，红袈裟，捧着手炉。

“救世新教”正一堂居士24人。引磬一对；铛子、钹子、手鼓各两对。余众手持念珠。俱身穿海青大袍，外加披紫红缙衣。

东岳庙（与地安门外火神庙合出）道士13人。所持法器与白云观道士相同。擎衣亦为彩锦对衣，红、蓝、橙、白、青、绿各一对。高功田子久身披紫缎绣有青云白鹤图案的法衣，手捧三镶如意一柄。

弘慈广济寺和尚（禅）13人。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钹子、手鼓各一对。和尚衣帽、袈裟与潭柘寺同。领忏放正的大和尚是显宗。

莲花山下院坤道（道姑）13人。法器、法衣与白云观、东岳庙乾道相同。

承寿寺和尚（禅）13人。九音锣、笙、管、笛、铙钹、手鼓各一对。吹一段梵乐，打一遍大铙大钹，两者交替进行。僧众为彩绣对衣，放正的大和尚是绣满佛像的“千佛衣”。

伪北京市警察局西乐队48名，以大小铜鼓、黑管、大小号等高奏《送君归》、《烈士魂》等曲。乐器上均缠了黑纱。队员一律黑礼眼、黑皮鞋。

翠峰庵尼姑（尼）13人。引磬、木鱼各一；铛子两对；钹子、手鼓各一对。俱着灰袍，加披红缎金线袈裟。放正身着茶青袍，披红袈裟，执手炉。

来宾约2000余人，花插走在以上各班僧、道、居士的中间，凡便装者，一律腰扎白孝带，胸左方佩戴白纸菊花一朵。惟孝服来宾（约半数以上）走在孝属之前。

大清音一班，13名。笛、笙各两对；九音锣一对；小锣一对；皮鼓（指挥）一个。吹奏《哭皇天》。鼓手俱头戴清制免缨官帽，身穿白孝袍，足穿青布靴。

孝属排成一行，每人均由两名近亲搀扶。孝子吴道时捧喇嘛用巴拉面捏的灯盏、塔；孙运乾捧道士给“宝华园满天尊”的大表；孙运坤捧和尚给“西方三圣”的大表，其他孝属依次捧各经班给神、佛的疏表。两旁均配备有卫士护卫，不许闲杂人等靠近。

拈花寺和尚（禅）13人殿后。

送库行列出什锦花园东口向南，经东四北大街向南，进猪市大街东口，至隆福寺神路街焚化纸扎冥器。

焚化场上坐北朝南地摆了加大尺码的一楼二库四墩箱：四季花盆两堂；

金山银山、绸缎尺头、文房四宝、古玩陈设等四对尺头桌子。最为精彩别致的是纸扎戏亭四座，内为京剧戏出，均为汉寿亭侯关云长之轶事。一为《三顾茅庐》，二为《挂印封金》，三为《保嫂寻兄》（即《过五关》，又称《千里走单骑》），四为《古城训弟》。裱糊极为精细，惟妙惟肖，关公赤面蚕眉，绿袍长髯，古风盎然。其用意极为明显，以“亘古一人”之武圣来比喻吴氏。

为安全起见，冥物是分堆焚化的，且有消防大队在旁照料。吴道时等孝属只到有楼库的主堆上三叩首即上了汽车。

焚化场上几十名手举白蜡杆子糊成的古代兵器模型，堆弄烧活，以压火势。焚烧约 40 分钟方完。

停灵暂厝拈花寺

吴氏系山东蓬莱人，在京客居，自然没有茔地。暴死之后，又“时值非常”，究竟是日后择吉“扶柩回籍、安葬祖茔”，还是在京郊另选风水宝地进行安葬，尚未最后决定。于是花了伪联币 3 万元，临时在北城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拈花寺东菜园修建了几间大殿，名为“武圣祠”，用来停放吴氏的灵柩。

民国 29 年（1940 年）1 月 24 日（即阴历己卯年腊月十六日），正是大寒时节，朔风凛冽，吴氏的大殓沿着北京市内各主要繁华街道绕了多半周。沿途各界的路祭棚共 11 座；路祭桌、茶桌鳞次栉比，无计其数。几乎所有居民都自动跑到街上观礼，形成万人空巷之势。甚至有从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京郊四乡八镇赶来看热闹的。大殓所经过的各街道，两旁的茶楼酒肆、饭馆，楼上楼下临窗的客座事先都被顾客以重金（比平日高数倍价钱）包了下来，以作为临时观礼台。届时，边吃边喝“检阅”这千载难逢的民族传统形式的大出丧。

其哀荣可谓大矣！大殓的排场，一如清代的皇杠。是日一早，即由有关单位派了洒水车，叮叮 也在殓列即将经过的街道上喷洒净水，以防止尘土飞扬。殓列之前的一百多米，有扛着锹、镐的筑路队工人，表示是为大殓铺道开路，填平沟壑，拆除障碍物，为大殓开道。并抬有所谓警察署的布告：“灵柩经过地段，障碍拆除，倘有拦阻，本署必究。”

吴氏的殓仪完全是老北京的传统形式。是由东四猪市大街永盛杠房承办的：64 人大杠大换班。民族传统仪仗——五半堂汉执事、松活、纸活、五光十色，令人目眩，响器、僧道绵亘数里之长。鼓乐喧天，音节悲壮。其声势浩大，诚民国以来所罕见。

殓仪排列顺序，大体如次：

一、各界送的花圈、挽联数百对；彩扎匾额亭数十座，内悬各界名流致送匾额、题词。

二、治安军骑兵部队（倒背枪，左臂缠黑纱）开道。

三、纸扎“哼哈”二将，俱高一丈四尺，金盔金甲，持金刚杵，面作忿怒相，一鼓鼻，一张口，露牙睁目。糊饰堂皇雄伟，威风凛凛，凶猛可畏（本为佛教护法神，是寺院的“门神爷”，但有些地区亦当作民宅的门神爷）。站立于纸扎的“虎皮石”立座上，下安木轮，用人推之以行。

四、纸扎开路鬼、打道鬼（传为方弼、方相兄弟。古力行柩之吉神）各

一、俱高丈余。开路鬼手执三股接天叉；打道鬼手执三节棍。二鬼头大如斗，戴将军盔，作金刚怒目状。身披铠甲，立于纸扎“虎皮石”座上，下安木轮，用人推之以行。

五、纸扎的“喷钱兽”、“喷云兽”各一状似麒麟，均高七尺许，走在开路鬼、打道鬼中间，由人牵拽而行。再由另二人将纸钱填入“兽”后的豁口内，使纸钱从“兽口”喷出，扬洒于路。表示为吴氏施舍了“买路钱”。

六、纸扎的石碑一对，碑文为吴氏生平事迹。高丈余。由鼉（石龟）驮之，花纹至细，尤以碑面的黑底白字，最为逼真，望之有立体感，若不以手抚摸，决不知为纸制冥物。鼉下有木轮，用人推之以行。

七、纸扎的“武判儿”（氏间对钟馗的提法）一名，高八尺许，古代武官形象，豹头环眼，铁面虬髯，身穿大红官服，足登皂靴，左腿抬起，手持宝剑举过头顶，作斩杀状。并以铁弹簧安上纸蝙蝠一只，插在“武判儿”肩上，走起来，蝙蝠上下颤动，好似飞舞，表示为“斩妖向导”（民间则赋予“恨福来迟”的吉祥意义）。脚下安座，座下有木轮，以人推而行之。

八、纸扎的地藏王菩萨（即幽冥教主）高丈许，男相，头戴毘卢帽，手持宝珠、锡杖，骑在一头名为“谛听”（似狮之怪兽）的背上。“兽”脚下安有木轮，用人推之以行。

以上纸扎意为主管幽冥地府的诸神，菩萨都来给吴氏带路。

九、伪北京市警察局乐队48名，均身穿黑礼服，胸佩白菊花。以大小铜鼓、黑管、大小号轮奏《送君归》、《烈士魂》等乐曲。

十、铭旌。系一座高两丈一尺的彩扎长亭内挂一幅红绸，上题“孚威上将军吴公佩孚之铭旌”字样。由身穿绿驾衣，头戴青荷叶帽的杠夫32人异行。两侧各有跟夫四名，肩扛拨旗，上书“东四猪市，永盛杠房”。走在殡列的正中间。表示为吴氏招魂引路。

十一、雍和宫番经（喇嘛经班）送殡。俱身穿黄袍，外面罩了灰鼠皮挂黄面的皮袍，足登青缎靴。前面的喇嘛均头戴黄面皮帽；后边的执法喇嘛则戴大鸡冠帽；主法放正的大喇嘛头戴桃形帽。

十二、松活：松狮一对；松亭一座（走在松狮中间）；松鹤、松鹿（谓“鹤鹿同春”）；松八仙人一堂；松桥（染松柏叶，作七色虹桥状，喻意“乘云跨虹游天外”）一座；松匾四方，分别题有“从超武圣”、“忠义千秋”等赞词。均为穿孝的执事夫肩抬而行。

十三、催压旗（执事大头目）6面；催压锣（执事二头目）6面。均身穿肥大的红锣衣，头戴红锣帽。大头目手执小旗，上书“催压执事”背面是“永盛杠房”，用以压阵。二头目则手提大广锣，在执事行列中来回巡视，以喊号、鸣锣的方式进行具体指挥。

十四、金执事8对。木制、金箔罩漆、红柄，高7尺许的古代兵器模型：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镡、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塑、金督各一对。

十五、“肃静”、“回避”浑金虎头牌各一对。执事夫扮清代官府衙役状，肩扛以行。

十六、红缎绣花幡、伞各6把（此为第一半堂）。由头戴黑荷叶帽，身穿绿驾衣的执事夫排成双行，高举前进（执事夫服饰、队形下同）。

十七、纸扎冥马队24骑，枣红高头大马，上有全副武装的骑兵。表示是吴氏的卫队。用执事夫擎举以行。

十八、纸扎冥汽车一辆，系仿当时进口“小黑老虎”，长方形的车厢，

外有托泥板，后边背有轮轱备份的下边，挂一车牌，上书“吴宅自用 1330”字样。驾驶楼内糊有司机一人手握方向盘。车厢外两边的托泥板上，各糊卫兵一名，军服军帽，腰跨“盒子炮”。冥汽车前后，还有纸扎冥跨斗保卫车各一辆，每辆上坐警卫两名。车系活交转轮，人拽以行。冥车两侧还扎糊了整列的全付武装卫兵，持枪荷弹。均由执事夫擎举而行。

十九、官鼓大乐一班。官吹官打带“小乐儿”，计有：拉号一对；官鼓4面：唢呐、海笛、笙各两对；九音锣一对；跟锣一面（指挥）。鼓手俱头戴清制官帽（去缨），身穿绿驾衣，腰系绣蓝寿字的白搭帛，足登青布靴。双行前进。

二十、汉旗子8对。清道旗（四方形、蓝底、红边、红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四方形、白底、红边、彩色图案）各一对。

二十一、蓝缎绣花幡、伞各6把（此为第二半堂）。

二十二、伪北京市政府西乐队一堂，48名。以大小铜鼓、黑管、大小号合奏哀乐。二十三、纸扎冥香幡、香伞，以蓝、白、黄、黑等素彩缎子做成片幡、六角形筒幡及圆周直径三尺有余的伞盖各若干把。上面均以不同彩色线香拼出不同的图案。由穿孝的执事夫高举而行。表示引领亡魂。

二十四、白云观道经一班，俱身穿蓝袍，外罩新绣成的古篆字百寿图的氅衣，每色一时。头戴圆形混元巾，露着发簪。安世霖为高功，亲自送殡。

二十五、香亭，以竹杆为架，繙上“吐沫葛”（纸质仿锦缎）成为古典宫殿顶的敞门式亭子，亭顶、亭身、亭座均以彩色线香拼成古典建筑上的各种图案。由4名孝服的执事夫肩抬以行。

二十六、金执事“八宝枪”8对，木制，金箔罩漆，红柄，高7尺许的古代兵器模式：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

二十七、白缎绣花幡、伞各6把（此为第三半堂）。

二十八、当时社会“名流”，伪政府要员及外宾所送的花圈、挽联。二十九、西乐队一班，48名，均头戴将军帽，身穿大礼服，以铜鼓、洋号合奏哀乐。

三十、当时社会“名流”及伪政府要员所送的大匾、题词，用宫殿顶的敞门素彩亭抬昇而行。

三十一、金执事4对。木制，金箔罩漆，红柄，7尺多高的古代兵器模型：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

三十二、青缎绣花幡、伞各6把（此为第四半堂）。

三十三、潭拓寺禅经（和尚经班）送殡。僧众均身穿海青大袍，披红缎金线绣成的福田纹袈裟，头戴大风帽。每众手执大藏香一炷。三十四、纸扎冥“四季花亭”，春、夏、秋、冬各一座。均糊成圆顶，绿琉璃筒瓦，敞门式四柱凉亭，内放纸糊的大型盆花，分别为兰芝、芍药、牡丹、佛座莲、丹桂、瓣菊、腊梅、迎春……每亭由穿孝的执事夫肩抬而行。

三十五、伪宪兵队100余人（倒背步枪，枪口朝下）臂缠黑纱，胸佩白菊花。以仪仗队形式出现。

三十六、紫缎绣花幡、伞各6把（此为第五半堂）。

三十七、纸扎冥步队24名，均为国防绿色军装，扛步枪。由穿孝服的执事夫作两排擎举而行。

三十八、纸扎八仙人一堂。

右为吕洞宾，身背宝剑（象征“剑现灵光魑魅惊”）；钟离权，手执小扇（象征“轻摇小扇乐陶然”）；何仙姑，手执莲花（象征“手执莲花不染尘”）；张果老，倒骑驴背，手摇鱼鼓（象征“鱼鼓频敲有梵音”）。

左为韩湘子，手执竹萧（象征“紫萧吹度千波静”）；曹国舅，手执拍板（象征“玉版和声万籁清”）；铁拐李，架单拐，身背大葫芦（象征“葫芦岂只存五福”）；蓝采和，手携花篮（象征“花篮内蓄非凡品”）。

由身穿孝服的执事夫擎举而行。

三十九、纸扎冥“四季花盆”。均糊成红漆木架；上架糊成的瓷盆、紫砂盆、木盆、陶瓦加釉盆不等。内插芍药、牡丹、荷花、桂花、皱菊、腊梅等花、蕾、枝、叶并茂的纸花（多系各界人士所赠）。由穿孝的执事夫舁行。

四十、又西乐队一堂，48人，以铜鼓、洋号奏哀乐。

四十一、红云缎绣花的大座伞一柄，高约丈余，顶上有贴箔罩漆的五寸“火焰”式金顶。由身穿绿驾衣、头戴青荷叶帽的执夫一人擎举前进，两夫以黄绸“拉幌”。

四十二、弘慈广济寺高僧一班。青袍，红缎金线袈裟。每僧各执大藏香一炷。

四十三、各界追赠的万民旗、万民伞；巨幅彩缎的锦旗、锦标各若干幅，间有黄缎绣花片幡若干。俱用穿孝的执事夫高举前进。

四十四、清音锣鼓一班。二人抬堂鼓一面，一人敲打；四笛、四笙、两面小锣；一人敲皮鼓指挥。鼓手均头戴清制官帽，身穿孝服。

四十五、提炉四尊，内燃檀香，由穿孝衣的执事夫以龙头金漆木棒提之以行（此为影亭前固有的附加仪仗）。

四十六、影亭。以素彩扎成，古典宫殿顶盖，敞门，下有须弥座。内悬大幅吴氏遗像。8抬夫穿孝肩抬行进。

四十七、红云缎官座伞一柄，一人擎举，二人以黄绸“拉幌”。

四十八、翠峰庵尼经（尼姑经班）送殡。均身穿灰袍，披红缎金线绣成的福田纹袈，头戴大风帽，足登青僧鞋。

四十九、魂轿一乘。绿呢围子，青纱帘，轿顶上罩黑绦网。内供吴氏灵牌。由8名头戴去纓的清制官帽，身穿孝衣的抬夫舁行。

五十、伪保安队数十名，身穿黑警服（倒背步枪，枪口朝下），胸前佩戴白菊花。以象征护送魂轿。

五十一、拈花寺高僧一班，俱青袍，红缎金线袈裟，戴大风帽。每僧手持大藏香一炷。此为主体道场的禅经经班，以“主人”身份，走在各送殡经班之后，此为旧京经忏佛事僧众行进时的固有规矩。

五十二、乐舞传习所学生组成的民族古乐队一班，二十四名，以笙、管、笛、萧、云锣等民族乐器吹奏细乐。

五十三、海会寺贫儿院院长印智及教职员王常照、邓常安、马家仪等率领贫儿30余人。贫儿俱穿小白孝袍子，左肩钉了“红补丁”。步伐整齐。

五十四、大雪柳48杆，由头戴假抓髻，身穿白布印花小褂的男童排成双行，擎举而行。

五十五、童子督胜盘（即小拿）32名，走在执紼来宾的两旁，每边16人。均为未成年的男童，头戴清制官帽，身穿孝服，各挎一红漆托盘，内放吴氏生前所喜爱的古玩：炉鼎瓶罐；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印章……边走边

喊，左边的喊“啊……”；右边的喊“暖……”表示“助哭”。每边各有一名“执鞭压差”，进行具体指挥。

五十六、北京地面上扬纸钱的能手全福（绰号“一撮毛”）率领4徒，均身穿孝袍，肩挎大串纸钱，起杠时以及每经十字路口、丁字街、路祭棚、路祭桌、茶桌等都要高高扬起纸钱，表示为吴氏向众“拦路鬼”施舍买路钱。

五十七、挎烧纸筐子的4人，身穿孝服，左臂各挎荆条筐一个，内装大烧纸、冥钞、金银箔叠成的镲子、元宝之类的冥钱，并在筐沿上插一炷香火。遇有路口、桥头、城门、井台、祠堂、庙宇、路祭棚、路祭桌、茶桌均要烧纸表示向拦路的孤魂野鬼施舍买路钱。

五十八、黄幡48面，上绣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文。

五十九、黄、红两色的佛字伞48柄。表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之意，以符吴氏生前信仰。

六十、大黄云缎官座伞一柄，一人擎举，二人以黄绸“拉幌”。

六十一、吴氏孝眷。吴道时身穿“斩衰”粗布毛边的重孝，左手执白绸子制成的筒子幡为其父引魂，走在孝眷的最前头。由二位穿孝的近亲搀架。后面依次为运乾、运坤二孙及其他男孝眷。但被大幅白布做成的帷幄所笼罩，从外面看不见。

六十二、纸扎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身穿虎皮裙，作行者打扮，左掌在眼前遮打“凉蓬”，作远眺状，右手执金箍棒。由一穿孝的执事夫高举。表示是吴氏去“西天”路上的护持者。

六十二、杠前大绑（由张燮元主持），用白布600尺，分成两行，每行300尺，上结若干大彩球，一头拴在大杠上，另一头由送殡诸来宾踵趾相接地牵拽而行。

执绑的有伪政府各总署要员、伪市政长官、吴氏生前“将军府”同僚、吴府幕僚、门客、社会各界名流人物约2000人。均身穿治丧办统一发给的白绸、白布做成的孝袍。胸前佩戴着吴氏纪念章一枚。

凡送殡者均按官职地位或亲疏远近发给孝服。上等为白绸子大褂一件；中等为白布大褂；末等则为孝帽一顶、孝带一条。

凡送殡者均发给一枚以治丧委员会名义监制的铜胎蓝地烧瓷，中间有个凸起的铜版印成的吴氏半身戎装像。蓝边上制有“吴佩孚将军治丧委员会”字样。这是治丧处于年前12月10日全体会议决定的，后于17日责成王实坪、刘泽普负责绘制图形，送总协理核定的。早于开吊之日即行颁发。凡未领到的，即在出堂前予以补发。像章一律别在胸襟左方。

六十四、64名杠夫肩抬着一副5丈多长的红漆大杠，杠上是盛殓着吴氏遗体的金丝楠灵柩。外面扣了一卷红寸蟒镶佛字的大官罩，每角各用一名杠夫以黄绸子“拉幌”（均往后拽，成为“一顺边”的形式）。大杠的四角备有一名手执籐鞭的“执鞭压差”，杠前有两名打响尺的杠头进行具体指挥。大杠两侧各有4名杠夫扛着红、蓝两色的“拨旗”，上书“猪市大街、永盛杠房”字样。以便遇有树枝、电线等障碍物，用它支起，使大杠顺利通过。

杠前有杠夫两班（连同杠上的杠夫一共为三班）。为是的途中50步一换班，此谓之“大换三班”。杠上杠夫为头班，身穿绿驾衣，头戴青荷叶帽，插红雉翎；二班杠夫身穿蓝驾衣，头戴青荷叶帽，插蓝雉翎；三班杠夫身穿青驾衣，头戴青荷叶帽，插红雉翎。均穿土黄套裤，新青布靴子。根据治丧处的要求，全体杠夫必须洗澡、剃头、穿新靴子。此谓之“普新”。

六十五、后拥（亦称“后扈”）。以木质、金箔罩漆的金执事：金星、金鎚、金刀、金枪、金拳等件，以湖色绸子连缀起来，由执事夫高举前进。分为5路，每5人一横排，共25夫。走在大杠后边，以示护灵。

六十六、白轿五乘，女孝眷乘坐。俱为4人抬，抬夫一律头戴清制官帽，身穿孝服。

六十七、扎蓝、白两色彩绸的四轮马车30余辆，女孝眷、女近亲属乘坐，马车夫头戴青荷叶帽，身穿孝服。

六十八、吴氏治丧处执公车，均为汽车，车身上悬有横幅标志，车顶上挂蓝、白两色的彩子。（一）、会计处车；（二）、庶务处车；（三）、宣传处车；（四）、总务处车。

六十九、来宾车（汽车、四轮马车）包括伪政府官员随行车，各大报社记者车共100余辆。均挂以治丧处黄色标志（准许通行证）。

七十、后护骑兵数十名，均为齐燮元部下的伪治安军。

七十一、伪北京市警察局弹压车。

七十二、北京市消防大队消防车。

七十二、北京市卫生局救护车。

吴氏发引路线是治丧处集体拟定的，后请示其夫人张佩兰做最后决定。吴氏灵柩，上午新时间（日伪时期，以东京时间为准）10时出堂，先上32人“小请儿”。出什锦花园东口后，正式升64人大杠。殡列经由东四、灯市口、王府井、东长安街、天安门、西长安街、西单北大街、缸瓦市、西四南大街，向东经西安门外大街、西安门内大街、文津街，跨北海御河桥，经北海前门，进景山西街，经地安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鼓楼西大街、旧鼓楼大街，进大石桥胡同。一路上，军警戒备森严，故仪仗虽丰，但秩序井然有序。迨拈花寺，时已5时半，已是夕阳西下近黄昏了。虽然寒风萧瑟，但送殡人数千，未减一人。

停灵处——拈花寺东院内，新盖的大殿坐北朝南，完全是依照佛教寺院固有的形式而建，与拈花寺原有的建筑完全相称。惟因冬季天寒，油漆工程须俟开春再补。殿的正中设一石座，为停放灵柩之处。石座上镌有七星（象征北斗七星——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座后为黄色幔帐，并有齐燮元题写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殿前为两层院落，甚为宽阔，已搭就两座高大的蓆棚，数十盏水电石灯照得通明，凡是奠礼中的万民伞、万民旗武圣亭等不焚之物，一律暂放于大棚内。棚口，殿前均临时搭了三门四柱，大型“昆卢帽”式的素彩牌楼。一派庄严肃穆景象。

吴氏的灵柩在庙门前换了16人的软杠，被杠夫抬至殿内灵座上放妥后，即置吴氏巨幅遗像于灵前，复抬来丰盛的祭席一桌。全体送殡人员遂举行公祭，吴氏家属、伪政府官员、亲友好等依次行三鞠躬礼。江朝宗代表所谓“救世新教”总会暨正一堂全体同人，上香设拜，恭读祭文。文曰：

“救世新教副教统江朝宗领导救世新教总会及正一堂同人致祭，文曰：惟天运己卯岁十有二月，既望、丙寅之吉，奉移我教

主吴公之灵于拈花寺，本教副教统江朝宗、陆宗輿、钟世铭、庄仁崧率全体职士、教士暨正一堂弟子等，谨致奠而献词曰：呜呼，我公！旷代之英，蓬莱降世，海岱钟灵。识时务者为俊杰，造时势者惟英雄。闻鼓声而思将帅，建节钺而跻元戎。一旅兴邦，早识无双国土，百战皆捷，遂成不世奇功。迫其间关万里，金门投止。既不托庇于外人，乃聊寄兴于经史。读书养气，缓

带轻裘，儒将本色，名士风流。口口礼教，志在春秋。于是救世兴教，明经讲学，振聩发聋，顽廉懦立，树德功言于不朽，成智仁勇之达德。呜呼！

哀哉！中原未定，大星先沉。天下胥溺，援手何人？公竟逝矣！如苍生何，来日不难，四海滂沱。呜呼！公灵暂安，神归道山。从兹永别，天上人间，拈花之旨，夫复何言！伏维尚飨！”

敌酋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多田骏亦装模作样地赶来致祭。

番、道、僧、尼在殿前排列两行，唸经品咒。乐队亦继之高奏哀乐。殿内，吴氏家族大恸，哭声极哀。礼成，大部分纸扎车马、尺头桌子、花圈、挽联等，不便继续存放的，均抬至庙前景尔胡同小大院，由官鼓大乐引导部分孝属、治丧处职员人等前往，分堆焚化。然后，由消防队扑灭余烬，清理现场。

随后，吴宅在拈花寺庙内各殿堂摆了素筵，大殓送殡诸宾。由孝子吴道时等分别到各桌前叩首谢席。至此，吴氏作古之后的“盛典”始告一段落。

从民国 29 年（1940 年）1 月 24 日至民国 35 年（1946 年）12 月 16 日，吴氏灵柩在拈花寺停厝近 7 年之久。在此期间，由一位法名叫调林的和尚常住守灵。据说，他早年是吴佩孚的一个侍卫连连长。吴氏垮台后，即在京西海淀药王庙出家。民国 25 年（1936 年），于拈花寺受戒，后就在拈花寺挂单常住，成为吴氏的“替僧”。吴氏死后，长期为吴氏守灵。其生活费在日降前，由日伪政府负担；日降后，由国民党政府负担。直至民国 35 年（1946 年）12 月吴氏安葬于玉泉山为止。

百日祭

百日祭属于旧时葬后祭的一种，即从亡人倒头之日起计算，至一百天之日，谓之“百日祭辰”。因距殡葬之日较近，丧家余哀未尽，届时，必给亡人设位超度。一般人家只是以三碟水饺供于亡人影像前，焚香秉烛，依尊卑长幼次序行三叩首礼。最后在门前烧几个素皮包裹而已。富户则延请僧道唸经礼忏，设筵招待前来祭奠的亲朋来宾，届晚送焚楼库等纸扎冥器，一如葬前每逢度亡道场圆满后的送圣之仪。

民国 29 年（1940 年）3 月 12 日（即阴历二月初四日）为吴佩孚逝世一百天。吴氏家属遵照北京风俗旧例，特在停放吴氏灵柩的拈花寺东院“武圣祠”举行百日祭。

是日，寺前高扎素彩牌坊一座。山门内设官鼓大乐，以便为来祭者传报。计有：红底金纹门鼓一对，锣架一对，金漆号筒一对。乐座上有九音锣一对，唢呐、海笛、笙各一对，水镲两付，大锣一面。祭棚搭在吴氏停灵的大殿之前。棚口亦扎有素彩，并设有小门鼓一面；官鼓四面；梆、鈸二报。棚内回事人员两名；参灵用的鸣锣一面。

棚前甬路两旁立有吴氏生前所荣获的巨幅锦旗、锦标、万名旗、伞。棚的对面，临时礼宾处前设有四档子火壶茶会。其中有东直门羊管胡同德爱堂“万寿无疆”粥茶老会一堂，地安门外火神庙内在理公所、旧鼓楼大街清虚观庙内在理公所等清茶老会各一堂。

棚内搭了三面上下两层的经台。共有七棚经。对着灵堂的两层经台；上面是雍和宫的喇嘛（番），唸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一永日；下层右首为潭柘寺的和尚（禅），唸诵《金刚经》一永日。

东面经台：上层为东岳庙道士（道），唵诵《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一永日；下层为长椿寺和尚（禅），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永日。西面经台：上层为白云观道士（道），唵诵《太上道德真经》一永日；下层为本庙拈花寺和尚（禅），唵诵《大佛顶楞严经》一永日。

自下午2时起，各界名流赶赴寺中祭奠者络绎不绝，静寂清幽之拈花寺中，一时冠盖如云。张燕卿夫妇、蒋雁行、寇英杰、张方严、陈幼孳、符定一、冷家骥、蒋尊祗，以及吴氏生前友好，旧日部属，皆亲往祭奠。致送花圈、挽联及各种纸扎冥器者甚多。来宾由张劭溥等分别招待。按佛教寺院清规，庙内不得进荤。吴氏生前信佛，故一律预备与荤菜名同形似的高级素筵。以为亡者保持身后功德。

下午4时许送库。一时附近市民空巷以观。盛况如昔。送库行进秩序为：

一、官鼓大乐（官吹官打带小乐儿）：号筒一对；官鼓四面；唢呐、海笛、笙各一对，九音锣一对，跟锣一面（指挥）。鼓手俱头戴清制官帽（免纓），身穿绣着团寿字的绿驾衣，腰系白缎绣蓝万字的搭帛，足登青布靴。

二、大北西乐队一班，吹奏哀乐，俱为铜鼓洋号。头戴将军帽，身穿白礼服。

三、雍和宫的番经13人；大“刚冻”（铜号）一对，由二人（临时雇来的，穿蓝褂。不算番僧数）由二番僧手持号嘴且走且吹；大柄鼓一对。临时雇二人扛着，由二番僧边走边敲；大钹一对；余者徒手相送。番僧俱头戴黄秋帽，身披黄袍。走在最后的大喇嘛，头戴黄色桃形秋帽。

四、潭柘寺的禅经13人。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钹子一对；手鼓一对。两众徒手。走在最后的“放正”大和尚，持手炉，上插草香炷。僧众俱披海青大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放正”大和尚着杏黄袍，加披同样袈裟。

五、东岳庙道经13人：走在最前面的道士，左边的持铃；右边的敲“喻子”（比引磬大的铜钟）；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钹子一对；手鼓一对。两众徒手。走在最后的“高功”手捧如意一柄。俱头戴圆形混元巾，露着冠簪，身穿蓝袍，加披彩色缎绣法衣，红、蓝、绿、豆青、白，每色一对，上绣青云、白鹤、灵芝或八仙法物等吉祥图案。惟有“高功”身披紫缎八卦太极图仙衣。

六、长椿寺音乐禅经13人。九音锣、笙各一对；管、笛各一，钹子一对，大铙、大钹各一，手鼓一对，放正的大和尚持手炉。均身穿海青大袍，加披彩缎对儿衣，每对色彩不同，但均为“七衣”（比丘具足戒的袈裟）的底子，每对色彩不同，上绣花卉图案。惟有“放正”大和尚披“千佛衣”，上面绣满了佛像。两旁的二僧披“罗汉衣”，上面绣满了罗汉像。每吹奏一段佛曲梵乐之后，便打一遍大铙大钹，两者间替进行。

七、白云观道经13人：法器、法衣与东岳庙相同。

八、翠峰庵尼姑经13人。身穿灰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走在最前头的两尼右边的打引磬；左边的敲木鱼。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钹子一对；手鼓一对。徒手一对；走在最后面“放正”的执手炉。

九、北京市警察局乐队，俱铜鼓、洋号合奏哀乐。队员均黑警帽、黑警服、白裹腿、黑皮鞋。

十、各界来宾数百人。

十一、大清音（即堂祭清音锣鼓）一班：九音锣、笙、笛、管各一对，

小锣一面，皮鼓一面（指挥）。俱头戴清制官帽（免纓），身穿蓝中褂。足登青布靴。

十二、孝子孝属：长子吴道时以铜茶盘捧着喇嘛用“巴拉面”捏成的灯、塔，灯盏内放有酥油，进行燃点。长孙运乾捧着潭柘寺和尚呈给西方三圣的黄表（度亡文疏）。次孙运坤捧着东岳庙老道呈给宝华圆满天尊的黄表。其他孝属依次捧着长椿寺和尚呈给西方三圣的黄表；白云观老道呈给宝华圆满天尊的黄表；翠峰庵尼姑呈送西方三圣的黄表；拈花寺和尚呈送西方三圣的黄表。

十三、女宾数十人。

十四、拈花寺禅经 13 人：法器、法衣与潭柘寺同。

行进中，警宪分列来宾、孝属两侧，以便护卫。

送库路线为，从拈花寺出大石桥胡同东口，经旧鼓楼大街，进大铃铛胡同，经钟楼弯西北侧，至钟楼后焚化冥器。

钟楼后焚化场早已摆好纸扎冥活：一丈五的楼，一丈一的库三堂，共为 9 座。坐北朝南，坐东朝西，坐西朝东各摆楼库一堂，每堂楼库前，各放 4 只墩箱。三堂楼库中间，放着金山银山、尺头桌子 8 对；文房四宝、古玩陈设桌子 4 对；四季花盆 8 对；灵人、卫兵十数对；花圈、花蓝数十个。一律面南而放，以便迎着送库的行列。

警宪将全部冥活围了起来，禁止闲杂人员靠近。另有消防队员十余员，架着水龙，摆开了阵式。北京市警察局的弹压车、消防大队的消防车，以及在此等候送库来宾的汽车、自用洋车，从焚化场一直排至钟楼湾西侧，势派可谓大矣！

送库行列到达后，鼓乐梵音，响成一片。茶房、铺排人等接过孝属捧的表疏，放在坐北朝南的楼库座上，点火后，全体孝属三叩首，马上由官鼓大乐鸣锣，宣告礼成。只留下拈花寺的和尚在此纷击法器，待将全部冥活焚上完毕，始行解散。

周年祭

旧时，最大的葬后祭是办周年之举，但在风俗习惯上办“单”不办“双”。据说，办“双”怕“重丧”（在百日内再死人）。父、母死后一年谓之“小祥”，办一周年；二年谓之“大祥”，但不办二周年。可办三周年。

个别汉人富户有办十周年者。未免过于繁文缛节了。

吴佩孚逝世后，办了一周年大祀，但未闻有办三周年之举。

民国 29 年（1940 年）11 月 13 日（即阴历十月二十四日）为吴佩孚逝世一周年之期。吴氏家属及其子吴道时、旧部洪晋彭、张劲溥等为追度吴氏英灵，于是日在拈花寺东院武圣祠举行了一周年大祀，采用的仍是民间传统形式。其规模较之年初的百日祭更加隆重。

是日，从凌晨起，自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东口起，直到拈花寺山门之前，警宪林立，诚是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持枪荷弹，戒备森严。山门前亦有两对警士挎着“盒子”站岗。门前搭了两道素彩牌楼，头道牌楼上以黄纸大字块写着“孚威上将军周年大祭”。山门内照例设了大鼓锣架等民乐，以迎接来宾。伪市长余晋龢、伪治安总署署长杜锡钧代表该署督办齐燮元，山东同乡会及京市各佛教、各慈善团体均分别派员参加致祭。来宾接踵，竟日

盈庭。

武圣祠前，幡旗伞盖，罗列满堂，灵前扎结素彩灵龕一座，中悬吴氏巨幅遗像。像后，吴氏灵柩上扣着一卷明黄色绣着佛字莲花座的堂罩。供案上设景泰蓝五供一堂，燃香秉烛，香花供养，十分肃穆庄严。殿内左壁悬挂着墨林恭绘的吴氏文装油画像，着冕佩圭；右壁悬挂着张召堂所画的吴氏武像，古装佩剑。以吴氏生前允文允武，因绘两像，用以传神。笔法均极为生动，堪称杰作。

纸扎冥物不可胜计，除加大尺码的楼库外，尚有纸糊的四合院瓦房一所，外围是车轱辘钱式的花墙子，青水脊的门楼，院内正房为二层古典式楼房，上下各五间，均前廊后厦，雕栏画栋。两旁为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屋内家俱、陈设，一应俱全，扎制极为精巧。再加上吴氏生前旧部属僚、亲朋所送的各种纸活，如金山银山、尺头桌子、四季花盆等，摆满了棚里棚外，简直成了一座纸扎艺术博物馆。

日间由番、道、禅、尼等 12 棚经轮流诵经礼忏。夜间尚有地藏十王宝灯（传灯）、瑜伽焰口施食，成为昼夜功德的道场。

下午 4 时来宾坐席；5 时送库。所有排列秩序大体上与百日祭相同。

- 一、官鼓大乐前引；
- 二、雍和宫番经 13 人；
- 三、东岳庙道经 13 人；
- 四、广济寺禅经 13 人；
- 五、法源寺禅经 13 人；
- 六、翊教寺禅经 13 人；
- 七、法源寺禅经（第二班）13 人；
- 八、承寿寺音乐禅经 13 人；
- 九、法源寺禅经（第三班）13 人；
- 十、莲花山下院坤道道经 13 人；
- 十一、翠峰庵尼经 13 人；
- 十二、北京市警察局乐队一班；
- 十三、各界来宾；
- 十四、清音一班；
- 十五、捧圣（疏表）的吴氏眷属；
- 十六、拈花寺禅经 13 人殿后。

送库按既定的路线行进，全体从拈花寺出发，出大石桥胡同东口，经旧鼓楼大街，进大铃铛胡同，至钟楼后广场焚化冥物。所经的街道，皆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竟然跟着送库行列，驰前跑后，尾随不舍。

钟楼后广场上，五颜六色的纸扎冥物堆积如山，令人眼花缭乱。广场南端，面北而立的是一堂加大尺码的楼库：一座高三丈二尺的“神楼”，两边各放一座高两丈八尺的“宝库”。四只两人抬的杠箱，在库前平排而放。四张尺头桌子，在两边八字分开而放。这是“主堆儿”。

广场北端，是一所纸扎的阴宅——四合房其尺码与真房不相上下，面南而立。广场东西两侧，约有几十套金山银山、尺头、文房四宝古玩陈设、各种家具、灵人、侍卫护兵……还有百十来个花圈、花篮、匾额……

广场被附近居民围得水泄不通，若不是警宪为之开道，几乎连送库的行列都很难行进。

当送库的行列到达之后，所有响器、僧道即分四排对面而立，一时，鼓乐喧天，梵音佛号交织在一起。孝属仅在摆有楼库的“主堆儿”前匍匐下跪，楼库将被点着，公子吴道时等即一齐三叩首，马上被人搀上了汽车，后边跟着两名身穿警服，腰里挎着“盒子炮”的，立即登上了跨子车，尾随汽车之后，匆匆退出了现场。这时，北京市警察局乐队、官鼓大乐、清音班都陆续撤离现场。喇嘛、老道、尼姑、道姑也匆忙止乐撤衣。只有几班和尚，从焚化场南端站成双行，对面而立，手里轻轻地敲打着法器“ ， ， 嗵！ ， ， 嗵！”因为绝大多数的纸扎冥活还没有焚化完。焚化场中心，纸扎阴宅的正前方是一片火海，由十几个人手举糊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白腊杆子围在火堆两旁戒备，北京市消防大队队员们头戴铝亮的大铜盔，排在一辆红色的消防车旁，云梯、水龙都摆开了阵势，以防火患。北京市警察局弹压车旁站了两排弹压秩序的警士，如临大敌。

冥活的火化仪式持续约有一个多小时。最后，由吴家管事的发话，点火焚烧巨码的阴宅四合房。顿时，大火冲天，纸灰腾空数丈。消防队竟将水龙打开，以喷水压减火势。这时，全体僧众高声齐诵“送圣功德赞”，在急敲重打中宣告礼成。管事的及总提调等代表本家一一向在场的消防队全体队员、警察局弹压席上全体警士以及现场工作人员长揖道谢。

最终公葬 千古长局玉泉山

民国34年（1945“八·一五”抗战胜利，国土重光。国民政府（指国民党南京中央国民政府——下同）认为“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歿。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上将衔”并以“故旧袍泽”及“平市各界”名义发起公葬。

12月9日，贵州省省主席杨森为主持吴的公葬从沈阳返平，下榻吴宅，研究公葬具体事宜。旋即组成以孔祥熙、李宗仁为主任委员的“蓬莱吴上将军营葬委员会”，并于平市《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北平日报》、《北平新报》等报纸发表启事，订于12月15日（星期日）下午1时至3时在拈花寺公祭，16日安葬于玉泉山西麓。同时，将此次营葬的经费也初步定了下来，总额为法币5000万元。

吴氏公葬的消息传出后，马上成了北平茶楼酒肆中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些市民很羡慕吴氏的身后哀荣，说：“日伪给他举行一次国葬，现在中央（国民政府）又给他举行一次国葬，他倒干着啦！”并预言说这次“国葬”一定比日伪时期那次还要隆重。

过去，无论国葬、公葬，均是在民葬的基础上进行的，即按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办理。尤其是对有勋业绩者表彰型的公葬，照例是繁文缛节，力求空前绝后。

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次国民政府以“故旧袍泽”及平市各界名义所举行的公葬，在当年说来，不是什么“俭朴”，而是简陋。说实在的，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在处理这类事情时，区别于满清、北洋、日伪诸政权的地方，不事传统排场，要求简单隆重。

12月15日是北平市各界公祭吴氏的日子，是日，武圣祠门口照例摆了大鼓锣架，设了门前的官鼓大乐，搭了黄、红两色的花牌楼。而且有一色新装的士兵为之站岗。凡来祭的汽车一停，对儿岗立即高喊“立正，敬礼！”

鼓手马上击鼓鸣号，为之传报。营葬委员会礼宾人员马上长揖相迎，同至礼宾处，双手送上一朵黄、红两色的纸菊花，下边缀以黄绶带。除了收受花圈、挽联外，像“奠敬”礼金及其它实物性的奠礼一概壁谢。同时营葬委员会和本家也不预备茶饭。

前院墙壁上贴着用黄纸腾写的国民政府当天发来的明令褒扬的电文；营葬委员会发布的明日发引路线图（绕内城一周），并敬告诸友好说：“墓远天寒，请勿送殡”。另外还贴了大幅黄纸报子，列出几位旧部下送来的“番经一永日”、“禅经一永日”。

二门以内，甬路两旁，摆满了红漆木质的执事架，上面插立着历届政府和各界赠给吴氏的大型彩缎锦旗、锦标、万名旗、万名伞。还有花圈和挽联。

北殿正中，吴氏的灵柩上扣着一卷黄色的“堂罩”，上面绣满了带有莲花座的佛字。大殿正面搭了三门四柱式的花牌楼，正中挂着一块白布正楷字的大匾，上书“正气长存”，上款是“吴上将军千古”；下款为“蒋中正”。灵柩前是一张供桌，上面摆了五碗苹果，五碗用粉条烧成的《西游记》点景的“艺术品”。前设景泰蓝五供，一对红供花，一对红蜡。桌前挂了一幅蓝缎绣花的桌帘。

灵堂的对面是雍和宫的喇嘛经和拈花寺的禅经各一台（均为平地座）。

下午1点以后，华北行营主任李宗仁、总务处处长张寿龄，十一战区副长官陈廷杰、副长官马法五，第二战区驻平办事处黄处长，第十二战区副长官马占山，以及吴氏的旧部、生前友好均陆续莅临致祭。吴大公子道时，站在灵前一一答礼。

下午2时，一辆市府小卧车驶入大门，只听鼓乐齐鸣，礼宾人员率所有前来致祭的来宾列队迎接“蒋主席的代表”市长何思源，鼓乐前引至灵堂。何思源首先上香行礼，然后，展读了《蒋主席祭文》：

“祭陆军上将吴子玉文：惟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市市长何思源谨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蒋，以清酌庶满之奠，致祭于陆军上将吴公之灵曰：蓬莱古郡，实生异人，蜚声中外，良非无因。溯公少时，建业衣序，学剑学书，允文允武。四方多故，慨想澄清。请纓投笔，久典甲兵。归隐旧京，功成身退。书画怡情，遵时养晦。天祸中国，日寇侵袭。偶纓牙疾，遂殒大星。

不为势屈，不为利诱。大节坚贞，洵堪不朽。玉泉山侧，瘞公之灵。

穹宫幽邃，千古长扁。呜呼哀哉，尚飨！”

礼毕，全体合影留念。随后，焚化花红纸钱于铁笼内。燃放万头铁鞭一挂。

次日，吴氏发引。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

上午10点。由官鼓大乐参灵后，从拈花寺起灵，由吴大公子道时执幡前导，拈花寺13名和尚搭衣送殡，首先上32人杠，高扬花红纸钱（按旧时风俗，死丧不满三年的，扬白纸钱，三年以上的扬花红纸钱）。

本来，吴氏的旧部几个军长，主张用64人大杠，已经与地安门内西黄城根信成杠房讲妥。但吴道时等均说：“不能按日伪时期旧例行事，应一切从简”遂改用西四丁字街永吉杠房的32人杠，连一卷官罩也没用，只用了一幅较为体统的过棺罩片。从庙里抬出，经八道湾至鼓楼西大街武庙前，换上了载重汽车。

一辆美式十轮大卡，拉着吴氏的灵柩，上面扎了松木枝的棺罩，正面挂

了吴氏遗像。另一辆挂着蒋送的“正气长存”匾额和国民政府褒扬令。后面便是孝属、营葬委员会成员以及“蒋主席代表”何思源、吴铸人、陈廷杰等人的送殡汽车，行列长达一里多地。

殡仪行列沿着鼓楼西大街浩浩荡荡向东行进，经过鼓楼前、鼓楼东大街、交道口南下，经交道口南大街、大佛寺东街（这样走大约是什锦花园口上有路祭）、马市大街、王府大街、八面槽、王府井大街、向西而行，经东长安街、天安门、西长安街、至西单北行，经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经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白石桥、黄庄、海淀镇、西苑、颐和园后身、青龙桥。下午2点最终到达玉泉山的西北麓墓地。

阜成门内大街妙应寺的喇嘛；西便门外白云观的老道；西郊皇姑寺的尼姑；旧鼓楼大街大石桥拈花寺的和尚各九众，各执法器，搭衣迎灵。

下葬后，举行了简单的祭礼，由华北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何思源、吴铸人、陈廷杰等陪祭。李宗仁、吴铸人分别致了词。然后，由僧、尼、喇嘛分别唸诵了《心经》、《大悲咒》、《七佛灭罪真言》；道士唸诵了《升天得道真经》，下午2时半礼成。

吴氏的墓地坐落在一片果园中，葬后修成一个大宝顶，高三米，直径两米半。墓门朝东。墓前立着一块刻有“孚威上将军吴公之墓”九个字。墓地四周围有松树墙子。当年，由吴氏手下的一位师长，在墓地建了两间房舍，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此。

吴佩孚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填的《满江红》词共两阕。本文所引为上阕。全文为：“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廓。到而今口外人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消；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一族错落。何时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后来，国民党军队在行军中与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并列而唱。

俗传人死“五七”（三十五天）时，要过五殿阎君的关。五殿阎君乃包公（即包文正）一转，一生无女，因此，他很喜欢女儿和花朵，如果亡人若用插上花朵的伞盖把身子遮挡起来，让老包误以为是少女，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所以，照例由姑奶奶（已出门子的女儿）出钱给糊一把大伞，并插上五朵石榴花，送到坟地焚化，谓之“烧伞”。丧家如果在家停灵三十五天，烧伞仪式则在发引之日下葬时举行。如果在家停灵四十九天的，烧伞仪式则结合“五七”送库的仪式举行。

早年有种仿真绸真缎的高级彩纸，谓其折叠后以吐沫一抿即可裁开，故名。前门外瑞蚨祥等绸布店均有出售。冥衣铺用它来糊成有关衣服、被褥、幔帐，以及各种片（如幡、伞之类）的纸活，即按真绸真缎收费。

筒子幡：引魂幡的一种。上端为八角形的架子，每角垂挂八绺白穗，每穗之间有白花一朵。架子中间挂有独条式的长幡，上书亡人名讳，外罩不同彩色纸剪成的“网套”，下垂三尺。据民间老人讲，此系明代皇家以及亲王家“奉安”时用的魂帛。这种幡从“网套”上区别嗣皇是否已经继位。如嗣皇未继位为黄色；嗣皇已继位的为红色；王爷用绿色“网套”。民间豪华型的大殡也有用这种幡的，不过用的是白“网套”。明代，有的皇帝崇尚道教，用此八角，代表八卦，每角八穗，象征八八六十四卦，打出这种幡，意为向天下十方为亡者招魂。清末民初，京津一带，民间华豪型的大殡，还有用这种筒子幡的。

主要参考资料：

赵可新。《一代军阀吴佩孚的没落》。见（In）：王凌、华平。《名人之死》。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8。第272—277页。

《吴佩孚将军昨晚在寓逝世》。《新民报》，1939—12—5。第1版。

《吴将军遗体作道装，昨日申时大殓》。《新民报》，1939—12—6。第1版。

《一代完人孚威上将军昨日接三盛况》。《新民报》，1939—12—7。第7版。

《孚威上将军吴佩孚氏昨为首七公祭》。《新民报》，1939—12—11。第7版。

《西尾大将派代表莅京吊祭孚威上将军》。《新民报》，1939—12—16。第7版。

《吴孚威移灵期近》。《新民报》，1939—12—17。第7版。

《吴孚威逝世二七，各界昨日举行公祭》。《新民报》，1939—12—18。第7版。

《吴孚威五七送库盛况》。《新民报》，1940—1—8。第7版。

《市民争观冥物》。《新民报》，1940—1—11。第7版。

《羊管胡同公益会昨为玉帅献匾》。《新民报》，1940—1—13。第7版。

《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会长等恭送玉帅万民旗、伞》。《新民报》，1940—1—14。

《吴氏成主大典，由傅增湘鸿题》。《新民报》，1940—1—16。第7版。

《吴孚威昨成主》，《新民报》，1940—1—17。第7版。

《孚威上将军逝世七七，今日举行家祭》。《新民报》，1940—1—21。第7版。

《孚威上将军灵柩定二十四日发引》。《新民报》，1940—1—22。第7版。

《多田华北最高指挥官昨吊祭吴上将军》。《新民报》，1940—1—23。第7版。

《吴灵今移拈花寺》。《新民报》，1940—1—24。第7版。

《吴上将军灵柩昨移竹拈花寺》，《新民报》，1940—1—25。第7版。

《孚威上将军百日祭辰》。《新民报》，1940—3—13。第7版。

《孚威上将军周年祭辰》。《新民报》，1940—11—23。第7版。

夫柩尚未发引 堂又遭大故 ——吴佩孚夫人张佩兰老母尾随三姑爷而死

吴佩孚的老岳母张王氏，膝下跟亲五个女儿，长女嫁给了前两湖巡阅使署的一位顾问；次女嫁给了梁文宗，但梁早逝，改嫁了张锡九；三女张佩兰续嫁了吴佩孚；四女嫁给了吴氏的军需处处长徐子珊；五女嫁给了张瑞峰。

民国 29 年（1940 年）时，吴佩孚的老岳母已届 85 岁高龄，但身本素健，精神颇为矍铄，起居饮食正常，并未发现任何具体疾病。但是，自阳历年前，得悉三姑爷吴佩孚竟因牙疾小恙而暴亡，深感蹊跷，精神上顿受打击，夙夜忧伤，形体顿呈老态龙钟之像。忽于 1 月 11 日下午 3 时许，结束了她的风烛残年，跟随三姑爷一起“游仙”去了。这时，她的三姑爷刚死去 39 天，正在什锦花园家里停灵受吊，尚未发引。作为她的三女儿张佩兰来讲，夫柩尚未发表，萱堂又告物故，连遭两次奇变，诚是祸不单行。

张佩兰闻耗，立即前往东四四条胡同娘家探丧，一痛而厥，几经家人呼唤方苏醒。是时，吴佩孚之子吴道时，死者张王氏的次婿张锡九，以及诸亲友已经纷纷赶到。张府内嚎哭之声，传于户外，令闻者酸鼻。

其子张百龄主持治丧，决定次日大殓；13 日接三；在家停灵受吊“三七”21 天，2 月 1 日伴宿送库；2 月 2 日发引。

据说，这位太夫人死后的发送不小（当然，比不上她的三姑爷吴佩孚）。13 日下午 4 时送三时，各界名流及吴氏生前友好，以及张府亲友均纷纷前往致送，达 400 余人，灯笼火把走成一条火龙。番、道、禅、尼共四棚经，还有民间的中、西三班乐队，排出去约有一里多地。沿途观者拥挤不堪，交通一时中断。地面上出动警、宪，进行弹压秩序。所焚冥物除楼库杠箱外，还有转轮大轿车一辆，前顶马，后跟骡；8 抬魂轿一乘；卫兵 4 名。至东四隆福寺前神路街焚化。

出殡时用的大约也是猪市大街永盛杠房的 64 杠，五半堂汉执事：五色绣花幡伞 30 件，金执事（古代兵器模型）三堂，大座伞三柄、影亭、魂轿，还有番、道、禅三个经班搭衣送殡。执紼者不下五六百人之多。这也是当年北京城内够上“罡风”的大殓。不过，由于这位太夫人的名气较小，北京文史档案及当时报刊均未有详细的记载。笔者仅就所得，作一简述，仅为吴氏公葬资料中的一个附件算了。

主要参考资料

《吴上将军夫人又遭萱堂大故》。《新民报》，1940—1—12。第 7 版。

《吴氏岳母昨日接三》。《新民报》，1940—1—14。第 7 版。

遇狙击成外丧鬼 不葬原籍葬京西 ——张宗昌被刺及葬事轶闻

先被“缴械”后被暗杀

张宗昌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打败后，一直妄图东山再起，民国18年（1929年）初，在日寇支持下，纠合鲁军残余势力，到烟台登陆，旋即失败，逃往日本别府当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他侈谈抗日，邀买人心，大摇大摆地回国，企图重新获得山东地盘。

民国21年（1932年）9月，张宗昌打着回籍扫墓的幌子，窜回济南进行活动，引起了当时山东统治者韩复榘的注意。于是暗中布置了郑继成，以“为父报仇”的名义将张宗昌干掉。

原来，郑继成的叔父郑金声（后郑继成过继给郑金声为继子）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位骑兵军长。民国16年（1927年）10月，郑金声奉命到鲁西济宁检阅王振等部，不期王振已降于张宗昌部下，于是被俘获，11月被杀害。因此，郑继成怀恨在心，有报“杀父之仇”的念头。此时，恰被韩复榘看中，便通过种种人事关系，暗中示意郑继成：先暗杀，后自首，走个司法审判的过场，到时候必有人保。

张宗昌在济南活动完毕，便借口他母亲在平患病电召返平，又说因为烟潍路被水冲坏，汽车不通，故中止扫墓，定于9月3日返平。韩复榘马上暗令郑继成等即刻采取行动。

韩复榘为了防止张宗昌以武器还击，于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缴械”方案——在给张宗昌饯行的宴会上，假惺惺地说：“兄弟我枉在军界多年，至今连把趁手家伙（指手枪）都不称。”张宗昌不知是计，便想讨好对方，于是就掏出自己用来自卫的手枪，往桌上一放，说“您要不嫌弃，就暂时先用去吧，日后我再给您掏换一把好的。”韩复榘一面称谢，一面将枪收了去，实际上等于缴了张宗昌的械。

晚6时，张宗昌携其随从原承启处处长刘怀洲（即刘怀周——下同）、副官刘清训、夏廷芳等乘津浦车返平，石友三、程希贤及张氏的旧属僚数十人到济南车站欢送。这时，郑继成及随员陈凤山等携带手枪，即混于人群中，未被发觉。

当时，列车停于第二站台南三股道上。张氏上车后，即与送行的旧属僚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除了重述此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原由之外，对于当前政局大发议论。丝毫没有注意个人安全的事。6点35分，将要开车，张氏由头等卧车出外送客，突有一穿灰大褂的（即郑继成）举枪即击，但子弹未发。张氏见势不妙，大呼“不好！”欲拔枪自卫，不期手枪在宴会上已被韩复榘索去，方知中计，无奈，乃拼命跑入车箱，从东头跳下，向东北方向逃窜，刘怀洲、刘清训闻警匆忙驰往救护。张宗昌等跑至七股铁道上，被追赶上来的郑继成等从后左脊击中一枪，张氏当即仰卧于七股道上。凶手又连放两枪，左眼下一枪，左额角一枪。随从刘怀洲腹部中一枪，刘清训右臂左膝各中一枪，站内顿时大乱。凶手郑继成及其胁从陈凤山趁乱逃离现场。郑继成当即向执法队官兵自首，陈凤山则逃匿无踪。

张宗昌当即被抬往济南医院救治，因伤势过重，中途即气绝；刘怀洲到医院后亦气绝；只有副官刘清训，只伤及皮肉，故未丧命，当即住院治疗。

张宗昌死后，即给其遗体照像，发现其左臂有刺字“张忠昌”三字。

“韩青天”故作姿态各报刊大造舆论

韩复榘暗杀张宗昌后，马上派代表程希贤进京以“公干”为名，实是探听北平方面对此事的反映。记者们纷纷前往采访，问及张宗昌在济南遇狙情况。据程氏说：“此次效坤赴济之前，曾打电报给韩主席。韩氏以为目前山东各地对张氏议论纷坛，不宜南来，不过在朋友间，此言又不便启齿，故张氏到济、离济之时，皆派本人以私人代表资格，赴站迎送。张氏抵济后（住纬一路石友三家），韩氏从辛庄归来，马上即去石公馆访张畅谈，翌日并设宴欢聚。不料，离济顷刻间即遭此不幸。我虽然知道郑继成其人，但谁又能料及其欲报乃叔（父）之仇。至于张氏遇害情形，报上登载的已极为详尽，因当时有记者二十余人在现场亲眼看到实况。外间对此事件传闻甚多，这完全是未见当时情形者的揣测之词，不足听信。”

当时，张学良及其他政府“要人”亦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询问此事真相，所得复电均称：

“（衔略）张宗昌到济，临行在车站被刺，当时殒命，凶手已获，系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师长郑金声之子郑继成。特此电闻。弟韩复榘。”

韩氏故作姿态，极力掩饰真相，但稍有政治头脑的人，即可推测八九。但是，除少数上层与张氏有亲故关系的军政两界人，对此持有疑议外，鲁省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此无不拍手称快，尤其是昔年受过张宗昌迫害的更是称心愿。韩复榘正是看中了这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暗中推波助澜，鼓动各界向他和中央上书，历数张氏祸鲁的种种劣迹，而郑继成为党国，为革命，为山东父老除害，枪杀张宗昌，情有可原。韩复榘却故作公正姿态，谓“电呈中央，拟俟复电再为核办，未定案前，先予郑继成特别优待。”

当时，济南、北平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各将领纷纷致电韩复榘，请求特赦郑继成。据民国21年（1932年）9月8日《北平晨报》载：商震、宋哲元、刘振华、庞炳勋、梁冠英、孙连仲、张之江、孙殿英、阎锡山等，先后致电韩复榘，谓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情有可原，请从轻处理或予特赦。长江各省来电尤多，一致同情郑继成，对其为党国，为革命，为山东父老除害的义举，以及为父报仇的孝思，深表钦佩，请求韩复榘对其予以特赦。冯玉祥则派员赴济，为郑说情。被张宗昌残害人杜化宇的妻子薛珊瑚等多人向省政府请愿，具呈各述张宗昌祸鲁历史，及各烈士殉难的情形，呈请中央特免郑罪，否则愿与郑同死。蒋介石则复电韩复榘对此案“请酌量情形办理。”

郑继成对此案的结论，当然心有成竹，自首后，在军法处不但未遭镣铐，且居住单间卧室，吃客饭。军法处给他照了一张整身像，他两手插腰，笑容满面，意颇自得。这张照片被各大报刊抢登在首版突出的位置上。

张府乱作一团接个无灵之“三”

张宗昌死讯传到北京铁狮子胡同平寓，张氏的妻妾呼天唤地乱成一团，张母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家里管事的星夜向各亲故、旧日属僚报丧，决定在私邸办理丧事。由张焕相、万福麟、潘复、何丰林、吴佩孚、李藻麟、王琦等主持，择于9月5日接三，一切都是“爆儿”，在院里赶搭了一座

席棚。因为是属于“凶死”的外丧鬼，当然不能象征“正寝”，在北堂设位。所以，只在棚里上首用素彩扎了一座毘卢帽顶子的灵龛，里边供上张氏的遗像。前边搭了一座狭长的月台，作为来宾们上祭行礼之处。平市许多军政要人及张氏旧属出于礼节上的应酬，自然都前来随礼。据说，张学良对于张氏的丧事，具有丰厚的赙赠。

是日张府门前设了大鼓锣架，官吹官打十一个响器；祭堂前设了清音细乐，为参拜者助哀。棚内三面都搭了经托子，由雍和宫的喇嘛，火神庙的道士，柏林寺、广化寺的和尚轮流唪经一永日。下午4时，平市公安局西乐队、大北乐队进棚参了“灵”。晚上4时送三，除糊了车轿、杠箱，还糊了穿着灰军装持枪荷弹的卫兵马弁，骑着“翻毛”骏马，雇人举着在前边开路。人们纷纷评论说，张氏生前已被刺身亡，就不要在去地府阴曹的路上再让孤魂野鬼崩上一弹，否则，连灵魂都灭绝了，真成了道书上所说的，变成“聾”了。

当送三的行列步出张府大门时，张氏的十多位姨太太都身穿白孝，头戴孝箍，跪在门外，呼天唤地痛哭一阵，就被人搀回棚去了（习俗上，女人不送三，只在门前跪哭一番即可回去）。张母虽然未出棚，却顿足捶胸地嚎了一气，边哭边骂郑继成心黑手狠，一定要跟他把官司打到底。

张府连出“逆事” 张氏长子自杀未遂

张氏长子济乐（当年24岁）自其父被害后，连日来精神恍惚。9月7日凌晨3点，忽然以手枪自戕，幸为仆人瞥见，当即上前搪其右臂，但子弹已出，虽未中要害，但击中腿部，立即昏倒，经家人急电王府井大街大陆医院，派车急救，经医生诊视，认为伤势不轻，但无生命危险。

至于张子为何自杀，说法不一。一说张子闻乃父凶耗后，即欲赴济南收殓，家人均认为目前情况复杂，恐遭不测，遂劝阻其行。6日晚间，张子又向他母亲要求亲去济南扶柩返平，其母便百般阻拦，为防止他私自离平，乃着人监视其行动。济乐以为行动不得自由，遂出此举。一说，是为了家务问题。但张府对此事守密甚严，外间无从得知其详。

一棺附身 萧条北上

张宗昌在济南遇刺后，其遗体由韩复榘代购棺木一具，在济南医院入殓。4日，运至皖新街安徽乡祠停放，等待他的家属前来发送。

起初，张宗昌家里的一部分人，主张在济南开吊后，当可直接扶柩回原籍掖县（张氏系山东掖县祝家庄人）附葬其祖茔内，不必运回北平。嗣后，又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是怕“凶死”的外丧鬼入祖茔破了坟地风水，防碍家运的昌隆。更主要的是张氏在山东的名声狼藉，树敌过多，如果家属齐集济南为他开吊、安葬，恐怕招来新的不幸事件。当然，还有其它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归葬不得”，只能运回北平，另寻风水宝地进行埋葬。

于是张母派张氏以前的承启处处长王金钰到济南办理运灵事宜。王金钰到济南后，当日未能谒韩。11日始得韩的副官长韩文秀代韩出见，王金钰即提出运柩回平的要求，韩即饬令济南车站为之备车。午后。总部驻站办公处主任关世濂即予备受40吨平汉4241号铁篷车一辆，决定附挂北去的津浦十

次车赴平。张氏之旧属早已离济他去，仅王金钰及同来的家族亲属一人为之照料。

该灵柩午后2时，由安徽乡祠起运，异以独龙车。2点30分到站。棺以黄绫蒙罩，抬上铁篷车，其家属则以芦席铺于车上，坐卧柩旁守之。情况极为惨淡。想当年（民国16年）张氏由济南青岛巡回时，扈从如云，胶济路曾为此加开专车七列。此次重游济南，虽无当年盛况，而故旧迎送者仍然不少。可是到今天灵柩返平，竟然无人相送，只落得一棺萧条北上。

《北平晨报》记者在发表上述报导时，特别加了按语，历数了张氏近年简历，不妨抄录于后，作为参考。

“按张宗昌十四年（指民国纪年——下同）任山东军务善后督办，以五月七日到济，十七年北伐军进展，张于四月三十日晚

退出济南，在鲁凡两年十一月又二十三日。以后即飘泊日本、大连，去年始返北平。本年九月二日早九点，由平到济南，三日下午六点半死于车站。死后之八日，今日（十一日）下午三点，灵柩离济运平。一棺附身，万事已矣！”

群妾呼天张柩出站

张氏灵柩于9月11日下午3时，由济南站启运，相传于12日正午可到，但直至下午5时半始抵北平东站，此车并非专车，而是一列货车，载其灵柩者，为一铁篷闷罐车，闷子车尚挂有二三节，车内已空，其货大概早已在沿途各站卸下去了。灵车停于南月台之南，因其家人到站较迟，故车停一刻钟后，始将灵柩运下。

棺木外裹黄绫，缠麻数匝。最先参拜灵柩者为王琦及前鲁省某厅长田某。王琦拜倒后痛哭失声，经人劝慰而退。田氏乃皤然一老翁，拜而不哭。继王、田行礼者为周大文，鞠躬而不拜，余人尚有五六十位，均因进站稍晚而未及行礼。

迟之有顷，张氏家属仍然未到，乃由绿衣白帽的杠夫将灵抬起，顺着旅客下车的路线出站，刚走几步，张氏的次子宁乐身穿重孝，由两人搀扶，疾驰而来，匍匐下跪，眼圈微红，但不出涕，而低垂其首，三叩而起，次子宁乐，年约十五六岁，肌肤黧黑，面庞削瘦，身高不满一米五，不像他父亲的身材那样高大。

月台中，除迎柩人外，闲杂观众颇多。警察宪兵各十余人，整队立于灵车的对面。灵柩出站，警宪亦随之而行，进行护卫。车站站门无禁，贩夫、乡妇、儿童均可入内观瞻，并不像当年张氏出行时，警卫戒备森严，其威风不可一世。如今仅一棺寂寂，景况凄凉。故有的记者评论说：“一世之雄，到头来亦不过一杯黄土；功名富贵亦不过是过眼烟云。”

迎灵人中有不少是张氏旧部，他们大多在5时以前即已到站，在候车室中闲谈，多操河北、山东口音，其中有不少青年，也有须发皆白的老人杂于其间。万福麟身穿便衣来祭，于灵柩停妥后，鞠躬后即告迟。潘复则未出席。此外，还有当年的台面人物李彪臣等人。别开生面者，尚有一西洋人来祭，据周大文介绍乃是来自使馆界者，但不知具体名姓。

内眷未进站，挂孝的少妇（张的姨太太）约十六七位，含泪坐在灵棚下。柩至，一齐迎上伏地高声哀号，十余人异口同声“天哪！天哪！”哭声震天，

悲痛欲绝。这时，军乐团奏起了哀乐，一时乐声呜呜与嚶嚶啜泣之呼天声交织于一起。军乐之外尚有国乐——传统的官鼓大乐，军乐止而国乐奏，呜呼呼的大号，尖声的唢呐，震心的官鼓，间有小铜锣叮咚作响，更显凄惨。当时二三十位摄影记者纷纷拍照。《北平晨报》于次日在第六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幅照片，题为“十数小星抢地哀”。照片以高搭素彩牌楼为背影，前边是十多个穿白戴孝的少妇伏地痛哭。

在军乐、国乐引导下，灵柩被抬入祭棚，置于事先准备好的“交木”上（停放灵柩的高凳），马上被扣上了红缎绣花的堂罩一卷，罩前置张氏半身大幅照片，前设灵桌，摆上从附近饭庄叫来的祭菜，五供香炉、蜡扦一应俱全，还有长明灯一盏。布置就绪后，即由众宾搀扶其内眷们入祭棚行礼，首由次子宁乐上香，然后，诸少妇一一行礼。首拜者系一四十多岁的乡妇（大约系正配夫人袁氏），在旁边的一人喊道：“先让五太太行礼！”然后依次跪拜举哀。约10分钟，一少妇手中牵一不足十岁的男孩，麻衣重孝，旋即引至次子宁乐跪灵苦席之侧，意为此是张氏的少子。

张氏的姨太太们装束几乎完全一致，孝服之内，均是灰色旗袍，或布，或绸，除二三人外，均已剪发。除五太太外，年岁最大的亦不过二十五六，最年轻的有正在“破瓜”（瓜字可分为“二八”两字，故以16岁为“破瓜”之年）年纪的，然而均是面容憔悴不堪，双眉紧锁，泪痕满面。据知情人指点说，梳头，身矮且胖的是张氏的第十五妾。眷属中有少女二，一个20岁，剪发，脖颈露有粉纱，另一个仅16岁，相当秀丽，这二人未戴孝，但也随其他各妾跪拜且哭。穿孝的女人当中只有领着幼子的那位无泪，看样子，不及30岁，仍有风韵。

据说，数月以前，张宗昌与吴佩孚同席，席间共论天下事，张氏以三国中的张飞自喻，吴氏当即打趣道：“张飞哪有十几个姨太太？”说罢大笑。未成想，曾几何时，张氏即遭不测，殒命于济南，只落得“空留遗爱在人间”了。

祭棚外观众约二三百人，当由军警维持秩序，不让观众进棚。因棚内拥挤不堪，来宾不能一一行礼，乃“合演”脱帽三鞠躬而告礼成。

棚西排列汽车3辆，四轮马车13辆，马多为枣红色，车皮甚新，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延长约30米远。电车道以西亦立有许多闲人在看热闹，而且议论纷纷。

晚间，张氏灵柩即停于祭棚之内。订于次晨移往地安门外后海北河沿广化寺。据说，将在寺内易棺衾而改殓（不用韩复榘给买的那口棺材）。

移灵广化寺

9月12日，搭在北平车站外面的祭棚，进行了重新布置，较前略微铺张。棚内外，堆满了平市军政界所送的花圈，并有挽联四对，悬于棚外。其中，汤尔和一联曰：“私仇终莫释，落落身家而外，有母难忘；

大节总无亏，纷纷仁义之徒，视君多媿。”

8时左右，张氏次子宁乐及其众妾十余人乘马车到站，焚化冥纸，哭声震天。此时，执紼者亦逐渐来齐，一一行礼。万福麟于8时40分到站致祭毕，即由广化寺高僧13人，身披红缎金线福田纹袈裟，手执铛、钹、鼓等法器进棚参灵，合诵《心经》、《大悲咒》、《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9

时整，杠夫入棚起灵，即在灵棚前上了64人大杠，杠上加了红缎绣蓝色团花的大罩一卷，由两名穿孝的杠头以打“响尺”的形式指挥（日升杠房承办）。殡列的最前头为平市内一区及公安局西乐队前导，次为汉执事“五半堂”幡、伞（红、蓝、青、白、紫幡、伞各6把；金箔罩漆木质古代兵器模型；金瓜、钺斧、朝天镫等金执事4组）；4人抬影亭；4人抬魂轿各一乘，官鼓大乐十一个响器；清音锣鼓“九福班”；广化寺和尚搭衣，执法器，素打“七星”。童子雪柳24对。最后为执绋的来宾，计有万福麟、江朝宗、朱有济、潘复，及伶人李万春等百余人。李万春着青衣杂于行列之中。沿途观者如云，拥挤不堪，茶楼酒肆临窗之处，以及高层建筑物都站满了人群，大有万人空巷之势。

殡列进前门东洞，经公安街，转东长安街，进南池子，经北池子、景山东街，出地安门，赴什刹前海广化寺。万福麟于公安街北头辞去，张氏次子叩首致谢。其余来宾多随行至广化寺。

广化寺在什刹海后海北岸（今属鸭儿胡同），门前高搭素彩牌楼。张氏停灵之处，在该寺东院侧殿。全寺僧众均出来迎灵。附近住户的妇女、儿童多入寺围观。

12时左右，张氏众妾先于殡列抵寺，即入殿堂等候。张母亦在众仆拥簇下亲到寺。张母已70开外，满脸皱纹，老泪纵横。但腿脚尚健，走路姿态，像五十几岁的人。身穿青布大夹袄，灰绸裤，意颇俭朴。

张枢抵达寺门，由乐队引导，换成16个人的夹杠，抬入寺内，停于东院侧殿。当即抬来祭席一桌，供于灵前。首由来宾致祭，继由张子及家属致祭，哭声大作。最后由张子叩谢全体来宾，宣告移灵礼成。

正式发出讣闻 向各界“告期”

张氏家属及旧部属僚经过紧张筹措，在京西香山普安店购置了一块新莹地，决定10月9日（阴历九月初十日）安葬（这样，葬前整停柩三十七天）。于是从10月4日起即在各大报刊上正式发出讣闻：

“不孝济乐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勋一位效坤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三日酉时，在济南逝世，距生于清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酉时，享年五十一岁。不幸等在不平闻耗，即日遵礼成服。于九月十二日扶柩来平，暂厝广化寺。兹泣卜于国历十月七日成主家祭，八日开吊，九日辰刻发引，安葬于香山普安店之新阡。哀此讣闻

闻

东
宁

恕报不周 重慈侍下孤子张济乐泣血稽颡

盛
昭
媛
瑞

孤女 春亭 泣血稽颡

兰
芳

枢停地安门外鸭儿胡同广化寺
幕设北平铁狮子胡同四号本宅”

点主和开吊

点主仪式没有在广化寺庙里举行，而是在铁狮子胡同四号寓所举行的。请柯邵恣为鸿题官，仍由次子宁乐捧主出堂，拜礼鸿题，行礼如仪。主成，张氏家属即予来祭的万福麟、张焕相、潘复等举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家务。认为北平市面亦非安全之地。恐仇人为“剪草除根”，日后再下毒手，故决定殡后，张氏之老母及其二子移居于东交民巷租界利通饭店，以确保人身安全。

由于张宗昌在当时已是“残花败柳”，他再一死，就更没人来捧他了。张家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一再声称“时值非常，一切从简”，这样，张宗昌的丧礼比之其他军阀不能不略逊一筹。再由于妻、妾各怀心事，丧事办得并不风光，除了“三七”念了一天经外，道场并未按“七”而作，仅仅开吊（发引前一天）用了番、道、禅、尼四棚经送库。与众不同之处仍然表现在纸扎烧活上。糊了一些骑兵部队，当时现役军人形象的侍卫仆役。诚然是活着领兵，死了也不忘挂帅。人们看了之后，不禁想起张氏于民国 15 年（1926 年）的旧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在北海公园天王殿追悼直鲁联军阵亡将士而举办的盂兰盆会上，不但糊了一只巨型法船放于湖心的木台上，还用彩纸扎糊了许多骑兵部队，从北海公园后门沿着北岸，一直摆到“小西天”一带，可谓盛矣！让这些死鬼生前当炮灰，死后的灵魂也别“退役”。张氏生前给自己死难的将士办的法会和他自己死后，其部下给他办的法会如出一辙。

当天晚上，送库时，雇了几十人举着纸扎的骑兵，走在最前边，表示开道。后边才是官鼓大乐，堂祭清音细乐，番、道、禅、尼，还有平市公安局的西乐队，旧部属僚送的民间大北乐队。由宁乐用铜茶盘托着喇嘛用巴拉面捏成的灯、塔，其他孝属捧着上呈给“宝华圆满天尊”和“西方三圣”的黄表疏文，吹吹打打地去焚化楼库等冥物。沿途观众纷纷议论说：“活着当官儿，死了也别为民”，“活着是一品，死了能成白丁吗？”

安葬京西香山普安店

10 月 9 日（阴历九月初十日）为张宗昌出殡之期（至此已是被刺的第 37 天），上午 9 时余，平市军政界要人多赴广济寺致祭送殡。迨至 10 时许，张枢以 16 名夹杠舁出寺外，即在什刹海地方改换 64 人大杠，罩以红缎蓝白团花，下绣一尺二“海水江牙”的大官罩一卷，四角以黄绸拉幌，对儿尺指挥，八杆红、蓝两色的拨旗，上书“日升杠房”字样，走在杠罩的两侧。走在杠前的张氏次子宁乐身穿重孝，左手执引魂幡，上书“中华已故显考张府君讳宗昌老大人之灵引魂幡，原命前清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酉时受生，大限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酉时云终”。下面还有四句佛家的偈子：“南柯一梦断，西域九莲开；翻身归净土，合掌礼如来。”万福麟、张焕相、汤国桢、刘翼飞、吴佩孚等，均前往执绋。殡列仍用了五半堂幡、伞，官鼓大乐官吹

官打 11 个响器、清音锣鼓“九福班”，平市公安局军乐队、大北民间西乐队、影亭、魂轿，以及番、道、禅各 13 人，搭衣送殡。纸活不过糊了些穿灰军衣的卫兵。作为当年的大殡也不过是刚刚够上“罡风”，不能不使当时红着心儿看热闹的人们大失所望。当时围观者都不约而同地说：此是军阀死后，大殡当中最次的一个。

张氏灵柩出庙后，经地安门大街、西黄城根、厂桥、兴化寺街、护国寺街，然后北折，经新街口、西直门大街。在西直门脸，于本家礼谢拦送的情况下，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李万春父子均鞠躬告退。到达海定时，又由丧家向送殡亲友再三叩谢拦送，于是吴佩孚、万福麟、张焕相等始行返城。殡列到达香山普安店莹地时已经是下午 3 点多钟了。

张氏的 15 妾均乘坐在挂有素彩的四轮马车里，随柩而行。张氏的长子济乐因腿伤未愈，所以，先乘汽车驰往坟地等候。当灵柩以“八把花”（八根系葬的大绳）往坑里系葬时，15 妾呼天唤地，其第五妾要往坑穴里跳，被人拉住，然痛哭不止，昏倒在地，经女仆救护，始逐渐复苏。这时，所有的纸活、花圈、挽联、冥钱均堆于穴前，付之一炬，跟下来的和尚高声诵念《阿弥陀经》、《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全体孝属依尊卑长幼行跪拜礼后，安葬告成。

“疑冢”之谜

关于张宗昌的改殓（换棺）情况和确切的坟穴，至今仍然是个谜。

当年，张宗昌在济南被狙击，韩复榘已给张氏代购了棺木，在济南医院成殓。其家属在京又买得一口上等棺木，在广化寺停灵期间，进行了改殓。但对其改殓的具体情况，却严守秘密，外间始终不得其详。

据有人推测，张氏后人为了防止仇人盗墓分尸，便将换下来的原棺木，在同一地点深埋地下，作为“疑冢”，而且做上宝顶，石桌、石五供、坟树等物，以迷惑他人。其具体地点仍是原来众所周知的普安店村（在海淀区西部，西南一公里许，为香山万安公墓北一公里许）。疑冢”系民国 37 年（1948 年）筑造的，其秘密是“文化革命”期间，1967 年发现的。因当地的农民“红卫兵造反派”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在其坟地宝顶 20 米深处掘出一具黑油漆的棺材，棺材头里写着“张大帅之灵”五个金色大字，但打开棺盖，并无尸骨。至于其真的灵柩所埋的位置至今仍然是个谜。

妻妾争遗产吵“黄”葬后祭

当年人们都说张宗昌有“三多”：兵多、钱多、姨太太多。张氏自己也以“金玉满堂”来自誉。据说，为了炫耀家业，曾将那位作过《何日君再来》的音乐家请来，为他谱写所谓《家歌》。没成想自己一命呜呼之后，家里的“元配”与“侧室”为了争夺遗产，马上互相撕咬起来，闹得一塌糊涂。徒然给外人留下了茶余饭后的笑谈。

却说，张氏各遗妾私下密议，认为前夫遗产应为妻、妾所共有，既使妻拿大份、妾拿小份，亦应公平合理，多寡不能过于悬殊，所以决定要据理力争，要求合理分配，如不能私下和解，自可具呈起诉，请求法院依法解决。不期袁氏耳目甚多，竟将各妾的锦囊妙计探悉，深恐将来被众妾控告，难以

脱身，于是邀来未婚女婿邢某倾心计议。

袁氏未婚女婿邢某系大连医院一看护生，年 26 岁，乃一白面书生。因曾看护袁氏殷勤备至，为袁氏所钟爱，愿以小女许配为妻。但是张宗昌生前认为，自己的女儿才 17 岁，邢某年龄过大，两人不相般配，于是坚不承认，夫妻之间因此反目。此次张宗昌被刺后，邢某认为时机已到，马上插手于张宅的家务。在妻妾分家的问题上向袁氏献计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在邢某的策划下，袁氏便四处放出风来，伪称，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时局变幻莫测，京城不甚安宁。随后即携带所有财物，率其子济、宁及女儿春宵，与尚未正式结婚的女婿邢某，一起迁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寄居，藉保安全。当时，各妾亦未疑有别情。不数日，袁氏乃偕其子女及婿，携带财物搭北宁路快车赴沽，当日乘船潜往大连，及至各妾发觉，业已无及。故匆忙召集家庭会议，讨论前夫遗产分配问题。张氏遗妾 16 人均出席会议。讨论结果，因张氏在京尚有铁狮子胡同及石老娘胡同等处房产，约值 20 余万元，拟先将此项财产变卖，分作各妾之瞻养费。然后再委托日本律师，赶赴大连，控告袁氏，要求交出全部财产，按股均分。

为了分遗产，妻妾闹得不可开交，结果把张氏的所有的葬后祭都吵“黄”了。原本，张氏部下的亲信们，建议袁氏在张氏被刺逝世一周年时，在原停灵暂厝的庙里，延僧念经送库，大办一场，表示追念，并藉此向韩复榘等刺客提出谴责。但是又怕众妻妾借此追祭之机群起“闹丧”，故此只好作罢了。

𦉑（音 jì）道书谓：“人死为鬼，鬼死为𦉑，𦉑死始无。”

盂兰盆会，佛教名词。亦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斋”、“盂兰盆供”；另称“中元节”，俗称“鬼节”。每逢旧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盂兰盆”是梵文音译，意为“救倒悬”，《盂兰盆经》载，释迦第子目连，看到死去的母亲在地狱里受苦，如处倒悬，求佛救度，释迦要他在七月十五日即僧众安居终了之日，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可使母亲解脱。佛教徒据此兴起盂兰盆会。中国自梁武帝时（502—549 在位）始设“盂兰盆斋”。节日期间，除施斋供僧外，寺院还举行诵经法会，以及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放河灯、烧法船等宗教活动。

主要参考资料

《张宗昌在济遇刺》。《北平晨报》，1932—9—4。第 3 版。

《鲁人营救郑继成将电京请特赦》。《北平晨报》，1932—9—6。第 3 版。

《各方咸注目刺张宗昌案善后》。《北平晨报》，1932—9—7。第 3 版。

《各将领纷纷电鲁韩，请特赦郑继成》。《北平晨报》，1932—9—8。第 3 版。

《张宗昌长子自杀》。《北平晨报》，1932—9—8。第 6 版。

《张枢出东关》。《北平晨报》，1932—9—13。第 6 版。

《张枢昨移广化寺》。《北平晨报》，1932—9—14。第 6 版。

《张宗昌昨被刺三七，啐经点主》。《北平晨报》，1932—9—25。第 6 版。

《张宅讣闻》。《北平晨报》，1932—10—4。第 2 版广告栏。

《张宗昌昨告室》。《北平晨报》，1932—10—10。第 6 版。

《对郑继成以预谋杀人罪起诉》。《北平晨报》，1932—10—10。第 6 版。

《张宗昌死后家庭变故何多》。天津《大公报》，1932—10—31。

好一个“简单而严整
盛大而不奢侈”的丧礼
——汉奸朱深葬事始末

民国 32 年（1943 年）7 月 4 日，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北京各大报刊，以赫然篇幅刊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局，于上午 11 时发表的一项公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因患黄胆病于 7 月 2 日凌晨 3 时逝世。

朱深，字渊博，河北省永清县人，清光绪五年（1879 年）生。前清廪生，嗣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法学部。返国后，首任律师。继任法典编纂会纂修。京师总检察厅检察官，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京师地方检查厅检察长，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于民国 4 年任大理院总检察厅检察长，得展所学，对北洋政府的司法行政多所建树。

民国 7 年（1918 年），段祺瑞组阁，朱氏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民国 8 年（1919 年），钱能训组阁，朱氏被留任。同年，靳云鹏内阁成立，朱氏仍任司法总长。靳辞职后，朱氏任国务总理。民国 9 年（1920 年），安福系失败，朱氏即退出政治舞台，遂闭门以诗酒自娱。

民国 26 年（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朱氏被日寇所网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后，充任司法总长。迨民国 29 年（1940 年）3 月 20 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华北方面在“还都南京”的名义下，将临时政府解散，统一于汪伪政府。与此同时，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朱氏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电业公司总裁等伪职。王揖唐引退后，朱氏继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新民会会长。

朱深死后，其妻刘氏痛不欲生，几次自杀未遂。朱氏遗三男六女。长子宪武，年 25 岁，已婚，任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练习生；次子早逝；三子宪尧，年 15 岁，在市立八中就读。六女中已出阁者有三：长女婿鹿学枏，为伪内务总署视察；二女婿齐崧为伪政委会秘书；三女婿祝豫系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职员。朱氏生前对子女钟爱异常，子女对朱氏亦异常孝敬，故朱氏病危临终时，子女们均服侍在侧。

因时值暑热，朱氏死后，当天下午六时即行大殓，用的是金丝捕四独板的上等棺材。殓服（寿衣）为蓝长袍、青马褂。夫人及两子均“亲视含殓”。殓后，七时即设灵堂进行公祭。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成了以“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为首，各总署督办、署氏、政委会政务厅厅长、秘书长为主的“朱深委员长治丧委员会”。决定在朱邸停灵受吊 21 天，其丧礼日程为：

“谨择于国历七月四日，即阴历六月初三日，番、道、禅经接谨择于国历七月九日，即阴历六月初八日，番、道、禅经首七送库；

谨择于国历七月二十一日，即阴历六月二十日，番、道、神经伴宿送库；

谨择于国历七月二十二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一日，辰刻发引（暂厝于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择吉安葬）。”

当日即由大六部口陈记六合棚铺在朱邸灵堂院内搭就起脊大棚一座，以及客棚两座，过街素彩牌坊三座；府前设“倒头鼓”一份；府内左侧设 32 人的“太平杠”（防水火设备）一份。

灵堂内，朱氏灵柩罩上了红寸蟒堂罩一卷，前横设一灵床，铺以红寸蟒床单，床上竖立着朱氏大幅中山装近影，灵床前即为供桌一张，上放景泰蓝

供器一堂，计有长明灯（闷灯）一盏；高足供碟五个，内放鲜果；花筒一时，内插金银灵花；蜡扦一对，上插素烛；鼎式香炉一尊。桌前挂以青缎彩绣的桌围子。最前为一小几，上设铜香炉一尊，两旁有引香面、炭筋、檀香粉、檀香丁各一碟。供来祭者上香之用。檀香炉下压着一白缎绣黑字的“请行鞠躬礼”的条幅——这是当年最“时髦”的丧礼设备了。灵前的月台上有纸制盆花两对；灵人两对，倚柱而立。

灵堂对面的房上为雍和宫喇嘛作法的“经托子”（搭在房上的经台——下同）；东房上为白云观老道作法的“经托子”；西房上为长椿寺和尚作法的“经托子”。棚顶上高悬黄、蓝、红缎底绣花经幡各四幢。上述三棚经均从接三之日（7月4日）起经。

接三之日，喇嘛（番）唸诵《金刚经》一永日；老道（道）唸诵《太上三元灭罪水忏》一永日；和尚（禅）唸诵《佛说阿弥陀经》一永日；晚间皆有焰口施食法事。各坛均为昼夜功德。

接三之日，丧家备纸糊“落地拉”（转轮）的蓝篷轿车一辆，三面纱窗，车内挂里子，车外支黑色凉篷，完全是夏日的遮凉设备。菊花青的大马三匹，一为拉车的辕马；一为走在车前的顶马，上边骑有清代装束的官人，放在辕马轿车之前，表示为亡灵开道；另一匹是跟马，放在车后，是畜力的“备份儿”。红色蓝花的墩箱4只；8人抬的绿帏、红托泥、青绦网罩顶子的官轿一乘，1.3丈高的冥楼一座，9尺高宝库两座。届晚，由鼓乐前引，番、道禅三棚经随后，长子宪武以秫秸杆挑着65张（根据朱氏享年虚岁数）“挑钱纸”（京城附近的乡县谓此为“吊殃纸”）三子宪尧以铜茶盘托着喇嘛用“巴拉面”捏的灯、塔；其他孝属则分别捧着道经和禅经呈送西方三圣的黄表。参加送三的约有千余人，俱手持官吊香一股，排成两行走在孝属前边，亲自步送。至隆福寺前神路街广场焚化卒轿、楼库等冥物。晚8时始毕。夜间还有三棚的对台焰口施食法事。

7月20日，为朱氏成主之期。朱邸特请伪政委会咨询委员，前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曹汝霖为鸿题官；伪政委会委员祝煜元、伪政委会政务厅厅长张仲直为襄题官；伪政委会秘书厅厅长祝书元为赞礼官。

下午。朱邸门前改扎花红彩牌坊一座；鼓乐一律亮出彩缎绣片；灵前红花、红烛。月台下设红毡礼案，棚内所有輓联輓幛均以红布作了象征性的遮档，一切设备布置如仪。祝、张二人于4时前，身着礼服抵达朱邸，祝书元亦前往张罗一切。

4时正，鸿题官曹汝霖乘汽车到达，朱邸以伞扇、衔牌全副执事，鼓吹前导，伞盖高张，孝子朱宪武素服匍匐迎于二门内道左，祝、张两襄题官亦同时出迎。先入客厅休息。孝子易吉眼出帏，诣鸿题官前三叩首，叩恳“赐福”，鸿题官、襄题官盥手升座，左襄题官为祝煜元；右襄题官为张仲直。依传统礼仪，左襄题启榘出木主，右襄题授笔，由鸿题官隆重点主，并读祝主词，词曰：

“敬维栗主，神所凭依。是格是飨，诚感不违。千秋万岁，永慕音徽。”

祝毕，合主入榘，缀以红、黑二帛，由孝子捧主，安放于灵前，上香行礼后，入帏。然后鸿题官、襄题官“荣主”，赞颂朱氏生前业迹，于清音细乐声中在灵前行三鞠躬礼。遂告礼成。

7月21日，为朱氏伴宿之日，日伪军政两界“要人”毕集朱邸。伪政委会委员长及各督办、各署长先后到达。伪政委会委员长身穿白色“国民服”，

系黑领结，陪同日本驻华公使盐泽到达，先后至灵堂上香致祭，读祭文。9点30分。日华北军冈村宁次至灵堂读祭文。继有日海军武官府久保田少将、北浦大佐来祭。10时许，由政委会参事索樾平赴北京饭店恭迎伪国府汪精卫代表国府文官长徐苏中来朱邸。孝子朱宪武等匍匐道左以迎。张仲直、祝书元两厅长迎至门前，徐氏迳入灵堂，行三献礼，读祭文。下午1时起先后有伪满洲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各国使馆代表，各公司、各学校、各团体、各界来宾，以及政委会所属各机关职员等来祭。

是日，由雍和宫喇嘛诵“昆卢经”一永日；白云观老道唸诵“太上道德经”一永日；长椿寺和尚唸诵“妙法莲华经”一永日。至下午6时送库，参加者约千余人，行列绵亘里许。

马市大街北口，早已由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派人将新绣的红寸蟒大官罩，64人大杠及出堂用的32人“小请儿”亮于便道上，预示着明日发引换罩升杠的具体地点。杠、罩两旁警宪林立，当送库的行列经过这里后，警宪始撤岗，尾随行列一起行进。至隆福寺前神路街焚化纸扎冥器——三丈二高的神楼一座；两丈八的宝库两座；纸扎的阴宅四合院一套；还有金山银山、绸缎尺头、文房四宝、古玩陈设等，不一而足。

7月22日，朱氏发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要求华北各沦陷区上至伪军政机关、各团体、会社，下至座商、住户一律挂半旗致哀。各娱乐场所一律停止营业一天。

晨6时许，治丧委员会各委员即率领各组组长、组员，分别准备殡仪，招待前来执紼送殡备宾。伪政委会政务厅厅长张仲直，到朱府最早，秘书厅厅长祝书元与各总署督办、各署长及政务委员会全体职员，8时即陆续到齐。日伪军政、外交各机关、各公司、会社团体、学校等人员亦先后到达。

伪政委会委员长及政委会各咨询委员张鸣岐、龚心湛等亦于8时前到达。为朱氏辞灵。各到来人员分别参灵讫，9时整正式启灵。首先由官鼓大乐、清音锣鼓吹奏参灵，再由故宫博物院乐队奏哀乐，孝子举哀，金棺始由杠夫肩舁启行。伪政委会委员长偕各督办、厅长及其他日伪要员等，先行至门外立候。时伪国府汪精卫的代表徐苏中，亦乘车而至，与各要员寒暄后，同立于门外。

金棺出堂后，先上32人“小请儿”，加官罩后南行，在马市大街北口，换64抬大杠和新绣的红寸蟒大罩，经猪市大街东行。

当时，平市各大报刊均称，朱氏殡仪的特色“为简单而严整，盛大而不奢侈，仪仗威严不同凡俗”。其实也没有离开传统的老框子，只不过是经过治丧委员会精心安排，使之较为规范而已。其殡列秩序大致一、巨幅青天白日旗一面，一兵高举，护旗兵每侧各两名。二、高二丈一尺的“铭施”一座，32名身穿绿驾衣，头戴青荷叶帽的杠夫肩舁而行表示引魂上路。

三、松活一堂：松狮、松亭、松鹤、松鹿、松人各一对。由穿孝的执事夫肩抬而行。

四、纸活冥器：金童玉女一对；灵人两对；四季花盆两对；古玩陈设、四季衣物等尺头桌子各一对。由穿孝的执事夫，两人一抬。五、伪“中国宪兵队”若干人；

六、伪“治安军”军乐团一班；

七、伪“步兵教导团”若干人；

八、伪“高等警官学校”学生数百人；

- 九、伪“北京警察局”乐队 40 余人；
- 十、伪警察队及各分局官长警士等约 200 余人；
- 十一、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卫队若干人；
- 十二、伪“新民学院”全体师生；
- 十三、伪“新民会中央训练处”若干人；
- 十四、伪“青少年团”若干人；
- 十五、伪“华北电网”职员 100 余人；
- 十六、伪“华北交通公司”乐队及职员 100 余人；
- 十七、伪“华北电业公司”职员若干人；

以上各武装者，一律遵照定仪，枪支倒佩；乐队使用的乐器，一律缠以青纱。

十八、8 人抬彩亭一座，名曰“褒扬状亭”亭内悬有伪“国民政府”褒扬状。全文如下：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学识贯通，才猷超卓，鞅掌司法，久著贤劳。事变以来，调护北方大局，尤见苦心毅力，国民政府还都以后，尤加倚畀，特派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今岁擢职现职，翊赞中央，殚竭心力，虽因积劳致疾，而任事一如平

日，卒以沉疴不治，溘然长逝。惊闻噩耗，震悼殊深。着即拨库帑五万圆治丧。生平事迹，宣付国史编纂委员会，以彰忠荃。状。

国民政府主席

兼行政院院长 汪兆铭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四日

十九、又 8 人抬彩亭一座，名曰“勋章亭”。内放勋章有三：一为汪伪政府授予朱氏的“一等同光大绶章；一为日本政府授予朱氏的“一等旭日大绶章；一为伪满洲国政府授予朱氏的一等龙光大绶章。

二十、8 人抬遗像亭一座，内悬朱氏中山装巨幅近影。

二十一、官鼓大乐一班，官吹官打带“小乐儿”计 13 人。

二十二、清音锣鼓一班。

二十三、雍和宫番经 13 人，徒手送殡。

二十四、白云观道经 13 人，徒手送殡。

二十五、长椿寺禅经 13 人，执香送殡。

二十六、童子大雪柳 240 把。

二十七、故宫博物院音乐队一班。

二十八、孝幕，即大白布凉篷一架，宪武执引魂幡、宪尧抱灵牌，其他男孝眷执孝杖走在孝幕内。幕外有持枪警宪做护卫。

二十九、执绋者。以白布制之结有彩球的长带，谓之“绋”，系于大杠之前部，长 10 余丈，由送殡诸人挽之而行。极饶古意。

三十、朱氏灵柩被扣在一卷新绣的红寸蟒大罩内，以 64 人大扛抬舁而行。头班杠夫均绿驾衣、青荷叶帽、插红雉翎、土黄套裤、青布靴。二班杠夫为蓝驾衣、青荷叶帽插蓝雉翎、土黄套裤、青布靴。杠侧各为四杆拨旗（红、蓝各二杆，白光上书“地安门外信成杠房”字样）大杠由四名执鞭压差和一对响尺指挥。

三十一、后扈 15 名，5 人一横排，共 3 排。各举古代兵器木制模型，每排皆以湖色绸带扎连一起。表示护灵。

三十二、本家“姑奶奶”（指已出阁的女）的素轿三乘。

三十三、挂素彩的四轮马车、汽车共 25 辆。其中治丧委员会执公车 3 辆。

三十四、伪北京市警察局弹压车一辆。

殡列经猪市大街，往东至东四、东单，往西经东长安街、天安门，在南出正阳门，至西珠市口，经虎坊桥、骡马市大街，广安门大街，往北进下斜街至长椿寺停灵。

沿途共有路祭棚 10 座，均系官方指定搭设的。并规定各机关送殡人员不用循例从丧居门前送至停灵庙宇；而是以路祭棚为起止站，各机关各送一段路。例如：政委会自一号路祭棚起，至二号路祭棚止；

内署自二号路祭棚起，至三号路祭棚止。余者类推。这样，各机关送殡事毕，一律回机关办公，所有公务毫不停顿。平市各报均称，此为政府要人盛大殡仪中，仅见之现象。

朱氏治丧委员会公布的各机关送殡担任地段时刻表：

祭棚地点	主祭机关	送殡担任机关	杠到时刻
东四猪市	六总署	政会及附属机关	约 10 : 30
外交部街	政委会	内署及附属机关	约 11 : 30
王府井	电业公司	财署及附属机关	约 12 : 30
天安门	新民会	新民会及附属机关	约 1 : 00
前门	警察局	治署	约 1 : 30
西珠市口	北京市商会	教署	约 2 : 00
给孤寺	华北宣传联盟	实署	约 2 : 30
	华北新闻协会		
虎坊桥	银行公会	建署及附属机关	约 3 : 00
菜市口	各省市	北京市署及附属机关	约 3 : 30
广安门大街	法院各机关	法院各附属机关	约 4 : 00

下午 4 点 30 分，殡列抵达下斜街长椿寺，朱氏灵柩被换上夹杠，于哀乐声中移灵入寺，停于正院南殿。遂抬来祭席一桌，首由番、道、禅依次啐经、品咒，然后，分别由家属及执紼送殡诸人，依次致祭。此时，日本“驻华使馆”土田参事官，代表日本使馆赶来致祭。日伪各方面要人，各机关代表、各学校、各团体亦到场致祭。最后，由番、道、禅再次啐经、品咒，家属举哀，凡不能继续保存的纸扎冥活，分别在庙里庙外点火焚化，始告礼成。

朱深的殡仪“简单”乎？“不奢侈”乎？时人已有评论：比起吴佩孚的丧礼倒是略逊一筹，如在日伪政界来讲，其全部丧事虽无国葬之名，但其“倍极优隆”的程度也是属一属二的了，故人们皆不约而同地惊呼：“好一个简单而严整，盛大而不奢侈”的丧礼！

由于“时局”关系，朱宪武等孝眷并未扶柩回籍安葬，而是于 9 月 20 日（阴历八月二十二日）移灵于香山万安公墓暂厝。这次，一切礼仪从简。

晨 9 时半，朱氏亲属及伪财务总署督办汪时憬，伪政委会政务厅厅长张仲直，伪北京市市长市公署秘书长刘宗彝，社会局局长刘宗纪等相继到达长椿寺，先后在灵前致祭，由朱氏六弟朱道炎还礼，照料一切。该寺僧人于灵前啐经后，遗族依次行礼。至 10 时 40 分启灵。由杠夫（地安门外信成杠房

承办)抬装于彩扎之灵车上,即行出发,沿途由车警队前导,灵车居次,遗族车、来宾车、及警备车随后,经菜市口、宣武门、西单、西四、羊市大街,11时30分,抵达阜成门内大街伪政委会所设路祭棚,伪政委会委员长、各督办,政务、秘书两厅厅长,伪政委会各顾问,各厅厅长,及政委会特任以上全体人员,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食粮管理局,印刷局,河北高等法院,北京地方法院,华北电业公司等各机关首脑,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副会长以下各局长,北京市总会事务部部长以下各处长,北京市公署各局长,国立各大学校校氏、院长,中国留日同学会代表等500余人,先后到达祭棚等候,高等警官学校学员300余人,由坂本队长率领,分别在祭棚两旁列队候祭。灵车到达后,即在棚前停车,由伪政委会委员长领导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祭毕,灵车继续前行,出阜成门。随后政委会黄瀚事务厅长,警察局钱宗超局长等亦先后参加行列。沿途由西郊警察分局警士警戒。12时5分行经建设总署土木工程学校,该校教职员50余人于灵前致祭。1时整,到达万安公墓。朱夫人,公子,小姐、亲友及来宾等迎灵下车。1时30分,由堪輿家唐竹平调度方向,众遗族、亲友、来宾扶灵入墓。继而抬来祭席,举行家奠及公祭。遗族、亲友号陶之声,顿时充溢于园内。

朱氏之墓的围墙为水泥建筑。位于万安公墓园内西北部(“辛山乙”)其后力碧云寺,北为玉泉山。据说此为该园地势最佳之处。

主要参考资料

《朱深逝世》。《新民报》,1943—7—5。第2版。

《朱故委长昨成主今日开吊明晨举殡》。《新民报》,1943—7—21。第4版。

《朱故委长今举殡》。《新民报》,1943—7—22。第4版。

《朱故委长昨日举殡》。《新民报》,1943—7—23。第5版。

《朱故委员长灵柩严肃哀荣中昨移万安公墓》。《新民报》,1943—9—21。第5版。

日伪教育界的一桩大丧事 ——汉奸汤尔和暨隆长寺始末

汤尔和，名鼎，字尔和。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青年时代考入日本金泽医科专门学校学习。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筹办浙江病院。辛亥革命后，曾出席各省都督会议，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被选为临时议长。民国元年（1912年）受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之聘，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力主在校内设立解剖学课，为中国医校有解剖学之开端。民国4年（1915年），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反对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爆发时，为反对北洋政府无理逮捕学生，愤然辞职。民国9年（1920年）赴欧洲考察，在德国柏林大学从事生物学和解剖学研究。民国11年（1922年）回国后，仍任医校校长。后与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建立“好人政府”。先后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此后，继续从事医学译著工作。民国18年（1929年）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民国22年（1933年）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民国24年（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沦为汉奸。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民国29年（1940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

民国29年（1940年）11月8日，汤氏因患肺癌，不治身死。汤宅门房立即发出口报，因交际较宽，恐有遗漏，故登载于各大报刊，以便“一体周知”。

“报丧 敬禀者 家主

汤督办于国历十一月八日戌时仙逝。十日接三。

谨此报闻

西四北前口袋胡同六号
汤宅家人马春山 谨禀”

汤氏生前早备有寿材木料——金丝楠木板，以备万一。汤氏死后，当即由东城八面槽元顺木厂斜木行 赶做棺木，连夜运抵汤邸。衣衾一项当晚派人去前门外大栅栏瑞缺样绸缎庄购买现成的古铜色小棉袄、棉裤一套；大棉袍一件，蓝缎长袍（外罩）一件；青缎马褂一件。此是根据汤氏生前遗嘱而办理的。于次日凌晨大殓，孝子汤坚、汤器等均亲视在侧。与此同时，伪教育总署组成了以署长方宗鳌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汤氏虽为杭州人，但入境随俗，全部丧事按北京地方传统礼俗办理。根据治丧委员会意见，鉴于汤氏生前名望大，交际广，但丧居较窄等具体情况，当请示政委会，于接三之后移灵于中南海怀仁堂受吊，但事不凑巧，当时新民会正在怀仁堂举行会议。故原议暂罢，待发引之后再议。

13日，为“迎七”（首七）之祭，教育总署职员纷纷前往吊唁，约三、四百人。北京大学总监督办公室送禅经一坛。汤宅请有雍和宫番经、地安门外火神庙道经、隆长寺禅经各一坛。共四棚经。下午5时送库，行列绵亘里许，送至西四以东广场焚化送圣全活一份。

16日，为汤氏成主吉期。根据堪舆家勘定，择于正午12时成主。仪式庄严肃穆，悉遵古礼。汤宅礼请前清遗老傅增湘为鸿题官，吴雷川、张海若为左、右鸿陪。参加者除家族近亲外，还有教育总署方署长、赵秘书长以及

各要员均前往襄礼。

28日，为“三七”之祭，汤宅亦请番、道、禅诵经礼忏终日。中外来宾约近500余人，汤宅以汉、回、素、番（西餐）四面席进行招待。下午5时送库，焚一丈三尺冥楼一座；九尺宝库两座；尺头桌子四对。

12月11日，为汤宅伴宿领帖送库之日，前口袋胡同西口搭就素彩牌坊一座，并立起了一丈八尺高的铭旛（汉用挂幡的长亭）一座。亮出汉执事20件，即幡、伞各10把，均插在红漆的执事架上。大红罗厂西口外的便道上，亮出了48人的大杠，红寸蟒大罩一份：出堂用的“小请儿”一份，拨旌8面（红、蓝各四）上书“日升杠房”字样。

汤宅除糊了一丈三的楼，九尺的库一份外，还加糊了一辆仿当时进口的小汽车，长方形的车箱，外有托泥板，后背装有轮轱备份。驾驶厢内坐一年轻司机。所有电镀活件，均以银纸做成，做工极为精细，足可乱真。

是日，教育总署各职员，各大、中、专院校师生及汤氏生前友好参加送库的近千人。致送花圈、挽联者甚多。其中傅增湘的挽联最引人注目：

“拨乱启新基，筹策独纡一代尽推医国事；
沉忧缠宿疾，邻旧忽辍百年空负树人心。”

下午9时，结合禅经在灵前的“戒食”仪式，举行家祭。设祭席三桌。官鼓大乐“发爵”后，与堂祭清音锣鼓轮流三吹三打。以汤坚、汤器为首的全宅孝属焚香叩拜。由“放正”的大和尚诵念“斋仪”折子——度亡文疏，给亡人“受戒”，让其皈依佛、法、僧三宝，以免坠入地狱、饿鬼、畜牲三涂之苦。孝子三献茶。最后，由番、道、禅纷击法器“祝赞”而礼成。

下午5时送库。官鼓大乐前引；堂祭清音及华北音乐队48人随后。给汤氏用纸糊的“小黑老虎”式的汽车，用二人推之而行，车内供汤氏灵牌，满装金、银镍簋。以伪教育总署、北京各教育机关，各大、中、专院校师生为主的来宾，均腰扎白布孝带，胸前佩戴白菊花，排成双行步送。后面依次为：伪北京市政府乐队一班；披着黄袍的雍和宫喇嘛13人，吹着长号、敲着大鼓、大钹。身披彩缎绣花对儿衣的地安门外火神庙道士13人，纷击法器缓步而行。后面是伪警察局乐队48人。身穿重孝的孝子汤坚、汤器等孝属各捧番、道、禅呈送神佛的荐亡文疏。警卫队挎枪走在两侧进行护卫。最后是作为主坛——主体道场的隆长寺和尚13人，以钹、铃、鼓等法器“素打七星儿”（指法器板点）作为殿后。经西四北大街、马市大街、至黄城根，在太平仓以北的便道上焚化了纸扎冥物。夜间还祈建了“往生逍遥道场”，施放番、道、禅三棚对台的传灯（地藏十王宝灯仪）焰口。

12月12日为汤氏发引之日，西四北大街一清早即车马水龙，市民观殡为之途塞。几乎所有车辆都自动停驶。沿途所有茶食店、酒楼、饭馆的临窗客座早已被“好事者”预先包下，以便届时一饱眼福。汤氏灵柩10时出堂，由于前口袋胡同较窄，放出丧居先上24人的小杠，至大红罗厂西口外的便道上，再换升48人大杠，加红寸蟒大罩一卷。孝子汤坚打着云幡宝盖的引魂幡，汤器抱着罩着黑纱的灵牌，与其他孝属在杠前跪成一串。起杠时，由长子汤坚在糊成古书形的砂板砖上摔了蓝白花纹的“吉祥盆”，全体孝属一齐高声举哀。华北乐队高奏哀乐，退步而行。著名的扬纸钱能手“一撮毛”（全福）率领四徒，大显身手，奋力高扬五把纸钱，致使漫天皆白，几有铺天盖地之势。

由于仪仗及送殡人员甚众，殡列绵亘约二里之遥。起杠时，最前头的仪

仗已排至西单北缸瓦市丰盛胡同东口。其势派确已够上“罡风”：

一、伪警骑车队 50 名。4 名一伍，12 名一队，计 48 名。2 名执旗，上书“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灵柩奉移开道”。走在最前面。

二、铭旌。高一丈八尺的古典长亭，内挂汤氏引魂幡，由 24 名身穿绿驾衣的杠夫肩抬而行；两名穿孝的杠头以打“响尺”的形式进行指挥。

三、开道锣 4 面，由 4 名头戴清制免纓官帽，身穿号坎儿的执事夫，肩扛一躺卧式旗杆，前镶龙头，后嵌龙尾。前挂锣；后面挂旗，上书“开道”二字。

四、五半堂汉执事“催压旌”、“催压锣”各 4 面。执旗、执锣者系“执事头目”。头戴大红高帽，身穿肥大的红锣衣，巡回于众执事行列之间，不断鸣锣、喊号，指挥执事夫一切动作。

五、各界所送的挽联、花圈若干对。

六、松活：松狮、松亭、松“鹤鹿同春”、松和合二仙。各一对。七、纸扎冥活：灵人两对；四季花盆两对；金山银山（盆景）桌一对；绸缎尺头桌一对；文房四宝桌一对；古玩陈设桌一对。两人一抬。八、黄亭一座，内放汤氏生前所得的勋章、奖章等。8 人抬，俱戴清制官帽，穿红驾衣。

九、华北音乐队 48 人（一堂），头戴将军帽，身穿白色礼服。俱以大小管号，大小铜鼓吹奏哀乐。

十、匾额亭 10 余座，俱为古典宫殿顶，敞门，下为须弥座，内放各界送的匾额。4 人一抬。抬夫头戴清制官帽，身穿绿驾衣。

十一、红缎绣花大幡、大伞各 6 把，执事夫头戴青荷叶帽，身穿绿袈衣（执事夫衣帽，下同）。

十二、汉旗子：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各一对。

十三、“回避”、“肃静”虎头牌各一对。执事夫头戴清制官帽，身穿号坎儿（执事夫衣帽下同）。

十四、“格漏”一对，系二尺多长的木棍，上涂黑、白两色之漆。

十五、“粉棍”一对，系半个竹筒，金箔罩漆，上端做一木质云头帽子，上有“万字不到头”的图案（以上均为封建时代官员出巡时所用的仪仗）。

十六、蓝缎绣花大幡、大伞各 6 把。执事夫俱头戴青荷叶帽，身穿绿驾衣（执事夫衣帽下同）。

十七、木制、金箔罩漆的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

十八、白缎绣花大幡、大伞各 6 把。

十九、木制、金箔罩漆的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

二十、青缎绣花大幡、大伞各 6 把。

二十一、木制、金箔罩漆的金立瓜、金钺斧、金天橙、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一对。

二十二、紫缎绣花大幡、大伞各 6 把。

二十三、官鼓大乐 13 人：拉号一对；官鼓 4 面；唢呐、海笛、九音锣各一对；跟锣一面（指挥）。鼓手头戴清制官帽，身穿绿驾衣，腰系绣蓝寿字的白搭帛，足登青布靴。

二十四、红云缎绣花座伞一把，高丈许，上有五寸“火焰式”金顶，一人身挎竹斗，将伞柄插入，另用二人以黄绸牵曳，谓之“拉幌”。

二十五、清音锣鼓一班。二人抬堂鼓一面，一人敲打，四笛吹奏，一面小锣，另一人以皮鼓指挥。共 9 人（抬鼓的 2 人不在内），谓之“九福班”。一律头戴清制官帽，身穿孝衣。

二十六、影亭一座，古典宫殿顶，敞门，下为须弥座，系以素彩扎成，8 人抬，内供汤氏巨幅遗像。抬夫衣帽与清音锣鼓相同。

二十七、汤氏生前所得万民旗、万民伞、锦旗、锦标若干。

二十八、红云缎绣花座伞一把（与二十四项同）。

二十九、魂轿一乘，绿帏，育绦网罩顶，青纱帘。内供汤氏灵牌。8 人抬，抬夫穿孝。

三十、红云缎绣花座伞一把（与二十四项相同）。

三十一、伪市政府音乐队 48 名（一堂）。

三十二、伪政府官员（警察护卫）。

三十三、伪教育总署及直辖机关；各院校文、理、工、农、医等各科大专院校师生。

三十四、外国语专科学校师生。

三十五、艺术专科学校师生。

三十六、师资讲肄馆全体师生。

三十七、男师附中、附小师生。

三十八、女师附中、附小师生。

三十九、兴亚高中全体师生。

四十、各市立、私立小学师生代表。

四十一、提炉 12 对，内燃檀香。

四十二、童子雪柳 12 对。

四十三、“一撮毛”（全福）率 4 徒，身背大串纸钱，沿路遇桥、河、井、庙、祠、祭棚、茶桌、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城门即扬撒纸钱。在他们身后，有两名挎烧纸筐子的，沿路焚纸；还有两名给孝子孝孙提着白布拜垫。

四十四、孝子汤坚持引魂幡；次子汤器捧着灵牌；其他男孝属一律手持孝杖。通走在白布帷幄内。外边看不见。

四十五、48 人大杠，抬着汤氏灵柩，罩着红寸蟒大官罩一卷。杠夫分为两班。第一班身穿绿驾衣，头戴青荷叶帽，插红雉翎；第二班身穿蓝驾衣，头戴青荷叶帽，插蓝雉翎。有 8 面拨旌（四红、四蓝）走在大杠两侧，上标“日升杠房”字样。由 4 名执鞭压差和两名打响尺的杠头指挥。

四十六、后扈 25 名，分为五排，每排五名，均擎举古代兵器模型，表示护灵。

四十七、送殡车轿。包括治丧委员会执公车数十辆。

伪北京市公署为保护参加执紼各机关要员，特派伪警察局侦缉队大批警探随殡列护送。伪政委会侍卫处亦派遣卫队一排（所有持枪者，一律枪口朝下）。分护灵柩左右，布置极为严密。

汤氏大殡达 3000 人左右。沿途观礼者人山人海。交通完全中断。

沿途共有路祭棚 4 座：报子胡同西口外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搭就的起脊式路祭棚一座。于汤氏灵柩到达时，由政委会执事人员将汤氏遗像从影亭中请至棚内，由委员江朝宗主祭；吉世安担任司仪。上香致祭。由孝子汤坚等叩首答谢。灵境胡同东口外有国立北京大学搭设的路祭棚一座，由总监翟兑之主祭。教育部街东口外有伪教育总署路祭棚一座，由署长方宗鳌主祭。石

驸马大街路北有浙江旅京同乡路祭棚一座，由浙江旅京名流周肇祥主祭；吴甘侯等陪祭。此外，还有许多路祭桌。例如：北京《新民报》报社社长因与汤氏生前感情素稔，特于该报馆门前摆设路祭桌，上陈香花果酒，以简单隆重仪式致祭于灵前，该社社长编辑局长，均低头默祷，历时一刻。

由于参加执紼送殡人数过多，且沿途路祭棚、路祭桌、茶桌甚多。所以殡列行走颇为缓慢。汤氏灵柩于上午 10 时出堂，由西四北前口袋胡同出发，经西四、西单，进石驸马大街，至石驸马桥，折向北行，经南沟沿、北沟沿，进报子胡同西口，直至下午 3 时始抵隆长寺安厝。伪教育总署刘士无、张心沛以及各重要职员，亦均步行送至庙内，会同汤氏家属上祭、封殿后，始告礼成。

汤氏发引安厝事竣，治丧委员会仍依原制定的计划，于 12 月 15 日（星期日）趁各机关、院校休息之际，借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吊（并非追悼会）。堂前扎巨大素彩牌楼一座，堂内高悬汤氏遗像，前设香案，广陈香花供养，焚香秉烛，并有雍和宫的喇嘛，白云观的道士，隆长寺的和尚各 13 众轮流诵经礼忏。从上午 8 时至下午 5 时，各机关、团体、学校及汤氏生前友好，前往吊祭络绎不绝，不下万人。治丧委员会以茶点招待。共收挽联 661 幅，不同质地的素色挽幛 300 余件，花圈 100 余件。

殡前已在家开吊，殡后又在社会上开吊，这是旧京丧礼中罕见的现象。

主要参考资料

《汤尔和三七之祭》。《新民报》，1940—11—29。第 4 版。

《汤尔和昨成主》。《新民报》，1940—12—7。第 4 版。

《汤尔和昨伴宿》。《新民报》，1940—12—12。第 4 版。

《一代元勋永别尘寰，汤灵厝隆长寺》。《新民报》，1940—12—13。第 4 版。

《汤尔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追悼会》。《新民报》，1940—12—16。第 4 版。

大吹“七定京师”难掩投敌罪恶 ——汉奸江朝宗丧事始末

民国 32 年（1943 年）9 月 21 日，北京各大报刊均以赫然篇幅刊登了所谓“迪威上将军”江朝宗去世的消息。敌伪《新民报》称他“三定京师，遗惠在民”；敌伪《新北京》报则称他“七定京师，功垂不朽”。简直将这位老朽吹捧上了天。

何谓“三定京师”？据江氏“倒头”之日，其“门生”对记者讲，民国肇建，内乱频繁。京师每有兵厄，如复辟、直皖、直奉三次战役，危及人民生命财产时，均由江氏出面维持，遂使京城不见兵戎。至于“七定京师”是在此“三定”的基础上延伸扩大的提法。“一定”为民国元年（1912 年）阴历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制造十二镇兵变，即由江氏出面维持善后；“二定”为民国 6 年（1917 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进京讨逆，京城演成巷战，亦由江氏出面料理善后；“三定”为民国 8 年（1919 年）直皖战争，危及京师，江氏遂与王聘卿等组成了治安维持会；“四定”为民国 10 年（1921 年）直奉大战，京畿战火，蔓延京城，亦由江氏出面调停；“五定”为民国 13 年（1924 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江氏与熊希龄、王聘卿等出面，力主和平；“六定”为民国 18 年（1929 年）阎锡山退出北京时，曾由江氏出面维持治安；“七定”即为民国 26 年（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撤退后，江氏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陷入日寇“和平”（即妥协、投降）的圈套。

前六次均为中国的“内忧”；而最后一次则属于中国的“外患”。江氏以投降日寇来换取了所谓“和平”而“定京师”，坠落成为民族罪人。这样，当然可以夸功于日寇和汪伪政府。所以，他以前的“六定”，不论功过、是非各占多少比重，也就被日伪政权当做第“七定”（投敌）的陪衬而被肯定下来了。

据查，江氏出面组织北京地方治安维持会——“七定京师”之后，由该会公推为“临时政府特任市长。自民国 26 年（1937 年）8 月 19 日起，至次年 1 月 9 日，仅为 4 个月又 21 天。后来日伪当局不忍抛弃“勋耆”，给了他一个“政委会委员”的虚衔。据说江氏没有上任视事，无所作为，即“闭门家居，惟以诗书自娱”。

江氏生前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在他的头脑中，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各占一席，但主要信仰佛教，曾与章嘉呼图克图（活佛）共为五台山普化向善佛教会的首脑；又与吴佩孚组织所谓“救世新教”，充任“副主教（企图在现有的“五大宗教”之外，自立新教的大有人在，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始终没有多大影响，孤芳自赏而已。随着日伪政权的覆亡，也就不消自灭了。

江氏“养生有道”，身体素健。民国 32 年（1943 年）春，偶觉不适，经医生诊断为肝硬化，牵连心胃。入夏以后，饮食渐弱，经多方诊治，但药石无灵，竟至 9 月 20 日下午 5 时死于北京南池子南湾子寓所。终年 80 岁。弥留时，其子女均在侧侍奉。其子泽春，孙理中，孙媳祝氏等均请假在家服侍医药。重孙三人均尚年幼。还有二“门生”不肯暂离，应酬内外一切。

当记者访问时，其门生除奢谈其“三定京师”、“七定京师”的事迹外，谓“江老病由来为优目时艰而促成者”，并出示江氏遗著《云山人诗草》一

册，尽为“忧国忧民”之作。并为他自己拟就了一幅挽联。

根据阴阳先生的勘测、鉴定，江氏遗体于次日（9月21日）下午4时大殓。其家属秉承江氏生前遗志，寿衣用全套道装，即大领皂服、黄冠、布靴，与吴佩孚的殓衣大体相同。因为吴与江氏共同组织“救世新教”，吴为主教，江为副主教，当此“玉楼赴召”时的装束焉能两样？

殓后，当即由“社会名流”及其门生组成治丧处，分为总务、文书、庶务、交际、会计五组。初步决定在家停灵受吊五七三十五天；后改三七二十一天（实际停灵23天），然后暂厝于京西“澄园别墅”。

9月22日，江宅以番、道、禅经接三，为江氏初祭之辰。自晨起，前往致祭者即接踵而至，计有伪建设总署督办余晋和，伪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应，伪市长刘玉书的代表窦以锐，前河北省省长吴赞周，前河南省省长陈静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方宗璠，以及社会名流，各机关团体、宗教团体代表等数百人。届晚，凡来吊者均各持引路香一股，当做火炬，由官鼓大乐前引，番、道、禅三班纷击法器随后，以孝子江泽春为首的男眷捧着各经班给神佛的度亡文疏，至南河沿送焚楼库一堂；“落地拉”的转轮大轿车一辆；8人抬绿帘官轿一乘。

10月10日为江氏“三七”之辰，江宅择于是日举行成主大典。京市“名流”潘燕生、梁亚平、冷家骥、周肇祥、胡观生、邹泉荪、吴道时等前后到江宅襄礼。江宅门前高张旌旗伞扇，陈设亮轿，备有官吹官打24个响器。孝子江泽春身着吉服率全宅孝眷跪于大门左侧，迎接鸿题官、襄题官的到来。

下午3时，三辆伪内务总署的小汽车，在鼓乐声中停在了江宅门前，襄礼员从车上搀下来三位老者，一位是鸿题官：伪内务总署礼俗局局长高毓彤；另两位是襄题官：前清遗老恽宝惠、张仲直。他们受孝眷三叩后，在礼宾人员的前护后拥下，进入江府。

江府前院是一片万民旗、万民伞的海洋，间杂着民国历届政府，以及各机关团体赠给他的冲天大幅锦旗、锦标。以喧染江氏“七定京师”的“一世功名”。

灵堂上端高悬北京市商会公送的大匾，上书“功德圆满”四个大字。正面陈放着敌军——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岗村的花圈和日本公使盐泽的花圈。灵棚四壁挂满了各界送来的挽联、挽幛，其中不乏阿谀逢迎之词。月台右侧挂着一幅江氏生前挚友、名医范更生的挽联：文曰：

“抵掌论事，低首参禅，订交已历三世，一生勋名竟付之梦幻：

君抱笃疾，我业岐黄，相距不过数里，两城隔绝不能理膏肓。”

月台下正对灵堂设了礼案，红伞、绿扇下的鸿题官、襄题官依次就位。在清音细乐中，孝子泽春捧主出堂，拜恳鸿题。由高毓彤在已写好的木主内外两函上“彩笔鸿题”（以朱笔加点）、“墨笔增辉”（以墨笔加点）、再以血“盖主”。行礼如仪。于4时礼成。江宅以丰盛酒席款待了鸿题官、襄题官及各位上宾。席后，举行了成主晚奠，一切悉遵古礼。奠后，由京西潭柘寺的大德僧众施放了“三大士”（即三位头戴五佛冠的金刚上师主法）的瑜伽焰口。金钟法鼓，通宵达旦。

次日（10月11日），江宅伴宿、辞灵，由番、道、禅、尼四棚经轮流诵经礼忏。据说，江氏生前与吴佩孚等人承办的“救世新教”正一堂的居士们也为江氏作了“往生普佛”仪式，念诵了《妙法莲华经》。

月台两侧，除陈放了大量鲜花圈、绢花圈、纸花圈外，还有引人注目的

纸扎冥活：计金山银山一对；绸缎尺头一对；另糊四张尺头桌子，上面分别摆着：《金刚经》一卷；《太上道德经》一卷；《论语》一卷（表示崇信“三教”）；江著《云山人诗草》一册；画卷、笔筒、笔洗、雕花石砚等文房四宝；还有各种带锦匣的名窑古瓷、玉器、雕漆珞珈等传统民族工艺品；以及皮、棉、夹、单、纱四季衣服，其中有团花寿字暗纹蓝长袍、金貂绒、银貂绒马褂、镶嵌着碧玺帽正、红珊瑚顶子的青缎帽头；福字履、云履等靴鞋……糊得惟妙惟肖，足可乱真。

月台前边还有扎糊的各式盆花，其中有四大紫砂缸，内插粉红佛座莲、碧绿荷叶、苍蒲棒、慈菇叶。意在表白江氏“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清高一生”。

下午6时送库。官鼓大乐、西乐队、清音细乐、番、道、禅、尼、居士，以及各界名流，江氏生前友好约数百人，列队徒步相送。在南河沿焚化了加大尺码的一楼二库三堂；纸糊的祭筵一桌；翻毛大马驾辕的四轮马车一辆，尺头桌子两对；还有江氏生前的部分衣物，也同时付之一炬。焚化场上，人山人海。由伪保安队派员弹压秩序。

10月12日，江氏发引。

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特明令褒恤1万元（伪联币）。文曰：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江朝宗，老成宿望，器职端凝，历任军政要职，声望甚著。事变以来，揶特匡济，功在地方，久于今职，尤重贤劳。兹闻溘逝，转悼实深。着即发给治丧费一万元，并交行政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用示笃念勋耆之意。此令！”

汪伪政府特派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专程赴京吊唁，并转饬上述褒恤令。

江氏灵柩于上午9时半“圈活绳”后，即由江泽春领全宅孝属跪灵，由官鼓大乐、清音锣鼓等响器参灵，最后由西乐队高奏哀乐，全体执绋来宾脱帽三鞠躬，灵柩即被杠夫抬出灵堂。全体高声举哀，哭嚎震天。先上32人“小请兀”。至南池子南口换升64人大杠，加扣红寸蟒大罩一卷。在僧众高诵《登云咒》声中，焚化了一座“九品莲台”。高扬起来的“买路钱”铺天盖地。

前来执绋送殡的除汪伪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江亢虎外，还有日本田中总领事、竹中副领事、江氏生前友好周大文、何丰林、陈静斋、梁亚平、胡观生、吴道时等，并有育青女职师生170人。

殡列颇为壮观，民族传统仪仗充溢了整个西长安街。是日天气晴和，沿途观礼者拥挤不堪，大有万人空巷之势。

走在最前面的是开路的保安队。32人抬着三丈二尺高的铭旌亭为江氏“招魂引路”；匾额亭十数抬，头一抬是市商会送的“功德圆满”的大匾。后面便是一望无际的花圈、挽联的队伍。万民旗、万民伞、各式锦旗、锦标；各式彩亭抬着江氏生前历届政府给他的委任状、功勋状；还有一座由穿着红驾衣8人抬的大型彩亭，内悬汪伪政府的“褒恤令”。在这些彩亭的两旁，杂以松狮，松亭、松鹤、松鹿、松和合二仙、福禄寿三星……纸糊的香幡、筒幡、香亭、香伞、金山银山、绸缎尺头、四季花盆、文房四宝、古玩陈设、金童玉女……

其后是汉执事五半堂幡伞：依次为红地绣花幡、伞各6把；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各一对；“回避”、“肃静”虎头牌各一对。蓝地绣花幡、伞各6把；木制金漆的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白地绣花幡、伞各6把；木制金漆的金轮枪、

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青地绣花幡、伞各6把；木制金漆的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一对。紫地绣花幡、伞各6把；官鼓大乐13人；大红云缎座伞一柄；清音锣鼓“九福班”；8人抬影亭一座，内悬江氏遗像；大红云缎座伞一柄；8人抬绿帏领魂轿一乘，内供江氏灵牌；4人抬更衣亭一座；内放江氏生前衣服鞋帽；4人抬四宝亭一座，内放江氏生前所用的文房囚宝及印章等物。大红云缎座伞一柄。番、道、禅、尼、居士；大白雪柳12把。

全部仪仗后是送殡的来宾。以孝子江泽春为首的男孝眷，走在用白布围成的帷幄里。

最后是身穿崭新绿驾衣，头戴新荷叶帽，插着红雉翎的杠夫64名，抬着一付长5丈有余的大红杠，杠上是江氏灵柩，扣着一卷红寸蟒的大罩。由4名执鞭压差和2名打响尺的杠头指挥。

殡出南池子南口，西行至天安门，有市商会路祭棚一座，由会长邹泉荪主祭；复西行至西单牌楼，有救世新教总会及各慈善团体联合设棚公祭；祭毕，折向北行，经西四缸瓦市，由北京绅商各界联合设棚公祭。后经新街口，出西直门，经博物院路，安灵于澄园别墅。

《1929年至1938年北京市政府历任官职表》。《北京档案资料》，1987—1。第1期。第23页。江朝宗自1937年8月19日任市长，次年1月9日卸任。1月10日即由余晋和接任。

江朝宗乃前清同治二年（1863年）生人，至民国32年（1943年）病故，享年80岁。但报丧文告及旧报刊报导上均说他享寿83岁，盖旧时均以虚岁计算，应为81岁。死后，大抵按“天增一岁，地增一岁”计算，故以“八十有三”论。

主要参考资料

《江字澄上将昨逝世，三定京师遗惠在民》。《新民报》，1943—9—21。第4版。

《江故上将军昨大殓》。《新民报》，1943—9—22。第4版。

《江故上将军昨日接三，倍极哀荣》。《新民报》，1943—9—23。第4版。

《故江上将昨成主》。《新民报》，1943—10—11。第4版。

《江字澄上将昨举殡》。《新民报》，1943—10—13。第4版。

家葬、公葬混合型的大丧事 ——记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的殡仪

民国 27 年（1938 年）1 月 8 日，北京《新民报》的广告栏里，出现了一份大讣闻：

“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陈觉生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即夏历丁丑年十一月初八日午时疾终北京寓所。兹订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即夏历丁丑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京领帖；一月十三日，即夏历丁丑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前九时发引，一月十四日，即夏历丁丑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西山新茔安葬。

幕设东城遂安伯胡同十号”

陈氏身后的丧事，表面上是由其家族承办的，属于民葬的性质，实际上是北宁铁路管理局给他举行的公葬。其倍极优隆的程度，不亚于事变前后死去的各朝野名流和要员政客。

陈氏逝世后，即由北宁铁路管理局（下简称“北宁路局”）官员为主，组成了治丧处，负责料理葬事，此是按北京民间传统丧礼办理的。而且力求大，各尽其奢。以示表彰其生前功绩。

日伪汉奸“政枢”当局王克敏，及其所属“要人”，均有匾额、挽联、挽幛所赠。侵华日酋寺内大将、山下司令、喜多特务部长等，亦作了礼节上的应酬，致送了花圈。一月以来，陈宅共收到各界所送的花圈、匾额、挽联，以及北宁路局各处、段、站所赠送的万民旗、万民伞，不下千余件。望之确有目不暇给之感。

1 月 11 日为成主之日，陈宅以重金厚礼恭请宿耆傅增湘为鸿题官；张海若、杨云史为左右襄题官，在灵前点了主。次日即开吊领帖，以番、道、禅、尼四棚经送库。据说每棚经都是 49 人。在近代度亡法事中，此是极为罕见的。据健在的法源寺圣欢法师回忆说，陈氏在停灵受吊期间，还办过“水陆法会”，对“十方三世，古往今来，四生六道，一切孤魂等众”都进行了超度，为陈氏作了最广泛的“身后功德”。

陈氏发引分为两天进行（要的是这个排场）。13 日上午 9 时出堂起杠，在阜成门外慈惠寺停灵一宿；14 日晨，再起灵，至西山茔地安葬。其殡仪是治丧处精心设计的，诚可谓“空前盛举”。仅就纸糊的烧活一项，即在 50 件以上，有纸扎的路警、仆役、尺头桌（陈设桌）、金山、银山、室内家具、日常用品、四季花盆、成桌筵席、牌桌；交通工具方面糊的有八抬绿帟官轿、四轮马车、进口小汽车、用作保卫的挎斗车，不一而足。走在殡列最前面的是高两丈一尺的“旌德亭”（即铭旌亭。因内有名人书写的亡人生平德业事迹，故名），由 32 名杠夫抬舁开道。全堂松活：松狮、松亭、松鹤鹿同春、松和合二仙等共 10 件，分别由 28 名执事夫抬舁而行。次为以素彩绸布扎成的匾额亭数十座，每座均为 4 人抬。亭内放朝野名流所送的大匾，俱出于名家手笔，措词哀惋，其顺序为：

- （一）、王克敏题曰：“为国惜才”；
- （二）、汤尔和题曰：“又弱一个”；
- （三）、董康题曰：“德惠黔黎”；
- （四）、齐燮元题曰：“伊人千古”；
- （五）、王揖唐题曰：“永怀时栋”；

(六)、朱深题曰：“遇执忽倾”；

(七)、江朝宗题曰：“天夺长才”；

(八)、高凌尉题曰：“路政先觉”。

再次为挽联行列，约数百对。现录其中典型的几例如下：

齐燮元的挽联，文曰：

“湖海慕豪情，揽辔澄清先尽瘁；
云霞开曙色，盖棺冥漠有余悲。”

曹汝霖的挽联，文曰：

“明足以察几先，忠言逆耳空遗憾；
年来不及强壮，扼腕伤心未竟才。”

池宗墨的挽联，文曰：

“南海毓多才，窃忝深情联缟紵；
北邙赍壮志，宁维琳迹著车书。”

鲍观澄的挽联，文曰：

“出处无妨各异，议论何必尽同，十载缔交，每以艰贞期国士；
序龄正在盛年，量才未竟大用，五日小别，不堪风雨哭良朋。”

所用的民间传统仪仗为“五半堂”幡、伞 30 件；金执事 20 对；大座伞 3 柄；影亭、魂轿，一应俱全。间有官鼓大乐、清音锣鼓、西乐队。送殡的经班为喇嘛、道士、和尚、尼姑各 49 人，俱搭锦绣法衣、袈裟，备执法器。另有童子雪柳 240 对。最后为孝子孝孙的白布“帷幄”。64 人大杠抬着陈氏灵柩，上面架上了大红云缎绣蓝白花卉图案的官罩一卷。其殡列足足排出去二华里之外。沿途观者人山人海，每个路口均被挤得水泄不通，车辆只得停驶。座商、摊贩均自动停止营业，看殡而不售货。

其发引路线为，自东城遂安伯胡同丧居灵堂出发，先上 32 人小杠，扣上“几了”（小罩），经无量大人胡同，出西口北行，至东单换升 64 人大杠。然后经灯市口，受北宁路局秘书处路祭；然后往南行进，经王府井大街，受北宁路局总务处路祭；经东长安街受北宁路局工务处路祭；经天安门西三座门时，受北宁路局机务处路祭；经西长安街，至南长街南口时，受北宁路局会计处路祭；经府右街南口时，受北宁路局材料处路祭；然后北行，经西单北大街时，受北宁路局警务处、北京营业所、北京办事处、稽核室等路祭；经西四牌楼西行，经羊市大街，出阜成门，受北宁路局编译室、丰台车务所路祭。沿途共有路祭棚 12 座。每座路祭棚均在棚口扎素彩牌坊一座，亮汉旗子 4 面，金执事 4 把。棚内扎上素彩灵龛设位，供祭席一桌。由主祭人上香、奠酒、恭读祭文，再由僧、道品咒诵经。耽搁时间很久。至于沿途各界所设的路祭桌、茶桌不下数百份。故灵柩到达阜成门外慈惠寺时，已经落日。在此庙大殿停灵一宵后，次晨继续发引，经海淀、颐和园，至西山茱地安葬。

慈惠寺，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北街，明万历年间建。赐额慈惠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重修。寺的西北有明建的静乐堂，为葬宫人之处，又称“宫人斜”。该寺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一间；天王殿三间；毗卢宝殿（即倒影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东西耳房各三间；东西寮房各三间。东跨院为四合布局；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南房五间。毗卢宝殿南向，原扇面墙后的四扇殿门上有圆孔，人若从后殿门外行走，人影就从孔中照进后殿门来，呈倒状，人往东走，影子却往西走，相反也如是。故称倒影庙，旧时，有停灵暂厝的业务。

主要参考资料

《一篇至文可传千古》。《新民报》，1937—12—20。第4版。

《陈宅讣闻》。《新民报》，1938—1—8。第1版。

《故陈觉生局长身后哀荣》。《新民报》，1938—1—12。第2版。

名伶、名丑、名宿的名丧厚葬 ——记京剧“滑稽大王”王长林身后的哀荣

王伶病故同行共襄“大事”

旧时，梨园界的人都是很讲究“外面儿”的，讲交际，讲人情往来，讲“义气”，讲礼节排场，因此，相对他讲，比其它行业更讲究办红白喜事，尤其是对身后大事，特别重视。一位名伶故去，所有的同人都来襄理丧事，有的送经忏法事；有的送杠罩执事；有的送纸活、松活等冥器；有的则出丰厚的赙仪（现金）份子，共同捧这棚丧事，认为这不但是人情所在，也是为本行业和祖师增光。这也可以算是同行人的“义气”吧！所以，北京城里名伶大殡不乏其例。其中，比较“风光”的要算名伶名丑王长林的大殡了。

王长林，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祖籍苏州，但生于北京。出身于艺人家庭。幼年在胜春奎科班学艺，学丑脚。以演武丑为主，中年后，兼演文丑。嗓音清脆流利，以念白爽朗有力，武功灵活见长。曾为“内廷供奉”。屡搭四喜同庆班，伴随程长庚、谭秀英等演唱倚为左右臂，名望久著，有“滑稽大王”称号。受业其门下者颇不乏其人。

民国20年（1931年），王长林已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了。卧病床头年余，药石无灵，竟于是年3月7日病歿于前门外东北园82号本寓。

王伶病故后，马上成了梨园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决定一切丧仪从丰，在家停灵受吊15天。因为王伶生前信道，与地安门外桥北路西火神庙主持田子久等名道素有交往。故决定在家受吊15天之后，停灵暂厝于火神庙，本来，北京城里的道教官观，包括火神庙在内，虽然对外应酬度亡法事，甚至可以还在庙里开吊治丧，但是却没有停灵暂厝的业务。此次，接纳王伶的停厝，乃是破例“照顾”。真可谓“面子”不小。

却说，3月7日接三的那天，丧居院里搭了起脊大棚，胡同里搭了过街棚，过街牌楼，门口设了大鼓锣架，门内设了梆、鐃二报。门前陈放着各种纸活，有加大尺码，带椽子的楼库一份；转轮挂里子的轿车一辆；绿帏官轿一乘；展翅欲飞的大白仙鹤一只；排列成行的九天仙女一队；八仙庆寿一堂。胡同口上还“卧”着六档子民间香会文场。据说，其中有四档子是清慈禧太后勅封的“皇会”。还有三档子“火壶茶会”。这是一般丧事所没有的排场。

这天，梨园行的人几乎都到齐了，就光丑行往吊者就有60多人，除了慈瑞泉随尚小云赴津演出，没有赶回来之外，凡在平丑行无不往吊。同时，丑行决议集资公送番（喇嘛）、道（道士）、禅（和尚）、尼（尼姑）四众诵经礼忏，自接三之日起正式开坛作法，至伴宿之日圆满。其他同行友好亦有不同赠挽，尤以杨小楼、谭小培等人的“奠敬”（现金封套）最为丰厚。

番、道、禅、尼九棚经伴宿送库

旧时，一般富户死了人伴宿之日，准要能用番、道、禅三棚经送库，那就已是“出人头地”，够上“罡风”的举动，也足以光耀门楣的了。王伶居然来了番、道、禅、尼“九打送圣”，可谓又高三番了，足给梨园行，尤其是丑行，甚至是给梨园行祖师爷壮了门面。

这样大的举动，当然要绕道而送，故意穿过繁华热闹的街市，显耀一番。

3月21日，正当初春季节。落日较早。所以，下午4时即开始送圣，其路线是：由丧居出百合园，经延寿寺街、杨梅竹斜街、大栅栏、正阳门大街（大杠大罩即亮于此）、西珠市口，由“新世界”游艺场往南，在永安路广场焚化楼库等冥活。其送圣行列是由梨园界几位礼仪通儿精心设计的，但不是规范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别出心裁。请看：

走在送圣队伍最前列的是外二区警署派的身挎“盒子枪”的警士和北平消防队队员。然后才是传统的送圣行列。

一、纸糊的哼、哈二将，身高丈二，头如斗大，为神鬼力士的形象，面作忿怒状，一鼓鼻，一张嘴露牙，凶猛可畏。头戴宝冠，上半身裸露。手执金刚杵。站在虎皮石的方座上。座下有木轮，人推以行。表示是“护法”神引魂上路。

二、纸糊的黑、白无常鬼，黑无常，为蓝靛脸。身着皂袍、皂靴、皂帽（四愣形），左手执黄色“勾魂牌”，上书“你可来了，正要拿你”，并用硃笔作不规则的圈点。右手执锁链。白无常穿白袍、白靴（丧服形式）、头戴白色高筒帽，上书“利见大人”四字，帽下长发及肩，口吐长舌（作吊死鬼相），手持哭丧棒。这种冥活多见于盂兰盆会所烧的法船（普渡船）上。相传为阎王派往人间的勾魂鬼。亦为佛教护法神。送圣糊这种冥活无非表示护法神引路。冥活下边亦安有木轮，用人推之以行。

送圣用以上两种冥活的极为罕见，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玩邪的”。如果糊有这种冥活，也多用在发引行列的前头，与开路鬼，打道鬼并列以行。

三、官鼓大乐，民间鼓手21名。拉号一时；大鼓八面，每面俱挂着“九狮同居”图案的鼓围子，但加披了漂白布，表示穿孝。顺呐两对；海笛、笙、九音锣各一对；跟锣一面（指挥）。俱头戴清制大绒官帽（秋帽、免纓），穿绿驾衣；系白搭帛绣蓝圆寿字；足穿青布靴。

四、堂祭清音一班，计11人。四笛、二管、二笙、一云锣、一小锣、一皮鼓（指挥）。均头戴清制秋帽，身穿漂孝（只长及膝盖，成中褂形式），足穿青布靴。

五、由外二区署组成的音乐队共58人，俱身穿青制服，头戴警帽，足穿黑皮鞋，胸佩白菊花一朵。以大、小铜鼓，大、小管号高奏哀乐。

六、雍和宫的喇嘛（番经）一班，15人。均身披黄袍，加红哈达，头戴黄秋帽（“放正”的达喇嘛戴桃形帽）。其轻重法器有：大“刚冻”（铜号）一对，长丈余，前边有穿孝的二人以绳索提着喇叭脖；由后边的两位喇嘛手握喇叭铜管的吹嘴，且走且吹。五声为一组：两声平音，两声高音，再加一声平音。吹起来极响，震天动地。大柄鼓一对，有两名穿孝的人扛着，由两位喇嘛用弯钩形的鼓槌边走边敲。大钹一对，与鼓同时打出节奏。间隔一个时候才吹一组大号。其他九众手拈佛珠相送。

七、白云观道士（道经）一班，计15人。均身穿蓝袍，外边加披彩色绣花的法衣，有红、蓝、绿、豆青、菊黄、黑、白，每色一对，分别绣有青云、白鹤、灵芝，及八仙法物图案。走在最后的“高功”为紫色的八卦太极图图案的法衣。俱头戴混元中，将道冠露出来。走在最前面，左边的持铃；右边的敲噐子（比引磬大的铜钟）；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钹子一对；手鼓两对。有两众徒手相送。走在最后的“高功”手捧如意一柄。

八、嵩祝寺喇嘛（番经）一班，计15人。所穿法衣和敲打的法器与雍和宫同。

九、地安门外火神庙道士（道经）一班。计 15 人。所穿法衣和敲打的法器与白云观同。

十、法源寺的和尚（禅经）一班，共 19 人。身穿海青大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法器排列为，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钹子一对；手鼓两对。两众徒手相送。走在最后“放正”的大和尚，身穿杏黄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袈裟，手持手炉一柄，上插一炷草香。

十一、卧佛寺的喇嘛（番经）一班，计 15 人。法衣、法器与雍和宫同。

十二、朝阳宫的道士（道经）一班，计 15 人。法衣、法器与白云观同。

十三、地藏庵的尼姑（尼经）一班，计 13 人。均身穿灰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走在前头的两尼，右边的打引磬；左边的敲木鱼。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钹子一对；手鼓两对。有两众徒手相送。走在最后面“放正”的执手炉一柄，上插草香一炷。

十四、步行送库的各界来宾。梨园行有钱金福、程继山、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萧长华等不下 200 多人；并有富连成社叶盛章率领的学生百余名。京剧票友有顾兰荪、王君甫、那君明等百余名。商界方面有绸缎行姚秀岩、白曾三；饭庄行孙晋卿；长春堂闻药庄张子余；大北照像馆经理赵燕臣；新闻界有王柱宇、夏铁汉、陈重光等。他们分插于各僧、道经班的中间，走成双行。

十五、捧圣的孝子、孝孙。分别由九名孝属用铜茶盘托着番经的“满扎”——用巴拉面捏成的灯、塔三份；道经给宝华圆满天尊的大疏三道；尼经给西方三圣的大疏一道；禅经给西方三圣的大疏两道。尼经、禅经大疏上还挂了元宝、黄钱、千张等，给四值功曹、传达于三界执符神的“钱粮”。

十六、弘慈广济寺和尚（禅经）一班，计 19 人。殿后。法衣、法器与法源寺完全相同。因这两座寺院都属于南派常住十方丛林。

沿途观众，携老扶幼，或登楼上房；或攀树登枝，居高下眺，一饱眼福。送圣行列出大栅栏东口时，观众尤为拥护，为之途塞，一、二路电车，竟然停驶五六辆。外国人士及新闻记者尾随拍照者甚多。该管界外二区警署、外五区警署特派出巡官、长警沿途维持秩序。侦缉队队长马蕴泉也特派了侦探沿路巡察，故秩序尚称井然。

盛极一时的大殡

次晨，王长林的灵柩移往地安门外火神庙，这是本世纪 30 年代，北京城里所罕见的大殡。其冥物离奇；僧道齐全；仪仗多而且精；送殡的人又多为现代伶人。因此，看热闹的人比昨天送圣时更多，琉璃厂、南新华街一带，已有人满为患，东北园、余家胡同，交通完全断绝。

上午 10 时起灵出堂，灵柩及本家孝属还没出街门，可是仪仗、响器、僧道已排出延寿寺街。本家所用的杠罩、仪仗，系崇文门外大街广兴杠房承办，64 人大杠，红缎绣花大罩，前三天就亮在了前门大街中和园夹道口上。根据本家要求，一律“普新”（即杠上的罩片、执事绣片，以及杠夫、执事夫的驾衣、靴帽，一律全新）。这在当年仅就杠罩租赁费，至少要花银元 1000 元以上。

灵柩出堂后，照例先上 32 人的“小请儿”，扣上一卷“几了”（小罩），前有“五半堂”执事的一小部分；幡、伞各 8 对；“拉幌”的大座伞 3 柄。

纸扎的四季花盆、灵人（仆役）、金重玉女、尺头桌（陈设桌）共 16 对。大件纸活有开路天玉、喷钱兽、牌桌、烟床烟具、老北京传统式的四合房。还有各种新、旧式的家俱、陈设等等。大件松活有：加大尺码的松狮、松亭、松鹤鹿同春、松和合二仙、松八仙人、松二十四孝人物等。花圈、挽联约三百余对。响器方面有：民间传统的官鼓大乐 21 人；

清音锣鼓 11 人；民间香会的文场 6 档；外五区署西乐队 58 人；长春学校民乐队 48 人；民间华北乐队 48 人。番、道、禅三经班搭衣送殡。

著名的“一撮毛”（全福）率四徒在灵前扬洒纸钱。柩前执紼送殡的伶人及各界来宾不下 500 人，凡是参加昨天送圣的几乎都来了。杠后为本家女眷所乘的白轿三乘；挂蓝白素彩的四轮马车 22 辆；挂白围子的骡车 13 辆。

殡列出东北园北口，经余家胡同、延寿寺街，进琉璃厂东口，经东北园南口，走南新华街、臧家桥、樱桃斜街、观音寺、大栅栏，至前门外大街中和园夹道口外，换升 64 人大杠。至此，五半堂汉执事——五色云缎绣花的幡、伞 30 件；汉旗子 8 对；金执事 3 组，计 20 件，影亭、魂轿，全部加入了殓列。由身穿红锣衣，头戴红锣帽的“催压旗”、“催压锣”各 6 名，以喊号、鸣锣的方式进行指挥。

随后，殓列南行，进西珠市口，经虎坊桥、菜市口、进宣武门，由西长安街，进南、北长街，经北海前门，走景山西街，经地安门，至火神庙停灵暂厝。

沿途，各界在便道上所摆的茶桌不下数百份，路祭棚共有 5 座。

以虎坊桥富连成社的路祭棚最为阔绰，为古典宫殿式的起脊大棚，棚前扎了一座三门式的素彩牌坊，内设虎皮帔椅上竖王伶遗像，由叶盛章主祭。殓列在此延搁最久。许多伶人在此路祭后，即告辞而返。

王伶灵柩到达火神庙，已届下午 5 时。庙前搭了素彩牌楼一座。

全庙道众搭衣在山门前排成双行迎灵。当即由杠夫给换上 16 人的软杠，将灵柩抬入庙内后院东配殿。停灵就位后，即摆上素筵，焚香秉烛。由孝属及执紼送殡的来宾依次行叩拜礼，再由番、道、禅依次在灵前品咒。最后，由鼓乐前引，至庙后什刹前海河沿送焚不再保留的冥物和花圈等奠礼。礼成后，本家在庙内摆了素席，向各界执紼送殡的来宾们表示礼谢。

火神庙，正名应为火德真君庙。过去是张天师来京的住处。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在元代庙址上改造而成。清乾隆三十四年（1759 年）重修。

庙坐北朝南，有门东向。东向山门内外各有一座牌楼。山门外有旗杆，山门内有钟鼓楼，山门三间，黄琉璃筒瓦绿剪边歇山顶。前为灵官殿三间，勾连搭建筑。二层殿为二层楼建筑蓝琉璃瓦绿剪边筒瓦顶。四层殿亦为二层楼建筑，名“万寿景命宝阁”，黄琉璃瓦顶。另有东西配楼二层，顶上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殿后有亭，可望什刹海。

民国期间，不应停灵暂厝，但承办丧事，专应道经。庙内有“经局子”“德善堂”（即经杆口子）专应禅经佛事（了事的乌荣寿）。

三四十年代，住持田子久，曾任华北道教总会副会长。

主要参考资料

《王长林歿后哀荣》。《北平晨报》，1931—3—10。第 6 版。

《旧剧滑稽大王王长林身后哀荣》。《北平晨报》，1931—3—22。第 6 版。

《王长林死后风光，昨日出殡盛极一时》。《北平晨报》，1931—3—23。

第6版。

《伶人出殡之盛，王长林死后哀荣》。《华北日报》，1931—3—23。

传奇式的人物传奇式的葬礼 ——记名伶杨小楼、王又宸的两棚大丧事

民国期间，北京市面上曾有几个梨园界名伶的大殡，其“备极优隆”的程度，虽不能称为“空前”，但足可视为“绝后”了。其中，以杨小楼和与他几乎同时而亡故的王又宸最为典型，且为当年一些茶楼酒肆的“太平父老”们赋予了所谓“行业重丧”的传奇色彩。本来，武生杨小楼生前作清宫“供奉”的那段历史，就已构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再加上他的死后又“拉”上了老生王又宸，以及后来杨小楼的坟墓被盗等事件，不但给那些“先聊地，后聊天，聊完大塔聊旗杆”的“神聊”者添了“佐料”，也给一些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试看杨小楼的大殡，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直到1987年4月，还见之于《燕都》杂志呢。可见其影响之深！

但传奇和印象，还不能当成事实。现还其原貌，奉献与读者。

传奇式的人物——杨小楼

杨小楼祖籍安徽潜县人，祖上十世“为士大夫身，未尝酷吏虐民”，后因时事变迁，弃士务农。祖父杨二喜，早年从军未成，遂改学戏，成为有名的武丑，同行都称之为“大刀杨二喜”。当时的名伶朱小元（朱素云的父亲）、俞润仙（俞振庭的父亲）都是他的门生。其父杨月楼，名久昌，初在徽班学习武生，后改学老生，与俞润仙合演《泗洲城》，以饰猴子出名，有“杨猴子”的绰号。其拿手戏如《五雷阵》、《牧羊圈》、《探母回令》、《长坂坡》、《挑滑车》等，极受欢迎。因之有“文武全才”之誉。

杨小楼本人系清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北京，乳名“三元”，八岁时，入小荣椿班一科学武生，取名春甫。因拜伶界大王谭鑫培为义父，随谭氏子辈排名嘉训，字嘉年。出科后，为借其父之名望，取艺名“小楼”。

当年，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供奉”。而小楼从长相到表演技巧、嗓音都酷似其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故被慈禧太后所看中，于光绪三十二年，也成了“内廷供奉”，每逢朔望，进宫演戏，曾得到厚赏。不料，受到一些王公大臣的嫉妒。

有些王爷的心腹人不明真相，只凭猜测，胡乱议论，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歪曲事实，四处传谣，似乎杨小楼与慈禧太后有不可告人的勾当。结果闹得满城风雨。

杨小楼为了躲避风头，便到西便门外白云观挂单，当了一名火居道士，道号超范子。这样，脱离了艺海，潜居庙里，既隐其名，又掩其身，似乎稳妥。詎料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先后去世。在这种形势下，若有王公大臣追究前嫌，便有口难辩。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只好装起疯来，于是经常蓬头垢面，穿一件破道袍，在前门外一带游荡，以制造假相。后来由于时局不稳，众王公大臣都忙于政务，又听说杨小楼疯了，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杨小楼在梨园界同人和众亲友的劝说下，才撤单还俗，重新挑班唱戏。

民国元年（1912年），杨小楼应吕月樵、白文金之约，离京南下，到上海三马路大舞台演戏，此为杨氏离京赴沪献艺之始。次年，乃载誉而归。

民国3年（1914年），杨氏嫌北京戏园过于陈旧，主张建新式舞台，于

是集股鸠资，在西柳树井建筑了第一舞台，一仿上海新式舞台之样式。以为北京舞台史上创一新纪元。杨氏从此组班在第一舞台演唱，共达三年之久。此后杨氏先后献艺于京、津、汉、沪，以及全国各大都市，声誉遍于南北。至本世纪 30 年代末，杨氏之艺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其唱腔朴直爽朗，饶有韵味；念白字音准确，节奏分明；武技动作灵活，似慢而实快，注意姿势优美，兼有钱金福、王长林等为之配合，更见精采。表演上主张“武戏文唱”，将武技之运用与剧情、人物刻画相结合。其代表作有《长坂坡》、《铁笼山》、《挑滑车》、《安天会》、《连环套》、《麒麟阁》、《状元印》、《江都县》、《落马湖》、《战宛城》、《宁武关》、《金钱豹》、《晋阳宫》、《林冲夜奔》、《蜈蚣岭》等诸戏。其晚年，又上演《康郎山》、《野猪林》、三四本《连环套》、《取桂阳》、《父子降汉》、《霸王遇虞姬》等戏，尤倾动全国。杨氏与王瑶卿合演之《长坂坡》、与梅兰芳合演之《霸王别姬》配合尤为严密。所演剧目大多自行加工，突破前人规范，形成独特风格，世称“杨派”，为后来武生所宗法，影响很大。

病体缠绵 终于不治

杨氏早年曾患半身麻木症，通过跟陈发科学练太极拳，病已痊愈。后来虽然多次染病，均因体质素壮，调养适宜，未成大患。民国 26 年（1937 年）9 月 15 日晚间，在长安戏院上演三四本《连环套》时，稍感不适，演后即行休养。由于年事已高，时愈时患。但杨氏从不服老，仍是争阳抢胜。10 月 20 日晚，梨园界为了救济河北省难民，在新新戏院上演义务戏，杨氏竟然抱病登台，与陆素娟合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经此一累，病情有所发展，后遵医嘱，在家静养，始终再未出台演戏。年底，金少山在新新戏院上演《霸王别姬》，杨氏冲寒前往聆听，深表嘉许。未料，返家后即患外感，勾起“老病”，以致卧床不起。本来，元旦之日，怀仁堂盛会，原定由杨氏饰《龙凤呈祥》中的赵云，结果只得告病假，由其外孙刘宗杨代表参加。年后，杨氏病转沉痾，经名医萧龙友连日诊治，讵料药石无灵，迨至 2 月 14 日（阴历正月十五日）午前 11 时逝世。杨氏生于清光绪四年，岁次戊寅，歿于民国 27 年，天运仍为戊寅，享年整一花甲子。

杨氏无子，只有一女，嫁给了名伶刘砚芳，砚芳侍杨如父，以婿兼子。乃出头料理丧事，业经分别向各方报丧。梨园界同行闻耗殊为震悼，即不约而同齐集杨宅，共商善后。

次晨，平市各大报刊均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杨氏逝世的消息。请看：

逝矣杨小楼

内外行闻者莫不深为惊悼
昨已入殓明日接三择期开吊

民国 27 年（1938 年）2 月 15 日《新民报》第六版

以金丝楠材道装盛殓

历史上，唐明皇（玄宗）是位崇玄信道的天子，因其大兴梨园，故被伶界祀为祖师和保护神。梨园界的伶人自然也都崇玄信道。这大概也是杨小楼为避祸而出家为道的原因吧。

杨小楼生前就留有遗嘱，说他曾在白云观出家为道，大名已上了玉皇大帝的《登真篆》，其身命，神魂均已不属于十殿阎君管辖，而是属于“三官”掌握了。所以，“羽化”之后，一定要身穿道装到“道国三千万世界，天京十二玉楼台”去仙游。

的确，他的后人照办了，他的装裹（殓衣）是一整套道装：贴身的是一套对襟大领的白裤褂，大领的蓝面黄里的小棉袄、棉裤，外面是大领蓝大棉袍。一律以宝剑头形的飘带扎系。最外边加披了一领深紫色，绣着八卦太极图图案的法衣，就像今天白云观道教文物陈列室展览的康熙爷赐给全真龙门第七代宗师王常月的那几件天仙法衣一样。头顶上因为没有长发，自然无法挽成道冠，所以没有用元形的混元巾，只好戴了一顶门楼式的庄子巾，正中镶上一块美玉，作为“帽正儿”。脚下穿了一双白袜子，将裤脚放进袜筒里，再配上一双紫色镶青云头的“云履”。双手捧着一柄玉如意。完全是一付道家焚修功圆果满“朝真”的装束。身上身下，当是“铺金盖银”。不过，身上盖的有说是绣着八仙庆寿图案的白色衾单；还有的说是加盖了黄绫、红色梵文经字的“陀罗经被”。后者的说法，当然与道装的殓衣不配套。但是很可能是受清代崇佛遗风的熏染，因而佛道相融。

盛殓杨小楼的棺材更是讲究，乃是一口精选的金丝楠“四独板”（即两帮、底、盖，均为四块整板）的“重材”，这是最上品的殓具了。系购自骡马市大街鹤年长寿材铺，价值 2400 元。至于棺内装的殉葬物其说不一。从当年各报披露的杨墓被盗的通讯报导来看，其殉葬品既精且多，除了宝剑、牙笏（朝笏）、拂尘等道教法物之外，古陶瓷、烟壶、金银珠宝，无所不有。但招来了后患，俗云“家贼难防”，不期让松柏庵义地看坟的董四及其勾结的盗匪们挖了去。

豪华的灵棚、灵堂和冥物

杨氏的确不愧为崇玄信道的。他的丧事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在总的排场上突出一个“奢”字；二是在礼仪上处处突出一个“道”字。

杨氏刚刚咽气，院内就搭起了巍峨壮观的起脊大棚，棚顶上按照古典建筑形式，做出了五脊六兽，而且还是古钱形状的“花脊”，从远处望去，俨然是一座高大的殿堂。棚内三面都搭了“经托子”（搭在房上的经台）。这样，可以不占院内的有效面积。其整个布局是：正面是灵堂，对面是宝盖式的番（喇嘛）经经台，台的对面，即灵堂上方，挂了黄缎绣花的幡门、幡条。棚顶中间挂了四幢与幡门、幡条配套的黄缎绣花经幡。棚的上首为楼阁式的

道经经台，挂了蓝缎绣花的幡门、幡条，棚顶挂了四幢蓝缎绣花的经幡。棚的下首为佛龕式的禅（和尚）经经台，挂了红缎绣花的幡门、幡条，棚顶挂了四幢红缎绣花的经幡。一眼望去，有如神、佛圣境。

杨氏的灵堂前搭了一座四围均为一丈二尺的大月台。台的四角各有绿漆金纹的明柱，以支撑上顶，顶上安装了彩绘团鹤图案的天花板，象征亡音“驾鹤仙去”。以符合杨氏的平生信仰，月台内外上端挂满了社会名流、商会、慈联会、梨园公会的题匾。

灵堂上扎了大型毗卢帽式的灵龕，正面挂着曹锟送的大匾“阆苑归真”，匾下，装饰着一个素彩花圈，中间以小白花组成一个大“奠”字。杨氏的灵柩被扣在一个红云缎绣着八仙庆寿图案的堂罩里。罩外竖立着杨氏大幅遗像，像前的灵桌上是一堂景泰蓝的五供，外加一盏宝塔式的“闷灯”（即长明灯，民间盛传冥路幽暗，须燃灯给亡人照明）；花筒内插着金银五彩的细灵花；两旁的蜡扦上燃点着一对白色蓝字的素蜡；中间是鼎式的大香炉。灵桌前面挂了青缎绣着青云白鹤图案的桌围子。供桌前还设了一个小几，上设檀香炉一尊，香碗一对，是供来吊者上香用的。

月台上，陈放着两对灵人；紧靠灵帏立着一对引路的“童儿”（即金童玉女），金童执幡，玉女提炉。

月台下边两侧，陈放着四对纸扎的尺头桌子，一对金山银山的小盆景；一对五彩锦缎的尺头（衣料），这是固定套路。但另外的两对桌子则带有杨氏丧礼的特色了。一桌糊的全套道装：缀有剑头飘带的豆青面，青大领的道袍；深蓝色青大领道袍各一领；马蹄形的混元中、门楼式的庄子中各一顶；彩绣青云白鹤、八仙法物的大红法衣、百寿图配万字不到头图案的橙黄色法衣、八卦太极图图案紫色法衣各一件；白袜、云头履各两双。一桌糊的是道家法物：勅令架上插着令旗、令剑、令牌、天篷尺（量天尺）、朝筒（笏板）、震坛木、米碟、净水碗、杨枝、朱砂砚、朱笔、黄表奏章匣、《天师符》、《天师玉匣记》、《天师万年历》、《天师神魂执照》各一册。一桌糊的是文房四宝：万历青花笔筒、山字形笔架、铜笔架各一；中插大抓笔、“一品文章”小楷狼毫；雕花石砚一块；大铜墨盒一具，上刻唐朝贾岛五言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铜镇纸一对；“龙门”盖金墨锭一匣、彩笺一匣，上绘松涛水月图案，并有双钩隶书：“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另有纱罩桌灯一具。另一桌糊的是古玩陈设：裱有紫红绫缎槽囊的硬木锦匣两对，内放炉、鼎、瓶、罐，另有陶瓦银釉古装歌妓人一堂，窑变紫红色“聚宝盆”（内叠金室、银室）一具；粉彩磁盆，插以大红珊瑚枝挂金银的“摇钱树”一具；玉器一匣；烟壶一匣……这些纸制冥物精细异常，足可乱真。乃是出于和平门外延寿寺街衡记、高记两家冥衣铺。据说，当年梨园名宿王长林等人死后所用的纸活冥物都是这两家承做的。

素车白马会吊龟年 迎三送路盛况空前

2月16日为杨氏迎三送路之辰，杨氏丧居笱帚胡同提前搭就了蓝布的过街棚，两边棚口及丧居门前，各搭了一座素彩牌坊。一对红底金纹双花篮图案的大鼓、锣架设于棚内，为来宾们传报不暇。延至午后，西至延寿寺街、琉璃厂，东至南火扇胡同、煤市街一带，车水马龙，以梨园界为主的各界人

士，纷纷前往杨宅吊唁。仅戏剧内外行人，计 300 余人，名伶尚小云、高庆奎、沈鬘华、李洪春、刘砚亭、王福山等，均亲临挂孝。伶界如余叔岩、玉瑶卿、王凤卿、俞振庭、蔡荣贵、谭小培、谭富英、程砚秋、马富禄、叶龙章、叶盛章、萧长华、郭春山、阎岚亭、李永利、荀慧生、王松龄、丁水利、于连泉、于水利、迟月亭、杨春龙、王又荃、金仲仁、赵砚奎、陈椿龄、郝寿臣、杨宝忠、侯海林、徐霖甫、迟绍峰、万子和、梁华庭、杨主生、王敬五、金廷荪、金少山等，及戏剧评论家汪侠公、戴兰生、齐如山、吴幻荪、景孤血等，均亲临致祭，或具联轴挽幛、或送香帛冥楮。诚为素车白马，会吊龟年，灵棚内，参灵的鼓乐，经声佛号与哭声混成一片。

午后 6 时，依丧礼送三。走在最前边的是官鼓大乐，官吹官打 24 个响器及清音“九福班”的细乐，后面便是以彩纸精糊细表的转轮大轿车一辆，以翻毛骏马驾辕，前加顶马；后配跟骡。车厢左窗外，贴一黄纸条，上书“杨府老太爷显考嘉训之灵车孝女杨荣桂、嗣孙续潜、婿刘砚芳、外孙宗杨、宗华等全宅孝属叩祭”字样。另有大翻毛双马驾辕的四面大玻璃百叶窗四轮马车一辆；8 人抬绿帏官轿一乘；杠箱 4 抬；墩箱 4 只；大白仙鹤一只（一楼二库已于事前送往焚化场等候）。

纸活两旁为 8 盏大白气死风灯和 12 对六角形的手罩子为之照明。纸扎乌灵后边为雍和宫的喇嘛 13 人，以大鼓、长号等轻重蒙藏法器吹奏。白云观的道士身披云缎刺绣的对儿衣，打着钹、铎、鼓，白全一为高功，捧着如意殿行。所有参加送三的来宾（多数是名伶）分别执香提灯，排成双行步送，成为一条大火龙。后为铁山寺的和尚以笙管笛吹着佛曲梵乐，音韵凄惨，使人呜咽欲绝。杨氏之女荣桂打着挑钱纸，女婿刘砚芳以铜茶盘捧着喇嘛用巴拉面捏成的灯塔；嗣孙等分别捧着道经大疏、禅经大疏，均痛哭失声，被近亲们一一搀行。最后是龙泉寺的 13 人大德高僧。以素打“七星”点殿后。整个送三行列蜿蜒约一里多地。观者如云。尾随不舍者数百人不止。送三行列由笕帚胡同 20 号本宅出发，出延寿寺街南口，经琉璃厂、厂甸、南新华街，至虎坊桥焚烧冥物车马，尽礼而散。

接三之日，业经丧礼处与孝属讨论决定，杨氏灵柩在家停灵受吊 15 天，从即日正式开坛起经，每天均有度亡法事，除本家自请的经忏以外，包括梨园界同仁送的计有番经 7 棚；道经 8 棚；禅经 10 棚。共 25 棚。所有诵经、礼忏、燃灯、施食，悉皆周隆。定于 2 月 27 日家奠、开吊、伴宿送库；28 日辰刻发引。因堪舆家勘测认为永定门外茔地因“方向不利”，当年不宜下葬，故暂厝陶然亭龙泉寺庙内，俟明年再卜吉告窆。

番、道、僧九班超度二十三黄袍送圣

2 月 27 日是已故杨小楼在家停灵受吊的“二七”（14 天），是日为伴宿、作夜辞灵之期。丧居门前的过街棚里里外外亮出了汉执事“五半堂”的幡、伞，每半堂亮出 2 件：红、蓝、白、黑、紫（绣花）的幡、伞各一对，计 20 件，均插在红漆葫芦座的执事架上。金银宝库、九品莲台、执幡使者、福禄寿三星、摇钱树、聚宝盆、哼哈二将、开路鬼、打道鬼、喷钱兽（独角獬）、香幡、筒幡、香伞、香亭、松狮、松亭、松八仙、松鹤鹿同春、松和合二仙等冥物沿南北墙一字排开。过街棚正对丧居门口还设了三档子妙峰山香会的火壶茶会；大鼓锣架、金漆大号，24 个民族传统式的鼓手整整排了一条胡同。

这里不能不临时断绝交通。地面上对此亦无不给予支持。至于前来吊唁人乘坐的汽车、马车、洋车、自行车都存放在琉璃厂甸海王村公园前边临时设立的场子里。

是日，前来吊唁者达数百人之多，内外行知名者计有：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小翠花、周瑞安、王少楼、孙毓坤、王又荃、李洪春、计砚芬、丁水利、张春彦、谭小培、谭富英、钟鸣歧、马富禄、吴彦衡、徐霖甫、李多奎、高庆奎、王瑶卿、王凤卿、叶龙章、郝寿臣、叶盛兰、高盛麟、刘砚亭、杨韵甫、万子和、郝锦川、金达志、吴菊痴、萧振川、吴钦李、汪侠公、杨主生、张寰如、王敬五、赵砚奎、陈椿龄、于永立、迟绍峰、赵世兴等均前后莅临吊祭。

杨宅所收的冥楮、纸扎、祭席等各种奠礼堆积如山，所有挽联、祭幛、匾额，自首七以来，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仅名流匾额就有数十方。不妨选录如下，以飨读者。

- 一、阆苑归真——曹锴。（挂于灵堂正面）。
- 二、广陵绝响杨伶小楼，艺术超寰，名溢京外，尤重义行，山东留京乡人，哀其永逝。请为书额惋之——吴佩孚（挂于灵堂）
- 三、千秋绝响——高凌霄（挂于灵堂）
- 四、声绝云璈——张水琪（挂于月台正面）
- 五、天上人间——冷家骥
- 六、名闻中外——江朝宗
- 七、黄钟息焉——宁夔杨
- 八、艺术绝响——北京市商会
- 九、惠及灾黎——北京市慈善团体联合会
- 十、白雪谁赓——长安大戏院董事会
- 十一、艺术超群——北京梨园公会
- 十二、善容顿渺——妙峰山 头岭茶棚北京天津众承办
- 十三、吾道同悲——余叔岩
- 十四、老成凋谢——梅兰芳
- 十五、成仙极乐——萧长华
- 十六、英名尚在——孙毓坤
- 十七、硕望犹存——丁跃龙
- 十八、寿高德重——梁仲达
- 十九、将星光沉——万子和、萧振川
- 二十、酷此胡天——安厘之
- 二十一、艺坛星殒——戴兰生
- 二十二、阆苑归真——贾兰亭
- 二十三、音容宛在——魏子丹
- 二十四、德隆望重——郝寿臣
- 二十五、南极星沉——李一车
- 二十六、典型永存——全民报社
- 二十七、国剧宗师——胡毓坤
- 二十八、犹存典型——迟月亭
- 二十九、果证菩提——二十三处寺院方丈
- 三十、天上修文——李万春

- 三十一、望隆山斗——张彬舫
- 三十二、典型失我——天津梨园公会
- 三十三、黄钟毁弃——庆亲王
- 三十四、吟啸涅槃——王守信
- 三十五、蓬岛归真——长安戏院张寰如
- 三十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成部——王仲锦
- 三十七、抱道长游——程连璞、程连璧
- 三十八、永护白云——白云观监院安世霖
- 三十九、典型宛在——永胜社同人
- 四十、拂袖西归——马丽华

由于杨氏生前崇佛信道，成为北京各大小寺院的大檀越、大功德主，且与各寺院方丈、监院等高僧结交甚密，故 23 处佛教寺院的方丈联合前往啐经礼忏。他们是：

- 一、广化寺方丈玉山；
- 二、圣安寺方丈宝泰；
- 三、善果寺方丈泽明；
- 四、拈花寺方丈量源；
- 五、华严寺方丈本容；
- 六、觉生寺方丈体仁；
- 七、潭拓寺方丈茂林；
- 八、嘉兴寺方丈崇辉；
- 九、净业寺方丈本悟；
- 十、观音院方丈纯山；
- 十一、戒台寺方丈悟修；
- 十二、崇效寺方丈越宗；
- 十三、贤良寺方丈星朗；
- 十四、宝通寺方丈慧证；
- 十五、佑圣寺方丈钟铄；
- 十六、广慈庵方丈慧果；
- 十七、香界寺方丈德福；
- 十八、广善寺方丈慧三；
- 十九、长椿寺方丈深慈；
- 二十、心华寺方丈通宝；
- 二十一、正果寺方丈宽广；
- 二十二、延寿寺方丈证和；
- 二十三、法华寺方丈学安。

集各大小寺院“黄袍”高僧啐经送圣是佛教界对亡人及其家属最高礼敬，对亡人本身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功德，若非特大的名流斋主去世，一般是绝不应酬这种佛事的。这是自民国 8 年以来，北京城所未有的情况。所以，为人们，尤其是为有佛教信仰的人们所景羨。

伴宿之日的法事，除 23 名“黄袍”以外，还有雍和宫、隆福寺、护国寺的喇嘛各 13 人；白云观、地安门外火神庙、和平门内吕祖阁的道士各 13 人；长椿寺、铁山寺、龙泉寺的和尚各 13 人。轮流诵经作法，凡送疏、戒食、交供、回向，经台、月台上下，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门前的鼓乐也“接赞”、

“送赞”吹打不停，其盛况不言而喻。

由于杨氏生前交际很广，来吊者有着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以不借重金，置办了“三面席”：一是大教席；二是同和轩的清真席；三是功德林的全素席。而且是一天早晚两顿。可谓奢矣！

来宾们坐席后，将近落日，总提调发话，宣布送圣僧、道排班秩序。其具体安排是：鼓乐、番道禅、来宾、番道禅、来宾、番道禅、近亲孝属、23位大德“黄袍”。采取“花插”排列，以利观瞻，而符礼俗。

念三黄袍送圣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延寿寺街一带人山人海，几无立锥之地，近至左邻右舍的商民，远至津、保各地不远百里而来的“好事”者，都云集于杨宅丧居附近，一时万头攒动，车马为之堵塞，不能通过。人们不但是为争看各种纸扎冥物，而更主要是争看名伶的庐山真面目，而一饱眼福。

随着官鼓大乐的一棒大锣，送圣开始。杨家确是独出心裁，将一丈多高的纸扎哼、哈二将推将出来，作为开路之神（一般这乃是出殡的排场，送圣很少有这种举动）。紧跟着是纸扎的尺头桌子、四季花盆、纸制的整桌祭席、福禄寿三星、执幡使者、九品莲台、香幡、香伞、香亭……均雇人擎举而行。其后为番、道、禅各三班，每班各13众，按既定“花插”而排列，来宾及捧圣的孝属间杂其间，最后是23处大小寺院的方丈，身披大黄袍，各捧手炉相送。最引人注目的是梨园行的7行7科，每科均推代表10人以上，步行送库，每人各佩一徽帜，上书：“北京梨园公会×行（或×科）代表致祭员”字样。每走过一处，必有若干观众指手划脚纷纷议论，形容不一。

送圣行列出笈帚胡同西口向南，经延寿寺街、一尺大街、皈子庙、向东经观音寺、大栅栏，出东口折向南行，经前门大街至西珠市口，折向西行，至万明路折向南，直奔香厂迤南永安路，焚烧楼库等冥物。于火光冲天中礼成。

晚间，杨宅办了盛大的资度道场。番、道、禅三台焰口施食：老道的铁罐施食，三清（三位头戴五老冠的高功主法）焰口；和尚的三大士（三位头戴五佛冠的金刚上师主法）焰口；外加“地藏十王宝灯”的传灯法事。金钟法鼓，通宵达旦。观礼者百人之多。

先厝龙泉寺 后丘松柏庵

杨家在出殡的前三天就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门前的大道上，亮出了一份五丈五尺长，一丈多高的64杠的大罩，罩架子上挂了红缎金线绣满“百寿图”的罩片，顶上安了80公分高的金箔罩漆的大“火焰”，罩架上盖的四角，都向外探出一个“草龙”，成为“兽头龙口”，龙口“衔”着一串编织的花穗，每绺花穗上拴着一个“荷叶帽”、八个小金葫芦和五个不同的“花拍子”。十分华贵。杠罩的四角各放置一座红漆木质的执事架，上面插了红、蓝两色不同的“拨旗”，上书“崇文门外广兴杠房”字样。大杠大罩的旁边还亮出了一付32抬的“小请儿”，即出堂用的小杠。这份大杠诚可谓富丽堂皇，气派极矣！引起了许多过往行人驻足围观。

按老北京的风俗习惯，丧家一亮杠亮罩，就是即将出殡的信号。紧跟着，在杨氏殡列即将经过的要路口便道上，相继搭起了高大的路祭棚三座，一为剧场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西珠市口当行商会门前的空地上，将由各剧院选派代表三人守候公祭。二为梨园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第一舞台门

前。三为内外行亲友联合路祭棚，设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门前。这些路祭棚均为平棚起尖子，一殿式的起脊大棚，棚口均搭了素彩毗卢帽式的花牌楼，设了官鼓大乐，摆上了对儿门鼓、对锣架、对官鼓、对号筒。棚口两旁的执事架上插着四对金执事，计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各一对；四对不同图案的大旗，计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各一对。棚内正面放了披有虎皮的“如意亮轿”一乘，当做被祭奠者的灵位，前面还扎了素彩灵龕一座。前边是大型供案，上面设置了香炉、蜡扦、花筒、供碗。棚壁上挂满了挽联、匾额、挽幛、花圈、相间有不同的四季花盆，尺头桌子等纸活冥器。给人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感觉，哀戚油然而生。

杨宅即将出大殓的消息，人人奔走相告，四九城的居民，尤其是南城一带的居民都憋足了劲头等着瞧热闹，都说：“这可是一出好戏，所有的名角都要上场亮相，这张票可是千金难买！”当年，瞧大殓几乎是北京人的一种“文化娱乐”，本来，丧葬礼俗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果然，杨氏的大殓成为万人空巷之举。一般平民，一早就扶老携幼地伫立街头，那些有钱有闲人家早在殓列即将经过的地方，找个茶点铺或饭庄子的楼上，订个临窗的好座，届时居高临下，边吃边看，将这盛大宏壮的丧礼尽收眼底，这恐怕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享受”吧！

杨氏丧居前门外笄帚胡同，巷子较窄，不便直接上大杠。所以，他的灵柩被抬出丧居之后，先在门口上32人抬的“小请儿”。由孝女荣桂身穿重孝，左手打着金钩龙凤“衔”挂的引魂幡，在众多亲友、梨园界同人拥簇之下，到南新华街北头师范大学门前换升大杠。这时最前头的仪仗已经穿过西河沿，进入前门大街了。

杨氏灵柩上了大杠，扣上了一卷红缎“百寿图”的大官罩。孝女荣桂跪在拜垫上，以左手在一块糊成一套《金刚经》的沙板砖上摔了“吉祥盆”，大喊一声：“爸爸哎！”遂被搀起，全体孝属及执事的近亲友便跟着一起高声举哀，这时，烧了一所纸扎的小四合房。被请来扬纸钱的“一撮毛”此刻大显身手，趁着纸活的火势，一连扬了三把纸钱，顿使漫天皆白，良久不能落地。有许多小孩，甚至老年人都凑过去，伸手接抢那些尚未落地的纸钱，说是用这种纸钱擦拭面部或身上的疥癣，当可霍然。此说虽然属无稽，但无意间却为丧礼壮大了声势和场面。

据说，杨氏是汉旗人，故按民族风俗习惯用了“五半堂”的汉执事。传统的汉执事以半堂为基数，每半堂有不同三色的幡、伞6把；金执事4对至8对。再加花圈、挽联、松活，纸活、响器、僧道及执事送殓的亲友，殓列排出足有三里地之遥，可谓壮观极矣。其殓列顺序大体上是：

最前为“北京特别市梨园公会”旗帜一对。由“龙套”演员擎举开道。

继之为纸糊的戴盔披甲，面目狰狞的开路鬼、打道鬼一对，各持鞭棍，立于“虎皮石”的立座上，座下有木轮，由人推之而行。

纸糊的独角獬——喷钱兽一只。高七尺，走在开路鬼、打道鬼的中间。一人从“兽”后豁口里填纸钱，使之从前面口内吐出。意为替亡蓄留下买路钱。

纸糊的头戴乌纱，身穿大红，左腿跃起，手举宝剑高过头顶，作斩妖姿势的“判官”，高近一丈，头顶上还飞舞着一只蝙蝠，盖为臂上一弹簧所系。

松活一堂：系右安门外丰台花厂的杰作。七、八尺高的松狮子一对；一丈一的松亭一对；松鹤、松鹿（鹤鹿同春）一对；松人（和合二仙）一对。

共用 28 人杠抬以行。

纸活金童玉女，金童执黄绶幡；玉女提引炉，作接引状。由二人擎举而行。意为神佛所派的使者接引亡灵升天。

纸活四季花盆，碧桃、芍药、牡丹、佛座莲、绉菊、桂花、腊梅、迎春各一盆，其盆糊成白磁状，上绘山水、人物、间有书法题诗。下支红漆木架。人夫各抱一盆以行。

纸活尺头桌子，上摆金山银山（盆景）、绸缎衣料、道装云履、道坛法物、古玩陈设、文房四宝等，各二夫一抬。

纸糊当年进口汽车一辆，驾驶楼内糊一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青年司机，手把方向盘。车前车后各挂一车牌，牌号为“北京 147”。因杨宅电话为“南局 147”，故借用于车牌。

京彩局以素彩扎成的“匾额亭”，古典宫殿式的顶盖，敞门，下为须弥座，座上穿以木杠，4 人肩抬以行。亭内放置受吊期间各界赠送的匾额。共 13 座，其顺序为：

1、曹锟挽；2、高凌霨挽；3、江朝宗挽；4、吴佩孚挽；5、张水淇挽；6、宁夔扬挽；7、冷家骥挽；8、北京市商会挽；9、北京市慈善团体联合会挽；10、妙峰山 头岭茶棚北京天津众承办挽；11、长安大戏院董事会挽；12、北京市梨园公会挽；13、丑行同人挽。其中，除丑行同人所送的匾额题词原缺外，余者题词可见本文上节所录，不再赘叙。

各界赠送的挽联 85 幅，俱以红漆竹杆高高挑起，一夫擎举上联，一夫擎举下联，两并排对正，缓步而行。其中不乏佳作，为殡仪烘托着哀戚气氛。例如：

北京市社会局公益救济股同人挽曰：

“法曲接俞谭，定场管弦推贺老；

元昔协钟吕，超时歌舞媿兰陵。”北京市慈善团体联合会主席胡恩元等挽曰：

“天宝事那堪重论，胜朝两代承殊遇；

广陵散有谁词响，梨园千载仰新声。”北京进报社挽曰：

“菊径荒凉冥漠秋郊悲泣雨；

蓉城缥缈苍茫野陌帐春风。”

武田南阳挽曰：

“执牛耳五十年间，昔时局阁鹓班舞罢干戚娱帝戚；

攀龙颜九重天上比日鲤庭燕寝歌残薤露帐春风。”吴菊痴挽曰：

“人曲各千秋，任教地老天荒大名永在；

悲歌同一梦，忽然山颓木坏吾道其孤。”晨报社同人挽曰：

“拟垓下声容，不复举头明月夜；

向江南风景，何堪回首落花时。”

齐如山挽曰：

“齿德均尊，犹执 恭维族谊；

形神虽逝，尚留青白著乡评。”

陆秋岩挽曰：

“菊坛星殒，永存典型光史页；

艺人其萎，一代宗师返道山。”

挽联群后面是民族传统仪仗——汉用“五半堂”执事。第一半堂：

“ 锣九对儿 ”：

四方形蓝底红边、红字的清道旗一对；四方形红边白底彩色图案的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各一对。均由头戴青荷叶帽，身穿绿驾衣的执事夫高举，缓行。

虎头牌——“ 回避 ”、“ 肃静 ”牌各一对。“ 格漏 ”、粉棍、鸣锣，各一对。

红云缎绣花幡、伞各 6 把。

第二半堂：

木质金箔罩漆的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

蓝云缎绣花幡、伞各 6 把。

第三半堂：

木质金箔罩漆的“ 八宝枪 ” 8 对：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

白云缎绣花幡、伞各 6 把。

第四半堂：

木质金箔罩漆的金立瓜、金钺斧、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塑、金督。各一对。

青云缎绣花幡、伞各 6 把。

第五半堂：

紫云缎绣花幡、伞各 6 把。

官鼓大乐一班，计 13 名：拉号一对；官鼓 4 面；喷呐、海笛、笙各一对；跟锣一面（指挥）。俱头戴去纓的清制青官帽，身穿绿驾衣，系绣着蓝寿字的白褶帛，足穿青布靴。

红云缎大座伞一柄，由 1 人擎举，2 人牵黄绸“ 拉幌 ”。

清音锣鼓 1 班。计 9 名：2 人抬堂鼓一面；1 人敲打；4 笛、2 笙、1 小锣、1 皮鼓指挥。是为“ 九福班 ”。

古典宫殿顶盖、敞门、须弥座，8 人抬的彩活影亭一座，内悬杨氏画像一幅。抬夫一律头戴清制官帽，身穿白孝袍。

影亭后边是两名执事夫举着名伶郝寿臣送的一对花圈（其它花圈均在殓列前边，挂在匾额亭的背后，只有郝氏送的花圈放在此处）。

又，红云缎大座伞 1 柄，1 人擎举，2 人牵黄绸“ 拉幌 ”（表示为影亭、领魂轿张伞，实际上是为把二者隔开，以利观瞻）。

挂着绿呢围子、青纱帘的魂轿一乘，内供杨氏灵牌，由 8 名穿孝的轿夫抬辇而行。

又，红云缎大座伞 1 柄，1 人擎举，2 人牵黄绸“ 拉幌 ”。

龙泉寺孤儿院音乐队以笙、管、笛、九音锣、钹、鼓合奏哀乐。队员均黑衣白孝带。

纸扎灵人（仆役）4 对：戴礼帽穿着长袍马褂的男管家 2 名；戴礼帽、着长袍青坎肩的听差 2 名；身穿旗袍、梳髻的中年女仆 2 名；戴帽头，穿灰袍，青坎肩，提篮买菜的厨师 2 名。均由 8 名穿孝的执事夫擎举而行。

雍和宫的番经（喇嘛经）一班，计 13 人，俱穿黄袍、戴黄秋帽。徒手送殓。

白云观的道经一班，计 13 人。俱蓝袍，加披五彩锦缎的法衣，每对一色。铃、磬各一；铛子两对；钹子一对；法鼓一对。

铁山寺的禅经(和尚经)一班,计13人,俱海青袍,加披红缎绣花偏衫。以笙、管、笛、九音锣、钹、鼓吹奏佛曲梵乐。

大白雪柳12对,由头戴假抓髻,身穿白布印花小褂的男童擎举而行。

执紼送殡的绅商各界,梨园同人,杨氏生前友好,逾300余人,内有尚小云、谭富英、高庆奎、高盛麟、周瑞安、尚富霞、叶龙章、马富禄、孙毓坤、王永昌、赵砚奎、万子和、丁永利、傅德威、王又荃、李洪春、何雅秋、杨宝忠、陈椿龄、郭宝麟等,还有梨园公会七行七科代表团200余人。有的穿孝袍子,有的腰系孝带,左胸佩戴白纸菊花一朵,簇拥在孝属前后。

“一撮毛”率领两名青年徒弟,各身背大串白纸钱。其身后还有一洋车,满载纸钱。路过庙宇、井台、桥梁、十字路口、路祭棚、茶桌等处,便高高扬起纸钱,表示打发“拦路鬼”,以便让杨氏的阴魂顺利通过。

还有两个挎烧纸筐子的,乃是沿途烧纸打发“外祟”的。另两个人手提白布绷的拜垫,以便丧主随时向外界拜谢时,跪而叩之。

二位穿孝的近亲搀扶着打幡的孝女荣桂,嗣孙续潜(即宗年)及乃婿刘砚芳,外孙宗杨、宗华,护灵椁前导。

孝属的后边便是64名头戴青毡荷叶帽、插着红雉翎、身穿绿驾衣的杠夫,抬着一付五丈五尺长的巨杠,上扣一卷崭新“百寿图”的大官罩。由两名穿孝的杠头,以打响尺的形式指挥前进。四角还有拉着罩上黄绸的4名杠夫。他们俱向后拽,成为一顺边的形式。杠的两侧各有4名杠夫扛着红、蓝两色的拨旗簇拥前行。

杠后有25名执事夫组成的后扈(后拥),均手举木质金箔罩漆的“金执事”(古代兵器模型)5人一排,共为五排,均以湖色绸子将金执事连缀起来,表示护灵。

杨氏为梨园公会的董事长,故该会由七行七科公推代表致祭。伴宿送库时,各行、科公推代表各十人参加吊祭送圣;出殡之日则每行、科各加派代表6人,共计224人,于9时余齐集杨宅,先行参灵后,再参加执紼。行至西珠市口当行商会门前的路祭棚,全体代表将杨氏遗像请至棚内灵座上致祭后,仍继续执紼前行。剧场公会则每单位推举代表3人,由剧场公会主席郝锦川率领,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门前的路祭棚内致祭。内外行亲友则在第一舞台前的路祭棚内致祭。每祭均设祭筵一桌,由主祭人上香、献爵、焚帛,再由僧道诵经品咒,异常隆重。沿途各商号、住户所设的茶桌、路祭桌约三百余处,均由以荣桂为首的孝眷一一叩首致谢。大殡经由骡马市大街、菜市口、丞相胡同,官菜园上街、自新路,过上清观,而达龙泉寺。届时,该寺两序大众均身披袈裟执香在山门前迎灵。这是对任何斋主死后来此停灵所未有过的礼仪。

后来,杨氏家族考虑,人死总是以入土为安,既然原茔地由于“方位不利”,不宜当年下葬,不如暂时寄埋于松柏庵梨园义地,俟明年(即1939年)择吉移葬于莲花山茔地。故于5月23日,即杨氏逝世100天之际,结合百日祭,由龙泉寺庙内移灵。这次当然没有上次那样隆重热闹,但是也用了32人大杠,约有内外行亲友百余人送葬。是

日,杨氏家族在笤帚胡同本寓延僧敬设“往生逍遥道场”,焚香设放瑜伽焰口“平等无遮甘露斛食”一堂。再次为杨氏作了身后功德。

杨小楼逝世后，唱老生的名伶王又宸正在天津搭班唱戏。旧历正月十五之后，一天早晨，王氏还未起床，偶阅一份报纸，上面刊登了杨小楼去世的消息。心里大惊，连忙呼唤睡在他身边的儿子王世英（现仍健在，已届 82 岁高龄）说：“唉呀！你看，又走了一位老前辈！”说罢，掩面而涕。从此，王氏便心事重重，精神恍惚，若有所失。正月二十一日唱完戏，便匆忙从天津返京，二十四日夜里，心脏病（心肌梗塞）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身故。就好像杨氏的死丧起了连锁反映。杨氏家族虽然不算“重丧”，但作为整个梨园界却是一星刚坠，又殒一星。事出蹊跷。

王又宸的儿子王世英请出谭五爷（谭小培）给主事。谭、王俱是好盛之人，认为王又宸在京剧界唱了一辈子，不能说是出人头地，也堪称是业迹斐然。所以，决定要在丧礼上与杨小楼不相上下，于是来了个“国药店的汤剂——照方抓”。先说殓具，仍旧效仿杨氏，用了一口最上乘的金丝楠木的棺材，杨氏的“四独板”材内部还补了几块，而王氏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四块整板合成的，较杨氏的还略胜一筹。度亡道场也用了番、道、禅、尼四棚经。此外，还加了 13 位大黄袍高僧，昼夜轮流诵经礼忏。除接三送焚车马外，还送了两次库。出殡时也用了“五半堂”的汉执事，一堂松活，各种纸扎乌灵，无计其数，64 人大杠，殓列排出去三里地以外。

从王又宸的丧礼当中可以看到他的宗教信仰，倾向于佛教。王氏在上海唱戏挣了一笔大钱，回到北京后，便发心献佛，亲到大栅栏瑞蚨祥绸缎店攒了一堂佛前挂的幡门、幡条，全用南绣，做工相当考究，而且在下款绣上了他和妻子的名字：“王又宸、王谭翠珍敬献”，献给了京西戒台寺。因此，王又宸死后，戒台寺的老方丈就将这堂幡门、幡条特意摘下来，送到王家，挂在王又宸的灵堂院，用了以戒台寺、潭柘寺为首的 11 个大庙的方丈放了一台“瑜伽焰口”，由悟修大和尚放正（即当金刚上师）。以表示对王氏的回报。如今这堂幡门、幡条还保存得很完整，挂在后海北岸广化寺的大殿里呢。有的老居士到那里朝佛随喜时，看到这堂幡门时，不禁要议论一番——原来王又宸也是个戏剧界的传奇式人物。

据说，王又宸自幼在当行学徒，当时正逢庚子前后，内忧外患。宫廷内外，风纪不整，有些不法太监乘机盗窃宫内文玩字画，暗中典押给当铺。但是，由于东西来路不明，很难当出高价，同时又怕当铺向宫廷告密。所以，太监们便挖空心思拉拢当铺的伙友、帐房先生等人。其手段无非是给他们送点礼物，或投其所好，顺便给办点小事等等。

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太监，素日与谭鑫培有所交往。发现王又宸这个小伙计，平日特别爱好京剧，经常到票房玩票，而且嗓子天赋特好，尤其是学谭鑫培谭派唱腔惟妙惟肖。于是就要给他介绍谭老板作师傅。王又宸受宠若惊，忙问如何与谭老板搭上关系，于是，太监告诉他“明天您在颐和园昆明湖边上吊嗓子，故意喊两口儿谭派的戏，到时候，我同着谭老板到湖边上遛弯儿，他听了必要问及此事，我马上就可以为您介绍……”果然，这招儿真灵，谭鑫培听了王又宸学他的几句唱腔赞不绝口，马上问那个太监“这个吊嗓子的小伙子是谁？把他给我叫来！”结果王、谭爷俩一见如故，大有相逢恨晚的意味。王又宸迫不及待地给谭鑫培磕了头，拜为师傅，自此，王又宸得了师傅的真传，在艺术上有所升华，遂抛弃了当行，下了艺海，而且逐渐成名。后来，王又宸丧妻，谭鑫培乃将自己的女儿翠珍续弦给他，由师徒

关系一跃成为老丈人与女婿的关系。怪不得王又宸死后，他儿子王世英请谭小培（五爷）出面给治丧呢！

主要参考资料

《逝矣杨小楼》。《新民报》，1938—2—15。第6版。

《杨小楼接三纪》。《新民报》，1938—2—18。第6版。

《菊苑：挽杨》。《新民报》，1938—2—20。第6版。

《菊苑：杨小楼之哀荣》。《新民报》，1938—2—27。第6版。

《杨小楼今晨出殡》。《新民报》，1938—2—28。第6版。

《杨小楼灵柩昨下葬松柏庵义地》。《新民报》，1938—5—24。第6

版。

谭派须生成绝响宗匠身后显哀荣 ——名伶余叔岩厝安法源寺始末

名伶余叔岩早年身患膀胱瘤症。民国26年(1937年)4月,经友人介绍,曾入德国医院治疗,由名医司蒂芬给他做了切除手术,约半年后出院。因割治不甚彻底,三年后旧病复发,又住进协和医院,经谢大夫诊断后,再次实行割瘤手术,但由于瘤症过剧,仍未根除,不得已,从是年起即用输尿管(皮管)插入膀胱,进行导尿。幸其平日善于珍摄,体质基础尚好,且由其至亲刘植源大夫父子二人,每日给其注射葡萄糖。二三年来已无痛苦。讵料民国32年(1943年)春季以来,病情突然转重,据医生诊断,认为膀胱内,已被毒瘤充满,且瘤内病菌侵入血液,因此,全身发生败血症,以致心脏极度衰弱,面部溃烂。因患病数年,身体过弱,已不能再行割治,中西医均已回生无术。延至5月18日上午11点,余氏感觉气力微弱已极。家人急忙将张庆松、刘植源二位大夫请来,进行抢救,当即注射强心剂一针,但仅勉强维持生命半日,下午6时,气脉更加微弱,余氏自知命危已在旦夕,要求再注射强心剂一针,但终于无法挽救,延至19日晚10时30分,溘然长逝。终年54岁。

余叔岩,名第祺,祖籍湖北罗田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北京。系名演员余三胜之孙,余子云之子。自幼倾慕谭鑫培,并从姚增禄学唱京剧老生。初以“小小余三胜”艺名在天津演唱,后改余叔岩。倒嗓后回北京休养,向前辈钱金福、王长林、陈彦衡等请教,拜谭鑫培为师,并加入春阳友会票房,潜心研究,技艺大进。民国4年(1915年)重行登台,演出《打棍出箱》而名重一时。民国5年(1916年)谭鑫培去世后,他成为“谭派”主要传人。继承了唱作并重、文武兼长的艺术特点,并形成自己新的艺术风格,善于以唱腔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世称“余派”,被誉之为“须生之宗匠”。

余氏生前多才多艺,对生活充满情趣,善书法,善文玩。尤其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对于龙泉寺孤儿院大力赞助,一朝逝世,闻者无不惋惜其艺,更挽其德。

余氏后事,在其生前即有充分准备,寿衣衾物已于民国31年(1942年)6月间做成。棺木是余氏前妻陈氏死时在宣武门外大街荣盛棺厂所购。当时,买了两付上好楠木的材板,称之为“阴阳材”。“阴材”制成后,即用以殓其妻。“阳材”材板则暂存于龙泉寺西殿后虎。民国31年,余氏一度病剧,家人乃将此板取出,交荣盛棺厂代攒成材,数日而成。为了坚固持久,后来又让同顺材厂给灌了松香里子。其材极为珍贵,按当年市价值万元以上,且不易买到。后余氏病势好转,所以又存于龙泉寺庙里。民国32年5月19日,余氏“倒头”后,家人马上通知材厂派24名杠夫“转空”(指往丧家抬空棺)至椿树上头条丧居。

5月20日下午6时大殓。按余氏生前遗嘱,寿衣用蓝长袍、上罩青马褂、小帽。接受杨小楼棺墓被盗的经验,棺内不放贵重殉葬物。入殓时,余氏继配夫人,二位女公子,以及爱徒孟小冬等均亲视在侧,由长女给余氏五官用棉球蘸凉水“开光”之后,哀声大作,其中孟小冬哭之最哀。

根据余氏家族意见,原本拟定在家停灵受吊“三七”21天。后因考虑正值端午节,家中停尸恐招邪祟,故改为在家停灵半个月。丧礼环节虽然紧凑,但隆重程度并不稍减。

5月21日，为余宅迎三送路之辰，门前扎起了素彩牌楼，并设大鼓锣架，为迎宾传报之用。灵前有堂祭清一班，为来宾上祭行礼时奏乐。在延寿寺街衡记冥衣铺糊的接三全活：挂豆青里子的“落地拉”蓝蓬大轿车一辆，车厢三面纱窗，三面支起凉篷，非常讲究。另有顶马、辕马、跟马三匹，墩箱四只。棚内灵堂的月台两侧还摆着四季花盆、尺头桌子。

是日，程砚秋、孟小冬等，均以“弟子”身份，穿了重孝。余氏生前友好张壁、李雅斋、桂月汀、刘植源等，以及梨园界数十人来吊。晚7时送三，凡来吊者各举官吊香一股，当做人把。由官鼓大乐、清音班等民乐前引，给余氏扎糊的转轮轿车由二人牵引，车前有从冥衣铺赁来的两对大白气死风灯；两对六角形的手罩子为之照明。其后便是华北音乐队24名，以洋号铜鼓吹奏哀乐。法源寺高僧13人，以铛、钹、鼓“素打七星”（法器的板点）。由余氏女公子打着挑钱纸；其他孝属依次捧着呈给西方三圣的度亡文疏。龙泉寺高僧13人殿后。送至虎坊桥焚化车马。晚间，由法源寺、龙泉寺两庙僧众放了对台的瑜伽焰口施食。

首七之日，吊客盈门。上海黄金大戏院主人黄金荣等特地赶来上祭。前教育部部长景太昭亦前来致祭，并送了一幅挽联。联曰：

“应碎伯牙琴，乱世正诗宁有寄；
遂绝广陵散，伶官压传更无人。”

6月1日，为余氏逝世“二七”，伴宿送库之期。余宅领帖受吊。根据汉人礼俗，上午10时举行点主仪式。特请祝煜元“赐福鸿题”，刘植源、李锡之为左右鸿陪。是日各方吊客接踵而至，计潘毓桂、李雅斋、朱复昌、凌抚元、吉世安、桂月汀等。梨园界尚小云、程砚秋、杨宝忠、杨宝森、刘砚芳、万子和、赵砚奎、丁永利、王福山（王长林之子）等数百人。

余氏生前笃信佛教，曾皈依拈花寺老方丈全朗，成为在家学佛的居士，且与北京各大寺院结有“不解之缘”。因此，各名刹方丈莅临礼拜者甚多。计有：戒台寺德明、铁山寺百川、智禅、报国寺、地藏寺法龄、观音寺如培、法源寺天文、光明寺常平、华严寺智山、长椿寺深慈、广济寺显宗、观音院纯山、广善寺慧三、圣安寺宝林、崇效寺越宗等约有数十位。一时满棚黄袍高僧。此为一般俗家人死后所未有的盛况。

余宅预备了大教席、清真席、素席三种，款待各来宾。

雍和宫的喇嘛、白云观的道士、法源寺和龙泉寺的和尚轮流诵经礼忏。因为余氏生前是龙泉寺的大功德主、大善士，故该庙敬送禅经一永日及焰口施食一堂。晚7时，各经坛法事功德圆满，举行送圣仪式。由余氏女公子慧龄等捧圣；余夫人及弟子孟小冬、李少春等数十人均着孝服相送，送圣行列一片缟素，真可谓满街白矣。在虎坊桥焚库时，围观者千余人，交通几乎中断。

晚间，余宅孝属正举行“辞灵”祭时，忽闻余氏老岳父姚文卿大夫病危。余夫人急忙派人探视，时已“易箴”（换吉祥床）矣。盖姚氏因爷爷去世，痛心之至，以至旧病发作，不可救药。次日（6月2日）上午9时逝世，恰恰是余氏灵柩出堂之时，可谓巧哉！结果，余夫人两头落了丧事：婆家死了丈夫，丧礼未竣，娘家又死了父亲，真是丧上加丧。

余氏6月2日（阴历四月三十日）上午9时发引。全部杠、罩、仪仗、鼓乐，均由宣武门内同顺杠房承办。共花费伪联币4500元。出堂时，用了32人小杠，灵柩上复盖了三幅红缎绣花的“过棺罩片”，成为“大亮牌”的

形式，倒也让老街旧坊看看这口出众的花棺彩木。殡列出了椿树头条东口外迤北处上罩。然后经由西琉璃厂、南新华街，在原师范大学门前换升 64 人大杠，加扣红缎绣花大官罩一卷。亦由长女慧龄执引魂幡，在杠前以左手摔了“吉祥盆”。即做为正式起杠。全班杠夫一色绿驾衣，红套裤（只有同顺杠房应出来的杠夫穿红套裤；其它杠房杠夫一律为土黄套裤）。此刻，南新华街上的汉执事五半堂幡伞、松活、纸活、彩亭、响器已排出一里多地。市民观殡者，蚁聚便道两旁，几无立锥之隙。殡列经由西河沿，至前门外大街南行，进西珠市口，至虎坊桥。原京华大楼旁有梨园公会设立的路祭棚一座，棚前亮有汉旗子 4 对；金执事（木制金箔罩漆的古代兵器模型）4 对，插在执事架上。棚口设大鼓锣架一份，鼓手为之吹奏。棚内的祭台设太师椅一张，上披虎皮。前设祭席一桌。殡列到达时，由尚小云、率赵砚奎、于永利等将余氏遗像从影亭中请入棚内太师椅上受祭。礼成后，殡列复经菜市口，往西进西砖胡同，至法源寺停灵暂厝。那天虽然尘沙飞扬，气候欠佳，但送殡执绋者，始终未减一人，足见余氏在戏剧界的威望。

余氏灵柩停于法源寺后，即雇工人用南漆涂之若干道，以图入土后不被浸蚀。据说，所用的上等南漆甚为名贵，系早年贮备，若现买则需要花伪联币五六千元。

余氏丧礼共花去伪联币两万余元。其规模势派与梨园名宿王长林、杨小楼、叶春善、王又宸等人的丧事不相上下，给老北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在南城住过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津津乐道这几桩大丧事。

主要参考资料

《谭派须生成绝响余叔岩作晚逝世》。《新民报》，1943—5—20。第 6 版。

女死当出嫁 接三如迎娶 出殓算送亲 ——记民间著名艺人胡老道女儿的丧事

却说 50 多年前，一进旧鼓楼大街南口，路东有一所磨砖对缝的大宅院，房主老穆家自住一院，其它院落的房屋就都租给了他人，因此，形成了一个小杂院。外院住的几家都是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其中东房住着一位头上挽着道冠儿，身穿肥大蓝袍的艺人。因为他姓胡，所以，人们直呼其“胡老道”。但他的真名却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胡老道，姓胡，名德全，原籍河间府（位于河北省中部偏南，明初改为府，1913 年废，改为县），出身于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家庭。早年在玄门认过师父，道号志兰。虽然没有“焚修德业”，却学了一身过硬的武艺。家道中落后，即在天桥平民市场、鼓楼民众商场、什刹海荷花市场等处卖艺，专门表演弹腿，成为一绝，在民间很有名气。1950 年，他已年过八旬，还曾作为中国杂技团的一名成员，专程去苏联作访问演出。

胡老道在精神上曾经受过一次打击。那是在民国 33 年（1944 年）春天，他的大女儿不幸得了肺结核（民间泛称“痨病”），当时，由于没有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只能坐以待毙。胡老道虽然懂得一些道家养生气功疗法和健身武艺，也无济于事。据说，中西医都求到了，也未见任何实效，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未出嫁的大姑娘夭折了。

俗云“猪老吃子，人老惜子”。当时，胡老道已逾“耳顺”之年，膝下无儿，只跟亲二女，老来又丧去一女，岂不痛心疾首，他觉得自己这个做长辈的没有尽到抚养爱护的责任，致使大女儿在为人一场。因此，深为内疚。于是与老伴一商量，决定从优从厚来发送女儿，干脆来个白事红办——女死当出嫁，接三如迎娶，出殓算送亲。聊以自慰而已矣！

1944 年，正是日寇投降前夕，民生凋弊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胡老道也不例外，已流落成为一个城市贫民了。所谓从优从厚地发送死女，也只不过是倾其所有，尽到力所能及罢了。好在旧鼓楼大街一带的婚丧服务行业上的头头脑脑都跟他有个半熟脸儿，或多或少的能有些照顾。

胡老道托人向成顺材厂石成吉掌柜的赊了一口“小三儿五”（盖五寸；帮四寸；底三寸）大叶杨的棺材。随后找大玲铛胡同口上的亨义顺棚铺洪三儿讲棚，一边套交情；一边“告帮”，算是左折右扣，还没收现钱，好歹给搭了座席棚。洪三儿到底是个外场人，主动到南口外头永兴号郭记响器铺给说情，廉价赁来一份灵前五供、云头幔帐和一些桌椅板凳，还雇了一班吹鼓手，不要官鼓大乐，要花吹怯打，因为要应白事红办的典。

次日，死女被装殓了。贴身是一套小棉袄、棉裤，外边罩了一件红丝葛的旗袍，当做“上轿袄”；头上戴了大红绒花编成的帽子，以象征出嫁所戴的凤冠霞帔。脸上浓施粉黛，脚上穿了一双丝袜，一双绿色的绣花鞋，手里握着一块粉红手帕。完全是新嫁娘的装扮。身下铺着黄褥单，身上盖着白衾单，象征着“铺金盖银”。因为民间盛传，这样到了阴间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要装入棺材了，老伴儿扶尸哭得死去活来，无法相劝，硬让一位帮忙的近亲给推开了。一般儿女装殓自己死去的父母，都喊：“爸（或妈）请您迁居啦！”胡老道却以半哭的腔调喊着女儿的名字：“姑娘上轿啦！”死者没有晚辈，当然也就没有给抱头抱脚的，只是用了两名“转空”的杠夫给入了

殓。至于为什么没让他二女儿动手，大约是怕被扩散在体外的结核菌传染。死去的女儿属于小口夭折，在家里不能享受“内寝”的礼遇，所以，她的灵柩也就不能放在屋内头顶风门的地方，而只能停放在棚内南端——头北脚南地受奠。灵前桌上，供着一朵红绫裱褙的大牡丹花，下级红绸带，上书“新娘”字样，还有胭脂粉、桂花头油、花露水等摆列有序。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从新成号喜轿铺借来的凤冠霞帔和红盖头，端端正正地摆在中间。俨然是新嫁娘在闺房等待上轿时的那套设备。头前供了五碗苹果。两旁是一对粉红色的灵花。桌围子也是粉红地子绣花的。桌前放着一位近亲送的鲜花篮。

一切礼仪用物都是以粉红色为主。棚壁上有几幅挽幛，都是粉红布料或绸料的，上面繙了白纸蓝纹的幛光（大字块），所写的挽词与普通丧事的迥然不同，既不用“驾返瑶池”，也不用“西方正路”，而是用些什么“玉碎珠埋”、“红尘一梦”等哀挽少女夭亡的词。门彩是粉红和纯白两色的；亲友前来吊唁用的礼金封套、甚至帐房用的礼帐也都是粉红色的。棚里棚外一片桃花红，确有白事红办、红白混办的意味。

接三本是人死后三天的初祭，一般丧家都是送焚一份车马、杠箱，表示为亡亲送路。胡老道却在街北头斌成斋冥衣铺糊了四名身穿蓝中褂，腰系红褶帛，头戴清制红缨帽的轿夫抬着一顶粉红大轿；还有4只红色的墩箱，这大约是代表他陪送女儿的嫁妆吧！有的邻居老太太们看了，纷纷议论说：“胡老道是没钱。如果是像他们院房东老穆家似的，就真许给女儿糊上24台嫁妆！”

中午，鼓手来齐了，金漆红纹的大鼓锣架也在门前摆好了。响器头儿故意献殷勤，请示本家怎个上鼓仪式，以便请赏。胡老道发话：“先以官吹官打上鼓”，棚里结合上鼓在灵前供饭——四碟四碗，权且当做“离娘饭”。然后，转花吹儿，即怯吹儿，吹些民间俚曲或戏曲。这吹鼓手哥几个倒也挺卖力气，先吹《马寡妇开店》，后吹《王婆子骂鸡》，搞得热火朝天。结果把四周的老街旧坊全招来了，棚里棚外挤满了人。比当年房东穆大爷死，用64杠出殡时还热闹呢。

下晌，伺候和尚的铺排担来了法鼓和圆笼（内装法器、法物），准备扎焰口座。胡老道给了“挑儿钱”之后，又交待了一下前天在“口子”上讲下的条件：全部彩活要粉红的，铺排说：“按老年间的规矩，作佛事用的“拍子山儿”（指焰口座前的彩门）都是黄、红两色的；倒有加上绿色的，这三色代表佛、法、僧三宝，这才是如法的，但没有用粉色的……如果不称老爷的心，小的马上到彩子刘那里去借。”说着就到斜对门公兴长米面庄打了个电话，叫刘爷马上派人送一份沿粉边的“拍子山儿”来，七条粉红垂头云儿（即彩球串儿）。居然对着灵堂搭了一座桃色的“落地楣子”（平地座），真是别出心裁。

焰口座刚刚搭好，门口大喊：“请本家接斛！”原来是北头蒸锅铺的小伙计送“斛食饽饽”来了。本家一个近亲小孩把一盘插满小彩旗的馒头塔捧了进来。鼓乐大作。铺排双手接过来，供在面然大士——

鬼王画像之前，故意高声喊道：“向本家老爷请赏啦您哪！”这时，铺排和蒸锅铺的小伙计一同给胡老道请了一个安“请老爷子上眼吧，您还有什么吩咐？”胡老道感到满意，于是掏出几张钞票分给了他们二人。

胡老道在这棚丧事中不像是本家老爷，简直是位“总提调”。临送三之前，他把门外看烧活的二路子叫了进来，说“告诉赵掌柜的，赶紧找俩人儿，

接三时好抬着轿子跟着响器走。”又把响器头儿宋黑子找进来，说：“呆会儿送三可别吹那老一套的玩艺儿，要吹点办喜事用的“花大盛”、“喜冲冲”什么的，也给我去去懊头！”宋黑子一听要笑又不敢笑，口里说“是啦您哪”，一转脸儿却嗔怪道：“你当是庆贺呢，究竟是白事还是红事呀！”

天渐渐黑下来了，和尚们都夹着海青道袍，拿着吹奏的乐器在门前聚齐了。胡老道告诉铺排，上座后要“打闹台”——把民间正一派的火居道那套拿出来了，人家和尚不应，只是照例打三通、念三通、吹三通。

灯笼、火把（官吊香）全点着了。院里院外唧唧喳喳地挤满了看热闹的大人小孩，有的老太太很幽默地说：“我们不是瞧送三的来了，是瞧发轿的来了！”

决定送到钟楼后头广场，但是还要绕一绕。

引头的是一班怯吹怯打的吹鼓手；锁呐、海笛、笙、九音锣、水镲、手鼓各一。吹打的既不像传统的哀乐，也不像用于娶亲的喜乐，因为没有那八面大鼓和一对大号筒，婚庆的韵味怎么也奏不出来。猛听起来，倒有些像老北京正月里跑旱船吹的那套玩艺儿。十分滑稽。

鼓手后面便是斌成斋掌柜的“窝头赵”和二路子与纸人为伍，抬着一顶粉红的纸轿子。后边便是提灯举香的人群，其中间杂着许多看热闹的老街旧坊。九众和尚（九音锣、横笛、笙、管、镲锅、铙、钹、手鼓各一。放正的徒手）走在最后，打一通大镲；吹一通梵乐，交替而奏。

送三行列出旧鼓楼大街南口，走鼓楼西大街往东，再进鼓楼湾西岔。从民众商场打穿时，打茶馆里跑出几个老头，有的说：“快看，胡老道他女儿嫁给阎王爷啦！”有的说：“唉，老年丧女，看着怪难受的。怪不得这两天胡老道没出摊呢！”茶馆是民间传闻的最好地方，故此不几天，胡老道女死当出嫁的“新闻”便轰动了北城。

却说次日一早，胡女出殡了。举动不大，略有丧仪而已。成顺杠房的经理石成吉老先生派了16名身穿绿驾衣的杠夫，一名打尺的杠头，拴了一付小红杠，杠上支了一卷小篷罩，民间叫它“采菱船”。这种官罩倒也素雅，四外挂红缎子绣花的走水，正面绣着福、禄、寿三星的吉祥图案。两旁绣的是“暗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长。走水下边垂着绉穗。前后有帘，前帘为“五福捧寿”的图案；后帘为莲花荷叶的图案。让人一看就知道，死的是位少女。

未从起杠之前，胡老道的老伴把供桌上的祭菜，一样夹了一箸子，放入了陶瓦的焰食罐子里，然后把筷子狠狠地一擻，抛于地下，算是完成了“揿罐”的辞灵礼。再由杠夫将灵柩钉上木梢。最后，将昨天接三剩下来的纸钱、金银箔叠的镲子、往生钱、官吊香等等一古脑地装进一个大麻袋，放在一辆小驴拉着的排子车上。这时，打响尺的要求胡老道交出出殡执照，响器头儿也来请示起杠时吹奏什么曲子。胡老道已没有昨天那样的精神头儿，只是向壁呜咽，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因为他女儿真正“出嫁”的时刻到了。响器参了灵，灵柩即被抬出灵堂，放在那只小小的“采菱船”里，及至杠夫将杠上了肩，“小船”总是左摇右摆，好像死女对人间无限眷恋……胡老道夫妇一起坐在那个放有大麻袋的排子车上，掩面吞声而哭。

看出殡的人异口同声他说：“得啦，儿女情长嘛，胡老道两口子总算对得起自己的大闺女啦！”

殡后，胡老道余哀未尽，心乱如麻，生怕练把式时神不守舍，失手伤人，

所以好多日子没有去鼓楼后头玩艺儿场去卖艺。

艺高哄人乐 草葬引人怜 ——驰名南北的相声艺人焦德海草葬纪实

老北京说相声的有朱、沈、阿三大派。民国以来，沈二、阿刺三两派的门户都不旺，只有朱派后继有人。朱少文（艺名穷不怕）是为朱派，当年，平津两他说相声的艺人，十有八九是朱派传流的，其中“德”字的，有位南北驰名的演员，名叫焦德海。他在辛亥革命前后，至本世纪30年代中期，献艺于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地，负有盛誉。他在艺术上以说、学见长，口齿清晰、沉浑，表演洒脱，尤以贯口抑扬、疾徐有致，一气呵成，更见功力。擅演《开粥厂》、《对对子》、《歪讲三字经》等曲目。当年曾与著名相声演员李德锡（艺名万人迷）齐名。他的徒弟很多，较有名气的如张寿臣、于俊波、尹麻子、白宾亭（即小云里飞的兄弟），还有当年在西单游艺场卖艺的汤金城（艺名汤瞎子）等。

焦德海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其收入亦高于同行艺人，但他受了当时社会不良风气的感染，染有很深的吸毒恶癖（晚年，不吸足鸦片烟，就不能上场），所以在资财上没有丝毫积蓄。民国25年（1936年）7月初，雨后路滑，从某杂耍馆子回来，由于烟瘾作祟，身子不支，以至跌倒于路途，被路人送至其家，从此即卧床不起，且呼吸紧促，喘嗽不止，已不能抽烟，遂每日以吞服鸦片烟泡延缓寿命。经延医诊治，均认为其病源系嗜耗过甚。

焦德海贫病交加，老境堪怜。戏曲界很讲义气，各名伶在人力、物力上都有所帮助，甚至听过焦德海玩艺的人也都纷纷捐款，梨园界李万春、马富禄、小翠花、谭富英等都主动出资，以助汤药。前门外观音寺“玉壶春”的三胎亥在天桥相声场子里碰上了说评书的连阔如，便要求他在报纸上刊登募捐启事，共襄善举。不料，事情还未来得及，焦德海便与世长辞了。时为民国25年（1936年）7月31日早晨7点30分。在世享年62岁（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生人）。死时有其发妻及子媳、孙女等5人在侧。

焦德海的儿子焦少海（亦为相声、评书演员，小有名气）闻耗，星夜由津匍匐奔丧。当时，家里只剩数十元钱，棺槨衣衾，一概无着。焦少海无法，只得叩请同行慷慨解囊。幸而北京有张德山、刘德智、于俊波、尹麻子，天津有张寿臣等竭力奔走，多方募化，集腋成裘，办了一棚白事。

据说，托人向长春堂张老道（即张子余）说情，从他开的棺厂内以40元购买了一口“三儿五”大叶杨的棺材，一套不到十元钱的寿衣，再雇8个人“转空”，将空材抬到丧居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9号。于当日下午3点入殓。殓后，他的徒弟们云集一处，研究善后各事，决定在家停灵5天，8月3日（即阴历六月十七日）接三、伴宿，8月4日（即阴历六月十八日）辰刻发引，卜葬于永定门外大沙子口张寿臣的义地里。

当年，四天接三，五天出殡，乃属于下层市民或“文贫”者流的丧事。但红白喜事，无论贫富，只要有“人缘”就显得格外火炽。焦德海生前是跑“江湖”的，四海皆亲。所以，他自倒头那天起，就吊客盈门。接三天那天，虽然不预备席面，只是清茶恭候，但棚内吊客无座而立者不下百余人，几乎所有的说唱艺人都到了。有的瞅着这棚丧事过于简陋，更加伤心，在灵前参礼后哭泣不止，临时充作义务“茶房”的一个劲儿喊“请节哀少痛吧您哪！”但均不能止哭，说是“就凭我大哥混了一辈子，就落这么个发送，真够窝囊的！”他的儿子焦少海大约有些害羞，忙往别处扯，对站在一旁的连阔如等

说：“得啦，谁让赶上这年月呢（指国府南迁，市面萧条），小子我又没什么能耐，愧对家父和各位老前辈啦！要说起来还总算不错，我的几个徒弟还真帮我的大忙了，就拿小龄童 说吧，‘响了万儿’之后，上了馆子和广播电台，每天都能抓弄十块八块的，没少孝敬我们老爷子……”连阔如因为喜欢小焦的脾气好，乘机略进忠言，劝他立志向上（言外之意千万不要“控海”——好抽大烟），不然，老焦一死，拿什么维持全家数口人的生活呢？据说，发送完了者父，焦少海又返津埠献艺，在“三不管”立下了脚根。这是后话。

老焦的丧仪略具规模，焦少海和老艺人们总算对得起他了。门口大鼓锣架，官吹官打九个响器。院内高搭席棚，棚内对着灵堂还扎了个放焰口用的“鬼脸座”。灵堂上挂着白布的云头幔帐，一堂铜五供的后边，供着一个“盒子”（祭菜）。晚上，还有主动送上门来的两档子“文场”。夏天天长，天不黑就送了三，但所有前来行人情的艺人们都举着官吊香，亲自步行致送。焦少海身穿重孝，左手打着挑钱纸，被人搀之以行。9 众和尚是带音乐的佛事，打一通大镲大钹，吹一曲梵乐。在永安路焚化了一辆纸糊的不挂里子的转轮轿车，有顶马（但没有跟骡儿）和 4 个箱子。送三回来，9 个和尚上座，放了一台“瑜伽焰口”。为老焦作了“身后功德”。

次日一早，焦德海出殡了。用的是 16 个人的杠，灵柩上覆盖了一面红缎绣着折枝花卉的过棺罩片。昨天晚上参加送三的那两档子文场也来送殡。还有“丧鼓子”邱记的全堂丧鼓锣鼓，片幡、雪柳，加上前边的官鼓大乐 9 个响器，这就是老北京的所谓“干三件”——执事、响器合二而一的形式。看起来倒也热闹，4 个小孩抬着一个绣花的“彩子棚”，棚下头前二人抬着一面“令”字大旗，旗杆是躺卧式的，前雕龙头，后嵌龙尾。紧跟有单皮、堂鼓、大、小锣、镲锅等猛砸猛打，十分喧闹。彩子棚后，有 8 名小男孩，各举一柄小花伞，身后背一小鼓，由另一小孩敲打，最后是一成年人打着大饶，进行指挥。紧跟两对片幡，两对雪柳，谓之“四花四柳”。由焦少海打着引魂幡，步行在灵柩之前。杠后有三辆四轮马车送殡：头一辆坐的是焦德海的老伴，头戴麻花包头，身穿重孝，有腔有调地哭泣，令人酸鼻。第二辆坐的是焦德海的儿媳妇，抱着一个焰食罐子；车顶上放着几个金银裸簋（冥钱）。第三辆坐的是焦德海的孙女们，小孝袍子上的左肩都钉了红布“补丁”。

最令人注目的是，天桥平民市场的艺人们集资在天桥马路西，通往市场的小胡同口上，设了一个路祭桌，上面供了许多鲜果、糕点，凡是没参加送殡的一些天桥艺人都在此上香致祭。旧艺人们的礼义甚为感人。从前门鲜鱼口至永定门门脸，约有二三十家铺户给摆了茶桌，以慰问孝属和送殡的宾客，借以表达对亡人的敬意。

100 多位说唱艺人一直步送至永定门门脸，他们自动分成两行肃立于道旁，目送殡列出城。本家一再礼谢，文场还是跟着出了城。

本来，像这样一个平民化的殡仪，在市面上是司空见惯的，并没有什么稀罕，但当人们知道这是焦德海的殡，却都跑来观看，而且不时发出惋惜之叹，这也可以说是老焦身后的一点哀荣吧。

“三儿五”：旧指棺材板料的厚度，凡大盖五寸，帮四寸，底三寸的棺材，行话谓之“三四五”的材，简称“三儿五”材。

小龄童：旧时，卖戏法的赵希贤之子，拜焦德海为师后，得艺名“小龄童”。

“响了万儿”：旧时江湖木语，谓艺人成了名。

主要参考资料：

《焦德海病故》。《北平晨报》，1936—8—1。第6版。
云游客。《江湖丛谈》。第3集。第47—50页。

不是俗礼 胜似俗礼的名僧隆丧厚葬 ——现明和尚圆寂法会、发龛荼毗纪盛

民国30年（1941年）的重阳节刚过，北京西四牌楼羊市大街的弘慈广济寺山门前，搭起了一座足够一丈多高的素彩牌楼，四柱三门，有靠无戢，耸然而立。“毗卢帽”形的顶子，向前探出了15个“山尖”，每个“山尖”上都垂着一绺黄、蓝、白三色的“垂头云儿”，每绺各结五个直径一尺多的大彩球。彩牌楼的拱门、立框将庙门上端的横额和两旁“八难三涂，共进毘卢性海；四生九有，同登华藏玄门”的对联完全遮住了。牌楼的顶子、立框，均以白布为衬地儿，中间以蓝布条拉成菱形小格，在每一交叉点上各别彩花一朵。并做出了盘长、方胜、团万字等图案。在极度肃穆庄严中，透着雍容华贵。比起民国8年（1919年），冯国璋逝世时，搭在故宫太和门前的花牌楼毫不逊色。天王殿的东门外，摆设了一堂金碧辉煌的大鼓锣架，对儿门鼓，金箔罩漆，上边以红漆画着“九狮同居”的图案，鼓架上加饰了青缎彩绣的莲花、荷叶图案的鼓帘子，鼓前是一对金漆长筒大号。身穿一色绿驾衣的鼓手，在钟楼下设座，鼓乐几乎传报不停。来客大多是披着黄袍的高僧，还有些前护后拥的官员。因此，站在门前的警察对儿岗，不断高喊“立正，敬礼！”鼓楼下边是以北京消防队大队长白来增为首的十数名头戴锃亮大铜盔的消防队员正在值勤，排列有序的云梯、水龙，严阵以待。山门外的小汽车，用作保卫的跨斗车、四轮马车、自用的洋车，从西四牌楼根底下，几乎快排到了帝王庙前的景德街。其势派可谓大矣。路过这里的行人，不免都要驻足围观，感到异乎寻常，猜想必是某位伟人政客呜呼哀哉了。其实非也。只要随便买份报纸一阅，就会知道这乃是广济寺退居方丈现明老和尚圆寂了。

当年，佛教界根据佛教仪轨，并且参照北京的传统风俗习惯，为现明和尚举行的圆寂法会和荼毗仪式，就其规模来讲，虽不能说是空前，但肯定是绝后了。许多名人的隆丧厚葬在这桩丧事面前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民国27年（1938年）以来，有外蒙王爷那彦图的大丧礼，但也只不过是只瘦死的骆驼，空有其骨架而已。一代京剧大师杨小楼、王又宸和北洋军系军阀吴佩孚的大丧礼，势派虽大，也只不过是近代社会司空见惯的俗家仪典。而现明老和尚的圆寂法事则别具特色，区别于俗而胜于俗。无怪乎时人评论杨、吴、现明的三桩大丧事时说：“到底俗不如僧”。现明和尚的圆寂法事之所以格外隆重，主要是他创下了中兴广济寺的业迹，因之，在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并非单纯是他身在以度亡为“天职”的广济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

现明老和尚其人

现明和尚（1880~1941）系南山律宗，名光德（现明是他的字），号水芝，原籍湖南衡阳县。俗家姓王。他在幼年时，聪慧过人，好读仙佛传记，超然有出世之志。故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3岁时，即受祁阳白云山隐林长老的剃度。次年，乃在衡阳县西禅寺受比丘具足戒（得戒于华巖老和尚），跟随明果法师及好心长老学习佛教教理教义，究禅悟道，颇为出众。旋任西禅、罗汉、花药诸寺要职。宣统元年（1909年）秋，道阶法师由京请藏经，回耒阳金钱山传千佛大戒，任现明为知客兼副训。宣统二年（1910年），

道阶法师于衡阳南云寺讲《弥陀疏钞》，现明有机会从学天台宗（即法华宗）的禅理。是年夏天，又去朝拜普陀山及阿育五寺，参访各处名师，遂依赭山寺惺愷法师学习水陆法事仪轨。民国2年（1913年）乃陪同道阶法师来京，在法源寺祈建佛祖2940年诞辰纪念大会及无遮水陆道场。次年，就任法源寺监院，进一步深究彻悟法华宗各派禅理。民国5年（1916年）现明37岁，被法门诸长老推举为弘慈广济寺主持。

是时，广济寺已非当年，殿堂久已失修，破漏不堪。法器残缺。既无庙产资财，且负外债。寺僧对于复兴之计，深感艰巨。现明却说“古人在荒山炉野尚能创建丛林，开办道场，何况广济寺还有这个基础，何愁不能复兴？”于是着手整顿清规，严格按祖制安单接众，亲自率领僧众朝暮课诵，一起“过斋”，无论寒暑、疾病，从无间断，斋主来寺祈福、度亡，必亲自主坛，如法焚修。民国6年（1917年）冬，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祈建了水陆道场。于是，广济寺之名始为社会所重视，施主云集，香火大盛。更由于现明广为结交社会名流，多方募化，寺内乃有所积累。民国7年（1918年）建筑了延寿堂、香积厨；8年，建了净业堂；修缮了比丘坛；9年，建了药师殿，修缮了大悲坛，并在河北顺义县置了900多亩香火地；10年，修缮了大雄殿，建造了天王殿三门及钟鼓二楼；11年，于寺西建筑了佛学院殿堂40余间；并于是年冬，亲传千佛大戒；12年，建了三学堂；13年，建了五观堂；是年佛学院开学，招收青年僧徒，修习各宗经曲，是为北京佛学院之始。14年，修藏经阁及东、西方丈室；复祈建七七水陆道场；15年夏，延请道阶法师宣讲《妙法莲华经》，一切规模均依古制，使人得见往昔经筵之隆重。是冬，复传千佛大戒；16年，开办平民小学；17年春，再传千佛大戒。是夏，乃付法传位于显宗和尚，退居潜修。

民国20年（1931年）冬，广济寺祈建了盛大的七七华严道场，未料，法事未满，即起祸端。由于电线走火，至使燃烧大殿、藏经楼及重要殿堂一百余间。现明和尚十余年苦心孤旨所作的功德业迹毁于一旦。劫后，百余常住僧众几欲四散。现明以及他的继席法徒显宗，一面以“生灭无常”的道理安慰僧众，一面请出名山大德、社会名流组成修复筹备委员会，主持募缘集金，大兴土木。乃于民国24年（1935年）冬，工程次第告竣。寺内殿堂不但恢复了旧观，而且焕然一新，较前更为宏伟。

民国21年（1932年），法门长老公推现明和尚为法源寺住持。现明为了亲自主持修复广济寺的工程，无法分身，便让自己的高徒梵月和和尚接法，升座为法源寺住持。

民国26年（1937年）7月，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北京西郊农民纷纷逃难，无衣无食，流离于荒野。现明便联合各方信士、檀越，设立临时救济会。提议时，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动。遂成立收容所20余处，救济队数十班。每日用汽车数十辆，分赴各地救援蒙难同胞，无偿地提供居住、衣食、医药。事后，有愿归家者，均发给路费。数月之间，救人数万。次年夏天，临时救济会结束，即于寺内天王殿前东小院（即今北京居士林临时办公室和《法音》杂志发行部办公室处）另组佛教利生会。继续办理慈善事业。

民国27年、28年、29年，现明先后在法源寺、广济寺先后传授了三次千佛大戒。28年（1939年）岁次己卯，是现明和尚的60岁的整生日，佛教界的四众弟子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日前，广济寺护法大居士弘道先生在劲松小区的旧货市场上，发现一枚铜胎景泰蓝的“庆祝现明长老六十大寿”

纪念章，中镶大师头像，可为当年盛会的佐证。

当年佛教界对现明和尚的评价很高，死后，在其《行述》里说：“综其生平两次修造广济寺殿堂房屋数百间，九次传戒，受戒弟子数千人，佛学院毕业六班，受学者数百人，皈依信徒更不下数千。噫！胜矣！”民国 29 年（1940 年）以来，现明和尚已心力疲惫，健康状况日下。终于在民国 30 年（1941 年）重阳之日“于广济寺退居察一笑西归”。佛门四众弟子无不喟然长叹。

现明老和尚世寿 61 岁；戒腊 38 年。

印发《哀启》

现明和尚既已圆寂，广济寺内外的佛门弟子，顿时陷入了极度的哀痛之中。按照佛教的说法，凡是希望圆寂大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均不应嚎陶大哭，而只能为之默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以便得到佛的接引。尽管寺内没有哭声，但仍令人顿感云雾凄凉，西方丈院内，诚是：小圃黄花枝上老，秋风落叶伴哀容。

现明和尚一直在三学堂戒台后边的西方丈院北屋里间养病，直至沉痾不起，最后就圆寂在此。因此，他的弟子们都云集在这里商议如何发送自己的得法恩师。决定先由广济寺方丈、继席法徒显宗、广济寺监院宽瑞、现明的另一接法弟子、法源寺方丈梵月、法源寺退居方丈天文、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祠方丈宗镜等，临时组成北京市广济寺现明长老圆寂法事委员会筹备会，向诸山长老、檀越、法亲、世谊、友谊报闻。

未几，正式组成了以江朝宗、夏莲居、周肇祥为首的北京广济寺现明长老圆寂法事委员会，并发出了一份铅印的《中兴弘慈广济寺现明长老哀启》。此相当于旧时民间常见的报丧文告——讣闻。共发出两千余份。

《哀启》是一册黑蓝色封面，古式线装的书，其款式横为 17mm；竖为 28.5mm，题词单篇 15 页；正文双篇 15 页。就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六部分：

（一）、现明老和尚遗像。上端有继席法徒、广济寺方丈显宗以隶书题写的《本师老和尚像赞》：

繫帷本师，降迹衡阳，湘南垂范，华北放光。中兴广济，规矩严肃。梵宇琳宫，两经修复，释尊妙禅，备得幽微。宏宗演教，善逗其机。行道是乐，利生偏尚。传戒兴学，饶益无量。方期大寿，广度有情。禅门不幸，大德遮亡，人天陨泣，遐尔兴悲。瞻兹遗容，聊掬哀思。

（二）、社会名人及诸山大德的题词江朝宗的题词是：

佛光一现，成就希有，慈德长明，清尘滌垢。是明大身，如来授受，不取于相，神存座右，大千士信，同深稽首，和南赞叹，灭度不朽。敬题现明老法师归真。佛赐名弥慈江朝宗合十

王揖唐的题词是：

法轮常转现明老和尚示寂王揖唐董康的题词是：

现明法师千古咸仰宗风毗陵董康题

余晋和的题词是：

放大光明现明老和尚圆寂余晋和

邵章题写的《现公老和尚像赞》是：

猗欤导师，妙契圣谛，崇殿饰宇，重兴宝地，高揭智烛，玄讲楞伽，力输龙象，訥化虫沙，具八解脱，生四禅天，慈晖不灭，长荫后贤。杭人邵章

敬题

傅增湘题写的《现公老和尚像赞》是：

闕妙明心，息广长舌，说法台倾，传灯光灭，师本南能，擷秀于北，性相顿空，畴能嗣法。傅增湘拜撰

周肇祥书写的《现明老和尚像赞》是：

法源广济，千古名蓝。扶衰振敝，谁其荷担。有大法师，道阶之子，善继善述，宗纲以理。悯忠既宏，西刘更起。云何赤爍，一怒遂毁，誓志复兴，谈笑经营。华严楼阁，宛若天成。闻者赞叹，见者诧异。弘法利生，老而弥笃，幽显舍灵，咸蒙斯福，积劳致，还不得休。众病我病，岂药可瘳？化缘周毕，终谢阎浮。人天失导，涕泗横流。图像伊然，音尘隔绝。如镜中花，或水中月。镜花水月，本无去来。徒令四众，瞻仰徘徊。辛巳九月无畏居士周肇祥谨撰

张朝墉书写的《现明大师遗照》是：

嶽嶽大师，生有自来，维摩丈室，誌工讲台。新诗一章，梅花几树。方外论交，一见如故。灵山香火，三十余霜，永不退转，神归西方。八二老人张朝墉赞张水淇的题词是：

现明法师灵鉴观六波罗密多，住于十地，而入无余涅槃。

张水淇敬题

蒋尊 书写的《现公老和尚赞词》是：

猗欤大德，南州僧象，宏法北来，万流景仰。赤龙吐舌，两劫精蓝，坐施法力。顿涌香龕，说戒诸圆。谈经旨妙，席有传人，灯还普照，是为显著，功在人天。语其秘印，不落言论。性本非空，身容息假，朗月高悬，灵风独写。

蒋尊 敬题

恽宝惠的题词是：

现公老和尚圆寂 双树变色 恽宝惠敬题

郑文轩的题词是：

现明老和尚圆寂 顿超觉地 优婆塞 郑文轩拜题

慈舟和尚的题词是：

现明老和尚示寂 显密圆通 后学慈舟拜题

全朗和尚的题词是：

现公老和尚哀启题词 现比丘身 度阎浮众 修大悲禅 证无生忍 拈花寺退居 全朗拜书

真空和尚的题词是：

现明长老示寂 般若真宗 真空拜题

（三）、中兴弘慈广济寺现明长老追悼会通启，发启人有社会各界名流 345 人；诸山长老以及现明的弟子 179 人，共计 524 人署名（略）。

（四）、法事日期

1、所修法事计三十五日。

自国夏历十九月二初八九日为始，至十一月十三日圆满。

2、追悼典礼国夏历十一月三十十二日

3、发龕国夏历十二月一十三日

（五）、追悼现明长老征文启

（六）、现明大师行述（从略）

治丧之初——成服、入龛

旧时，俗家落了丧事，其孝属必“遵礼成服”。以表孝意和哀思。僧家也不例外，现明圆寂后，法事筹备会首先要求他的弟子、常住僧众按佛教仪轨于现明大殓之前一体成服。旧时，俗家为亡亲服孝，以白色为主。僧人则是以灰色为主，灰袍、灰腰带、灰帽、灰鞋。但制作孝服用的灰布，不是市上卖的普通灰布，而是极粗的白布，放在盛有煤末子水缸内，染成黑灰色，染的深浅不均，成为名符其实的“坏色”。现明和尚的继席法徒们的灰孝袍子袖口、衣襟开启、底摆都是毛边的，形成我国古代民间五种服制当中的“斩纛”。

现明和尚的衣殓和大殓都是在戒台后边西方丈院正厅举行。出家人的殓衣与俗家人不同。现明的殓衣是根据佛教的成例，享受大德高僧的优礼。上衣为五件，贴身的是黄色衬褂，黄色小棉袄，加上黄外罩，黄大棉袄，外罩大黄袍。下身紧里边是衬裤，黄棉裤，黄裤罩，黄色绒绳的腰带。脚上是黄布袜子，高底大坡边，虎鼻子单脸僧鞋，大口，沿紫边。头枕一尺余的圆柱形黄色枕头，两边堵头刺绣着九品莲台。立面绣着轮、螺、伞、盖、花、罐、鱼、长的八吉祥图案。身下为黄棉褥，亦绣有八吉祥图案，与枕头上的图案配套。身上为黄衾单，最上边是黄绫红色梵文的陀罗经被。袍袖内放着他本人受戒时的戒牒，作为进入极乐世界的凭证。由接法弟子给他左手里放一股上档龙涎香。表示对恩师最后供养的一炷真香；再给他右手放一挂十八子佛珠，给他脖子上挂一串菩提子佛珠，但没有非可燃物的“结珠”（一串佛珠为108颗，每27颗中间有一磁、料、宝石等“结珠”），主要是怕将来茶毗（火化）后，筛骨灰时与留下的坚固子、舍利花相混淆。

衣殓后，举行了开光仪式。俗家是开眼、开耳、开口；佛家只是开眼光，与给佛像开光的仪式大体上一致，由一个小沙弥在院内用铜镜子将阳光反射至西方丈室内现明的眼上，由继席法徒显宗以棉花球蘸净水擦试，再由主持开光的法师边执手印，边持咒，边洒甘露水，最后，以振铃收法。

佛教徒的殓具谓之“龛”，表示以证佛位。用棺材的谓之“躺龛”；用特制佛龛形式的谓之“坐龛”。后者为佛教正宗殓具。现明和尚生前抱病时，他的弟子们就都争先恐后地募缘集金，为他准备了极为豪华的殓具。以继席法徒显宗为首的一派，花了1万元的伪联币，定做了一口上等金丝楠四独板的棺材，名之为“躺龛”，准备按俗礼进行土葬。以剃度徒为首的另一派，则是花了三年的功夫做成了一座精美的香樟木坐龛，准备按佛教仪轨如法茶毗火化。因此，双方在如何使用殓具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议。双方背后都有北京，天津等地的势力，所以一时争执不下，互不相让。最后，只好请现明和尚的第一高徒宗月和尚（当时任鹫峰寺方丈）来裁决。宗月自然不好得罪任何一方，乃采用各取一半的方案，表示同意用棺材装殓，但根据佛教“五蕴皆空”的教义，一定要火化。至于坐龛则暂时保存，留待他自己圆寂时使用。宗镜等人虽然从思想上还不太服气，但也不便再争。于是，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据说，现明和尚的躺龛（金丝楠木的棺材）被涂了紫黑色的大漆，远望如同硬木中的紫檀一样，并请描金匠（往灵柩上画图案的人不叫画匠）用金漆工笔画上佛家所特有的图案，正面是梵文经字大展祥光，后边是莲花荷叶，只有这一处是与俗家人的“脚毗莲花”图案一致。两帮各画了三个法轮，下

边是“海水江牙”的图案。表示此龕为南海中的佛位。

佛家称入殓叫做“入龕”，入龕前先得“净龕”，僧人捧经持咒，主法大师扬洒甘露，澄心观想，通过持咒施法，使木龕真正成为南海中的佛座。

灵堂、祭堂和挽联

入龕后，现明和尚的躺龕被停放在西方丈院的正殿。其躺龕正顶在大殿的风门上，完全是俗家人正寝的格局，龕前竖立着现明遗像。像前设了大型供案，挂了青缎彩绣的桌围子。案上摆了精致的景泰蓝五供一堂，花筒内插着金、银两色的莲花、荷叶、慈菇叶、苍蒲棒组成的灵花一对；蜡扦上燃着一对写有“西方接引，花开见佛”字样的素蜡；并陈放素馔、糕点、鲜果供品各一堂。躺龕前搭了一座三门四框“垂花门”式的素彩牌坊（彩活均是白塔寺东夹道关记彩局承办的），正面挂着倓虚大师的挽幛“常住寂光”。两旁挂着继席法徒——嗣法门人的挽联。显宗的挽联是：“古刹费经营数十年手创宏规万善同归资普度；师门佯覆帙廿一载心传法席千秋纪念感重阳。”梵月的挽联是：“师复何憾兴丛林启后学谁与齐肩方期寿享遐龄大教前途永赖光显；我最难忘传法胤提慧镫实深刻骨詎料神游乐国隆恩未报遵失瞻依。”灵堂前，搭了一座一丈见方的月台，描金彩绘的红绿栏杆与明柱，吼狮图案的天花板，汉白玉须弥座形式的“台裙”。躺龕两侧是继席法徒陪灵守孝的苦席，左为广济寺方丈显宗；右为法源寺方丈梵月。凡有来祭者，均由此二僧还礼答谢。

灵堂院内挂的挽联多是佛教界及诸山长老、居士、檀越所送的。月台明柱上挂的是北京佛教会的挽联：

“发广大心誓兴梵刹厥功告成归净土；乘般若船直到彼岸惟愿再来度众生。”三面棚壁挂着近百幅挽联：

广东中山佛天精舍舍长徐军武暨全体莲友：

以求生得故乡之风月生本无生无生而生生于无生之净土；为示灭作除道之导师灭实不灭不灭而灭灭于不灭之秽邦。”印度那兰陀寺方丈福金：

“修无为法照五蕴空见胜明心悟彻人天归净土；参上乘禅传千佛戒慈怀宏愿长留功德在尘寰。”

上海佛教同仁会范成：

“大启法门重兴广济拈茎草作金身总属神通游戏；不厌生死无著涅槃昇兜率入内院定当乘愿再来。”

北京菩提学会：

愿行广弘成就不思议功德；庄严圆寂已度无量数众生。”北京西直门外念佛会会长刘显亮：

“讲经救人心赈灾救人命道场救人魂造福如斯可谓实行菩萨道；僧学续佛智戒坛续佛种苦行续佛宝修慧若此竟成满报祖师恩。”

天津佛教居士林：

“身乃地水火风自然和合而来在四大皆空之中皆能为塔；心无罣碍恐怖究竟涅槃目去除如时我闻之外我有何言。”

在这里挂出挽联的还有：广惠寺退居荣鑫、住持瑞祥、龙泉寺住持百川、华嘉寺住持常悟率两序大众、广善寺住持慧三、退居灵岩、上方山兜率寺退居清池、广化寺住持玉山、圣安寺住持宝林、广通寺住持性然、宝禅寺退居

润波、住持学海、石灯吉祥寺退居越尘、嘉兴寺住持崇辉、永泰寺住持含空、极乐寺住持真悲、正觉寺住持辉光、铁关帝庙住持常瀛、无量寺住持如亮、延寿寺退居星朗率法徒证和、拈花寺退居全朗、住持量源、宝兴寺住持敷扬、雷音寺住持魁亮率徒云庵、五台山十方普济禅寺退居广慧、住持寿冶（现为美国纽约佛教协会会长）、太原崇善寺退居明义、住持广净、大同上华严寺住持云生、河北乐亭县菩萨院住持无烦、崇福寺住持义然、河北武清县慈航寺住持道树、通县燕郊镇天齐庙住持宽谛，以及未署职衔的四众弟子近百人。

在这里挂出的挽联还有广济寺、法源寺所属单位。如：弘慈佛学院、弘慈律学院、法源佛学院、佛教利生会、莲池放生会、净业莲社、广济小学等。

西方丈院、三学堂小院以及中轴线上各院均搭了席棚、舍利阁、多宝殿前搭了讲经用的法台。台的前脸是以黄、红、紫三色扎成的三门四柱式的花牌楼，上有毗卢帽形的顶子，垂着十五挂“垂头云儿”。

圆通殿是为祭堂，堂上正面设位悬影，影像上端有继席法徒显宗和尚的题诗。前设大型供案，香花灯果等供品亦如灵堂。圆通殿临时卸去了殿门和两旁门窗，形成灵堂“正寝”的格局。在素缎湘绣的幡门、幡条上端，高悬“政界要人”的祭匾。江朝宗匾额题词为“成就希有”；王揖唐匾额题词为“归真净域”；齐燮元匾额题词为“法性圆融”。对面高悬余晋猷的祭匾，题词是：“大觉西归”。从大雄殿后门通往圆通殿的砖石结构基座上，临时搭上了连殿走廊式的大型月台，月台的上顶，南边搭在大雄殿的后檐；北边则直搭在圆通殿——祭堂的前檐上。外边两侧均是绿色云头式的挂檐，台里顶棚是描金彩绘吼狮和梵文“六字真言”相间的天花板，就像寺院殿堂内部装修一样。月台的基座围了木板彩绘而成的汉白玉式的“台裙”。基座东西两侧围起了红绿栏杆，台的東西两边原石阶处留了道口。东边为致祭人的入口，设有签到处，随签到发给白纸菊花一朵，让致祭人带在左胸或马褂的二扣上。西边为致祭人礼成后的出口。有四众弟子在此分发印赠的经书，以便上殿“一体台韵”。

祭堂的月台左右及圆通殿、大雄殿东西山墙外的配殿两廊都挂满了挽联、祭幛。

江朝宗的挽联是：“佛笑拈花今证果；人生落叶此归根。”

王荫泰的挽联是：“一笑拈花归净土；十年面壁证莲台。”

曹汝霖的挽联是：“大德曰生千劫禅天人力补；法苑宛在百年净业我闻详。”

殷汝耕的挽联是：“弘法利生一片慈云光大乘，拈花证果连朝风雨黯重阳。”

董康的挽联是：“主玄席数十年燕冀仰宗风檀越功成三辅地；渺故乡千万劫沅湘阻归梦茶毗皈去四禅天。”

蒋尊的挽联是：“溯当年缔造艰难住锡余霜复整梵宫经两度；除此日功行圆满归真重九节长随摩利救群生。”

周肇祥的挽联是：“菩提以济度为先当兹灾劫频仍何忍掉头便去；本生灭刹那之事且听虚空赞叹定知乘愿重来。”

张朝墉的挽联是：“击钺声高箇中弹指三千劫；画梅诗在方外论交二十秋。”

北京市商会会长邹泉荪的挽联是：“形化神存常澄妙果；愿宏德大显证涅槃。”

浑宝惠的挽联是：“慈悲利生圆通说法；双林现足四禅升天。”

冷家驥的挽联是：“四大皆空归真登极乐界；三缘已断积功为众生修。”

钱隼人的挽联是：“间气毓衡湘味道谈经信仰遍大千世界；至诚新广济归真晦影遗泽被亿万众生。”

河北省公署财政厅厅长高崇祿的挽联是：“三千界佛国灵山撒手返西天从此别开新殿阙；八百里洞庭秋水魂归向南岳剧怜非复旧楼中国实业银行田鸿麟的挽联是：“四大皆空度阎浮众；三缘已断证无生忍。”

万国道德总会全体同人的挽联是：“顽石点头谈经入妙；拈花微笑脱俗归真。”

天津惠中大饭店孟少臣的挽联是：“勋业可观岂独浮名能媲美；高风堪仰较诸古德亦无亏。”

三阳面粉公司经理李泽民的挽联是：“窗前有竹传风籁；座上无人对雨花。”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集内经句”挽联是：“善哉善哉成就希有功德利益一切众生即非凡夫当得作佛；如是如是此人以是因缘此处即为是塔皆应供养以诸华香。”

《实报》社社长管翼贤的挽联是：“莲池藏海涤澈烦氛普极众生来从知一旦旋真千佛灵岩随接引；净业婆心载兴宝刹饱偿弘愿去况有六班俊造万像贤首继焚修。”

《晨报》社社长宗威之的挽联是：“广济赖重修弟子数千宗戒法；京畿资极救灾黎凡万渡慈航。”

北京消防大队队长白来增的挽联是：“四大皆空乃成圆竟；三缘已断独自归真。”

北京森隆番菜馆经理张春山的挽联是：“撒手竟西去叹衡岳风凄燕山露冷；乘愿再东来期法源普润广济群生。”

此外，还有各伪警政机关、绅商各界、生前友好、同乡等单位 and 个人的挽联约一百余幅。

后来，法事委员会陆续收进了全国各大名山寺院、高僧、居士、檀越施主、社会名流送来的匾额、题词、诔文、挽联、祭幛数百份。各主要殿堂内外，中轴线棚壁，已然挂满，达到无己复加的程度。除了显要人物的奠礼，悬于显赫地位外，对于一般人送的，只能重叠而挂，不露上款、题词，只露下款——送礼人的名号。

迎三送路

自现明和尚圆寂之日起，四众弟子们即分别在西方丈院灵堂、三学堂戒台院和大雄殿，昼夜轮流诵经礼忏。根据法事委员会的安排，从旧历九月初九日至十六日，“首七”期间，除临时“随喜”的散众在大雄殿随班念佛外，广济寺本庙挂单常住僧众，每日由客堂以开牌的形式，指定108位高僧，登坛拜大悲忏。早晚加上禅门朝暮课诵各一坛。

九月十一日为迎三送路之辰，广济寺内幢幡飘舞，宝盖飞辉。大雄殿须弥座上的席棚顶上，垂挂着24幢不同颜色、图案的经幡。四周石栏杆的立柱下，分别设立了玻璃罩的戳灯、绣片形式的引幡、以素菊为主的鲜花。须弥座正中，供着一座纸扎的粉红莲花座，周围直径约九尺、高三尺，上面竖立

着圆寂大师名号的牌位，莲花座的两旁各立一纸糊的僧装侍者，俱手持黄绫引幡，上有“西方接引”字样。殿上，三世佛（释迦、药师、弥陀）前的供案上，炉焚檀降，香烟霏霏，玉烛高燃，时令果品，奇样糖酥糕点罗列有序。身披黄袍、红缎绣金线福田纹袈裟的108众大德高僧纷击钹、铃、钟、鼓，高诵佛经。这便是现明和尚圆寂法会道场的主坛。西方丈院（即灵堂院）设了三面经托子，南面是法源寺15众的官经；东面是拈花寺15众的官经；西面是嘉兴寺15众的官经。俱为昼夜功德——白天有经忏，夜晚有焰口。这是以上三个庙为给现明作身后功德而赠送的。三学堂戒台院还有华北居士林等佛教社团设的经坛。每座经坛前均由扎彩匠搭上了毗卢帽式的素彩牌楼，并挂起了红缎绣花的云头幡门、幡条。棚顶悬挂了12幢红缎彩绣的经幡。三台经采取轮念的形式，上午9点先由法源寺和尚上座起经，次由拈花、嘉兴两寺继之。照例是念罢一节忏，即由现明生前收的“悟”字辈的弟子捧疏，送到山门外焚化，由设在门前的官鼓大乐击鼓鸣号“接赞”、“送赞”。然后，僧众在灵前“回向”。

迎三送路之日，庙里开始供斋。此大体上分为三种形式：

按佛事通例，中午和后晌均举行灵前上供仪式。由本庙小沙弥们从斋堂的厨房一直排到西方丈院灵堂前的月台上。先由官鼓大乐击鼓发酹、鸣金、鸣号、奏乐后，只听司仪一喊“传供”，即由小沙弥们将一盘盘的素馐、茶果，一个传递一个地传到灵前，由供斋大德双手接过来往上一举，再由侍者接过来放在供桌上。传毕乐止。僧众诵经持咒。礼成后，僧众便敲打看法器去五观堂“过斋”（吃饭）。这时，不在经坛上的诸山长老、僧众、尼众均步随其后，排成一长蛇阵，一同去“过斋”。

一般前来“随喜”的居士散众、檀越施主则是分别到另院去吃“罗汉斋”，即素什锦烩成的大锅菜，每人一碗，馒头、米饭自取，管饱管够。

对于“政客要员”、社会名流，则被助善的知客让到东西大客堂里坐席，预备的是西四丁字街香积园素菜馆的全素席，所有菜馐完全是以素托荤，名同形似。但主食仍然按老北京的风俗，预备素卤面。以应“人生有三面：洗三面、寿诞面、接三面”的典。

据说，整个法会期间的斋饭都是各大施主舍的。斋堂内外贴满了“某某大居士、某某大善士献罗汉斋一堂供众”的红纸条。其中，以左悟净、左悟哲两位大居士供斋最多。还有森隆番菜馆经理张森隆（亦名张春山）以“素食会”名义施舍素筵。

按法事委员会庶务处安排，下午4点施斋供众。下午6点送三。所以，从三点起，各大经坛即前后在佛前“交供”，诵念《三宝证盟》斋仪折子（荐亡文疏），宣八十八佛号，然后送疏，回坛时，围绕纸扎的莲花座诵经加持，由主法大和尚弹洒净水。108众黄袍僧纷击法器，板点经韵，合谐一致，音韵悠扬，庄严透顶。以继席法徒显宗、梵月为首，现明和尚的弟子跪成一片，是为“祭莲台”，相当于俗家办丧事时的“祭库”、“祭船”等礼仪。礼成后，即口宣佛号敲打着法器到斋堂“过斋”。

僧众过了斋，各院才能开始向各位“随喜”的居士散众、施主供斋。晚斋一律是素卤面，加上印有红佛字的大馒头。但将近一千人的斋饭，供应起来，谈何容易？从4点到7点才大体上结束。送三的时间不得不再推迟。

深秋九月的7点，北京城早已被夜幕笼罩了。法委会始决定送三到北沟沿（今太平桥大街）迤北去焚化莲台和纸龛。因为北沟沿是历史上形成的焚

化场，已为地面上所指定。这样，正好出了庙的山门往西送，应了“东送娘娘西送三”的典。

广济寺内外，人山人海。看热闹的人流把西四和羊市大街一带挤得水泄不通。各大报馆、杂志社的记者也纷纷采访猎奇。

送三的行列是波澜壮阔的灯海人流。走在最前头的是官吹官打 15 个响器“带小乐儿”。身穿崭新绿驾衣，头戴去掉红缨的清制官帽的鼓手，排成双行，缓步前进。金漆长筒的拉号一对；挂着青缎彩绣鼓衣，并覆以孝布的金漆官鼓四面；笙、唢呐、海笛、九音锣各一对，跟锣（指挥）一面。

庆升杠房的大白“气死风灯”8 盏；六角形玻璃框点蜡的手罩子 16 把。均为杠房代雇的执事夫高举前行。

小沙弥 8 人提灯；4 人提炉，炉内燃点着檀香。排成双行，走在纸扎大莲花座前头。

小沙弥 4 人以木杠肩抬着纸扎的粉红大莲花座。此为象征着现明和尚已修持成佛，而且位登上乘极品。莲座临时装饰了彩色的小灯泡，通上干电他，闪闪发光。据说这是西四附近一家电料行捐赠的。

莲座四角，各为一小沙弥，前边的执锡杖、钵；后边的执拂尘、具（读作“居”——僧人礼佛时，铺在拜垫上）。

另两个小沙弥抬着一座古典宫殿形式的纸龕，高约两米左右，上面糊了五脊六兽，黄顶绿瓦，前有四根明柱，红菱花格的窗棂，敞门，内有圆寂大师名号的牌位。下边有汉白玉花纹的须弥座。

西安门华北居士林经班全体身着海青大袍，外搭紫红缙衣（因居士不是出家人，不能搭袈裟）。俱敲打着铛、钹、鼓。后跟董事会“六部”成员、林员、林友等散众，均执把子香（即官吊香）一股。西板桥长春寺内太虚莲社、大六部口报恩寺内清静莲社、崇文门外花市妙德莲社、广济寺净业莲社等佛教居士团体的成员百余人，其行进顺序是经班在前，次为搭缙衣的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着海青大袍的男、女居士。便装散众尾随其后。搭衣着袍者一律执草香一炷；便装者，左手提白纸灯笼一盏或执官吊香一股，以为火把。

居士后边是提灯、执香的檀越施主、社会名流。还有“七七”事变后，蒙难遇救图报的近郊农民，他们都自动赶来，自己花钱请香买蜡买灯，临时加入送三行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其中有悲痛欲绝，痛哭失声者。诚是“无数饥黎齐下泪，霜宵忍冻拜莲池。”后边依次为法源寺、拈花寺和嘉兴寺的大德僧众各 15 位，均身着法青大袍，加披红缎金线福田纹袈裟，以引磬、铛子、钹子、法鼓素打“七星”（指法器的板点）。

继席法徒显宗双手捧着垫有黄绫“盏”的铜茶盘，内放写着圆寂大师名号的牌位；梵月双手捧着广济寺道场主坛给西方三圣的大表。后边的“悟”字辈的弟子分别捧着各居士经班、法源寺、拈花寺、嘉兴寺等经坛道场给佛的黄表。捧牌、捧表的都有两名僧人侍者搀扶以行。

最后是广济寺道场主坛上的 108 众黄袍。4 对引磬；4 对木鱼、8 对铛子、4 对钹子；8 对手鼓。余者俱手执念珠。主法放正的大和尚捧着手炉。主持仪轨的大和尚真空，手抱如意，走在最后，有一个小沙弥给打着大黄伞盖。伞上绣着“弘慈广济寺”的名号。

送三的行列无法按传统规矩双人直排行进，而完全是交错重叠而行。最南头已到北沟沿丁章胡同东口，后边的还没出广济寺的山门。送三的响器、

僧众、居士、人群陆续到达指定地点之后，就在便道两旁列队等候。以丁章胡同东口为中心，队伍人流逐渐向沟沿南北两方延伸，南头已排至大麻线胡同东口；北头则排至马市桥十字路口。

交通完全中断。地方军、警、宪都临时派员至现场弹压。消防队亦全副“武装”尾随而至。

108 众大德高僧在焚化场上，敲打着法器，口诵经咒，绕纸扎莲花座三周后，由五位“香灯”将牌位、黄表接过来，点火焚化。几乎所有的居士都随同显宗、梵月及现明生前收下的众弟子跪地三叩首，并口宣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各大名山长老，由侍者就地铺“具”，抽下二十五条的“祖衣”，跪地三叩首。遂告礼成。但僧众并未就地解散，而是打着“回坛”板点，回到了广济寺的经坛上，在佛前齐诵《圆满赞》

后，封坛。

是夜，大雄殿的须弥座上有“三大士”——三位金刚上师放正主法的《瑜伽焰口》。西方丈院灵前亦有法源寺等三庙的对台焰口。金钟法鼓，琳琅振响，直至夜阑。

犯重丧——宗月追其恩师而去

现明和尚的迎三送路仪式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

宗月和尚是现明和尚的第一大弟子，当时是西单卧佛寺街鹫峰寺（即卧佛寺，乃京西妙峰山的下院）方丈。他是毁家赈济，破产后出家为僧的，堪称京华一奇人。

宗月虽是出家人，但平时许多行为却不尽“如法”（指佛法）。九月十一日晚上，给现明送三之前，广济寺内，灯笼火把已经点燃，只等“香灯”喊：“师父点鼓”了。宗月可能有难隐之衷，突然跑到灵堂里边，拍着现明的灵柩痛哭。顿时，把所有的四众弟子都给惊呆了。因为出家人应该懂得，在这求佛接引的神圣庄严时刻，嚎陶大哭，会影响死者的升遐。宗月却当众来了个独角表演，而且连孝也没穿，排在众弟子当中，显得非常个别。

当他与送三的行列走到广济寺的山门时，忽然感到身体不支，于是就向左右的僧众说：“我不好！”当即被他已经出家为尼的大女儿搀扶至天王殿外院东边“利生会”的北屋（今北京居士林临时办公室）休息。他好像有某种预感，看见桌上放着一个磁茶杯，当即以手指蘸上茶根，往桌面上写了一首偈子：

“芸芸众生芸芸事，芸芸一日又一日。有时芸芸不耐烦，赶快去问西来意。”写罢，马上双眼一闭，跟着他的师父西去了。这时，他的姑娘和利生会的坐班留守人员急忙去追送三的队伍。可是等到叫回了几个僧人后，为时已晚，根本无法抢救了。

这回给现明和尚打的那座香樟木的坐龕可真的派上了用场。于是盛殓之后，雇用了羊市大街庆升杠房 32 人的杠罩，从广济寺抬出来，回鹫峰寺去治丧。作了“三七”二十一天的法事。比他师父现明和尚提前 11 天就荼毗火化了。

许多局外人都背后议论说，当初给现明打了两份殓具（一躺龕，一坐龕），后来，宗月又红口白牙地说，坐龕留给他用。这些作法和说法都是不吉利的征兆——主重丧（百日之内再死人）。确是不巧不成书，三天之后，果然应

验了——现明和尚圆寂起了连锁反映。

五个“七日”的经忏法事和送圣

现明和尚圆寂法会，最大的特点是以广济寺本庙 108 众大德高僧所组成的道场为主体。起初，各大寺院所送的禅经，照例是按传统习惯，分班轮作法事。后因经坛过多，无法容纳，故于“三七”以后，按法事委员会的安排，除番经、尼经外，都集中一起归入主体道场，成为一坛，统一作法事。

“首七”拜大悲忏，祭送九品莲台

由 10 月 28 日（即阴历九月初九日）至 11 月 3 日（阴历九月十五日）“首七”期间，礼大悲忏。这是根据《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而作的法事，共分为十科：严道场、净三界、结界、修供养、请三宝诸天、赞叹申诚、作礼、发愿持咒、忏悔、修现行。以天台宗教义指导修忏。佛教认为，如法修忏可使亡者往生西方净土。

11 月 3 日，为首七拜大悲忏功德圆满之日，是法事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广济寺天王殿前，亮出了现明和尚生前所得的万名旗伞、锦旗、锦标。展示了他一生对佛教事业的贡献。现明长老的万名旗、伞均是以杏黄缎子为地，以象征着他的“神圣业迹。”伞帖子约长三市尺以上；圆周直径为五市尺左右，上面均以花绦子边分隔成三层，每层缀有不同色彩的小飘带，上书献伞人的名字。万名旗是三角形，边缘镶有红色“火焰”，中间为彩带人名。伞与旗都用七尺高的白蜡杆子张起，插在红漆木质的执事架上。中间还配上了黄云缎绣花的片幡、经幢。据说，这都是佛门四众弟子以及大檀越们集资制作的。此外，还有社会团体、名流人物赠送的锦旗、锦标，上有不同的题词赞语。按他生平历史时期大体上分为：荣膺弘慈广济寺方丈升座大典纪念旗伞；七坛千佛大戒，培育僧才功德圣迹旗伞；两次重修梵宇，中兴古刹功德旗伞；慈善利生，救灾赈济功德圣迹旗伞。还有他圆寂后，四众弟子及蒙恩图报信众追赠的功圆满，大德隆恩万名伞盖。一时形成旗群伞海，在初冬寒阳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庄严、隆重。

天王殿东、西钟楼二楼以南的墙壁上，分别张贴着用黄毛边纸书写的大幅文告：《中兴弘慈广济寺现明长老圆寂祈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榜文》；还有十方善信为现明共修身后功德的募缘捐启：《募缘今岁冬令暖棚、粥厂赈济利生功德通启》；《募缘刻印经书宝卷弘法结缘通启》；《十方善信上供舍斋放生功德榜》。二门东过道，有用灰布红条公布的《北京广济寺现明长老圆寂法事委员会成员名单》；助善居士名单。门前为官鼓大乐，大门鼓一对；官鼓两对；大号一对；锁呐、海笛各一对；九音锣一对；跟锣一面。设座于钟楼北侧，专为来客传报。

二门以内设了签到处。凡来祭的比丘、比丘尼，一律发给一条灰布孝带；一般来宾则给予黄纸菊花一朵，令佩戴于左胸襟。有的居士还在一旁散发黄纸红字的警句“为圆寂大师志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功德无量”、“凡沙门弟子咸宜称念生佛界菩萨摩河萨是为殊胜功德”。

在那天两次灵前献供仪式上，功德林素菜馆、香积园饭庄、森隆“素食会”，均用清音细乐送来了挂有黄缎彩绣桌围子的素祭席。白色绸带上写着“现明老和尚尚飨”。他们的经理、职工在灵前行礼后，马上就在西院设立了临时营业处，专应素祭席，并承办了今后法会的全部斋供素食。清室遗老

恽主惠等还按满族礼俗在灵前敬献了饽饽桌子，上面插了许多金团万字的供花。还有的居士、檀越送来了金字塔式的馒头桌子、鲜果桌子，上面插着象征佛度众生而自身常净的莲花、荷叶、圆寿字、团万字等金银供花。这些分别摆在了祭堂和灵堂院。由于过多，故从那天起，上下午各更替一次。

首七晚间送圣时，焚化的是一座“九品莲台”。这是僧人圆寂特用的纸活，这座莲台高约五尺左右，是两个直径约四尺左右的六角底座，中间立以六根立柱，成为下座支上座的高台，每根立柱攀有莲花、荷叶。台上正中放一牌位，上书“南山律宗临济正宗大师光德正德”广济堂上上现下明大师之位。”两旁各糊两位僧装侍者，二人执幡；二人提炉。莲台经过僧众持咒后，由鼓乐前引，四众弟子千余名列队送至北沟沿焚化。以象征现明长老位登极品，为最上乘。

“二七”唵诵《金刚经》

由11月4日至10日，即阴历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二七”期间，唵诵《金刚经》。此是禅门度亡佛事中常作的佛事。金刚经称，世界上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应对现实世界不应执著或留恋。念诵金刚经的目的在于向亡人说法，让亡人皈依佛、法、僧三宝，免入地狱、饿鬼、畜牲“三涂之苦”。对圆寂的出家人来讲，是令其加深正信，坚持正行，彻底看破和脱离红尘而一心无挂地往生西方净土。

11日为道场圆满之日，因属“双七”，根据法事委员会安排，晚间送圣仪式从简，只由继席法徒等捧圣（指给西方三圣的黄表）至天王殿前焚化，届时由官鼓大乐击鼓、鸣号，进行“接赞”，即可礼成。但是，西直门外念佛会会长刘显亮发心，送来了一对长五尺，高三尺的纸箱子，里边满装的是用往生钱叠成的镲子。所以，届晚仍按“首七”送圣之仪，由官鼓大乐前引，张显亮自己出资雇了4个人抬着纸扎银箱，后边有千余名四众弟子纷击法器，送至北沟沿广场焚化。

“三七”拜地藏忏，送焚楼库

由11月11日至17日，即阴历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三七”期间，拜地藏忏，即向地藏王菩萨替亡人礼拜、忏悔生前罪业。地藏王菩萨因有“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之愿，常住地狱拔苦。如法向其礼忏，被超度的亡灵定能往生极乐。是日，寺内道场经坛上除了加挂了许多佛画外，还张起了地藏王十二大愿伞盖一堂。据说，这是从南方寺院借来的。

本来，僧人圆寂的法事仪轨中，并没有送库之举。但因受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一些名僧、名道（如华北道教总会会长田子久）的丧事都未能免俗。

继席法徒显宗有两个女徒弟，原是西安门丁字街文记花生店的“姑奶奶”，后皈依佛教，拜显宗为师父，取法名宽琦、宽玄，又由现明为他俩授了比丘尼的具足戒。据说，在景山西街买的庙，成为该庙的主持尼僧。现明圆寂“三七”，拜地藏忏圆满送圣之日，便按民间俗礼，主动出资，给自己得戒的大和尚糊了一份送圣全活——楼二库四杠箱。但这份楼库与俗家人的不同，首先，楼库的山墙、后背一律为红色（给俗家人糊的一律为蓝色，取“神红鬼蓝”之意）。其次用的是古典宫殿形的顶子，黄地蓝瓦城；上面所有的油漆彩画没有折枝花卉和飞禽走兽的图案，而是一律仿照佛殿上的梵文经字。二层楼座是红色描金的云头装饰。下面糊成汉白玉须弥座，上面饰以白色莲花瓣。两座库上站立的库官是黄色僧装、光头。四只红电光纸的

墩箱上做出了凸起的金莲花、荷叶的图案。实是一份充满佛教教义的纸扎艺术品。

“三七”送圣——焚库仪式较前规模更加盛大。为赶在天黑之前举行，故提前在下午四点半即“点鼓”送库。法委会临时决定，部分四众弟子，可在礼成回坛后再过斋。

西四、羊市大街及北沟沿一带，自发聚集起来观礼的人群把两旁便道挤得水泄不通。由于人满为患，有的无缘到庙内随礼，于是就举上一炷草香跪于便道上，口喧“南无弥陀佛”佛号，表示祝祷现明往生极乐。这些人多是从西郊赶来的农民。

送圣——焚库行列颇为壮观，与俗家人的丧事大不相同，除了前边有传统的官鼓大乐外，后边是仿民间送圣用的纸扎尺头桌子，两人一抬，共四抬。但上边糊的既不是金山银山，也不是绸缎尺头，而是糊的僧人所特有的锡杖、拂尘、如意、手炉等法物；还有仿现明生前所用的文房四宝等物。次为数十名檀越施主自动组成的队伍，俱以四尺长的龙头棒挑挂一六角形宝盖，中心分别垂挂着黄钱、千张、元宝等“敬神钱粮”。后边还有以大白蜡杆子挑着大幅黄钱的。再次即为小沙弥十名，捧着“十供养”（每人捧一供养），一为举大藏香一炷；二为捧莲花十二朵（代表地藏王菩萨十二大愿），下缀金丝荷叶垂地；三为托铜茶盘，内放苹果、石榴、柑桔、香蕉、盖柿等鲜果；六为托铜茶盘，内放清茶一盏；七为捧铜茶盘，内放芙蓉糕、萨其玛做成的梵塔，上插五彩小旗；八为盘棒玉质十八子手串；九为托银质官宝一锭；下级象征“通宝”的铜钱一串；十捧黄绫袍一件。以上计为：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表示对地藏王菩萨的十供养。其后为八提炉（焚檀香）、八提灯（点蜡）、“七珍”、“八宝”等佛前法物；8人抬的以黄绫扎成的敞门亭盖，外镶线香，组成了各种不同的吉祥图案。内供地藏王菩萨的像。后边的千余名佛门四众弟子同声高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訶萨”。继席法徒、接法卷弟子以及现明收下的“悟”字辈弟子均捧着道场给“西方三圣”和“大愿地藏王菩萨”的黄表。后面跟着纷击法器的108众黄袍大德高僧。三位主法领杆的头前各有一小沙弥给撑着一把大伞盖，分别为黄、红、绿三色。

焚化场上，执钱粮幡的从楼库前排成双行，直至继席法徒的拜垫前。由4名“香灯”接过自继席法徒之后弟子们的黄表，送至楼库的底座上，并不举火，而是由另一“香灯”将继席法徒所捧的黄表立在他所捧的铜茶盘内点着，然后，依次引着小沙弥们举的钱粮幡，依次燃至纸库前。最后，由挑大黄钱的将楼库引着。全体送圣的四众弟子均跪地三叩。官鼓大乐止乐，僧众则打着回坛板点回庙。

水陆法会

由11月18日至24日，即阴历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初六日，“四七”期间，为追度现明长老祈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这是现明圆寂法事的最高潮。广济寺内按水陆仪轨设七坛一会，即大坛、楞严坛、法华坛、净土坛、大悲坛、地藏坛、诸经坛等七坛。一会为莲池放生会。

舍利阁多宝殿院内搭了两座大型法台，正面为大坛，礼拜《梁皇忏》；对面为讲经台，由慈舟大法师宣讲《妙法莲华经》。这里布置得极为庄严，棚壁上挂了上下两堂《水陆画》，正面为上堂，计有：诸佛像、经典像、菩萨像、缘觉像、声闻像、各宗祖师像、印度古仙人像、明王像、护法鬼神像、

水陆撰作诸大士像。两壁为下堂。计有：诸天像、山岳江海诸神像、儒士神仙像、诸种善恶神像、阿修罗像、种种鬼像、阎罗王及鬼卒像、地狱像、畜牲像、中阴众生像、城隍土地像。各经坛昼夜诵经不断，钟磬悠扬，法味充盈。尤其所焚之香，更是大有讲究，有芸香、檀香、紫降香、龙涎香，还有长约二尺，直径为四分左右的深紫色大藏香。诚是烟云氤氲，异香扑鼻。

寺内中轴线上，分别树立了二十四诸天的黄幡。东侧为：功德天幡、辨才天幡、大梵天王幡、帝释天幡、东方执国天王幡、南天增长天王幡、西方广目天王幡、北方多闻天王幡、日天幡、月天幡、金刚密迹力士幡、摩醯首罗天幡。西侧为：散脂大将幡、韦驮天幡、坚牢地神幡、菩提树神幡、鬼子母幡、摩利支天幡、娑羯罗龙王幡、阎魔罗王幡、紧那罗王幡、紫微大帝幡、东岳大帝幡、雷神幡。各殿前均添设了若干玻璃框的戳灯。据说，这是根据现明原籍及南方诸寺斋仪而设的。

大雄殿的须弥座上，对着“孤魂台”，在一个石墩上，树起水陆法会所特有的“挑灯鹤杆”。这是一根高七米（两丈一尺）的杉槁杆子，顶上是用彩纸扎成一只展翅而飞的大仙鹤，口中衔一松柏枝，枝下挂一铁环，以为滑车，用大绳穿在环内，可以上下拉动。上面吊着七盏大气死风灯，成为上下一串的形式。据说，每一盏灯即代表一永日功德，办七天水陆，就挂七盏，如是办四十九天水陆，就树七根灯杆，每杆七盏。这是清代国师达天祖师留下的仪轨。

七天当中，每于上午十点在大雄殿前，由天文主持放生仪式。前四天放的是水族动物，鱼、鳖、虾、蟹、蛤蚌、螺蛳，分别放至前海、后海、积水潭。后三天放的是飞禽鸟雀，分别采取了就地开笼放生和野外园林望海楼下（钓鱼台前）放生两种形式，每次放生都是按佛教放生仪轨进行的。院中设香案，备净水杨枝，中供观世音菩萨像。法师及四众弟子列于案前。举香赞，称圣号后，法师执水盂说水文，众随法师唸诵《大悲咒》、《心经》、《往生咒》，称念南无甘露王菩萨圣号，由法师随念随绕各生灵处，扬洒净水。然后，请圣“香花迎，香花请”；在法师带领下，众等替被放生的生灵忏悔、持咒；向被放生的生灵说法传戒，让它们皈依佛、法、僧三宝；在通过法师开示、发愿、称赞七如来吉祥名号后，始进行放生，边赞祝文：

“诸佛子等，此七如来，以誓愿力，拔济众生，三称其名，千生离苦，证无上道。惟愿汝等，既放以后，永不遭遇恶魔吞啖，纲捕相加，获尽天年，命终之后，承三宝力，随缘往生，持戒修行，见佛闻法，授菩提记，转化众生……”

祝罢，齐声唱赞：

“胎卵湿化，多劫沉迷，皈依三宝发菩提，笼网捕免离，海阔天飞，随佛生西天。南无生佛界菩萨摩訶萨”。

每于放生仪轨圆满，由助善居士们抬着木盆或鸟笼，法师等纷击法器，尼众、男女居士们随之口喧佛号，送至山门以外。官鼓大乐在山门前击鼓、鸣号，表示“接赞”。然后，由部分四众弟子将被放生的生灵装上马车，送往放生地点。

11月24日，为水陆法会圆满之日。届晚举行了盛大的送圣仪式。走在最前边的是“神耳”——大广铜锣，由二年轻僧人抬着，由后边的僧人用大“鞭”抽打，以示开道。下面依次是：香幡、筒幡各8对；钱粮幡数十对；提炉、提灯、大型气死风灯、六角玻璃手罩子各数对；二十四诸天黄幡。以

上仪仗俱由小沙弥高举缓行。还有纸扎的4匹高头骏马，完全是“翻毛”的细活（用纸剪成穗，逐条逐块地贴在纸马的纸胎上，使之成为凸起的翻毛），红、白、黄、黑各一匹，每匹各骑“曹官”一名，俱身披红袍，头戴如意翅纱帽，手执小旗，背上挎着文书褡裢，里边装着黄钱、千张、元宝等敬神钱粮。因马蹄下安有小木轱辘，故由小沙弥们牵之以行。1000余名四众弟子和108众黄袍高僧纷击法器随后。在北沟沿焚化现场上，由主水陆大法瑞祥大和尚朗读水陆大斋胜会的表文后，由“香灯”4人，各接过一表，分别掖在骑马的曹官文书袋内，始由排列成行的钱粮幡点起，逐次燃至纸马前。在千余弟子高声诵念佛号声中，礼成回坛。

是夜，108众黄袍高僧，在多宝殿前的大法台上，放了“三大士”的瑜伽焰口。

追悼会

根据法事委员会的安排，11月30日，发龛荼毗的头天，下午2时，为现明长老举行“追悼典礼”。实际上仍是宗教性的公祭仪式。是时，诸山大德，十方檀护，奔走偕来参加盛会者千余人。

会上首先由江朝宗代表法事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上香顶礼，恭读祭文：

“惟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现公圆寂法事委员会江朝宗、夏莲居、周肇祥等谨以香花百味，虔修供养于现明老和尚之灵。

呜呼！我师，南州之英。幼耽释典，早脱尘纓。阶公北游，是辅是翼。法源振衰，广济受职。教瞻兼谋，精研辄律。万千法门，融通显密。单丁举废，插草开山。昔闻豪杰，今也抗颜。一往十年，刹竿扶起。圣化风行，檀施云委。天降祸乱，忽启衅端。流离锋镝，啼饥号寒。惟师哀悯，遑问艰难。连合拯救，拨危即安。道场超度，祈礼登坛。消灾弭劫，遐迩同欢。保全实多，不懈益励。会泐利生，规模远大。念彼残黎，得所芘赖。九传大戒，两造精蓝。经营济度，仔肩荷担。屈己宏道，誉盛弥谦。以师槃才，尚肯用世，何功不成，何求弗逮。儒门淡泊，言归大雄。慈善喜舍，贯澈初终。虽休勿休，尽瘁厥躬。乘愿而来，随缘示灭。因果循环，百年一瞥。佛道无上，众生无边。誓愿未竟，成佛不先。师之福德，感动人天。师之行业，薪火永传。靡有遗憾，复何恫焉。尚飨！”

次由弘慈佛学院主讲马振彪代表佛学院全体师生上香顶礼。恭读《祭院长现明公老和尚文》：

“懿欤大师，为出家雄。衡岳开士，驻锡燕京。显密交修，性相融通。十数年前，曾参弹室，一见心倾，话言累日，语我法华，为说一乘。岁建道场，瞻礼生信，华严璀璨。大启庄严，两番随喜。七七维虔，坛前开示。洞澈人天。我有深愿，瓣香默祷，乞佛垂慈，卜先人兆。冬归雪野，春冷山荒。一载经营，马鬣封完。佛恩难报，结素铭丹。我悦禅心，师媿儒学。宏法资粮，文字般若。载道传经，云胡可略。鹿牺揭奥，大易渊涵。孔孟正宗，五子荷担，千秋一脉。师欲亲探，佛院宏规。圣佛兼理，以礼为罗，滥竽兹始。共学三年，谈经济济。何意浮屠，引为知己。我客津沽，师盼来游。屡愆师约，予志踌蹰，昨岁诣院，复践前诺。籍习性功，求通佛学。师旋示疾，供养愧薄。闭关养痾，挥尘从容。时招晤对，饌约意丰。更延高士，易阐奇门。吉凶何筮，履道何穷。毁不撻辱，誉亦何荣。生死来去，不胶于胸。性道得闻，万劫朝昏。色身有尽，慧命无终。虽则无终，四众感泣。问法未由，仰天太息。昔拜华严，身入经中。今读法华，师在殡宫。以此回向，师证无生。

曩时度众，高掌遐瞩。盛会肩摩，士女礼肃。如川汇海，如响应谷。今也西归，僧俗同患。泪雨纵横，悲风飘忽。功德圆成，慕思何极，既感契深，亦愴于文。心香膜拜，神其来歆。”

再由吴兴李升培恭读《追悼现明法师诔词》：

“ 繁惟法师诞生衡岳，久驻燕都。以智慧之夙根，遂皈依于佛法，道行高洁，法力宏深。广济宝刹，两度兴修：水陆道场，几番启建。运广长舌，宏佛法之宣扬，具菩提心；愿众生之普度。是惟五蕴皆空，用致群伦共仰。方谓寿登耄耋，孰知光灭须臾。追溯生平，弥深悼惋，敬为词以诔之。词曰：

卓哉法师，佛门长老。宿慧根深，慈悲怀抱。祁阳出世，方在英年。精研佛法，遍礼名山。独任仔肩，琳宫再建。道愿弥坚，伟功实现。创修学院，教育僧徒。救济灾难，誉满燕都。宏法利生，心弹力竭，果证涅槃，黄花晚节。不生不灭，善果善因。拈花佛座，永作天人。”

再由赵岫春恭读《现明法师挽词》：

“ 惟师钟南岳之秀气兮，早披剃于祁阳。受具足于西禅兮，参佛理而礼空王。领要职于钜刹兮，传大戒于山乡。受阶师之衣钵兮，善继述而理宗纲。拜普陀于海壖兮，访名宿于各方。既功行之猛进兮，究诸宗之典章。乃北来以宏法兮，开水陆之道场。作主持于广济兮，值梵宇之就荒，乃能支艰钜，耐悲凉，整清规，肃僧常。朝暮之课诵兮，历寒暑之星霜。焚修膜拜，祈福度亡。得社会之信誉兮，博世人之揄扬。适欧战之酣烈兮，将士之死伤。爰本平等慈悲之怀兮，建大斋而素旆高飏。泊乎时局之粗平兮，始兴土木而饰殿廊。修香积之厨兮，造净业之堂。法像庄严兮，庙貌琳瑯。设弘慈之学院兮，创佛教之序库。云何赤燄之忽降兮，毁法典之宝藏。群僧惶惑几于星散兮，师独镇定而安详，说生灭无常之理兮，誓志中兴而奔忙。有志者事竟成兮，越四载而法殿重光。膺佛会首席执委兮，谋宗风之发皇。嗟事变之突起兮，难民糜集京郊而彷徨。亟联合檀越与护法兮，作救济之主张。设所以收容穷黎兮，供衣食而医治疮伤。更组利生之会兮，发菩提之心肠。老而弥笃兮，昕夕不遑。方期大寿以广度兮，何意好月之难长。倾说法之崇台兮，灭传灯之光芒。一笑西归兮，犹持念于匡床。覩图象之俨然兮，写灵风而不忘。惟师回旋于极乐净域兮，永为苦海沉溺众生作慈航。尚飨！”

最后，由继席法徒显宗致答谢词。随后，净土坛上 108 位大德高僧敲响法器，口喧佛号，率领四众弟子至五观堂过斋。恭请青岛湛山寺倓虚老法师为现明老和尚追悼会设斋上堂说法。老法师登座后，竖拂子云：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遍周法界，同应乎中。今日良辰，为本寺广济堂上上现下明老和尚圆寂，建设追悼道场。诸山长老云集，四众弟子聚会，檀越致祭护法降光，同临法会。奠礼拈香。本寺住持显宗和尚暨四众弟子，敬备上堂千僧大斋一堂供众。植福培因，普结胜缘。以此功德，回向三有六道四生登觉路，九幽十类孤魂证菩提。法界冤亲，一一悉登彼岸。蠕动含灵，在在共出迷津。干戈化为玉帛，厉气变作祥和。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以满现公老和尚生前之慈愿，殁后之悲心。请老僧上堂说法，利益人天。转三惑成三智，修三行证三德。三灾消于无形，八难弭于未起。总在冥阳两利，且当如何说之？窃想老僧未上堂时，说法已竟。须知寒风飒飒时；溪声潺潺时；渔人唱晚时；樵夫晨歌时；鸡鸣狗吠；妇噪儿啼。何时不是老僧说法呢？诸上座会得么。

说至此振拄杖云：

鱼跃水兮鸟翔空，歧路且莫问西东。狮子咬人卢逐块，拈来物物入囊中！老法师讲罢，始开斋供众（五观堂是中心斋堂，其它斋堂同时开始）。这次供斋主要是对参加盛会的总答谢。斋罢即当送圣——祭焚法船。

“五七”拜净土忏，送焚法船

从11月25日至12月1日，即阴历十月初七至十月十三日，“五七”期间礼拜“净土忏”。开坛之日，四众弟子齐聚灵堂院举行了隆重的上供仪式。月台下，设素筵祭席三桌；时令鲜果一桌；应时糕点一桌。继席法徒显宗上香设拜后，恭读了《祭现公老和尚文》：

“惟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初七日，法徒显宗顶礼陈词敬奠于我上现下明传法恩师之觉灵而言曰：呜呼！我师付法于显宗，于

今十有三年。有长养教诲之恩，有芘荫提携之德。而今已矣。显宗于师亲承绪论，步趋巢窠。侍疾以来，愧无丝毫涓埃之报。不能致吾师久延于世，以满慈悲之宏愿。静言思之，潜焉出涕，罪戾深矣。显宗隐薄能鲜，受兹付托，时以不克负荷为惧。惟我师指导而扶掖之。显宗学识浅闇，于大乘经典未能深入，惟我师训迪而诱进之。中更祝融之焰，竟罹焚如之灾，殿阁残毁。显宗不克尽提防救护之责。惟我师引躬自咎而慰藉之。瓦砾荒凉，飘摇风雨。显宗不克尽补造复兴之力。惟我师呼吁募贖，鳩工庀材而落成之。世变日亟，玄黄易色，膏液润野草，疮痍遍燕冀。显宗董理僧伽，不免施救济利生之术。惟我师提倡助賑，慷慨援手而周全之。凡显宗才力所不逮者，莫非我师之助；凡内外事业所能济者，莫非我师之功。今者，我师随化归尽，乘大愿船，游大觉海，种大菩提树，登大宝莲台；与我如来，亲证无生法忍。显宗攀号莫及，呼抢无穷。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谨求胡妙观老居士，为我师撰行述一通。以垂久远。并于本寺中虔修法事。每七唵经拜忏，广建水陆道场。五七以内，延请有道大师，讲经开示。以慰我师普度众生之愿于万一。择于十三日说法起龕，奉归塔院。恪遵茶毗仪轨。自今以往，我师浩气还太虚，精神会于无为之舍，法身住于常寂常光之土。呜呼！我师实鉴临之。”

佛家所谓“法船”（11），乃是一种比喻。但在老北京烧法船已化为一种民俗。因此，四众弟子发心为现明长老糊了一只像显宗在祭文当中所说的“大愿船”。决定在11月30日，发龕茶毗的头天，结合送圣，一并祭送法船。以便让现明长老“游大觉海”直“登大宝莲台”。

本来，一般安排在水陆大斋圆满之日，因现明长老的法事在水陆大斋之后，还要拜一“七”的净土忏，故决定最后一起祭送法船。以圆全部法事之始末。

为现明长老糊的法船长两丈一尺，高一丈一尺。船身深黄色，底部为彩绘一尺二的海水江牙，中为以莲花瓣组成凸起的二龙戏珠图案；船舱为三层古典楼阁，顶子为一殿两卷，黄地青蓝色的瓦垅。二、三层的红色楼座，绘有金色云朵，楼身敞开。下层糊的是十殿阎君（即秦广王蒋、楚江王厉、宋帝王余、五官王吕、阎罗王天子包、卡城王毕、泰山王董、都市王黄、平等王陆、转轮王薛）朝地藏王菩萨。中层是十六尊者（即罗汉宾度罗跋罗情阁、迦诺迦伐蹉、迦诺迦跋厘情阁、苏频陀、诺讵罗、跋陀罗、迦哩迦、伐睺罗弗多罗、戌博迦、半托迦、罗睺罗、那迦犀那，因揭陀、伐那娑斯、阿氏多、注荼半托迦）；上层是西方三圣（即：中为阿弥陀佛，左胁侍为观世音菩萨，右胁侍为大势至菩萨）。櫓亭顶上还落着大鹏金翅鸟。船头甲板上糊了四位僧装侍者执幡接引；船尾甲板上糊有护法四名。船舱两面各有划浆的水手八

名；船头有行者装扮的开路神一名。按佛教的说法，这种法船是“净业船”的一种，是渡生前修行，功圆满，去西方朝佛证位的；既是超度现明长老的法船，又是超度一切善人的法船。所以是为现明长老作的身后功德。

送焚之前，法船摆在了天王殿前的空地上。数百名僧众三次绕船持咒，由领忏的三名大和尚，澄心观想（想象现明长老同十方善信觉灵同登极乐世界），施洒了甘露净水，并在船上以弘慈广济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的名义张贴了黄纸“船照”和“榜文”。

广济寺山门外迤西，六和大院口上，自11月27日就亮出了一份拴好的48人大杠（按弥陀如来四十八愿之意），架在亮杠专用的“金墩”上，每角一墩。金墩高二尺，狮子头，须弥座，贴箔罩漆，金碧辉煌。红漆大杠上扣着一卷黄缎绣着梵文经咒的官罩。罩片乃是四众弟子主动出资现做现绣的。罩顶上按着金箔罩漆的柳叶尖式大“火焰”顶子，罩架四角安了龙头兽头兽口，下面挂着彩色的绉穗葫芦。大杠的四角上各放红漆执事架两座，每座各插“拨旗”两面，两红、两蓝，俱为白光，上书“庆升杠房”。原来这份大杠是西四羊市大街路南中央医院（今人民医院）对面庆升杠房承办的。已于送圣前四天（连同发龛为前五天）就摆了出来，等待“五七”送圣——送焚法船队伍的“检阅”。

祭送法船时，已是万家灯火了，故临时赁来庆升杠房的大白气死风灯8盏；六角玻璃框罩点蜡的手罩子16盏；寺内水陆法会戳灯数十盏。亮杠、亮罩的地方，周围加了水电石灯4盏。法船由西四某电料行在每层舱楼楼台的周围，加了干电池的小电灯。一片灯火，交相辉映。

“五七”送圣——送焚法船的行列，一如前次水陆法会送圣。走在最前边的是，二人抬红绸金字大型牌匾，上书“为弘慈广济寺现明长老圆寂祈建水陆一堂”。其依次为：

一、广铜大锣四面开道，锣上红漆字，上书“水陆大斋”，两人抬一铜锣，由后面人以大鞭子抽打。

二、水陆法会戳灯48盏，每4盏为一排，每排为12盏。

三、红、蓝、白、紫四色缎绣引幡，每色27把，是为一组，共108把。均由寺僧手执前行。

四、檀香提炉、紫降香提炉、云香提炉各16对；挎盘檀香炉、紫降炉、云香炉16对。均由小沙弥提挎而行。

五、执大藏香、龙涎香，男、女居士数百名。俱身着海青大袍，外搭紫红纓衣。

六、官鼓大乐一班。拉号一对，挂素围子的官鼓四面、锁呐、海笛、笙各一对、跟锣一面。共计13名。

七、高杆大型气死风灯8盏，由杠房执事夫穿孝高举而行。

八、阜成门内大街妙应寺（即白塔寺）送番经（喇嘛经）一班。共21众：“刚冻”——长丈余的大铜号一对，由二人牵引，二人吹奏；大炳鼓一对，由二人肩杠，二人以弯勾形鼓槌敲打；海螺号一对；锁呐、海笛各两对；铙钹各两对。俱穿黄袍，头戴黄秋帽，最后两番僧戴大鸡冠帽，主法放正的大喇嘛为桃形帽。一如雍和宫每年正月底“善愿日”大法会——演鬼、打鬼的格局。

九、东直门内王大人胡同广通寺尼经（尼姑经）15众。引磬、木鱼各一，铛子两对，钹子两对，法鼓两对。放正的执手炉。俱为灰袍、红袈裟，双行

前进。

十、西安门华北居士林优婆塞（男居士）经一班。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钹子两对；法鼓两对，领众的大居士执手炉。均身穿海青大袍，披紫缙衣，头戴青毛线织的如来帽。后边跟随着穿袍搭衣，手执念珠的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百余人。由周叔迦具体指挥。

十一、北京菩提学会、三时学会，北京各居士“莲社”、各念佛堂、念佛会、素食会等民间佛教组织的成员数百人，均手执大藏香一炷。

十二、水陆法会戳灯 48 盏（按弥陀如来四十八愿之意）。每 4 盏为一排，每排为 12 盏。

十二、水陆法会特有的仪仗——二十四诸天黄云缎大幡 24 幢，具由寺僧高举前进。

十四、送圣的社会名流人物；各大檀越施主数百人。

十五、弘慈佛学院、律学院、法源佛学院全体学僧、佛教利生会全体弟子、莲池放生会全体同仁约数百人。

十六、继席法徒显宗双手捧着铜茶盘，内放圆寂大师牌位。

十七、接法卷弟子梵月双手捧着铜茶盘，内放喇嘛用酥油合面（巴拉面）捏成的灯、塔。

十八、接法卷弟子天文，以及“悟”字辈的弟子们俱捧着各大经坛道场的黄表，排成一直行，由两名僧人侍者搀扶以行。在他们的行列两旁伴有大型气死风灯 8 盏。

十九、主体道场数百名僧众。因为以广济寺为主的各大寺院经班僧众过多，故不再按传统习惯分班。只由 108 众“黄袍”纷击法器领先，后为各大寺院僧众，俱搭比丘具足戒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走在最后边的是三位领忏主法的大和尚。一位执手炉，一位执如意，一位执锡杖。每位大和尚的头前，均有一小沙弥给张举一柄大伞盖，分别为黄、红、绿三色，上书“弘慈广济寺”字样。

北沟沿以南，丁章胡同东口早已戒严。法船被提前一小时就分截运来，码在大道中间，船的周围插满了立体的大朵粉、白两色的莲花、大绿荷叶。

北京市警察局临时派员进行弹压，一律举着长长的白蜡杆子，杆的顶端糊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民间水会、消防队举的白蜡杆子顶上糊成了轮、螺、伞、盖、花、罐、鱼、长的“金执事”。分成两班，列队于法船的两侧。他们举的白蜡杆子糊成的“金执事”是用来压烧活，规弄火灰用的。这是焚化大型纸扎所特有的设备和排场。

当送圣队伍到达现场后，抱牌、捧圣的继席法徒即跪于离法船 50 米以外的灰色拜垫上。所有致送的全体僧众、居士、檀越几乎都随之而跪于地下。108 位黄袍高僧纷击法器，绕船持咒，复由小沙弥挑来一担清水，由二僧尾随转咒的行列，往地下倾洒，以象征汇成水路，以资行船。随后，由 5 位“香灯”将圆寂大师牌位及道场呈送西方三圣的大表，放在船舱内，举火焚化。顿时。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纸灰腾空数丈。喇嘛的大号、海螺、僧众的铛、钹、鼓、镲响成一片。经声佛号，震彻夜空。

礼成，消防队接通水龙，扑灭余烬。所有僧众、居士均整整齐齐排成双行，由 108 众黄袍僧，打着回坛板点，回到了广济寺。紧接着即由拈花寺全朗法师在药师殿前大法台上向四众弟子宣讲《无常经》。

随后，“七如来焰口”（法事委员会原安排为“五方焰口”，后改放“七

如来焰口”）即开始拜座。七位主法的金刚上师头戴五佛冠坐在焰口座最上层的正面，成为七个幡门。这七位金刚上师是拈花寺方丈全朗；柏林寺方丈福振；龙泉寺方丈百川；贤良寺方丈星朗；嘉兴寺方丈崇辉；长椿寺方丈深慈；圆广寺方丈桐缘。焰口座分为三层，上层是主法的七位金刚上师；中层是拨文、念文和陪座的僧众。经案上供着地藏王菩萨的立体坐像，上有缎绣宝盖一幢，前有五方童子执旛，上书五方佛的名号：即东方世界阿閼佛；南方世界宝生佛；中央世界毗卢佛；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北方世界成就佛。下层是陪忏的僧众。（全堂焰口计有金刚上师七位、击法鼓、忏钟的一位，拨文、念文各一位、陪忏 38 位。共 48 位）。座下的上首还搭着一毗卢帽式的经龕，内有“监经长老”三位。他们是潭柘寺方丈茂林；净莲寺方丈慈舟；卧佛寺方丈清池。

焰口之前加了传灯（观灯）佛事，诚演《地藏十王宝灯》科仪。这与俗家人用的传灯焰口不一样。俗家人是在灵前与焰口座之间拉上两根老弦，弦上有两个古装童男、童女模样的“灯人”捧着灯盘一上一下地进行传灯。而给现明长老作的燃灯佛事却是由 100 名比丘尼，手持一朵大佛座莲，花下垂着金丝荷叶和小朵莲花，直垂脚面，大莲花中间插上半支蜡烛燃点起来。在台上僧众唪经时，手执莲花灯盏和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十供养”的比丘尼们排成一直行循环绕佛。为了加强法事的意境，还加了拈花寺、嘉兴寺、智化寺、九顶娘娘庙的梵乐，以为对佛的供养。据说，民国以来，只有现明长老圆寂和现明长老的姐姐——显宗和尚的母亲（比丘尼）圆寂时，放了这种形式的传灯、焰口。按当年市价办这样一桩佛事，得花银元 2000 多元（一般俗家人请九众和尚放台焰口只不过 24 元）。

那天夜间，数百人赶来观礼，因为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盛举。搭在房上的经托子，临时都成了各大诸山长老和护法大居士、大檀越、社会名流、各大报馆记者们的观礼台。

庄严隆重的发龕、茶毗仪式

散了焰口，马上在西方丈院举行了隆重的辞灵献供仪式。由 108 众黄袍大德高僧诵经转咒后，天已大亮，广济寺内外已是人头攒动，前来等候“发龕”的各界人士和佛门四众越聚越多，可谓盛矣。

是日，天气晴和，阳光四射，风歇尘息，使得 5000 余众衔哀恭送者，免受天寒之虐苦。时人谓，现明老和尚既有人缘，又有天缘，真乃“人天感应”。

根据法事委员会的安排，上午 9 时起龕出堂。先由 16 名身穿绿驾衣，头戴青荷叶帽，插着冲天锥式红翎的杠夫至灵堂圈了“活绳”，继席法徒显宗、接法卷弟子梵月、天文跪在灵龕的最前头，后边依次是现明生前收的弟子，以及皈依他的在家学佛的男、女居士、檀越施主。13 名官鼓大乐在三声大锣之后，鼓号齐鸣。继而送龕经班梵乐大作。这时，被显宗、梵月事先敬请出来的青岛湛山寺倓虚老法师手拄禅杖，站在当中，为现明长老起龕说法。乐止，他首先振拄杖，朗声高诵偈子云：

“示‘现’比丘身，昌‘明’菩萨道。慧‘光’照大千，福‘德’呈预兆。”

这是一首以圆寂大师“现明”（号），“正德”（名）镶嵌而成的赞偈，乃融佛学，文学为一体之大作也。接下去，他手扶锡杖，立于脚尖，宣读了

事前写好的《法语》：

“恭维广济堂上宝华正宗圆寂第十七代弘法沙门现明光德老和尚觉灵入寂，四大归空。住世花甲，随缘度生。中兴广济，重建大雄。伟哉大业，独让现公。接人应物，措置有方。创立僧

校，道风远扬。观机已尽，示疾生西。付嘱得人，绍隆无疑。今日发龛，诸缘已毕。复佛使命，善去善去！临行送公两句话：且道作么生？！”

朗诵至此，将锡杖举起用力往地上一墩，随着哗愣一响，法师又道：“方才放下千斤担，撒手归兮月正圆！”至此，复将锡杖用力一墩，大喝：“起！”四众弟子马上站起，一齐随着经班高举赞偈，同诵“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訶萨”。这才由 16 名杠夫把夹杠上肩，将现明的灵龛抬出灵堂。继席法徒显宗、接法卷弟子梵月、天文俱身穿灰孝，左手执着黄绫引魂幡，眼含泪花，高声诵念：“南无阿弥陀佛，广济堂上上现下明中兴祖师归位！”

灵龛出堂后往东，下了药师殿的台阶，出东角门，一直奔南，经圆通殿、大雄殿东山墙，出天王殿的东过堂门，至山门前东边的“毗卢性海”门。门前杠夫们早将黄云缎的大罩堵在门口了。里边横着用了两根“龙门耙”，直接使现明的灵龛进了大罩。这时，大杠被另一班杠夫抬了起来，去找大罩和灵龛。

杠前烧了一些纸，都是用红纸剪成的蛛网兜若干兜，每兜内装着 108 张黄纸往生咒叠成的元宝、镲子；还有从灵堂、祭堂撤下来的金银供花和灵花。但没有按照俗家人出殡扬纸钱，让杠夫喊“加钱儿”等仪式。发龛行列排出三里地之遥。其顺序是：

一、挽联群。多为“政界要人”社会名流的挽联，平排上下两联而行。

二、匾额亭。以素彩扎成，古典宫殿式，敞门，匾额放在其中，左右均露于亭外，恰好突出上下款。每亭 4 人抬，约十数亭。

三、现明生前所得的万名旗、万名伞、锦旗、锦标。这是他生前两次修建广济寺、“七·七”事变赈济救灾、历次传戒以及 60 大寿时四众弟子、诸山长老、社会各佛教团体赠送的。还有是他圆寂后，各方人士为表彰其生前弘法利生的功绩而敬献的。万名旗、伞为黄云缎地子，上缀五彩的名签，间有不同的题词赞语。其行进顺序是按其生平历史安排的：

1、天运丙辰荣膺弘慈广济寺方丈升座大典纪念旗、伞；

2、七坛千佛大戒，培育僧才，功德圣迹旗、伞；

3、两次重修梵宇，中兴古刹，功德圣迹旗、伞；

4、慈善利生，救灾赈济，功德圣迹旗、伞；

5、功圆果满，大德隆恩万名旗、伞。均为若干把。

四、红缎绣花经幡 12 幢，由寺僧等擎举前行。

五、紫缎、蓝缎绣花片幡 24 把，由执事夫穿孝擎举前行。

六、香幡（高档冥活）。以白缎为幡，用彩色线香在幡上镶成各种图案。由执事夫擎举前行。

七、官鼓大乐一班。拉号一对；官鼓 4 面；唢呐、海笛、九音锣各一对；跟锣一面。共 13 名。俱头戴清制官帽（去缨），身穿绿驾衣。

八、阜成门内大街妙应寺番经一班，俱身着黄袍，披红哈达，头戴黄秋帽（放正的头戴桃形帽），足登青缎子靴。未用法器。

九、东直门内王大人胡同广通寺尼经一班。俱身着灰袍，披红缎金线福田纹袈裟。未用法器。

十、西安门华北居士林优婆塞经一班。俱身披青袍，披紫红色缦衣，头戴青毛线织的如来帽。未用法器。后跟散众百余人。

十一、各居士莲社。西板桥长春寺内的太虚莲社经班；大六部口报恩寺内的清静莲社经班；崇文门外花市妙德莲社经班；弘慈广济寺净业莲社全体。

十二、西直门外念佛会全体成员。由会长刘显亮领班。

十三、东安市场森隆素食会全体成员，由张森隆领班。

十四、檀香提炉、紫降香提炉、芸香提炉各 8 对，由小沙弥提之以行。

十五、水陆法会二十四诸天黄幡 24 把，由小沙弥 4 人一排，高举前行。

十六、为超度现明长老弘慈广济寺祈建的水陆法会主体道场大德高僧、诸山长老、大法师。躬亲致送的有：东直门内西手帕胡同净莲寺方丈慈舟；旧鼓楼大街大石桥拈花寺退居方丈全朗；西山上方山兜率寺方丈清池；怀柔红螺山资福寺方丈常福；朝阳门内南小街弥勒院方丈、第五代禅宗传人真宗；青岛湛山寺方丈倓虚；前海鸦儿胡同广化寺方丈玉山；王府井校尉营内东冰渣胡同贤良寺方丈星朗；西直门外曾家庄觉生寺方丈体仁；东四北广善寺方丈慧三；拈花寺方丈量源；通县燕郊镇天齐庙方丈宽谛；西直门外高粱桥北广通寺方丈性然；香山八大处二处灵光寺方丈丛棠；西郊万寿寺方丈宽祥；西城锦什坊街华嘉寺方丈常悟；退居方丈道禅；西直门外极乐寺方丈灵云；宣武门外宝禅寺方丈善周；交道口南大佛寺方丈纯山；石驸马后宅石灯吉祥寺（庵）方丈印智；陶然亭龙泉寺方丈百川；阜成门外圆广寺方丈桐缘；安定门内柏林寺方丈福振；交道口南大佛寺佛经流通处经理如实；沙窝药王庙方丈德缘；前海瑞应寺方丈兼佛学院教务处主任保林；西郊潭柘寺方丈茂林；西黄城根嘉兴寺方丈崇辉；香山八大处香戒寺兼其下院沟沿翊教寺方丈德福；东直门外延寿寺方丈证和；交道口前圆恩寺大慈庵方丈慧果；宣武门外老墙根广惠寺方丈瑞祥；北沟沿东观音寺方丈玉玺；西直门内翠峰寺方丈（比丘尼）悟隐等约计 200 余位。

躬亲致送的还有广济寺、法源寺的全体僧众，包括现明生前收的弟子“悟”字辈的：悟林、悟圆、悟霞、悟仙、悟凯、悟平、悟和、悟性、悟华等 20 余名；继席法徒显宗收的“宽”字辈的弟子们数十名。

十七、弘慈佛学院、律学院、法源佛学院全体学僧、佛教利生会弟子、莲池放生会全体同人。

十八、北京民间佛教团体、名流居士、檀越。有三时学会会长、创办人韩清静；华北居士林董事会主席崔云斋、夏莲居、佛教同愿会工艺传习所所长田克明等，约计百余人。

十九、社会知名人士。华北道教总会副会长、地安门外火神庙方丈田子久、永定门外二郎庙侠持张子余、西便门外白云观住持安世霖。前任、现任商会正副会长孙学仕、冷家驥、邹泉荪等。《实报》社社长管翼贤、《晨报》社社长宗威之，名医萧龙友，律师凌昌炎、马仙源，梨园名伶李万春、余叔岩、尚小云、言菊朋等。各界名流约数百人。

二十、提炉（内燃檀香）4 对；提灯（内燃蜡烛）4 对。

二十一、影亭。以素彩扎成古典宫殿顶，敞门，下为须弥座。内悬现明长老放大照片一幅。由穿孝的抬夫 8 名肩抬行进。

二十二、民国 5 年（1916 年）现明长老荣任广济寺方丈时的“宝座”。这是一把圆形的大太师椅，两旁的扶手雕有龙头装饰。座上有黄垫。为 8 人抬昇缓行。

二十三、素彩扎成的配亭 4 座。俱为 8 人抬。

- 1、更衣亭：内供现明生前的僧袍、袈裟、僧履、毗卢帽等（一座）；
- 2、四宝亭：内供现明生前用的笔、墨、纸、砚、经书、印章等（一座）；
- 3、法物亭：内供“佛、法、僧三宝印”一颗、锡杖、拂尘、如意、具、铃、杵、铍、手炉等（两座）。

二十四、继席法徒显宗头戴灰孝帽，身穿毛边灰袍，腰扎灰带，脚穿灰僧鞋。左手执黄绫子的牌子幡，上书“广济堂上上现下明长老之灵引魂幡”，莲座下边四条是佛家偈子：“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接法卷弟子梵月也穿了同样的毛边灰孝，左手执一黄绫子的牌子幡，上书“法源堂上上现下明长老之灵引魂幡”。均有二僧侍者搀扶，缓步行进。

其他“悟”字辈的弟子们均穿缙边灰孝，有袍无带。徒手而行。

二十五、盘炉 48 名。有如俗家出殡之小囍，均为十几岁小男孩，身穿灰中褂，头戴清制官帽，身挎一木盘，内设檀香炉一尊、檀香丁、檀香面、引香面、炭筋各一盘。边走边燃点檀香。杠、罩前每侧各 24 名，由两名穿孝的执鞭压差，以藤鞭指挥前进。

二十六、48 名杠夫，头戴黑色荷叶帽，上插红雉翎，身穿绿驾衣，土黄色套裤、新青布靴。事先，已应法事委员会庶务处要求，斋戒、沐浴、剃头、全身普新（指衣服鞋帽全新）。杠夫们抬着一副大杠，两根“大棍”（主杠）头上，盘龙形状的“吉脸子”及“大棍”后尾，均用黄绫子包上，各绣一红字：“阿”、“弥”、“陀”、“佛”。杠上黄云缎罩内是现明长老金丝楠“躺龕”。罩的四角各有一杠夫用黄绸子往后拉拽，成为一顺边的形式，谓之“拉幌”。杠的四角各有一名执鞭压差和一名打响尺的杠头进行指挥。大杠两侧各有人面红、蓝两色的拨旗。因为承应这副大杠的庆升杠房经理卢振东是佛教居士，故志心发愿，除杠夫的工钱外，所有的家什、设备，不取分文。本来，一般大杠出城过了小关就要换成小杠，但现明这副大杠却是 48 人一抬到底。

二十七、现明长老圆寂法事委员会执公车若干辆，均挂灰布彩。

二十八、“政界要人”及社会名流汽车、保卫车、四轮马车等数十辆。

二十九、北京市警察局弹压车；特派巡逻车若干辆。

三十、北京市消防队消防车。

发龕路线是法事委员会根据沿途路祭情况决定的。躺龕升杠后，沿羊市大街北侧（当时以左边为上行道）东行，至西四牌楼往南，经由西四南大街、进丰盛胡同东口，出西口至北沟沿南段（今太平桥大街）向西，经由阜成门大街，出阜成门至白堆子弘慈广济寺塔院茶毗（火化）。

西四至西单的这段路上，两侧便道，由市长、市政机关、各行各业临时设的茶桌、路祭桌鳞次栉比。许多由芦沟桥一带赶来的乡民，都长跪于路旁，嚎陶大哭。有的自动扯了灰布为现明和尚穿孝，感谢他在“七七”事变战乱中的救命之恩。有的还带了高粱、小米之类的五谷杂粮，扬洒在杠、罩经过的马路上，让鸟雀啄食，以此为现明和尚作些施舍众生的身后功德。

法事委员会原计划大杠要走旧刑部街，以便经过卧佛寺街东口，因为卧佛寺街有座鹫峰寺（即卧佛寺），是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祠的下院，是现明和尚第一大弟子宗月和尚主持的庙，宗月于现明和尚迎三送路之日圆寂后，刚刚发龕茶毗十一天，他的继席法徒纯度准备在卧佛寺东口举行路祭，后来

考虑卧佛寺与旧刑部街交界路口狭窄，故临时改在丰盛胡同西口搭路祭棚一座。所以大杠也就从西四南大街进丰盛胡同东口，出西口。纯度率蛮峰寺全体寺僧在那里搭衣迎灵、转咒。

灵龕出了阜成门之后，还距白堆子火化场有 8 里之遥，中间每隔一里地即搭设粥棚一座，敞开为送丧的人施舍上等面粉的馒头和米粥。据说，这都是各大居士、大檀越施主集资承办的。

下午 1 点半，到达了白堆子弘慈广济寺火化场。那里有座高约五米的石座砖身的“毗卢塔”，塔内已堆满了木柴，并且浇上了火油，柴上为一大洞，叫做“化身窑”，窑内有一铁篋。现明长老的躺龕当即被请入窑内，然后关闭了上面镌刻着“五蕴皆空”四个大字的塔门。

茶毗仪式由倓虚老法师主持。举火前，老法师首先在炉前说法。其《法语》云：

“恭维现公老和尚，觉灵寂照，圆闻圆知。涅槃经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如法发龕，举火茶毗，身入化境，涅槃无余。今日举火，且道么生。”

说至此，振锡杖作响。复高声朗诵道：

“大性无情寄诸缘，无人无我遍大千。对治众生情不尽，光风霁月莫流连！”

随后，亲自点燃火把，高高举起，跑至茶毗炉前，大喝一声：“看火！”顿时，烈焰熊熊，青烟缕缕，直升云霄而去。

1000 余名四众弟子齐举《香赞》、《菩萨托》“杨枝净水”继而高诵《弥陀经》、《心经》、《往生咒》，表示“万法皆空”。复由全朗法师“开示”，讲述现明长老年平业迹及佛门“警句”。最后，齐声唱念《觉灵赞》：

“‘觉灵寂灭，四大分张，六根清净证无常，一心悟生方。返照回光，逍遥到西方。南无升佛界菩萨摩訶萨，南无摩訶般若波罗密。”

茶毗仪式礼成后，四众弟子马上回到了广济寺，在大雄殿里进行了圆满普佛。随后，由继席法徒显宗捧着现明长老的牌位至天王殿西侧的祖堂安位。至此，历时 35 天的现明长老圆寂法会宣告功圆果满。

捡骨入塔

根据佛祖遗制，僧人圆寂茶毗（火化）后 7 天筛灰捡骨，收舍利子，以验其德。所以 18 日现明老和尚的继席法徒显宗、梵月，以及弘慈佛学院主讲道源法师、大居士周养庵等数十人莅塔院筛灰捡骨，获舍利颇多，颜色各异，大者如梧桐子，小者如粟米。其光泽亦隐曜不一。还有牙齿十数颗，因质坚而未烧坏。四众弟子见此皆转悲为喜，颇为欣慰。认为是“现公清修苦行始终严密之结果”，是现明“功德之结晶品”，“以为此必大众精诚及现化功德二种集合，成就往生净土之果也。”（12）

次日（19 日），为现明长老灵骨入塔之辰。弘慈佛学院全体师生，一早即到塔院再次筛拣舍利，共得 1000 余颗，其他四众弟子所得亦无计其数。

现明长老的塔已事先修好，是一座以汉白玉精雕而成的藏式宝塔，高丈余。与法源寺内西塔院道阶长老的塔完全一样。

下午 1 时，举行现明长老灵骨入塔仪式。四众弟子及各界前来瞻礼者数百人。入坛时，各待所拣舍利轮流投入。然后，由继席法徒显宗亲手捧坛放

入塔内的石质莲花座上。一时经声朗朗，佛号扬扬。恭送灵骨入塔安葬，及僧家人生最后之一著，至此，为现明老和尚所作的法事，整合七七四十九之全满大愿。

据载，凡与现明长老有缘者，皆各获舍利，弘慈佛学院学僧亦如此。学僧雪明《记现公荼毗入塔事》写道：

“诸同学与现公因缘甚深，所获舍利，超胜常人。余发意欲得舍利六粒则愿满，以表余修六度之诚。至时默持佛号，诚恳收检，得舍利十余倍，向余争求者不乏其人。吾留五十二粒，以表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五十二法位。余皆供养信好者，令其善根永种，发心修向。余所留之舍利中，有一粒互具五色，大如绿豆，有一粒大于小米，黑而发光，非常圆润。有一粒小如莞豆，色白带黑。更有一粒大于绿豆，色如桑椹，亮晶隐曜，宁非随人本源心地显示软。其余几十粒有翠绿色、白色、黑色、黄色、血色等。此外，留有舍利花、舍利块，颜色各别。见者欣敬。更有骨花一朵，其白如雪……”（13）

其他各学僧亦获舍利若干。归来后，俱购请小水晶塔一具，内垫名贵的藏红花，复将舍利安放其中，以便长期供养。之后，又在学院法师启示下，发起出资共造水晶塔一具，供于院中，以资日日瞻礼，作为“弘法利生”的永久纪念。

肖承熹。《记杨小楼、吴佩孚与现明和尚的三次大发表》。《燕都》，1987—4。1987第2期。第13—14页。

按佛教的说法，舍利是佛的身骨。佛、菩萨、罗汉、高僧等，寂后火化，每凝结有舍利，或如珠，或如花。白色为骨舍利；赤色为血肉舍利；黑色为发舍利；亦有杂色者，则系综合所成。此是生前依戒定慧薰修而得，无量功德所成。若是佛舍利，世间无物能将其毁坏，菩萨以次，则坚度递减。僧人圆寂火化后，从骨灰中也能筛出如珠如花的“舍利花”。但僧人修行再深，毕竟还是肉体凡胎，不能与佛、菩萨相提并论，故只能称“坚固子”、“舍利花”，而不称“舍利子”。

素食会。抗战期间，北京市东安市场门外森隆番菜馆经常受日伪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经理张森隆（又名张春山）便请出佛教名流屠士夏莲居、杜骏甫等出面发启在此组织所谓素食会，并辗转相托请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领衔，作为会长。因此，日伪军、警、宪、特都不敢再来滋扰。

华北居士林董事会“六部”是根据民国27年（1938年）7月第二次修订的《华北居士林章程》第三章第四条之规定设立的机构：1.研究部；2.修持部；3.图书部；4.弘法部；5.救济部；6.事务部。

夏莲居。《莲公大士净语》。北京：广化寺，1994—8。第85页。“论才以足冠当时，能转乾坤世不知。无数饥黎齐下泪，霜宵忍冻拜莲池。”并自注云：“倡设利生会，全活难民无算。示寂后，哭拜者甚众。”

香灯。在寺院内的经坛道场上，从事焚香、点蜡、摆供、叠衣、传递法器、法物等杂务的僧人。相当于寺庙里给俗家人作佛事时的“铺排”。不过，铺排可以由俗家人充任，而香灯则是由庙里的出家人充任。

舒乙。《宗月大师》。见（In）：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华奇人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12。第81页。

宗月和尚临终偈子为现任北京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居士林理事长吕香光提供。

宽玄，字智慎，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人，河北宛平县人。早年皈依显宗。民国24年（1935年）冬，现明在广济寺传戒时，曾受比丘尼具足戒。民国30年（1941年）显宗传戒时，为比丘尼引礼师。引自1941年冬《北京弘慈广济寺同戒录》。

祝文、唱赞均见《放生仪轨》。

（11）法船，原为佛家的一种比喻，是说佛法能使人了脱生死，犹如船只能够渡人，跨过生死海，而到达涅槃的彼岸。近代，汉传佛教的度亡法会（如盂兰盆会，地藏会等）多以彩纸扎糊成法船，认为经过僧众念咒加持后火化，即可度亡。

（12）（13）《现明老和尚纪念刊》。北京弘慈广济寺内部刊物。1942。第64页。

“彩云乍散”举城瞩目“当大事” ——名妓赛金花公葬始末

小史代序

赛金花(约1864——1936) 安徽徽州休宁县人(有说是盐城赵姓之女,正名灵飞)。少年家贫,沦落青楼,署名富彩云,后人讹为傅彩云。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被状元洪钧娶为侧室,得名梦鸾,曾随洪钧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洪死,又沦落为妓,署名梦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在天津组“金花班”,始用赛金花之名。

据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乱兵逞凶作恶,大肆烧杀抢掠,惨无人道,朝野士民苦不堪命。赛氏出于忧国忧民,乃利用当年在德时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多方周旋,劝令约束联军,尊重人道,勿再蛮横,以复邦交。瓦从其言,联军纪律顿肃。京师人民生命财产,始得一定程度的保护。并说服被害德使克林德的夫人放弃对中国政府的无理要求。

宣统三年(1911年)“从良”,嫁与沪宁铁路总稽查曹瑞忠(但有的说是沪宁铁路局司书黄某)。不幸,次年曹某病故,乃于民国7年(1918年)改嫁金溪人魏斯灵(曾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参议院议员),因名魏赵灵飞。民国10年(1921年)7月魏死,在江西会馆开吊时,有许多人送的挽联,影射赛氏是“祸水”,因而与魏家发生争执,结果赛氏失败,乃迁居北京南城香厂居仁里16号蛰居,此后,其生活日渐贫困。

由于文人们的“艺术创作”,赛金花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朴写了一本《孽海花》的小说,以苏州名妓傅彩云为经,以清廷弊政及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为纬,真假相间地架构了一个现代史上的传奇故事。该书第二集出版后,又在《小说林》杂志上连载,因此,彩云艳名不胫而走。诗人樊樊山据此而谱成前后《彩云曲》,一时艺林纷纷传诵,此绝代红颜,益为世人所美称。民国初年,上海市石路一家剧场又据此编成文明戏《状元夫人》,其社会影响,越发地扩大。

此后,社会上的“赛金花热”时起时伏。民国22年(1933年)赛氏因无力缴纳房租,乃向该管警段请求豁免,外五区署署长祝维平曾拟一呈文,罗列了赛金花庚子年有功于社会的种种事迹,偶然被一报馆记者索去发表,立刻轰动北京社会,并传播至全国各地,赛氏再度成为新闻人物。民国24年(1935年)刘半农、商鸿逵发表了《赛金花本事》一书。民国25年(1936年)40年代剧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演了夏衍编的七幕剧《赛金花》。鉴于赛氏年老,贫病交加,故声明将演出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赛氏的生活补贴。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赛氏病逝,身后殓葬,皆无所出。各界知名人士,因感念赛氏在庚子之役,保护北京地方有功,遂为其发起公葬。

公葬概述

赛氏病故后,消息传出,南北各报争相刊载。平市各界复以前京师总商会会长孙晋卿、沧石路总办潘毓桂等领衔发起治丧,组成“魏赵灵飞治丧处”。

并于 12 月 6 日（接三之日）在黑窑厂三圣庵，召开临时谈话会。决议：

- 1、凡本日出席会议者，皆为助葬筹备处的发起人；
- 2、各界捐款，一律由《实报》报馆代收；
- 3、将赛金花灵柩上漆三道；
- 4、根据赛金花生前遗愿，将其母亲潘氏灵柩起灵，与赛并葬；
- 5、订于 12 月 15 日（旧历十一月初二日）开吊，12 月 16 日（旧历十一月初三日）发引；
- 6、安葬于陶然亭锦秋墩香冢西坡，以供后人凭吊。

此外，并有如下之提议：

- 1、据张次溪称，拟由其个人出资，为赛氏立碑。碑文拟请金松岭著述；杨云史书写。“赛金花之墓”5 字，则拟请齐白石提笔。并将搜集其生前事迹及近年来与各方往来之函件，刊印成册，以广流传。

- 2、天津名士赵元礼亦拟作诗，镌于碑上。

- 3、王玉树则主张在墓前另立碑亭，仿西湖六角亭式样，不使苏小小专美于前。

- 4、同时，又有人提议请吴佩孚代撰碑文。

据 12 月 9 日，南京《中央日报》刊载一则消息称，为赛氏筹措治丧费的零星组织，截止至 6 日，已有七八处。就笔者所知有如下几处：

- 1、在京的名画家李苦禅、侯子步、王青芳自 12 月 5 日起，在中山公园春明馆举办画展，展销近作 60 余幅。原计划得款全数捐作赛金花的生活费，后闻赛金花病故，故改作丧葬费。

- 2、名教授萧一山等发起成立“助葬筹备处”，有教授多人列名。

- 3、北京梨园界以王又宸、马连良等名伶公议，为赛金花演出义务戏 4 台，得款全部作为助葬之用。

- 4、上海 40 年代话剧社于 11 月，曾在金城大戏院公演《赛金花》一剧。中法大学陈绵教授曾致函该戏院，要求借演戏机会，代赛氏募集养老金。然赛氏不幸病故，40 年代话剧社闻此消息后，即将募得捐款 100 元，通过国华银行电汇到京。并有唁电云：“陈绵先生转赛金花治丧处：彩云乍散，彤史流辉。四十年代剧社、金城大戏院同唁。”与此同时，上海舞女李丽君亦汇款 100 元助葬。

- 5、北京《实报》刊登为赛氏公葬募捐启事，指定于 12 月 5 日起，由该报馆代收捐款三天。第一天即收到捐款 190 余元。市长秦德纯夫人捐款 30 元；社会局局长雷嗣尚之夫人与公安局局长陈继淹之夫人各捐 20 元；名伶马连良之眷属捐助 20 元，并代募 50 元。

- 6、该区绅民孙晋卿、刘彩臣、刘多文、杜润芝、刘耀亭、曲宪章等，于赛氏病危时，曾具呈该管界自治事务第十一区分所，请求予以救济。后赛氏病故，该分所所长沈钧，复据前呈进行调查，认为应予料理身后各事。特于 12 月 7 日，呈请自治事务监理处，转恳绥靖公署急赈处及市政府，酌拨丧葬费用。呈文有“……仰查魏赵灵飞即当时之名妓赛金花，在庚子拳乱，联军入京，宗社既墟，国亡无日之际，而赛金花以一风尘俗妓尚知眷怀故国，悲悯无辜，不惜牺牲一己之色相，维护百万人民之苟安。稽之野乘，闻之遗老，或记述历历，或乐道津津。纵令事实或未尽然，而风来空穴，未必无因。故该绅等，拟请救济于生前，料理身后，意旨所在，实未可厚非……”等句。但市府如何批复不详。

公葬当中，当时北京“红白口”各行业，亦有不同的助葬表示。例如：当时一口杉木十二圆的棺材，最少值百元以上，但贵寿材厂连同全套寿衣，仅收百元，修坟原单开 170 元，实收 120 元。天成杠房的杠价 120 元，实收 110 元。漆材原价 99.45 元，实收 90 元。普度寺番经两坛，原价 56 元，实收 40 元。《实报》报社代募捐款共 734.70 元，除丧葬费提用 400 元外，下余 334.70 元，由《实报》径交赛仆顾妈领讫。所有这些，于赛氏发引后，其治丧处都在《征信录》上，做了如实的公布。

初终

赛氏晚年蛰居陋室，人老珠黄，无以为业，穷极潦倒，自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但还有两位不要工钱的仆人与之相依为命。据说，他们是姐弟两个，姐顾蒋氏，江苏海门人，自 27 岁丧偶后，即寄于赛氏篱下，后从上海随主人来京。民国 14 年（1925 年），其弟蒋乾方亦北上投奔赛氏。由于主仆相处知心，彼此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誓愿同舟共济。因此，主仆之间已不再是雇佣关系，诚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当年，二仆可能得到主人的某些殊遇、厚赏，后来，主人穷了，开不出工钱，姐弟二仆不但不计较，反将以前的积蓄拿出来给主人垫办生活。另外，顾蒋氏还让自己的次子二兴（当年在上海工作）给赛氏磕头，认了干妈。

赛氏处境虽窘，但民国 20 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日寇猖獗，国难紧逼之故，颇有人念其既往之功（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市民赖其保全者甚众），再加之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的宣传，社会上许多知名人士前往拜访，络绎不绝，物资援助也源源而来。并且某要人曾有许诺。所以赛氏认为很有指望，于是计划将其已故老母的灵柩运回原籍安葬，以了却终生大愿。同时自身既归，即不再来，终老故乡，落叶归根。为此赛氏终日诵经念佛，每逢朔望必亲去前门关帝庙、观音庙拈香，并于家内设立佛堂，晨昏祝祷，乞求神佛显灵，以多得一二善人资助。

但愿望终归破灭。国事、家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促其早亡。日寇步步紧逼，尤其是绥远战事的爆发，使赛氏大为震惊，因当年联军入京时的惨状，她仍历历在目，心有余悸，深恐将来无容身之地。喘病因而加剧。在家事上则是由于贫穷给她带来烦恼，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主三寿堂徐家控告于法庭，使她感到耻辱，虽然最后归于和解，但每逢提及此事，便涕泪满襟，可见对其刺激之深。因此，赛氏积忧成疾，不过这仅是近因。究其致病的总根源，则是其青春时期被人摧残过度，折伤太甚，元气素亏，又染有鸦片烟癖，已有数十年之久。瘾人最忌腹泻，犯者十有九死。赛氏即为典型的一例。民国 25 年（1936 年）11 月，赛氏咽喉肿痛，腹泻不止，经中亚医院院长刘彩臣大夫及该院内科各大医师精心治疗后，病情略有好转，但由于“内热上升”，不进饮食，延至月底，又出现便血、舌头溃烂等症状。复经名医汪逢春诊治，仍收效甚微。赛氏自知病入膏肓，频念义子二兴不止，即嘱蒋氏连电上海，召二兴来京，俾尽义子之孝。蒋氏姐、弟二人闻言，涕泪横流，哭诉如二兴一时不能赶来，情愿代二兴尽子侄之礼。赛氏闻言亦感激流涕，哽咽不止。延至 12 月 3 日晚间，顾蒋氏见主人神智昏迷，乃急为之烧烟（鸦片）抢救，赛氏强吸食数口，始渐清醒。男仆蒋乾方为其购来泗安酥糖一包，自来红月饼五块，经二仆再三劝说，吃了酥糖和月饼各一块。入夜，赛氏并未安睡，

目光发直，口中喃喃不已。忽向顾妈说：“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来了，洪老爷也来了，他们都迎接我到西天去哪！圣旨下来催我啦……”顾妈闻主人归期已至，乃放声大哭，说：“天哪！难道说就让我主人这样收场吗？真太惨啦！家中空无所有，我主人的后事一无准备……”赛氏张目四顾，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把我的后事挂在心上。须知，我活了65年，中间的30年，享尽了荣华富贵，虽未生于帝王之家，但吃穿玩乐也都享受过了，甚至暴殄天物，不知有多少。今日如此收场，却也不冤啦！我在晚年，极力忏悔造下的这种罪业，已深知福寿不能两全。上天能让我活到六七十岁的高龄已是很不错了。如今我应了民间谚语所说的‘空着手儿来的，还得空着手儿去’的典……惟你们姐弟之情至为感人，随我北来已经20多年，同受艰辛，实指望有朝一日得志，来厚报你们。未料，就这样死了，把你们扔下，叫你们再受艰辛，于心实在不忍。如今，我没留下任何财产，仅剩绸被一条，送给你们姐弟留个念想儿吧！我死后，你们就取些旧布单把我一裹算啦！因为我这一生享受过火，必然如此……这样死后我也心安……”这是赛氏的临终遗嘱。此后，赛氏仍唠念不已，但声音越来越弱，而且语无伦次，盖已进入昏迷状态。蒋氏姐、弟欲上前劝慰，然赛氏已溘然长逝。顾妈大恸，呼天唤地嚎陶大哭起来，说：“太太怎么死啦！我们太太是英雄好汉哪！太太，您可真狠心哪，撇下我这苦老婆子啦……”蒋乾方只是跪在地下涕泪交流——连哭都哭不出声了。此时约为12月4日凌晨2时半。

停尸待殓

却说，天桥居仁里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巷，是个典型的贫民窟，一排排简陋的房子，破旧不堪，自南往北，一直到头，路东的就是16号（旧门牌）——赛氏临终的寓所。外面很寂静，听不到杂乱的声音，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似的。两扇木板门，门框上钉着一个写有“江西魏寓”的牌子。院子里只有五六只不懂事的猫、狗仍在欢蹦乱跳地戏耍。赛氏住的是院内两间小小的北房，东间放着简单的桌椅家具；西间的一张铁床上，挂着一幅有若干年没有洗涤的纱帐，将赛氏的遗体笼罩了起来。她头朝东，脚朝西地躺在那里，盖着一条旧被子，连脸也盖上了。屋里光线黑暗的很，使人越发感到凄惨。床头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如烟灯、烟枪、烟盒、手巾、肥皂盒、破旧的衣服等把她葬在当中。床前一条长长的板凳，和靠东墙的小桌也堆满了盆碗，看来这些东西最少也有几十年的历史。靠门的八仙桌上堆满了用金银箔叠成的元宝、镲子。由于赛氏生前信仰佛教，所以，家里的供佛设备特别齐全，不但屋内有香炉之类的供器，就是不满几丈见方的院子里也设一张八仙桌，上面摆了一对高高的蜡扦、香炉、供碗……倒确有佛化家庭的意味。东头的葡萄架，用黄土埋着，猛一看来好像一座坟墓。总之，赛氏住房环境，甚至于一个角落，都显得格外阴暗凄凉。这位一代“名花”，就归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了。

停尸待殓，情况极惨。天明后，蒋乾方即奔赴各处报丧。当时闻讯而来者有赛氏同乡周少舫，表妹易太太，女友侯太太，邻居王竹岩、李青山等，共同讨论如何处理善后。因棺木装裹一概无着，故有人提议派代表去前京师商会会长孙晋卿处恳求助葬（赛氏生前，孙已联合地方士绅，向市府为赛氏请求救济）。孙氏闻耗后，由于敬佩赛氏庚子之役的作为，力主崇德报功，

遂慨然应允出面代为主持向各方募捐。认为赛氏葬礼当在不丰不菲之间，使其泉下瞑目。至其费用，看各方面资助情况如何，不敷之数，当由其个人负担。

平市各报记者闻讯后，纷纷赶至采访猎奇，给赛氏拍照遗容。捷足先登的是《世界晚报》。随后，平市《实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均争相采访，并做了报道。此外，上海《大晚报》、天津《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均于社会新闻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了长篇报道。上海《大晚报》12月4日报道的大标题是《艳闻洋溢时代角色赛金花晨病故》。还刊登了赛氏于民国7年（1918年）在上海与魏斯灵举行文明结婚婚礼时的照片。并在消息报道的下面开辟专栏，发表了燕谷老人张鸿的《孽海花续编》。当时报纸成了抢手快货。

成殓停灵

由于助葬集金刚刚开始，筹款无多，于是在前京师商会会长孙晋卿、中亚医院股东刘彩臣等人主持下，向前门外东珠市口贵寿棺厂以100元购得杉木十三圆的棺木一口，陀罗经被、寿衣全套。

12月4日晚8时，《世界日报》记者郑先生正在采访之际，“转空”的棺材到了。这是按老北京的风俗习惯，由16个身穿绿色驾衣，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红雉翎的杠夫，以一付小红杠，将空棺高高抬起，由一名身穿孝衣，头戴清制官帽的杠头，打着“响尺”，指挥前进。杠前有一班官鼓大乐，但鼓号都背在肩上，并不吹打。只有“响尺”声划破寂静的夜空，由远及近，不多时，已进居仁里的巷口，落于丧居门口。顾妈已意识到，主人的遗体马上就要入殓，从此便终古不能再见了，因之，放声大哭起来。

杠房了事的首先进了院，让准备少量的煤炭，放入棺内，以象征丧家“不进空材（财）”。并将带来的寿衣，让蒋氏姐弟一一验看。计有：蓝绸面粉红绸里的大棉袍一件；蓝色小纺绸面粉红布里的棉袄棉裤一套；被褥两床；粉红色棉被一床；黄绫红色梵文的陀罗经被一床。另有白布小裤褂一套；布袜子一双；淡绿色绣红莲花的花丝葛鞋一双；还有蓝色绣红莲花的“观音兜”（即帽子）一顶；红莲花枕头一个。蒋氏姐弟看罢，深表满意。随后，由顾妈用湿毛巾将赛氏全身擦拭一遍，即由杠夫给她穿上寿衣。蒋氏姐弟果真履行诺言，充当孝子孝眷，把赁来的孝衣一一穿好，郑重其事地为主人“遵礼成服”。

棺木被抬进院内，停在北屋的门前，棺内根据赛氏的岁数放了锯末包。没有儿女亲人，只得由杠夫将赛氏遗体抬起，由蒋乾方象征性地抱头，顾妈和义女侯秀贞象征性地抱腿，殓入棺中。这时，鼓手们一声闷锣，唢呐、官鼓齐鸣。杠房了事的要求蒋乾方亲手扶着子盖，与杠夫们一起插关。最后，由杠夫们上了大盖，不过没有上销，为的是等着她的亲族人——66岁的弟妇来看她的遗容。

殓后，已晚间9时，由官鼓大乐前引，在居仁里南口上了16人杠，棺枢上加披了一幅大红缎子绣着折枝牡丹的过棺罩片，即抬往黑窑厂三圣庵停灵（因居仁里丧居过于狭窄，不能办丧事）。正值初冬，寒风砭骨，路静人稀，万籁俱寂。送灵者惟蒋氏二仆及邻居三五人。义女侯秀贞亦冲寒前往，扶棺痛哭，闻者莫不泪下。途中萧鼓徐奏，呜咽欲绝。

三圣庵主持尼僧图印亲自至山门前迎灵。并当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因赛二爷对社会有功，贫尼除率尼众在庵中诵经，晨昏不辍，以资超度外，并决定免收寄柩之费，以表敬意。”

接三

12月6日，为赛氏逝世后的第三天，按照北京的俗例，在三圣庵接三。山门内，设大鼓锣架，11名鼓手设座，官吹官打。于上午9点“上鼓”。院内有官鼓4面，是为“二报”，并站有“回事”人员，灵堂前有持锣鼓手，伺候堂祭。

灵堂上挂有白布云头幔帐，柩前立赛氏大幅遗像，并设一木质牌位，上书：“魏赵灵飞之灵位”。花筒内插着全白的灵花一对，塔状的闷灯一盏，供苹果5碗，蜡扦上素烛高燃。供桌两侧立有纸糊的金童玉女。

充当孝子、孝眷的仆人、义女等均身穿孝服，按传统礼俗跪灵。蒋乾方跪于灵柩左方；顾蒋氏、侯秀贞等跪于灵柩右方（其母侯太太在居仁里看家，未到庵）。有来吊祭者，即叩首还礼、陪哭。

到庵吊祭的有公安局稽查刘耀庭，中亚医院股东刘彩臣，中法大学教授陈绵等数十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前京师商会会长孙晋卿，头戴貂冠，拥重裘，乘自用米色汽车，于下午4时许到庵致祭。另有邻居、同乡，及生前友好多人。其中有沈鑫者，年68岁，身穿古铜色大棉袍，头戴青缎风帽，手持念珠，谓与赛氏乃是髫年之交。在灵前痛哭流涕，并向治丧处赠贖仪百金。此外，还有三人向治丧处递上“折祭”现金的黄封套，却隐去姓名。盖其妙龄时之走马王孙也。

按北京的风俗习惯，因不预备席面，故不能设本家帐房收受奠礼。故由“魏赵灵飞治丧处”临时收受各界送来的花圈、挽联、官吊“红白包”（冥钱烧纸），代行本家帐房职务。

刘耀亭、刘彩臣、李春山合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立轴一幅，系董康手笔，下款书“勋二位一等大缓宝光嘉禾章前署财政总长司法总长董康”24字。此外，还有几幅挽联，分别挂在院墙之上。

灵堂外殿左方墙壁上挂着“三世佛”（即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画像，并有展开的“佛牌子”一折。经案前，有陶然亭慈悲庵九僧高声唸诵《金刚经》，为赛氏作“昼夜功德”。9时开坛，40分钟后，上卷完周，由蒋乾方捧着给“上贤位菩萨”的疏表，送到门外焚化后，即结合灵前“回向”，举行了供饭、“戒食”仪式。先由鼓手“发酹”，茶房托来红烧鱼、四喜丸子、米粉肉、炒虾仁、肉丝炒榨菜各一盘，白米饭一碗，清茶一盏，供于灵前桌上，蒋乾方长跪于桌前。僧众念了一遍《心经》，齐宣“南无加特利菩萨摩诃萨”的“水赞”，然后，由放正的大和尚念了《斋仪》（度亡文书）：“三十二相能圆满，八十种好妙庄严，眉间毫光娑婆照，师度灵魂登彼岸。以此大乘经渴开导尊灵，影中像前，我此道场今为奉，佛资命，谨逢北平市香厂路居仁里十六号魏宅迎三送路之辰，具诚修斋，报恩孝男蒋乾方，右领阖府孝眷人等，思念音容，由是全悉……”戒食之后，僧众们打着“七星”（法器板点）到厨房“交汤”（亦称“交灶”），由铺排交给厨师一个包有现金的黄纸包，表示对厨房供斋的感谢。僧众对着灶火口合诵《大吉祥天女咒》，就地焚化了敬神钱粮（黄钱、元宝、千张）一份，表示祭灶。

然后，才回到殿上用斋。

下午1点，冥衣铺伙计送来了烧活。摆在了前院。落地拉的转轮红粘轱蓝帏轿车一辆，并糊一老年妇女跨沿，是为“跟妈”，由一匹菊花青的大马驾辕。车前有执鞭车夫一名。另有一匹同样的大马，上面骑着清代装束的官人，是为“顶马”。还有一匹“跟骡”。四只粉红色画着蓝色团花的墩箱。

下午，平市助葬筹备处的各界人士在庵内召开临时谈话会，决议凡出席此次会议者，皆为助葬筹备处的发起人。经讨论，做出了关于治丧的若干具体决议（详见本文第二节公葬概述）。会间，由中法大学教授陈绵宣读了40年代剧社、上海金城大戏院拍来的唁电：“彩云乍散，彤史流辉”。并宣读了卡尔登剧院上演《赛金花》时，经理曾焕堂的来信“闻名妓赛金花近来贫病交加，处境殊窘，美人迟暮，太觉可怜。忆吾兄（指陈氏）在沪时，曾有欲为她捐募养老金之意，现业余剧社与敝处订约出演《赛金花》话剧。弟欲藉此机会，请她南来，亲自登台，当能鼓动观众热情，将营业收入，提出若干，作为她养老之资，更提出若干，为劳军之用。想观众必极踊跃。在她可以名利双收，在我侪亦可尽一些救国与救美人的工作。倘能设法同意南来，吾兄可算是做一件大功德。”展函读罢，座中人均不胜感叹。

会议即将结束时，蒋乾方被唤来，跪地向助葬筹备处全体与会人员三叩首，表示赛氏身后各事，全权拜托治丧处酌情力办，并申谢忱。当即被一职员搀起。至此，治丧处宣布正式成立。

下午4时许，禅经在佛前“交供”。僧众在合诵《大悲咒》、《解冤咒》后，放正的大和尚再次念了《斋仪》：“……中华已故魏太夫人赵氏灵飞之灵，在世享年63岁，原命距生于前清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吉时受生。盖闻生死之道，古今皆然，未了真常，难逃梦幻。大限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丑时云终。今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迎三送路之辰，延请陶然亭慈悲庵大德僧众昼夜轮流讽诵《金刚经》、《瑜伽焰口施食》一堂，加唸诸品神咒，昼夜功德。伏愿：闻经早登三摩地，听法高超六欲天。解了神魂冤和业，洗心濯沥发虔诚，今对佛前求忏悔。弥陀佛……西方接引弥陀佛……”至此，僧众列队，送交供大表，由蒋乾方捧着写有“天厨妙供·秉教沙门封”字样的疏，到大门外焚化。下午5时，在给下贤位菩萨送疏、灵前回向后，白天的“永日功德”宣告圆满。

北京的初冬下午6点，已是万家灯火。治丧处传令，准备送三，由知宾发给每位来宾各一白纸灯笼。蒋乾方捧着给西方三圣的大疏跪于灵前，顾妈哀戚油然而生，没等铺排喊“师傅点鼓”，即哭泣起来。随着官鼓大乐在门外的一声大锣，鼓乐齐鸣，和尚打起了“七星”铛、钹、鼓，高声诵念“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訶萨”。蒋乾方被男宾挽了起来，顾妈哭得前仰后合。送三行列开始行进，官鼓大乐的后面是两对大型白色的“气死风灯”，两对六角形的手罩子，为之照明。后边是纸活：一人举着纸糊的“顶马”，上边骑着一名头戴清朝官帽，身穿袍褂的官人，表示开路，一匹菊花青的大马驾辕，拉着一辆“落地拉”的红轱辘、蓝篷的轿车，车沿上还跨着一名身穿蓝短褂、头戴红石榴花的“老妈儿”。这便是赛金花的灵车。车后还有一匹“跟骡”。送三的宾客各持“引路灯”一盏，排成双行缓缓行进。蒋乾方由两位男宾搀扶，顾妈由两位女宾搀扶。九众和尚敲打着法器走在最后。沿途围观者甚众。当人们知道这是为赛金花送三，有的自动加入送三行列，自己买香当做火把者有之，自己买引路灯燃点者有之。送三行列越走人越多，成为古城一大奇

观。及至到达预定的焚化场——城南游艺园门前时，那里挤满了等候“观礼”的群众。据说，有个小老花子本能地拚命往前挤，想抢点什么，被一个南方口音的大老花子一把拽了出来，骂道：“造孽哟，要不是赛金花，北京城早就没的喽！”焚烧车马的大火腾空而起，蒋氏姐弟趴在地下给被送往西天的女主人三叩。转身又为送三的各位来宾一叩，表示谢意。和尚没有打“回坛”，而是就地解散了，但许多来宾却有秩序地提灯回庵，为的是护送蒋氏姐弟。

按老北京的风俗，接三之夜，照例要为亡人祈建“往生逍遥道场”，唸诵《瑜伽焰口》，为“十方法界无祀孤魂”施食放赈，以便为亡人赎罪。焰口后半部有20次召请，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烟花妓女，乞丐贫儿，都一一呼唤。其中有“一心召请，花街艳质，柳陌妓姿，歌讴婉转而惊落梁尘，舞袖翩翩而接开檀板。朝以笑，暮以笑，好景难忘，浓梳妆，淡梳妆，朱颜易老。呜呼！岂不闻昨日街头玩赏时，今朝棺内已眠尸，少年女子今何在，红粉佳人化作灰”。群念“如是古往今来，花街妓女之流，一类孤魂等众，惟愿承三宝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时来受无遮甘露法食。”在场人闻之无不悲痛，哭声直至四请（初申召请，再请，三请，总请）本家亡灵来临法会，来受甘露法食”。有在坐记者问：“座中泣下谁最多？”治丧办答曰：“蒋氏姐弟麻衣湿”。

开吊

根据治丧处的决定，于15日开吊。从14日晚间北京降了一场大雪，一夜之间，整个京城银装素裹，处处雪柳、银松，好像天公有意为赛氏开吊做了装点。窑台茶馆的太平父老们都说：“这可真是天意多情”。

三圣庵的黄琉璃瓦上复盖了白雪，衬着山门前素彩牌楼更加庄严肃穆。山门内是一对红漆金纹的对儿花篮图案的门鼓，一对与之配套的锣架，门鼓前立着一对金漆的长号，官鼓大乐设座迎宾。

官鼓的对面是一堂送圣用的全活。一丈一的冥楼一座，九尺的宝库两座，雕栏彩绘，鲜艳夺目，并有四只红地蓝花的墩箱。据说，当初按治丧处某些人的意见，还要加糊二至四张桌子，不摆尺头、金山银山，而是要糊些赛氏生前的纪念品，例如：有洪状元题款的《采梅图》；瓦德西送的12个小金人的自鸣钟；魏斯灵送的银色雕花的金属鞘一尺多长的小剑……大约是因为没有原物作样品，冥衣铺碍难接件。赛氏灵柩已涂上了红漆，并画了金纹的图案，头顶五蝠（福）捧寿，脚趾莲花。灵前搭了一座龕形的素彩牌楼，前置供桌一张，设三堂供品，一是苹果5碗；二是满、汉京式糕点：花糕、桃酥、碎供、芙蓉糕、萨其玛各一盘；三是菜馐：鸡丁、鸭块、虾仁、肚丝、肝尖、肘条各一盘。仿徽州“状元饭”一碗；圆寿字扁馒头两碟。前有五供一堂，炉内插四炷线香，蜡扦上高点素烛一对，上有蓝字：“西方接引，花开见佛”。青缎绣花桌围，加一白缎垂条，上绣：“请行鞠躬礼”。墙上贴着治丧处公告“准五时送库”。四面挂有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约四五十幅。

前京师商会会长孙晋卿的挽联是：

“蟠桃被谪，三次临凡为女身，只凭口德返上阙；

劫海宇笼，一志非偶作乾杰，当有英名流芳年。”

文极晦涩。孙氏自称，此联语并非自撰，乃是从某慈善会扶乩所得。

自治事务第十一区分所所长沈钧的挽联是：

“ 鸚鵡慰寂寥，終古江亭無語暮；
芙蓉哀夢幻，平生向筆有書傳。 ”

署名讀律齋主的挽聯是：

“ 孽海波沉，地下欣逢曾孟朴；
京華春歇，人間誰是劉半衣。 ”

殿上有瑪噶拉廟（普度寺）番經（喇嘛經）一堂，11 眾；陶然亭慈悲庵禪經（和尚經）一堂，亦 11 眾。從上午 9 點輪流上座唸經。

到庵致祭的各界人士均在門房兒簽了名，計有：潘毓桂、孫晉卿、沈鈞、劉耀庭、劉彩臣、陳綿、張次溪、王秀山、李青山、章佩萱、楊世勛、劉多文、杜潤芝、曲憲章、沈鑫、李春山、周少舫、王竹岩、侯秀貞、易太太、蔣廷梓、田桂舫、馬一民、孫華生、栾鶴九、王青芳、王玉樹、張盛齋、劉治安、田步蟾、孫學仕、王琦、華輯云（華世奎侄孫）、汪澤臣、王代昌（實報記者）、魏惜文（北方日報記者）等 100 多人。劉耀庭、劉彩臣等擔任知賓。

下午 2 點，舉行點主儀式。靈堂的供桌上換了紅燭，紅綉花的桌圍子，所有的祭幛、挽聯都用紅綢象徵性地擋了起來。盡孝的“ 義仆 ” 蔣乾方換了“ 吉服 ”，身穿藍長袍、青馬褂，頭戴青緞帽頭。並令顧媽等婦女暫時回避。蔣乾方在鼓樂聲中捧主出堂，長跪於“ 公案 ” 桌前。首先由華世奎之侄孫華輯云書主：“ 魏夫人趙靈飛之位 ”，左下款為“ 義子蔣乾方立 ”。由前商會會長、正明齋經理孫學仕任鴻題官，進行點主。主成，扎紅綢、青紗各一方，供於靈堂，將由二仆請回家中永遠奉祀。顧媽對記者說：“ 我等跟隨賽氏多年，所得實惠，誠堪稱不少。今主人既死，無以為報，俟發引後除令舍弟返回原籍外，我不願片刻離開賽氏靈柩，決定在墳地築房四間，供奉主牌，永遠守靈。 ” 下午 4 點，禪經在送疏、回向之後，到樓庫前誦經“ 持咒 ”，並貼了“ 三寶示 ”（交單）和十字式的封條。至此，道場宣告功德圓滿。

5 點送庫。由官鼓大樂前引，11 眾身披黃袍的喇嘛，吹著銅管“ 剛凍 ”，敲著大柄鼓，打著大鈸。來賓自動走成兩行致送。蔣乾方用銅茶盤托著喇嘛用八拉麵捏成的燈、塔，顧蔣氏則用銅茶盤捧著和尚的大疏（黃表）上書“ 西方三聖· 乘· 教沙門· 封 ”，還搭著一份給傳達於三界執符神的錢糧——黃錢、元寶千張。按老北京的风俗習慣，送庫（送聖）是不哭的，但顧媽還是痛哭不止。給老佛爺的大表及茶盤“ 擱盞 ” 的孝布上不知灑了多少極度悲痛的“ 義仆 ” 之淚。走在最後的是 11 眾身披緞綉偏衫的和尚，他們用笙、管吹奏一段梵樂，打擊一通鼓鑼。

一樓二庫已事先運至城南游藝園門前，圍觀者不下數百人，送庫的人們比剛一出庵時增多了好幾倍，因此，地面上出動了警察維持秩序。樓庫起火後，蔣氏姐弟三叩，顧媽痛哭不起來，硬是讓女賓們給架回三聖庵去了。

晚間仍然辦了禪經“ 往生逍遙道場 ” 的“ 晚分功德 ”——施放《瑜伽焰口》，再次為賽氏作了身後功德。僧眾下座已是夜闌。隨後，舉行了簡單的“ 辭靈 ” 儀式，由杠房的伙計將靈柩稍稍掀起，蔣乾方馬上墊以銅錢一枚；然後再以新筍帚象徵性地掃一下棺蓋上的塵土，包在一個紙包里，讓顧媽帶回家去灑在床下，以象徵日後有財。由於賽氏無孝屬，故攙罐時，只由義女侯秀貞攙起，依次是顧媽和蔣乾方，每人攙了一簋子祭菜，填往“ 焰食罐子 ”（即“ 寶瓶 ”），最後，由茶房接過來將祭菜填滿，用一個蘋果和一小烙餅堵上罐口，再蒙以紅布，以花紅線扎好，將筷箸折斷，棄於地下。這時，由

杠房伙计把灵柩的大盖上了销，蒋乾方跪地大喊：“太太躲钉”，顾妈顿足大哭声中，宣告礼成。赛氏遗像被翻了过去。灵前五供、祭品一律撤去。只等天明发引了。

发引

根据治丧处决定，于16日上午11时发引。因赛氏生前对其先母停柩待葬，引以为憾。故由赛氏生前友好等决定将其母灵柩由永定门外浙江义园移回陶然亭与赛氏合葬，治丧处派人前去办理手续未果，故延至下午1时才行起杠。

门外，响尺招唤杠夫们进庙“圈活绳”。治丧处遂传令带响器参灵。蒋乾方右手执引魂幡跪于灵前，顾妈怀抱“宝瓶”（焗食罐子）跪于其弟之后。依次跪灵的还有义女侯秀贞等。由官鼓大乐和华北乐队先后奏哀乐，全体送殡执紼者肃立两旁，脱帽向赛氏静默致哀。最后由杠头向“孝子”发出“请起”的信号，一声响尺，杠夫们即将灵柩抬起，蒋氏姐弟嚎陶大哭，迎着灵柩退步而行。这时，治丧处请来了照像馆的摄影师为之拍照，以资永远留念。

在灵柩出门上杠的时候，门前闲看热闹的人丛中，有一位老太太，对身旁的女人指点着说：“二婶儿，您瞧，棺材上漆着金花儿，这不就是暗含着赛金花吗？”另一位妇女则问：“那个穿孝打幡儿的是赛金花的干儿子吗？”“不，这是使唤人。唔，来啦！看见没有？那个哭着的就是赛金花的老妈子。”大伙儿都在纷纷议论。

来宾们都自任一项杂务，说是“不用外雇他人，省下钱来奖给两位‘义仆’”。有的背了大串的纸线，充当“一撮毛”的角色，为殡仪扬洒“买路钱”。有的挎了烧纸筐子，沿途烧化纸钱，打发“外崇”。

上杠时，由蒋乾方用右手将一个画着白地蓝花的“吉祥盆”摔碎，大哭。趁着点燃冥帛烧纸的火焰，知宾们用力往空中扬了四把纸钱。杠头带领杠夫们喊了“加钱”之后，殡列开始进发。执事仪仗用的是崇文门外石板房天成杠房的“仨八件”（幡、伞各12把），即汉执事“三半堂”的简化形式。其行列顺序为：

- 一、各界送的挽联。
- 二、纸活“金童玉女”（金童执幡，玉女提炉）。
- 三、催压执事头目2名，头戴红毡高帽，身穿肥大的红锣衣，手执青铜大锣。以敲锣指挥执事行进。
- 四、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各1对。
- 五、红地绣花幡、伞各4把。
- 六、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镡、金兵拳各1对。
- 七、黑地绣花幡、伞各4把。
- 八、官鼓大乐11名：拉号1对；官鼓四面；唢呐1对；海笛1对；跟锣1面。
- 九、华北乐队的西乐队24名。
- 十、番（喇嘛）11众，俱着黄缎大袍，罩了同样颜色、质料出锋灰外鼠套，戴着皮帽，踏青缎靴。未打法器。
- 十一、禅（和尚）11众，俱穿海青大袍，外披红缎绣花偏衫，“放正”的大和尚披菊黄色佛字偏衫。以笙、管、笛吹奏一段梵乐，再以大饶、大钹、

手鼓打一遍“神仙同”。两者交替进行。

十二、白地绣花幡、伞各4把。

十三、大红云缎座伞1把（2人以黄绸拉幌）。

十四、4人抬影亭1座，内挂赛氏大幅像片。

十五、大红云缎座伞1把（2人以黄绸拉幌）。

十六、4人抬绿帏、顶端罩着青绦网的魂轿1乘，内供赛氏灵牌。

十七、大红云缎座伞1把（2人以黄绸拉幌）。

十八、童子雪柳8对。

十九、执紼送殡的各界人士及赛氏生前友好百余人，均佩戴白纸菊花一朵。

二十、蒋乾方右手执绿宝盖、红莲座、白幡条的引魂幡，上书“中华已故魏府太夫人赵氏灵飞之灵引魂幡，原命前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九日吉时，大限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丑时”。下边还有四句佛家的偈子：“红尘一梦断，西域九莲开。翻身归净土，合掌礼如来。”蒋乾方由治丧处两知宾搀扶，缓缓而行。在他的后边，还有一名穿孝的茶房，手提一个折叠式的大拜垫。

二十一、32名身穿绿驾衣，土黄套裤，头戴插着红雉翎、青毡荷叶帽的杠夫用一付大红杠抬着赛氏灵柩，上面扣了大金“火焰”顶子，红缎绣花的官罩，由两名穿孝的杠头以响尺进行指挥。四根红色白光的拨旗，随侍两旁，上书“天成杠房”字样。

二十二、送殡的四轮马车3辆：

1、第1辆为顾妈怀抱宝瓶（焰食罐子）乘坐，车顶上放着金银镍簋等奠礼。

2、第2辆为义女侯秀贞及其母侯太太乘坐。

3、第3辆为治丧处成员：礼宾、帐房人等乘坐。车外面用黄纸贴了“魏赵灵飞治丧处帐房车”的标志。

以上3辆四轮马车均挂了蓝、白两色的彩球。

此外，还有来宾车若干辆，包括孙晋卿的自用汽车，以及平市各大报馆记者的洋车等等。

按治丧处原发布的发引路线是：出堂后北行，出黑窑厂，进粉房琉璃街，出北口，经骡马市大街往东，至虎坊桥往北，进五道庙街，经李铁拐斜街、观音寺、大栅栏、前门大街，至天桥，走香厂路，居仁里，由赛氏生前寓所经过，进留学路，经西柳树井、万明路，由永增工厂西墙外到陶然亭墓地。但是，殡列行至前门大街，已是下午3点半了，冬天天短，马上就要落日，为了节省路程，赛氏的住处居仁里没有走到，而是直接由西珠市口往西，经万明路直达陶然亭的。

沿途许多商店都设了茶桌、路祭桌，以前门大街为最。据说是公安局稽查刘耀亭等人事先联系的。这时，义女侯秀贞亲自走下马车，与蒋乾方等向各茶桌、路祭桌一一叩谢，并一直步行到陶然亭墓地。

赛氏葬于陶然亭锦秋墩上，是孙晋卿等人出面向陶然亭慈悲庵庙里商妥的。庙里认为，赛氏对社会有功，名声显赫，如果埋在陶然亭与醉郭、香塚、鸚鵡塚为伍并列，则必然增强了此处的神秘意味和知名度。于是慨然向赛氏舍地助葬。其具体墓址就在醉郭墓上首背后的高坡上。事先已在堪輿家张先生的勘测下，打了一个约一丈五尺长，一丈多宽的大坑，预计为赛氏及其母

合葬，以了却赛氏生前的遗愿。坟塚的四周风景绝佳，加之雪后，大地皆白，一片缟素，银松雪柳，尤如画中。

下午4时，始抵墓地。红漆金花的棺柩被徐徐停放到墓道的西侧，由杠夫以“八把花”往坑里缓缓系葬，另由两名杠夫在坑下调整棺柩的位置。此即京城所谓的“登坑下葬”。官鼓大乐极度庄严，足压尘嚣。

先由番、禅诵经品咒。花圈、挽联、纸活、金帛、银帛等冥钱通通付之一炬。知宾将剩下的纸钱尽数高高扬起。杠头趁势引吭高喊“加钱”，向本家及治丧处谢赏。在蒋乾方、顾妈等人的哭声中，所有参加执紼送殡的人都各抓一把土扬入坑内，最后由杠夫将土填满，堆成坟头。遂告礼成。至此，不同凡响的赛金花遂长眠地下矣。

尾声

赛氏葬于陶然亭，墓前本没有碑，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京城沦陷，一片混乱。原治丧处决定给赛氏立碑的事便搁置起来。民国26年（1937年），赛氏一远亲。署名“八一叟长霖”为赛氏立了一座花岗岩雕刻而成的墓碑，上端镌刻有双钩“丁”字的回头连续花纹，并书“丁丑孟陬，姑胥赵灵飞之墓念”，下边便是由潘毓桂（即潘燕生）撰写的《赛金花墓表》，凡六百余字：

“宇宙间振奇之气，钟于男者，百数年一见，钟于女者，盖二三千年而一见。明妃以言人登车和戎，赖延赤帝子四百年之天下，生民免于荼毒，宫社免于夷荡。其潜功之伟，当时或不尽知，而后世有识者咸推之，其论久而益著。自西汉直迄有清，始有赵灵飞者继出，其所以戢颡利之凶焰，与夫息呼韩之野心，后先殆如一揆。庚子之役，厥人所为关系之重，时贤已揭发靡遗。世之但以节行责斯二女者，真爱且陋也。庚子春，予年方十四，侍先兄荫墀公至津就院试。灵飞适张艳帜于津门，诸名士置酒高会于其所，苦勸予往。初级之顷，灵飞已中年，然珠光霞彩，烟视媚行，膩理嫫容，眉宇间隐含英斌，而嘉侠之姿，恢豁之度，更惊为仅见。予以髫年虫技，浪博微名，而灵飞慕才特甚，温言挚语，抚爱备至。予惟知乐近之，无他念也。是岁秋，联军入境，予方寓故都。荫墀公谕德文，与灵飞偕谋所以保卫闾阎者甚大，凡灵飞不世之绩，予皆亲见之，事后遂睽不复晤。虽迭传其嫫人，自念剑跃龙渊，岂必司空自佩，乃悉不之问。而予跌宕江湖，浮沉忧患，亦复侵寻老矣。近年闻其憔悴金台，示疾礼佛，只藉朋游力阴助之，曾未肯重谋一面，匪薄于旧情，实欲绝世倩影，永留心曲中，不忍视其身微荧火，骨瘦香桃也。今伊人逝矣！将卜葬于江亭之浒，锦秋之墩，行与塞上青坟同垂万古。予重仪往烈，枵触前尘，情不自己，爰摭所欲言，以表其墓，而系以铭曰：王嫫质美，以存汉祚；灵飞粹容，用弭夷祸。春明块土，穷边草色，一例千秋，后先辉耀。呜

呼休哉！孰谓女色可以亡国！”

50年代初，修浚陶然亭河塘后，成为公园，该碑安放于园中中央岛锦秋墩附近。“文革”高潮中，被红卫兵推倒，据说后来被陶然亭公园内一早点铺暗中抬去，将有字的正面朝下，无字的反面朝上，搭起一工作案，用来制作烧饼、麻花，因此未被发觉，始得保全。浩劫过后，该碑被文物主管单位统一保管收藏。现与樊樊山等前后《彩云曲》的石刻并排陈列在陶然亭公园

南端的慈悲庵西殿上，供后来者考证。

至于赛金花之墓，已于50年代初被毁。根据附近知情老人指点，在慈悲庵东北方向上山坡的树林里，有石桌、石凳之处，便是原来墓址。盖石桌、石凳者，乃建园后之新设施，此亦恐“有心人”之所为也。

关于赛金花年岁有不同说法：

1、瑜寿。《赛金花故事编年》。见（In）：吴德铎。《赛金花本事》。长沙市：岳麓出版社，1985—6。第109页。以为赛氏享年应为73岁（虚岁）。即生于前清同治3年10月初9日，岁次甲子，即1864年11月7日，歿于民国25年旧历10月21日，岁次丙子，即1936年12月4日。

燕归来窆主。《赛金花系年小录》。见（In）：吴德铎。《赛金花本事》。长沙市：岳麓出版社，1985—6。第170页。认为赛氏享年应为65岁。即生于前清同治11年10月初9日，岁次壬申，即1872年11月9日，歿于民国25年旧历10月21日，岁次丙子，即1936年12月4日。

刘半农等。《赛金花本事》，见（In）：吴德铎。《赛金花本事》。长沙市：岳麓出版社，1985—6。第1页。认为赛氏生于前清同治13年10月初9日，岁次甲戌，即1874年11月17日。这样，应是享年63岁。

张鸿，光绪甲辰（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进士，常熟人。曾以“燕谷老人”笔名写过《孽海花续编》。抗战前，曾在上海《大晚报》上连载。抗战后，又在北京的《中和月刊》上连载。

上海40年代剧社曾排演话剧《赛金花》，在金城大剧院上演，王莹饰主角赛金花，夏霞饰顾妈。剧情侧重历史性。

赛氏发引后，蒋氏姐弟都没有离开北京。由于经济条件不够，在陶然亭筑房为夫人守灵一事，自然是办不到的。但蒋氏姐弟迁至西城北沟沿西观音寺一间陋室，继承了赛氏生前佛堂的香火，并奉祀赛氏主牌。但生活贫困，顾蒋氏靠附近邻居救济过活。画家徐悲鸿为照顾顾妈生活，曾请她做自己的管家，但顾妈时已67岁高龄，不能劳动，只试工一日就告退了。蒋乾方则被友人介绍到西直门外一尼庵看门，勉强维持生活。他们直到民国36年（1947年）仍在北京。以后情况则不详。

民国10年（1921年）赛母潘氏病故于北京，年78岁。暂厝永定门外浙江义园。赛氏生前对其母安葬一事颇为悬念。故赛氏治丧处决定将母女二人合葬于陶然亭锦秋墩上。大约由于需要补交15年巨额租金，未能实现。潘氏至1947年尚停柩于一个荒寺未葬，以后不详。当年，平市各报，均未报导此事细节。

主要参考资料

吴德铎。《赛金花本事》。长沙市：岳麓出版社，1985—6。第1页、第109、第151页、第187—190页。

中英犹合璧古今一体
的大丧
儒释道圆融南北两合
——英籍犹太人欧司·爱·哈同的葬礼

旧上海租界里最大的冒险家

清末民初，上海租界里有位最大的冒险家，冒险的结果大获全胜。由一个只有 10 块现大洋本钱的小瘪三通过索贿、放高利贷、贩卖鸦片，掠夺地产和租地造屋等卑劣手段，混成了具有敌国之富的远东第一大富翁，赚了一个“生荣死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欧司·爱·哈同（以下简称哈同）。

哈同是英籍犹太人，1849 年 5 月生于土耳其（英殖民地）的巴格达（今伊拉克的首都）。他排行老三。他的父亲爱隆·哈同是当地沙逊洋行里的一名小职员，由于入不敷出，生活艰难，不得不忍心将他打发到国外自谋生路。

哈同当时仅仅 24 周岁，既无文化，又没技术，光凭“两肩膀扛一个脑袋”闯到香港，混了两个月，苦不堪言。但他敢于闯练，遂继一批“掘金”者之后，流浪到号称“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来窥测机遇。

他凭借父亲与上海老沙逊洋行里一位管事人的关系，在那里当了一名“司阍”（看门的人）。因“勤快乖巧”，善于观测谋划，受到大班的赏识，不到一年即改任“业务管事”，旋升地产科“领班”，成为洋行的高级职员。

光绪九年（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当中国获胜时，上海租界的洋人大为恐慌，商贾、传教士、外交官，乃至形形色色的冒险家，深恐中国收回利权，于是将房地产出顶、脱手，特别是法租界地产价一落千丈。哈同却预言此风不会持久，乘机大量廉价收进地皮。后来果然由于慈禧对法妥协，洋人在上海重整旗鼓，十里洋场地皮大涨，洋行又乘机高价抛售，净赚暴利 500 多万两白银，却只奖给哈同 1000 两酬金，而且也未给他晋职，哈同心中有些不满，新沙逊洋行看中这一点，乃与哈同接头，表示愿出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他去当大班的协办，并且表示，大班不久将调升香港总行，遗缺可由哈同继任。因此，哈同便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由老沙逊“跳槽”进了新沙逊洋行。同年他与中国一女子罗迦陵结了婚。光绪十六年（1890 年）左右，哈同升任为新沙逊洋行的“大班”，他一面继续为洋行大做鸦片生意，一面利用他从地产上获取的大量资金，自建仓库，大量囤积烟土。因为哈同知道清廷的所谓禁烟是“寓禁于征”，可以乘机加税，便大量吃进烟土，果然不久“禁令”即如过眼烟云，所谓“华界”里的“黑”市活动，更加活跃起来。烟价在一周中，暴涨了三成，在这一落一涨中，哈同又发了几十万两的横财。

当英租界与美、日租界合组为“公共租界”时，哈同又被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聘为“董事”，后又被租界法院委为“陪审员”，变成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了。哈同利用这种声望和地位，贿买当地的巡警和地痞流氓，以极低的代价强买农民的土地 300 多亩。后均根据“新约”划进了租界的范围之内。此时，哈同已拥有几百万财产，几百亩地皮，又兼任两个租界的董事，已膨胀成为租界的洋“大亨”，不再甘心寄人篱下，于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他脱离了新沙逊，创办了哈同洋行。注册资本 200 万两。其经营项目仍可概括为“二土”：即地“土”和烟“土”。

哈同夫妇用半抢半购来的地皮修建了一所别墅，取名“爱侬园”（俗称

哈同花园)，是由当时镇江金山寺的一位知客僧黄宗仰（乌目山僧）精心设计的，又经管事的姬觉弥参与策划，才逐渐完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该园已扩大到200多亩地。据说，共有楼80座，台12个，阁8个，亭子48个，池沼8个，小榭4个；另有10大院落，9条马路，其它曲径小道、小桥、小屋，不可胜计。有些帮闲文人，说爱俪园有10景，有的说是8景。他们在园内还创办了华严大学，后改仓圣明智大学，并增设了中学、小学、女学。创建了“广仓学寮”、“广仓学会”。并出版了《广仓学会杂志》。

哈同夫妇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进一步扩展生意，在社会上广为结交，挖空心思地沽名钓誉，攀龙附凤。宣统二年（1910年）罗迦陵曾亲自去天津拜见隆裕太后之母老福晋，并认了“干妈”。这样，罗迦陵就与当今隆裕太后成了干姊妹，虽然称不上郡主，却也与皇室攀上“亲”了。后又将老福晋接到爱俪园款待，哈同得了二等室星勋章，并被赐予“公使待遇”。哈同夫人也得到了玉如意、沉香念珠等御赏。民国12年（1923年）又晋京拜见了逊清宣统皇帝溥仪和瑜、珣、璿、瑾、四皇太妃。瑾太妃赐罗迦陵为一品夫人。

当军阀横行的时候，哈同夫妇又把“秤心”偏向北方。军阀也想利用他们，冯国璋当政时，就看重了哈同这个洋“闻人”，可以为他的“南北统一”的主张起些作用，又可以通过他，取得英美方面的支持。所以，于民国6年（1917年）授予哈同以四等嘉禾章。徐世昌登台，又升一级，于民国8年（1919年）授予三等嘉禾章；翌年3月，又升一级，授予二等嘉禾章；还说罗迦陵热心赈灾，授予慈惠章。黎元洪再次登台，又授予哈同以一等大绶嘉禾章。这是北洋政府授给文官和外国使节的最高勋章。可见，哈同和北洋政府的关系，年复一年地亲密起来。

在直皖战争酝酿期间，哈同支援了曹锟约值50万元的枪支弹药。民国11年（1922年）冬，曹锟通过贿选当了总统后，借邀请哈同夫妇北游之际，以促进中英邦交有功，授予哈同一等大绶嘉禾章；授予哈同夫人一级慈惠勋章。

哈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哈同死后，大开吊那天，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远东怪人》。说：

“哈同是远东的大富翁之一。他生前对于金钱，有时一掷千金万金，有时却异常吝啬，常以偶然之爱，化用数万，数十万，而办公室里，常隆冬不肯升一火炉。

“哈同之在上海，可说是白种人在中国的一个象征，他现在死了，盖棺论定，可以说他是一个严格的个人主义者。他崇拜着各种宗教，怀想着各种欲望，从无满足之时，做事，专拣有利于己的去做，以一个外国人，竟拥有如此巨额的财产，可见他本领的高强和狡狴，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可悲和可耻。

“哈同生前曾捐资兴建犹太教堂，并影印佛经全部，最近又雇人将《可兰经》全部译成中文出版。所以，昨天爱俪园中，各种教徒、僧尼、居士，前往祭吊者，不下数千人。”

正是由于哈同这个特殊人物（一身横跨三国）又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创下了特殊的“业绩”，所以，他的身后大事自然是一个中、英、犹太合璧，儒、释、道圆融，南北混合古今一体的“大丧”，可称是古今奇观。倒给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添了一份“多姿多彩”的材料。

敌国之富成梦幻 求神求医俱无灵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 20 年代末的时候，哈同“王国”已经越过顶峰，逐渐走向下坡路了。彼时，哈同已是 80 开外的衰翁，几经病患，心力衰竭，无法再逞强好胜。尤其是中国政局的发展趋势，已超乎他的意料之外，昨天还召见他们的皇帝、总统，今天已变成阶下之囚；昨天，得到他们所赐的勋章、“恩赏”，珍如瑰宝；今天，统统变成了勾结军阀和帝制余孽的罪证。孙传芳占领浙江后，扬言要查封他苦心经营起来的“罗苑”。上海政局也动荡不定，进入了多事之秋，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权势几度易手，哈同感到无所是从。而且，租界里的工潮时有发生，“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更使他胆战心惊。所有这一切，都使哈同夫妇心灰意冷，当年的创业心，几乎丧失殆尽。

民国 20 年（1931 年）夏天以后，哈同的“泻病”复发，经常头晕目眩，体软不能自持，竟至卧床不起。他素日“御用”的中西医，以及市面上的名医、“时医”都束手无策。

他的爱妻以及义子、义女们见求医不成，转而求神，以赎万一。故多次去犹太教堂，为哈同向“唯一真神”雅赫维祈祷。在罗迦陵亲自主持下，频伽精舍的尼僧，以及带发修行的优婆夷们为哈同做了多次的“延生普佛”。曾为乌目山僧黄宗仰主持过的家寺里十几位高僧以及他们的徒弟们都为哈同的早日康复祈建“增福延寿消灾解厄吉祥道场”。

值得一提的是，总管事的姬觉弥在早年不得志时曾经当过道士，了解道教有除邪攘解的法事，可使垂危的病人得救还阳，乃向罗迦陵“献计献策”。于是派人以重金从江西龙虎山请来了第 63 代嗣汉天师张恩溥到爱俪园里设坛打醮。

张恩溥那年 27 虚岁，乘四人肩舆而来，舆前有“龙王免朝”、“诸神免参”两揭示。随行有“法官”4 人，“护法童子”1 人。天师头戴五岳朝天冠，服蓝花缎八卦仙衣，足登云履。时风华正茂，颇有道骨仙风。总管事的跪于大门前迎迓（因他是“三清弟子”）。

天师先做的“清事”，除邪镇宅；后做的“延生普堂”，包括“抢患告斗”、“延生告斗”，燃延生灯、寿星灯……并用了龙虎山天师府特有的神符宝篆和“禁咒”——求病者愈神咒——召神为之除疾。并将盖有天师宝印的神符给哈同佩带于身。但是，谨遵《道门科范》如法如仪地诵经、上表、燃灯、礼斗等法事俱都举行过了，仍不灵验，寿夭的“定数”难逃，天师亦回天无术。罗迦陵这才傻了眼，忙令管事的姬觉弥给哈同准备后事。

当时，人们以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论来发议论，上海人说：“任你千算万算，到头来逃不出阎王一算。”老北京人则说是“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算尽则亡”。哈同也难逃这一规律。任凭他 60 年来巧用心机，将中国人算计尽了，赢得了敌国之富的家当，到头来也难免应了“空着手儿来的，还得空着手儿去”的典。

哈同终于在民国 20 年（1931 年）6 月 19 日，天将落日时，一命呜呼了。

花园一夜成白色 后事千般效逊清

大约是鉴于哈同生前是逊清皇太后的“亲戚”吧，故管事的姬觉弥与罗

迎陵马上决定，一切部按照老北京的习俗办理，还要突出王府的气派。于是，特请清末中堂那桐府中的管事王连五任丧仪总办。从杠房、杠头、杠夫、厨房厨师、茶房到棱糊匠、棚匠、彩子匠，都邀请北京城里有名的。

哈同府治丧处，以王连五为首，再加上府内的食客、帮闲文人几十位。几乎上海所有“闻人”都在这里挂名，好听的名衔繁多，不及备载。这个治丧处不亚于一个小规模的政治机关，内分庶务、礼宾、会计（帐房）、文牒等科。办事人员及仆役皆为训练有素者。一律身穿白夏布大褂，整齐严肃。

哈同刚刚“倒头”，姬觉弥便指挥全园工役连夜突击，用白油漆将所有园内建筑物上的油漆彩画，绿椽红柱改装成白色。第三天，上海各大报纸都以显赫的地位报道了这条大新闻。《申报》的标题是“爱俪园一夜成白色”，副题是“哈同今晨入殓，花园中安葬”。正文为：“昨晨（二十日晨）起，爱俪园中各处，若戩寿堂、天演界、媼姪门、燕誉堂等，一律挂白。沿静安寺路之朱漆大门，经前晚一夜之工作，完全刷成白色。墙上贴有‘哈同府治丧处’黄纸一条。”有的报纸还载有：园中的树木也刷以白粉，凡红色的廊柱、匾额，也一律涂以白漆……宛如雪后的银装世界。

园外静安路从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口起，直至哈同路（今铜仁路）口，马路上一律搭起了白布顶盖的“过街棚”，棚外檐子上镶了蓝白电灯，两旁也装上了电灯立柱，挂上挽联，饰以松柏和黄白纸花。

爱俪门前扎起了巍峨的素彩牌楼，上书：“东辕”、“西辕”字样。彩子活从大门口的牌楼起，到进门的“头道槨”、“二道槨”，所有的金漆红花架子上都有三蓝彩绸和绣球垂挂。与这些架子的装饰互相映衬的是各道门口、各楼台亭阁上的彩子和绣球。园中走道，均以蓝白彩布扎成了临时走廊，悬灯无数，并挂满挽联。园中一处圆形草地，中竖一碑，亦以挽联组成。入夜碑中电炬放光，洵属奇观。

爱俪园除大门外的过街棚外，一进门两旁还以席箔、彩绸扎了钟、鼓二楼，完全是皇宫内院大丧的格局。院内扎了临时上祭棚、落座棚、纸扎冥器的防雨大罩棚，还有迎旭楼以东靠花墙长廊的墓穴棚（坑棚），而且每座棚前都扎了不同形式的彩牌楼。

祭堂前搭了一丈二见方的大月台。堂内的装饰更是精美绝伦，一律用蓝白两色相间的龟背锦图案的彩子隔扇，做出孝属陪灵的苫席，前边扎出半圆的圈门，左右有黄龙抱柱的彩子活。俨然是一座大佛殿。

一切务尽其美，务尽其奢。据说，只彩子活一项就花了好几万银元。

入土为安先下葬 赫赫大殡未出园

哈同的丧礼程序与老北京不同，这大约是根据犹太族的风俗习惯。先出殡安葬，然后再开吊。若非早有准备，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好在坟地是现成的，就埋在园内迎旭楼以东的空地上。坟墓是用大理石砌的。

哈同生前早就给自己准备了寿材。据说，是从东南亚某个国家定购的贵重木材，在上海攒成的，并且依中国习俗涂了七七四十九道大漆。连同工料、运费，大约花了5万多两银子。死后第三天即依犹太族古礼入了殓，不在园里任何地方停灵，马上即发引安葬。

虽然是在园内安葬，殡仪却仍按北京大王府的势派去办，有仪仗、响器，也有僧道送殡，约有千人左右的队伍，抬着哈同的灵柩在园内兜了一圈之后

才埋葬。

走在殡列最前边的是一座三丈二尺高的大“铭旌”，由 32 名身穿绿驾衣的杠夫抬舁导行。表示引魂上路。这完全是中国汉人的仪节排场。

接着便是一长列的彩亭；完全是精工细作的“全活”，饰有五脊六兽的宫殿顶子，饰有狮头栏杆的须弥座。座上插以红漆金纹的抬杆。

第一组为全黄色的彩亭：其中有“圣旨亭”，内供奉清逊帝溥仪颁发的“视同公使”的上谕。第二座黄亭内供奉逊帝“恩赏”的“二等宝星勋章”。以下依次为全黄色的“御赏亭”内供清室赐予的匾额、画卷、福字、三镶玉如意、沉香念珠、朝珠、冠服、珊瑚、荷包、尺头等等。每座黄亭都是用穿着大红驾衣的抬夫 8 人抬舁而行。每座并罩以曲柄黄伞一把。

第二组为五彩亭，分别抬着民国政府（北洋军阀）大总统冯国璋、黎元洪、曹锟颁发的嘉禾章，以及盖有民国“荣典之玺”的嘉禾章证书。每座彩亭都用穿着绿驾衣的抬夫 8 人抬舁而行。

第三组为古典宫殿顶子，敞门、须弥座的大影亭一座，内供哈同大幅画像。用身穿白孝衣的抬夫 16 人抬舁而行。另有绿帷领魂轿一乘，内供哈同灵牌，外罩黑纱帘。亦用身穿白孝衣的抬夫 8 人抬舁而行。外加“引炉”16 尊，由未成年的男童以龙头棒提之以行。

第四组为蓝白两色彩子扎成的“更衣亭”4 座，内放哈同生前穿用过的袍套靴帽；“四宝亭”4 座，内放哈同生前用过的笔墨纸砚、印章、书籍，以及他生前喜爱的文玩、古董。

彩亭之后是数不清的“万名旗”、“万名伞”和冲天大幅的各式锦旗、锦标。

响器有北京市面上通用的官鼓大乐（拉号、官鼓、唢呐、跟锣）带小乐儿（笙、管、笛、九音锣）。还有汉人专用的堂祭清音锣鼓“九福班”以横笛、堂鼓、小锣吹打细乐。当然，还有公共租界警政方面主动送上门来的军乐团。

园内频伽精舍的尼僧，家寺里的大德高僧与他们的徒弟，都身披红缎金线福田纹的袈裟间杂在殡列之中燃香相送。还有被邀请解襁未果，尚未归山的六十三代嗣汉天师率领的道众披着缎绣的对儿衣相送。上海市的犹太教徒也捧着《圣经》步随其后。这是华人满、汉葬礼当中罕见的现象。

可能还有仓圣明智大学、中学、小学、女学的师生代表前来执紼。

最后是按老北京的 64 人的大杠，抬着哈同的灵柩，外面扣了一卷红绣片的“头水儿”的官罩，所有的杠夫都身穿新绿驾衣，新土黄的套裤，新青布靴子。而且要求剃头、洗澡、斋戒三天，最后经哈同府治丧处审核筛选的。

至于他的义子们是采取打幡、抱牌的形式，还是按阿拉伯人的习俗顶丧驾灵（长子站在前头横杠里，两手驾杠而行，谓之“驾灵”；次子在杠后将头顶在横杠上，谓之“顶丧”），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这个殡仪是个大杂烩，既有满清遗老的排场，又有洋教的风味。是个古今罕见的奇观（因为任何宗教都忌讳一身二信）。

家奠如祭孔死后算“先贤”

哈同生前在他的贤内助罗迦陵的怂恿下，在乌目山僧黄宗仰的影响下，曾出资在园内办起了华严大学来“弘扬佛法”；继而又通过道教而转向崇儒，

改办仓圣明智大学。诚然，道教是个多神教，尤其是全真派主张“三教圆融”。罗迦陵自从到仓圣庙（道观）里进了一次香，居然与“造字”的仓圣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将仓颉置于孔子之上。他办的“大学”、中学、小学、女学，还有什么“广仓学窘”、“广仓学会”，每年春秋两祀仓圣。当时，姬觉弥主办的《广仓学会杂志》对此有所记载：“大学面东设礼堂，德清俞阶清太史颜其额。堂址宽敞，中肃立古圣仓颉先师牌位，左配为周太史籀、秦太史令胡毋敬、司隶校尉程邈，右配为汉祭酒许慎，中郎将蔡邕、魏太傅钟繇。上列乐器厨四，下置钟鼓、祝敌之属，及羽籥、干戚各舞器。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九月十八日循例祭祀，歌舞交作，郁郁乎，观者咸有周礼在鲁之感。”

爱侖园祭祀仓圣遵照历代相传的古礼进行，祭先贤须用烧好煮熟的整猪整羊各一只，名为“少牢”，放在特制的方盘里上供。祭孔子还须添一头全牛，名为“太牢”。仓颉是比孔子还伟大的先知先觉，自然也该用“太牢”。不过，这与佛、道两教戒杀生的戒条相矛盾，所以罗迦陵使用名同形似的素“少牢”、“太牢”来献供。祭祀时，还要用各种古乐器奏“中和韶乐”，跳八佾之舞，一如春秋丁日祭孔之仪。

哈同死后，其祭堂上的布置与家奠仪式，与祭先贤——仓颉、孔圣的古礼无异。祭堂上两旁置钟磬、大鼓、鼗鼓、干戚、羽旄、箫、管、琴、瑟、祝、敌、缶、以及爵、笱豆（11）、俎豆（12）等古代的乐器和祭器。上祭时，由大同乐会郑觐文老先生以仓圣明智大学校友资格，参加奏“中和韶乐”，哈同生前所办学校的64名学生穿着特制的服装跳八佾之舞。俨然是在祭孔。这种作法，显然是丧礼当中的孤例。这如果在前清时代，是违犯国家典制的，就是在民国期间，虽然国家礼制未修，人们的婚丧礼仪不受约束。但在社会舆论当中也是要遭到非议的。也就只有哈同在外国租界里的租界——爱侖园里，才能有这种荒诞不经的举动。

中犹合璧的讣闻 沽名钩誉的行迹

据上海《申报》称：“据罗夫人之意，于安葬完毕后，再择期开吊，同时发表正式遗嘱。断七（13）后，拟在园内风景幽静处，树立铜像、石碑，永留纪念云。”

在哈同死去17天（发引半个月后）才正式发出讣告。民国20年（1931年）7月6日的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恕报不周”的大幅讣闻：

“欧司·爱·哈同公，痛于本年国历六月十九日酉时，寿终爱侖园正寝。距生于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即清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五月初四，耄寿八十三岁。迦陵即日遵照犹太教礼，亲视含殓，恭率家族，一律成服，安葬本国。兹择于国历七月二十三日设奠领帖，叨在世谊，谨此讣。

闻

主丧妻罗迦陵泣血稽颡。”

与此同时，洽丧处还印发了5000份特大张幅的讣闻。其式样比当年盛宣怀还阔绰十倍，乃是用宽约二尺，长有七八尺的素色纸精印而成的。讣闻正文一开始就将自清末以来，哈同毕生所得的荣誉罗列尽至：

大中华民国晋授勋一位，晋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一等文虎章，特赠“抗怀希古”匾额，历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二等文

虎章，二等嘉禾章。大清国特颁二等第一宝星，特恩赐宴，特颁“为善

最乐”匾额，历蒙颁给春条、对联、福、寿、龙、虎等字，无量寿佛，三镶如意，江绸库缎，白玉扳指，瓷瓶，荷包，红茶果饵，佩文韵府，全部散氏盘拓本等。大英帝国欧司·爱·哈同公痛于西历 1931 年 6 月 19 日，即夏历辛未年五月初四日酉刻，在上海爱俪园正寝归真（中略）。主丧妻罗迦陵。孤子：罗泌、斐利浦、乔治、罗义、礼既；孤女：爱茉莉、美浦尔、娜拉、美特铃、德学尼、伊娃；内姓义子：罗友翔、罗友后、罗友兰、罗友良、罗友山、罗友仁、罗继祖；内姓义女：罗岫海、罗馥贞、罗慧秀。内姓义孙：罗丙麟、罗赓赓、罗雅清、罗丙奇、罗丙寅；内姓义孙女：罗舜茵、罗舜藻、罗舜华、罗舜胤、罗舜万。内姓义子婿：杨瑞麟、庄肇一、杨庆昌；义侄：姬毓维、姬毓生、姬毓龙、姬毓鹏。治丧主任义弟姬觉弥。

罗迦陵从来没生过孩子，哈同一生既未纳妾，又未搞过“外室”。罗迦陵是个孤女，哈同也早和他的兄弟姊妹一刀两断。他们遗留的亲人，只有收养的二十多个义子、义女。据说，这些义子义女，有的是朋友介绍的犹太孤儿，或白俄儿童，有的是从侍童中或仓圣小学里挑选的。最多时，他们曾收养过 40 多个，后来经过淘汰，留下了这 20 多个。

哈同在遗嘱（称为“第一遗嘱”）中，开列的义子女都以哈同为姓，义子计有：大卫·乔治·哈同、罗弼维多·哈同（讣闻上译作“罗泌”）、飞列浦·哈同（讣闻上译作“斐利浦”）等 5 人；义女计有：娜拉·哈同、马特兰·哈同（讣闻上译作“美特铃”）等 6 人。罗迦陵死前也留有遗嘱（称为“第二遗嘱”），又增加了收养的中国子女，义子有罗友兰、罗友翔等 5 人（比哈同讣闻上少两人），另有罗友良（已早死）；义女有罗馥贞、罗慧秀等 5 人（比哈同讣闻上多两人）。登在报上的哈同讣闻仅具其妻罗迦陵之名，没有按中国传统礼仪，从服制上和应具的礼节上（如“泣血稽颡”等）将其确认下来的义子女的名字列出来。至于单独发出去的 5000 份讣闻虽然义子、义女、内姓义子、义女，内姓义孙、义孙女，甚至内姓义子婿等统统都罗列了出来，但仍未按中国传统规矩从服制上相应地书具应持的礼节。而且与后来罗迦陵的遗嘱所确认下来的义子女在人数上有所出入。

此外，哈同公治丧处还编印了一册精美的《哈同先生行述》，内有哈同遗像、哈同生平事迹等。还有段祺瑞的匾额“乐善好施”；吴佩孚的匾额：“慈善可风”。此外题像、题赞的还有国民党“党国要人”戴传贤（考试院院长）、于右任（监察院院长）、王伯群（交通部部长）、王法勤（中委）、陈继承（军长）、梁冠英（军长）、钮永建（元老）、陈调元（省主席）、韩复榘（省主席）等。

北洋时代的人物有杜锡珪（海军总长）、董康（司法总长，后成汉奸）、岑春煊、李厚基（福建督军）、卢永祥、许世英、陈宦以及“闻名”的卖国贼曹汝霖等。

上海的“闻人”，除市长俞鸿钧外，还有虞洽卿、杜月笙、王晓籁、袁履登、林康侯等。研究系的名流张君勱、张东荪也题了赞词。

信仰太复杂道场“大杂烩”

哈同是犹太族人，信仰犹太教。自 24 岁来中国上海后，其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不对他有所熏陶。尤其是与罗迦陵婚后，先是通过乌目山僧黄宗仰和当过道士、和尚的姬觉弥，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很大，

后又受到儒家的影响。由于哈同来自中东阿拉伯地区，对伊斯兰教耳濡目染，亦有所好感（曾翻印《可兰经》）。哈同可称是世界各大宗教的综合信仰者。按宗教者的说法，一身不可二信。凡多信仰者，乃无信仰也。俱信者，亦俱不信也。

中国人丧事的度亡道场最大特点，并不是完全依照亡人生前信仰而办的。有的是根据其后人（丧主）的信仰；有的则是依照亡人与丧主的共同信仰。但绝大多数并不是什么宗教信仰问题，而是用来壮大丧礼场面，摆谱显阔，炫耀自家富有，以便增辉于门第。有的生前什么都不信，只要家里一落白事，马上就什么都“信”起来。

哈同的度亡道场当然是综合性道场，不尽如法，不尽规范，处处别出心裁。这当然仍是姬觉弥和罗夫人的一手杰作。

据说，哈同的度亡道场一共办了“七七”49天。如从倒头之日，6月19日（即阴历五月初四日）开坛，应于8月6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三日）圆满。但不知根据什么，却在“五七”35天，即7月23日开吊、成主。

道场基本上分为四坛，即番、道、僧、尼（是否同日起经不详），分别在爱俪园各处作法。根据治丧处要求，法事不限专用在度亡上，而是广行各种功德，然后“回向”给哈同，使之存亡两济，各得善利。

从北京雍和宫请来了49位喇嘛，俱头戴黄色藏帽，身穿红、黄两色的法衣、法裙及袈裟偏衫，携带蒙藏轻重法器，如大铜“刚冻”、插柄大鼓、铙钹、海螺号、人皮鼓、金口角、锁呐、海笛、铛子……等。每天在搭就的“宝盖式”的法座上诵经。不限于度亡专用的经典，而是将藏传佛教主要的经典都从头至尾唸诵一遍，目的是向亡人说法，让亡人皈依佛、法、僧三宝。前后安排的主要经典有：《皈依经》、《大白伞盖经》、《绿相佛母经》、《白相佛母经》、《普贤愿文》、《弥勒愿文》、《极乐愿文》等。

每“七”循例要放一台“观灯（传灯）焰口”。喇嘛焰口与汉传佛教的和尚焰口有所不同，和尚的焰口是由主法的“金刚上师”戴上五佛冠代表佛来号令鬼神，而喇嘛的焰口则是座上所有的喇嘛一概头戴五佛冠，均为“金刚上师”。尤其在放焰口之前，加上燃灯（观灯）法事（供养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和十殿阎君）殊为可观，喇嘛念经时，由铺排（经坛上的杂务）们用老弦做走线，牵动一个“灵人”（亦作“灯人”绸缎做身，泥做头，三尺来高的假人），灵人手托装有灯花的漆盘，一一传给跪灵的孝家。“灵人”出入左右彩子圈门，有如戏台上的出将入相。

据说，还搞了“跳神”。大抵是祈建了“善愿日”大法会，由番僧们扮成了天神、鬼怪，跳了“布扎”（打鬼），表示除邪迎祥。不过，这是番经外出应酬法事当中的孤例，在丧事中举行这种宗教仪式的，诚是“史无前例”的。

北方人以汉传佛教的禅经为主体道场，但南方人，包括上海人多以道经为主体道场。哈同及其家属不能不受这一影响。六十三代嗣汉天师张恩溥为哈同解襁未验之后，可能根本就没归山，继续留在爱俪园内主持设坛打醮。大约除了罗天大醮没做之外，几乎所有的法事都做到了。每天法事两头循例加上《太上早晚坛》（14），早晚坛中间才是正式的经忏法事，依次为：《玉皇经忏》、《真武经忏》、《三官经忏》、《观音经忏》、《斗经斗忏》、《朝天忏》、《青玄忏》法事包括上表、供天、炼度、专炼、上供、发递、亡斗、开启、结篆、青玄朝、请圣、燃灯、召孤魂、施食赈济等等。

至于禅经、尼经自然是以园内频伽精舍和家寺里的僧尼为主。不足之数再由龙华寺等庙作补充，以与番、道两坛位数相等。不过，被请来的僧、尼都是经过这位曾经出家为僧的姬觉弥亲自考试才“录取”的。总之。哈同这桩佛事不好应酬，因为姬觉弥和罗迦陵两位斋主全是“内行”。而且还请了三位长老坐在一个单设的小龕里进行监经。

按“七七”四十九天的佛事，循例为以下四种，方为周隆圆满。

一、诵经：向亡人说法，让亡人皈依佛、法、僧三宝，以免坠入“三涂”。所诵的经典是：《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大佛顶楞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观音菩萨普门品》、《金光明经》、《药师如来本愿经》。并相应加唵诸品神咒。

二、礼忏：替亡人向佛忏悔生前的罪业。包括：大悲忏、地藏忏、净土忏。

三、燃灯：即在放焰口之前加上燃灯佛事，即诚演《地藏十王宝灯》，以传灯作传法，以传法作度亡。以灯供养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和十殿阎君。请地藏勿违“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本愿。

四、施食：施放《瑜伽焰口》解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戴罪之鬼，向他们放赈施食、使他们各得饱满，皈依佛、法、僧三宝，脱离饿鬼道，该托生转世的托生，该升天的升天，各得善果。以此无上功德“回向”给亡人。

据说还有佛教居士主动进园诵经作法，不过，“随喜”的居士每坛都没有定数，所以没有列入正式的经坛道场。

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在此期间，上海的犹太教堂为哈同做了祈祷；天主教堂为哈同做了“弥撒”；基督教堂也为哈同做了“祝丧”仪式。诚然，追悼哈同的宗教活动是“土洋结合”的大杂烩。

稀奇古怪荒乎其唐的大开吊

“春满八千岁，日尽三万觞。茫溪黄叶落，黎杖白云乡。须发想奇古，精神仍老苍。大千多被泽，佛寿永无量。”

这是姬觉弥挽哈同的一首五言律诗。见诸于哈同“五七”开吊时的各大报刊上。

7月23日，哈同府正式领帖受吊。前往爱俪园的路上，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吊客盈门，其盛况不可言喻。从西摩路以西，临时停止车辆通行。园外站满了巡捕、包探和“红头阿三”。

是日上午8时至下午4时，共到中西来宾两千余人，其中，华人占十分之八、九，虽有洋人，但寥若辰星，并不多见。爱俪园的东西两端，扎了高大的素彩牌楼，横贯静安寺路，称为“东辕门”与“西辕门”。大门前也扎了素彩牌楼，两旁高挂“哈同府”白底蓝字的聂灯。鼓手十余名坐在号房中，以鼓乐接送来宾。来宾入门须投以名片，再于来宾签到簿上签名，始由招待员发给黄花一朵、哈同公遗像纪念章一枚，系于左衣襟上，然后依照规定的白色路线曲曲折折走向祭堂。经过之处，两旁均扎了白绫匾额及白绢立柱，上画花草，兼有挽词。布置之美，引人入胜。

土坟一堆 乐队两排

走进燕誉堂前面的花园，从蓊郁的绿荫中即可望见哈同的土坟，突出地面，如一小邱。坟前扎白布八角亭一座，亭的左右两侧，花圈、花篮无计其数。只见有两排身穿白制服的军乐队，站立于亭前，不见手动与口吹，但闻乐声续续发自亭间，令人感到奇怪，但只要近前一看，就会知道那是纸糊的烧活，但惟妙惟肖，酷似活人，可谓技艺绝伦，屈指一数，共 58 位。回顾亭中，计有三班军乐队，轮流吹奏哀乐。坟前堆满鲜花，中间悬一用花朵扎成的“奠”字。两旁悬有挽联，上书：“香花成佛地；乐土作公琴” 10 字。由此往南，向西一拐，即可直奔祭堂（在燕誉堂），沿路素彩牌楼一座接连一座，不可胜计。还有沪北保卫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给维持秩序。凡来宾行至燕誉堂大门，即由男仆引进，经过四厅，始至灵座，鞠躬叩首，一如客便。有的洋人，西装革履，亦执香下拜，侷促之状引人发笑。礼毕，由招待员迎入客厅，赠以哈同遗像扇子一把及纪念手帕一方。

厅分四五座 鼓如七石缸

祭堂可谓富丽堂皇。自燕誉堂大门起，共分为四厅：第一厅悬挂着大门灯及名流挽联。喇嘛鼓手两人，立于厅角，为来宾打鼓传报。并有喇嘛一班，在此吹奏西番乐。第二厅悬挂着哈同生前所荣获的宝章证书及各界所送的挽词。并有军乐队一班。喇嘛鼓手两名，站在两旁，司击鼓之职，鼓大如七石缸。第三厅四壁满挂绸幛布联，中设祭筵一桌，并设军乐队一班。第四厅辟为食堂，为上宾坐席的地方。堂的四周扎满了白球素彩。第五厅始为祭堂，左为男宾席；右为女宾席。屋角置有电光灯四盏，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此拍摄记录片时所用。当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如狄子平、关炯之、袁履登等）行礼上祭之际，即放光拍影。从祭堂小门走出，穿过花园一角，至“天演界”戏台，上面挂满名流挽联，其中，吴佩孚的代表樊德光所送的挽联云：

“是西方佛，结东土缘，来去有因圆宿果；
泛北海槎，历南洋岛，梯航无处不知名。”

又张安泰挽云：

“受天方戒，证菩提果庇杜陵厦，被白衣裘。”

天演界后面则有文海阁与戩寿堂两处经坛。文海阁内是从北京请来的喇嘛，操蒙藏的轻重法器在此诵经。一对喇叭长约一丈六尺，铜鼓庞大如圆桌，吹奏起来声震屋宇。戩寿堂中，六十三代嗣汉天师率道众作法，一律身着黄色氅衣。正与文海阁遥遥相对。

开吊的场面庞大，但不尽规范，道场亦不尽“如法”，与传统的丧礼大相径庭。诚是稀奇古怪，荒乎其唐。

祠中留主位

根据哈同公治丧处的安排，要按照中国汉族人的风俗习惯，举行盛大的点主（成主）仪式（并将在爱俪园内建立祠堂），以便给义子、义孙们留下个可供奉祀的主位。

点主例来被视为白事中的红事，祭堂上扎起了花红彩球，供案上红烛高烧，地下满铺了红毯，好像办喜事一样。所有的义子、义女们都脱了孝衣，换上吉服，由鼓乐、仪仗前引至花园门前迎接鸿题官（点主官）、襄题官（陪

主官)。

点主官、陪主官都是哈同府上礼聘来的“三鼎甲”。他们都身穿清代官服，头冠花翎顶戴，乘坐着丧家事前给他们准备好的8人抬绿呢大轿，前边铜锣开道，就像清代官员出巡一样。原来，一位是前清末科状元刘春霖，由他执笔点主；一位是榜眼夏寿田，担任右襄题官；另一位是探花郑沅，担任左襄题官。此外，还请来了传胪（二甲第一名）张启后，以及曾为清代翰林院供职的高野侯、蓝云屏等几位遗老，分别担任前引官、大赞、襄赞等职。

吉时已到，鸣炮奏乐。点主官、襄主官正冠、束带，在公案正面升座后，由孝子捧主出堂，行三拜九叩大礼，恭请点主官赐福点主。以北京为主的北方人点主是用鸡血滴在朱砂砚里，用新笔蘸之，点在“神主”的“主”字一“点”上；但南方，包括上海，是用孝子的血滴在朱砂砚内来点主。至于究竟是用了义子乔治·哈同的血，还是用了义弟（管事的）姬觉弥的血，那就无从考证了。

点主后，主牌供在祭堂上，开始举行家奠。奇怪的是哈同夫妇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义女，却让所谓的“义弟”姬觉弥担任主祭。这个仪式除了仿效祭孔、祭仓圣的那一套以外，循例再特请这几位翰林公三讲《论语》：一讲“孟懿子问孝”；二讲“子游问孝”；三讲“子夏问孝”。次讲《孝经》选段。最后，由仓圣小学学生组成的“歌诗团”循声朗诵《诗经》里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一段。

礼成后，哈同府在贵宾接待室摆上了四干、四鲜、四糕点、四冷荤“四四到底”的燕翅席款待了点主官、襄主官、前引官、大赞、襄赞等几位遗老。席间，乔治·哈同等义子、义女以及管事的姬觉弥等依次跪叩谢席，由清音细乐精吹细打在一旁参礼祝赞。最后，由姬觉弥代表哈同府向点主官刘春霖呈上“菲敬”银元1万元的红封；向襄主官夏寿田、郑沅呈上“菲敬”5000元；又赠前引官、大赞、襄赞等几位翰林公各3000元。对于茶房、厨师、执事夫、轿夫、响器（吹鼓手）、彩匠等也都分发了赏钱。

冥界建花园

送圣也没有上街，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届时，番、道、僧、尼、居士纷击法器，当然还有犹太教教徒捧着《圣经》，排成长长的大队，由鼓乐前引，在园内各主要的大道上绕了一圈之后，将纸扎的楼库、冥宅一一焚化。

据说，给哈同烧化的冥宅是以爱俪园为基本“蓝图”扎糊的。也是虎皮石的围墙，内里称得起是黄琉璃瓦的朱亭绿掩，红栏杆的桥曲廊环。楼台亭阁错落有致，池塘、假山陪衬其间，大菜间、弹子房惟妙惟肖，房内的设备，以及厨师、听差、仆役、门卫也一应俱全。只是没有仓圣明智大学，也没有僧寺、尼庵，却添了一幢高耸的犹太教堂。尽管只是具体而微的模型，还是占地达半亩之多。这是由京、沪两地裱糊匠数百人攒起来的艺术绝活。按南方人的风俗习惯。一切纸糊的建筑物，都是匠人边扎糊，僧、道一边唸经持咒，表示施法筑库。等到扎糊完毕，法事也圆满了，二者是相应的。最后才由孝子们捧着“度亡文疏”，僧、道各诵《送圣功德赞》、《送化赞》，点火焚化。这样，作为哈同的后人来讲，总算尽到了孝道——让哈同把生前所置下的产业带走了。因为给哈同烧化了纸扎的假花园，才好扪心无愧地继承他的真花园。

哈同的丧事前后折腾了 49 天，牵扯京、沪两地的几十个行业，几千人。据说，耗费了银元达 80 万元之多。其奢靡的程度令人咋舌。

夫人亡时业亦亡

10 年之后，即民国 30 年（1941 年）10 月 3 日，哈同的夫人罗迦陵也“驾返瑶池”了。当时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讣告：

“大英国欧司·爱·哈同德配、显妣罗迦陵太夫人，痛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即夏历辛巳年八月十三日申时，寿终于上海爱俪国内寝，距生于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清同治三年岁次甲子七月七日戌时，享寿七十八岁。不孝男罗友兰、乔治·哈同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即日成服。谨择于国历十一月十一日，即夏历九月二十三日家奠，十二日即夏历二十四日安葬于显考莹次。叨在世谊，哀此讣告。”

耐人寻味的是讣告最后署名的孝眷分为中、外两组：一组是罗友兰、罗友仁等 6 人；一组是乔治·哈同、罗意·哈同等 4 人。“孤哀女”也分两组，一组都叫罗××，另一组是爱茉莉·哈同和娜拉·哈同等。共合子、女 20 多人。最后，还有“治丧主任义弟姬觉弥顿首拜”，像当时一般讣文后的“杖期夫”××顿首拜一样。

同时也编印了所谓“行述”，详述了她生平所受的封典：

清室恩赏：特封正一品夫人。特恩赐宴。御书“福曜双辉”、“种德树福”、“为善最乐”、“寿逾百岁”、“功德无量”等匾额。御绘佛像、花卉等条幅。颁赐朝珠、冠服、珊瑚、荷包、克食、尺头、如意。特赏紫禁城乘肩舆。

中华民国：特赠一等慈惠章，一等二级宝光慈惠章。大总统特颁“慈淑贤祥”、“鹤寿”等匾额。

国民政府：国府主席特赠“仁寿之符”、“寿考维祺”等匾额。

在园内停灵 41 天后，与哈同并了葬。其葬礼的形式、内容与哈同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时事变迁，星移斗转，就整个丧事规模来讲，自然要比哈同略逊一筹，然而治丧的一切开销也用去了 45 万多元。

罗迦陵死后，仅仅两个月的时光，日寇就发动了“一二·八”太平洋战争。与英美宣战。爱俪园和哈同洋行均被日寇“军管监理”。至此，哈同“王国”的“领土”和“基业”几乎与哈同夫妇同归于尽了。

罗迦陵（1864—1941）原籍福建。其父罗路易，在法国轮船上当水手后，移居上海。罗迦陵一岁丧父，靠母亲佣工为生。她本人曾给一法国商人当劳工。光绪十二年（1886 年）嫁与哈同为妻。

“新约”：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北方发生义和团事件，美国人福开森向上海的英、美、法等国总领事出谋划策，乘机向中国方面交涉，大大扩充租界。经交涉后，签订了新约。公共租界西面从西藏路划到静安寺以西附近，东面从杨树浦推广到顾家浜（现平凉路、军工路附近），共计扩充面积达 22800 多亩。在 1845 年“开埠”之初，订立的《租界地皮章程》中所规定的英租界面积，只有 830 亩；后来，和美、日租界合并，一共也不到 1 万亩；经此次扩充，总面积达 33500 多亩。法租界的西界，也由八仙桥附近一直扩展到徐家汇，扩大了几十倍。这样，哈同以贱价收进的 300 多亩土地，就都列入了租界的范围。

爱俪园，欧司·爱，哈同私人花园。1904年初建，1907年、1910年两次扩建。园内景点繁多。围墙长廊以西为迎旭楼、燕誉堂、崇礼堂、仙药窝、戩寿堂、天演界、西爽斋、文海阁、大拨云假山、曲径湾、环云转等。长廊以东为，海棠艇、孔雀亭、接叶亭、挹翠亭、玲语阁、梅园、一字亭、烟水湾、絮舞桥、延秋小榭、九思廐、驾鹤亭、山外山、冬桂轩、风来啸、涵虚楼、水心草庐、万牲固、岁寒亭、大果园、万化坞、赊月亭、俟秋吟馆、茝兰室、飞流界、九曲桥、大好河山、石舫、待云楼、扞碧亭、黄蘗山房、菊园、听风亭、舍利塔、石坪侨、一带春、红叶邨、红枫集景、蝶隐廊、椒亭、黄海涛声、频伽精舍等主要景点。民国30年（1941年）“一二·八”后，被日寇接管。后毁于大火。1953年在其废址上兴建了“中苏友好大厦”，1955年落成开幕。从60年代起改名为上海展览馆。

广仓学窘、广仓学会：“窘”音“群”，群居之意，近乎“家”字与“会”字。广仓学窘是个常设机构，有固定的人——大约十余人，在此办事和研究，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和杂志。广仓学会则是一个只有空壳的团体，以崇敬仓颉为号召，邀请百多位当年的耆老和下野官僚，到花园里玩几次，作为会员。

张恩溥（1904—1969），即第六十三代嗣汉天师。字鹤琴，号瑞龄，谱名道生（又名岩生），为天师道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字晓初）之长子。1949年去台湾。1969年去世。享年65岁。

中和韶乐：清代之大乐。顺治元年议定，祭天地、太庙、社稷均用中和韶乐。康熙五十二年，考订黄钟，重加制造，乾隆时又加修改，后遂因之，凡大朝会、大祭祀，殿陛皆奏此乐。

八佾：“佾”音 yì，跳舞的行列、行数、人数纵横均等谓之“佾”。如天子八佾，六十四人也；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文庙丁祭亦用八佾。祭孔舞者为“佾舞生”，也叫“乐舞生”，泛指文庙之歌生、舞生。

鼗鼓：“鼗”音 táo，长柄的摇鼓，俗称“拨浪鼓”。

祝：“祝”音 zhù，古乐器名，以木为之，形如方斗，上广下狭，深一尺五寸，三面木板，正中各隆起如鼓以受击，一面正中开圆孔纳击之具，作乐时，先击之以起乐。击祝之具谓之“止”。

敌，音 y 古代一种打击乐器，用以止乐。

（11）筮，音 bī n，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果祭品等的器物。

（12）断七、俗以人死，每第7日为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则卒哭。第49日召僧道诵经，俗谓“断六”。

（13）太上早晚坛：即道教的《玄门日诵早晚课》。

主要参考资料

徐铸成。《哈同外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1983—4。第171页。

《爱俪园速写》。《申报》，1931—6—21。

《哈同花园办丧事》。《北平晨报》，1931—8—5。第6版。

巨人大棺小殡万人观 ——在理公所、万牲园公葬“巨人”魏集贤记略

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是清代光绪末年推行新政时的建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大臣载泽、端方等人出洋考察新政时。为了向慈禧太后献媚，从外国买回了一些狮子、老虎、斑马等动物，先放在广善寺饲养，后迁入在“三贝子花园”东半部盖的几幢六角形亭式的兽房内，从此，有了动物园的雏形。园子的西半部多为荷塘、稻地，大有江南水乡的意境，又经人工从各地移植了一些珍奇的树木花果，以应“万牲”的本意。慈禧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曾经“临幸”一次，次年即对外售票开放，成为北京最早的一个公园。

万牲园初办时，为广招游人，不但在园内动、植物展品上广为猎奇，而且在雇用员工上也下了一番功夫。当时，有一刁姓，身高2米有余，有“金刚力士”之称，被园方招去。起初考虑让他做动物饲养员或清洁工，与动物同时成为展品。但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有损于员工的人格，更有损于人类本身的尊严，对此抱否定的态度。园方几经商计，最后决定，将刁某安置在园外门口做检票员。当然，他仍被当做展品，已尽在不言中，但不管怎么说，从形式上已与被展览的动物绝然分开了，在舆论上也能交待了。看来，当时的万牲园园方是很有远见的。果然，北京城里的人都慕“巨人”之名而来园参观。

民国5年（1916年）姓刁的这位巨人死去，园方乃千方百计各处物色“继承人”。当时，有魏集贤者，原名世明，河北深州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人，当时，44岁。身高2米许，异常魁梧，是名符其实的“堂堂七尺男儿壮”。俗云“身大力不亏”，自少以石匠为业，手艺超群。清末，因予末科状元刘春霖做石器数件，颇蒙赏识。当刘氏听说万牲园门前需要“巨人”二名，乃将魏集贤推荐给该园。园方旋又从别处招来另一身高2米许的刘玉清与魏一起专门司门前守卫之职，当时煊赫一时，每日往观“巨人”者，必在数千之众。当年有不少文人对此有所记载，如叶德辉《观古堂诗集》中有一首《游万牲园诗》，写的是民国初年游万牲园的情况，诗云“万牲园中列万物，飞潜动植充林麓……钱髯语我园游好，四月黄云麦秋早。入门突见两长人，伛偻接客如山倒……”。四川人邓谔民国16年写的《春游杂事》诗后作注云“三贝子园司閤有长人二，余等不及其肩。其一为西人雇以重金，鬻技于海外都会，获利不貲”。这大约是指刘玉清。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巨人”并没有发财致富，晚年都混得穷极潦倒。

“七·七”事变后，市面萧条，民生凋敝，各处都在裁减人员，正赶上刘玉清患病经久不愈，多日未能上班。这时农林试验场（万牲园）新换了一位场长，名张玉皋，就职视事后，首先调整人事，认为刘玉清不能服务，遂予革职。刘玉清失业后，贫病交加，旋即身死。与他一起值班的“巨人”魏集贤目睹刘之惨状，黯然情伤，连想到自己将来也必遭如此之下场，因而忧虑过甚，神经突变，竟于园中投井自杀，事被同人及时发现，将其救护，送往精神病疗养院诊治。

魏集贤终身未娶（旧称“童男子”），少年时代即加入阜成门内西城根后大坑静修堂“在理”，拜当家桂芳为师。桂芳认为魏某为“童子理儿”（即从小就“在理”）乃赐予“游方领众”，自其患病后，静修堂道友们

及万牲园中的同人，恐其发生意外变故，遂发起为其准备后事。首先是集资为他订制了一具红柏木的特大棺材，长一丈余，其厚度是：大盖为六寸；两帮各五寸；底四寸，而且略厚于此，成为“四五六放样”加码的汉材，令人看了赫眼。并购置了一套与之合身的特大加码（加肥加长）的寿衣，一并存于静修堂内。

本来，魏某经医生极力治疗，精神业已恢复正常，农林试验场方面乃将其接回，令其照旧值班。不料，上班仅仅一天，竟于次日早晨 [此为民国 27 年（1938 年）1 月 11 日晨] 突然死于场中。卒年 66 岁。

（工龄 22 年）。场中同人颇为惋惜。

次日，北京《新民报》在六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巨人”魏集贤逝世的消息，标题是“巨人又弱一个”。作为万牲园来讲，用堂堂七尺男儿值勤于大门的事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

阜成门内后大坑静修堂“在理”公所乃与农林试验场场方研究，如何处理善后，双方认为，魏集贤无妻无子，孑然一身，只得予以公葬，由场方赏给数月工资，作为举办丧仪之费用；静修堂道友及农林试验场同人亦公议助葬，各自慷慨解囊，即在农林试验场南墙外的便道上搭了一座灵棚，将魏之灵柩停入棚内，设了简单的灵堂，并决定停灵受吊 5 天。

自报上发表这宗消息后，西郊农林试验场连日来人满为患，很多人并非是逛万牲园来的，而是凭吊“巨人”魏集贤的，结果将腊月的游览淡季变成了旺季。

13 日接三。棚前只有一班“怯吹儿”的乡间吹鼓手，在间歇地吹些民间小曲，糊了一套骡拉轿车，四个墩箱的“接三活”。并没有什么可看的東西。只有棚里亮盘停放的一丈多长的大棺材是个新鲜物，可资瞻仰。还有就是阜成门内后大坑静修堂“在理”公所出了一档子火壶茶会，大紫铜的茶汤壶和青花磁的茶壶、茶碗摊子，摆了个迎门冲。因为不预备酒席，对任何来吊的宾客一律是“清茶恭候”，所以，这档子茶会倒成了抬大柱的。是日，阜成门左右在理公所老当家的、道友们都冲寒前往吊祭。凡游览万牲园的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都顺便到棚内外一吊。居然还有送“折祭”札金的，送“金银鏤簋”官吊香的。因没有本家孝属张罗一切，所以，凡是在理的道友就都成了临时“知宾”。这确是有钱难买的场面。

当时，北京的城门有早启晚关的制度，如果晚上不关城，许多好事的非等着一起送三不可。天黑前，虽然散去了十分之八九的人，但直到善乐寺的和尚进棚上座时，棚内外还有等候送三的约数百人之多，由于人多，官吊香只分给每人一根，来个象征性的火祀。送三的队伍排出去一里多地，前边的怯吹鼓手都到了今天的 107 路电车站，紧后边的和尚还刚刚出棚。许多人纷纷议论说：“看起来，为人一世不在于有后无后，而在于有无人缘儿。”

魏集贤自己当然没有坟地，还是在在理公所桂芳老当家的倡议下，由道友们的公议将他埋葬在阜成门外九天庙旁的静修堂公地里。15 日一早，由一班怯吹鼓手：一笙、两唢呐、一鼓、一钹、一云锣前引，万牲园的职工代表数人（多是其生前友好），还有几十位在理公所的道友们的冒着严寒步行送殡。后边便是一付 24 杠（原议用 16 名杠夫，但灵柩过大，杠短人少抬不了，故改 24 杠）抬着魏的特大灵柩，柩上披了一面红色绣花的过棺罩片，来个大亮盘的形式，也好让路人看看这个罕见的大棺材。西直门外的乡民们和一早赶来看热闹的人们仍不少于前天接三的盛况。在当年，这当然是个微不足道的

穷殡，但它却有个特点，即：巨人、大棺、小殡、万人观。

原为明代近郊御园，名乐善园。清初为康亲王园亭，颓废已久。乾隆十二年（1747年）重加修葺，仍名乐善园。后成为傅恒三子福康安贝子的私人园邸，俗称“三贝子花园”。园内建筑屡有废圯改建，现存畅观楼、春堂、幽风堂皆为晚清所修，主要目的是供慈禧去颐和园途中休息。光绪末年，将广善寺、慧安寺并入，建农事试验场。民国时期依旧，只是名称稍有改变。民国18年（1929年）改称天然博物院；民国23年（1934年）复改名北平农事试验场，俗称万牲园。50年代初，称西郊公园；1955年正式改名为北京动物园。

三贝子花园，“贝子”是满语“固山贝子”的简称，亲王、郡王之子有的封作“贝勒”，贝勒之子得封为“贝子”。“三贝子”是行三的“贝子”。此即崇彝所说的宝文庄，名宝兴，道光末年大学士兼四川总督。但另有传说，三贝子是清异姓郡王忠勇佳勇贝子富察氏福安康，他是傅恒三儿子，因称“三贝子”。园正名“环溪别墅”，此园后又归内务府文麟，改名继园，因事查抄归公。

清军有《军人十愿》歌“一愿军人志气强，人无志气铁无钢。堂堂七尺男儿壮，要到军前战一场”。

在理，旧指在理门的人。理门，发源于明末清初，是汉族人民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其创始人为羊来如，系山东即墨县人，在河北省蓟县岐山澜水洞创立“理教”，以劝戒烟酒为名，联络道徒，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民国后演化为民间一般会道门。

游方领众，特指理门在外传道时的首脑（当家的），他可以组织所到之处的理门信徒散众一起活动，可以接受散众的供养。

主要参考资料

《巨人又弱一个：魏集贤死于农事试验场，特制红柏棺木长达丈余》。
《新民报》1938—1—12。第6版。

近世名人葬例综述（代后记）

《近世名人大出殡》一书写完了吗？

没有！就笔者的具体条件来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只能算是暂告一个段落吧。本来，就北京地区和与此有关的名人葬例，所应该选入的，其例数是无法胜计的，绝不仅仅只是本书所选入的三十几例。仅就笔者手头掌握的零星材料，当可信手拈来，作一拾零性质的综述。

一、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根据《优待清室条件》，还允许北京紫禁城里存在一个逊清小朝廷。从民国2年（1913年）至民国13年（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订了优待清室条件，将溥仪等撵出皇宫为止，这个小朝廷按旧制，对于旧时的王公、大臣死后，予以加封谥号、赐奠、赐恤，有案可查的就有32人（见附件）。这些人都是遵清制治丧的，当然不外乎像载涛、恽宝惠写的《清末贵族之生活》那一套繁文缛节的丧礼。但其中不乏反映清代礼制的典型例子，例如：亲王、郡王、贝勒有郡王衔和无郡王衔的；入八分和不入八分的镇国公、辅国公；王爷的福晋、侧福晋和“母借子爵”的侧福晋，在丧礼上有什么区别，表现在何处？在这些死后受封谥号、赐奠、赐恤的王公大臣里可以找出一整套、一系列的具体例子。但很可惜，至今还未找到这些具体、详尽的资料。

二、逊清小朝廷民国13年（1924年）彻底覆灭之后，王公以及其他清代遗老，仍遵清制发丧，北京市内以此为尾声的，例如：

蒙古喀尔喀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那彦图，其祖先策凌因助清廷平定厄鲁特有功，历代均袭封王爵，并曾两次“尚主”（娶公主为妻）。

那彦图系第七代王爷。

民国27年（1938年）4月16日凌晨3点30分，在北城钟楼后王佐胡同本府病逝。卒年72岁。18日，以番、道、禅二棚经接三。21日，移灵西黄城根嘉兴寺。其殡仪由东四猪市陈记永盛杠房承办。遵清制发丧。以红寸蟒大罩，挂杏黄色“走水”，64人大杠，用杏黄绊绳、杏黄托垫抬灵。杠夫大换两班，俱在青毡荷叶帽上插了杏黄色的雉翎。杠侧擎举八面杏黄色白光的拨旗，上书“王府奉移”字样。用了全堂满、蒙仪仗，约千余人。前往执绋送殡者300多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特派该府驻北京办公处处长敖云章，于20日赶返北京致祭。

伪临时政府为追念那彦图之勋德，发表“府令”，以示褒崇之意：

“蒙古喀尔喀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那彦图持恭端谨，秉性忠纯，早树楷模；宣力民国，历任要秩，久著勤劳，望重雄藩，名隆辅翊。兹闻溘逝，悼惜殊深。论功勋之共闻，宜身名之俱泰，永为者硕，乃不慙遗。追念老成，足为矜式，特敷峻绩，以示褒崇。此令！”

因那王府在经济上已临山穷水尽之地，其子祺克慎变卖了仅存的珍玩，给乃父治丧。停灵乃为掩其不能依制在府上受吊的窘况。其归葬事宜皆无下文。

逊清少保朱益藩及其夫人于民国26年（1937年）相继去世，夫妇一同发丧。5月2日，在东四十二条私邸开吊。自晨9时起，前往致祭的中外名流有冯恕、傅增湘、江朝宗、福开森，及军政要人代表200余人。市长秦德纯、邵力子、于右任、焦易堂等，均送了挽联、谏词。下午5时，以番、道、禅三班送库。次日由私邸发引。夫妇灵柩俱用64人大杠，移往宣武门外法源

寺停灵暂厝，参加执紼送殡的约 300 余人。亦为京城走双灵形式的大殡。可惜资料不详，无从细述。

刘春霖，系清代末科状元，日伪时期病故。按清制治丧。殡前按汉官礼俗“成主”，丧家以重金聘请了逊清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傅增湘为点主官；前清翰林潘龄、郭小禄为襄主官给刘春霖建立“神主”。未归葬原籍前，在下斜街长椿寺停灵暂厝，其殡仪由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承办，用了“五半堂”幡伞，就光官衔牌、功名牌就有 100 多块。64 人大杠，大换两班。殡列经由石驸马大街时，遇有原闾巷公立的栅栏门楼；下斜街街道过窄，均走不开 64 人大杠。伪北京地方法院书记官张益之任总提调，严令杠头保持原杠、原罩（不得拆卸杠、罩上的任何设备，不得减少杠夫），直抬至庙内，倒让信成杠房露了一手绝活。此是北京市内最后一个“状元殡”。

三、关于民国北洋军阀、政客的葬礼。

民国初期的政客葬礼，除冯国璋等少数人外，多发生在天津。

据说，天津最大的殡要属民国 9 年（1920 年）江苏督军李纯了。他亡于任内，由其家属扶柩回津治丧。灵柩一到津寓，首先搭棚修经，远近亲族，以至街坊故旧皆来挂孝守灵，每日有酒席招待。发引前开吊两天。在此期间有家奠、成主等礼仪。僧、道对棚经，作观灯、洗佛、拜表、变幡等法事。每日早晚开席两次，开席的地方有五、六处，都是海味鸭翅席，还有清真席，款待回民亲朋。凡来吊唁者，每人发给新孝衣一件，并早晚招待他们吃饭。举殡时，几乎用了天津白货铺的全部“大座”，如诰命亭、黄旗、黄伞，抬亭的都穿红驾衣（这是清朝銮仪卫的制度）。许多好久没人肯用的文武执事都搬上了街头。由刘把儿杠房承揽殡葬，用了 64 人抬的独龙杠，扣了一卷新绣的京式大罩。此举轰动了整个天津，其“盛况”不亚于皇会。凡殡列经过的街道，家家接亲招友看热闹，甚至有在沿街搭看棚的，到处万人空巷。民国 12 年（1923 年）9 月 12 日，张勋病逝于天津，其殡仪之盛也是近代屈指可数的，但京、津各大报刊均不载，故未得其详。只见张氏死后，其家属在各大报刊上发了一份报丧“口报”；一份正式讣闻。

口报称：

“张大帅少轩于旧历八月初二日未时逝世；初三日巳时大殓：初四日接三。此报

闻

天津英租界松寿里张宅号房 谨启

正式讣闻：

恕报不周

不孝梦潮等罪孽深重，祸延

显考

论授光禄大夫、建成将军

予说忠武少轩府君痛于癸亥年八月初二日来时寿终津寓正寝。兹穆卜于夏历九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领帖。二十七日发引。哀此讣

闻

渭渊

孤子张梦潮、梦津泣血稽颡

范汾

大功服弟嘉猷泪顿首燦云

运迎
功服侄肇达肇迹拭泪顿首
通迪
建邀

据说，他的葬礼“备极优隆”。张作霖特地从兰州赶赴天津亲自主持，丧葬费共花去 20 万元，概由张作霖一人出资办理。张勋在津寓开吊三天，除京、津各要人外，其他苏、鄂、豫、鲁及徐州各处的朝野政客、名流，或与夫人一起亲临致祭，或派代表致祭。因人数过多，京津、京奉两线火车座席全满。吊客尤以军界为多，约占全体人数的 70%。民国总统中还有个曹锟，自民国 16 年（1927 年）2 月后，一直定居于天津，作了“超级寓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拉他下水，参加伪政权，但曹锟始终拒绝合作。

民国 27 年（1938 年）5 月 17 日，曹锟病死于天津英租界，时年 76 岁。伪北京临时政府故作姿态，特予 5000 元（伪联币）治丧费，并通令各机关于 5 月 25 日下半旗一日，以资追悼。据报载，5 月 20 日接二之日，前往吊唁送三者，接踵于门，一时素车白马，络绎于途。除河北省省长高凌爵代表伪临时政府前往致祭外，天津市市长潘毓桂及天津市署各厅长、局长亦均亲临吊唁。潘毓桂系与曹氏为故交，待送挽联曰：

“法统昔重光，谁知动地鼓，萧墙变起，纽解纲维，从此纵流沉禹迹；大勋终未集，遽见遗骏弓剑，薄海悲同，仗空仪卫，徒得积雪讶尧年。”其挽幛曰：“祀崇百世”。

此外，靳云鹏、吴佩孚、王怀庆、陈光远、朱作舟等人亦亲临祭奠。至下午 5 时余，由番、道、禅三班纷击法器，引导孝属，将纸扎车马送至英租界河沿焚化。

但可惜，这份资料不全，其成主、伴宿、发引等实况待查。

另一位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于民国 28 年（1939 年）6 月 5 日死在天津寓所，享年 85 岁。由承重孙主持丧事。6 月 6 日辰时大殓，7 日接三，7 月 2 日成主，3 日受吊，4 日辰时即移灵英租界 40 号路南头弢园别墅。可惜，只知上述治丧日程，具体细节均不详。

至于冯国璋的身后各事，尚未见到有关材料，只知他是民国 8 年（1919 年）12 月 28 日，死于北京地安门外帽儿胡同寓所，余者均不详。

四、属于旧官僚，堕落为日伪汉奸，得势时获得厚葬的。

日伪统治时期是旧京婚，丧礼俗回光返照的时期。民间的婚、丧礼俗固然受到经济上的制约，而一再从简。但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上层人士”则与此相反，遇有婚丧仍大办特办，其内容与形式仍是以传统礼俗为基础，略以新礼作为点缀。例如：

民国 30 年（1941 年）8 月 22 日，伪陆军总长蒋雁行病故后，在家停灵受吊 35 天。9 月 23 日，延请清代遗老给点主。24 日以番、道、禅经伴宿送库。25 日发引时，用了 64 人的大杠，汉执事五半堂幡伞，充溢于街市，殓列达二华里之遥。大殡出细瓦厂，经西交民巷、司法部街、西单、宣武门内大街、菜市口等处，至法源寺停灵暂厝。所经街巷，万人空巷以观。

北京市伪商会常委杜善斋于民国 30 年（1941 年）6 月 27 日病故，在西城公用库家里停灵受吊 15 天。伪市长余晋和、市商会代表邹泉荪、姚泽生、高伦堂、杨绍业、封心传、魏子丹等，均前往吊唁。7 月 10 日，以番、道、

禅经伴宿送库。11日发引，用了48人大杠，三半堂幡伞执事。其势派仅次于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的葬礼。这一历史时期，北京市内较大的殡仪还有：

伪冀东道22县府尹王继章，死于北京东板桥织染局家里。其殡仪由地安门外信成杠房承办。发引时，用了64人大杠，五半堂幡伞执事。殡列约二里地长。

伪河北省省长高凌霄死后，在京西卧佛寺现置的坟地。发引时，由宣武门内大街同顺杠房承办一切，用了64人大杠，五半堂幡伞执事，至西直门换乘新式灵车，直抵茆地。

较大的殡仪，还有伪警察局局长钱宗超发送他母亲。其殡仪由前门外西柳树井恒升杠房承办，亦64人大杠，五半堂幡伞执事。其规模仅次于名伶杨小楼的大殡。

还有一个于海门，其身世不详。早年承办所谓“八旗王公生计维持会”。事变后，为了换取日伪政府之信任与支持，以便顺利地开展“业务”，于是请出前驻日本大使庄景科之弟庄景松任会长，并将该会易名为“东亚亲善联络会”。因该会办理的会务（为八旗王公后人向日伪当局争讼产权）与名称、宗旨、完全不符，故被日伪当局明令取缔。于海门气脑之下致疾而亡。其丧事亦颇具规模。伴宿时亦番、道、禅经送库，还仿照其生前的住宅糊了一套四合房。这是日寇投降前夕，绝无仅有的殡列了。

五、属于汉奸死于日伪垮台之后，由其家属进行草葬的。由于内容空洞，没有列入本书正文。如：

王揖唐，曾任伪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赈济部总长、内政部总长，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较前任王克敏等越发助纣为虐。自称佛教居士，曾出资修缮弘慈广济寺。应日本主子之命，在全市灭犬，为洗滌自身参与“残害生灵”之过，曾于北沟沿翊教寺给狗举办“孟兰盆会”，名为“超度畜灵息灾法会”，请僧众念经、烧法船，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好戏，成为民间笑谈，此亦为旧京之奇闻。光复以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王逆接到初审判决书后，在监房设观音菩萨位，大哭，许愿说：“如果我要能活下来，还要重修广济寺”。未果，终于在民国37年（1948年）9月10日被处死。12日在广济寺接三，仅用九僧念了一天官经，晚间送焚一纸轿车、一马、四墩箱。夜间放了一台“瑜伽焰口”。据说，有吊客送了几轴挽联，其老妻顾氏为避免是非，亦未敢悬挂。

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的王克敏，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因汉奸罪被捕。王逆自知罪责难逃，故于12月在狱中畏罪服毒自杀。死后停灵于雍和宫后身的柏林寺，出殡时，仅用了16个人的小杠无声无息地抬走了。

六、属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名人殡例。

回民殡葬一般不用棺木，多是从清真寺里借来临时盛殓用的活底棺木，谓之“买太匣子”。回民茆地是在坑内掘洞，内做一铺“土炕”，谓之“喇哈儿”。下葬时，将遗体放在土炕上，撤去买太匣子，然后掩土，是为土葬。至于买太匣子用完仍送回清真寺。极个别的富户有自用棺木的，谓之“塔木”。例如：中国农工银行经理常朗斋死；聚义银号（后改银行）总经理常铸九的老父亲死，都是在原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兼材厂）定做的柏木材，但与满、汉两族的棺木形状、用法不一样。是个长方形的材，四框和上盖厚

度均等，常朗斋用的是三寸板；常铸九的父亲用的是五寸板。总之，是四框一盖，与底分开，底是用薄板方盘铺上黄砂土，使遗体直接接触于土，仍不失为土葬。这乃是回民所特有的殡葬形式。

这两位金融界的回民大殡都是用的 64 人大杠，扣绣花官罩（回民官罩上不得有动物图案，主要是忌讳上边有眼睛），挂着黑底白阿拉伯文的“经符儿”（“符儿”读作“堵儿”）。杠前有提炉 24 尊；盘炉 32 尊；炉亭 15 座，每亭内放置檀香炉一尊。这大抵是北京三四十年代回民以伊斯兰教礼仪出殡的典型例子了。

民国 33 年（1944 年），华北道教总会副会长、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火神庙）方丈田子久羽化，按道教仪范治丧。在庙内停灵受吊 21 天。全市各道教官观云集经师 70 多位，给他办了“无上资度升天道场”，举行了盛大的送圣仪式。发龛时，以 48 人大杠，扣红寸蟒大罩一卷，用了五半堂幡伞执事。此是北京最后一个道教界的大殓了。

佛教界除了本书已选人的现明和尚示寂后的隆丧厚葬以外，还有现明和尚的得法恩师道阶长老的茶昆发龛，这也是北京佛教界一件备极优隆的“盛事”。道阶为民初法源寺的方丈。民国 23 年（1934 年）阴历二月初一日，道阶圆寂于南洋英属槟榔屿普陀。其弟子梵月躬亲迎灵，并于是年阴历三月初八日，在法源寺设坛追度，北京各大寺院高僧均云集于该寺，为道阶诵经礼忏，规模盛大。事后，道阶长老茶昆后的“坚固子”，即安放于该寺天王殿前东跨院塔内（现只存塔基）。可惜，其葬礼仪节无档可查。

沈兼士是我国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留学于日本。民国元年（1912 年）秋来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及厦门、清华、女子文理学院等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以及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代理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等职。民国 36 年（1947 年）8 月 2 日，因患脑溢血身故。沈兼士生前信奉天主教，死后即以 32 杠抬往嘉兴寺停灵，按天主教仪礼治丧，居然在佛教庙内举行了所谓“终傅式”。本来，终傅式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一般都在教徒年迈或病危时，由神父用经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念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借此赋恩宠于受敷者，减轻他的神形困苦，赦免罪过。但沈兼士因急病身死，事出突然。

故在开吊之日下午 4 时补作终傅式。发引之日先抬柩“游堂”，由神父念经祝祷之后，始行抬埋。

北京道德学社“非佛非道，乃民间之杂教”，其“师尊”（社之首脑）段正元于民国 29 年（1940 年）1 月 26 日寅时示寂，享年 77 岁（清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生）。该社弟子共同决议公葬段师尊，其殡仪极为隆重，特由宣武门内大街同顺杠房承办。发引所用的官罩新颖别致，系红缎底子满绣金龙，与当年段祺瑞执政所用之官罩比起来，更为别开生面。灵柩、仪仗之前则由纸扎的韦驮佛法身领路，表示“护法”。其殡列由西单头条出发，赴海淀善缘桥山庄安厝。此系民间“杂教”首脑之葬例。

世界红字会副会长、中华总会会长封永修，于民国 32 年（1943 年）6 月 18 日病故。享年 90 岁。当由红字会出面发丧。在家（北池子七十六号私寓）停灵受吊“三七”二十一天，按传统丧礼举行了盛大的成主、伴宿送库等仪式。于 7 月 8 日，以 64 人大杠、五半堂幡伞发引，暂厝于陶然亭龙泉

寺。此亦当年有特殊宗教色彩的葬例。

七、属于旧戏曲界名伶的殡例。如：

陈德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京剧青衣演员，幼年，先后入全福昆科习昆旦、京剧青衣兼刀马旦，以唱功著名。20岁被选入宫，成为“内廷供奉”。所演京剧《祭江》、《彩楼配》、《芦花河》，昆剧《昭君出塞》和吹腔《奇双会》等，素为人们所称道。师事陈门学戏的很多，当年梅兰芳、王惠芳、王瑶卿、王琴侬、姜妙香、姚玉芙，并称为陈门的六大弟子。

民国19年（1930年）7月27日，陈德霖因患伤寒症去世，终年69岁。据说，他的哀荣并不亚于王长林、杨小楼等人。他的丧事由曹心泉主持。棺木是女婿余叔岩所赠。接三之日，伶界往吊者极多。甚至年逾古稀的侯俊山（老十三旦）亦特地从张家口赶来吊祭。由王琴侬、姜妙香及余叔岩担任知宾。

陈德霖在家停灵受吊11天，8月5日伴宿送库；6日辰刻发引。在此期间，伶界同人、票友及各界名流都赠有挽联，根据兼葭蓂主所录，发表在当年《戏剧月刊》上的就有48幅，其中不乏佳作。例如：

出版界票友老生张笑侠挽曰：

“打破十年红，莫不足入江返照，濒危尚耦薛平贵；
已赢双鬓白，竟难迟浮海归槎，顿失师资陈最良。”

戏曲作家傅绪——清逸居士挽曰：

“旧事无人谈天宝；
伤心落泪泣贞元。”

王瑶卿挽曰：

“平生风义兼师友；
一别音容两渺茫。”

王长林挽曰：

“桃李蔚新英，尽属公门培植；
梗楠储伟器，咸归大将准绳。”

尚小云挽曰：

“往日仰师程，先生云亡悲菊部；
崇朝惊噩耗，老成凋谢痛虞歌。”

梅兰芳挽曰：

“木坏山颓，十日迟归慳一诀；
情深调合，甘年亲灸剩千哀。”

此外，梅兰芳、余叔岩、王琴侬、姚玉芙、俞步兰等各送经杆一棚。

发引之日，许多著名演员和社会名流都参加了送葬行列，其中有：余叔岩、李水利（李万春之父）、王琴侬、韩世昌、王惠芳、时慧宝、尚小云、程砚秋、杨宝忠等数十人。灵柩从百顺胡同丧居出堂后，过韩家潭、五道庙，走樱桃斜街，入观音寺，出大栅栏东口往南，至珠市口再往西。梨园行同人在虎坊桥十字路西北侧搭一条棚，棚前三门式的素彩牌坊上书“艺德可风”，上款书“陈德霖夫子千古”，下款写“梨园占行（旦行）公祭”。众弟子、友好公祭后，再往西走骡马市大街，进丞相胡同，经官菜园上街，至南下洼子梨园义地下葬。人物、殡例均属典型，但跑遍图书馆，尚未找到具体资料，亦只好暂缺。

又，从已故陈家驥先生遗稿中查到关于《梅花鼓王金昌身后萧条，平津

两地曲艺界义助治丧》一文。人物、葬例颇为典型。

民国33年（1944年）6月17日，著名梅花大鼓老艺人，北平鼓曲长春会副会长金万昌病逝于和平门外琉璃厂百合园八号其外孙赵绮霞家中，终年73岁。

金万昌逝世后，北京曲艺界的著名演员白凤鸣、常连安、侯一尘、高德明，以及其弟子白凤麟、刘连玉等组织了“治丧后援会”，由京、津曲艺界同人发起义演，为其募款治丧。当时，天津曲艺界著名演员骆玉笙、常宝堃、方红霞和北京的白凤鸣等共代为募款9000元（伪联币），在和平门外延寿寺内停灵开吊。金万昌出殡之月，北京曲艺界同人均往送殡，“穿孝衣者，达百余人……所经之处，观者塞途”，殡仪颇尽哀荣。

但其后事，仍未得其详，无档可查。

以上这些近代名人葬例的片片“散叶”，有的由于残缺不全，或还存在某些疑问，暂时无法还其原貌和全貌，只能留待日后再接；有的则因葬式雷同（传统殡葬是规范化的有其固定的内容与形式），因而典型重叠（如清末慈禧太后娘家妈——皇姥姥的殡仪），无须赘述。

这里，还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的是，本书资料的来源。过去，有关婚丧礼俗，包括近代名人葬礼资料，除紫禁城内有清史档案可稽外，余者可供参考的档案，图书典籍、报刊杂志，均属寥寥。本书资料的来源主要是：

一、笔者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如民国35年（1946年）12月15日，北平各界公祭吴佩孚；民间艺人胡德全（胡老道）“女死当出嫁”等，都是笔者随家长前去随礼而见到的情况。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广化寺、嘉兴寺“看热闹”而得来的资料。说是看热闹，实是等于在戏班里坐科一样。因为通过看热闹，结识了许多有关婚丧用品出赁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是庙里专门以应酬停灵暂厝为业的管事者。虽然与他们没有“师徒”关系，但实际上都成为我“坐科”授业的“师傅”。应该说，笔者是从办红白喜事总提调“科班”学出来的，要比真正“坐科”的从业人员学的全面、系统、深刻。

二、笔者近年通过对居京耆老的访问而获得的活资料。例如：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大出丧一事，已有原贵寿彩子局萧景泉先生写过《丧葬琐记》一文，登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亦附在《八十三天皇帝梦》一书中。但根据当年旧丧礼，似乎还有许多应当有和必须有的重要环节。如袁氏的入殓、殓具、殓衣、殉葬物、孝属的“遵礼成服”；有无接三之举，是否有送圣——送库仪式？既然让大老婆给抱罐儿，其辞灵撵罐仪式什么样？都不清楚。于是，笔者曾向一位知情的老者陈家骥先生请教。陈先生原是和平门内大六部口六合棚铺的后人，他的祖父、父亲曾应过慈禧、光绪“万寿”，以及慈禧、光绪大丧的棚彩全活，也承办过袁世凯死后，在北京中南海和原籍河南彰德治丧时的棚彩全活，曾见到袁丧的始末。因此，曾经断断续续地谈过当年有关的实况。陈先生就其记忆所及，作了较为详尽的补充。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仍属阙疑。笔者仅就采访所得，在萧先生《丧葬琐记》一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和补充。本书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笔者亲闻之类的材料，如溥仪在伪满时给谭玉龄举行的“暂安”大典；敬懿、荣惠两太妃的奉安大典；以及清末摄政王载沣的葬礼等，都是由前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少经理狄恒业先生提供的资料，经笔者参考其它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的。又如：《现明和尚圆寂法会、发龛、荼毘纪盛》一文则是通过佛教界，原翊教寺方丈德福、原中南海万善殿主持宽、原广善寺僧人赵敬和等人的

口述，以及正果法师、却西活佛的弟子弘道居士献出的有关图书资料整理而成。并请北京佛教协会会长修明长老题写了篇目。至于其它篇章则多是根据有关图书，报刊资料整理荟萃而成。均于篇末标明出处。

本书全部篇章虽是旧闻重提，但又是旧事新闻，而且带有珍闻的性质，例如：伪满谭玉龄的“暂安大典”，即属于不可多得文史资料。又如：名僧现明的圆寂法会、发龕、荼毘等具体情况都鲜为人知。对于后人认识、了解过去，不无补益。

《近世名人大出殡》之所以成书，应该说是笔者毕生善于观察，不辞上访，不耻下问，善于搜集的结果。至于查阅有关档案、报刊资料只不过是為了将原有的活资料不足之处填齐补平，进一步核实，将有出入的部分作些必要的修正而已。还应当说明的是，根据过去老前辈所提供的资料或有关线索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图书报刊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当年，凡属这些东西多不上纸笔，查找起来，如同翰海淘金，淘出的“金”并不见得很纯，还须加工提炼。虽然几经寒暑，矢志不辍，废寝忘食地“淘”“冶”，就所得的资料质和量上仍不能令人满意，写起书稿来，仍是缺东少西，难称初衷。本书纯系文史资料性的参考读物，它不是一般的文艺作品，也不是什么演义、小说，所以就必須力求真实可信，对于历史以及世世代代的后来人负责。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因此对每一葬例，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敢稍作渲染，而是一律采用“白描”的笔法进行“纪实”。力争在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大的梗概上不致有误。但笔者志大才疏，功力不足，学识有限，再加之所掌握的资料残缺不全，又一时难以全部核实。尤其是旧图书、报刊杂志印刷质量奇差，一些文言体裁的祭文、挽联、匾额，甚至出现的人名、地名、专用术语有不甚清晰之处，因此，本书在引文上可能出现错字、别字。至于全文的阙漏与谬误之处那就更是难免，深望专家、学者、同人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笔者谨向上述提供资料的老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

常人春

1996年端阳后两日于北京

满、蒙执事。满执事不只专为满人使用，凡满、蒙、汉二十四旗皆可使用。满、蒙、汉各旗执事基本上一致，只是个别之处略有区别。京城无特定的蒙八旗、汉八旗的执事。因此，满执事亦可称为“旗执事”。凡门纛（旧时军中的大旗）、曲律（满语译音，即小型门纛。旧时，八旗当中参佐时用之），均以丧家和亡人所在的“旗”色为别。正色为黄、白、红、蓝四旗；镶色亦有四旗，黄、白、蓝三色镶红边；惟有红色旗镶白边。旗旄红纓为汉军；黑纓为满、蒙。又以旗旄旁所系之红布荷包、枕头、圆饼、分汉、满、蒙。

北京《新民报》1938年4月17日。

北平《民言报》1937年5月2日至5月3日。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杨绍周《解放前天津吃红白饭儿的》1989年4月第一版。

北京《顺天时报》1923年9月13日；9月20日；11月4日。俱第5版。天津《大公报》1923年10月1日第2版。

北京《新民报》1938年5月19日、5月20日。

北京《新民报》1939年6月6日第1版。
北京《新民报》1941年9月26日。
北京《新民报》1941年6月30日。
内部资料：《陈德霖评传》陈志明编著。

附 件
关于逊清小朝廷对于旧王公大臣死后加封谥
号、赐奠（朝廷谕祭）、赐恤的记载
（1913年12月至1923年9月12日）

民国2年（1913年）12月15日，原御前侍卫正蓝旗满洲都统三等承恩公桂祥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银5000两治丧。

民国3年（1914年）1月20日，礼亲王世铎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恪”，派贝勒载涛前往奠醊，赏银3000两治丧。

同年1月29日，奉恩辅国公寿全去世，溥仪赏银1000两治丧。

同年11月4日，豫亲王懋林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敏”，派贝勒载润前往奠醊，赏银1000元治丧。

民国4年（1915年）4月10日，睿亲王魁斌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敬”，赏银2000元治丧。

同年9月26日，太傅銜太保陆润庠去世，溥仪予谥“文端”，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润前往奠醊，赏银3000元治丧。

民国5年（1916年）3月3日，庄亲王载功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瀛前往奠醊，予谥“恭”，赏银1000元治丧。

同年4月5日，内务府大臣景丰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诚慎”，派贝子载灃前往奠醊，赏银5000两治丧。

同年4月27日，实录馆总裁荣庆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赏银5000两治丧。

同年8月30日，毓庆宫行走徐坊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忠勤”，派贝勒载润前往奠醊，赏银3000元治丧。

同年9月2日，前内务府大臣奎俊去世，溥仪派贝勒载瀛前往奠醊。

同年10月4日，前弼德院顾问林绍年去世，溥仪赏银500元治丧。

同年12月31日，前闽浙总督魂光涛去世，溥仪予谥“威肃”。

民国6年（1917年）1月29日，庆亲王奕劻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涛等前往奠醊，予谥“密”，赏银3000元治丧。

同年2月15日，礼亲王诚厚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质”，派贝勒载润前往奠醊，赏银2000元治丧。

同年11月16日，前郡王銜多罗贝勒载瀛去世，溥仪赏银4000元治丧。

民国7年（1918年）3月13日，前东三省总督锡良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文诚”，赏银500元治丧。

同年4月29日，前大学士瞿鸿机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文慎”。

同年7月30日，御前行走熙凌阿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派溥侁前往奠醊，赏银500元治丧。

民国8年（1919年）1月15日，前镶蓝旗蒙古都统张德彝去世，溥仪“加恩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同年7月10日，前署热河都统昆源去世，溥仪赏银500元治丧。

同年11月8日，衍圣公孔令贻去世，溥仪赏银500元治丧。

同年10月11日，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奏请将已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加恩赐恤。溥仪下旨：“盛宣怀著加恩开复一切处分，照例赐恤。”

民国9年（1920年）1月5日，毓庆宫行走梁鼎芬去世，溥仪赏给陀罗

经被，赠太子少保衔，予谥“文忠”，派贝勒载瀛前往奠醊，赏银 3000 元治丧。

民国 10 年（1921 年）4 月 24 日，庄和皇贵妃去世，溥仪尊谥“恭肃”。

同年 9 月 30 日，溥仪生母醇亲王嫡福晋瓜尔佳氏去世，溥仪即日至邸成服行礼。

民国 11 年（1922 年）1 月 19 日，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文端”，派贝勒载瀛前往奠醊，赏银 8000 元治丧。

同年 1 月 24 日，陆军检阅使毅军军统姜桂题去世，溥仪赐祭一坛，赏银 1000 元治丧。

同年 4 月 10 日，肃亲王善耆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忠”，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银 3000 元治丧。

同年 9 月 29 日，毓庆宫行走伊克坦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晋赠少保，予谥“文直”，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银 3000 元治丧。

同年 12 月 16 日，贝勒毓朗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敏达”，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银 2000 元治丧。

民国 12 年（1923 年）9 月 12 日，张勋去世，溥仪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润前往奠醊，赏银 3000 元治丧。

